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冷战中的盟友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

沈志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寻求真相


ISBN 978-7-5108-1499-0

定价：88.00元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冷战中的盟友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

沈志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中的盟友 / 沈志华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7
（沈志华冷战史文集）
ISBN 978-7-5108-1499-0

Ⅰ. ①冷… Ⅱ. ①沈… Ⅲ.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文集
Ⅳ. ①D8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6963号

冷战中的盟友

作　　者　沈志华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36
字　　数　618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499-0
定　　价　88.00元

编者说明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追寻当下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主导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对当前一系列国际纠纷和冲突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学界掀起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潮。

作为中国“冷战国际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沈志华教授为该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自费从俄国和美国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并无偿地提供给国内外学者使用，从而为该学科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他本人，更是与这些档案朝夕相处，潜心研究，近二十年来主编了多部档案文献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乃至国际史学界对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的叙述。

为此，我社把沈志华教授 1994 年以来发表的部分论文，根据“冷战的起源”、“冷战的转型”、“冷战在亚洲”、“冷战中的盟友”、“冷战的再转型”五大主题编辑为五册，以飨读者。除了对冷战史这个广泛领域中许多不同事件或过程的描述，这些论文集也收入了沈教授对同一论题在不同年代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些内容显得重复，但更多的是对历史过程表述的细微变化，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恰恰显示出随着档案文献不断解密和公布而反映出来的冷战史研究发展和变化的历程。对于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了解这一历程可能更为重要。同时，在每一册中，作为附录，我们还挑选了沈教授整理、编辑的部分国外档案文献，相信对学者的研究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九州出版社

目 录

附录

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

——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开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莫斯科进行的前后长达两个月的访问。中国领导人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同时争取得到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外交谈判，毛泽东终于迫使斯大林做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①] 那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之间在经济关系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苏联是否对中国刚起步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必不可少的援助？从客观上讲，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进一步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性，苏联也有义务为其盟友提供全面的经济援助。然而，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及结果使得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心存芥蒂，他们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必然形成中苏经济关系发展中的心理障碍。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那么，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的程度以及中苏经济关系在战争时期的发展前景的确是难以预料的。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对苏联的依赖，以及苏联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回应，就构成了从中苏条约签订到朝鲜战争结束这一时期[②] 中苏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提，同时也决定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内容、形式及其结果。

中国对苏联的经济依赖首先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国

---

① 关于这次谈判的详细情况，参见沈志华、冈察洛夫：《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② 通常对经济发展的阶段不是这样划分的。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这一时期包括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阶段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笔者如此划分，是考虑到从苏联援华方针的变化来看，这一时期大体反映了斯大林时代最后4年的对华政策。

家之一。旧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2.3%，而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重又仅占 5.5%。[①] 加上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 1950 年初，这种破坏在电力工业达 50%，钢铁工业达 90%，而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一般则在 50–70% 之间。同时，因工业设施不配套、分布不合理以及供销不畅通，即使在完好的工业企业，其设备利用率也只有 45% 左右。由此造成社会失业现象严重，当时全国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约 150 万人，尚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口。[②] 农业生产同样落后，1949 年粮食平均亩产 137 斤，棉花 21 斤。[③] 此外，因大面积农田（12795 万亩）受灾，农业总产量只有 2100 亿斤，为战前平均水平的 75%，粮食减产 150 亿斤以上，灾民达 4000 万人。[④] 交通运输业也遭到严重破坏，1949 年的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只有 229.6 吨公里，仅及 1936 年的 52.7%。[⑤] 生产落后和衰败直接导致了新政府的财政困难，1949 年财政赤字达财政总支出的 46.4%。[⑥]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刘少奇 1951 年 7 月 5 日在一次报告中承认的，中国的经济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⑦] 而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中国当时可以指望的经济援助只能来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⑧]

在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的一个多月里，中国主要领导人与苏联大使频繁接触，不断反映新中国面临的困难，要求苏联给以帮助。朱德希望苏联及时提供大功率拖拉机和其他农机设备，帮助新疆地区顺利开展春播。[⑨] 刘少奇强调新政府刻不容缓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年，第 63–64 页。值得提出作为比较的是，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在革命前的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分别为 42.1%，38% 和 30%，即使在最落后的保加利亚也有 20%。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 40、65、24 页。

③ 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26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 29、38、82 页。

⑤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5 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 119–120 页。

⑦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年，第 35 页。

⑧ 当然，在联合国通过对华实行经济封锁的决议之前，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并未中断，但中共由于其主观意识的原因，已经很难摆脱对苏联的依赖性。

⑨ 1949 年 10 月 24 日 N. V. 罗申与朱德谈话记录，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100，оп.42，п.288，д.19，л.34-36。

的任务是巩固中苏友谊，并表示愿意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以使苏联同志熟悉中国的情况。[①] 郭沫若谈到科学院大量仪器和资料被国民党运往台湾的情况，董必武则讲述了国民党特务对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破坏活动。[②] 陈云和周恩来更为详细地介绍了经济方面的严重情况：因民族资本家大量转移资金，华南地区生产严重下降，而由于海岸封锁，对外贸易也处于半停顿状态，唯一能够使用的天津港，每月交易额仅 300 万美元左右。1949 年 10 月战争仍在进行，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库和多印发两倍以上的钞票来补偿 450 万军队及 150 万国家机关和企业职工的开支。由于大量发行纸币，建国伊始仅一个多月，物价即出现灾难性暴涨达 5–6 倍，尽管政府为稳定物价而向市场投放了大批粮食，但预计 1950 年的粮食价格至少还得上涨一倍。此外，人民政府正在制定 1950 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计划，而中国的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希望苏联专家帮助进行这一复杂的工作，尤其帮助搞好以前处于隔离状态的各原料产地和工业区之间的经济联系。[③] 显然，中国领导人期望 N. V. 罗申将这些情况转达莫斯科，从而为毛泽东亲自访苏解决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进行铺垫。

应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长达两个多月的外交谈判是成功的，达到了缔结新盟约和争取苏联援助的预期目的。不过，苏联被迫接受中国的缔约条件，也的确在斯大林心中留下了对毛泽东不信任和不满意的阴影。这对于中国期望从苏联得到大量经济援助的前景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然而，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改变了一切。当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战局发生急速逆转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把挽救北朝鲜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而毛泽东在经济面临重重困难，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特别是苏联拒绝出动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毅然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做出让步，决心单独出兵朝鲜与美国较量。[④] 毛泽东在危急关头做出的决定，不仅解救了金日成，也使斯大林如释重负——苏联由此摆脱了因做出朝鲜战争的轻率决策而在冷战格局中所处的尴尬境地。其结果一方面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一方面也使莫斯科转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看法。对此，中国

① 1949 年 10 月 25 日罗申与刘少奇谈话记录，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9，л.37-43。

② 1949 年 10 月 28 日罗申与郭沫若，罗申与董必武谈话记录，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9，л.63-65，69-71。

③ 1949 年 10 月 28 日罗申与陈云谈话记录，11 月 15 日罗申与周恩来谈话记录，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9，л.58-62，81-95。

④ 笔者关于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过程的论述，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 年，第五章。

领导人深有体会。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①]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②]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苏同盟出现了新的局面。在整个战争期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配合默契，协调一致，[③]而且经济关系方面的相互合作和援助也迅速发展起来。此期中苏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苏联对华援助，所以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也是以苏联援华的内容为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时中国经济状态正处于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过程中，中苏双方对于他们之间将要形成的经济关系既没有准备，又缺乏经验，因而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矛盾、混乱、重复、遗漏的情况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史料也是零乱庞杂的。笔者在考察中，把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方式和途径分为提供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开办合股公司、提供技术资料、派遣苏联专家、培养中国专家和协助编制经济计划等几个方面。这种划分或许不够科学，但采取这种条理化方式进行考察的尝试，无非是希望把复杂纷乱的经济现象看得清晰一些。

一、提供低息贷款

早在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共领导人就多次要求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在2月6–7日同米高扬的最后会谈中，毛泽东明确请求苏联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希望从1949年起的3年内就得到这笔款，将来新中国连本带息一并偿还。[④]当刘少奇于6月27日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当天的会谈中就告诉刘少奇，联共（布）中央决定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的商品形式向中共提供3亿美元贷款，利息1%，为期5年。[⑤]7月30日刘少奇与马林科夫签订了贷款协定，但中方一时无法提出全部货单，要求苏联专家来华组成共同委员会协商确定，事情便拖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2页。

② *Юдин П.*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07.

③ 详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④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9，оп.1，д.39，л.85-86。详见*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г.，№3，с.99-104。中国有论著说，周恩来提出贷款4亿美元，而米高扬只答应给3亿。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⑤ 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АПРФ，ф.45，оп.1，д.329，л.1-7。

下来。[①] 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时，双方以政府名义再次签订了贷款协定。[②]

3亿美元数量并不多，据说比苏联最初对东欧国家的援助要少。[③] 但这里的问题不在斯大林，而是中国不愿意多借外债。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④] 至于贷款期限，毛泽东再次希望缩短至3–4年，而斯大林以苏联来不及供货为由没有答应，也确是实情。[⑤] 但无论如何，这笔贷款对于中国政府收拾满目疮痍的经济烂摊子确属雪中送炭。不过，苏联也提出了十分苛刻的附加条件，这一点则使毛泽东深感不快。

在1月22日莫洛托夫等人提交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有关中苏条约的12个文件中，均没有关于贷款附加条件的内容。[⑥] 斯大林在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正式会谈时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给予年息1%的优惠条件非常满意。[⑦] 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当1月26日斯大林收到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草案后，对其中要求苏联立即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权利的条款感到非常意外和不满。[⑧] 后来苏方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大体上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但随之便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协定，其中就包括贷款协定的议定书。

经过一轮谈判后，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其数量令周恩来颇感为难：“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9–220页。

② 协定文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第87–88页。

③ 阿·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郭健哉、隋竹梅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42页。作者是前苏联高级外交官，曾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据查，仅1948年苏联向波兰提供工业设备一项，即贷款4.5亿美元。见《人民日报》1948年2月2日。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13页。

⑤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АПРФ，ф.45，оп.1，д.329，л.29-38。

⑥ 参见1950年1月22日联共（布）中央决议及附件，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41-45。

⑦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АПРФ，ф.45，оп.1，д.329，л.29-38。当时苏联给东欧国家的贷款利息为2%，而中国规定银行给予工业的低息贷款为月息2.7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99页），合年息3.24%。

⑧ 1950年1月26日A. Ia.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月28日苏方对中方草案的修改稿，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38-55，74-79。斯大林最初对中方草案的大段删改，表现了他的不满情绪。

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①] 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的储藏量，但生产极为落后。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3吨，而1949年仅2766.58吨，1936–1948年平均年出口约7386.6吨；锑矿年产分别为22401吨和1204.77吨，1937–1947年平均年出口约4512.7吨；锡年产分别为11710吨和3500吨，1939–1948年平均年出口3787.1吨；铅最高年产约10000吨，自给略有剩余。[②] 所以，苏联提出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力所不及的，据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③] 尽管经过反复谈判苏方最后接受了中国的请求，但这个附加条件的提出，以及苏方坚持要在协定中解释年息1%是对中国的特别优惠条件，[④] 已经有理由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的盛气凌人的味道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感觉，当刘少奇汇报说，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苏条约等七个文件后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鉴于苏联因为战略原料(钨、锑、锡)之不足而处在一种被限制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照顾苏联愿望”数句似可删去时，毛泽东复电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⑤]

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巩固国防和解放台湾的需要，特别是后来应付朝鲜战争的需要，中国只得将本来就不多的贷款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进口军事物资和装备，而此期真正在经济建设方面使用的苏联贷款则是有限的。例如，贷款协定尚未签字，中国已经把1950年度6000万美元贷款中的4000万用于购买飞机(340架)、汽车、降落伞、钢轨(43089吨)、高射炮、炮弹、汽油及空军器材等军事目的了。[⑥] 因此，1950年9月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通令强调：苏联贷款已列入国家预算，故各部门应把贷款物资作为国家财政的正式投资，扣顶其当年预算，而不能视作预算外拨付。有关此项贷款的管理、使用、还本付息等事宜，均统一由中央人民政府财

① 1950年1月31日中方对贷款议定书的修改草案，2月2日苏方关于贷款议定书提交的草案，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23-26，39-49。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47–49页。

③ 1950年2月2日、3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29-34，50-55。

④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95–996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04、407–408页。

⑥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996页。

政部负责办理。[①] 中国出兵朝鲜以后，苏联为向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而设立了专用军事贷款，并根据 1951 年 2 月和 9 月的协定，分别提供了 4 亿和 6 亿卢布的军事贷款。[②] 但中国仍然不得不将部分国家预算用于战争，如 1951 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 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 32%。[③] 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 年 9 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 5 年中再贷款 40 亿卢布，其中用来购买工业设备的仅 8 亿卢布。[④]

尽管如此，苏联的 3 亿美元贷款按 1950 年汇率折算人民币约合 9 亿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 62.99 亿元中，所占比例高达 14.3%。[⑤] 而且，中国将苏联贷款集中使用在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等基本建设的重点项目上，所以，这笔贷款对于新中国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援建重点项目

可以说，在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 156 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 50 个项目。1950 年 2 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 50 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了 1 个项目，合并了 2 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 47 个，具体情况如下表：[⑥]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年，第 627–628 页。

② 关于军事贷款的情况散见于 1951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 月 19 日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9 月 20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45，оп.1，д.337，л.4-5，26-35，д.341，л.125-127。1950 年 1 美元折合 4 卢布。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551 页。

③ 1951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6-19。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58 页；1952 年 9 月 3 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АПРФ，ф.45，оп.1，д.343，л.89-90。

⑤ 投资总额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107 页。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参见 1951 年 2 月 24 日罗申给苏联外交部、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电报（АПРФ，ф.45，оп.1，д.337，л.69-72）。百分比为笔者计算所得。

⑥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第 14–15 页。

表一 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情况

	项目总数	按建设性质分		按建设地区分	
		改建扩建	新建	东北	内地
一、能源工业					
1. 煤炭工业	10	5	5	8	2
2. 电力工业	11	5	6	6	5
二、原材料工业					
1. 钢铁工业	3	2	1	3	
2. 有色金属工业	3	1	2	3	
3. 化学工业	5		5	4	1
三、民用机械加工	7	2	5	7	
四、国防军工	7	7		4	3
五、造纸工业	1		1	1	
合 计	47	22	25	36	11

表中的 3 个数字，即能源工业项目 21 个，占 44.7%，改建和扩建项目 22 个，占 46.8%，东北建设项目 36 个，占 76.6%，充分说明这一援建工程带有为工业化打基础和恢复经济的性质。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和朝鲜战局趋向缓和，这些项目在恢复时期内陆续开始破土动工。从成套设备进口的完成情况看，有些项目是可以分阶段建成投产的。按国家统计局 1953 年 3 月 11 日的统计报告，1950–1953 年中苏共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 68394 万卢布，3 年累计实际进口 46974 万卢布，完成合同 68.7%。其中上述企业中已经全部完成进口合同的有抚顺电站（一期）、阜新电站（一期）、西安电站（一期）、郑州电站、乌鲁木齐电站、丰满水电站（一、二期）、重庆电站、沈阳风动工具厂等 8 个项目，完成 80% 以上的有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铝厂（一期）、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机械一厂、富拉尔基电站（一期）、太原电站（一期）、大连化工厂等。[①] 所以，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与恢复时期全部新增固定资产金额和生产能力数量比较，以下重点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如表二[②] 所示）足以说明 1950–1952 年苏联援建的项目对于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未来工业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1950–1952 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 59 亿元，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 22.2 万千瓦，煤炭开采 1563.7 万吨 / 年，生铁 76.4 万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年，第 386–387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270 页。其中不含军工项目。

吨 / 年，钢锭 55.8 万吨 / 年，钢材 33.6 万吨 / 年。[①] 而表二所列部分重点项目完全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合计达 41.39 亿元，实现生产能力新增：电力 87.55 万千瓦，煤炭开采 780 万吨 / 年，生铁 250 万吨 / 年，钢锭 320 万吨 / 年，钢材 250 万吨 / 年。苏联援建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表二　恢复时期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开始建设时间	建成投产时间	累计投资（万元）	新增生产能力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一、煤炭工业						
辽源中央立井	1950	1955	5770	采煤	万吨	90
阜新平安立井	1952	1957	8334	采煤	万吨	150
阜新海州露天矿	1950	1957	19472	采煤	万吨	300
鹤岗东山 1 号立井	1950	1955	6512	采煤	万吨	90
鹤岗兴安台 10 号立井	1950	1956	7178	采煤	万吨	150
二、电力工业						
阜新热电厂	1951	1958	7450	机组容量	万千瓦	15
抚顺电站	1952	1957	8734	机组容量	万千瓦	15
丰满水电站	1951	1959	9634	机组容量	万千瓦	42.25
富拉尔基热电站	1952	1955	6870	机组容量	万千瓦	5
郑州第二热电站	1952	1953	1971	机组容量	万千瓦	1.2
重庆电站	1952	1954	3561	机组容量	万千瓦	2.4
西安热电站	1952	1957	6449	机组容量	万千瓦	4.8
乌鲁木齐热电站	1952	1959	3275	机组容量	万千瓦	1.9
三、钢铁工业						
鞍山钢铁公司	1952	1960	268500	生铁	万吨	250
				钢	万吨	320
				钢材	万吨	250
四、有色金属工业						
抚顺铝厂（一、二期）	1952	1957	15619	铝锭	万吨	3.9
				镁	万吨	0.12
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	1952	1958	32681	铝材	万吨	3
五、机械工业						
沈阳风动工具厂	1952	1954	1893	风动工具	万台 / 吨	2.554

除此之外，苏联还应中国政府要求，援建了一些临时提出的项目。如 1951 年 1 月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和段子俊、沈鸿受命前往莫斯科，谈判由苏联紧急援建中国航空工业的计划。苏联对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 A. Ia. 维辛斯基为首的七人委员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266、268 页。

会与中方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谈，苏联答应帮助中国迅速建造起年修理能力为3000台发动机和600架飞机的修造厂，当年即大修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而且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在中国进行设计，并尽快派专家赴华开展工作。考虑到航空工业对中国的紧迫性，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送交斯大林审批后，只用三个小时就批准了。在这个基础上，1951年4月中国政府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①]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必须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这一点，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看得十分透彻。1952年1月16日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国今后工业化的方针，必须把自力更生同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援助密切结合起来。张闻天认为，对于中国今后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大型工厂和矿场的建设，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详图直到成套设备订货及安装，都应全部地、彻底地采用苏联的计划、装备与专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一开始就真正建立起最新式的、最进步的、最现代化的工业工厂。这样的工厂，只要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帮助，即可最迅速地建立起来，用不着走弯路，用不着摸索又摸索，而且也不会发生乱子。因为苏联同志们有充分的经验，有足够的设备，并且有最可靠的政治保证。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今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这一方面。张闻天此信引起中共中央极大重视。毛泽东于1952年2月8日批示："关于工业问题，请陈〈云〉、李〈富春〉注意随时提到中央会议加以讨论"。中财委党组干事会于2月18日讨论了张闻天的信和有关来电，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一、凡属开办新工厂或在旧厂中改建重要装备而我无改进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而且对于接收定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均需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二、初步设计批准后，凡我不能自制的装备，必须依靠苏联供应。三、因今后贸易部进口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购买工业装备和器材，一切工业部门必须抽出一批熟悉苏联设备和器材的干部及可靠的技术人员给进口公司。四、凡属向苏订购成套装备或订购大量器材的厂矿，必须派出该厂矿的第二负责人带队常驻苏接洽定货、催货。不派重要负责人者，不予定货。五、对于重要工厂的设计和定购装备工作，中央财经各部的负责人必须十分重视，必要时必须亲去苏联接洽。六、中央各部及各厂矿所开定单，事前

---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12、131–132页；1951年1月10日维辛斯基与何长工谈话记录，АВПРФ，ф.0100，оп.44，п.322，д.11，л.1-3；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5–307页。

必须慎重确定，一经我方商务代表团与苏方签订了议定书之后，就不能变更。七、各部门各厂矿经中贸部向苏联提出的定货单的金额及定单中的主要装备，必须仍由中财委批准，未得中财委批准不得变更。八、已征得外交部同意加派四个来往于中苏的外交信使，专送财经信件，如此等等。中共中央于同年 3 月 7 日致电张闻天和各中央局，表示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意见。[①]

156 项工程的第二批项目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一五计划的制定开始的。1952 年 8-9 月，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即将于 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和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原则确定之后，李富春等继续留下与苏方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 8 个月。苏联政府在对周恩来交付的一五计划重点工业项目逐一进行了极为详细周密的研究后，除少数中国自己能办或因地质资源不明和一五计划期间无法上马的项目外，同意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甚至增加了一些应该开办而中方没有考虑到的企业。双方最终确定，在 1953–1959 年内由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 91 个企业。1953 年 5 月 15 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其中确定的苏联援建项目为 2 个钢铁联合企业，各年产钢 120–150 万吨；8 个有色金属企业，年产锡 3 万吨，铝 1.5 万吨，钼精矿 1 万吨，钨精矿 3 万吨，钒钛精矿 13 万吨；8 个矿井、1 个煤炭联合厂，年产煤 1990 万吨，3 个洗煤厂，年产煤 450 万吨；1 个石油炼油厂，年处理原油 100 万吨；32 个机器制造厂，其中年产冶金、矿山、石油设备 7.5 万吨，金属切削机床 3.6 万吨，载重汽车 6 万辆，拖拉机 1.5 万辆，轴承 1000 万个；16 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年产发电机组各为 36 万千瓦，并能扩大到 60 万千瓦，以及其他无线电和电气产品；7 个化学厂，其中 3 个化学厂年产氮肥 18 万吨，合成橡胶 1.5 万吨；10 个火力发电站，年发电量共 41.3 万千瓦；2 个医药工业企业；1 个食品工业企业，共 91 项。同时，还要帮助中国 35 个国防工业企业完成设计、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各种技术援助。作为偿付，中国则要在 1959 年以前供应苏联 16 万吨钨精矿、11 万吨锡、3 万吨锑、3.5 万吨钼精矿、9 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李富春报告说，包括在建的 50 个项目在内的这 141 个企业的建成，到 1959 年中国的工业能力将大大增长，在黑色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器制造、动力机械制造和化工方面，都将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不仅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钢铁、煤炭、电力和石油等主要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363–368 页。

工业产品将达到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 1937 年的水平。[①]

当时，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已经苏共十九大通过，为了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这些企业，苏联必须重新调整计划、调度生产和安排人员。例如，除需派遣大量技术专家来华外，仅国内设计单位就要增加 3 万人。[②] 此外，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苏方承担 70–80%），供应设备（苏方承担 50-70%），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苏联都将给予全面的援助。[③] 总之，正如周恩来给苏联政府备忘录的回文中所说，苏联政府对于建设和改建中国的 91 个新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 50 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种种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④]

三、发展双边贸易

通过商品贸易换取恢复和发展经济急需的生产资料是建国初期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目的之一，在这方面新中国所能依靠的也只有苏联及东欧几个国家。建国前夕，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1946–1948 年间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美国所占份额平均分别为 27% 和 51%，即使到 1949 年，也分别保持在 13.7% 和 24%。[⑤]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政策，1950–1951 年期间，中美贸易逐渐减少，直至完全停止，中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也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同苏联与东北民主政府的贸易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一样，中苏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0 年 1 月 5 日包尔汉和王震给中央政府的报告反映了各地要求尽快开展对苏贸易的强烈愿望。报告说，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坚决执行中苏友好合作的政策，新疆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迅速恢复和苏联的通商，来克服本省经济上的困难，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332–364 页。上述稀有金属供应量包括了 1950 年协议中规定的数字。另，笔者询问本卷编纂者董志凯得知，上述 91 个项目与 35 个军工企业有部分重叠。

② 袁宝华：《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第 25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359–364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02 页。

⑤ *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49-1952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c.115.

和依靠苏联的帮助进行各项生产建设，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报告要求在中苏两国通商条约尚未签署之前，允许新疆与苏联开展地方非正式的贸易往来。① 是年，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提供的货物便达 2.838 亿美元，其中包括冶金、矿山、运输、能源等方面的设备和材料，都是恢复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物资。②

据中国有关部门当时的报告，苏联对华贸易是“带有政治性质”的，“确实是站在帮助我方经济建设的立场来进行贸易工作的”。例如，1950–1952 年中国进口最多的是工业设备器材及油脂（占 63.7%）、铁路设备器材及油脂（9.9%）、交通通讯器材及油脂（7%）和农业机器及种畜籽种（4.8%），其中很多都是中国生产建设急需而西方国家不肯出卖的产品。虽然有些品种的供应对于苏联来说也具有相当难度，但还是尽量满足了中方的要求，甚至在没有议定价格和没有签订合同之前，就按中方提出的日期把一些急需商品运往中国，既不需付款，也不要定金。在价格方面，苏联也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凡供应中国的商品价格，都比同期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低。如矽钢片的价格为香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价格固定不变，不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对于中国临时急需的各种商品，虽然在中苏贸易合同之外，苏联也都尽量供给。如 1950 年秋为帮助中国稳定糖价，苏联从远东地区调拨大量食糖卖给中国。至于中国的出口商品，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恢复生产，对于他们本可自给而无须进口的许多货物，都设法增加其国内的消费量，大量向中国购买。如大宗进口东北的苹果和渔产等。即使对一些并不需要的“冷货”，苏联也照收不误。③ 到 1953 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苏贸易在新中国最初的工业化建设中更具有关键意义，因为恢复时期引进的重点项目主要是通过贷款方式，而同一五计划直接有关的成套设备进口则更多地要采取贸易形式。经过对 1953 年中苏贸易总货单的认真研究，1953 年 2 月 13 日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李强等联名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认为，“苏方交来之货单是经过慎重考虑研究

① 1950 年 1 月 5 日包尔汉、王震致周恩来、陈云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75，目录 2，卷宗 112，第 7–9 页。

② *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6，c.75. 据周恩来在莫斯科谈判时发回的电报，年初中国提交的进出口货单均已接近 2 亿美元。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 996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 年，第 500–507 页；《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547 页。关于价格问题，周恩来在 1950 年 4 月 9 日给李富春等谈判代表的电报中提到苏联进口价格偏高而中国出口价格偏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1 页）。笔者以为，周电所说，只是当时谈判代表的感觉，而外贸部和海关总署的报告则是根据后来实际情况写的。

的，进口方面绝大部分满足了我们的需要”。[1]

不过也应该看到，此期中苏贸易往来并不是完全和谐的。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还在1950年2月双方进行贸易协定谈判时，就在汇率问题上发生了矛盾。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伍修权认为由于中国有求于对方，而作出了让步和妥协，两国货币的比值实际上是在相对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的。[2] 当时的合理汇率应如何确定，现在恐怕很难考察了。不过，苏联对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视的，特别是斯大林本人对此颇为计较。

1951年2月24日苏联大使报告：中国政府从1950年12月19日起连续4次降低美元汇率，即从1美元兑换30410元人民币（旧币）降到11890元，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按美元计算的，所以美元汇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即从1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500元降低到5720元。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含金量虽尚未确定，但银行是按固定的官方价格收购黄金的，罗申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黄金计算的汇率大约低20%。因此，罗申认为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自动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特别是1951年苏中之间贸易结算和非贸易结算将进一步增长，情况会更加不利。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3] 至于苏联政府如何处理罗申提出的问题，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看不到下文，但据多勃雷宁回忆，此后苏联外交部和财政部曾联合起草了一份有关人民币与卢布汇率的文件，其决定是有利于中国的。当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一方面出于谨慎，一方面以为汇率并非重大问题，不便打扰斯大林，遂将文件搁置起来。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使馆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于是，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向政治局宣布将葛罗米柯贬为驻英国大使，佐林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4]

此外，在要求中国供货方面，苏联也曾提出过一些强人所难的条件，橡胶问题

---

①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603页。

②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6–247页。

③ 1951年2月24日罗申给苏联外交部、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电报（俄国档案，馆藏号缺失）。

④ 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王为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1页。1953年中苏商定人民币与卢布的非贸易兑换率为1∶2，1956年实际调整为1∶6。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

就是其中一例。橡胶是苏联本身无法生产而在冷战的环境中又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因而希望通过中国的途径搞到。早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时，斯大林就询问中国南方是否能够种植橡胶。[①] 20 世纪初中国从马来亚半岛引进橡胶树，但只有海南岛地区适宜种植。解放初期，种植面积 29332 亩，年产橡胶约 7500 担，尚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②] 而且随着西方国家开始实行禁运，中国要进口橡胶也是有困难的。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在 1951 年利用在天津和广州的两家英国公司进口了 4800 吨橡胶。[③] 斯大林对中国能够向苏联提供橡胶表示满意，但又感数量不足，于是提出以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开发橡胶生产。毛泽东同意在中国南方种植橡胶，但认为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建议苏联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而中国以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答应向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 50%以上，而且按低于世界市场的优惠价格提供。[④]

不知是中方有意拖延还是保证苏方要求的数量确有实际困难，总之，直到 1952 年 9 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双方才签订了橡胶协定。斯大林在会谈中直率地说："我们想从你方每年得到 1.5–2 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周恩来回答，中国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如数供应，但考虑到"敌人的封锁和其他反华措施"，担心无法完成义务而被视为违反协定。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但又不客气地指出，中方应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至于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如果中国不能按商定的数量提供橡胶，苏联只好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同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 1 亿卢布的贷款数额，斯大林也表示有困难。[⑤] 9 月 15 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 7000 万卢布，在出产橡胶之前，中国每年需从第三国为苏联尽可能购得 1.5–2 万吨橡胶，不足部分以钨、钼、锡、铝、锑等原料顶替；出产橡胶后，每年产量的 70% 提供给苏联，1963 年以前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以后则按低于国际市场 8% 的价格售与苏联。[⑥] 为了保证朝鲜前线的运输和供应，周恩来签订这样的协定确有些勉为其难。于是，

① 1949 年 12 月 16 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② 见《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24 日。

③ 1951 年 7 月 17 日罗申与陈云谈话记录，АВПРФ，ф.100，оп.44，п.332，д.13，л.36-39。

④ 1951 年 5 月 26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6 月 21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 年 3 月 28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45，оп.1，д.338，л.91；д.339，л.69-70；д.342，л.126-130。

⑤ 1952 年 9 月 3 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АПРФ，ф.45，оп.1，д.343，л.89-90。

⑥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40–41 页。

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周恩来便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紧缩华南植胶的计划。[①]

但无论如何，中苏贸易的发展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1949 年中苏贸易额仅有 2630 万美元，1950 年即为 24190 万美元，增长 8 倍多。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苏贸易额的比重 1949 年占第 3 位，1950 年则跃居第 1 位，为 30%，1953 年更上升为 56.3%。[②]

四、开办合股公司

在 50 年代初的中苏经济关系中，开办中苏合股公司是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有的著作认为股份公司协定表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从后来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谈话记录看，中国领导人对股份公司也颇有不满，似乎开办合股公司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③] 这样说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④]

苏联对于在中国开办合营股份公司的事很有兴趣，早 1939 年 9 月苏联就与国民党政府共同组建了以哈密 – 阿拉木图为定期航线的中苏航空公司(有效期 10 年)，1949 年又提出要签订新疆金属和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⑤] 到 1950 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方已经起草了苏中航运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议定书及管理东北地区苏中合营股份公司的决议，正如周恩来所说，“苏联对经济合作颇感兴趣”。[⑥] 这些都是事实，说明苏联从其经济利益出发，急于建立几个中苏合股公司。但同时必须看到，新中国领导人对于合股公司的事情同样是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01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第 499–500 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41 页。

③ 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47 页；1956 年 3 月 31 日罗申与毛泽东谈话记录，АВПРФ，ф.100，оп.49，п.401，д.9，л.87-98。

④ 葛罗米柯回忆说，中国不愿意在股份公司问题上与苏联合作，斯大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恐怕也属不实之词。见安·安·葛罗米柯:《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下卷，依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第 164–165 页。

⑤ 详见瞿韶华主编:《航空史料——中华民国交通史料（三)》，台湾“国史馆”，1991 年，第 358-363、377–384 页；Donald Gillin and Ramon Myers（ed.)，*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Hoover Press，1989。*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 в Китае в 1942-1952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6，с.112.

⑥ 1950 年 1 月 22 日联共（布）中央关于中苏谈判的决议及附件，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41-45；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 993–997 页。

积极的。当米高扬在西柏坡时，任弼时就提到了苏中经济联合体和租让企业的问题。[①] 1950 年 1 月 2 日，刘少奇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说：彭德怀带来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关于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两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签订大体相同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富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少奇认为此事可行，只是经营期限应从 45 年缩短为 20 或 25 年为宜，还提出不止在新疆，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企业。刘少奇与在京领导人商议后建议毛泽东亲自向苏联提出这一要求。[②] 应该说，中苏合办股份公司是双方的共同要求，也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然而，当中苏关于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属两个合股公司协定的消息发布以后，不仅西方国家的报纸纷纷指责中苏石油和金属两公司协定是“苏联吞并新疆的行动”，是最卑劣的“经济帝国主义”行为，[③] 而且在北京的学生当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他们“怀疑这两项协定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并有要求退团和向人民政府请愿者。”[④] 西方的指责自有其政治目的，而国内学生的骚动则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流露，现在看来，也是对利用外资等现代经济运行方式缺乏了解的表现。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股份公司的形式，而要看协定的内容是否公平互利。中苏股份公司主要是指 1950 年 3 月 27 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以及 1951 年 7 月 28 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造船公司。[⑤] 根据协定，中苏双方股份各占 50%，公司领导职务也是双方按期轮换，股份公司赢利的 20% 应作为税款交给中国政府，而苏联有权出口的 50% 产品还应向中国海关交纳关税。对比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中东铁路协定、中苏航空公司协定以及苏联提出的中苏金属和石油公司的条款，在公司实际管理权和交纳关税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⑥] 尽管从现在的

---

①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3，с.99-100.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219–220 页。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0 年 4 月 1 日。

④ 1950 年 3 月中央关于中苏签订两合股公司协定后应注意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01，目录 5，卷宗 5，第 5–6 页。

⑤ 上述协定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88–97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790–794 页。

⑥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 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 年，第 1331–1333 页；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90-394、404-405、412–427 页。

观点看，苏联坚持平分股权和较长的期限[1]显然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并没有损害中国主权的意图和表现。据参加股份公司谈判并担任文字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会谈中双方都强调了真诚合作、平等互利和平权合股的原则，"我国保持独立而不依赖，苏联尽力帮助而不剥削"。[2]

事实上，这些合股公司的建立对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1955 年 2 月 23 日苏联驻华使馆曾向国内提交了一份关于上述 4 个中苏股份公司的详细情况报告，反映了这些公司运营的基本状况：[3]

中苏金属公司的业务是在中国新疆地区普查、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协议规定公司股份资本 2800 万卢布，双方股份额均等。后来双方协商将公司股份资本增加到 1 亿卢布，每方资本 5000 万卢布。公司职工共 8924 人，其中苏方 400 人。公司经营正常，产量逐年增长（见表三）。

表三　中苏金属公司主要产品产量

年份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总产值（万卢布）		1501.46	2589.48	3883.31	4805.10
产量（吨）	10% 绿柱石精矿	873	1004	1204	1300
	4% 锂辉石精矿	1095	3155	3863	5000
	钽 – 铌精矿	0.98	1	5	0
	50% 铅精矿	—	—	—	9000
	50% 锌精矿	—	—	—	5000
	云母（半成品）	19	205	122	100
	含量 15% 的铅锌矿石	2100	10300	18700	—

注：总产值按 1951 年计划不变价格计

由于建设初期地质勘探和其他公用设施投入较大（占 3 年总支出的 52.3%），且冲销成本数额增加，1953 年又开缴营业税（184.2 万卢布），以及矿石中金属含量下降等因素，经营成本较高，特别是自 1953 年 9 月 1 日起人民币对卢布比价提高了 26%，而苏联购买的公司产品是以卢布支付的，从而相应地降低了以人民币计算的产品出厂价格，导致 1953 年公司亏损 686.8 万卢布。此外，苏方的亏损还要额外加上支付苏方工作人员生活补贴费用 719 万卢布。不过，除去汇率变动的因

① 石油、金属公司 30 年，造船公司 25 年，民航公司 10 年，均超过中方最初设想的合作年限。

②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47–248 页。

③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53，д.384. 除特别注明外，以下关于中苏股份公司的材料均出自于此，其中表格为笔者计算后设置。

素，这种亏损应该说是正常的。所以，苏联使馆的结论是：金属公司目前已经具有可靠的原料基地，并且继续发展生产的前景美好。

中苏石油公司的业务是在新疆勘探、开采原油，并提炼各种工业用油。公司协定总资本4600万卢布，后经换文增加到2亿卢布。公司职工5603人，其中苏方人员357人。在苏联帮助下，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发展起来。最初只有独山子一地，仅有职工100多人，两口油井日产原油2–3吨，炼油厂每日处理原油7吨左右。到1952年中，采油点已扩展到南疆和北疆十几个地区，共有油井10口，日产原油200吨，炼油能力也提高到日处理250吨。[①] 石油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销售。1951–1953年生产情况如表所四示：

表四　中苏石油公司主要产品产量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计划
石油开采（吨）	3500	52100	70200	75000
石油加工（吨）	2500	52000	70100	75000
其中：汽油	600	11500	20400	33300
煤油	600	1600	3900	7500
柴油	300	3500	17500	18000

表中数字显示，石油公司产量不仅逐年增加，而且涨幅较大。由于石油产品全部内销，不受汇率影响，所以公司经营是赢利的。如果不计无效钻探的费用和苏方人员的补贴，随着产量增加，公司获得总利润1951年为52万卢布，1952年为66.4万卢布，1953年为239.5万卢布。另据中国报纸当时的报道，与1951年比较，1953年的钻井生产增长6倍，勘探面积扩大10倍，原油产量增长18倍以上。公司还培养出了2000多名优秀的中国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②]

中苏民航公司经营的航线包括北京–蒙古–伊尔库茨克，北京–沈阳–赤塔，北京–乌鲁木齐–阿拉木图，以及1953年底投入运营的乌鲁木齐至喀什新航线。公司股本确定为4200万卢布。公司职工896人，其中苏方236人。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期间，共获利536.72万卢布。其中苏联分得利润228.5万卢布，中方获利润和税收共计308.22万卢布。航空公司对中国的最大帮

① 1952年7月中苏石油公司党的工作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0，目录4，卷宗95，第6–7页。

② 《人民日报》1953年10月6日。

助是培养了中方的场站管理和地勤技术人员，截至 1953 年底，公司在经营期间总共从中国公民中培训出 244 名专业人员。[①] 其中部分航空机械员和无线电专业人员后来被调到中国民航工作，以弥补中国民航严重缺乏干部和经验之不足。

成立中苏造船公司的目的是建造和修理船只及其他水上工具。公司协定股本 1.4 亿卢布。[②] 公司职工 9400 人，另有 78 名苏联专家。造船公司虽然成立较晚，但形成生产能力很快。1952 年便完成了生产计划额定 4960 万卢布的 94%，造船 54 艘，总排水量为 11000 吨，并大修、中修和小修船只 18 艘，完成了中方 180 万卢布的定货。1953 年则完成了计划定额 5000 万卢布的 105.6%，造船 19 艘，总排水量 10000 吨，修船 14 艘，完成了中方定货 3200 万卢布。

当然，在经营过程中，中苏之间确实也存在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例如中苏金属公司的投资和估价问题。按照协定，公司股本 2800 万卢布，中苏各应投资一半。苏方以机器设备作为投资，中方则以矿产、地皮、房屋及当地建筑材料作价入股。1951 年公司成立时，苏方投资计算价值为 2200 万卢布，而对中方投入的房屋、机场、草场等依照当地价格仅作价 60 万卢布。作为主要投资构成的矿产，因中方毫无经验，无法估价。此时，苏方坚持要将协定附图中所指定的矿产及所需地段和现有房屋等总共作价 1400 万卢布。换句话说，中方不仅要将该地段 30 年内开采的全部矿石算作中苏共有资产，而且还要再投资现款 800 万卢布。苏方如此苛刻，以致自认外行的中方当事人也认为如此计算中国太吃亏，要求中央政府定夺。[③] 此外，在具体工作中也有矛盾。如在金属公司喀什矿务管理局，由于中方管理人员多系部队转业干部，既不懂技术，又不会俄语，而翻译人员也极为缺乏（全矿区只有一名），很难与苏方专家和干部合作，甚至产生了“没有看见苏联同志先进经验”的错误想法。同时，由于同样的原因，苏联专家有事也很少与中方商量，以至造成双方管理人员的不合。[④]

此外，苏联驻华使馆党组书记瓦日诺夫在 1954 年 2 月 25 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也反映了股份公司苏方人员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苏方代表在公司管理工作中违反

---

① 据中国史料，该公司为中国民航培养各种技术人员 340 名，还接受中国民航局实习人员 32 名。姚峻主编：《中国航空史》，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 年，第 215–217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 790–794 页。

③ 1952 年 8 月 17 日中共中苏金属公司党委会致中央新疆分局的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0，目录 4，卷宗 95，第 38–40 页。

④ 1953 年 1 月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喀什矿务管理处 1952 年工作总结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0，目录 4，卷宗 95，第 74–76 页。

平等原则，长期占据公司及其管理机构的领导职位而不按规定进行轮换。苏方领导人常常不理睬自己的中方副手，有时还干预中方的职权，不向中方工作人员传授自己的全部工作经验或隐瞒地质勘探结果。破坏平等原则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公司的许多企业里，财务和其他方面的报表、指令都只使用俄文。苏方领导人选用干部任人唯亲，不是选用精通业务的当地干部，而常常让苏联专家的妻子顶替。还有，苏方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也给企业经营造成了损失，提供给公司的设备和材料往往不考虑实际需要，例如，给阿尔泰矿务管理局运来的T-45型传送带和电力机车在当地条件下根本不能使用，公司仓库里积存了大量布匹和皮革。如此等等。[①]

不过，这些大多不是苏联的政府行为，更不能证明合股公司的形式不可取。总体说来，建国初期的几个合股公司在经营上是成功的，对中国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按企业资产计算，除中苏航空公司外的3家股份公司共有资产4.4亿卢布，合人民币约5.86亿元，[②] 而1950–1952年全国新增工业固定资产仅为19.3亿元，[③] 可见这几家股份公司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从经济效益上讲，中苏合营企业也是比较突出的。除4个中苏股份公司外，建国初期还有一些中苏合营企业。1949年底共有中苏合营企业109个，根据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在1950年间大部分企业已经移交给了中国，到1950年底还有38个尚未移交。[④] 据表五[⑤] 显示，在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的整个发展中，中苏合营企业的效益最好，其平均产值为413.26亿元，大大超过了国家公营（162.75亿元）和公私合营（131.60亿元）企业。

---

① 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4，оп.9，д.1933，л.22-31。转引自甘申、扎泽尔斯卡娅：《"兄弟友谊"道路上的坎坷——苏中关系史片断》，马贵凡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期，第23–25页。

② 按美元与人民币1∶3和美元与卢布1∶4的汇率计算。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266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267、267页。另据中财委计划局统计，1950年共有中苏合营企业20个，职工26554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第793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276–277页。

表五　1950 年底国营工业企业发展概况

	企业（个）	百分比	职工（人）	百分比	产值（亿元）	百分比
国家公营	2522	89.6%	1049708	88.2%	410466	89.3%
公私合营	255	9.1%	105771	8.9%	33559	7.3%
中苏合营	38	1.3%	34150	2.8%	15704	3.4%
总计	2815	100%	1189569	100%	459729	100%

注：工业产值按 1950 年 6 月企业不变价格计

这里还应提及的是建国初期苏联向中国移交的企业和资产。虽然移交是根据中苏协定办理的，说不上是对中国的特别援助，但这些企业和资产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1950 年苏联政府将大连市苏联代管或租用的财产，苏联经济机构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给了中国。其中包括 47 个工厂、11 所电影院、188 处宅舍、33 个仓库、23 处地产，共 302 处。移交财产总数比协定签订时苏联照会所列清单还多 18 处。而且，苏联在移交这些企业和资产前还为以后照常生产作了重要准备。如中苏合营的远东电业公司，所属工厂从 12 个扩大到 21 个，工人增加了 4.5 倍，产品种类也由原来的十几种增加到几百种。某机械厂的设备比建厂初期增加了 200%，生产总值提高了 439%。大连修造厂的生产率也比战后初期提高了 36 倍。对中国建设尤为有益的是这些企业培养了大批中国技术人才，仅上述 3 个工厂就培养出技术人员 4650 余名。[①]

从性质上讲，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也属股份公司，但由于历史原因，签订协定时只说是中苏共同管理，称为合办公司。[②] 苏联移交的中长铁路包括基本干线，连同服务于该路的土地、铁路建筑与设备、机车车辆、发电站、电话所与电报所、通讯器材与通讯线路、铁路辅助支线、公务技术建筑物及居住建筑物、经济组织、附属企业及其他企业与机构，以及在中苏共管期间购置、恢复和新建的财产与 1950–1952 年固定资产清查登记时查出的财产，总资产共达 22.8 亿元，其中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 133–135 页。

② 有关协定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 年，第 26–32 页。

固定资产22.4亿元。[1] 更为重要的是中长铁路为中国铁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从1950年5月开始运营，到1952年12月无偿移交给中国，中长铁路货运量增长53.3%，劳动生产率提高56.8%，运输成本降低27%。公司利润则逐年增加，1951年比1950年增长110%，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97%。同时为中国培养出39138名技术和管理干部。铁道部提出了全国铁路必须学习中长路的号召，先后选派上万名干部职工去中长路参观学习。按照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说法，在中苏合办的32个月中，中长路以其"突出的效率高、成本低、利润大的模范行动，成为全国铁路"的"旗帜和榜样"。而中长铁路的全部经验贯穿了体现在1500多名苏联专家身上的"政治品质、技术修养和经验知识融合为一体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2]

五、提供技术资料

对于中国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资料，苏联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提供的，即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

在1949年索菲亚经互会第二次会议上，确定了经互会成员国之间无偿交换科学技术资料的原则。中国虽不是经互会成员国，但苏联比照这一原则，以图书交换的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科技情报和文献。通过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与中国相应单位之间的交换，苏联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科技情报材料、图书和杂志。1950年9月2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下达指示，责成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重新审察1951年国际图书交换计划，目的是大大增加给人民民主国家科学机关的寄书量，其中要特别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交流"，指示还提出"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图书交换，不要求他们数量相等"。在1952年通过的决定中，规定从1953年起，按照不对等原则，向人民民主国家每年多寄25%的科学书籍。因此，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提高了给中国的寄书量（见表六）。1953年，接受苏联科学出版物的中国机关达到300个，其中有31个大型图书馆。[3]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第30–31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274–285、243–247、254–255页；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铁道事业》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5页。

③ *Филатов Л.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1995，№65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7-8.

表六　中苏图书资料交换情况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总 计
苏联给中国（套册）	9955	31653	37098	42136	120842
中国给苏联（套册）	2948	4082	6327	12062	25419

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国特别要求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技术资料，是通过双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提供给中国的。对于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中方实际上只需付移交材料的成本费和复印费，即使这点费用，也不是每每收齐。而 1953 年 5 月 15 日签订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则第一次以独立条款的形式确定了无偿向中国提供技术文件的原则。[①] 对于中方提出的要求，苏联总是能够及时给予满足。如为了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周恩来致信莫洛托夫，希望苏联政府继续向中国提供以下方面的技术资料：苏联现行的工业产品标准，即国家标准、全苏标准、暂行技术条件及各企业的制造规格；建设矿山、工厂、学校、医院的典型设计；工业及交通企业的技术操作规程；机器制造图纸和先进企业的原材料、电力、燃料消耗的技术经济定额等。两天以后，莫洛托夫便答复同意满足中方的要求。[②]

从 1950–1953 年，苏联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 2928 套（件），具体情况如表七所示：[③]

表七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

	整套技术设计文件	基本建设设计方案	机器和设备草图	整套技术文件	整套部门技术文件
1950 年	30		30		
1951 年	338	24	294	1	19
1952 年	507	25	385	27	70
1953 年	599	32	398	28	141
总计	1474	81	1107	56	230

①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с.7-8.

② 1952 年 9 月 6 日周恩来给莫洛托夫的信，《党的文献》1999 年第 5 期，第 3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58 页。

③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с.102.

六、派遣苏联专家

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技术人才。建国之初陈云便告诉苏联大使，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严重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①]情况确实如此，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②] 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是，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③]直到恢复时期结束，全国也仅有16.4万工程技术人员，地质专家总共不到200人。[④]显然，派遣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后，又带来一批帮助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建国前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⑤]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专家非常重视。当第一批苏联顾问团到达沈阳时，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告诫中国同志，要"把他们当作很好的老师"，"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了来京的全体苏联专家及苏联专列的服务员，周恩来则邀请苏联专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随后，毛泽东又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前往坐落在铁狮子胡同的苏联顾问总部参加专家工作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恩来亲自领导了苏联专家工作指

---

① 1949年10月28日罗申与陈云谈话记录，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9，л.58-62。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46页。

③ 1951年7月24日罗申与周恩来谈话记录，АВПРФ，ф.100，оп.44，п.322，д.13，л.44-51。

④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с.7-8.

⑤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6，с.84.

⑥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5–8页。

导小组，日常工作由伍修权、杨放之主持。[①] 中国领导人对这批苏联专家的生活起居也给予特别的关照，刘少奇曾专门致电周恩来，对到京专家的住房、办公室和用车，乃至被褥、洗漱用具和纸笔，每个细节都作了认真交待。[②]

苏联在华专家总顾问最初是科瓦廖夫，因其给斯大林写报告攻击中共领导人，很快便被调回国内。接替科瓦廖夫职务的是阿尔希波夫，在华工作一年多后也奉调回国。1952 年年中来华担任总顾问的是毕考尔金，曾负责协助中国政府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一年后阿尔希波夫再次来华担任总顾问，一直在中国工作达八年之久，经常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③]

关于 1950–1953 年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和统计。有俄国学者说，到 1952 年 3 月，在中国已有苏联顾问和教师 332 名，各种技术专家 471 名。1953 年 7 月中国政府又要求在现有 277 名专家的基础上，再增派 172 名。[④] 而据 1952 年 9 月 21 日周恩来给莫洛托夫的信上说，当时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共有 252 名，除明年需辞聘 31 名和聘期满后回国需另聘 37 名外，请在明年再增派 237 名来。鉴于他们人数大量增加，且分散在许多城市，因此，“有必要增加脱离其他工作的两名副总顾问，一名具有苏联高等学校教育工作及领导工作经验的，负责领导全体在中国的苏联教员的工作，一名负责领导在财经机关及各工业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⑤] 就专家总数而言，据中国档案材料，自 1950 年至 1953 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 1093 人，截至 1953 年底已回国 741 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 342 人（其中重工业部系统 159 人，燃料工业部系统 102 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 52 人）。[⑥] 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 1951 年为 557 人，1952 年为 258 人，1953 年为 395 人。[⑦] 按这个统计，不算 1950 年，苏联来华专家（还是高级的）已达 1210 人。考虑到在华专家工作状况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续聘、新聘者之交叉），以及计算标准的差异性（即有高级顾问、

---

①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87–89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46–47 页。

③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一辑，第 90 页。

④ АВПРФ. ф.06，оп.12，п.22，д.337，л.14；ф.06，оп.13，п.21，д.334，л.1. 转引自 *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6，с.76。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60 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386–388 页。

⑦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с.11.

技术专家、教师和一般工作人员之分)，出现上述统计上的差别是正常的，特别是由于最初派遣专家工作缺乏计划性，想要得到精确数字也未必可能。不过，大体可以确定的是，在本文考察时期，苏联来华的经济技术专家（不算教师）总数至少在 1100 人以上，同期在华工作的大约保持在 250–480 人之间，专家来华的高潮在 1951 年和 1953 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

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到 1953 年，全国总共只有 78 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 500 人。[①] 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 年 2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 16 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 3 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 23 个苏联设计组是 1951 年聘请的。这样，到 1951 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 42 个小组，其中 30 个安排在东北地区。[②] 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 5 个综合专家组于 1952 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规划全国电气化方案，确定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调整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和规划新厂建设，对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进行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 6 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③] 对于中方提出的设计要求，苏方都是尽量予以满足的。据李富春和宋邵文报告，在 1952 年底关于煤矿设计项目的谈判中，对于中国提出的设计要求，苏联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全部予以接受，即使地质资料不完备，也“勉强接受设计”。[④]

在具体工作中，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例如，过去中国被认为是贫油国家，而苏联专家根据石油生成的原理并将中国地层构造与周边国家比较后指出，“中国处在油田国家的中间，中国地下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同时，苏联专家还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解决了低压油田的产油问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三年来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3 倍，1952

---

①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c.7-8.

②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第 14–15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369、374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第 784–785 页。

年的原油产量已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 19.66%，从而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电力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在阜新发电厂安装发电机工程中推广了 16 种先进施工方法，结果安装一部锅炉就节省人工 25000 个，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 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 60 亿元，质量完全合乎苏联先进标准，受到毛泽东和高岗的嘉勉。[①] 在煤炭工业方面，中国煤炭管理总局曾认为国内现有浅部煤层已开采完，而受技术条件限制又无法开采深部煤层和扩大采掘范围，因此要在 1957 年以前废弃 120 个矿井。后经苏联专家研究，恢复和扩建了大部分矿井，使得 1952 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 60%，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矿井的服务年限延长了 20–40 年。各矿还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实行苏联新式采煤法，使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 20–30%。在钢铁工业方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仅仅一年，各地炼铁炉且均已突破原设计能力，其中石景山 250 吨炼铁炉可炼铁 376 吨，太原 50 吨炼铁炉则创造了 106 吨的纪录。太原马丁炉接受苏联专家的建议，采用热装法和吹风熔炼法炼钢，将每炉冶炼时间由过去的 10 小时 42 分缩短到 4 小时 54 分。天津马丁炉采用苏联专家的热修法，修炉时间由 180 小时减至 60 小时，提高效率两倍。重庆某钢厂轧制钢轨的设备已废置不用达十余年，经苏联专家帮助，不仅重新启用，而且在国内首次轧制重型钢轨成功，使四川人民仰望了 40 年的成渝铁路得以动手修筑。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提出的木材流送新方案把流送损失率从 10% 降到 1.37%，而他们的林业方格调查法将使东北森林调查所需时间由 25 年缩短为 5 年。农业部水利局修建浑河水库的设计，经过苏联专家修订，蓄水量增加 2.25 倍，节约投资 2000 亿元（旧币）。在农业方面，苏联专家介绍的深耕、密植、轮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进经验，对于提高中国的农作技术贡献很大。北京双桥国营农场在苏联专家卢森科的直接指导下实行棉花密植，每亩产量提高了一倍。在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因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而大为改观，对于制定生产计划、确定生产责任制度、简化统计表报、建立经济核算制等各项工作，专家们都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收到良好效果。此外，苏联专家还通过讲课等方式向中方人员传授经验和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如 1952 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 3 万多人，其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②]

① 《人民日报》1953 年 4 月 10 日、1952 年 12 月 15 日。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第 753–776 页；《人民日报》1951 年 2 月 15 日、1952 年 1 月 20 日。

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负责的。据重工业部报告，为了正确地规定设计任务书中的产品方案，吉林铁合金厂苏联设计小组收集了中国所有铁合金厂的设备能力及生产情况，并研究了钢铁工业发展远景，经过5个月时间的研究，编制了4个方案，加以反复比较，才将产品方案最后确定下来。[①] 在西北钢铁公司铺炼二号马丁炉炉底的五天五夜，苏联专家赫力浩夫除每天休息4–5个小时外，未离开现场一步。天津制钢厂修马丁炉时，苏联专家马里谢夫一连在现场工作19个小时。[②] 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察看沟砖被浸蚀的程度，证实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从而大大节省了费用，也加速了工程进度。[③] 1952年1月周恩来出席政务院召开的财经部门苏联专家工作座谈会时，对苏联专家在财政、工业、交通、银行、贸易、水利等部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④]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十分强调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1952年2月中财委的总结报告说，“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⑤] 1952年3月5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中财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规定，凡属举办性质重要，其产品在我国尚未生产过的新工厂，或在旧的大工厂中改建重要装备，而我无改建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而且接收定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均需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若干新工厂在开工之前还需派实习组到苏联工厂中去实习。[⑥] 1952年12月中财委赞同并转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专家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必须采纳。以为苏联专家不了解我国情况的观点应当改变，事实上他们是不轻易发言的，他们的意见基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410–418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第776页。

③ 《人民日报》1952年1月20日。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14–115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370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第781页。

本上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提出的”。采纳苏联专家的意见“应当是坚决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更好的办法。动摇不定又想依靠又打折扣的态度是错误的。”报告还建议必须设立由部长直接领导的专门机构，管理和协助专家工作，并支持检查执行专家意见的情况，及时总结经验。①

当然，在专家问题上中苏之间也曾有过分歧和矛盾，这主要表现在支付苏联专家的待遇和报酬方面。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曾表示派往中国的专家，其待遇只需与中国的优秀专家相同即可，其余部分则由苏联政府补贴。② 根据这一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订最高标准为2500斤小米”，另须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商店，对专家给予照顾，具体事宜与科瓦廖夫商议。③

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特别是中方提出关于中长铁路等新条款后，情况有了变化。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国还应支付一笔补偿费用。在2月11日与米高扬会谈时，周恩来表示不理解第一条款的含义，即苏方提出中国政府应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2000–4000卢布的补偿费用，是用于赡养专家的家庭，还是给国家或者直接付给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明确说，这笔钱将用作对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的补偿，应交给苏联政府，这一条款适用于所有专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希望中国可以用实物支付这笔费用的要求，米高扬回答，支付协议草案所规定的支付可以是提供实物，也可以用黄金、美元和英镑。④ 第二天，罗申受葛罗米柯委托会晤周恩来。周恩来要求罗申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转告，昨天会谈后，他又仔细考虑了支付专家费用协定的第四款，并同毛泽东进行了协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规定每月支付苏联专家的补偿费用2000–4000卢布以美元结算，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这将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周恩来强调说，这笔费用相当于每月10000至18000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们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们只有2800斤小米。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如果采用提供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对于中方来说，比支付美元要轻松得多。”⑤

然而，周恩来在莫斯科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苏方同意将补偿金降到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374–375页。

② 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АПРФ，ф.45，оп.1，д.329，л.1-7。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64页。

④ 1950年2月12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64-69。

⑤ 1950年2月12日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70-74。

1500-3000卢布，但坚持应以外汇（卢布）结算。在3月8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的会谈中，中方又提出，根据一些在华专家的要求，是否可以将这笔费用的一部分直接支付给在中国的多子女专家本人，其目的当然还是希望减少外汇的支出。对此，葛罗米柯予以否定。此外，苏方准备把在华苏联军士的工资提高到低级专家水平，即每月应为他们支付1500卢布的补偿费用。甚至对于普通士兵，中方在提供实际生活费以外，也应支付补偿金。王稼祥指出，在苏联顾问中，军士占相当大的部分，而他们在苏联每月收入只有500–600卢布，因此不应该把对专家的条件扩展到军士身上，况且，从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来看，这样的标准也太高了。葛罗米柯则认为，苏方的立场"是以许多恰当的理由为基础提出的"。尽管王稼祥后来暗示，暂时不要提出关于军士和士兵的支付问题，但苏方坚持己见。[①]

情况汇报到北京，3月19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答复电：关于专家协定条款，"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减专家，亦甚有利"。[②] 1950年3月27日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协定签字，10月25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对技术专家报酬条件的协定。根据这两个协定，中国应向苏联专家支付相当于中国专家工资水平的工资，另外再支付出差补偿费用，按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计。[③] 但实际上中国支付苏联专家的工资是高于国内标准的，以1952年的水平为例，共分七级，其工资由348万元（旧币）至180万元不等。[④] 此外，由于中方缺乏经验，派遣专家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麻烦和矛盾，主要表现在聘请专家没有计划性，管理混乱，以及不能满足专家要求的工作条件等等。由于没有统一计划和管理，造成有些专家已经来到中国，而用人单位尚未接到通知。有些单位聘请专家时，没有考虑住处和翻译等相应条件，不得不一再削减人数，造成双方被动。[⑤] 为苏联专家进行设计而收集原始资料的工作也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不能按时交付齐备的资料，致使苏联专家的设计进度受到影响。如1951年鞍钢对收集原始资料工作没有统一领导机构，以致造成了零星分散和缺乏专责制的现象，结果使电气、土建、水道、供热、总平面图等工作互相

---

① 1950年3月8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АВПРФ，ф.0100，оп.43，д.8，л.36-40。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9页。

③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с.8-9.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第778–780页。

⑤ 1949年12月29日齐赫文斯基与张锡俦谈话记录，АВПРФ，ф.100，оп.43，п.302，д.10，л.50-52。

配合不起来，导致返工延误。按中国重工业部统计，1953 年以前，除由专家在华直接领导收集的项目外，所有各厂矿的资料大都延期交付，据初步计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资料，约占全部原始资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于中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造成设计失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①] 为此，中国加强了对专家工作的管理和领导。1953 年 6 月 8 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代总顾问布拉金时，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6 月 13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聘有苏联专家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并将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个关于加强专家工作的决定送中央批准。9 月 9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②]

七、培养中国专家

从根本上解决缺乏科学技术人才问题的途径当然是培养中国自己的专家，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方面的困难也是非常突出的。本来旧中国的高等学校就不多，而在校学生的成份又令中共很不放心。如同郭沫若对苏联大使所说，“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③] 然而，从中共党员中培养科技人员则受制于普通教育和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根据 1950 年 3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 150 万党员，其中 130 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人员中（区委和区委以上），将近 50% 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陆定一说，中共领导准备用 2–3 年时间在上述党的干部中扫除文盲，用 5 年时间在一般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410–41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06、308 页。

③ 1949 年 10 月 28 日郭沫若与罗申会谈记录，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9，л.63-65。

党员中扫除文盲。[①] 显然，对于这些可以依靠的力量近期是无法指望的。同时，直接从科研机构中选拔和培养人才也很困难。解放前夕中国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少得可怜，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中央科学院仅有 13 个研究所，科研人员 207 人，涉及的学科也只有物理、数学、生物、地质及人文科学。北平科学院下设 9 个研究所，共有科研人员 42 名。[②] 因此，迅速培养出中国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

苏联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主要是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1951 年 8 月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向斯大林要求，为了适应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希望苏联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并提出准备派遣 375 名学生和 88 名干部赴苏学习和实习。[③]

中苏于 1951 年 12 月 6 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 年 9 月 1 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在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 10–20%。而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苏联政府支付 50% 的助学金。[④]

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1952 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抽调在职干部 273 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挑选学生 287 名，派往苏联留学。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 9 个部委 174 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 560 名。1953 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 1100 名，其中财经系统 650 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 500–600 名实习生。另外，根据当年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和苏联技术出口公司签订的相应合同，苏联以提供科学技术援助的方式，接收了 144 名中国专家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专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燃料工业系统，如在 1952 年中央各部派出的实习生中，占 64.4%，在 1952 年财经系统的留学生中，占 58.6%。[⑤] 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

① АВПРФ，ф.0100，оп43，д.10，п.302，л.100，转引自 *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17。

②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с.5.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65 页。

④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с.9.

⑤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第 787–791 页；*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с.11。其中百分比为笔者计算所得。

国研究生 1952 年有 11 人，1953 年有 13 人。[①]

八、协助编制经济计划

新中国的整个经济建设方针是以建立苏联模式为目标的，其核心就是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形成以国有经济成份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早在 1951 年 2 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便提出了为进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做准备的设想。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组成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领导小组。[②] 到 1952 年 8 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文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报告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建设的方针，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发展农业，加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学工业，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范围内，按人力、物力的可能来发展其他的经济部门。工业建设的速度，每年可递增 20%。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同时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冒险倾向。首先在现有工业基础上发展，并准备和开始在中国大后方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工业建设必须采取苏联先进的统一的技术标准，并依靠于苏联专家的指导和技术的援助。总之，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③]

第一次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自然要寻求苏联的帮助。1952 年 8 月 15 日周恩来亲自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8 月 23 日和 28 日，周恩来分别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双方约定，在苏联党政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与

①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с.11.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30–131 页。

③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 1070–1071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54–255 页

斯大林本人进行会谈。[①]

在9月3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提出了如下意见：一、认为在计划中规定工业发展的增长率为20%过高，应留有余地。经周恩来解释，以往三年的经验证明中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斯大林便建议将总增长率定为15%，而在年度计划中定为20%。二、计划中没有列入军事工业，并且对全部供货问题缺少总体说明。经周恩来说明，斯大林接受了军事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12–13%的比例，中国可以按这个比例编制整个供货申请单。三、计划中没有需要苏联援助项目的具体数据，而苏联方面研究这些计划并给予答复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先行回国，由李富春留下商谈具体计划。[②]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同刘少奇、李富春继续讨论一五计划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萨布罗夫认为，把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增长速度定为18%是难以实现的，建议改为11–12%。关于苏联提供工业设备的问题，萨布罗夫认为不宜要求过多，尽管苏联可以提供这些设备，但要考虑到技术更新很快，应留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新设备。关于派遣苏联专家的问题，萨布罗夫也提出，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由专家包办。中国应多派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到苏联来学习和实习，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技术队伍。经过对中方计划的充分研究，1953年2月，苏联组成以萨布罗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进行会谈，分组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③]

中国领导人很重视这些意见。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富春电，认为苏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所提的各项意见，都是很可贵而应该予以重视的。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和苏方的意见，五年计划确应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减低工业生产总值每年递增的速度是肯定的。因此，可根据来电所提原则与其进行各项磋商，进一步考虑和修改我们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2月17日、23日，周恩来召集朱德、习仲勋、曾山、贾拓夫和有关各部部长、国家计委委员及各局局长开会，讨论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方案所提的意见，一致认为苏方的意见对中国制定五年计划有很大的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

---

① 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② 1952年9月3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АПРФ，ф.45，оп.1，д.329，л.75-87。

③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39–40页；《我国同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的回忆》，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7–18页。

13.5–15%，年度计划争取为 20% 左右，以保证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后，周恩来复信通报了北京讨论的情况。[①]

1953 年 5 月 18 日，周恩来和高岗收到库兹涅佐夫大使送来的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一五计划任务的正式意见书，并报告给毛泽东和各中央领导人。意见书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在肯定恢复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意见书认为，规定中国全部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20.4%，其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为 24%，都是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提得过高会使物资和熟练干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无法完成。苏方建议自 1953 年至 1957 年工业总产量年增长速度由 20.4% 改为 14–15%。意见书还提出，大工业的发展必须和能大量生产民用必需品的手工业的发展配合起来。中国拥有极丰富的劳动力和有经验的手艺人，手工业的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因为应该把这一点估计在五年计划之内。国家必须指导手工业的发展，供给其原料，实行手工业合作化，以保证其获得必要的发展。五年计划中必须特别注意农业问题，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当是保证以粮食供应城市居民，以农业原料供应工业，尤其要注意扩大技术作物的生产，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工业的需要。意见书接着指出，中方的草案没有对国家财政和金融问题给以应有的说明，而要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尤其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同时又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制定有关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措施。此外，草案中对培养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干部的计划问题也没有很好地给以说明。苏联经验证明，国家工业化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大量培养熟练干部，从劳动人民中培养知识分子。应当专门作出培养熟练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计划。第二天，中共中央讨论并通过了苏方的意见书。20 日中央向莫斯科回文，并以电话将中央的意见通知李富春。[②] 至此，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原则上确定下来。[③]

在一五计划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全面工业化建设。当然，还是离不开苏联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84–285 页。周恩来的复信见《党的文献》1999 年第 5 期，第 3–4 页。

②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中共党史资料》第 69 辑，第 1–4 页。文件提供者陈夕向笔者说明了中共中央收到和处理苏方意见书的大体情况。

③ 此后，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又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先后提出过多次方案。1954 年 11 月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在广州用 20 天时间审核修改了一五计划的草案初稿。1955 年 2 月计划草案编制完成。同年 3 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这一计划草案的决议。7 月 5 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 1086 页。

帮助。正像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的："从今年起，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的计划建设的时期。为了把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我们必须努力向苏联学习，必须把虚心学习和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看作是推进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首要条件之一。"[①]

对建国初期中苏经济关系状况进行考察的结论如下：

一、中苏已经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因而在经济上也需要密切双边关系，这一点对于中国尤其重要。因此，苏联的经济援助是及时的，且为中国所必需；

二、新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又处于战争环境中，因而其经济建设和发展必须依靠苏联。而苏联的全面援助确实对于中国的经济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斯大林很不情愿地按照中方提出的要求缔结了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因而在经济利益方面颇有计较。所以，苏联的对华援助是有条件的和要求回报的；

四、尽管苏联政府在援华专家的条件方面毫不让步，但苏联的经验和技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且苏联专家确实做到了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令中方人员感动不已；

五、中国方面全无经济建设的经验，同时，在战争的条件下，苏联也没有把经济援华作为一项特别突出的任务，因而整个对华援助工作显得缺乏计划性，出现了不少矛盾和混乱现象。

总之，从 1950 年至 1953 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经济领域也是协调和互助的。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此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至于对苏联援华政策的评估，应该指出，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既是慷慨的，又是有限的，既有效地帮助了中国的经济恢复，也遗留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斯大林的对华经济政策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未免有些牵强，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确是有条件和有保留的。这就是赫鲁晓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面对的现实。

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01 年第 1、2 期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 308 页。

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新中国行政权力所及范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了所有外国列强在中国大陆的租界地，惟有一块地方仍旧被苏联占用，成为苏联红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这就是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直到1955年，旅大地区才完全回到祖国的怀抱。苏联为何能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租用旅顺口，这个海军基地又是如何归还中国的？对于这段历史，凡研究国史的论著多有提及，但均语焉不详。笔者在俄国解密档案及苏方当事人回忆录中发现了一些材料，最近又因考察50年代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到大连市查阅档案文献并进行采访，了解到许多情况，从而对这个历史过程有了基本的认识。

一、斯大林得以继续使用旅顺基地

旅顺口是举世闻名的天然良港，隐蔽险要，终年不冻。旅顺口与庙岛列岛及山东半岛蓬莱角共扼渤海海峡，构成北京和渤海海岸的天然屏障，是重要的军港和海军基地。中国清政府于1880年建造旅顺港，费时10年，耗资430多万两白银。[①]

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辽东半岛被日本强行割让，但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被迫以3000万两白银让中国赎回。沙皇俄国乘人之危，借口保护中国，于1897年12月强占旅顺、大连，并于次年3月迫使中国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借给俄国，为期25年，其中旅顺口

① 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的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9–83页。

及大连湾内一个港口专门辟为军港，仅供中俄两国兵舰使用。[①] 实际上，当时大清舰队已不复存在，海军基地自然为俄国独占。

190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败北，旅顺基地转为日本人占有，不久以后，整个东北都陷入了日本的魔爪。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希望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斯大林以恢复沙俄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条件，答应出兵远东，对日作战。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之后，美苏联手，一暗一明，一软一硬，劝逼中国接受苏联的条件。苏联在8月9日以百万大军进入东北的情况下，迫使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②] 有关协定规定，旅顺口作为纯粹的海军基地，仅由中苏两国舰船使用，为期30年；基地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进行管理，委员会由2名中国代表和3名苏联代表组成，苏联为主，中国为副；旅顺地区的民事行政权力属中国，但人员任免须征得苏联军事当局同意；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开放；大连行政权属中国，但如发生对日作战，则受该区域所设定之军事统制；大连港口的工事及一半设备无偿租与苏联，为期30年。[③]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22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诸夫中将率250名空降兵在旅顺口土城子机场着陆，并就任旅顺警备区司令。日军驻旅顺守备司令官小林海军中将向苏军投降，驻旅顺日军武装遂被苏军解除。同日，雅曼诺夫少将也率250名空降兵在大连周水子机场着陆，并就任大连警备区司令（后由高字洛夫中将接替）。当天下午，一批苏军乘火车抵达金县石河驿。8月24日，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的首批坦克部队抵达旅大地区。同时，太平洋舰队空降兵部队在旅顺口降落。8月底，苏军进驻旅大地区的兵力约1万余人。9月1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第39集团军司令柳德尼科夫上将率司令部作战组飞抵旅顺。9月6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远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元帅、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和胡佳科夫、炮兵元帅契斯佳科夫，以及其他将领视察了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在日俄战争中阵亡官兵的墓前祭奠亡灵。华西列夫斯基说："我们用自己的行动为40年前牺牲在这里的父兄们报了仇，我们把日本鬼子打败了。"这批苏军高级将领向墓地献了花圈，缎带上写道："1904年为保卫俄国要塞旅顺口而牺牲的战士们永垂不朽！ 1945年8月22日夺取了这座城市和

---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741–742页。

② 参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334–1337页。

要塞的红军官兵敬挽”。9月28日，苏联太平洋舰队部分军舰开入旅顺口，齐帕诺维奇海军少将任旅顺口海军基地司令官。[①]

此后，旅顺、大连地区实际上成为苏联的军事管制区。旅顺口海军基地名为中苏共用，实为苏联独占。而大连市的主权虽属中国，但苏军占领当局既不允许国民党军队从海上登陆，也拒绝国民党政府设立航空站，空运部队接防，甚至以成立自治地方政府等方法阻挠国民党中央政府接收大连的地方行政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始终配合苏军当局行动，以保证旅大地区成为一块受苏联保护的革命根据地。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旅大地区的确为支援中国革命做出了极大贡献，但应该承认，其主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苏联手中，至于旅顺基地，更是中国人无法问津的“特区”。[②]这个问题，直到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成功的时候，才开始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1945年苏军占领旅大地区后，斯大林曾感慨地说：“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③]从历史上地缘政治中利益冲突的角度看，中苏两国共同关注的有三个问题，即东北问题，蒙古问题和新疆问题。不过，到中共即将执掌政权的时候，蒙古问题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通过1945年的中苏条约和1946年的全民公决，外蒙古已经如斯大林所愿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新疆问题则已不在苏联的考虑范围之内——经过1945年对三区革命的调停和1949年对刘少奇的许诺，斯大林表明了莫斯科将不再插手新疆事务的立场；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制约而可能导致新中国与苏联利益冲突的只有东北问题了。俄国在亚洲地区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取得一个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而这一战略就是通过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终点旅顺口的占领来实现的。实际上，斯大林所说的收回沙俄在中国的权益，指的正是东北问题。因此，对于长春铁路和旅顺口，苏联是不会轻易放手的。不过，

---

①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苏联红军在旅大》，1995年（未刊），第6–7页。笔者2001年6-9月采访王亚志记录。王亚志在50年代曾担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和彭德怀的参谋。

② 有关详情参见沈志华：《建国前夕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党的文献》2001年第3期；*Борисов О. Б.*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1977，c.190-193；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苏联红军在旅大》，第7–21页；《韩光党史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3–39、133–139、335–340页；笔者1996年5月对韩光的采访记录。韩光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

③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38–439页。但斯大林在这里讲的根本不是实际情况。事实上，当时的“老一辈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为沙皇的失败而受到鼓舞，对此感到受到屈辱和挫折的只是沙皇政权和欧洲资产阶级。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4–142页。

从利益的角度看，长春铁路主要在经济方面，而旅顺基地则主要在军事方面。斯大林心里很清楚，新中国急于收回长春铁路，却没有守卫旅顺基地的军事力量，所以，在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斯大林缄口不谈长春铁路问题，而提出苏联可以提前从旅顺撤军。[①]

1949年初，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处理意见，斯大林表示，由于形势的改变，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从旅顺撤军。但如果中共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这一愿望。[②]中共当时根本没有海军，自然无法接受斯大林的“好意”。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其目的主要是废除1945年条约，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最初反对“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后来，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苏联有关部门反复考虑，数易其稿，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起草了12份有关条约和协定，其中规定，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③]显然，斯大林原来的考虑是，中方不会让苏联立即撤军，即使同意，因原条约保留，苏军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回来。现在原条约已废除，但苏方也很难再收回撤军的承诺了。最后，经过双方讨论确认的协定规定，缔结对日和约后，但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之前，成立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而民事行政直属中国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权力及苏联借用和租用的所有财产立即移交中国；大连港的问题待对日和约缔结后处理。协定中还有一条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国政府同意，苏军可与中国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④]这自然是中苏结成军事同盟的需要和结果，同时也为苏军继续驻守或将来重返旅顺港留下了机会。对于毛

---

① 关于中苏谈判在长春铁路问题上的争议，详见沈志华、冈察洛夫：《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沈志华：《中苏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с.106；№3，с.101.

③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7，оп. 23а，п.235，пор.18，л.1-7.

④ 正式发表的中文文本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18–523页。

泽东来说，关键是必须签订一个新条约，以示中共的民族立场及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至于旅顺口，当时中国的确无力驻守，也就乐得借用苏联的海军力量。

根据新的协定，苏联政府解除了对旅大地区的军事管制，并将行政权力移交旅大地方政府，同时还将苏军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的财产，苏联经济机构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给中国。其中包括 47 个工厂、11 所电影院、188 处宅舍、33 个仓库、23 处地产等，共 302 处。移交财产总数比协定签订时苏联照会所列清单还多 18 处，但大连造船厂改为中苏合股企业，大连铁路局和铁道工厂等属双方共同经营的长春铁路财产，也不在移交之列。①

此时，驻守在旅大地区的苏军部队有：陆军——第 39 集团军，辖直属工兵团、通信团和加农炮兵旅；近卫步兵第 5 军及所属炮兵旅、高炮团、火箭炮团、近卫 17 师、19 师、机械化师；第 25 机炮师。空军——第 55 歼击机军及所属 3 个歼击机师、1 个侦察大队和 1 个对空勤务团。海军——太平洋舰队红海军旅顺口基地及所属 1 个水鱼雷机师、岸防司令部、潜艇基地、快艇总队、水警总队、高射炮兵团、水上飞机大队、抢险救生大队、海道测量区和海军修船厂。炮兵——加农炮兵 33 师、突破炮兵师、防坦克歼击炮兵旅和高射炮兵 14 师。总计约 30 万人，同以前一样仍分别驻扎在旅顺、金州、长海等地区。②

中苏条约签订后，根据双方协定，为磋商和处理旅大地区防务的管理和交接问题，成立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由中苏双方各派一个代表团组成。苏方军事代表团主席是驻大连苏军司令官别洛博罗多夫上将。中方军事代表团主席是海军司令肖劲光，代表团成员有东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贺晋年、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旅大市长韩光、海军副参谋长张学思等。别洛博罗多夫担任联合委员会第一年工作的主席。1951 年 3 月 24 日，在大连召开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和明确了苏联军事指挥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规定了中苏公民和军人进入旅顺口区域及出境的手续，确定了旅顺口区域和海军基地在海上和陆上的境界，制定了旅顺口区域的飞行管制办法、舰船航线及中国军用舰只进入基地的手续，以及提交两国政府审议的关于交接旅顺问题的措施。1952 年 9 月，双方又草拟了一份《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章程》。但此时中苏商议推迟苏军撤走的日期，联合委员会的工作遂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33–135 页。

②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苏联红军在旅大》，第 23 页。

搁置下来。[①]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远东地区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51年9月8日，美英等国在旧金山与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同时，美日还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因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没有邀请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苏联代表虽然出席了会议，但鉴于邀请中国参加签署对日和约的动议被拒绝，且和约条款中又没有规定将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主权归属苏联，所以苏联代表拒绝在对日和约上签字。[②] 以上国际形势的变化，自然牵涉到旅顺基地的命运。

苏军撤离旅顺口的日期已经临近，但中国尚未建立起一支真正的海军，而美日勾结对远东地区安全造成的威胁则日益严重，中国不得不考虑继续请苏联海军留在旅顺基地。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根据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口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口。"[③] 这一要求当然符合莫斯科的意愿，不过，斯大林的考虑更加全面。他在4月2日回电说："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口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底撤出旅顺口。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和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口，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向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口条约。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④]

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会谈，除了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朝鲜战争问题，延长苏联在旅顺基地驻军也是讨论的内容之一。

---

① 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3–24页。

② 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最新研究见：*Славинский Б.Н.* Сан-Франц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1951г. По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 Япо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1；张盛发：《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

③ 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п.342，л.126-130。

④ 1952年4月2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45，оп.1，п.343，л.2-3。

会谈中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于是，周恩来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由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①]9月15日，中苏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中国的照会在陈述了理由后，请求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口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②]中国没有海防力量，请求苏联援助，在中苏同盟的情况下是顺理成章的，但照会提出的撤军期限或条件似有不妥：倘若中国或苏联对日和约的缔结遥遥无期，不知中国何时或以何种理由收回旅顺口。

二、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归还旅顺口

由于苏联履行1950年协定，如期归还了长春铁路，又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所以中苏会谈公报发表后，中国国内普遍表示拥护，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在报道上海各界的反应时说，"这与两年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公布时的混乱状况相比，已有极大改变。虽然也有人对延长旅顺基地使用期限不满，但总体来说，反映不大。"[③]不过，旅大地区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旅大之初纪律很差，奸污妇女、强夺民财等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发生。[④]虽然后来苏联军事当局采取极其严厉的惩治措施（包括就地枪决），改变了这种状况，但给当地居民留下的恶劣印象却难以很快消除。因此，苏联延长在旅顺驻军，引起了中国当地军民的不满。据旅大市甘井子区苏军飞机场负责人反映，"中苏关系不如以前密切，最近有些工人、学生对苏联同志不够尊敬。苏联妇女抱小孩上电车时也不让座。对上电车的苏联军官，过去不推不挤，现在又推又挤，个别的还有打人现象。"[⑤]此外，1952年11月10日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还报道了某些旅大市职工对苏军不友好的大量事例，有人在买卖时欺骗、糊弄苏联人，有人看不起苏联的技术和经验，

① 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АПРФ，ф.45，оп.1，д.329，л.54-72。

② 1952年9月15日周恩来给A. Ia. 维辛斯基的照会，SD04013。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1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第2184页。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2年9月30日，第225号，第455–457页。

④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27页。笔者1968–1969年曾在旅顺土城子机场服兵役，听当地农民说过这种情况。另外，2001年9月大连造船厂厂史办主任徐金成接受笔者采访时也有同样的说法。

⑤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2年11月10日，第252号，第118–119页。

还有人甚至在争吵中解除了苏军战士的武器和摘掉军官的军帽。[①]

中国政府当然非常重视苏军驻守旅顺基地的作用。1953 年 2 月 22 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旅大市，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同日下午，周恩来出席庆祝苏联建军三十五周年、慰问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曾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军队所走过的艰辛的、英雄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苏联军队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旅顺口地区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东北的桥头堡，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在目前的形势下，苏联军队驻在旅顺口地区，对于制止和打击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心更加努力地"向苏联军队学习，加强国防建设，充实现代装备，改进编制制度，提高各种训练，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会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将锦旗和纪念章授予苏军将士。次日，周恩来向旅大市苏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②]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党内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当时苏联的领导核心中，马林科夫兼任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最高，贝利亚掌管安全部和内务部，势力最大，再加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老近卫军"重返政治舞台，赫鲁晓夫所处的地位最不起眼。然而，凭借长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权术，赫鲁晓夫先是联合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于 1953 年 6 月击败了贝利亚，又利用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在 1955 年 2 月把马林科夫排挤出核心圈子，从而逐步树立起个人的领导权威。[③] 在这场政治和权力的斗争中，赫鲁晓夫所依靠的，在国内是他掌握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和人事关系，在国外则是通过党的系统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取得联系。而在这方面，赫鲁晓夫特别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在 1958 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之前，赫鲁晓夫主要是利用党的渠道向中国通报各种情况，以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通过这条渠道推动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2 年 11 月 10 日，第 252 号，第 119–12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86–287 页。

③ 关于斯大林死后苏联党内的斗争情况，近年俄国学者披露了大量档案文献中的新史料，可参见：*Зубкова Е.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ёв：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4；*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Наумов В.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5；*Медведев Ж.А.* Секретный наследник Сталин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

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交还旅顺口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庆典，苏联派遣了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华，而率领代表团的不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却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也许是为了说明赫鲁晓夫在这一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作为给中国准备的厚礼，赫鲁晓夫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了大量援华项目的确定。这包括：帮助中国新建 15 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 141 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向中国提供 5.2 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加强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苏军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不过，事情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从政府的角度，苏联当时尚未把对华关系摆在显著的地位。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有关措施的决议草案，从草案内容看，苏联政府最初确定的出席中国五周年庆典活动的政府代表团规格较低，团长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团员有苏斯洛夫、卡巴诺夫、亚历山德罗夫等。作为苏方的庆祝活动，不过是在北京举办苏联成就展览；在苏联各地组织群众集会；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群众团体发祝贺电；组织科学、文化著名活动家和著名劳动能手发表广播讲话和寄个人贺信；在苏联报刊杂志上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中国的成就，以及播放中国电影和中国流行歌曲，张贴巩固苏中友谊的标语等等。唯一有实质意义的内容就是确定在 10 月 1 日成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这算是对中国自 1949 年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系统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的回应。[①]

但接着又出现了一份文件，完全改变了问题的性质，这就是 1954 年 8 月 5 日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关于苏联代表团出访北京的有关事宜给副部长 A. Ia. 维辛斯基的请示。根据这份文件，苏联代表团访华决不仅仅是参加庆祝活动，而是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的重大举措。库尔久科夫的请示全文如下：

鉴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行将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 周年庆祝活

---

① 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 周年有关措施的决议草案，1954 年 8 月，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9 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第 2254–2255 页。

动，远东司认为：在苏联代表团在华逗留期间，委托它进行以下活动是适宜的：

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文件上有手笔将此句改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引者）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给中国，并从那里（文件上有手笔将“从那里”一句划掉——引者）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

众所周知，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应于1952年底完全交给中国所有。1952年9月，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远东形成的紧张局势（朝鲜战争），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将共同利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时间延长至中日和苏日缔结和约时为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2年9月15–20日致苏联政府的照会）。双方交换照会并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

远东司认为，在当前已经变化的形势下，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中国领土上，留在旅顺口地区，对我们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在苏联军事和技术援助下，中国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保证海军基地的健全和运转的。至于在非常局势下苏联使用旅顺港基地的问题，可以与中国政府就此问题缔结单独的协定。

二、由苏联大使馆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的问题。应该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情。

三、关于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问题。该协定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四、与中国政府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苏中合股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金属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

如您同意，远东司将起草相应的提案报上级机关批准。①

远东司起草这一文件的背景如何，不得而知，但肯定是表达了赫鲁晓夫力主改善中苏关系的意图。不过，这一文件在外交部内遇到了阻力，而不同意见主要是针对旅顺口撤军问题的。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当天在文件批示：葛罗米柯、佐林同志，我认为第一条很值得怀疑。你们的意见如何呢？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的意见是：“我认为第一条不能接受。其余建议值得研究。”几天以后，副部长佐林表示：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于是，9月9日远东司再次提交的报告，以及9月15日葛罗米柯给苏共中央关于参加中国五周年国庆事宜的请示及所附决议草案，都没有提到旅顺

① 1954年8月5日库尔久科夫给维辛斯基的请示，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пор.40，л.4-5。

基地的问题，代表团的规格也没有提高。[①]

在目前笔者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没有关于此后情况变化的材料，但当事人的回忆弥补了文献上的缺憾。苏联对外贸易部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副部长 K. I. 科瓦利在回忆中谈到了苏联代表团赴中国之前的准备工作。[②]

代表团的准备工作由赫鲁晓夫的支持者米高扬全面负责，经济援助方案的制定由科瓦利主持，外交方面的事务由外交部部务委员费德林负责。赫鲁晓夫从一开始就不断详细地过问援华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一次又一次地召米高扬去汇报。赫鲁晓夫"处事果断，几乎重新审理了每个工程项目"，直到 9 月 25 日，即代表团出发的前两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人员还在进行有关协定最终方案和其他有关文件的修改和整理。看来，外交部 9 月 15 日的方案是被苏共中央否决了。因为 9 月 24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确定的方案，代表团团长已经改为赫鲁晓夫本人，而且包括了交还旅顺基地的内容。据科瓦利回忆，这种想法很早就在赫鲁晓夫的个人计划之中了，由此判断，库尔久科夫的建议很可能是秉承了赫鲁晓夫的旨意。

9 月 25 日晚上，米高扬再次认真地阅读了前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所讨论的为北京谈判准备的全部协定草案和其他文件草案。当确定已经吸纳了主席团成员的所有意见后，米高扬用电话向赫鲁晓夫报告说："我认真地、从头到尾地阅读了准备在中国讨论的全部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中央主席团昨天会议上的所有意见，文件已经全部印完。"米高扬建议不再召集主席团会议进行表决，而由赫鲁晓夫和他本人带头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派科瓦利连夜专程送主席团各成员传阅签字。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后，米高扬便确定了表决顺序。米高扬告诉科瓦利，最后到伏罗希洛夫那里，因他住在郊外别墅，且年事已高，很少出来活动，估计不会有什么意见。传阅和表决一直很顺利，全体中央主席团成员都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文件，并签名同意，他们指出，"文件对发展和加强苏中友谊和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令人意外的是，恰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那里出了问题。午夜 12 时以后，科瓦利最后来到伏罗希洛夫的别墅，伏罗希洛夫正穿着睡衣在前厅等待。他把文件拿去看了约一个小时，随后说："向米高扬报告，我反对。"说完就去睡觉了。此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在克里姆林宫等待消息。他们对伏罗希洛夫的表态十分

① 1954 年 9 月 9 日费德林给葛罗米柯的报告，9 月 15 日葛罗米柯给苏共中央的请示，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пор.40，л.10-19。

② *Коваль К.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 в 1953г. в Москве и Н.С. 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1954г. в Пекине.//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89，№5，с.104-118. 以下关于苏联代表团准备工作的描述，均依据科瓦利的回忆。

惊讶，立即决定第二天上午召集主席团会议。

9月26日上午11时，全体中央主席团成员都出席了会议。科瓦利简短地报告了表决的情况以后，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要求伏罗希洛夫谈谈反对的理由。伏罗希洛夫回答说："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党和中央委员会今天并没有因为我有不同意见而逮捕我，把我送进监狱，而是让我自由表述意见。我认为，目前随处可见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战争而造成的可怕后果，我国人民无力承担在中国的这样一番大事业。需要设计和供应复杂的设备，谈何容易！这需要我们成千上万的专家去工作。此外，就在不久前我们还解释说，我们宣布对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日本作战，目的就是收复旅顺口和俄日战争期间沙俄丧失的领地，而现在我们又要把它们交出去。或许，应该就这件事问问大家的想法，即使不问，至少也得让人们对此有所准备。"伏罗希洛夫发言后，赫鲁晓夫感到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不能退让，便开始以强硬的口气述说自己的理由。

赫鲁晓夫强调，现在所说的原沙俄领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只是根据租赁协定，也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由双方共同使用。后来根据中国政府1952年9月15日的请求，有关旅顺口的协定已经延长了。赫鲁晓夫语气坚定地指出，如果不是建立在经济互利、相互需要和彼此承担义务的坚实基础上，那么两国之间的任何友好条约都不可能是长久的。"这是一个重要时期，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庆祝自己建国五周年之际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改变其几百年的落后状态，而我们不能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即将来临的五年采取最重要的措施，那么，我们就将失去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机遇"。赫鲁晓夫还表示，没有这些实际内容，苏联派如此高级的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庆典、同毛泽东的会谈，将变得毫无意义。

在赫鲁晓夫的带动下，其他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也发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见。最后，伏罗希洛夫勉强在文件上签了字，会议就此结束。可见，在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以及提前从旅顺口撤军的问题上，赫鲁晓夫本人确实付出了极大努力。

三、苏联军队撤退及旅顺基地的交接

苏联代表团的确是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北京的。国庆活动结束后，中苏双方开始进行会谈。赫鲁晓夫在10月2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中，便谈到了旅顺口问题。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当苏方提出从旅顺口撤军，并将基地及其设备无偿移交给中国时，毛泽东最初曾表示犹豫和担心。毛泽东提出：现在是否有必要这

样做，因为美国可能会利用苏军从旅顺口港撤出之际，在这个地区向中国发动进攻。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同志，我们不大相信美国人会这么做。不但如此，我本人坚信，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当然，对此不可能有任何保证，因为美国执行的是一条侵略政策，而且在朝鲜的战争才刚刚结束。但是，我们也正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派军队，这与撤军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发生敌对性进攻行动的话，我们当然会帮助你们的。"最后，毛泽东表示不再反对苏联撤军了。

然而，双方在旅顺口武器设备的处理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周恩来提出，中国希望苏军撤退时，不仅将基地的设备留下，而且把炮兵武器也留下。赫鲁晓夫表示，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无偿留给中方，苏方也同意把重武器留下，但要付钱。周恩来坚持想无偿得到这些武器，赫鲁晓夫没有让步，他回答说：这是非常昂贵的武器，我们可以按照最低的价格卖给你们。我们希望，这批武器能够按照我们建议的条件进行移交。我们还没有从损失惨重的战争中恢复过来，我们的经济已经遭到破坏，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同意我们的意见。请正确地理解我们！于是，周恩来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①]

双方发表的公报说，"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基地的设备移交应于 1955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②]这次中苏公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欢迎，认为在苏联身上"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友谊"。特别是对于苏联归还旅顺的做法，普遍的反映是消除了对苏联的怀疑和担心，相信苏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③]

苏联领导人从战略利益出发采取的政治举动的确感动了中国人民，但是，由于历史地形成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苏军在撤退前还是做了一些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蠢事，这就是所谓的旅大苏军纪念塔事件。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在回国途中，于 10 月 13 日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苏联领导人指示，苏军撤走前应修建一些纪念物，并整修原日俄战争的纪念

---

① *Хрущё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Вагриус，1997，с.356.

② 《人民日报》1954 年 10 月 12 日。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4 年 10 月 15 日，第 234 号，第 192–193 页；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4 年 11 月 1 日，第 248 号，第 11–12、14–15 页。

物。11 月 13 日，苏军指挥部派代表到旅大市委，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指示，具体计划是：修建一座抗日战争胜利塔，以及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口陆地防务要塞司令官康特拉琴科少将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中将的两座纪念塔；建造一个巨型建筑物，上面镌刻斯大林为战胜日本的《告公民书》；修建 12 座各种纪念碑。此外，要把两次战争中阵亡的俄军官兵和苏军官兵墓地及俄军博物馆加以整修。所有费用均由苏方负担，有关雕塑物，将由莫斯科制作运来。中共中央接到旅大市委报告后，可能是对详细情况不清楚，也可能当时未加认真考虑，遂于 11 月 27 日复电表示同意，并表示可予以协助。[①]

后来，当苏联通过外交途径正式提出明确要求后，中方提出了不同意见。1955 年 1 月 30 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时通知，苏联政府已经做出决定，为纪念苏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拟在旅顺地区建造下述建筑物，以铭记苏军将士和 1904 年保卫旅顺的英雄：1. 在城里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2. 在军人墓地建立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3. 在城里修建斯·奥·马卡洛夫海军中将纪念碑；4. 在 2 号炮台建立两座方尖碑；所有这些建筑物均拟建成带有青铜雕和石雕的宏伟纪念碑。大使馆受托同中国政府协商建筑上述纪念碑以及由中国当局保护现有的保卫旅顺英雄纪念碑的问题。周恩来听后说，关于利用苏联资金建筑上述纪念碑一事，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的报告中得知。中国欢迎建造纪念 1945 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在这一战争中阵亡的苏军将士纪念碑，但对于建立马卡洛夫纪念碑和两个方尖碑，他个人还不完全理解。周恩来提醒说，列宁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都对 1904 年日俄战争做过相应的评价。周恩来表示，还需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必须在中共中央进行商量。[②]

2 月 17 日周恩来接见刚从莫斯科返回北京的尤金大使，谈到苏军撤退前拟在旅顺修建五个纪念物的问题时，周恩来说：苏军当局提出的两个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碑（一个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在旅大市；另一个是苏军死难烈士纪念碑，在旅顺郊外苏军公墓），当然是完全应该建立的。关于修建另外三个有关 1904 年日俄战争的纪念物的问题，我们曾经考虑过。我们认为，在联共党史上关于 1904 年日俄战争的性质，是说得很清楚的，列宁同志对这个战争也作了极正确的评价。因此，我们觉得不好去纪念日俄战争中的人物和战绩。而且，反映日俄战争的苏联

① 采访王亚志记录。

② 1955 年 1 月 30 日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пор.10，л.188-189。

小说《旅顺口》，是一部不好的小说，这部小说中没有写中国人民，而出现在小说中的两个中国人，都是日本间谍。同时，表示原则同意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军的计划。最后，请大使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考虑，并希望对此提出苏方的看法。[①]

《旅顺口》是苏联作家 A. 斯杰潘诺夫撰写的小说，曾获得 1943–1944 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1947 年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翻译出版了中文本，在中国大量发售。周恩来在 1950 年 1 月乘火车赴莫斯科途中看了这本书，印象很不好。周恩来认为，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思想，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书中的英雄马卡洛夫只不过对腐朽的沙俄军队制度做过一些技术性的修补、改革，比其他将军们稍好一点，但对沙皇的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特别是书中丑化中国人，把中国人都描绘成坏人，周恩来感到十分气愤。[②]

周恩来的看法是有根据的。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说，“旅顺口的陷落是对沙皇制度的罪行所作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总结”，这“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失败中得到了好处”。[③] 旅顺口要塞司令康特拉琴科在战争中英勇阵亡，被俄国人誉为旅顺防御的“灵魂”。马卡洛夫原是海军彼得堡喀琅施塔得港口司令，很有才华，战争开始后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在海战中触雷，舰毁人亡。在沙皇制度腐败，众多将领庸碌无为的日俄战争期间，康特拉琴科和马卡洛夫确是俄军中的佼佼者，是俄国的民族英雄，但对于革命来说，他们是旧制度的维护者，对于中国来说，他们是占领者和侵略者。试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能容忍为这样的人树碑立传！？

2 月 20 日，周恩来将中央的意见电告旅大市委，并叮嘱即将到旅大地区慰问苏军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说，如苏方再提出此事，可答复由两国政府商定。如苏方讲建立的理由，可以列宁和苏共党史的表述进行回答。[④]3 月 8 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共旅大市委：苏联政府考虑了中国政府的意见后，已决定不再建有关日俄战争的纪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450–45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01、102 页。

③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34–141 页。

④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4–5 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590–591 页。

念物，并对中国修建苏军烈士塔、中苏友谊塔和中苏友谊纪念碑表示感谢。[①] 事情总算过去了，但给中国领导人留下的印象很不好。

1955 年 1 月 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从朝鲜东海岸回国，接管苏军在旅大地区的防务。2–5 月，中央军委又陆续调空军、海军和公安部队进驻旅顺口，并组建了海军旅顺口基地。2 月 5 日，接收旅大防卫区委员会组成，肖劲光为主任，邓华、甘泗其、刘亚楼、曾绍山、郭述申为副主任。2 月 11 日成立了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为保证顺利、按时接收和担负起防务，进驻旅大地区的各部队迅速开展了向苏军学习的活动。2 月中旬，接防部队在苏军协助下，举办了 15000 多人参加的 200 多个训练班，由苏军从技术上培训防区的指挥员、参谋、军械、政工、坦克、通信、防空、工兵、防化和后勤等有关人员。海军部队则开展了“兵对兵，将对将”向苏军学经验、学技术的活动。通过向苏军学习的活动，各级干部不仅熟悉了防区，掌握了技术，而且对接收的武器装备、物资器材的状况和性能都有了全面的了解。[②]

2 月 16 日，中苏交接联合委员会举行会谈，通过了《苏军自辽东半岛撤离与中国军队进驻的计划》、《防务移交与中苏军队同驻期间保持备战实施的计划》和《技术装备交接计划》。为预防交接期间突然事件的发生，双方还共同拟定了《中苏两国军队共同作战方案》。其中规定，4 月 16 日零时为防务交接时间，此前两国军队统由苏方指挥，此后统由中方指挥。4 月 15 日 13 时，举行交接签字仪式。中方代表签字的是第三兵团副司令曾绍山、海军旅顺口基地司令罗华生、空军第三军军长刘丰；苏方代表签字的是第 39 集团军司令什维佐夫、海军基地司令古德利切夫、空军第 55 军军长切德利克。4 月 16 日零时以后，旅大地区一切防务由中方接管。[③]

接收军事设施和装备武器的工作，从 3 月 7 日开始，至 5 月 16 日全部完成。有偿接收的装备有：

海军——鱼雷快艇 39 艘，护卫艇 6 艘，辅助船 18 只，伊尔 -28 轰炸机 64 架，另配伊尔 -28 教练机 12 架，里 -2 教练机 2 架，180 毫米海岸炮 1 个连（4 门），130 毫米海岸炮 28 门，130 毫米列车炮 14 门，100 毫米海岸炮 8 门，85 毫米高射炮 96 门，37 毫米高射炮 26 门，鱼雷 80 枚，水雷 332 个，各种炮弹 235 万发，炸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450–451 页。

②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苏联红军在旅大》，第 26–27 页；彭林：《接收苏军防务，组建旅顺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年，第 240–241 页。

③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苏联红军在旅大》，第 27 页。

弹2624吨，各种车辆1684辆，雷达35部，油料22000吨，共2.7亿卢布。

陆军——各种大炮1113门；坦克和自行火炮357辆，其中ИС-2重坦克18辆，T-54坦克16辆，T-34坦克224辆，СУ100自行火炮99门。中国用以编成1个机械化师（3个机械化团，1个坦克团，一个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榴弹炮团，1个高射炮团，共7个团），还用其他苏军装备编成1个野战高射炮师、1个反坦克炮师、1个加农炮兵旅。

空军——接收295架飞机，内有281架米格-15，12架米格-17，2架雅克-12。陆、空军武器装备共4.53亿卢布。上述苏军武器共7.23亿卢布，加上安东苏军（抗美援朝时进驻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撤走时移交的装备共2.47亿卢布，合计9.72亿卢布。

无偿移交的设备和器材有营房151万平方米，机场9个，以及码头、阵地、工厂、营房、仓库、医院等，还有布雷舰1艘、护卫舰2艘、护卫艇2艘，约值人民币4亿元。[①]

移交谈判开始是在双方军人之间进行的，互相合作不错，价格也定得较为合理。但不久莫斯科从对外贸易部派来了一个代表团，专门谈价格，把以前的方案全部推翻，重新评级定价，于是双方讨价还价，争吵不休。如谈判空军装备时，苏方均按出厂新品的半价计算米格-15和米格-17飞机价格，而且不供应喷气飞机的燃料。刘亚楼听后生气地说，那么一架也不接收了，邓华也说对方是“老奸巨猾”，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后报经双方上层调解，又确定飞机折旧计价，并供应燃料油，才解决了问题。[②]副总参谋长黄克诚后来谈到接收旅大装备时认为，在经济上不合算，但从政治上考虑，这笔钱又不能不花。[③]现在看来，这批装备是中国主动提出留下的，苏联要求部分装备有偿转让，并无不合理之处。即使苏方外贸人员对价格有些计较，但并没有超出周恩来确定的8亿卢布的总额限定，[④]而中国军队则增添了一批急需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对加强国防是极为有利的。

交接工作全部完成以后，5月24日下午4时，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旅顺苏

---

① 采访王亚志记录；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7–28页；彭林：《接收苏军防务，组建旅顺基地》，第242页。另参见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11–112页，其中对海军接收的装备有不同计算。

② 采访王亚志、纪亭榭记录，纪亭榭50年代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另参见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11–112页。

③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318页。

④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57页。

军司令部举行会议，签署了最后议定书。确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将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全部撤退回国。[①]自5月25日至27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12万人分批撤离。从此，旅大地区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由外国人统治和管辖的历史。

苏联军队实际占有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前后达10年之久，这也算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苏联来说，控制旅顺口确实有其安全利益和军事战略的考虑，但客观地讲，对于中共并无不利。苏军占据和控制旅顺地区，在1949年以前有助于中共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军队，夺取全国政权；在1949年以后则有利于中共巩固政权，保障其远东地区的安全。惟其如此，中共对此始终持赞同和理解的立场，甚至主动要求推迟苏军从旅顺口撤退的期限。不过，从民族感情和权利的角度，允许在本国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毕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为了加强中苏友谊，巩固中苏同盟，苏联才主动提出提前归还旅顺基地。在这方面，尽管可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赫鲁晓夫个人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强国的首脑，赫鲁晓夫对于弱国的民族感情似乎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和体会，所以当他在几年后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时，恰恰因没有考虑到毛泽东对外国军事基地问题的敏感反应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②]

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9期

---

① 《人民日报》1955年5月25日。

②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另有一篇文章论述：《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即将发表）。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

向国外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是战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一种特别现象。人们注意到，无论派出国的动机和初衷怎样，其结果都是事与愿违。以苏联为例，1948 年斯大林对苏南冲突的第一反应就是撤退在南斯拉夫的所有专家，1956 年波苏关系危机时哥穆尔卡首先采取的措施也是要求苏联撤出在波兰的顾问，而 1960 年中苏分裂展示给世人的信号又是赫鲁晓夫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同样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南阿、中越、苏匈、苏阿关系当中。仅此一点就值得引起历史学家去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派遣专家问题的方方面面。

本文专门讨论 1949–1960 年在华苏联专家的问题。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人数最多[①]，时间最长[②]，对于在中国建立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也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所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派遣专家现象、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点、分析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美国分化中苏关系的战略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有助

① 1947–1956 年苏联向各人民民主国家派出的专家总计 14000 多人（《人民日报》1957 年 2 月 23 日），而据俄国档案记载，1950–1956 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就有 5092 名 [Sergei 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55]。1957 年苏联撤回了在东欧各国的大部分专家和顾问，但在华专家则保留了几年而且还有新增者。

② 尽管 1960 年 7 月赫鲁晓夫撤退了在华专家，但 1961 年又向中国派出 9 名苏联专家，1962 年派遣了 10 名。*Филатов Л.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1995, №65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49.

于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诸多历史因素。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学界，特别是中俄两国学者，对这一课题尚未展开深入研究。尽管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几乎都要谈到苏联专家问题，但专门的论著却极为少见。[①]笔者在考察中体会到，其原因主要是有关史料在以往研究著作中少而零乱，原始材料又分散在各地，特别是要了解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具体和实际的状况，则必须深入到社会基层。所以，为了收集有关这一专题的资料，笔者除阅读此期全部《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和大量专业论著外，还到北京、内蒙、吉林、辽宁、新疆等数省地方档案馆查阅有关文献，走访一些曾聘请苏联专家的企业、机构和当事人，并翻阅了涉及中苏关系的大量俄国最新解密档案。

作为对这一课题的初步探讨，本文主要目的是对所收集的大量史料进行梳理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描述苏联专家来华的基本状况及中苏双方政策的变化，以为进一步研究做准备。

一、为了满足中国的政权和经济需要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③]至于到1960年7月撤退专家前，究竟有多少苏联专家来中国工作，学术界没有考证。一般的说法是专家总数在万余人，但有学者指出这一估计没有根据。[④]笔者以为，由于当时对专家这一概念

---

① 笔者只见到一篇专门讨论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论文 [Deborah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 Odd Arne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作者是中苏经济关系史专家，曾出版过一部有关中国如何学习苏联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的专著（*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该文的价值在于利用了大量俄国解密档案和对专家本人的采访，而缺憾是没有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当然，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

② 详见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1948–1949）——中苏经济关系研究之一》，《党的文献》2001年第二期。

③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6, с.84.

④ *Кейпл Д.* (D.Kaple)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 (1949-1960) //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5，с.342.

没有确定的范围[①]，以及在华专家往来期限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延聘、新聘者之交叉），加之统计材料不全面，的确难以把握精确的数字。不过，大体情况还是可以了解的。据中国的档案文献，至1958年底，全国经济、文教各部门聘请了11527名苏联和其他国家专家来华工作，其中苏联专家占89%，[②]即约10260人。而1958–1960年苏联又分别派遣915名、699名和410名工业技术专家来华。[③]相对来说，苏联教师来华人数有限，1948–1960年总计615名。[④]故1958年以后来华教师数字可以略去不计。这样，来华工作的非军事专家（除临时开会和访问的学者、专家）应在12284人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军事顾问（1957年后也称专家）。据目前看到的中国书面材料，海军聘请的苏联专家和顾问累计3390余人，[⑤]再加上空军、炮兵、通讯兵、导弹部队等其他技术兵种，有人估计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总数肯定在万人以上。[⑥]如此计算，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2万人。

这么多的专家是如何到中国来的？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国家派遣专家（主要是军事、安全顾问）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⑦]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共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完全是中国政府请来的。

---

① 这里需要对专家的称谓做一说明。波匈事件以前，中国对请来的苏联援助人员有各种称呼，一般来讲，在国家机关和行政管理部门及军事机构的称为顾问（总顾问），在工矿企业和基层单位的称为专家，在学校和教学单位的称为教授或教师，此外还有一些辅助工作人员，如技工和军士。1957年12月5日国务院通知，鉴于苏共中央提出“取消向我国派遣顾问的建议”，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的苏联专家仍称顾问外，其余统称为苏联专家（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239，第45页）。1958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通知：“今后凡在我国各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律取消顾问名称，统称专家”，总顾问改称专家负责人（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第94卷，第46–47页）。本文所说专家，除特别说明外，是对来华援助人员的统称，但所引史料中使用的称谓各异，需要仔细判别。

② 1959年4月11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外国专家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5，卷宗21，第96–106页。

③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c.39.

④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c.56.

⑤ 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44–4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⑥ 2001年6–10月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王亚志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国防科委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

⑦ *Носкова А.Ф.* 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45-1953гг.)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1，c.105；Zoltan Barany，“Soviet Takeovers: The Role of Advisers in Mongolia in the 1920s and in Eastern Europe after World War II”，*East European Quarterly*，V.28，No.4，January 1995，pp.411-413.

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而管理城市和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人才则严重缺乏，因此，掌握政权以后就特别需要学习，尤其是向苏联学习。在这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无疑是一条重要而快捷的途径。正是为了满足中国的需要，50 年代初莫斯科提供的直接帮助之一，就是派遣大批工业技术和军事训练专家以及国家行政管理顾问来华工作。

缺乏可靠的科学技术人才是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1949 年 10 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告诉苏联大使 N. V. 罗申，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 2 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 70 名工程师中竟有 62 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①] 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 0.24%。[②] 到 1951 年 7 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③] 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以至毛泽东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④] 显然，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据中国档案材料，自 1950 年至 1953 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 1093 人。[⑤] 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 1951–1953 年已有 1210 人。[⑥] 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 1953 年的工作报告，仅 1950 年 5 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

---

① 1949 年 10 月 28 日罗申与陈云谈话备忘录，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100, оп.42, п.288, д.19, л.58-62。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年，第 46 页。

③ 1951 年 7 月 24 日罗申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АВПРФ, ф.100, оп.44, п.322, д.13, л.44-51。

④ 1949 年 7 月 4 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647 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年，第 386–388 页。

⑥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c.11.

先后聘请苏联专家 1500 人。[①]

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首先需要技术支持的就是基建工程的设计力量，而在这方面中国确实无能为力。到 1953 年，全国总共只有 78 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不足 500 人。[②] 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 年 2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 16 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 3 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 23 个苏联设计组是 1951 年聘请的。这样，到 1951 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 42 个小组，其中 30 个安排在东北地区。[③] 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 5 个综合专家组于 1952 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规划全国电气化，确定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调整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和规划新厂建设，对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进行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 6 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④]

建国初期中共对苏联还有一个急切需求，就是派遣军事技术和训练专家。中共军队虽英勇善战，但武器装备实在太落后，炮兵数量有限，空军根本不存在，仅有的一些海军舰只破旧不堪，甚至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战船。[⑤] 这样的装备，既要保证国家的空防和海防，又要渡海解放台湾，还要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显然力不从心。而从苏联大量购进飞机、军舰及其他现代化武器后所面临的问题是部队文化素质太低，自己无法立即掌握和使用新式武器。据统计，1952 年中国军队 128 万排长以上的军官，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 2.14%，具有高中水平的占 12%，还有 27.21% 的人是文盲。[⑥] 刘少奇后来向苏联大使尤金承认，那时中国军队的一些指挥员不是其所辖兵种的内行，有些空军团长没当过飞行员，炮兵军官没当过炮兵，他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年，第 254 页。

②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c.7-8.

③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4–15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年，第 369、374 页。

⑤ 采访王亚志记录。

⑥ 采访王亚志记录。

们“应该接受培训，以便能够管理机械化的部队”。[①] 于是，苏联不仅需要提供武器，还必须派遣教官和军士来帮助中国军队掌握新式武器。

为了帮助中国建立 6 所空军学校，1949 年底根据双方协定，苏联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 878 名专家。[②] 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 711 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③]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以至苏联有时甚至不能完全满足中方的请求。如 1950 年 8 月苏联应邀增派了 38 名空军顾问,[④]1951 年 2 月又派出 15 名军事顾问。[⑤] 同年 9 月毛泽东要求苏联派 83 名顾问到志愿军部队工作。[⑥] 尽管中方一再坚持，苏联只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 M. V. 扎哈罗夫为首的 5 人专家小组驻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⑦]1951 年 11 月苏联再次应中方要求派出 19 名空军顾问。[⑧] 对于 1953 年 1 月中国请求派 12 名海军航空兵顾问的电报，斯大林答复只能补派 3 人，其余从已在华的顾问中派出。[⑨]

中共在国家管理方面的主要难题也是干部文化水平低下。根据 1950 年 3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 150 万党员，其中 130 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 50% 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准备用 2–3 年时间在党的基层干部中扫除文盲，用 5 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⑩] 依靠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当然是无法对诺大中国进行有效管理的。因此，中共一方面动员各部门干部到苏联学习、参观，[⑪] 一方面聘请大量苏联

① AVPRF, f.0100, op.48, pap.410, d.9, p.9，Sergei Goncharenko，“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Siho-Soviet Split”，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1996.1，p.7.

② 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的空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58 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空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164 页。

③ 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的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48–49 页。

④ 1950 年 8 月 27 日斯大林致科托夫电，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34，л.94。

⑤ 1951 年 2 月 13 日周恩来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45，оп.1，п.337，л.58-59；2 月 16 日斯大林致周恩来电，АПРФ，ф.45，оп.1，п.337，л.60。

⑥ 1951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45，оп.1，п.341，л.98-99。

⑦ 1951 年 9 月 10 日、12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45，оп.1，п.341，л.109，120。

⑧ 1951 年 11 月 13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45，оп.1，п.342，л.8-9。

⑨ 1953 年 1 月 7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 月 27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45，оп.1，п.343，л.128，139。

⑩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302, д.10, л.100. *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17.

⑪ 在俄国解密档案中有许多关于中国代表团请求到苏联对口部门或单位参观、学习的报告和批示。

专家来华协助政府进行管理。苏共中央的档案提供了1954年第1季度苏联顾问在华工作范围和地区的证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顾问达403人，这个数字大约占当时在华经济专家人数的1/3，而且其中318人，即3/4以上的顾问集中在北京。[①] 这些顾问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门，从安全、军事、情报，到体育、卫生，无所不在。由此可以想见，中共对国家尤其是城市的管理，最初是何等地需要和依赖于苏联专家传授的经验。

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要求的，而且往往是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鼠疫，威胁平津，毛泽东请求苏联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电答应了这一要求。[②]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使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的另一个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③]1950年1月6日苏联外长A. Ia. 维辛斯基通知毛泽东，为排除吉林水电站的故障，苏联政府已决定按中方要求在5天内派出4名苏联专家到中国。[④]1953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扩大招生，需要增聘4位苏联教授来校讲课，苏联方面立即满足了这一要求。[⑤] 如此等等。

二、专家派遣和管理工作的混乱局面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50年代初期很多专家来华是为了解决中国之亟需，而且专家的聘请与派遣，往往是在国家领导人之间直接交涉的，没有确定的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也没有相应的计划和措施。所以，尽管高层对此十分重视，但向中国派遣专家的工作是相当混乱的。

最初在华苏联专家负责人是莫斯科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1950年毛泽

① 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 ф.5, оп.28, д.187, л.15-19. *Кейпл Д.*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 (1949-1960), с.342.

② 1949年10月28日、3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98、99页。

③ 1949年12月29日齐赫文斯基与张西畴谈话的报告，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302, д.10。л.50-52；1949年12月31日谢巴耶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302, д.10, л.47-49。

④ 1950年1月6日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8, д.302, л.1-5。

⑤ 1953年7月27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 ф.5, оп.28, д.38, р.5082, л.34-35；龚士其主编：《杨献珍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68、204页。

东访苏时，斯大林认为此人不懂政治，作为铁路专家，其技术也不全面，所以推荐时任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阿尔希波夫担任总顾问。[①] 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做出决议，在苏联驻华大使馆设立经济参赞职务，并批准阿尔希波夫以二级特命全权公使衔担任这一职务。[②] 斯大林曾指示，苏联专家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苏联专家到中国后由中方分配工作，受中方各级负责人的领导。[③] 在苏共十九大期间，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还向刘少奇和李富春建议："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专家包办"，"不一定事事派苏联专家去。派专家一定要专业对口才行。"[④]

不过，苏联多年形成的官僚体制使得领导人的良好愿望无法贯彻下去。通过凯佩尔教授对大量苏联专家的采访可以得知，派遣专家的问题最初是由联共（布）中央直接负责的，但具体负责人关注的只是专家的政治背景。据说，每一位被挑选准备出国的人都要填写一些表格，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确认其本人和家庭、亲属没有政治问题后，被召到中央委员会参加会议，进行谈话，并分配任务。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认为，挑选专家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你有没有党证"，而且一旦被选中是不能拒绝的。而对于专家如何在中国开展工作，却没有任何足够的准备，既没有发给他们一些有关中国的材料，也不要求他们到中国后学习最基本的汉语知识。因此，大多数受聘者对中国的历史、政治和当前形势竟然一无所知，有报告说，马上要出发到中国去的教师甚至都没有看过刚从那里返回的苏联专家写的在华工作总结。[⑤]

实际上，尽管中国迫切需要苏联专家，但并没有及时做好接受专家的各项准备工作。例如，1949 年底大量专家来华，一时间住满了北京饭店和解放宾馆，接待单位只能在北京以外设法为他们安排住宿；有时由于缺少足够的翻译人员而不得不减少聘请的专家人数。[⑥] 鉴于这种情况，1950 年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苏联专家工

---

① 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87–488 页。笔者 2000 年 10 月 29 日采访李越然记录。李越然在 50 年代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外国专家局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俄文翻译。

② 1950 年 4 月 24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 74 号记录摘录，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1, л.1。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69–74 页。另参见《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7 日。

④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年，第 39–40 页。

⑤ Deborah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pp.125-127.

⑥ 1949 年 12 月 29 日齐赫文斯基与张锡俦谈话的报告，АВПРФ, ф.100, оп.43, п.302, д.10, л.50-52。

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放之主持。中方最先成立苏联专家事务管理部门是“北京苏联专家服务局”，专门负责接待、住宿等生活问题。[①]

安排专家工作方面的准备同样非常仓促。如中央各部和东北等地区的主管部门纷纷提出聘请专家的要求，却没有事先为苏联专家设计组准备好必要的资料，多数设计组来到中国后还要搜集设计资料，以至不能依照合同如期完成工作，必须延长留在中国的时间。1951 年鞍山钢铁厂对收集原始资料工作没有统一领导，零星分散，没有专责，结果使电气、土建、水道、供热、总平面图等方面的设计工作缺乏相互配合，导致返工延误。按中国重工业部统计，1953 年以前，除由苏联专家在华直接领导收集资料的项目外，所有各厂矿的文献和资料大都延期交付。据初步计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资料，约占全部原始资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于中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造成设计失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其结果，不但增加了设计费用，推迟了建设工期，也因苏方专家延期返国，耽误了他们在国内的原有工作。[②]

为了克服在聘请苏联专家方面各自为政的现象，中央财经委在 1951 年 4 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区有关聘请设计专家事项，应呈由中央主管部核转中财委呈请政务院批准。政务院核准后，经中财委通知主管部及贸易部，由贸易部会同主管部与外国驻华商务代表接洽办理。必要时由贸易部授权驻外商务参赞处在国外洽商办理。[③]4 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再次强调，财经、文教、政法等所有系统聘请外国专家的批准权限均在政务院。专家到职后的薪金、待遇等事项亦由政务院通知有关部门统一办理。[④]

中苏双方的沟通和联系也十分欠缺。如 1949 年 12 月 9 名苏联女教师来人民大学任教，中方却一直未得到通知；苏联两位国家安全机关的专家已经到达北京，中国有关方面竟无人知道此事。[⑤]还有，计划专家班高夫刚刚派到中央财经委员会计

---

①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89 页。

② 1951 年 7 月 20 日中央财经委关于聘请苏联设计专家的补充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A31，目录 2，卷宗 361，第 17–21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410–418 页。

③ 1951 年 4 月 30 日中央财经委关于“聘请国外设计组、设计专家及设计顾问暂行办法”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A31，目录 2，卷宗 361，第 1–6 页。

④ 1951 年 8 月 18 日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聘请外国顾问及专家暂行办法，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A31，目录 2，卷宗 361，第 29–31 页。

⑤ 1949 年 12 月 29 日齐赫文斯基与张锡俦谈话的报告，АВПРФ, ф.100, оп.43, п.302, д.10, л.50-52。

划局工作不足一个月，苏联总顾问便通知将其调赴东北经济计划委员会工作。既没有同专家本人商量，也不征求计划局的意见。① 此外，由于中方有些部门在聘请专家方面缺乏计划，考虑不周，往往在报请中央批准后又要求改变专家种类或名额。② 这些都是造成双方交涉困难，出现麻烦的原因。

为解决上述问题，中苏双方加强了高层接触。1953 年 6 月 8 日，周恩来接见苏联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部门代总顾问布拉金（阿尔希波夫为洽谈一五计划援华问题回国），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6 月 13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9 月 9 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③ 此后不久便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杨放之任局长，进一步加强了对专家工作的管理。④ 从 1954 年起，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也开始出现了有关专家工作计划的记载。⑤

三、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以一五计划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猛然增加。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由此出现了高潮。

1953 年 9 月 3 日李富春自莫斯科报告，历时 8 个月的关于苏联援华问题讨论终于有了结果。苏联将派遣 200 名设计专家，帮助中国建立工业企业设计单位，培养中国自己的设计人员，并为中国进行工业企业的设计。此外，还决定增派 50 名

---

① 1952 年 4 月 8 日陈云给周恩来的报告，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A31，目录 2，卷宗 406，第 67–68 页。

② 1952 年 4 月 28 日中央财经委关于下年度聘请苏联专家问题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A31，目录 2，卷宗 406，第 4–6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306、308 页。

④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一辑，第 89 页。

⑤ Deborah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p.119.

地质专家来华，帮助中国组织地质勘探工作，同时培训中国地质人员。[1]

按照计划，仅 1954 年 1 月份，苏联即向中国派去 343 名专家。[2] 根据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统计，是年 1 至 3 季度工矿企业新到苏联专家 467 人。到年底，除期满回国者，在工业部门的苏联技术专家已达 820 人。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估计，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 年比 1953 年增加两倍多，1955 年比 1954 年可能还要多些”。[3] 鉴于一五计划主要是为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所以，从此期来华专家的比例看，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 1954 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 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4] 可见，1954 年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仍然是根据中国的需要。

1954 年 10 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方提出了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进一步要求：一、派遣解决总体利用扬子江和水力资源问题的专家组到中国来帮助进行勘察工作。二、派遣建筑施工专家 40 到 50 名帮助中国在新工业城市建立的 11 个建筑工程公司的工作。三、派遣 8 名城市规划方面的顾问，指导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四、在 1955 年派遣 57 名铁路设计专家，6 名铁路施工专家帮助中国进行铁路建设。[5] 苏联部长会议于 11 月 25 日通过决议：满足中国政府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额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工厂生产实习的请求；责成苏联一批工业部为总供货人，必须按期完成企业设计工作，在厂矿建设（设计检查和咨询）、安装、调试和投入生产中提供设备、电缆制品和技术援助；交通建设部和交通部必须于 1955 年第 1 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 - 设计师和建设者；电站部必须在 1955 年第 1 季度为中国派去 13 人的专家小组，期限为 1 年，帮助中国进行长江水利资源勘察和测算，包括农业部专家和技工，河运部专家和技工，地质部、科学院、测绘总局各 1 名专家；建设部、冶金和化学企业建设部必须在 1955 年上半年向中国各派出 11 名专家，期限为 2 年，根据双方达成的专业范围，为中国 11 个联合企业提供技术援助；莫斯科市必须在 1955 年第 1 季度为中国派去顾问，帮助制定北京市的总计划；石油工业部必须在 1955 年第 1 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就地了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359–364 页。

② *Кейпл Д.*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 (1949-1960)，c.341.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390、396、437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 396 页。

⑤ 1954 年 10 月 12 日中国政府备忘录，《党的文献》1999 年第 5 期，第 25–27 页。

解现行炼油厂的状况，并同中国方面一起弄清同炼油厂改造有关的问题。[①]

此期，在华苏联专家人数持续增长。据苏方的统计，在1954—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②] 如果按照中方的估计，此期苏联专家人数还要多。[③]

在短时间内派遣大量专家来华，苏联的管理工作难免出现差错。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的费德林1954年1月向苏共中央报告说，答应往中国派遣的50名地质专家，结果只来了21名，而卫生保健专家根本就没有来。更为糟糕的是，某些部派来的专家明显没有能力或身体欠佳。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也报告说，到中国考察的结果表明，由于选人不当，把一些专业水平不高的顾问派到了中国。一位在冶金部工作的苏联顾问，不仅对中国的冶金状况缺乏了解，甚至对苏联先进的炼钢工艺也不熟悉。谢列平认为这简直是耻辱。[④]1957年外交部的几份报告反映，苏联国内各部委和行政机关对派遣专家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把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派到了中国，很多专家事前毫无准备，一些人工作状况很糟糕，甚至有人还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由于对派遣条件控制不严，有的部门把年老体弱无法工作的人派到中国，以至有几个人长期患病，到中国只是养病，直到身体康复又被送回国。教育部门派遣专家在时间安排上有很大漏洞，有些教师到中国后，学校正在放假，根本无事可做，而几个月后又该回国了。外交部还向苏共中央抱怨说，已决定派往中国的39名专家中，至今有31人的材料还被搁置在出国委员会。[⑤]

---

① 1954年12月27日费德林致尤金的信，АВПРФ, ф.0100, оп.47, п.384, д.52, л.52-56。

②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c.24；1957年1月4日谢皮洛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SD10181。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1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第2810–2813页。

③ 1956年6月28日结束的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报告说，预计在年底全国将有苏联专家3500人，其他国家专家200余人，如加上家属即有6000–7000人。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138，第7–14页。同期在华军事专家和顾问有592人。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23页。

④ ЦХСД, ф.5, оп.28, д.187, л.15-19；д.308, л.116-126. *Кейпл Д.*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 (1949-1960)，c.342.

⑤ TsKhSD, f.5, op.49, roll.8862, no.41 (April-December 1957), pp.120-152. 转引自 Deborah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pp.131-132。

其实责任并不完全在苏方，中方聘请不当，准备不足，也是造成苏联专家在华期间工作量不足，到期又不能返回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业没有根据工作进度安排聘请计划，便贸然请来大批专家。如陕西兴平中速柴油机厂急急忙忙发出聘用专家的申请，但8位苏联专家到厂后，发现建厂计划推迟，甚至主厂房还未建起，结果无所事事。还有兰州化工厂、洛阳铜加工厂、洛阳高速柴油机厂及中山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都因原材料或仪器供应不上而造成专家工作延期。[①] 长春汽车制造厂则有16位专家因聘期不当，不能发挥作用而提前回国。还有3位负责职工技术培训的苏联专家已经到厂，而该厂的招工工作尚未开始，只得由苏联调回。[②]

这些情况的发生，自然会引起双方的矛盾，特别是在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专家工作中的问题便成为双方相互指责的借口。

四、苏联的谨慎政策和中国的少而精原则

1956年10月波苏冲突时，苏联被迫答应撤退在波兰的军事专家，[③] 并在10月30日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表示愿意考虑撤退在其他国家工作的苏联专家。[④] 此事对在华苏联专家也产生了影响。在10月30日与尤金大使讨论宣言时，刘少奇指出，由于对所在国的特点缺乏了解，"某些顾问提出的政治建议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而某些地方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通常都归罪于顾问，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中国从越南召回了除技术专家之外的全部顾问。说到苏联顾问，刘少奇强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当地国家的干部，"目前已经是他们返回祖国的时候了"。考虑到某些国家已经习惯于依赖苏联顾问的情况，刘少奇甚至建议莫斯科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要表现得坚定果

① 1959年8月1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报告，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11，卷宗88，第81–82页。

② 1960年9月1日中共第一汽车制造厂委员会关于建厂以来苏联专家工作总结，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6，卷宗23，第45–49页。

③ 详见Mark Kramer，"Hungary and Poland, 1956: Khrushchev's CPSU CC Presideum Meeting on East European Crises, 24 October 1956"，*CWIHP Bulletin*, 1995, No.5, p.50；关于苏共中央讨论在波兰苏联专家问题的俄国档案中译文，刊登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

④ 195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宣言全文。

断一些。[①] 尽管谈的不是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但莫斯科了解到中国这一立场后的感觉是可以想见的。

实际上，中国聘请苏联专家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改变。1957 年 2 月 6 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我们需要苏联专家，但有些部门过去请得多了些，以后要严格控制。[②] 随后国务院发出通知，批评某些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并非必需，聘期也过长，规定"今后在聘请专家方面必须严格掌握精简的原则，凡可聘可不聘的坚决不聘，凡能缓聘的坚决缓聘"。[③] 中国改变聘请专家政策的考虑，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目的是缩减聘请专家的庞大开支。[④] 另一方面，是对某些在军队和政府部门的苏联顾问有意见。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以苏为鉴"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响中国政策方针或体制建设的顾问显然是没有必要了。[⑤] 这一点在 1958 年 7 月毛泽东分别与尤金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充分表现出来。毛泽东指责在军事院校的苏联顾问讲战例时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公安部的首席顾问工作调动不同中方商议等。但毛泽东又明确讲，这些批评仅仅是针对军事和公安两个部门的苏联顾问，并不是针对经济领域的专家。当赫鲁晓夫提出撤走所有顾问的建议时，毛泽东表示反对，并主张把所有的顾问都换成专家。[⑥] 随后，中国政府逐渐确定了聘请苏联专家的新方针。

赫鲁晓夫尚未离开北京，周恩来即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工作问题的议定书草案送毛泽东审阅。议定书规定：苏联根据中国政府请求而派来的军事专家归中国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单位继续需要他们，应即改为专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继续工作。[⑦]8 月 23 日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必须严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只有工作上确属需要的新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才可聘请专家，同

① АВПРФ, Ф.0100, оп.49, п.410, д.9, л.202-203, *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2000，с.44. 实际上，早在 1955 年 8 月中国就提出撤出在越南的全部顾问，尽管胡志明有意挽留。1955 年 8 月 23 日佐林致苏共中央的信，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57。

②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367 页。

③ 1957 年 2 月 25 日国务院批转外专局关于对苏联专家关系中一些问题报告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36，目录 9，卷宗 294，第 4–5 页。

④ 关于专家开支的情况笔者将另文论述。

⑤ 1956 年 5 月彭德怀就主张将军队系统的专家、顾问减少 170 人。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623 页。

⑥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322–333 页；1958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АПРФ，ф.52，оп.1，п.498，л.44-47。

⑦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著：《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456 页。

时，要注意凡能聘请短期专家解决的，就不要聘请长期的专家，凡能够几个单位合聘的就要合聘。”[①]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联合发出通知，一方面强调绝大部分苏联专家是优秀的技术人才，对他们应热情相待，并虚心向他们学习；一方面重申只有在非聘请专家不可的部门和技术环节才能聘请专家，聘期以短期为主，一般不要延聘。[②]

苏联方面也加强了对聘请专家手续的管理。1958年12月苏联经济专家负责人符明转告中方，今后将严格按照派遣专家的新协定办事。过去中方往往在聘期届满时才提出延期问题，苏方为了满足聘请部门的要求，一般都同意先把专家留下来，以后再补办手续，今后使馆就没有权力这样做了。中方要求延聘的专家往往并非是工作十分迫切需要的，今后最好不要再延聘专家。确属非延聘不可的专家，希望在专家满期前2–3个月提出请求，以便在专家满期以前办好延聘手续。[③]此后，中方进一步对聘请专家的专业、聘期、来华日期和聘请条件提出了严格要求，并规定了审查制度和相应程序。[④]

由于执行新政策，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逐年减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⑤]再加上不断有专家到期回国，从1957年开始，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更呈现下降趋势。有材料说，1957年在华苏联专家共2419人，1958年为1285人。[⑥]如果与前引苏方统计数字相比，则在华苏联专家1957年减少了694人，1958年减少了1134人。[⑦]至于1960年4月在华工

① 1958年8月23日国务院关于1959年度聘请苏联专家注意事项的通知，吉林市档案馆，全宗77，目录4，卷宗20，第61–62页。

② 1958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对苏联专家工作的通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94，第46–47页。

③ 1958年12月11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报告，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全宗252，目录1，卷宗5，第65–67页。

④ 1959年6月16日国务院关于1960年度聘请苏联专家有关事项的通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5，卷宗21，第141–142页；1959年6月16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编写聘请苏联专家说明书的内容和注意事项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363，第76–82页。

⑤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c.24，39.

⑥ ЦХСД, ф.5, оп.49, д.131，*Кейпл Д.*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 (1949-1960)，c.341.

⑦ 另有材料说，到1957年在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已减少了三分之一，即947人。AVPRF, f.0100, op.50, pap.426, d.29, p.69. Sergei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p.155. 按中方的统计，到1958年底，在经济、文教各部门的苏联专家共有1177人。1959年4月11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5，卷宗21，第96–106页。

作的苏联专家总数（约1500人[①]）还多于1958年，其原因在于中国许多单位要求延长在华专家的聘用期。[②]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1957年以后聘请专家的低潮中，并非所有部门都减少了对苏联的要求，有些单位甚至还增加或新聘了苏联专家，这主要表现在国防新技术领域。1957年3月底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将派遣5名专家到中国，帮助组织有关专业的教学和讲授喷气技术课程。几个月后又决定增设固体火箭、远程控制（陀螺仪）、远程控制（无线电）等3个专业，增聘控制专业2至3名专家。[③]为了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根据10月15日双方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派遣了3名专家来到内蒙，进行核部件设计和生产厂的选址工作。[④]苏联国防部还决定将于12月下旬以两列火车60个车皮载运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口岸站，为教会中国官兵使用和维护这些设备，苏方拟派103人随同前来，教学期为3个月。[⑤]1958年5月27日，周恩来致电赫鲁晓夫：鉴于在研究试制和生产火箭武器过程中，保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决定请求苏联政府派一个保密专家组来华协助工作，为期两年。[⑥]中国政府还要求苏联派遣一个由31名导弹专家组成的技术小组于10月内抵达中国，同样工作两年。[⑦]为了帮助中国建立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6月底和7月初，由苏联海军通信部副部长列特文斯基率领的专家组6人，分两批到达北京，协商勘察建台选址事宜。[⑧]7月12日聂荣臻复电在莫斯科的李强：经中央批准，在榆林建立水声学研究站所需设备请苏方供应，费用由中方支付，但“建站技术及研

① 1960年4月2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党组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3，卷宗51卷，第6–11页；АВПРФ，Ф.0100, оп.53, п.454, д.8, л.205。*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с.295.

② 1959年各部门提出延聘的苏联专家相当多，将近工作期满专家人数的三分之一。1960年4月2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党组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3，卷宗51，第6–11页。

③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05、624页。

④ 2001年8月10日笔者采访安纯祥记录。安纯祥在50年代任核工业部202厂技术员，后任该厂总工程师。

⑤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27–628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45页。

⑦ 1958年6月6日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华大使备忘录，1958年8月16日张闻天致苏联驻华大使备忘录，AVPRF, f.0100, op.51, pap.431, d.1,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13。

⑧ 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01–202页。

究工作请苏派专家来我国具体指导，所获资料可互相交换。"[①]到1959年，中国对国防新技术专家的需求越来越迫切。1月27日要求聘请13名国防专家，6月24日要求聘请195名军事专家，9月22日要求聘请8名P-2导弹专家，11月23日要求聘请23名军事技术专家。是年6月，中国还希望已经在华工作的137名军事专家延期两年。[②]

不过，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1959年10月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后，聘请专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5月国务院再次强调，聘请苏联专家的原则是继续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聘请专家只限于为保证苏联援建项目的需要和发展高、精、尖、新的现代技术以及培养高等学校开设新专业或新课程的师资；聘请专家必须严肃认真，全面规划，通盘考虑，严格审查。[③]苏联方面对专家来华则更加严格限制，特别是在中国实际急需的领域。7月3日聂荣臻报告：苏联的援助在国防科技领域已经封口，对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则尽量控制，对已经签订的协议采取拖延和推托的态度。对此，周恩来批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专家问题：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提，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④]至此，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迹象已经显露，而中方也有了心理准备。

中苏两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有同盟条约做保证，相互之间提供援助本在情理之中。中国需要专家，而苏联也愿意给予帮助，双方最初的热情感人至深，但在具体执行派遣或聘请专家的政策时，中苏都没有从国家关系的法律角度认真考虑问题，缺乏严密的计划、具体的规定和详细的措施，致使矛盾和摩擦不断出现，即使中苏关系没有恶化，这种状态也无法长期维持。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时过于看重意识形态的作用，以为信仰相同，目标一致，便可以兄弟相称，不分你我，一句国际主义的口号就替代了处理国家关系的一般准则。一旦出现分歧或误解，主权问题、平等问题则立即被提到桌面上来，使得

---

①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46页。

② AVPRF, f.0100, op.52, pap.442, d.3,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pp.213, 339.

③ 1960年5月2日国务院关于1961年聘请苏联专家有关事项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3，目录12，卷宗21，第16–1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30–331页。

本来可以维持的正常关系也无法继续。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否构成了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真正原因，作为中苏关系的一个侧面，苏联专家在中国究竟有何作用和影响，笔者将另文加以论述。

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

中苏同盟的存在仅仅十几年，而真正的蜜月时期不过数年而已，但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则是极为深远的。直到今天，从党和政府的机构建制及名称，到经济体制的设立和运转，乃至大都市的建筑物和厂矿企业的机器设备，都还可以看到苏联的痕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国家的时尚或习俗传播到其他国度和地区，大体说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是国民自我意识发生变化的结果。然而，一种思想、制度甚至国家体制的移植，能够在短短数年内完成，则必然依赖于政府行为，所以它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影响，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专家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学习苏联的途径大体上有三种，第一是大量引进和翻译苏联的各类书籍和资料，通过书本学习。[①] 第二是大量派遣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技术人员及学生到苏联实习、考察，通过实践学习。[②] 第三就是大规模、全方位地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将苏联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等传授给中国人。[③] 应该说，与阅读书本和实地考察相比，通过面对面、手把手和朝夕相处的方式向苏联专家学

---

① 根据出版总署不完全的统计，自1949年2月到1952年9月止，中国出版的苏联书籍中译本共约3131种，仅人民出版社就出版12166100册，其中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占1/6。1952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台湾学者余敏玲有专文论述：《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到中国》，（台湾）《新史学》第12卷第4期（2001年12月）。

② 1950–1960年，苏联共接受38000多名中国公民前去学习或实习，1949–1966年，苏联的学院和研究机构共培养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实习生11000多人。*Филатов Л.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1995, №65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③ 关于苏联专家来华的过程和规模，详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24–37页。

习，影响更大，成绩更佳，见效更快。可以这样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苏联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一度在中国的出现，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以及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通过苏联专家这一渠道发生作用的结果。

鉴于有关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研究目前在国际学界，尤其是在中俄学者当中尚未展开，因此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收集和梳理史料。为此，笔者除阅读此期全部《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和大量专业论著外，还到北京、内蒙、吉林、辽宁、新疆等数省地方档案馆查阅有关文献，走访一些曾聘请苏联专家的企业、机构和当事人，并翻阅了涉及中苏关系的大量俄国最新解密档案。在此基础上，本文拟讨论50年代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这一过程是怎样发展变化的。

一、倡导“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

当第一批苏联专家于1949年8月来到中国时，刘少奇就在欢迎会上表示：这些专家“千里迢迢到中国来，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把他们当作很好的老师”。说到如何处理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刘少奇提出了“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的著名口号。[①]这个说法在以后若干年几乎成为中国各级干部处理与苏联专家关系的一条戒律，也是在那个时期无条件学习苏联的保障。[②]几天以后，刘少奇又分别对东北局干部和在北平的中共高级干部提出了严厉的要求：“苏联专家来，给了我们学习的好条件”，要善于向他们学习，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如果没有学好，不管工作职位高低，就要调动、撤职。”[③]

在工业系统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方针。1951年4月，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代表中央政府要求在中长铁路工作的中国干部，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各方面有计划、有组织地向苏联专家学习，“一件一件地学透彻，学会成套的经验”。[④]1952年12

①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7页。

② 笔者采访王亚志、李越然、纪亭榭等人时都留下了这种印象。王亚志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国防科委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李越然在50年代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外国专家局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俄文翻译。纪亭榭时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兼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直到1956年下半年，刘少奇和周恩来还是坚持这种说法。龚士其主编：《杨献珍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03页；中共中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2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

④ 《人民日报》1951年4月25日。

月中财委赞同并转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专家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必须采纳。以为苏联专家不了解我国情况的观点应当改变，事实上他们是不轻易发言的，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提出的。"采纳苏联专家的意见"应当是坚决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更好的办法。动摇不定又想依靠又打折扣的态度是错误的"。报告还建议必须设立由部长直接领导的专门机构，管理和协助专家工作，并支持检查执行专家意见的情况，及时总结经验。①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学习苏联专家并非没有阻力。如鞍山钢铁厂聘请苏联专家两年来，企业面貌有了很大改进，但仍有 144 项合理建议未被采纳，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领导上未加重视，长期搁置；二是操作人员思想保守，习惯于旧方法，无法贯彻。②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的工程人员最初抵触苏联专家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这种情绪在有一些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干部、老工程师和老工人中间尤为明显。"③针对这种状况，1953 年 9 月 9 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文件，其中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巩固地确立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思想，克服保守观念和骄傲自满情绪；各部门必须在专家参加之下制定工作计划，并邀请他们参加各级领导会议、专业会议和技术会议；对专家所提出的建议，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加以采用；必须在苏联专家帮助之下有计划地加强在职干部的业务教育，请专家有系统地讲解各专业和各方面苏联的先进经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把使用专家作为自己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方面之一；各部门的专家工作应有负责人专管，并根据专家人数建立适当的专家工作机构；各部门每半年（每年 3 月和 9 月）应对苏联专家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及时上报中央。④笔者的确在地方档案中看到许多关于检查专家工作的报告或总结，包括国家计委和财政部都有详细的报告，⑤有的地区还以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进这一工作。⑥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甚至针对个别企业的具体问题向全党和全国发出指示，强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年，第 374–375 页。

② 1951 年 2 月鞍山钢铁公司关于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指示，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全宗 500，目录 2.1，案卷 3。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4 年第 281 号，第 130 页。

④ 1953 年 9 月 9 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9，卷宗 52，第 5–6 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 年，第 880–881、882–885 页。

⑥ 1953 年 7 月 15 日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9-1，卷宗 20，第 9–11 页。

调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 1953 年 5 月和 7 月，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两次报道了黄石市大冶钢厂因不尊重苏联专家意见而出现大量废品，以及苏联专家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的情况。[①] 中共中南局了解情况后，很快派出了工作组，帮助大冶钢厂在领导上、管理上、技术上坚决转变忽视专家意见的状况，指令该厂把实现苏联专家的建议作为今后，特别是最近几个月的中心工作，并提议把苏联专家的建议编成本厂的技术措施计划，动员全厂，保证实施。8 月 22 日，中共中央专门转发了中南局的指示。[②] 同年 8 月 7 日《内部参考》又刊登了天津钢厂不认真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消息。[③] 不久，天津市委也向华北局和中央报告，该厂在贯彻苏联专家建议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专家工作无人负责，专家的建议也不记录，特别是一些技术干部一贯轻视、怀疑甚至抗拒苏联专家的建议，并以敷衍、欺骗的恶劣作法对付苏联专家，以致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也使生产遭到严重损失。天津市委为此召开全市工程技术人员大会，展开批评讨论，以示教育。中共中央当天便批转了这一报告。[④]

50 年代初军队系统在向苏联专家学习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在海军中就有不少技术人员认为，英美的海军比苏联强，科技比苏联发达，应该在政治上学苏联，在技术上学英美。[⑤] 针对这种抵触情绪，1952 年 11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⑥] 彭德怀 12 月 24 日的讲话虽然粗糙一些，但意思完全相同。他严厉指责那些故步自封、知识浅薄而不愿向苏联专家学习的人说："应当大喝一声，告诉他们，革命的历史总是向前的；是任何人拖不住，挡不了的。或者很快赶上来跟大家一起前进，或者就请滚开！"[⑦]

在这样一种由上层推动的全面学习苏联的氛围中，聘请苏联专家的意义才充分体现出来。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3 年第 116 号，第 343–344 页；1953 年第 155 号，第 119–120 页。

② 1953 年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南局（加强与苏专家合作）指示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9-1，卷宗 1，第 109–111 页。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3 年第 183 号，第 76–77 页。

④ 1953 年 10 月 3 日中共中央批转天津市委关于天津钢厂贯彻苏联专家建议存在问题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9-1，卷宗 68 卷，第 105–108 页。

⑤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年，第 164–165 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第 607–608 页。

⑦ 采访王亚志记录。

二、苏联专家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苏联专家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国家管理制度，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建立方面。建国之初的几年，大量专家和顾问云集北京，[①]就足以说明其对中国党政机关工作的影响。

解放初期，各地厂矿企业劳动纪律松弛，制度不健全，劳动力管理混乱。[②]针对这种状况，苏联专家小组认为需要立即进行制度上的整顿和改进，并于1954年1月建议中共中央责成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及其他部门合作解决这一问题。[③]半年后，政务院颁布了根据全国总工会建议制定的《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并责成各企业主管部门根据《纲要》制定本部门的劳动规则。[④]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聘请的苏联专家契普洛夫不仅深入各省市解决实际问题，帮助沈阳、旅大、吉林等地编制预算，加强对企业财务的管理，而且对于领导机关的财政管理制度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以致财政部请求政务院务必让他继续留在东北工作一年，并保证在这一年中组织干部加紧学习，力求提高，以达能胜任工作。[⑤]

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苏联专家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有益的和巨大的帮助。中国在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既无人才，又无经验，也不能完全依靠苏联的计划部门，因为他们远离中国，不了解实际情况。于是，在华苏联专家就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在苏联方面关于修改“一五计划”草案的59条意见当中，有52条就是在华顾问提出的。[⑥]再有，近百名苏联专家历时半年，协助中国专家完成了《1956–195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起草工作，为

---

① 详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4–37页。

② 天津、武汉、郑州等地对有关情况的报告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321–332页。

③ TsKhSD，f.5，op.28，roll.5104，no.138（January-October 1954），Deborah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22-123.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316–321页。

⑤ 1953年1月7日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关于请求让苏联专家继续留住一年的报告，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429，第1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第411–412页。

奠定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①]

即使在中共建立多年的军队组织，为了加强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也需要通过苏联专家从建制上加以改造。海军、空军是这样，[②]干部管理也是如此。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1952年12月27日报告，“我们认为，我军干部机关是新建的组织，缺乏整个经验，向顾问学习苏军干部工作经验是基本的，否则不能前进，但在实行的步骤上及某些组织形式要照顾我军的实际情况。”[③]

特别是在企业管理方面，苏联专家发挥的作用最为显著。旧中国的工业管理大体上还处于手工业水平，如在电力系统，设备的检修和运行主要是靠老师傅的经验和言传身带，没有一套统一的、科学的操作方法。1949年9月，石景山发电厂6号机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全北平大面积停电，于是聘请苏联专家到厂帮助处理。在修复设备的过程中，苏联专家不仅在计划检修、改革管理体制、改进设备和恢复铭牌出力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更重要的是为电厂编制了一套运行规程，要求工人按规程操作。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为此，中央燃料工业部将此规程作为典型规程印发到全国各电厂。[④]1950年，苏联专家又帮助东北电力企业建立起经济核算制及各种安全发供电规程和机构。[⑤]应该说，是苏联专家为中国电力系统科学管理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大连造船厂是苏联1945年接管的老厂，较早地实行了一套苏联的企业管理制度。1947年陈云主管东北经济工作时，就对那里实行苏联的八级工资制拍手叫好。50年代中苏合营后，大连造船厂便成为全国企业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一面旗帜。当时在专家的主持下按照苏联模式搞了一套规章制度，号称“企业管理天书”，1954年在全国推行，带动了全国造船业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发展。[⑥]冶金工业的管理工作也是苏联专家推动的。早在1951年1月，苏联专家就对鞍山钢铁公司的管理机构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整编意见。[⑦]同时，苏联专家还帮助东北的许多企业建立了各级计划机构，推行使用计划表格，确定生产责任制，实施“流水作业法”，大大

①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3页。

② 详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673–674页。

④ 薛启宇主编：《中共北京石景山发电总厂历史大事（1948–1995）》，中共北京石景山发电总厂党史征编办公室1999年印制（未刊），第202页。

⑤ 《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5日。

⑥ 采访徐金成记录。徐金成现任大连造船厂厂史编辑委员会主任。

⑦ 1951年1月13日鞍山钢铁公司关于苏联专家对鞍钢管理机构整编意见给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的报告，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全宗500，目录2.1，案卷9。

加强了生产的科学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①]

中国很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都倾注了苏联专家的心血和汗水。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是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该厂全套引进苏联设备和零件，并由苏联专家帮助筹建。在1953年7月15日破土动工前，苏联就派出了总顾问希格乔夫和第一批技术培训和土建专家进行现场指导，以后又陆续派来近200名各种专家，从产品工艺、技术检查到设备安装、生产调度，都有苏联专家把关，还配备了技术科长、车间主任直到各车间高级调整技工的全班人马。他们手把手地教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安装、调试及组织生产，直到1956年7月13日从总装线开出第一辆中国制造的汽车。[②]对于中国航空工业如何从修理飞机过渡到制造飞机，苏联专家组组长瓦西列夫提出了根本性的建议，并设想了非常具体的途径和方法。40余年后，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之一段子俊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慨由衷地说："瓦西列夫对中国航空工业起步是功不可没的。"[③]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舰艇制造业。在新中国海军初创阶段，只能依靠修复旧船和改装商船建造一些巡逻艇，朝鲜战争期间则完全是依赖购买苏联的舰船。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转让技术和提供设备，帮助中国建造驱逐舰、扫雷艇、鱼雷快艇等。经过长期的谈判，中苏于1953年6月4日签署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1954年11月，随着技术组织措施逐步落实和图纸资料及器材设备陆续到位，苏联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技术援助委员会来华。该委员会在华期间先后共有288位专家（协定规定不超过150人），委员会及其下属各专家组按工作性质和分级原则与相应的中方机构对口配合，从船舶工业管理局直到各厂科室。在编制造船工业长远规划，选购配套机电设备，解答工艺技术难题，翻译校对图纸资料，选择各型舰艇试航基地，以及培训中方技术人员等各个方面，苏联专家给予了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这一协定的执行，奠定了中国舰艇制造工业的基础。[④]

苏联专家在生产技术领域为中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

---

① 《人民日报》1951年2月15日。

② 第一汽车制造厂企业研究中心编：《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第一汽车制造厂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83年印制（未刊），第38页。

③ 王凡：《周恩来、李富春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创立——原航空工业部党组副书记段子俊访谈》，《党史博览》2001年第4期，第14–15页。

④ 余伯良主编：《〈六四协定〉史料集（1953–1963）》，中国舰艇工业历史资料丛书，1991年（未刊），第4–8页。

加产量所做出的贡献更是举不胜举。如石景山发电厂的重大事故从1949年的113次减少到1951年的2次；本溪煤铁公司炼铁厂低磷铁的合格率在3个月内从16%提高到88.5%，抚顺矿务局炼钢分厂钢锭合格率也提高到95.3%，超过以往标准15个百分点；1952年除新疆外全国原油产量即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66%，以及玉门优质油田和乌苏油田旺井的发现，老君庙旧油井的复活；阜新发电厂安装一部锅炉节省人工25000个，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旧币）；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大部分矿井使用期延长了20–40年，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石景山钢铁厂250吨炼铁炉可炼铁376吨，太原钢铁厂50吨炼铁炉创造了106吨的纪录；山西浑河水库工程设计蓄水量增加2.25倍，投资节约2000亿元（旧币），如此等等。[①]

从长远的眼光看，苏联专家的作用还在于培养出大批中国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他们通过讲授技术课、现场指导工作、翻译讲解文献资料等各种方式，耐心而无私地向中国干部、工人传授知识和经验。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例，在1953年至1956年的三年建厂期间，186名苏联专家为2万职工讲授技术课1500余次，直接传教和培养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470名，其中处长56人，工程师139人，科长、车间主任60人，技术员173人，技工90人。[②]大连造船厂自1952年移交中方以后，苏联专家更加毫无保留地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向中国职工传授知识和经验。苏方总经理和总工程师亲自审查各科室专家的教学计划和材料，技术专家则是亲自示范，边做边教，耐心讲解。到1954年底已经培养出工段以上技术和管理干部近千人，其中65%的科长和车间主任是从普通工人中提拔起来的。[③]建国初期东北地区大量向内地输送人才，被称为全国的干部基地，这与苏联专家的帮助也不无关系。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达3万多人，其中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④]正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直接帮助，中国的设计队伍也逐步壮大起来。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的设计单位从78个增加到198个，每个单位有设计人员200–1000名，

① 《人民日报》1951年11月4日、1950年10月6日、1953年4月10日、1952年12月15日、1951年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第753–776页。

② 1960年9月3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关于建厂以来专家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6，卷宗23，第40–43页。

③ 《人民日报》1955年1月2日。

④ 《人民日报》1952年1月20日。

设计和勘查的工作量分别增长了 4.1% 和 5.1%，中国自行设计或部分自行设计的大中型工业项目已达 413 个。[1]

教育也是苏联专家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北京大学 13 个系 35 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大多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以苏联相同专业的教学计划为蓝本，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考虑到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教师、学生的水平，经过反复修订而制成的。[2]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在两年中建立的 40 多个现代化实验室，都是苏联专家从设计到安装一手帮助搞起来的。[3] 吉林大学聘请的 5 位苏联专家，培养了 9 名研究生和 18 名进修教师，帮助建立了 6 个新的实验室，还提出 112 条改进教学工作的建议，校方感到受益匪浅。[4] 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早在 1949 年 12 月就聘请了 4 位苏联专家来讲授苏联党史，以后开设的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新闻等课程，全都有苏联顾问任教，他们除了授课、编写讲义，还辅导中国年轻教师从事教学和研究，并在党校刊物《向专家学习》上发表文章，介绍自己的教学经验。[5]

三、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

在向苏联专家学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是苏联专家提倡的某些在苏联一贯采用的制度和方法不符合中国国情。

应该说，从苏联的主导思想来说，并非要中国照搬苏联的一切。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在 1952 年 10 月与刘少奇、李富春谈话时就提出，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能包办一切。[6] 作为前后在华工作 8 年的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他反复向专家强调，你们最熟悉的事情在中国未必适用，最了解中国情况的是他们自己，必须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离开他们，苏联专家是无法开展工作的。阿尔希波夫本人与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①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с.28.

② 《苏联专家谈话报告集》，北京大学编印，1955 年（未刊），第 1–3 页。

③ 《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15 日。

④ 1960 年 8 月 22 日吉林大学关于苏联专家建议执行情况的汇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6，卷宗 122，第 37–41 页。

⑤ 龚士其主编：《杨献珍传》，第 204–205 页。

⑥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 39–40 页。

和私人感情。[①]

然而在具体工作中，苏联专家指手画脚和生搬硬套的情况却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军队系统。如苏联专家在军事院校讲课时，历史课不讲中共党史，只讲苏共历史，讲战例时只准讲苏联的十大打击，不准讲朝鲜战争，引起中方干部的不满。苏联专家在军队指挥管理上推广的“一长制”也因与中国传统的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矛盾，未能全面实行。[②]

在公安系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位曾在公安部负责专家工作的干部告诉笔者，苏联顾问在那里的作用不大。苏联专家在公安系统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技术设备方面，如电台测向和邮件检查系统，就是苏联专家帮助建立的。但在政策和方针上，我们有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的传统，苏联专家则推行“一长制”，在实际破案和审案工作中，主张使用包括美人计在内的一切手段，引诱和调动敌人，这些我们都没有采纳。[③]

一位接受笔者采访的军方干部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事例。1952 年 2 月 27 日第十五次军委办公例会讨论海防第一线重点地域设防工程时，中南军区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提出，要把珠江口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苏联总顾问柯托夫强调，苏联的经验是，为了保密和军事需要，在国防要地内的居民应全部搬迁，并举出苏联卫国战争中有些少数民族倾向德国，被全部远距离迁移的例子。由于受苏联专家的影响，中国在山东、广东沿海等地禁区划得过宽，禁止捕鱼区过大，引起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强烈反映，以后才逐渐得到纠正。关于军事训练场地，苏联地广人稀，中国人多地少，两方情况差距很大。但 1951 年 9 月军训部发下的参考材料，根据苏联顾问的经验介绍，要求每个师应有训练基地 12 万亩。有些部队参照执行，如贵州某部一个团竟占用了 1.12 万亩训练场地，附近农民怨声载道。再如山东海岸防务，按苏联顾问的设计，每个炮连火炮一字平列，置于最前沿，对空无遮蔽，炮位相距 40 米，弹药所设在 4 门炮位中央。这适用于苏联享有制空权的条件，而当时中国防空力量十分薄弱，一旦敌空军炸弹命中弹药所，全连火炮将被同时毁灭。这种状

① 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87–488 页；采访李越然记录。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第 164–165 页；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326–327 页；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45 页。

③ 采访赵明记录。赵明时任公安部编译处副处长，负责专家工作。

况直到1954年中彭德怀视察后才得以纠正。[①]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倒不是苏联专家本身提出的意见或建议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在于全国上上下下出现的一种事事听从专家，全搬苏联一套的依赖思想。早在1952年11月聂荣臻就指出，300多位苏联专家对我军特种兵的建设帮助很大，但部队中也出现了完全依赖苏联顾问，不考虑我们具体条件的偏向。[②]1956年1月2日刘少奇指示粮食部领导人，合作化以后的粮食征购制度如何改变，不要单纯学苏联的经验。[③]这种现象在工矿企业尤为严重。大连造船厂铸造分厂的职工在生产过程中自己不动脑筋，专家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出了问题就找专家，说是"孩子哭了抱给娘"。[④]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的工程人员盲目执行专家的建议，对建议不作具体分析，不领会其精神实质。[⑤]类似的情况在鞍钢基建部门和黑色冶金设计公司，以及沈阳电线厂等企业都普遍存在。[⑥]

针对这种情况，在1955底检查专家工作时，国务院已经开始提醒各部门，在发挥专家作用方面要注意结合实际情况，对专家的建议应"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加以执行"。[⑦]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口各部汇报时指出：学习苏联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周恩来的讲话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⑧]不过，在学习苏联专家问题上指导方针上的变化，还是出现在苏共二十大，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责和批判，虽然最初令人感到意外，但无论是东欧各党还是中共领导人，已经从中领悟到苏联承认其犯有错误的深远意义是各国可以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了。至少在毛泽东看来，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应该放弃了。苏共二十大结束两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一讲话开宗明义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苏联方面暴露的缺点、错误和走过的弯路，中国党现在"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所谈十个问题，无一不

---

① 采访王亚志记录。

②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554–55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52页。

④ 1954年10月中苏造船公司向苏联学习的初步总结，大连市档案馆，全宗7，目录2，卷宗60，第2–16页。

⑤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4年第281号，第130–131页。

⑥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4年第153号，第164–165页；1955年第21号，第387页；1954年第299号，第487–488页。

⑦ 1955年11月14日国务院关于1955年年终专家工作检查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67，第31页。

⑧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8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48页。

是针对苏联而言的，特别是在讲最后一个问题时，反复强调不能对苏联照抄照搬，不能盲目学习。[①] 这种说法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问题是在大张旗鼓学习苏联以及大量苏联专家在中国的 1956 年，[②] 讲话的重点在于突出“以苏为鉴”，就自然带有指导方针的性质了。于是，中国领导人纷纷出来就此发表谈话。5 月 3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在肯定“首先还是要向苏联学习”的前提下，也强调“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③]6 月 28 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又在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上批评“一切依赖专家的思想”，指出“专家的建议有 70% 是可行的，有的建议是不可行的”，“外国的专家只能帮助我们，靠外国专家的思想是危险的”。[④] 刘少奇则批评了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强调“学习苏联经验要有分析，必须独立思考”。[⑤]

这种精神贯彻到基层以后，引起了广大干部对苏联理论和经验的质疑。一名在高教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总结与其中国同事们谈话的内容，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国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问题，还能不能推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马列主义的基础课本，通过议会斗争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与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有矛盾，斯大林提出的战争不可避免论是否已经过时，苏联怎么评价《人民日报》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算不算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除了南斯拉夫问题，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犯有哪些错误？如此等等。[⑥]

在波匈事件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帮了赫鲁晓夫的忙，中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威望明显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谈到学习苏联和苏联专家问题，口气自然又强硬了许多。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反复谈到这个话题。他批评“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入人心”，“各部都有，搬

---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3–48 页。

② 据笔者考察，在华苏联专家人数最多的是 1956 年，详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158 页。

④ 1956 年 6 月 28 日习仲勋在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上的指示，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138，第 2–5 页。

⑤ 龚士其主编：《杨献珍传》，第 203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 377 页。

⑥ 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49，д.408，л.216-222. *Кейпл Д. (D.Kaple)*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 (1949-1960) //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5, с.340.

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部长们都五十岁左右了，非三岁小孩要扶。”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情况变了，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装备再有五年就可自己制造了”，“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①]6月23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②]

对此，苏联方面表示理解。1957年2月15日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华代表处党委书记列瓦金与外专局副局长吴凡吾谈话时，坦率地承认有些专家在不熟悉情况的条件下硬搬苏联的经验，诚恳地希望对苏联专家的工作提出意见，并要求经常向专家介绍情况。[③]

在这样的气氛中，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地位自然会受到影响。1957年2月外国专家局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关于苏联专家的报告，其中谈到苏联专家的工作作风有了显著改进，“他们更加谦虚了，处处表示十分尊重中国同志的意见”，提建议也“比以前更加慎重了”，而且总要一再声明，“请按照中国具体情况研究采纳”。但同时在某些部门则出现了“一种对苏联专家冷淡、疏远，不虚心向专家学习，甚至傲慢无理的现象”。其表现是：不积极主动地安排专家的工作，致使专家感到无事可做；不及时向专家介绍业务情况，提供相关资料；对专家不尊重，自己不愿与专家合作进行工作，也不让研究生接近专家。[④]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了这份报告，并要求“勤勤恳恳地、老老实实地”向苏联专家学习，“以亲切、热情的态度去对待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⑤]

不过，总体来讲，直到1958年下半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之前，苏联专家在中国基层单位，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作用并未减退。为了证明这一点，笔者对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一些具体材料

---

①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66–167页。1958年3月10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摘要），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68，第11–16页。

② 1958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各小组组长座谈会上的指示，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宗223，第15–17页。

③ 1957年3月7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给习仲勋的报告，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第40–42页。

④ 1957年2月10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对苏联专家关系中一些问题的报告，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第6–10页。

⑤ 1957年2月25日国务院批转外专局关于对苏联专家关系中一些问题报告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第4–5页。

做了下表，以备参考。

部分企业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

单位	时间	提出建议	执行建议	执行比例	未执行的主要原因
阜新矿务局	1949–1954年3月	516	340	66.89%	条件不足和设备未到
石景山钢铁厂	1950–1955年	561	442	78.78%	不详
第一汽车制造厂	1953年6–9月	69	54	78.26%	条件不具备
第一汽车制造厂	1953–1960年	20000	19950	99.75%	事关重大，以后再议
鞍山钢铁公司	1957年	176	158	89.77%	条件不宜或正在商议
鞍山钢铁公司	1958年	262	绝大部分		不详

材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1704，第2–13页；《内部参考》1955年第43号，第315页；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1704，第22–24页；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6，卷宗23，第40–43页；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全宗500，目录2.1，案卷20、21。

当然，这些具体数字未必能反映全面情况，但从这些大企业的材料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基本是良好和正常的，这至少从一个角度说明苏联专家在工业企业中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充分的。至于50年代中期执行建议的情况要好于50年代初，恐怕主要在于上层领导开始提出“以苏为鉴”的方针时，社会基层的多数群众还停留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情中。当新的方针已经贯彻下来，广大群众也投入到“大跃进”浪潮中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四、“大跃进”和中苏分歧的影响

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再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整个1958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在筹备和动员“大跃进”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思想准备，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了反对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个方向上。如果说反保守主义的矛头是针对党内务实派和反冒进的领导人，那么提出反教条主义则主要是针对苏联发展经济的一套做法和经验。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根本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依靠官僚技术阶层（专家学者自然列在其中）和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管理经济，其要

害是限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朝鲜战争期间在国内开展的几次大规模运动及其结局使毛泽东领悟到，发动群众运动这种方式，不仅在夺取政权和战争时期是整合社会、积聚力量的有效手段，就是在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时期，也会成为实现各种宏伟理想的法宝。他在党内各种会议上大批苏联的教条和规章制度，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大跃进”这一群众运动扫清思想障碍。因此，当“大跃进”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行动，中苏之间的政治矛盾也日渐明朗的时候，大量在华苏联专家的地位自然显得十分尴尬。

笔者在地方档案发现了一系列的报告或材料，普遍反映了 1958–1959 年在基层工作中不尊重专家，斥责专家思想保守，以及忽视专家作用的现象，从中可以看到苏联专家在“大跃进”及反右倾运动中的处境。在吉林省，有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解决技术问题时，“认为专家思想保守、陈规旧律没有破除，对专家的建议或设计，不进行认真的研究，不征求专家意见，过分的强调中国条件与苏联不同，就任意否定或修改”。有的工厂把听取专家建议的工作制度也作为“妨碍跃进的规章制度而废除了”，有的学校还任意削减苏联专家所担任的课程，认为这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①] 苏联专家一致认为长春汽车制造厂正在试制的红旗轿车外形不好看，设计不合理，建议修改设计。但该厂为了实现国庆十周年出车的目标，拒绝考虑专家的建议。[②] 一机部第一设计院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认为：现在不需要苏联专家帮助也能独立进行设计，向专家请教益处不大，反而招来许多麻烦，甚至会阻碍我们跃进。以致某些专家担心会出现在波兰、匈牙利那样的情况，并表示“如不需要我们，可以回国”。武汉重型机械厂设计了新的大型简易车床，事先未与专家商量也没进行试验就成批投入生产 50 台。苏联专家得知后再三建议发货前需检验，结果发现这批车床有严重问题。鞍山钢铁厂因忽视苏联专家一再提出的遵守工艺规程的主张，一级钢轨的产量由过去的 93% 降低到 42–50%。平炉顶的寿命也比过去大为缩短。[③] 哈尔滨电机厂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该厂当时正在设计的一种直流电机，使用的是苏联提供的达到世界最新水平的整套图纸，按这种图纸生产的直流电机投入生产后，年产钢材可达 300–400 万吨，相当于 1957 年中国钢材产量

---

① 1959 年 3 月吉林省外办关于对外国专家工作检查情况和问题的报告，长春市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2，卷宗 80，第 66–72 页。

② 1960 年 9 月 3 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关于建厂以来专家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6，卷宗 23，第 40–43 页。

③ 关于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的骄傲、急躁和轻敌情绪的一些材料（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1959 年 2 月 3 日整理），长春市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2，卷宗 48，第 8–15 页。

的 70–80%。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产品，工厂设计人员为了节省几吨制作钢材，未同苏联专家商量，就对原图纸的主要部件作了重大修改。苏联专家发现后甚为吃惊，认为这套图纸是总结了苏联电机厂十几年经验设计出来的，而中国在缺乏运转试验的情况下就作如此重大的修改，是不适当的。由于中方坚持，苏联专家又建议至少对头两台机组不要修改，可待试验后再作修改。为此，苏联专家扎依采夫难过地流了眼泪，说自己到中国来没有发挥作用，也不知道怎样发挥作用。[①]

与此同时，莫斯科也不断接到有关情况的报告。如苏联政府得知，1958 年下半年，中共工业企业撤销了所有按苏联技术方案和技术规程设立的技术部门，取消了必要的技术规格和标准。苏联专家表面上仍留在岗位上，享受薪金，承担合同规定的生产责任，但实际上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能。在水利和电力系统工作的专家别斯托夫斯基 1959 年 2 月报告说："中国同志决定简化电力装置，这将降低它们的可靠性"，并警告说，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将导致事故的发生"。1959 年 4 月在武汉冶金公司工作的 12 位苏联工程师也抱怨说，他们已经有 3 个多月被禁止工作了。在企业里，苏联的所有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章都被取消了。[②]

到 1958 年底，"大跃进"的错误逐渐被中共领导人所认识，中央开始纠"左"。国务院也感到专家工作中问题的严重性，并极力加以纠正。1959 年 2 月 4 日，李富春指示："凡是科学技术问题，一定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如果双方意见不同，可以提出来研究，如果经过研究意见还不一致，那就应当按苏联专家的意见去办，决不能采取不尊重、不重视苏联专家建议的态度。"3 月 7 日陈毅又指示："一定要抓专家工作，一年应当抓四次。"接着，在 3 月 12 日至 23 日召开了外国专家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苏联专家是以国际主义的精神，全心全意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他们在科学技术上也的确比较高明，所提建议绝大部分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而且是正确的，决不能盲目拒绝专家的建议。[③]

然而，庐山会议转向继续反右，随后又发生中苏领导人的严重争吵，终于未能从根本上改进专家工作。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警告仍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如苏联专

---

① 1958 年 7 月 7 日哈尔滨市中苏友协关于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检查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 134，目录 2，卷宗 32，第 19–21 页。

②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Москва，1977，c.246.

③ 1959 年 4 月 11 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外国专家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5，卷宗 21，第 96–106 页。

家小组负责人祖博夫1959年8月16日向石油工业部长通报说，玉门矿井正在对石油资源进行滥采，电焊条的生产也违背了技术规程，其结果“出现了大量废品”。哈尔滨火电厂专家组长克利莫夫在7–10月间向中国有关方面递交了10多封抗议信和申诉信，告之工厂违反锅炉的操作规章。但一直无人过问，最后引起工厂大爆炸，造成大火和人员伤亡。①

尽管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现象，但并不能说这是中国政府有意冷淡苏联专家和限制发挥其作用。②针对苏联专家的不满情绪，中国政府尽力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以稳定苏联专家的情绪，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1960年4月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连续发出了两个通知，一是为了“鼓舞专家们的工作热情”，要求“凡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专家帮助建设的工程项目，有举行竣工典礼时，应当注意邀请帮助过该项工程的专家参加，并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一是为了表彰苏联专家的贡献，要求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发给苏联专家感谢信、感谢状和纪念章的办法”，并强调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十分严肃的工作”。③然而为时已晚，赫鲁晓夫还是借口苏联专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宣布撤走所有在华专家。

必须看到，1960年初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的局面，主要还是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尽管在基层也的确存在一些对苏联专家不尊重、不友好的表现，使其作用和影响在客观上受到制约，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苏联专家的感情是深厚的，态度是诚恳的，评价也是公正的。接受笔者采访的所有当事人，几乎都谈到了这一点。很多老干部和老工人回想中苏合作时的情景，都认为“那时中苏团结一心，生产蒸蒸日上，真是一个辉煌的时期”，他们特别怀念那段日子。④所以，赫鲁晓夫撤退专家的粗暴行动，本意是借撤退专家打击中国，警告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伤害的是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对苏联本身也并无利益。首先

---

①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с.246.

② 苏斯洛夫1964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苏联政府多次要求中国政府为苏联专家的工作创造正常的条件，但中国政府的答复只是更加不友好和更加侮辱地对待专家，把他们看作是“保守分子”，并千方百计地诋毁苏联的经验和技术。*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с.248-249.

③ 1960年4月10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注意邀请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专家参加竣工典礼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413，第61页；1960年4月13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加强对发给外国专家感谢信等管理工作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12，卷宗235，第14–15页。

④ 笔者在核工业部202厂、大连造船厂、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及一些军事单位采访时，听到有关这方面的看法最为突出。

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苏联驻华使馆。契尔沃年科大使得到消息时非常“震惊”，并向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认为撤退专家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苏联国内也有许多官员认为这是一种感情冲动的外交政策。[①]就是在华工作的许多苏联专家，也对此颇有微词，认为突然撤退专家是背信弃义的行为，甚至有人在酒后对赫鲁晓夫破口大骂。[②]正如有些苏联学者批评的，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其理由也是站不住脚和含糊其辞的，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使得中苏关系走到无法恢复的地步。[③]

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向他国大量派遣专家是仅仅发生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种特殊现象，而像苏联专家在中国这样，规模如此之大，时间如此之长，又是绝无仅有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苏两国在专家问题上从最初的良好愿望出发，最终却走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笔者在研究中苏关系的过程中发现，在冷战时期，特别是60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阵营内部的相互关系时存在一个通病，就是把党的关系等同于国家关系，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④]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⑤]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此时，一旦两党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分歧，隐含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摩擦就会逐渐显露，如果双方力量失衡，

①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Versus Mao: 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1996.1. 在笔者参加的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的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北京）上，原在苏共中央有关中国事务部门工作的杰柳辛和库利克教授也都讲到过这种情况。

② 采访安纯祥、纪亭榭记录。

③ 罗伊·麦德维杰夫、诺莱斯·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邹子婴、宋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3页。

④ 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

⑤ 从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理论阐述。

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苏联在华专家的问题正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中国的问题出在一开始就从心理上把苏联提供专家和其他援助作为在国际主义原则下理所应当的政府行为，那么赫鲁晓夫的问题就在于把派遣专家作为迫使中国在理论和政策分歧上就范的外交筹码，其最终结果，导致在华苏联专家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牺牲品。

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生活及工作条件

在中苏争吵的年代，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问题是一个经常的话题。苏联人抱怨其专家在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仅在华苏联专家和总顾问多次反映，就连苏联政府也出面请求中国各级政府机构保证为苏联专家提供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破坏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的协定绝不是地方行政部门的专横妄为，而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有意识贯彻实施的方针的结果，这一方针反映了中国的总的政治路线。[①]中国人则认为苏联专家在工作中有大国主义表现，看不起中国，苏联专家工资过高，是中苏关系不平等的表现。[②]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中苏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的协定是否平等，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是否缺少正常的条件，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是否构成破坏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是否因负担专家开支而感受到巨大的经济压力呢？笔者拟依据来自中俄双方大量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回答这些问题。

一、关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条件的谈判

1949 年夏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曾表示派往中国的专家，其待遇只须与中国

---

①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Москва, 1977, с.269.

② 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李越然在 50 年代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外国专家局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俄文翻译；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46–447 页。

的优秀专家相同即可，其余部分则由苏联政府补贴。[①] 根据这一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订最高标准为 2500 斤小米”，另外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商店，对专家给予照顾。[②] 刘少奇还在公众大会上特别提到，苏联专家只领取和中国同等工程师一样的薪资，而不是如英、美工程师一样，领取很高的薪资，这是苏联人民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③]

但在 1950 年初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特别是中方提出要签订中长铁路等新协定后，情况有了变化。[④] 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国还应支付一笔费用，作为对专家以前工作单位的补偿，为此，中国政府应按每人每月 2000–4000 卢布交付给苏联政府。中方对此感到难以接受。周恩来强调说，这笔费用相当于每月 10000 至 18000 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每月只有 3400 斤小米，部长只有 2800 斤小米。此外，中国希望以提供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而不要支付美元。[⑤] 然而，周恩来在莫斯科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谈判中，苏方同意将补偿金降到 1500–3000 卢布，但坚持应以外汇（卢布）结算。在 3 月 8 日双方关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条件协定的会谈中，为了减少外汇的支出，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又提出，根据一些在华专家的要求，是否可以将补偿金的一部分直接支付给在中国的多子女专家本人。苏联外贸部长葛罗米柯对此予以否定，同时，苏方还要求把在华苏联军士的报酬提高到低级专家水平，即每月应为他们支付 1500 卢布的补偿费用，甚至对普通士兵也要支付补偿金。王稼祥指出，在苏联顾问中，军士占相当大的部分，而他们在苏联每月收入只有 500–600 卢布，因此不应该把对专家的条件扩展到军士身上。况且，从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来看，这样的标准也太高了。葛罗米柯则认为，苏方的立场“是以许多恰当理由为基础提出的”。尽管王稼祥后来暗示在协定中暂时不要提出军士和士兵的支付问题，但苏方坚持己见。[⑥]

实际上，在此之前周恩来已经决定基本接受苏方的协定草案。3 月 6 日周恩来

---

① 1949 年 6 月 27 日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29，л.1–7。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64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69–74 页。

④ 关于中苏外交谈判的情况可参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⑤ 1950 年 2 月 12 日 A. Ia.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2 月 12 日 N. V.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7，оп.23а，п.18，д.234，л.64-69，70-74。

⑥ 1950 年 3 月 8 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АВПРФ，ф.0100，оп.43，д.8，л.36-40。

通知，关于中苏专家协定草案，除少数属文字的修改意见外，全部同意。3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李富春、王稼祥、伍修权电：关于专家协定的条款“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减专家”。[①] 此后，苏联领导人对中方提出的要求也有所考虑。3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修改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有关决议，除了增加该协定“应适用于以前到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的条款外，将给苏联政府的军士补偿金降为每人每月1000卢布，并接受中方对协定第3款的修改意见，即中国政府“将以中国货币支付苏联专家固定工资，其数额与中国同等级别和专业的专家现行工资及以后相应的变动保持一致。在其他方面，保证苏联专家享有与中国专家同样的待遇，包括对专家食品和日用品的补贴”。[②]

3月27日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协定签字，10月25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对技术专家报酬条件的协定。根据这两个协定，中国应向苏联专家支付相当于中国专家工资水平的工资，另外再支付出差补偿费用，按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计。[③]1950年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将1950年有关专家薪金的决议延长一年。[④]1957年12月28日双方政府又签订了关于互派专家的新协定，其中对于双方派遣专家规定了对等的条件。[⑤] 考虑到中国为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服务的人员大大少于苏联来华的专家，[⑥] 可以说这一协定主要还是为苏联专家制定的。不过，这至少在形式上反映了双方平等的原则。

在原则上确定苏联专家领取与中国专家同等的工资，这当然是合理的，也是中方乐于接受的。至于补偿金，首先，出国工作人员领取双份工资恐怕是通行的惯例；其次，本单位人员出国为他国工作，自然也需要得到经济补偿；最后的问题主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7、29页。

② 1950年3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73号记录摘录，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6。

③ *Филатов Л.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1995, №65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8-9.

④ 1950年12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79号记录摘录，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6，л.176，208。

⑤ 1958年1月22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中苏政府签订的互派专家条件协定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10，卷宗275，第108–112页。

⑥ 据苏联的统计资料，根据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决议，1958–1960年到苏联参与共同研究和提供援助的中国专家只有3人。*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с.94，107.

要在于苏联的工资水平高于中国，再加上对派遣专家单位的经济补偿，使得中方对付出高额外汇补偿金感到为难，但从道理上讲，这种代价的付出并无不合理之处。引起中方不快的原因，关键在于中苏双方观念上的差异。在斯大林看来，中国是苏联的一位盟友，但毕竟是另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他并不了解的民族。而中国领导人则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标准看待苏联老大哥，认为革命先成功的国家帮助后来者是理所当然的，没有想到苏联领导人会在具体谈判中斤斤计较。

二、苏联专家的待遇和中国的实际支出

中国为聘请苏联专家所需支出分为三部分：专家本人在华工资，专家在华工作和生活的补贴费用，以及为弥补专家原单位损失而付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政府规定的苏联专家在华工资在一开始就普遍高于中方同等人员的工资。据 1952 年 2 月 18 日陈云等关于苏联专家工薪标准问题给周恩来的报告所说，虽然合同规定苏联专家的工薪待遇比照中国同等职务和能力的专家现行标准执行，但实际上支付的工薪是高于国内标准的。该报告完全参照现有苏联专家工资标准制定了即将来华进行设计工作的专家的工资标准，按照当时计算工资的工作分值，来华专家工资分为七级：一级设计总工师 2900 分，二级设计组负责人 2800 分，三级设计组工程师 2600 分，四级主任工程师 2300 分，五级工程师 2000 分，六级主任工程师 1600 分，七级技术员 1500 分。① 作为对比，这里举出 1954 年 6 月 25 日政务院颁发的中国各级行政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工资标准（包括补贴在内）：国家主席、副主席 4280 分，政务院总理、副总理 3580 分，部长最高 2260 分，司局长最高 1470 分；一级工程师最高 1360 分，一般技术员最高 560 分。② 从分值看，苏联专家的平均工资水平大抵与中国的部长相同，而远远高于一级工程师。如公安部总顾问伊万诺夫的工资就比罗瑞卿部长的工资高。③

此外，笔者还在大连市档案馆发现一份 1951 年 7 月 26 日大连市苏联专家服务局副局长林志新和苏联专家小组负责人乌宪科商定的当地苏联专家的工资表，大体情况是主任医师 160 万元（旧币，下同），医师 140–150 万元；高级教师 150–160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 年，第 778–780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年，第 382–384 页。

③ 笔者采访赵明记录。赵明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编译处副处长，负责管理专家工作。

万元，教师100–140万元；工程师150万元，会计、技术员和实验员110–120万元，还有少数专家的工资定为200–230万元。[①] 没有找到同期中国相应人员的工资数据，但1956年全国实行工资制改革后确定的标准（旧币1万元等于新币1元）：卫生部门分11类21级，最高类别最高级377元，最高类别最低级32.5元，最高类别平均约139.2元；高等院校教师分11类12级，最高类别最高级390元，最高类别最低级70元，最高类别平均约182.6元。如果考虑到工资改革后全国工资水平平均增长了39%，而苏联专家的工资分值1954年1月从原来的每分人民币1200元（旧币）提高到1400元，那么以上两项数据相比，当时中国同等人员的工资显然大大低于苏联专家的工资水平。[②] 另一个可以作为参考数据的材料是，1955年底国务院规定，编制在华苏联专家工资预算的标准按每位专家（限顾问和教师）每月平均350元计算，[③] 可以看出，苏联专家的平均工资与中国同类人员最高工资相差无几。至于军队系统聘请的苏联顾问，其工资待遇大约要比非军事专家高15%。[④]

其实上述比较还省却了一个因素，即中国人员（高级干部除外）的工资一般包含了个人的所有开销，而苏联专家的工资中尚未包括其日常生活费用——这些开支都是由中方另行负担的。1955年12月国务院通知，因过去苏联专家经费预算标准偏高，故需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日常费用标准平均每位专家每天规定为：招待费（节日宴会费、礼品和纪念品费等）0.5元，文娱费（书报购置和文娱、体育所需费用）0.25元，住宿费（租金、家具、房屋修缮、煤火费、水电费、卫生杂品费和服务人员工资）13.5元，交通费（油料消耗、汽车维修、司机工资及管理费用）7.5元。此外还有由财政部统一支付的专家医疗费和警卫费用等等。[⑤] 如此算下来，这笔费用（超过652.5元）要大大高于工资本身，而且实际开销往往是难以计算的。仍以公安部为例，那里共有苏联专家30多人，每人配备一部专车，一个翻译。所有专家都住在原恭王府（公安部宿舍）院内，每人一栋单独住宅，有4–5个警卫日

① 1951年5月20日关于大连市苏联专家工资标准的协定，大连市档案馆，全宗2，目录2，卷宗309，第43–46、53、58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526、515、568页；1953年11月5日政务院关于调整苏联专家工资分值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429，第22–23页。平均值为笔者计算所得。

③ 1955年12月15日国务院关于修订苏联专家所需经费的预算标准及开支掌管办法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83，第12–15页。

④ 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王亚志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国防科委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

⑤ 1955年12月15日国务院关于修订苏联专家所需经费的预算标准及开支掌管办法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83，第12–15页。

夜看守。据说，那时为专家服务的编译处用钱非常方便，只要说明是为专家开销的，从来都畅通无阻。[①]

中方为专家支出的第三笔费用是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1950年协定规定补偿金为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1957年的新协定拉开了支付标准的档次，即咨询专家2400卢布，总工程师2200卢布，主任工程师2000卢布，工程师1700卢布，技师和工长1300卢布，熟练工人900卢布。[②]笔者没有找到此后苏联援华人员结构的统计资料，但仅从1958年1月18日中苏科技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看，1958–1959年苏联到中国讲学和提供咨询的学者、专家375人，而进行技术援助的学者、专家只有111人。[③]由此可以判断，新协定很可能进一步增加了中国政府在补偿金方面的负担。

上述情况表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收入是丰厚的。据接受采访的专家本人反映，尽管很多人最初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时有些不情愿，甚至是迫于政治压力，但几乎没有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此感到后悔。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政府对他们在华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补偿，有些人得到的报酬至少是其平常在苏联工资的5倍。[④]

当然，如果说苏联专家的工资偏高就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就不符合平等的原则，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也不尽合理。首先，从客观上讲，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大批专家来华最终受益的是中国。毛泽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1958年曾经对下面的干部说过："你们不愿意请顾问，我反正是要请的。"[⑤]其次，对于到苏联学习和培训的中方人员，苏联实行的是优惠政策。根据1951年12月6日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中方只需向苏联支付讲课费和指导者工资的10–20%。根据1952年9月1日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

---

① 采访赵明记录。赵明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编译处副处长，负责专家工作。

② 1958年1月22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中苏政府签订的互派专家条件协定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10，卷宗275，第108–112页；*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с.31。

③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с.93-94.

④ Deborah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Odd Arne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26. 显然，赫鲁晓夫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受折磨"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参见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07页。

⑤ 1958年6月1日陈毅在军委扩大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见采访王亚志记录。毛泽东的看法还可参见他1958年7月22日与尤金的谈话，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7页。

中方仅向苏联政府支付书本费、公用事业费和助学金的50%。[①] 这无疑将抵销一部分中方的开支。最后，按苏方的计算，苏联收取的费用大大低于各种科学技术援助的国际价格水平，中国支付援华苏联专家的补偿金只是国际标准的1/3–1/4，而支付培训中方人员的费用则只是国际标准的1/6，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无偿提供了大量科技文件和图纸。[②] 当然，作为个人行为，苏联专家也有超出协定范围滥用由中方支付费用的公共服务设施的现象。为此，联共（布）中央曾责令外交部授权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就地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一现象。[③]

不过，对于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来说，这项开支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据1951–1955年对苏非贸易外汇收支计算表，仅行政顾问和专家费一项开支：1951年5604万卢布，1952年4069万卢布，1953年3260万卢布，1954年3295万卢布，1955年4912万卢布，合计21140万卢布。[④] 与中国首次向苏联贷款总共才12亿卢布的数字相比，这笔费用的确是惊人的。因此，作为全国的大管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强调尽量少聘请苏联专家。1951年1月7日周恩来致电王震和赛福鼎并告各大行政区和中央财经委："凡我们自己能够找到的专门技术人员就不要再从苏联请人来。" 1月18日就苏联在大连的企业移交中国后苏方人员的留用和薪俸等问题，周恩来又致电高岗转欧阳钦、韩光："你们应将必须聘请的人数减至最低限度。"[⑤]1957年以后中国在聘请专家方面实行"少而精"的原则，[⑥] 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以外，与减轻巨大的经济负担也不无关系。

有一点需要指出，造成在聘请专家问题上经济负担过重，实际上并非完全是因为对苏联专家的高待遇，中国人本身在一些问题上也是有责任的。支付给苏联专家的工资超过了协定标准，是中国政府主动为之，表明了中国人的诚意和待客之道，但不可取的是一些中国地方官员讲排场和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如招待服务人员过多，随便为专家举行宴会和给专家送礼，宴

---

①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с.9.

②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с.73. 关于苏联提供技术资料的费用问题，详见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0年，第3章。

③ 1951年9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83号记录（摘录），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6。*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с.8-9.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第917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13–114、119–120页。

⑥ 详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会时陪客人员过多，给予专家各种不必要的额外补贴，经常在专家住室内摆设纸烟、糖果等等。如有的企业将专家的房间布置得花花绿绿，用最好的床单做桌布，在屋内喷香水。以宴请专家为名大吃大喝是经常的事情，个别单位甚至每日必宴，有时宴请一位专家，中方的陪客竟有二三十人。专家出差时中方随员过多也是个问题，被专家戏称为游行队伍。[①] 有些做法连苏联人自己都看不过去。如天津音乐学院和南开大学邀请苏联专家游览泰山，途中遇雨，陪同游览的负责人劝告专家家属及孩子乘坐山轿，而且自己也坐轿陪同。事后，苏联使馆认为影响极坏，提出将有关专家调回国内进行严肃处理。[②]

三、对苏联专家日常生活的关心和照顾

苏联专家在中国享受的待遇有些是不能以金钱来计算的。笔者查阅的大量中国文献表明，从政策的角度看，中国政府对苏联专家在日常生活上的关心和照顾完全可以用“无微不至”、“宾至如归”这些中国待客的传统词汇来形容。

来者欢迎。首批到北京的苏联专家尚未启程，刘少奇就专门致电周恩来，对专家的住房、办公室和用车，乃至被褥、洗漱用具和纸笔，每个细节都作了认真交待。[③] 专家到京后，毛泽东亲自在中南海接见，周恩来则邀请他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还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前往坐落在铁狮子胡同的苏联顾问总部看望他们。[④]1956 年 6 月国务院外国专家局通知：凡新聘请的专家应由聘请部门负责人陪同游览一次本地的名胜古迹；定期统一组织所属范围的专家参观本地名胜古迹和工厂、农庄以及各种经济、文化展览会；专家要求在假期到外地游览参观可予同意；专家出差到外地时可顺便游览途中或附近地区的名胜古迹。[⑤]

走者欢送。第一批专家期满回国前，政务院专门通知：各部门可以首长名义赠送总值不超过 20 万人民币的有政治意义的纪念品一份，部门首长可举行小型宴

① 1956 年 12 月 8 日国务院秘书厅关于检查 1956 年接待外国专家工作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36，目录 9，卷宗 294，第 35–37 页。1956 年 7 月 1 日关于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138，第 7–14 页。

② 1957 年 10 月 12 日国务院关于在泰山组织苏联专家家属乘坐山轿错误的通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36，目录 9，卷宗 294，第 45–46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46–47 页。

④ 李越然：《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片段回忆》，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一辑，第 87–89 页。

⑤ 1956 年 6 月 28 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组织专家游览参观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36，目录 10，卷宗 275，第 41–42 页。

会饯行，并亲自到车站欢送。[①]1955年9月中国政府又规定：专家工作期满回国时，除以国务院名义发给中苏友谊纪念章外，所在工作单位负责人应给专家写感谢信，写明专家的主要工作和成绩，并附俄文译本。对有重大贡献的专家应由有关部门负责人发给感谢状。对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则应报请国务院以总理名义颁发感谢状。[②]

苏联专家的节日和休假问题也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1953年2月规定，在华苏联专家除享受中国统一的节假日外，十月革命节放假2天，12月5日斯大林宪法日放假1天，2月23日苏联红军节放假1天；各地负责人每年国庆节统一宴请一次当地的苏联专家，每年春节则由各聘有专家的单位负责人分别宴请本部门的苏联专家；国庆节和春节时向苏联专家子女每人赠送一份礼物；元旦、五一劳动节及苏联红军节各单位应为专家举办纪念会和各种晚会；国庆节的天安门和各地观礼及其他庆祝大典，应酌情邀请专家或其代表出席。[③]关于专家按协定享受的休假，1955年10月规定，休假的时间和地点应尊重专家本人的意见，如回国休假，其往返旅途时间不计算在休假期内。[④]为了满足苏联专家到海滨度假的愿望，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同意了苏方建议，特将1957年暑期各地在中国境内休假的苏联专家及其家属，原则上集中在北戴河及青岛两地休假，往返费用由聘请单位负担。北戴河及青岛的专家休养所由外专局和当地人民委员会筹办并管理。[⑤]为了减少休假专家长途跋涉，1958年夏天又对苏联专家在中国境内休假采取了分区集中的办法，开设了北戴河海滨专家休养所、庐山交际处招待所和青岛疗养院三处休假场所，并划分了休假区域和分期时间。[⑥]

在医疗方面，不仅专家本人，而且其家属的医疗医药费用，一般都是由中国政府统一负担的，还特别规定，专家或专家眷属镶牙的医药费和手术费也由中方支

---

① 1952年1月6日政务院关于欢送苏联专家回国的办法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429，第10–11页。

② 1955年9月15日国务院关于发给苏联专家感谢状和纪念章的办法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67，第11–12页。

③ 1953年2月7日政务院关于苏联专家放假办法和放假日招待办法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429，第4–5页。

④ 1955年10月22日国务院关于苏联专家休假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67，第18页。

⑤ 1957年6月4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1957年暑期苏联专家在我国境内休假办法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第14–16页。

⑥ 1958年5月24日外国专家局关于1958年暑期苏联专家在中国境内休假办法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312，第108–111页。

付。[①]1954年12月国务院还通知，各单位负责人须探望本单位患病住院的专家并派翻译人员前往照料。[②]后来又因苏联专家对看病时没有固定医生的状况有意见，要求各医疗单位给专家及其家属治病时，“尽可能固定大夫，负责治疗到底”。[③]

对于在野外工作的专家，中国政府也给予特别关照。1957年2月外国专家局专门就伙食补贴问题发出通知，强调外国专家在野外工作期间，各聘请部门应当供应大体上相当于北京国际饭店标准的西餐伙食，并保证对专家所需要的日用必需品（如纸、烟、毛巾、肥皂等）的供应，并按照附近大、中城市通行市价予以出售，其差价由聘请部门予以补贴。[④]

为了保证对来华专家日常生活的供应，专门开设了使用票券购物的商店，对外国专家开放。[⑤]1958年提出了如下要求：各地专家招待部门应根据专家实际所需肉制品、糖果及必需的水果的品种和数量，提出年度和分月要货计划，由当地供应；当地不能解决的部分，可报请省第二商业厅、局进行计划安排，确定专点加工制作；本省市内不能解决的部分，由省市第二商业厅、局分别地区、品种、数量汇总，报第二商业部安排解决。[⑥]考虑到专家的生活习惯不同，还对一些特殊粮食成品——黑面粉、三角米（荞麦制成）、麦精（小麦或大米制成）、巴力米（芒麦制成）、豌豆瓣、通心粉等——的供应专门提出要求：各地专家接待单位，应事先认真制定要货计划交当地粮食部门；各地粮食部门应尽可能在当地加工解决；如因当地缺乏加工设备或限于技术条件不能加工而必须由外地供应者，则统由北京市粮食局负责协助解决。[⑦]

有意思的是，对于苏联专家饮酒这样的细节，中国政府也做出了特别规定。鉴于苏共二十一大提出关于禁止酗酒的问题，苏方专家组织也要求平时不要向专家供

① 1955年9月12日国务院秘书厅关于苏联专家医疗费和镶牙费的补充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67，第45页。

② 1954年12月28日国务院关于探望患病住院专家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67，第4–5页。

③ 1959年8月12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在专家医疗和饮食卫生方面应注意的几件事项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11，卷宗88，第99页。

④ 1957年2月27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对在野外工作的外国专家实行伙食补贴等问题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第25–26页。

⑤ Deborah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p.126.

⑥ 1958年4月3日外专局关于解决外国专家所需肉制品水果及高级糖果问题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312，第22–24页。

⑦ 1958年5月3日外专局、粮食部关于解决外国专家需要某些特种粮食制成品供应问题的联合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312，第17–18页。

应烈性酒，1959年外专局专门规定：平时组织专家舞会和野游时，一般不必供应酒类。如专家坚持要求，则可供应一些啤酒和葡萄酒；餐厅小卖部平时可供应啤酒和葡萄酒，不应卖烈性酒，只在重大节日，可采取少量定量供应的办法；举行宴会时可少量供给一部分烈性酒。并要求各地招待单位就此问题与当地外国专家负责人妥善商议，取得他们的同意、协助和支持。①

甚至对专家的丧事也有明确规定：各省、市专家招待委员会和专家所在工作单位会同其他有关单位组织治丧委员会，并指派负责干部前往专家逝世地点，协助料理善后事宜；聘请部门应派负责同志至大使馆或领事馆吊唁；举行适当仪式的追悼会；慰问已故专家亲属或商请外交部发唁电；对已故专家尸体的处理（火葬、土葬或运回本国），依其家属或驻华使馆意见办理；对已故专家亲属给予抚恤金。②

总之，中国政府建立起一套招待来华专家的制度，要求各地对招待外国专家的工作每半年检查总结一次。检查总结中所包括的事项有“对专家迎送、住房分配、伙食调剂、交通供应、疾病医疗、文化娱乐、参观游览、安全保卫等”各个方面，目的是克服“对专家不热情、不礼貌和不照顾专家本国生活习惯的缺点”。③

四、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及其变化

如果说对苏联专家在华生活的关心和照顾是始终如一的，那么为苏联专家创造的工作环境则随着中苏政治关系的变化而有所改变。造成这种环境改变的原因是复杂的。从中国政府的初衷看，既然付出高昂代价把专家请来，自然是希望他们能为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发挥最大的作用，而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则是首要的、必需的条件。这一点，从政府的角度讲是始终注意的，从逻辑的角度看也是容易理解的。但事实上，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环境确有不尽人意之处。从中国各级政府到具体聘请专家的单位都缺乏工作经验，以致聘请专家的计划经常变动，专家开展工作所需的基本材料和文献准备不全，与苏联有关方面缺乏必需的沟通和联系等等，其结果往

① 1959年7月27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供应外国专家酒类应当注意事项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11，卷宗88，第103页。

② 1955年10月25日国务院关于苏联专家善后事宜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67，第27–28页。

③ 1957年1月12日国务院秘书厅关于检查1956年接待外国专家工作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第35–37页。

往造成苏联专家来华以后无法顺利工作。[①]不过，这方面的状况随着经验的积累可以而且已经不断地得到了改善，问题在于50年代后期出现的两种情况使得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确有向不利方向转变的趋势：其一，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以及广大基层工作人员政治情绪的波动，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其二，中苏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消息渐渐在基层和群众当中传播，无形中影响了对苏联专家的态度。

苏联专家来华之初，中国政府想方设法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条件。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不了解中国国情，不熟悉中国的环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三令五申，要求聘请专家的各部门和各单位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有关情况。早在1950年6月，周恩来就致函陈云：今后凡有苏联专家工作的机关、企业的负责人，务必将本机关、企业的生产业务计划扼要地告诉苏联专家，各地工业生产的情况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工业生产方针、计划的指示，不论是报纸上登载的或单位发布的，均应尽一切可能有计划地指定专人经常找苏联专家面谈，并与他们密切联系，借以更好地发挥专家们的作用。[②]12月9日，周恩来批准了《关于加强专家工作的几项具体办法》。《办法》规定：(一）每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分别向专家作一次关于中国政治情况和各种政策问题的报告；(二）将政府的各种政策性文件，编译成俄文供专家参考；(三）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专家工作汇报会议。[③]为此，周恩来还提出要外国专家局编印《专家工作通讯》，并亲自题写刊名。除了交流专家工作的经验，这本内部资料主要内容就是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文件、政策或其基本精神翻译成俄文，提供给苏联专家。[④]1958年又扩大了发送范围，所有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都可以阅读。[⑤]中共中央党校则把每期的俄文版《中共中央文件汇编》发给专家阅读，使他们及时了解中共的方针政策。[⑥]

不仅如此，苏联专家还可以参加所在部门或单位的所有重要会议，以便及时了解政策和方针的制定情况。1952年11月4日华北军区副司令杨成武请示，苏联

① 详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04页。

④ 采访李越然记录。

⑤ 1958年7月12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扩大俄文内部参考资料阅读范围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10，卷宗275，第122–123页。

⑥ 龚士其主编：《杨献珍传》，第204–205页。

顾问可否参加部队党委会议，毛泽东答复允许，并批转各处参考。[①]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和专家总负责人时告诉他们，中国政府系统和军事系统各部门的最重要的、带方针政策性的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是在党委会议上讨论的，因此，虽然有了各部门负责人定期会见专家组长的规定，但在讨论上述问题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或党委会议仍然是必要的。[②]

据公安部专家工作负责人介绍，苏联专家可以参加公安部所有的工作会议，包括部领导的内部会议。总顾问伊万诺夫的办公室就设在罗瑞卿部长的外屋，有事可以随时找部长商议。按照刘少奇的指示，所有文件都必须给专家看，所以无论是中央下达的文件，还是部里的文件，都一字不落地翻译给他们听，由他们作记录。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60年专家撤走前。当问到这样做有无顾虑时，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们对苏联专家非常信任，都是共产党嘛。"[③]

在军队系统也是如此。1952年12月31日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向毛泽东报告改进专家工作的措施时提到：今后各部门、各兵种的党委会议，以及有关布置工作、检查工作较为重要的会议，都吸收顾问或首席顾问参加；各部门、各兵种负责人，定期向顾问介绍我军情况及本身工作情况，并征求顾问意见等，得到毛泽东赞同。[④]后来，不仅各部队照此办法执行，甚至每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报告和文件，也均送给苏联顾问团一份，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1958年。[⑤]

苏联专家工作很认真，但由于缺乏有关中共历史的基本知识，往往闹出笑话。比如，1955年一位在公安部工作的顾问回国前，坚决要求面见周总理，说有重要情况反映。有关方面未敢怠慢，随即安排周恩来和公安部、军委几位领导人接见了他。这位顾问郑重报告说，公安部队中有的干部是国民党特务，因为他看了档案材料，这些人曾参加过国民党。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说，邓颖超也曾加入过国民党。[⑥]这件事一方面表明苏联专家可以查阅中共干部的人事档案，足见对其信任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苏联专家确实需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和中共的历史。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07–60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06页。

③ 采访赵明记录。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⑤ 采访王亚志记录；采访纪亭榭记录。纪亭榭时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兼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

⑥ 采访赵明记录。

1956年4月国务院明确发出通知，为使苏联专家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各聘有苏联专家部门的负责同志必须定期向专家介绍本单位的工作情况、业务计划以及执行专家建议的情况和问题，并且供给专家必要的业务资料”；“凡在中央各部门司、局长和省、市厅、局长一级干部中传达的有关党和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方面的重要政策的内部报告，中央各部门和地区应当指定适当的同志向本部门的专家组长和各地区的专家组织负责人进行传达”；“在苏联专家人数较多的地区，主管专家工作（或主管专家招待工作）的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定期地为专家组织有关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等方面情况的报告会”。① 是年12月，国务院又规定，为苏联专家组织报告会已列为今后检查专家工作的内容之一。②

此外，一些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地区，对于苏联专家也是开放的。例如，1956年6月国务院通知，旅顺军港为非参观游览区，过去原则上一律不准外宾进入。现在考虑到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都是我们国家机关内部的人员，不同于一般外宾”，特规定允许他们去旅顺作一般性参观。③

在此对比一下1948年苏南冲突时的同类问题，对于评判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环境有参考意义。苏联把南斯拉夫政府拒绝向苏联专家提供有关材料作为撤退专家的理由，而铁托则因政治局委员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向苏联使馆提供了党内情况而对他们进行审判。④ 如此看来，苏联专家在中国享受的政治待遇应该是无从挑剔的。

不过，1958年中苏领导人因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产生分歧时，中国领导人也顺带提出了专家问题。⑤ 此后，向苏联专家介绍情况的要求也有一些微妙变化。9月15日外专局向国务院报告，今年以来为北京地区苏联专家组织的15次报告会，效果良好。如国务院副秘书长龚子荣关于中央国家机关的双反运动的报告，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许涤新关于资产阶级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计委重工业局长余建亭关于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问题的报告等等。苏联方面的专家组织希望各地都加强这项工作，并强调，如果专家对于本地区以至于全国情况知道太少，不仅

---

① 1956年4月5日国务院关于向苏联专家介绍情况、供给资料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143，第121页。

② 1956年12月8日国务院秘书厅关于为外国专家组织报告会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138，第55–61页。

③ 1956年6月19日国务院关于苏联专家去旅顺参观问题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143，第122页。

④ 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⑤ 1958年7月31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АПРФ，ф.52，оп.1，п.498，л.44-47。

影响在华工作的开展，回国后无法介绍中国的情况，也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外专局为此提出的改进意见在报告内容方面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强调在介绍情况时应当根据总路线对专家进行“务虚”，即重点报告大跃进、文化革命、人民公社等方面的情况；二是降低了报告本身的等级，过去可以向专家传达厅局级甚至部级的文件，现在限制为“向我们自己一般干部传达的报告内容”，但不能涉及对苏联的批评；三是降低了报告人的级别，过去要求部门负责人亲自做报告，现在允许指定代理人，但对报告稿事先需加以审查。① 当然，这些微小的变化尚不致影响专家的工作环境。

赫鲁晓夫全面撤退在华专家时提出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监视和跟踪，认为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② 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许多专家也有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苏联专家都不许单独行动，跟踪他们是强制性的，即使上厕所也有卫兵跟在旁边，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搜查他们的住所。有的专家感觉到，“我们在中国就像关进了一所被高墙环绕的监狱”。③ 无论苏联政府或专家本人是在何种情况下这样说的，以及他们这样说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种描述都是不符合事实的。笔者在采访中方负责接待苏联专家或与专家共同工作的人员时，几乎都问了这个同样的问题，所得到的答案全部是否定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老干部肯定地答复，安全部门从来没有对任何一名苏联专家使用过“手段”，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种政策。④ 对苏联人采取反间谍手段是 70 年代的事情，而那时苏联专家离开中国已经很久了。即使某些专家的感受是真实的，也是由于误会造成的。据了解，对于苏联专家的外出行动，中国方面的确是要求有人陪同的，但这些人只是警卫、向导和翻译。由于在专家住所发生过偷盗现象，甚至有反革命分子想要杀害苏联专家，所以中方对专家的警卫是很严格的。直到 1956 年 6 月接待外国专家的会议上才决定，对专家的警卫工作应主要放在驻地的安全保卫方面，一般专家外出可不随身警卫，但对于专家负责人或特殊专

---

① 1958 年 9 月 15 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加强为苏联专家组织报告会问题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4，第 21 卷，第 5–7 页。

② 1960 年 7 月 18 日苏联驻华大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АВПРФ，ф.0100，оп.53，п.454，д.11，л.243-246。

③ Deborah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 p.129；*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с.75.

④ 中苏关系恶化时，赫鲁晓夫曾找人写反华文章，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拒绝这样做，并坚决不同意中国人对苏联专家“盯梢”的说法。采访李越然记录。

家外出，以及在偏僻荒凉地区出差的专家，还是要求随身警卫。[①] 至于中方派遣向导和翻译跟随，则完全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多数苏联专家也认为这是需要的，“因为他们不懂汉语”。[②]

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对苏联专家的工作确实是有影响的，尽管这并非是官方有意造成的。1957 年 6 月苏联大使馆在一份关于中国开展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提到，虽然中共在同“右派分子”做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运动组织得不好，大量有损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情报落入了这些“右派分子”手中，致使反苏言论和关于匈牙利事件的敌对性宣传不胫而走。大使馆忧心忡忡：其结果很可能对某些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产生不利于苏联人的影响。[③] 苏联使馆的担心不无道理，根据新华社的内部报道，确有不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一般市民，对苏联在波匈事件中的做法表示不满或不理解，认为匈牙利出现暴乱是苏联的责任，苏联出兵是干涉别国内政等等。[④]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讲，已经考虑到开展政治运动时应内外有别。如在 1958 年开展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有些部门提出是否可以组织外国专家写大字报和参加群众性辩论，为此国务院规定：应当及时向外国专家介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意义和目的，以及本部门的运动进展情况。群众在运动中所提出的有关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国外设计、专家建议等问题，应当根据需要，采取各种适当的方式虚心地征求外国专家的意见并向他们求教。这种谈话和座谈会应当和群众性的鸣放、辩论严格分开；应当允许外国专家看大字报和参观展览会。他们如要求将大字报摄影，也不要加以禁止。但必须注意凡大字报和展览会有批评专家内容的，一律不许张贴和展出；不要组织外国专家参加群众的座谈会和辩论会，也不要提倡和引导外国专家用写大字报的形式向我们提意见。如果外国专家主动要写大字报，不要加以阻止。[⑤]

不过，群众的热情一旦在运动中迸发出来，是很难靠几项规定制止的。在“大

---

① 1956 年 12 月 28 日习仲勋在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上的指示，1956 年 7 月 10 日关于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138，第 2–5、7–14 页。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4 年第 189 号，第 214–215 页。

② Deborah Kaple, “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 , p.130.

③ TsKhSD，f.5，op.49，roll.8862，no.41（April-December 1957），pp.105-113；Deborah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 , pp.132-133.

④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第 2043 号，第 127–128、134–136、145 页。

⑤ 1958 年 3 月 18 日国务院关于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是否组织外国专家写大字报等问题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36，目录 10，卷宗 275，第 108–112 页。

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很多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认为苏联专家思想保守，跟不上跃进的步伐，有事不愿找专家，甚至减少专家课程，的确出现了有些专家无事可做的现象。[①] 核工业部 202 厂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该厂正处于设计阶段，苏联专家按照常规提出，设计工作应分为三步，即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设计。但中方负责人认为，在目前大跃进和任务紧急的形势下，应打破常规，采取两步设计，取消技术设计的中间环节。为了说服苏联专家，中方便组织他们参观在“大跃进”中名声显赫的徐水地区，试图以亩产万斤的惊人纪录说服苏联专家。但苏方人员对徐水的粮食产量持保留态度，仍不同意改变设计方案。由于中方人员一再坚持，苏方被迫同意取消技术设计环节，并三步为两步，提前完成了设计。结果在施工中出现了问题，不断遇到麻烦，大大小小的修改有几百次。[②]

1958 年夏季及 1959 年 10 月中苏领导人发生争吵以后，大多数干部都已经知道中苏关系出现了麻烦，苏联在搞修正主义。[③] 特别是听说毛主席讲了“我们上山打游击”的话，不少基层工作人员以为问题严重，思想和情绪受到很大影响。过去对苏联专家的建议有不同意见，都是协商解决，现在则有人认定是专家有意捣乱，是赫鲁晓夫让专家们在中国做自己的试验。海军航空兵一位搞机场建筑的苏联专家在修建机场时，提出的跑道坡度超出了常规标准，中方认为这样可能造成事故，双方发生了争执。一位中方干部在情急时竟说：“我们请专家来不是搞破坏的，中国不是你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由于相互之间的信任不存在了，有的部门甚至在电话总机处安装了接听设备，监听苏联专家与国内的长途电话。[④]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也可以相信有的苏联专家所说其信件被拆阅的事情。[⑤] 尽管这些情况并非普遍存在，也不是政府行为，但毕竟会伤害苏联专家的感情，使他们感到在中国的工作环境已经恶化。

如果对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环境进行整体评价，那么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在实际工作中两国关系是真诚的”，他们“对中国人的工作感到满意”，也欣赏中华民族的质朴风格，只是对中国人与专家私下接触受到严格限制

① 关于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的骄傲、急躁和轻敌情绪的一些材料（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1959 年 2 月 3 日整理），长春市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2，卷宗 48，第 8–15 页。

② 采访安纯祥记录。安纯祥在 50 年代任核工业部 202 厂技术员，后任该厂总工程师。

③ 笔者当时在上小学，因生活在机关大院，对此也有所耳闻。

④ 采访纪亭榭记录。

⑤ Deborah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 , p.133；*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c.75.

的现象感到不解。[①] 而笔者采访的所有中方人员也都认为，与苏联专家的工作关系是令人感动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列举苏联专家撤离时的情形对此加以说明。大连造船厂的专家撤退前，没有按照苏联政府要求的将全部图纸和资料带走，而是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的所有图纸和资料都交给中国技术人员，让他们尽量抄写和记录，说能留多少就留多少，能记多少就记多少，他们不想就这样把图纸、资料带走。在包头 202 厂负责培训核材料生产人员的有 30 多位苏联专家，他们听到撤离的消息后，很多人向中国技术人员表示，中国需要了解的东西，他们知道什么就告诉什么，能留下多少，就留下多少，绝不保留，他们把这种作法叫"挤牛奶"。在海军工作的许多专家临走前表示了依依惜别之情，一位曾得过列宁奖章的苏联战斗英雄还流下了眼泪，甚至有人到了火车站还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中国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资料。[②] 这种情况之普遍，以致国务院专门为此发出通知，对于主动提供技术资料，甚至亲自动手帮助抄录资料的苏联专家，"必须尽一切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造成对他们返国后的不利情况。"《通知》要求：一、各单位不要向专家索取原来属于专家所有的技术资料、工作笔记和教材等，除非专家主动借给或送给。二、对于向专家借来的资料进行抄录或派照时，应严格保密，注意务使资料保持原状，必须选择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员去做，并禁止在专家招待所内进行。三、所借资料一定要将原件按时归还，不可拖延时日，以便保护专家。四、切忌对个别专家表示出过分的热情，凡需要避嫌的地方，都不要勉强行事，以免引起不良后果。[③]

上述如此动人的情节，不仅表明苏联专家对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是满意的，而且从一个角度说明，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至少在当时还没有对中苏人民之间的感情造成严重影响。

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82 辑，2002 年 5 月

① Deborah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 pp.129-130.

② 采访徐金成记录。徐金成现任大连造船厂厂史编撰办公室主任。采访安纯祥记录。采访纪亭榭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年，第 404 页。

③ 1960 年 8 月 5 日国务院有关保护苏联专家的指示电，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运局 1960 年，卷号 479，第 6–7 页。

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根据俄国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及斯大林问题的提出，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冷战进程中最具震撼力、最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之一。其结果，不仅引起了一系列有关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的深刻问题，也对中苏关系的演变乃至冷战格局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因此，对于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的讨论理应列为国际冷战史和中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果说在20世纪50–60年代苏共二十大问题主要是作为现实政治进入专家和学者的研究视野的，那么使其成为历史研究对象则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因为只是在这一时期，相关的档案文献才陆续解密并披露出来。有关苏共二十大，过去公布的只是会议代表的公开报告和发言，以及苏共的部分决议，而对于当时震动世界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几十年来在各国流传有许多文本，但始终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更不用说，还有大量涉及这次大会的主席团会议和中央全会的会议记录、决议以及各部门和地区的请示、报告尚不为人知。直到1989年，苏联才在复刊的《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上首次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文本。[①] 随着俄国档案的开放，特别是到199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40周年）以后，俄国学者

---

① 见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3，c.128-170。这个文本就是当时在苏联各级党团组织中传达用的印刷小册子，与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秘密会议上宣读的报告有些区别。3月1日赫鲁晓夫对宣读的报告文本进行了修改，主要是补充了部分即席发挥的内容，对引用文献做了技术性加工，增加反应会场效果的内容（如全场起立、鼓掌等），以及少量的文字修订。见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 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c.42-44。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以前在苏联民间流通的有关秘密报告的俄文版本，大都是从国外英文本转译的。见裘实编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三种俄文版本》，《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7年第2期，第82–83页。

发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使用了大量在档案馆中发现的历史文献。[①] 从史料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2002年莫斯科出版的关于苏共二十大的专题档案文献集，其中公布了当年秘密报告起草时的3个文本，以及有关这次大会筹备、酝酿情况以及苏联国内外和社会反应的198个文件。[②] 此后不久出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文件汇编，又补充了一些相关的档案文献。[③] 在此基础上，俄国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起来。[④] 由此可以断言，从真正学术意义上讲，对于苏共二十大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⑤]

至于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的影响，始终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其研究的切入角度有两个：中国现代史和国际冷战史。从中国史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

---

① 在笔者看来，比较重要的有：*Пихоя Р.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6；*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Наумов В.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 Хрущёв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Барсуков Н.* Как создавался "закрытый доклад" Хрущёв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21.02.1996；*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8，№2；*Пыжиков А.* XX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0，№8。

②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 在此之前出版的有关为政治受害者平反的文件集，已经公布了一些相关档案，见 *Артизов А. и т.д. (сост.)*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как это было，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март 1953-февраль 1956，Том 1，Москва：МФД，2000。

③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

④ 目前已经发表的重要成果有：*Аксютин Ю.В., Пыжиков А.В.*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 Хрущёва XX съезду КПСС в свете нов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2，№2；*Рейман М.*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3；*Пыжиков А.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в годы хрущё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4。*А.Пыжиков* 的另外两篇论文则着重研究了二十大以后苏联社会的心理和思想变化。见：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в годы "оттепели".//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3，№6；Истоки 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а：Молодёжь после XX съезда КПСС.//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3，№12。

⑤ 在英语世界，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学者对苏联史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在社会史、文化史方面。对政治史的研究则出现了新概念（New Soviet Political History），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杂志《评论》（*Kritika*）甚至出版专号讨论了这个问题（Volume 5，Number 1，Winter 2004）。至于对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的研究，William Taubman 最近出版并获普利策传记奖的专著（*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NY & London: W. W. North & Company，2003）值得一读，其中有专门章节讨论这些问题。此外，Lorenz Lüthi 不久前完成的博士论文（*The Sino-Soviet Split,1956-1966,* Ph.D. 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2003）对此也有较深入的研究。笔者不久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得到了 Lüthi 赠送的这部未发表的文稿，在此致谢。中国学者中已有人摆脱了以往政治理念的羁绊，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再版的《苏联兴亡史》（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和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不过，与俄国学者的研究相比，上述著作使用的材料均显得比较陈旧。

来说多一些，其重点集中在中共对苏联经济发展道路的反思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索。[①]从中苏关系史方面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李丹慧主编的《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论文集）里，应该说，这部著作代表了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②]

本文利用的史料，除现有的公开文献外，主要是最近俄国发表的历史档案，以及相关的中方文献。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拟回答三个问题：第一，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以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实质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共当时的政策方针，才可以看清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二，二十大纲领和斯大林问题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以此观察苏联历史的发展，才可以判断其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第三，毛泽东最初对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是什么心态，是怎样考虑的，并以此分析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

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对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认识及评价无疑是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而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的看法。在 1963 年 9 月 6 日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一文中，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做了全面评述。文章断言，在二十大会议上，苏共“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苏共的错误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借口所谓

① 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董志凯：《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设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王真：《50 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武力：《论八大对苏联工业化模式认识的深化及其历史局限》，《教学与研究》1996 年第 6 期；孔寒冰：《苏联经济模式是如何在中国确立起来的》，《俄罗斯研究》2000 年第 1 期；刑和明：《1956 年中共对苏联模式认识的转变及启示》：《党史研究资料》2002 年第 12 期；林蕴晖：《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之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林蕴晖：《苏共二十大与毛泽东走自己的路》，《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对个人崇拜和思想解冻问题的专门研究不多，只有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年）等少数论著。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论述。西方学者从中国史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的代表作应属 R.MacFarquhar1979 年出版的专著，中文本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翻译组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② 该文集 2002 年 10 月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相关的论文有：杨奎松的《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李丹慧的《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54–1960）》，牛大勇的《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杨奎松、陈兼的《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李捷的《从同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等。

‘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斯大林问题，文章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而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文章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由于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现在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①] 这种似乎已经盖棺定论的说法至今没有在官方史学中得到修正。[②]

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仅就内容而言，把苏共二十大的主要精神归结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和平过渡”理论，既不准确，也不完整，因而很难对其实质做出正确和全面的判断。所以有必要首先对二十大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然后对其实质做出评判。现在所有相关的文件几乎都已经公开，总括起来看，苏共二十大是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确与斯大林主持的十九大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或纲领性意见。

在国际方面，苏共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样一套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和总路线。

苏联对外政策新理论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当前时代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作为“无所不包的世界制度”已经瓦解，而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国范围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由于掌握了核武器的秘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有道义的手段而且也有了“物质的手段来阻止侵略”。于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虽然继续有效，但“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核武器时代，未来的世界“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看到，“历史已经把这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事实上，两个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日益广泛地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它不仅是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也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主要的目的是消除战争的威胁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同样由于国际形势的根本变

---

① 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55–63 页。

② 特别是“全盘否定”的说法，仍为官方所使用。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59–360 页注释。

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依照列宁关于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观点，苏共中央指出，“除了依照社会主义方针改造社会的苏维埃形式以外，还有人民民主的形式”，其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实行私营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并逐步使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的政策，认为中国“正在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许多独特的贡献”。因此，不应该“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从理论上讲，“这种过渡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制度革命式地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因而，任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就是革命，激烈的程度有轻有重，然而都是各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人民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就是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在右翼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越来越多地遭到破产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可以团结其他爱国力量通过议会斗争改变政权的性质，而在反动势力仍然强大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则只能伴随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重要的是，“无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如何，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首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没有这种领导就不可能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是通过武装干涉内政的办法，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和平竞赛的方式。“在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但不是通过“革命输出”，“不是用大炮和侵略，而是由于它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因此它能够保证人类达到比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大会通过的决议全面肯定了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理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一些根本的、带有原则性的、有关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问题，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①

今天看来，苏共中央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路线，是极具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的，正如许多俄国学者现在认为的那样，“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成

① 赫鲁晓夫关于苏共中央工作总结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日；米高扬在大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2月22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在大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2月23日；苏共中央关于工作总结报告的决议，《人民日报》1956年2月26日。1956年1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对二十大总结报告的文稿进行了深入讨论，并集中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只有莫洛托夫和卡岗诺维奇提出不同意见，而多数人完全支持报告的观点和结论，并批评了莫洛托夫和卡岗诺维奇的看法。卡岗诺维奇最后表示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莫洛托夫没有表态。详见 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3，оп.8，д.389，л.43-51об.，*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88-93。

果首先是制定了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方针，而这个方针是与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本人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1]当然，这种具有内在逻辑的新思维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时局认识逐步成熟的考虑。

在国内方面，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变经济发展及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这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在继续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迅速发展消费品的生产”。

2、把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必须坚决地、有计划地在工业和运输业中采用最新的科学成就、技术和先进经验，使现有设备现代化，改善和改进劳动和生产组织，更广泛地在工业中实行专业化和协作，以便在这一基础上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3、加强“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其基本路线是加快东部地区的开发，今后10年到15年间，在那里建立起采煤和电力生产的最大基地、第三个大冶金基地以及新的机器制造中心。

4、在所采取的措施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消灭农业的落后现象和消除由此产生的工农业发展之间不均衡的现象”，为此需要在农业中实行可以发挥集体农庄庄员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新的计划制度；在增加农产品的生产中，加强对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鼓励；从城市和工业中心派遣人员到农村，加强集体农庄的领导干部和专门人材队伍；进一步加强农业的技术装备，增加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人员和工程技术干部；增加国家对发展农业的拨款；继续集中力量大力发展谷物业，开垦生荒地和扩大玉米播种面积。

5、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为此，除进一步提高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以及集体农民的收入外，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措施，如实行七小时（特殊行业六小时）工作制或每周五天工作制；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将住宅建设增加一倍；国家为老年人建立房屋和设置相应的养老金；实行免费教育；普遍设立托儿所和幼儿园，以及其他改善保健和国民教育事业的种种措施。

6、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其主要内容有：“同官僚主义的集中化作无情的斗争，充分确立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和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把中央所属的大量工业企业转交给地方机关管理”；加强地方苏维埃和企业的自主权利；“吸引工人群众广泛参加拟定和审查经济计划的工作、更加积极地参与决定生产管理的

---

① *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с.15.

问题”等。

7、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进国家机关工作，加强苏维埃法制。建立党和政府对国家保安机关和其他权力机构的监督，完全恢复并且加强检察机构的监察权力。[①]

可以看出，与对外政策相比，二十大提出的对内政策显得缺乏系统性和过于表面化，根本没有触及苏联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本身，给人的感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情况恐怕也确实如此，二十大提出的国内问题，只是苏联新领导人感受到而不是深刻认识到的问题，或者是已经有所认识但不敢坦白讲出的问题。

在党内方面，除了加强组织和思想工作等一般号召外，引人注意的是二十大提出了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问题是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出的：在党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和尽力加强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苏共中央严厉地“谴责个人崇拜”，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个人崇拜的危害在于“使得某一个领袖变成英雄和创造奇迹的人”，同时却“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贬低他们的创造性的努力”，并曾使党的工作“发生严重的缺点”。[②]不过，这个问题在大会上并没有占据突出地位。尽管全体代表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反对个人崇拜是完全正确的”，[③]但是从整个会议发言的情况看，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有人统计过，在大会上发言的共126人，直接提到“个人崇拜”问题的只有8人，其中6人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即阿里斯托夫、苏斯洛夫、米高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其他2人是达吉斯坦州委第一书记达尼亚洛夫和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④]而在所有公开发言中，点名批评斯大林的只有米高扬一人。按照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在其得意之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分析“未必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实际上由斯大林授意

---

① 赫鲁晓夫关于苏共中央工作总结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日；米高扬在大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2月22日；马林科夫在大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2月23日；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2月25日。

② 《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日。

③ 《人民日报》1956年2月26日。

④ 尼古拉·津科维奇：《权力与争斗》，郅友昌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03–204页；*Пыжиков А.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в годы хрущё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c.51。在苏联领导人中，只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发言时没有提及个人崇拜问题。见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c.110-111。

和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没有全面、正确地反映党的历史。[①] 目前还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米高扬何以会有如此惊人之举——几十年来在苏联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斯大林，以至许多外国共产党代表当时认为他与赫鲁晓夫或其他苏联领导人在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意见分歧。[②] 不过人们很快就了解到，赫鲁晓夫的看法不仅与米高扬没有分歧，而且很可能还对他轻描淡写的批评方式感到不满。如果不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问题确实不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和震动。

10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在一次只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讲演。[③] 在这个冗长和充满激情的秘密报告中，作为个人崇拜现象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列举了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这些内容已经有太多的论著讲述，因此没有必要在此重复了。[④] 为了评判和对比中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里要强调说明的只有两点：第一，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是尽人皆知"。最后又谈到，"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且他的逻辑、力量和意志对干部、对党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过去斯大

① 《人民日报》1956年2月22日。著名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在发言中也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提出了批评。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2月23日，第32期，第235–237页。

② 如见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回忆录，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83，д.117，л.2504-2575//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9，№1，с.6；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7–18页。

③ 几乎所有的中文论著都说秘密报告的时间是在24–25日夜间，不知根据何在。而在俄国档案的记载中，24日晚间进行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选举，由布尔加宁主持和赫鲁晓夫报告的秘密会议是在25日上午举行的。РГАНИ，ф.1，оп.2，д.17，л.89-90，*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250-251. 另见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с.111-113。

④ 关于这个报告公开出版的中文本至少已经有三个。1988年2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同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拉齐奇所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夏平译），这两本书作为附录收入的报告文本都是来自西方久已流传的1956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英文本，而199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麦德维杰夫著《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述弢译）所附录的报告文本则译自苏联1989年首次公布的俄文本。经过核对，笔者发现俄文本与英文本的内容和文字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俄国学者从文本来源考证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同。[见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30] 尽管如前所说，这个文本与赫鲁晓夫宣读的报告有些差别，但并不影响人们对报告实质和基本内容的了解。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据新华社查对，美联社和合众社播发的报告原文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6日印发的那本文件。除极个别用词外，"段落和文字都相同"。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6月9日，第1903期，第229页。

林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功劳”。[1] 此外，报告对斯大林的批评仅仅集中在大清洗及军事指挥错误等少数几个问题上，而对于斯大林其他许许多多的错误，如对党内反对派的无情镇压、推行全盘集体化的严重后果、消灭富农的残酷政策、对内实行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外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蛮横专断和老子作风（毛泽东对此最为愤恨）等等，报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或者是以赞同的口气提到的。第二，报告在谈到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时，仅仅将其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和道德缺陷，如“疑神疑鬼的病态心理”，经常性的“滥用权力”和“恣意妄为”，“最肆无忌惮的专横”作风，以及性格粗暴、缺乏耐心、好大喜功等等，而没有深刻地分析个人崇拜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更没有从制度层面阐述斯大林问题的要害——高度集权的官僚和独裁体制。很显然，既然在这种政治体制里没有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和民主选举，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现象，而报告中所谓“党内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法制”也只能是天方夜谭而已。赫鲁晓夫甚至认为，斯大林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出发”的，“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如此推理的结论自然是好心办坏事：动机是好的，只是方法和手段有问题。

由此看来，苏共二十大确实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方针，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不过，从中苏关系的角度观察，麻烦并不在于提出了非斯大林化的问题，而是在于提出问题的方式，特别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方式。

二、非斯大林化现象的由来

综上所述，苏共二十大提出的纲领和路线，无论其认识是否正确，思考是否到位，都是针对斯大林时期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所以称之为非斯大林化现象毫不为过。这里要强调的是，由苏联自身开始的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并不是赫鲁晓夫个人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从斯大林去世以后就在莫斯科新领导层逐步形成的共识。本来这些对内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是在不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情况下悄悄推行的，但在筹备二十大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为成千上万30年代大清洗的受害者平

① 本文使用的秘密报告原文，均引自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一书的附录，以下不再注明。

反的问题，于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的批判便被提到了二十大的议事日程。

还是先看对外政策。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新的国际局势就已经显示出来。由于战时合作而形成的国际关系重组，以联合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为标志的统一的国际体系相继建立，以及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功能趋向成熟，为修正苏联传统的对外政策创造了国际环境和基本条件。雅尔塔体系区别于凡尔赛体系的根本标志之一是建立了各大国认同的国际体系和平等的游戏规则，而莫斯科也是这种体系和规则的倡导人和缔造者。因此，斯大林陆续地、不自觉地从战略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方式和安全观念。从战争后期到战后初期，解散共产国际这个对苏联外交已经不起作用的工具，以求得资本主义世界的谅解；强调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合作，表明苏联已经感受到其可以对世界命运发挥主体作用；促进欧洲各国及中国通过选举成立共产党与其他各党的联合政府，说明苏联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认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经验；最后，放弃世界革命的主张——如在伊朗、希腊和中国表现的那样，不再是推翻旧世界，而是要改造旧社会。所有这些政策的本质及其归宿就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然而，因意识形态对立而产生的东西方之间的猜疑和敌对，因美苏各自的过度反应而采取的过激措施，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互动作用，终于使冷战思维成为双方政策的出发点，同美国一样，苏联也很快就回到了战前发展的老路。斯大林不仅在国内继续高唱军事共产主义的“凯歌”，进一步巩固标榜为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加紧对社会的控制和镇压，而且重新调整了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在东欧各国推行苏联体制并建立起类似共产国际的情报局组织。欧洲的紧张局势随着柏林危机的爆发而加剧，朝鲜战争则把苏联与西方的对抗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并推至极限。

斯大林的去世为苏联改变传统政策提供了机会。及时地劝说中国接受美国条件、结束朝鲜战争是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意图的第一次显示，也是克里姆林宫新主人集体做出的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次尝试。①1954 年 3 月 12 日，马林科夫在对选民演说时宣称，朝鲜停战是国际紧张局势走向缓和的标志，“苏联政府坚持进一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坚持牢固而持久的和平，坚决反对冷战政策，因为这个政策是一个准备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政策，而在拥有现代武器的条件下，这样一场战争将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

① 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年。相关的档案文献见沈志华编：《关于朝鲜停战的俄国档案选编》，《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4 期，第 150–175 页。

"和平经济竞赛"。[①]这种表述不仅在观点上，甚至在话语上，已经与斯大林所坚持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大相径庭了。由于党内继承权的斗争，马林科夫公开发表的惊人言论受到指责，并成为其被罢黜的理由之一。[②]但实际上，这个理论框架和思维逻辑是苏联新领导人普遍接受的。二十大在提出"三和路线"时只从政治角度强调了时代变化的背景，而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则欲言又止，一笔带过，但这并不说明赫鲁晓夫没有把这个问题也作为苏共改变外交政策的根据之一。

自 1949 年 8 月 29 日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苏联的核武器研制得到迅速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美国。据俄国的解密档案，在国家银行特别账户的秘密用途拨款中，按当时价格统计，1947–1949 年苏联研制核武器的开支为 145 亿卢布，而在 1951–1955 年期间，仅用于原子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科研和试验设计单位的计划开支就有 648 亿卢布。[③]在 1953 年 7 月 3 日苏共中央全会上，中型机械制造部副部长扎文亚金骄傲的宣称：美国人将看到他们的核优势正在消失。苏联即将爆炸的氢弹威力比普通原子弹要大数十倍，"它的爆炸意味着美国人正在准备的第二次核垄断已被打破，这将是世界政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果然，8 月 12 日苏联成功地试验了世界上第一枚可运载氢弹，而美国的氢弹爆炸是在 7 个月之后。[④]与此同时，苏联核武器的运载能力也在不断提高。1947–1949 年，P-1 型导弹（射程 300 公里）和 P-2 型导弹（射程 600 公里）相继试制成功并装备部队。而在二十大召开期间，1956 年 2 月 20 日，P-5 型导弹携带着核弹头，以 1500 米 / 秒的速度飞越 1000 公里，在预定时间内将其"有效负载"送达目的地。[⑤]这个射程还不足以把原子弹送到美国本土，但打到欧洲则绰绰有余。[⑥]自然，知道核武器的威力同时也了解核战争危害的并非马林科夫一个人。1954 年 4 月 1 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报告了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等著名物理学家关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看法：战后短短的几年，从原子弹到氢弹，从核

---

① Правда，13 марта 1954г..

② *Рейман М.*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о Г.М. Маленкове.//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1，с.31.

③ *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структура，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6，с.242-244.

④ Y. Smirnov and V.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CWIHP Bulletin*，Issue 4，fall 1994，p.14.

⑤ *Симонов*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структура，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с.239-240，248.

⑥ 1957 年 8 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P-7 型）。

裂变到核聚变，核武器的杀伤力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从而使核军备竞赛达到了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科学家们在一系列文章中生动而有力地论证说，建立在利用热核反应基础上的核弹，实际上可以无限制地增加一枚炸弹中所包含的爆破能量，而对这种武器的防御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明显，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核爆炸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过不了多少年，其数量将足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成为不可能。人类正面临着毁灭地球上全部生命的威胁。[①] 无疑，这使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人感到震惊。9 月 22 日，在关于防止核扩散谈判中一直采取对峙立场的苏联政府向美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示愿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上继续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不久，苏联又提出了一项禁止核试验的新建议。[②]

因此，苏联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方针，一方面是基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也是对核武器发展及其后果有了明确认识的结果。于是，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两年的时间里，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以实现与西方的缓和：提出苏联作为新成员加入北约的要求，采取主动措施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赞同奥地利中立并同意从那里撤退苏联占领军，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起义采取冷漠态度，积极推动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谈判，主动提出裁减军队并单独实现裁军，向美国建议签署苏美友好与合作条约，如此等等。[③] 在 1956 年 1 月 30 日主席团会议研究大会工作总结报告草稿时，最集中讨论的就是议会道路、和平共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经过一番争论，所有人一致赞同报告的宗旨——和平，会议的结论是："我们是马克思 – 列宁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寻求通向

① 1954 年 4 月 1 日马里舍夫给赫鲁晓夫的备忘录，TsKhSD，f.5，op.3，d.126，ll.39-41，转引自 Y. Smirnov and V.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pp.14-15。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卡皮察的文章及其给赫鲁晓夫的信件。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465–488 页。

② 详见沈志华：《援助与限制：1950 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③ Vojtech Mastn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arsaw Pact in 1955"，Niels Erik Rosenfeldt，Bent Jensen，and Erik Kulavig (ed.)，*Mechanisms of Power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pp.243-254；Csaba Béké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16，1996；Matthew Evangelista，"Why Keep Such an Army? Khrushchev's Troop Reductions"，*CWIHP Working Paper*，No.19，1997；*Обичкина Е.О.*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и война в алжире，1954-1962г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МИД РФ.//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0，№1，с.19-24；*Катасонова Е.*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1955-1956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3，№5，с.121-132；*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69-71, 906-908.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第 587–608 页。

共产主义的道路，但不是经过战争。”[①] 尽管苏联的举动在美国没有立即看到积极反应，但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却是“深入人心”的。[②] 确如美国情报专家分析的，“苏共二十大的整个旋律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领导人似乎确信，只有和平才是世界共产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③] 无论如何，20 世纪 50 年代“被合情合理地认为是东西方缓和的第一时期”。[④] 这是苏共中央提出的“三和路线”的结果，也是二十大试图改变国内政策、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提。

1917 年的革命导致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开始在一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建构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囿于历史的条件和战争的环境，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军事共产主义的发展模式，并准备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为了巩固革命的政权，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当时历史环境为苏联提供的第一次制度转型（或曰改革）的机会。但是，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集权统治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⑤]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政治动荡不安，经济畸形发展，生活贫穷落后。是战争掩盖了苏联的社会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挽救了斯大林模式，因为它的军事共产主义（战时经济）性质恰恰适合了战争的环境和需要。但战争也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数百万穿着军装的苏联工人和农民随着战线推进走出国门后才发现，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主义天堂”简直无法同“资本主义地狱”相比，甚至战败的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要高于战胜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抱怨，社会开始思考。然而，斯大林却陷入了一种理论误区，他认为苏联在战争中显示的力量和取得的胜利证明了他所创造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正确

---

①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с.88-95.

② *Афиани В.Ю., Иванов Н.С.*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Суэц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ЦХСД，复印自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room 保存的手稿；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达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 年，第 27–28 页。

③ 1956 年 6 月 22 日，国务院情报研究办的报告：“苏共二十大与‘战争不可避免’论”，MF2524607-0807，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④ Csaba Béké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⑤ 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研究，著述颇丰，在中国学者的论著中，笔者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有：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年；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至于对苏联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可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性和优越性——1946 年 2 月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1] 再加上冷战爆发和国际关系趋向紧张，刚刚开启的通向世界的窗口被关闭了，铁幕再次降临俄罗斯大地。拟议于 1948 年召开的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宗旨的苏共十九大无声无息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改革经济体制的尝试尚未启动便夭折了。与此同时，党内和社会生活也悄悄地再次笼罩在政治清洗和镇压的乌云之中。一切又恢复到战前的状态。[2]

俄国学者说的不错，1953 年的苏维埃国家确实已经处于社会大爆炸的前夕。[3] 人们不仅要在恐惧和惊慌中煎熬，还要忍受物质生活的贫乏。斯大林的逝世给那些一向视沙皇为神明的俄罗斯人带来了由衷的悲伤，也使许多善于思考的人们产生了希望。这种思考首先是从直接承担着社会责任的党和国家的高层开始的——他们感受到了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

50 年代初苏联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是国民生活水平低下，食物、日用品和住房的短缺严重困扰着苏联人民。以食品为例，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社会主义搞了 30 多年，直到 1952 年，苏联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才接近（牛奶及乳制品、鱼类及水产品）甚至还低于（面粉、大米、肉类及油脂）1913 年的水平。[4]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严重落后。统计资料显示，按 1926–1927 年不变价格计算，与 1945 年相比，尽管消费资料产品的增长率（169%）要大大高于生产资料产品（57%），但是到 1950 年，在工业总产值（2400 亿卢布）中，生产资料产品（1620 亿卢布）仍占 67.5%，而消费资料产品（780 亿卢布）仅占 32.5%。[5] 至于农业，问题就更加严重了——斯大林去世前后的主要生产指标几乎都低于十月革命前。如谷物总产量（按 1939 年以后疆界计算），1913 年为 8600 万吨，1953 年为

① 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441–454 页。

② 关于战后苏联社会状况的详细史料可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2、23、25、26、28、30 卷，也参见俄国学者的论著：*Пыжиков А.В.* Советско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хрущёвских рефор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2，с.33-43；*Наумов В.П.* Хрущё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 4，с.29-30；*Зубкова Е.* 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чистки в КПСС，1949-1953.//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9，№3，№4，№6；*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политика 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1945-1953，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0。

③ *Наумов* Хрущё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с.29.

④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3 卷，第 694 页。

⑤ РГАЭ（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ф.4372，оп.96，д.693，л.161-162，转引自 *Симонов*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структура，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с.201。百分比为笔者计算所得。

8250万吨，1946–1950年平均为6480万吨。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也是如此，1913年为8.2公担/公顷，1953年为7.8公担/公顷，1946–1950年平均为6.7公担/公顷。谷物出口量差得就更远了，1913年出口910万吨，到1953年只有310万吨。与美国农业相比，也能看出同样的问题。1949–1953年苏联平均谷物产量8090万吨，仅为美国同期产量（13350万吨）的60%。[①]

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农业改革纲要，可以被看作是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增加日用品生产，发展居民住宅建设，扩大商业销售网点，降低农业税收标准，加速开垦生荒地，所有这些措施，无论最初是谁提出的，其结果都是为二十大进一步提出的改革方针提供了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②]不过同时必须指出，苏共中央当时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提出挑战。可以对此做出注解的是，1955年1月马林科夫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罪名之一就是引导经济界"在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宣扬明显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大提出的对国内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的修改才局限于一些治标不治本、治表不治里的零星措施。这里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超越被斯大林注释和僵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曰斯大林主义）的程度，而不在于对斯大林本人的畏惧，否则就无法解释苏共领导人在党内民主问题上对斯大林的点名批判了。

如前所说，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在二十大期间对个人崇拜现象的认识水平，显

---

① 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35、41、135–137、164–165页。

② 关于1953年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争先提出经济改革措施的情况，详见*Зубкова Е.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ёв：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4，с.109-111；*Пихоя*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с.8-11。

③ 苏共中央决议指出，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九月会议上的发言"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速度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作为重要的结论，他还提出了加快轻工业发展的口号。因此，某些可怜的经济学家抓住马林科夫同志的这个错误讲话，在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宣扬明显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要求优先发展轻工业，并不是偶然的"。见*Рейман*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 (1955г.) пленума，с.31。

然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即使这样，在全党和全世界面前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是极富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因为从本质上讲，批判斯大林无疑就意味着以其为标志的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那么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只是在代表大会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① 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

对斯大林产生恐惧感的首先是他身边的人，特别是到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已经处于一种人人自危、难以容忍的紧张状态。通过 1952 年 10 月召开的十九大，斯大林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全部赶出了新的领导核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实际上都是在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而能够被召来出席晚宴的只有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少数第二代领导人。即便是他们几人也整日战战兢兢，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从晚宴邀请名单中除名。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虽然导致斯大林最后死亡的真实原因目前仍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斯大林能够再次站起来。在斯大林昏迷和弥留之际召开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以及会议做出的对党和国家进行机构及人事调整的决议，充分证明了党内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② 在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便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并形成一个共识：今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担任可以凌驾于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之上的职务。③ 应该说，苏联领导层的“非斯大林化”实际上早在斯大林刚刚倒下时就开始了，尽管步履蹒跚并充满了自相矛盾。

最先针对斯大林采取个人行动的是贝利亚。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星期，3 月 13 日，内务部长贝利亚就命令成立若干侦查小组，负责重新审理包括著名的“医生案

①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500–511 页；拉齐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第 4–8 页；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第 60 页；尼古拉·津科维奇：《权力与争斗》，第 210 页。

② 有关史料见 *Медведев Ж.А.* Загадка смерти Сталин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0, №1；*Пихоя Р.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Рейман М.*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第 370–377 页，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③ *Наумов*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5, с.19.

件”在内的一些重大案件，而这些案件都是斯大林生前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重要内容。不到1个月的时间，“医生案件”得到平反，主席团还通过决议，赞成贝利亚采取措施揭露过去国家安全机构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尔后，根据贝利亚的倡议，在5月9日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①] 虽然这些措施没有直接联系到斯大林，但是其逻辑的指向是清楚的。6月22日贝利亚的被捕当然不是因为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是由斯大林批准的，不过处理贝利亚事件却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提供了一个讨论斯大林问题的机会。

有学者认为逮捕和处决贝利亚“实际上导致了非斯大林化的停止，甚至出现了恢复斯大林化的现象”。[②] 实际情况未必如此。7月中央全会形成的决议承认，苏联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还是在遵守“列宁制定的党的准则”和“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积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例如，一再推迟十九大的召开，连续几年不召集中央全会，主席团“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议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决议还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走上了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很显然，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然而，笔锋一转，决议把本来应由斯大林承担的这一切罪过都转嫁到了贝利亚头上。[③] 鉴于斯大林在党内的崇高威望，这样做是完全正常的。令人感兴趣的是，除了向党内传达会议精神外，苏共中央还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里，斯大林遭到了点名批评。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还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苏联领导人要改

---

①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380-409；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3，оп.10，д.22，л.3-4；д.20，л.11，*Наумов*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с.20-22，27-28。

② *Рейман*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 (1955г.) пленума，с.29-30.

③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47–72页。这里根据原文对译文做了一些修改。原文见 *Наумов В.,Сигачев Ю.*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1999，с.265-273。

变斯大林生前的一些作法，自然需提出理由，但莫洛托夫强调他只是在讲述一个伟人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归结为斯大林晚年的“病态”。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①] 显然，此时个人崇拜的概念表面上还是没有直接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同全会的精神一样，在舆论宣传上，所有的指责都是针对贝利亚的。苏共领导人这样做，很可能是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尽管在党内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个人崇拜具体讲是对谁的崇拜？宣传个人崇拜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但是在社会上，民众仍然像神一样供奉着斯大林。1953–1955 年，各种报刊杂志继续连篇累牍、一如既往地颂扬和赞美斯大林。特别是 1954 年 12 月斯大林诞辰 75 周年时，各地关于斯大林的展览、集会、颁奖等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②] 在这样的氛围中，1955 年 1 月被罢免的马林科夫的罪名有很大一部分是指责他违背了斯大林生前制定的方针和政策，并骗取了“伟大领袖”的信任。不过，中央全会决议的最后还是没有忘记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③]

当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纷纷落马以后，召开苏共二十大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55 年 4 月 7 日，赫鲁晓夫提议 10 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④] 然而，在为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 30 年代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问题。平反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做出结论，还要给千百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镇压、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 1936–1939 年期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阴谋伪造的假案和通过粗暴手段制造的冤案，揭发材料如潮水般涌来。1955 年 3 月 14 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 1954 年下半年和 1955 年 1–2 月份，共审理了 13084 起反革命案。其中由于在原审

---

① R.J.Service，“The Road to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Soviet Studies*，Vol.33，No.2，April 1981，pp.240-242. 高岗代表中共听取了情况通报，遗憾的是目前有关的中方材料尚未解密。

② РГАНИ，ф.5，оп.30，д.4，л.20，*Пыжиков А.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в годы хрущё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с.47-49.

③ *Рейман*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 (1955г.) пленума，с.30-32.

④ РГАНИ，ф.1，оп.2，д.1，л.7，4-5，*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167-168.

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达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①]

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并考虑为无辜受害者的平反问题。到1955年的秋天，关于30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应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②]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11月5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做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时，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③]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会上还宣读了当事人沙图诺夫斯卡娅给米高扬的信，信中讲述了有关调查谋杀基洛夫案件的情况：在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办公室，凶手尼古拉耶夫当着斯大林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亚戈达的面，讲出他的背后指使者竟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随即遭到一顿毒打。受到震动的主席团成员要求继续调查。[④]

一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2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引起了领导层的争论。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镇压和刑讯都是斯大林本人亲自设计、亲自领导的消灭异己的活动。米高扬、波斯佩洛夫和谢罗夫还谈到了一些具体事实，表明斯大林确曾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他在二十大

---

① *Артизов А. и т.д. (сост.)*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как это было，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Март 1953-Февраль 1956，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с.196，201.

② *Наумов* Хрущё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с.27；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第62–63页。

③ 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33-34；д.388，л.61-62，*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169-172。参见 *Наумов* Хрущё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с.27。

④ 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30-35，*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с.79，171-172，912；*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г.，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9，с.200.

的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做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斯大林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因此，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① 两天以后，斯大林的名字第一次从官方公开的政治语汇中消失了。在 2 月 3 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 75 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②

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在大会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了明确答案。2 月 9 日，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此前提交的一份长达 70 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令人震惊的还有如下统计数字：1935–1940 年，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苏联公民共有 1920635 人，其中被处决的有 688503 人，镇压主要集中在 1937–1938 年（逮捕 1548366 人，处决 681692 人）。大清洗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

---

① 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52-54，*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175-177. 参见 *Наумов* Хрущё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с.156-157。

② Правда，4 февраля 1956г..

部遭到了逮捕”，在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98人被逮捕并无一例外地被枪决，在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镇压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还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①

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波斯佩洛夫）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我们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②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和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关于个人崇拜，阿里斯

---

① АПРФ，ф.3，оп，24，д.489，л.23-91，*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185-230. 根据90年代初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披露的数字，1930–1953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和处罚的3778234人，其中处决了786098人。已经查出的被镇压者的坟场约有100个。见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第546页。关于在苏联遭到政治镇压的具体人数，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这恐怕与中国当年右派的人数统计一样，很难说得十分准确。不过，如果有人以为只要把受害者人数减少一些，就可以改变“大清洗”和斯大林罪行的性质，那实在是太可笑了。原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说得好：无论如何，斯大林杀死的共产党人比世界上所有法西斯独裁者所杀死的加起来还多，提醒这一点对当今斯大林分子是有益的。见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21页。

② АПРФ，ф.39，оп.3，д.120，л.115-116，转引自 *Наумов В.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 Хрущёв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с.157；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39，оп.3，д.120，л.115，116，转引自 *Наумов* Хрущё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с.27-28。

托夫的话很有哲理：斯大林时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萨布罗夫也指出，斯大林的问题“不是缺点”，“而是犯罪”。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①] 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②]

2月13日首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③] 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④] 这就是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直到大会召开了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政治镇压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⑤] 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

---

① 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56-62об，*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234-237.

② РГАНИ，ф.1，оп.2，д.182，л.1；ф.3，оп.10，д.223，л.25，*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238.

③ 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64-66；ф.1，оп.2，д.1，л.64，*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239-240.

④ РГАНИ，ф.2，оп.1，д.184，л.6-8，*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241-243.

⑤ АПРФ，ф.52，оп.1，д.169，л.1-28об，29-63，*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120-133，134-150. 参见 *Наумов В.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 Хрущёв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163-164。有学者认为，秘密报告是赫鲁晓夫私下秘密完成的（*Барсуков* Как создавался “закрытый доклад” Хрущёва），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做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这样出笼的。[②]

苏共二十大路线及其产生的过程告诉人们：第一，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绝不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时代前进的体现，社会发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要。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活动和社会趋向预示了改革的基础，包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内苏共新领导人的措施反映了变革的必要。因此，其理论前提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对斯大林的崇拜是苏联社会变革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并不是个人或小集团谋求权力的工具（尽管不排除在党内斗争中有人利用之），而是要以此为铺垫改变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平反历史冤案的社会浪潮不过是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机会。苏联要摆脱危机，必须破除个人崇拜的罗网。这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分歧只在于问题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第三，囿于认识能力和传统思想，二十大并没有从社会变革的层面提出改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任务，而仅限于政策性调整和某些具体措施的实施。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传统力量击败了政治对手，而他本人也受到传统势力的束缚。赫鲁晓夫并非要、也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第四，无论如何，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虽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毕竟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了。更准确地说，二十大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会。然而，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世界引起的反应却是复杂的，其命运也是难以预测的。

---

① 参见*Аксютин Ю.В., Пыжиков А.В.*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 Хрущёва XX съезду КПСС в свете нов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c.114；*Наумов В.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 Хрущёв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c.163-164；*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c.15。各种修改文本似乎尚未发表，但在关于二十大的文件汇编中收入了有关目录。见*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c.119。

② 据俄国学者考证，赫鲁晓夫做报告时有一些即席发挥的内容，在会后整理并传达的小册子里，只有少数保留了下来，同时还对引文做了技术性加工，基本上就是会前准备的和目前人们看到的那个报告文本。*Аксютин Ю.В., Пыжиков А.В.*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 Хрущёва XX съезду КПСС в свете нов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c.116；*Наумов В.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 Хрущёв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c.165-166.

三、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时，中共就提出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①]这种看法直到今天仍然为很多研究者所坚持，他们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②]如果说中共当时出于政治目的提出这样的看法尚可理解的话，那么现在的历史研究者还保持这种观点就多少有些令人可笑了——作为学者，对于基本的史实岂能视而不见。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提出的新方针与中国当时的国内外政策究竟有多少区别？二十大路线与中共八大路线到底有多大分歧？

首先是和平过渡问题。对于二十大的提法，毛泽东心里显然是不满意的，因为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共自认为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得意之作，是中共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的宝贵经验。[③]但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都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④]因此，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线”在中共高层是得到了广泛共鸣的。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在2月21日外交部部务会议上指出，“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多样性，是已经存在着的现实。例如，应该容许南斯拉夫采取自己的过渡方式。至于通过议会斗争是否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能说一定不能。在理论问题上，要打破教条主义对我们的束缚，理论要用实践来检验，不能认为斯大林讲过的话就不能修改。”“在党内生活中强调集体领导是对的。斯大林的功绩不能否认，也没有否认；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缺点的，集体领导不够，会造成许多不良后

① 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55–56页。

② 如见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9–240页。

③ 这里有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删去《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二两节。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复信同意了英共的意见。毛泽东在审阅复信时指出，中宣部和英共都犯了错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30–532页）。值得注意的是，被删去的两节文字所论述的核心思想恰恰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06–512页。

④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应该注意到，苏联强调的是全面缓和，而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更注重的是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相处。

果。”[1] 周恩来也多次谈到和平共处的问题。如在 3 月 4 日是一次专业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说：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建设。国际紧张局势更会趋向于和缓。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当世界形势发生这样大变化，和平更加为全世界人民掌握了，战争是可以制止的。正是为了争取和平，制止战争，就更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利用有利于和平建设的条件，加快加紧地建设，包括国防建设。在 5 月 3 日国务院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又说，在国际关系上，“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2] 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又以“促进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等为题，连续刊登文章和消息。[3] 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自然不便提出反对和平过渡的意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个人内心的不满是有的，但中苏之间的政策性分歧是不存在的。直到 1957 年底的莫斯科会议，中共才有分寸地提出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意见。[4]

至于国内经济方针，毛泽东当时对“以苏为鉴”思考的集大成者就是他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 如果把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布尔加宁的六五计划报告与毛泽东的论述逐条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改变工业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经济措施，中苏之间没有任何分歧。苏联使驻华馆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分析后做出的评论是有根据的：在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强调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福利和进一步发扬民主问题等方面。[6] 当然，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的思考，在这方面都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模式，都没有从改变或改革制度的层面思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①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年，第 1013 页；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年，第 63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554、579、648 页；中卷，第 84–85 页；《党的文献》1993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③ 《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2 日、7 日。

④ 关于中共在莫斯科会议提出《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的情况，参见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10–11 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 744 页。俄国档案见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28-28об.，*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с.280-281，1022。

⑤ 该报告当时只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1965 年底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党委。1975 年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再次整理成文，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1976 年 12 月 26 日公开发表，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汪裕尧执笔：《关于〈论十大关系〉的产生、整理和发表》，《文献和研究》1982 年第 8 期，第 18–19 页。

⑥ 1956 年 8 月 22 日利哈乔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ф.5，оп.28，д.407，р.5174，л.129-147。

问题。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中国的经验看，否定斯大林模式必须过两道关口，即经济体制的市场关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关，而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当时的思考都在这两道关口面前止步了。中国经济建设采用的做法都是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战后恢复时期苏联的经验，所以毛泽东认为需要引为借鉴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这正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已经考虑并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的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1956 年毛泽东所谓的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从本质上讲还是没有摆脱斯大林所指引的苏联道路，只是中国要通过采用那些适合自己国情的方法比苏联走得更快些。再者，同苏共领导人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模式的原则没有错，只是方法有问题。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共八大继续探索而产生的思想火花，很轻易地就在突然爆发的波匈事件和反右派运动中熄灭了。总之可以说，在二十大路线提出的初期，中苏两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何谈“根本的分歧”乃至“严重的分裂”？

问题似乎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的确形成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冲击波。但是要说到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事情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对二十大做出反应的当然是出席大会的苏联代表，反应最强烈的当然是斯大林问题。据会议参加者证明，如往常一样，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受到普遍赞同，人们继续对党歌功颂德。但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在大会讨论的过程中，除潘克拉托娃外，米高扬关于个人崇拜的发言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还在会议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某地方组织负责人就发来电报称：“我不同意米高扬的右倾讲话，这一讲话是对活在整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辉形象的一种亵渎，并且将会为整个资产阶级所欣然接受。”[①] 人们做出如此反应，显然是不了解米高扬发言的背景。因此，当赫鲁晓夫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宣读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意外和震惊，会场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②] 这种局面本该使苏共领导人意识到处理斯大林问题应当特别慎重，但苏共中央的做法却是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外，不断扩大秘密报告传播的范围，以至最后引火烧身。

在 1956 年 2 月 19 日赫鲁晓夫对报告的补充提纲中，强调指出的是，关于个人

---

① ЦХСД，ф.1，оп.2，д.81，л.228，转引自 *Наумов В.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 Хрущёв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с.147。

②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с.113-114；*Пыжиков*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с.48.

崇拜问题不能超出党的代表大会的范围。[①] 但是在2月25日的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便把知情者的范围扩大到会议代表之外："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上报纸"。[②] 主持人布尔加宁在大会通过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后再次强调，目前还不公布报告和决议，但"这些材料将寄发给各级党组织"。这个建议也被一致通过。[③] 不久，范围又扩大到党外。3月5日主席团的决议"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无党派积极分子"了解报告的内容，并决定取消下发材料上的"绝密"标志。[④]3月7日，根据主席团的决议，将赫鲁晓夫于3月1日提交给主席团的、经过校订的报告文本寄发给了各级党组织。[⑤] 据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报告，"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是很快的，到3月20日左右就普遍传达到了基层组织"，而各种流言传播得更快。[⑥] 或许像俄国学者估计的，最初莫斯科希望对国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⑦] 但无论如何这个界限很快就取消了。3月24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建议，在各民主国家，可以向党团中央及各地区和部门主管干部介绍秘密报告。[⑧]3月28日，联络部又建议，向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各民主国家兄弟党的党员和预备党员介绍和宣讲秘密报告。[⑨] 主席团则做出决议：向16名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活动家介绍《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⑩] 就在3月28日这一天，《真理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为什么个人崇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格格不入？》，第一次正式地指出所谓批判个人崇拜，就是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⑪] 于是，秘密报告不再秘

---

① АПРФ，ф.52，оп.1，д.196，л.29-63，*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134-150.

②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第259页。

③ РГАНИ，ф.1，оп.2，д.17，л.89-90，*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250-251.

④ РГАНИ，ф.3，оп.14，д.4，л.66，*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253.

⑤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43-44.

⑥ 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01。

⑦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18.

⑧ РГАНИ，ф.5，оп.28，д.381，л.81-82，*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646-647.

⑨ РГАНИ，ф.5，оп.28，д.381，л.83-83об，*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654-655.

⑩ РГАНИ，ф.3，оп.14，д.12，л.71、118，*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253-254.

⑪ 《人民日报》1956年3月30日。

密，斯大林问题的冲击波在秘密报告那颗炸弹爆炸后一个月产生了最大的震荡力。

几乎没有人怀疑，积极推动将斯大林问题从党内高层扩展到基层和一般民众乃至国外的，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本人。[①] 赫鲁晓夫的目的，究竟是想以此打击政治对手，为个人争夺统治地位，[②] 还是要排除保守派的干扰，为进一步改变传统政策打开通道，亦或纯粹为形势所迫而身不由己，[③] 这些都只能是研究者的推断。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斯大林问题如此迅速而无限制地扩散和传播，用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是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还要按照斯大林指引的方向走下去？[④] 不过，从现实的角度观察，苏共的做法也确实造成了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思想混乱，其结果反而给继续推行改革政策和非斯大林化方针带来了诸多困难和阻力。

受到最大冲击的自然是苏联社会本身。目前披露的丰富档案文献显示，在广泛的讨论中，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和意见，有些是十分尖锐和激烈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身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国家的罪人”，“没有资格葬在列宁墓里”。更极端的意见认为，30 年来的苏联社会是“高度独裁的专制国家”，还不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甚至有人提出应取缔苏联共产党，烧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著作。[⑤] 但更多的人认为，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斯大林一个人“是不公平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将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⑥] 尽管观察者和研究者对当时苏联社会的主流倾向

---

①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郭家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第 97–99 页；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赵敏善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第 44–45 页。

② 参见 *Наумов* Хрущё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c.30-31。

③ 关于国内外共产党员强烈要求知道内情的材料，参见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c.20-21，623-624；*ПыжиковА.*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c.60。

④ 无论是在苏共党内还是年轻的一代中，新的思潮和不同政见就是从此开始出现的。详见 *Пыжиков*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в годы “оттепели”；Истоки 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а：Молодёжь после XX съезда КПСС；*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c.8-9。

⑤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c.114-118；*Пыжиков А.* XX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0，№8，c.78-81. 第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托洛茨基的亲属致信苏共二十大主席团，请求为托洛茨基及其他在 20 年代受到镇压的反对派成员恢复名誉。РГАНИ，ф.1，оп.2，д.14，л.48，68，*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c.609，610.

⑥ *Пыжиков*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c.60；*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c.559-573；*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c.119.

有不同的判断，但明显的是，斯大林问题在如此广泛的层面展开讨论，其结果的主要特征就是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1]这一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3月7–9日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发生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在这次布尔什维克掌权以来发生的最大一次自发性示威游行中，对批判斯大林强烈不满的人群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大批人被判处1–10年的徒刑。[2]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反应同样十分强烈。在刚刚被纳入阵营的南斯拉夫可以听到一派赞扬声，而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却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东欧各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迫不及待地公开发表文章赞扬和吹捧苏共的新精神，阿尔巴尼亚表面上赞同二十大而在私下则表示了不满和否定的倾向，在波兰和匈牙利是改革派受到鼓舞而保守派垂头丧气，其他几个国家则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3]至于亚洲国家各党，则采取了比较保守的做法，如在朝鲜、越南和印尼共产党内，都严格限制了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和讨论。[4]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当时的心情很具代表性，她回忆说：得知苏联领导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后，我们感到异常压抑和沉重，似乎还是茫然无知好些。[5]究其原因，关键的问题

---

①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ХХ съезде КПСС，c.119；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01；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41页。

② 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档案资料见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Документы，c.929-930；*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ХХ съезде КПСС，c.257-265；*Наумов* Хрущё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c.33。由于事发突然，3月7日到达第比利斯访问的朱德也不得不取消原定计划，提前离开。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8–19页。

③ 详细材料见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ХХ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c.22，28-29，31-32，611-612，613-621，625，704-705；*Орехов А.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c.222-224；*Мусатов В.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1，c.4-6；*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c.242-248；*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c.28-30，35-40，85-87；*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Хрущёв，Й.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2，c. 12，以及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3月16日，第54期，第223页；1956年3月20日，第58期，第340–341页；1956年3月21日，第59期，第426–427页；1956年5月8日，第117期，第494–497页。

④ 1956年4月27日苏驻越大使齐米亚宁与越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阮维清谈话记录，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79，оп.11，п.13，д.5，л.84-95；*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ХХ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c.27，30。

⑤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ХХ съезде КПСС，c.114.

不在于斯大林问题的提出，而是提出问题的方式。对这一点，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当时的观察和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①] 恐怕这才是造成混乱局面的主要根源。[②]

总之，苏共二十大所面临的局面是，长期以来的残酷镇压手段和疯狂造神运动已经使斯大林成为真理和理想的化身，如果不解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任何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更不用说要改变斯大林体制和模式了。但正是因为个人崇拜的病毒已经渗透到苏联社会的骨髓和细胞，所以任何细小的手术都必须谨慎从事，否则就会引起整个功能紊乱。这种混乱的局面，加上舆论压力和党内本来就存在的意见分歧，苏共在召开二十大后不久便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方针，放慢甚至停止了解冻的步伐。4 月 5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解散了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室的党组织，将部分党员开除出党，并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其理由是在党的会议上有人对二十大总结报告进行恶意攻击，声称苏联社会是不民主的社会，而该党组织不仅没有奋起谴责这些言论，甚至还为部分发言者鼓掌。[③] 同时，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党的领导人不断发表讲话，批评各种“打着谴责个人崇拜的旗号企图怀疑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人。[④] 为政治镇压牺牲者平反的工作也受到极大限制，不仅拒绝重新审理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的政治案件，甚至对许多在 30 年代大清洗中蒙受冤屈的人，虽然给予法律上的平反，却没有恢复他们的党籍，因为他们曾经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⑤]6 月 30 日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虽然保留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观点，但口气已经缓和了许多，并特意强调“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中做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是从苏维埃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

---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4 月 8 日，第 1861 期，第 385–390 页。

② 周恩来在 7 月 8 日接见南斯拉夫大使 V. 波波维奇时曾表示过这样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认为，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着想，把这个问题放在党内解决更为有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第 596–597 页。

③ РГАНИ，ф.3，оп.14，д.13，л.20，76-79，*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288-290；*Наумов* Хрущё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с.31.

④ *Пыжиков А.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в годы хрущё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с.52.

⑤ *Наумов* Хрущё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с.31.

就是严重的错误"。[①] 接着，很多人因发表了超出二十大规定的讨论范围的言论而被扣上反苏反共的罪名关进监狱。[②] 笔者对 50 年代由苏联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反苏鼓动和宣传案件"的数量进行统计和对比的结果，特别能说明问题。1953 年是最高峰，为 1229 件，1954 年就猛降到 151 件，1955 年为 71 件，1956 年反而有所上升（93 件），到 1957 年又猛增到 1056 件。[③] 难怪有人认为，"到 1956 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旧的轨道上去了"。[④]

与苏联相比，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立场也就有很大的区别。总体的曲线是，苏共在二十大提出的非斯大林化方针并不坚定，而且在党内外的压力下日益趋向保守，直到 1961 年 10 月的苏共二十二大才真正开始推行非斯大林化运动。中共立场的变化历程恰好相反，一开始基本上是赞同二十大的路线，波匈事件后有了新的思考，到 1960 年与苏联分歧公开化以后，才提出了一整套与苏共二十大对立的方针政策。无论如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并非像后来中苏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二十大召开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则详细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米高扬发言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 30 年代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消息，[⑤] 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通过《内部参考》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甚至有人怀疑是翻译时出现了错误。议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议会道路等一些理论问题上，普遍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给予明确解释和指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4 月上旬。[⑥]

---

① РГАНИ，ф.3，оп.14，д.39，л1，30-34，*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352-368，中译文见《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6 日。

② 详见 *Пыжиков А.* XX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с.82。

③ 1958 年以后则迅速下降。*Козлова В.А. и Мироненко С.В. (пот. ред.)* Надзор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по делам 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агитаций и пропаганде，март 1953-1991，Москва：МФД，1999.

④ 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 54–62 页。

⑤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2 月 20 日，第 29 期，第 177–179、184–188、190–195、195–197、200–202 页。

⑥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2 月 25 日至 4 月 4 日各期。

实际上，对于苏共在斯大林评价方面发生变化的迹象，中共中央早就有所感觉和了解，并且持一种认同的态度。[①] 苏共也并非有意在斯大林问题对中国搞"突然袭击"。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地位不断提高，赫鲁晓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特别重视发展与中共的关系。还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苏联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人不仅分别会见中共代表团，而且还暗示要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如 2 月 6 日赫鲁晓夫接见朱德和刘晓时，就大谈斯大林在农业问题上的错误。代表团急电请示中共中央，是否出席批判斯大林的会议。接到中央"照常参加"的电示后，代表团经研究一致决定，对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政策。[②] 很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朱德在大会发表的贺词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他代读的毛泽东的贺词则提到苏共是"斯大林及其亲密的战友所共同培育的"。[③] 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 19 日宴会上又主动表示，会后将同中共代表团谈斯大林问题。中共代表团确定的方针是"对斯大林的功过不表示意见"，但同意"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④] 于是，2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明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不过，社论没有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也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⑤]

关于中共中央何时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情况，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⑥] 这显然不对。吴冷西说，26 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 3 月 10 日《纽约时报》

---

①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第 484–485 页。不仅毛泽东本人提出了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甚至中共中央早于苏联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作用和个人崇拜的问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第 192、407、473、528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129 页。

②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 17 页。赵仲元：《1956 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中共党史资料》2004 年第 2 期，第 86–87 页。师哲也回忆了一些赫鲁晓夫在会前的谈话内容。参见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595 页。另见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年，第 87 页。

③ 《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9 日。

④ 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430 页。

⑤ 《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19 日。

⑥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 87 页。

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①]这里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才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所以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消息。李、吴对研究中苏关系无疑是重要的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据朱德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B. N. 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②]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③]不过，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共印制30份）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要求是“离开莫斯科之前应该将材料交回”。[④]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反复强调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⑤]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⑥]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⑦]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② 赵仲元：《1956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第89页。回忆中谈到所谓波兰代表团的贝鲁特和匈牙利代表团的拉科西出席了秘密会议，只是传言，没有得到证实。

③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9，№1，с.11-12.

④ РГАНИ，ф.1，оп.2，д.18，л.116，*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252-253，42.

⑤ 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第430页；赵仲元：《1956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第89页。

⑥ РГАНИ，ф.1，оп.2，д.18，л.188，190-210，*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43-44.

⑦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5页。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备忘录，ЦХСД，ф.5，оп.30，д.163，л.88-89//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01-111。刘晓的回忆也说，苏共中央把秘密报告复本分送给各兄弟党，也送了一份给中共代表团，还特地给他送了一份，封面印上了刘晓的名字。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4页。

可以烧掉。[①] 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一份秘密报告文本。[②] 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报告文本。不过，中共中央并没有及时做出任何公开反应，也没有在内部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在3月10日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汇报外国报刊对二十大反应情况的报告中，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态度只是一些猜测。[③] 甚至那些密切注意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问题如何反应的美国专家也是一无所获。[④]

不仅如此，中共反而在得到报告文本后，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照本宣科地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随《参考资料》发放。同时，《参考消息》上也大量刊登各国对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李慎之的印象是，看来毛泽东"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漏出去"。[⑤] 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的一种心态：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关于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由于目前中国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研究者所能利用的主要是吴冷西的回忆录——党内讨论，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公开表态，以及俄国的档案文献——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数次谈话。

---

① 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第431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72页。有人以为是米高扬正式将秘密报告带给中共中央的（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第242页），实在是不了解情况。

③ РГАНИ，ф.5，оп.30，д.138，л.107-124，*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613-621.

④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3月20日，第58期，第320–322页。

⑤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第4–5页；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页。据韦君宜回忆，她本人就听过两次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传达。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25–26页。

中共高层对苏共二十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3月11–1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①]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破题"定了调子，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所谓揭盖子，就是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思考和办事了。所谓捅娄子，就是指苏共对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人物"进行批判，事前没有同其他各国党商量，搞"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毛泽东还提到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展开讲。在3月19日和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主要谈论的是斯大林在各个时期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和刘少奇，详细讲述了斯大林在对待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邓小平主要谈批判个人崇拜问题，并强调指出，"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还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无古人，错误是难免的。会议决定，面对国际风浪，中共应该表态，以支持二十大的姿态，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4月4日毛泽东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即将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强调指出，从苏共反斯大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②]

所谓公开表态，就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③]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的局面，表明中共的观点和立场，扭转一些兄弟党悲观失望的情绪，而这个任务本来应该由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联党来完成。[④]另一方面是用中共中央对于斯大林问题的"全面分析"来教育和指导中国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解除他们中间的种种疑问和揣测。[⑤]看来，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历史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苏联共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1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3–24页。

③ 见《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毛泽东的修改部分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9–67页。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19–20页。

⑤ 文章发表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便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立即在党团员中和党外人士中，广泛地进行切实的学习和讨论，并且随时将学习的情形和讨论中的问题报告中央宣传部"。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00，第43–46张。

产党提出但无法自己解决的。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便对斯大林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文章突出强调的有以下几点：一、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个人崇拜的错误在所难免。二、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是说，斯大林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而是思想认识问题。三、“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四、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是说，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是需要分析和鉴别的。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层。但是，很多人过分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苏共方针的区别，这是显然是有误会的。苏共中央在6月30日的决议中，特意引证这篇文章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真理报》出版社还将该文全文进行准确校对后，印成小册子，发行了20万册。[①]

如果说在报纸上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则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在3月31日与尤金进行的3个小时“情绪极佳”的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虽然在原则上承认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就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言，几乎没有正确的地方。毛泽东指出，“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服从国民党。后来，斯大林只相信王明的话，给中

① 《人民日报》1956年7月6日。

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在抗日战争中，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搞投降主义活动。共产国际只是在最后一段不长的工作时期才转变了看法，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季米特洛夫的功劳。毛泽东特别讲到，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仍然错误地估计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坚持主张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此，斯大林以“俄共（布)”名义发来秘密电报，坚决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却怀疑中国的革命力量，坚决主张同蒋介石讲和。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以后，斯大林对中共仍然持不信任的态度。毛泽东带有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接着，毛泽东又大谈他在莫斯科的遭遇，强烈批评斯大林对中国所犯的大国主义错误。同样，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但对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错误没有任何否定意见，反而对其进行了总结，并归纳为7个问题。看过以上记录，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①]4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会见来访的米高扬，苏联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签订苏联援助中国再建55项重点工程的协定。会见中，米高扬通报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有关情况。毛泽东感谢苏联的援助，并表示也将一如既往地尽力支持苏联。谈到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②]在5月2日与尤金的轻松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首先表示欢迎和完全赞同苏联对英国采取的缓和立场，而“过去错误地把英国同美国一样看待，把英国也看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敌人”。接着，毛泽东又指出了斯大林在中国和印度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毛泽东还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

---

① ЦХСД，ф.5，оп.30，д.163，л.88-89.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01-111.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3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63页。

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毛泽东又一次说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犯过许多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只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说到中苏两党的看法，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①]

在苏联人看来，直到是年9月召开八大，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总体上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讲到：苏共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所作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八大政治报告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③]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④]

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对于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倾向，毛泽东是心花怒放、举双手赞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在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长期以来指挥和训导中国共产党，怀疑和压制毛泽东本人，现在这个“盖子”被苏联人自己搬开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终于有机会一吐积压心中多年的怨气了。[⑤]按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⑥]毛泽东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⑦]的确，

---

①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0，д.9，л.124-130.

② *Василий Сидихмено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Новое Время，1993，№2-3，c.38-39.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204、138页。

④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2页。

⑤ 米高扬与毛泽东谈话后就有这种感觉。见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46页。

⑥ 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609–612页。

⑦ 1957年10月29日尤金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АПРФ，ф.3，оп.65，д.589，л.173-179。

毛泽东不仅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在苏联人面前，而且反复向中共广大干部数落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罪状"，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加深了对批判斯大林的理解。中共党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不仅苏联人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满腹怨言。[①] 第二，在建设问题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榜样，特别是对于毫无管理国家经验的中共来说，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苏联有的，中国也应该有，苏联没有的，中国也不能有，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②] 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的做法正确与否，而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总是屈居莫斯科门下。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咒"也被苏共自己解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③] 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不仅在革命问题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也会走到苏联的前面。因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非斯大林化倾向无疑是为中共打开了通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宝座的大门，毛泽东没有理由不暗自高兴。[④]

其次，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也确有不满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有关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如上所述，毛泽东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原则上和方法上都是错误的"。所谓"原则上"的错误，就是说不能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后来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⑤] 说到底，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和未来世界革命的领袖，是需要个人崇拜的。但是，当苏联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时，中国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很自然就联想到国内问题。河北省机关党员干部提出，"要说过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⑥] 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⑦] 广

① 黎之：《文坛风云录》，第 54–56 页；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第 25–26 页。

② 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如 1958 年 3 月在成都会议的讲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65–371 页。

③ 在一次讨论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不无兴奋地说："这个报告（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者）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第 25–26 页。

④ 斯大林逝世的讣告广播后不久，苏共中央工作人员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曾听一位在中国党内地位很高的干部说："鉴于斯大林的逝世，国际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就应当是毛泽东了。"*Василий Сидихмено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c.38.

⑤ 毛泽东 1958 年 3 月 10 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吉林省档案馆，1/1-14/68，第 6-16 张。

⑥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3 月 7 日，第 45 期，第 55–56 页。

⑦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2 月 28 日，第 37 期，第 293–295 页。

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①]鞍山市干部、职工讨论时有人说：“什么是个人崇拜？中国对毛主席来说是否也是个人崇拜呢？”[②]湖南高等学校教师则直接提出了中国党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的问题。[③]在4月5日中共中央的文章公开发表以后，黑龙江省机关干部中还有些人提出：歌颂毛主席的东方红民歌，在农业合作化中提出的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以及以前讲的在毛泽东时代、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毛主席万岁等等，是否算个人崇拜？[④]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⑤]看到这些材料，不由得毛泽东不考虑。[⑥]于是，毛泽东在10月31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时指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⑦]显然，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可以的，但不能在一般意义上否定个人崇拜。所谓“方法上”的错误，并不是指苏共过早地提出了斯大林问题，主要也不是说传达个人崇拜问题的范围过于扩大了，而是指责苏共中央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没有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同意。关于这个问题，最早是朱德在莫斯科时向陪同他的苏共中央工作人员指出的，后来苏联驻中国外交官也听到了类似的指责。[⑧]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苏共中央采取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使各国共产党没有做好准备，才引起了社会

---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3月13日，第51期，第150–151页。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3月20日，第58号，第369–370页。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3月23日，第61期，第557–558页。

④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4月10日，第80期，第221–222页。

⑤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4月18日，第87期，第394–396页。

⑥ 或许正是担心这种情绪汇入整个共产党世界的迷惘和混乱当中，中共中央在4月12日专门发出通知，禁止主动与外国人谈斯大林问题，即使被问到，也“应避免深谈多谈”，“支吾过去”。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01。

⑦ 1956年10月31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夫的谈话，转引自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⑧ *Василий Сидихмено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с.38；РГАНИ，ф.5，оп.28，д.409，л.108；оп.49，д.128，л.36，*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с.27-28.

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此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从道德层面上提出了问题，批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①] 重庆市机关干部讨论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否共产党内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马、恩死后，有考茨基等人歪曲，列宁死后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起而反攻，斯大林才死不久，又受到米高扬等人的攻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的人说：“人生在世叫万岁，死后就把一切都否定了，实在令人寒心”。[②] 这或许也是引起毛泽东担忧的一个问题。至于中共一再强调的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不能“一棍子”打死云云，在当时多少有些无的放失，因为无论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3月28日的《真理报》文章，以及6月30日苏共中央的决议，都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意思。

最后，既然苏共二十大路线与中共的主张没有根本性的分歧，那么就可以断定，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并没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严重分裂，反而更加紧密。实际情况是，从此后发生的波匈事件、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清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乃至1958年上半年的种种合作情况看，中苏关系仍然处于蜜月时期。[③] 当然，中苏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分歧。如果谈到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利影响，应该强调的是，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无疑是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紧随苏联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中共固然不如苏共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就领袖魅力而言，赫鲁晓夫则完全不能同毛泽东相比。至少在中共眼中，斯大林倒下了，站起来的应该是毛泽东！从历史过程来看，导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种子大概埋藏在这里。

发表于《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2004年冬季号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02页。毛泽东后来又说，“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叫“缺乏革命道德”。《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页。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3月9日，第47期，第81–83页。

③ 参见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31–264页。有关中苏在波匈事件中合作的情况，参见笔者提交2004年6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波匈事件与中国——中国在处理1956年危机中的角色和影响》。

援助和限制：
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1949–1960）

有关核问题的历史——包括各大国核技术的发展、核政策和核战略的演变以及核军备控制和禁止核试验谈判等，无疑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要讨论的是其中一个侧面：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①]所采取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可以从苏联的核政策、中国的核发展以及中苏关系的变化三个角度来考察。在近年冷战史的新研究中，由于俄国档案的开放，有关苏联核历史的论著有了明显增加，并占有突出的地位。[②]不过，其中很少谈到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和态度。[③]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有关中国核武器发展史的论著和回忆录发表了不少，但主要篇幅都是讲中国如何在苏联撕毁协定后自力更生试制了原子弹，

---

① 本文使用的核武器的概念，包括了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导弹（亦称火箭、飞弹），当时在中国也称为尖端武器或国防新技术，俗称“两弹”。

②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Yuri Smirnov，Vladislav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 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CWIHP Bulletin*，1994，No.4，pp.14-18；David 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 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56)*，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Mark Kramer，“Documenting the Early Soviet Nuclear Weapons Program”，*CWIHP Bulletin*，1995/96，No.6-7，pp.266-271；John Gaddis et al.（eds.），*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since 194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③ 笔者所见，只有一篇论文专门讨论苏联核政策中的对华援助问题（Viktor M. 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Vol.12，No.4，December 1999，pp.1-53），其中使用了一些最新的俄国档案资料及口述史料。有一本讨论苏联在华军事专家的俄文著作，也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见 *Зазерская Т.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 год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НИИХ СПБГУ，2000。

而较少论及在此之前苏联是如何帮助中国的。[①] 在中苏关系研究中，专门讨论核武器问题的论著也不多见。[②] 这样，就为本文留下了一些研究空间。

本文使用的材料，除了中国的公开出版物外，主要是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文件及双方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在研读这些史料的基础上，笔者拟考察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对中国的政策，其形成的基础和变化的原因，以及在此条件下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进展。

一、赫鲁晓夫开启了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

斯大林或许没有想到，还在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中共就知道莫斯科已经掌握了核技术，甚至提出参观苏联的核设施。当刘少奇在1949年8月秘密访苏期间提出的这一要求时，斯大林拒绝了。不过，作为补偿，苏联人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③] 由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在8月29日，[④] 而那时刘少奇已经离开了莫斯科，所以正像有些学者怀疑的，中共代表团看到的并非像他们理解的那样是有关苏联核试验的影片。[⑤] 斯大林这样做，可能是在应付中国人——他不知道即将开始的试验是否能够成功，也可能是对毛泽东的动机有所怀疑——中国人是否也想拥有原子弹。

---

① 最重要的有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三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研究中国核问题的英文论著不计其数，在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当属刘易斯和薛理泰的专著（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其中一节简要论述了中苏核关系。但现在看来，其材料已显陈旧。

② 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可见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76–85页；第5期，第62–72页。该文第一次将中国发展核武器与苏联的关系做了比较完整的描述和客观的分析，但缺陷是只依据中方的史料，故对有些并非不重要的问题语焉不详。

③ Sergei Goncharov，John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71；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10页。

④ 关于苏联第一次核爆试验的情形参见*Симонов*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структура，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6，c.224-225；David 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 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56)*，pp.213-219.

⑤ Sergei Goncharov，John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p.71. 后来俄国的核武器专家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见Viktor M. 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p.3。

确实，中共很早就对这种新式武器产生了兴趣。尽管毛泽东在 1946 年 8 月宣称原子弹是“纸老虎”，[①] 但有资料说，与此同时，中共安全部门负责人康生已开始招募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②]1949 年 2 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郭沫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将于 4 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物理学家钱三强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实验室。钱三强向有关方面提出：想借此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一些有关原子能研究的设备、仪器和图书资料等，预算需要 20 万美元。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同意，周恩来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约见钱三强，进一步表明支持的态度，转告他说：“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③]

苏联拥有原子弹对中共是一种鼓励。当 1950 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炫耀性地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斯大林这样做，无非是想让毛泽东了解核武器的威力，并表示苏联有能力为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供核保护。苏联外交部在起草中苏同盟条约（第二稿）时，有意地、暗示性地提到，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④] 毛泽东对原子弹的威力的确有了感性认识，但他想到的却不是依赖苏联的核保护。回国后，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⑤]

---

① 毛泽东的这一著名论断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年，第 1135–1136 页）。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表示了这种看法。1945 年 8 月 9 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中共《解放日报》在同日刊登这条消息时，称其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毛泽东对如此宣传美国的原子弹感到不悦，便召集胡乔木等宣传干部谈话，教育他们“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年）》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616–617 页。

② 林中斌：《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刘戟锋等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 年，第 178 页。

③ 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党的文献》1994 年第 3 期，第 28 页；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p.36。

④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7，оп.23а，п.18，д.235，л.16-19. 双方最后签字的文本用语与此相同（《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有学者认为，这一保证的条款，即“尽其全力”，是周恩来提出的，并且是在经过激烈争吵后，苏方才被迫同意的（Viktor M. 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p.5）。这种说法不对，因为前引内容出现在苏联外交部 1 月 9 日起草的条约第二稿草案中，而那时周恩来还未启程来莫斯科。

⑤ 叶子龙口述：《叶子龙回忆录》，温卫东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185–186 页。

然而，莫斯科可以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核保护，[①]却并不希望他们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在1952年底，即以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院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报告。在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的活动安排时，涅斯梅亚诺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②]鉴于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第一总局正在领导着原子能利用的科学研究工作、铀加工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③]，这一建议足以表明，苏联此时尚无意向中国透露原子能的秘密。果然，1953年3月，经周恩来出面联系，苏联虽同意让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以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参观被列为保密范围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但实际上，代表团“只接触到了几名完全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科研人员”。当钱三强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时，苏方含糊地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④]中苏双方当时为此是否有所接触，尚不得而知。不过，没有技术来源，国家财力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6）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⑤]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并一再讨好毛泽东。[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次提出了研制核武器的问题。据周恩来秘书的回忆，早在1952年分别与科学家竺可桢和地质学家李四光的谈话中，周恩来就感到，发展原子能科学，必须要苏

① 俄国军方档案中记载，在朝鲜战争最危急的时候，即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以后，苏军总参谋部制定的四个可供选择的预案之一就是动用核武器对抗美军。见 Viktor M. 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pp.7-8。

② 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30，д.7，л.18-20，转引自*Зазерская Т.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 годы），с.110。

③ 参见*Симонов*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структура，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с.215-216。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90页；维克托·乌索夫（*В. Усов*）：《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俄）《新闻时报》2003年8月6日。笔者是在国际互联网中文网站（http://www.scol.com.cn）上看到此文的，俄文网站（www.news2.ru/）已经检索不到2003年的内容了。另见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第29页；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58页。

⑤ 笔者2001年6–8月采访王亚志的记录。王亚志在50–60年代曾任彭德怀的参谋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⑥ 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76–195页。

联的帮助。[①]1954年4月22日国家计委第二机械工业计划局局长孙泱等致信李富春、贾拓夫，并随信附上钱三强关于原子武器的原理、性能、制造条件等问题的报告。信中建议，加强对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政治领导，同时开始准备技术力量；把铀及石墨的勘探提到工作日程；在适当时机，提出国际技术援助的要求，尽可能争取在二五计划着手建立原子反应堆。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是值得考虑的，这几年的准备工作也是需要的"。[②]于是，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问中方还有什么要求时，毛泽东趁机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准备，稍做迟疑后，他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不过，赫鲁晓夫最后答应，可以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③]

赫鲁晓夫的这个最初反应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的既定政策是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而不提供核技术。核工业体系是一条门类繁多又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也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科技系统，特别是核武器装料的提取，十分艰难和昂贵。原子弹有铀弹和钚弹两种，对核装料都有很高的要求，铀-235的纯度要求在90%以上，钚-239的纯度要求在93%以上；天然铀含有铀-235、铀-238和铀-234三种同位素，铀-235只占其中的0.711%；铀属于稀有矿种，而一般说来，含铀量在0.05%以上的矿藏才有开采价值；从含铀量0.05%的矿石到用作原子弹核装料丰度在90%以上的铀-235，是一个需要经过多道工序进行生产加工的复杂过程：首先把矿石破碎、磨细，用化学方法萃取、提纯并精制为二氧化铀，然后两度转化为四氟化铀和六氟化铀，再用物理方法进行铀-235和铀-238的同位素分离，生产富集

① 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第657–65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8–219页。

③ 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572–57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78页。关于建立核反应堆的提议，这两本书的说法不同，前者说是赫鲁晓夫当时主动提出的，毛泽东答应考虑；后者说是毛泽东提出的，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看来需要有关档案解密才能知道细节。但无论如何，笔者不相信另一种说法：据苏联军方人士回忆说，在赫鲁晓夫拒绝中国的要求后，毛泽东坚持中国哪怕拥有一两枚原子弹也好，并以美国可能会在当时的台海危机中使用原子弹为理由（Viktor M. 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pp.20-21）。陪同赫鲁晓夫访华的《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尤金对他转述的谈话内容：赫鲁晓夫拒绝毛泽东的理由是：如果苏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美国就会向德国提供核援助。*Шепилов Д.Т.*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Т. Шепило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10，с.28.

的低浓铀 -235 和高浓铀 -235。军用高浓铀 -235 还要还原为金属铀，再按照原子弹设计的形状要求进行精密铸造和机械加工；用作原子弹核装料的钚 -239 的纯度要求也很高，必须在 93% 以上，杂质钚 -240 含量必须小于 7%。① 其提炼工序之繁多，成品提炼比例之微小，工厂设备之昂贵和技术难度之大，都是耗资巨大的因素。对此，苏联人当然是有体会的。② 赫鲁晓夫的建议，不能说没有道理，实际上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不过，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即当时美苏正在谈判防止核扩散问题。

实际上，早在苏联成功地进行核试验之前很久，美国就试图禁止核试验，从而垄断核武器。1946 年 6 月 14 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巴鲁克提出了一项由国际组织控制核试验的方案，史称“巴鲁克计划”，而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很快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苏联的方案。③ 从此，美苏之间开始了限制核武器发展的谈判和争吵。当苏联拥有核武器，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本人意识到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之后，莫斯科对防止核扩散的问题有了新的考虑。1954 年 4 月 1 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报告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等人关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看法：战后短短的几年，从原子弹到氢弹，从核裂变到核聚变，核武器的杀伤力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从而使核军备竞赛达到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核爆炸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过不了多少年，核爆炸的数量将

---

① 李鹰翔 2010 年 3 月 12 日给笔者的信。李鹰翔，原二机部办公厅主任，《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主编之一。

② 据俄国的解密档案，按当时价格计算，1947–1949 年苏联研制核武器的开支为 145 亿卢布，而在 1951–1955 年，仅用于原子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科研和试验设计单位的计划开支就有 648 亿卢布。（*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структура，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с.242–244.）而中国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仅 62.99 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89 年，第 107 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工业投资实际完成额也只有 250.26 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年，第 2 页]，按 1961 年的汇率计算，分别约合 22.5 亿和 56.4 亿卢布，远远低于苏联研制核武器的经费。

③ 参见 Larry Gerber，“The Baruch Pl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1982，Vol.6，No.1，pp.69-95；*Батюк В.* План Баруха и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ИВИ РАН，с.85-98。

足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成为不可能。[①]这对赫鲁晓夫无疑是一个震动，其结果推动了苏联与西方进行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谈判的步伐，到9月莫斯科的态度已经大有改变。[②]况且，此时由于中共军队进攻浙江沿海岛屿而出现的台湾海峡危机方兴未艾。在这个时候，中国提出想自己制造原子弹，并要苏联提供帮助，莫斯科当然不会答应。

不过，赫鲁晓夫毕竟有求于毛泽东，因此他比斯大林进了一步，答应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帮助中国，而这项工作开展的结果，无疑将为核武器研制奠定技术基础。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从物理学的角度可以说，原子弹是爆炸的反应堆，而反应堆则是不爆炸的原子弹，所不同的是，反应堆是控制能量缓慢地释放，用来产生动力，而原子弹则是在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从而形成爆炸。至少在中国人看来，这是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赫鲁晓夫回国后不久，10月23日，毛泽东便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兴致勃勃地谈起原子弹，并有意透露中国"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③]

莫斯科答应提供核技术帮助，的确令毛泽东兴奋不已。此前不久，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的迹象，经进一步勘探确定，在中国南方找到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④]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以及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所长钱三强的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向到会人员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⑤]很快，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便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第一

---

① TsKhSD，f.5，op.3，d.126，ll.39-41，转引自Y. Smirnov，V.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 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pp.14-15。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卡皮察的文章及其给赫鲁晓夫的信件（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65–488页）。

② 详见科拉尔·贝尔：《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云汀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65–17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7页。

④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11–12页。

⑤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13–14页；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pp.38-39。

次正式提出了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问题。[①]3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也提出："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美国的核恐怖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已经进入了开始研究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②]毛泽东终于向他梦寐以求的核大国迈出了第一步。

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关于在核能事业方面合作的具体谈判。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为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苏联将向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提供广泛的帮助，其中包括进行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设计，供给相关设备及必要数量的可分裂物质。中国为此欢欣鼓舞，1月31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③]作为核合作的内容之一，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个协定，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苏联提供技术和设备。开采的铀矿石，除满足中国本身的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④]

1955年4月2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苏联将在1955–19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6500–10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12.5–25MeV（百万电子

① 参见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562页。

② 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31日，《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16–19、13–14页。

③ 《新华月报》1955年2月28日，第53页；《人民日报》1955年1月28日第1版，2月1日第1版。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41页；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0页。关于铀矿勘探详见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2–23页；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pp.73-87。鉴于中国核能工业的发展对铀矿石的需求不断增大，本国开采的铀矿不仅无法向苏联提供，反而要从苏联进口相当的数量，1956年12月19日中苏重新签订了协议。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20页）的说法，即重新签订协议的建议是中方主动提出的，恐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修改1955年的协定是苏方于7月9日首先提出的，经周恩来批准，中方于7月13日答复同意。双方商定，铀矿勘探由中国自主经营，苏方的投资撤销，但专家继续留下工作，设备亦由苏联提供。见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年7月13日；中国外交部给苏联的备忘录，1956年8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51-01，第5–6、7–10页。由此看来，另一种说法，即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决定于苏联从中国取得了多少铀矿（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pp.61-62），也是毫无根据的。

伏特）的回旋加速器，还要无偿提供有关的科学技术资料，提供能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的数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①]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②]是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以索洛诺夫和阿里柯谢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③]12月，苏联主动派出以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院长诺维科夫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有7位科学家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周恩来及党政军各机关1400多名高级干部出席了报告会。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大使、在华总顾问及诺维科夫举行会谈，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④]

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各国的原子能和平利用，1956年3月20日，苏联召集人民民主国家代表在莫斯科讨论建立东方原子能研究院的问题，中国派遣刘杰、钱三强等人组成代表团参加会议。26日，以苏联为首的11个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决定》。[⑤]作为研究所的发起国，其建设费用和日常开销绝大部分由苏联（50%）和中国（20%）承担。这个位于莫斯科郊外小镇杜布纳的研究所，主要是进行核物理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建立仅半年，苏联就投资5.2亿多卢布，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同步回旋加速器（680MeV）及物理实验室。[⑥]

---

①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5日，第6版；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0页。

② 苏联高教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5年8月19日，ЦХСД, ф.4, оп.9, д.1347, p.571, л.121-123；苏共中央主席团第142号会议记录摘录，1955年8月22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第2552–2553页。

③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1950–1985）》，1987年，未刊，第15–1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29–530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9页。

⑥ Sergei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Odd Arne Westad（ed.），*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57；《人民日报》1956年9月22日，第5版；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0页。

研究所的章程规定，其“科研成果将分别寄送参与研究的各个会员国”。[①] 杜布纳研究所的建立，是苏联在核能研究方面向中国提供帮助的重要步骤，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人才的基础。几年后，中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处汇报说：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具有苏联较新、较高的科学技术设备，较完备科学情报（包括西方各国），也有些杰出的科学人材，科学技术条件也比苏联其他大学和研究机关全面。其主要研究方面包括高能物理实验、核结构、核反应、中子物理、理论物理等，并且正在进行多电核高能实验和最新的螺旋线式强聚焦回旋加速器的研究和设计。因此，建议国内有关部门多派专业技术人员去参加科研工作并从中学习。[②] 中国著名的核物理专家很多都在该所进行过研究，他们普遍感到收获很大。王淦昌说：“苏联同志很照顾我们，凡是我们不知道的，苏联同志都告诉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器材，也能尽先供应。”周光召说：除了苏联同志的热情帮助以外，这个研究所最使他感到满意的有三点：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气氛；时常展开自由争论；迅速吸收世界核子科学研究的成果。研究所所长德·布洛欣泽夫则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物理学家来参加工作和学习”。[③]

1956 年，苏联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4 月 7 日中苏签署的协议规定，将修建从哈萨克斯坦的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④] 其结果自然是方便了向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诺维科夫代表团回国后，中国便趁热打铁，向苏联提出核工业援助的要求，并很快得到苏方的支持。[⑤]8 月 17 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⑥]11 月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苏联领导人表现得极其热情，彭真甚至认为给予了破格接待，其理由之一就是，赫鲁晓夫专门邀请代表团全体人员到克里姆林宫，观看苏联原子弹、氢弹和导弹试验

---

① 联合原子能研究所章程（俄文），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52-01，第 4–31 页。

② 陈赓传编写组：《陈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第 510–511 页。

③ 《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18 日，第 5 版。王淦昌从 1956 年 9 月起一直在杜布纳研究所工作，1959 年 1 月担任该所副所长，1960 年 12 月回国，任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实验领域的工作。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 108、110 页；张开善：《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功勋科学家》，《中共党史资料》2006 年第 4 期，第 149 页。

④ 米高扬访华后发表的中苏会谈公报，1956 年 4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4-00024-01，第 11–13 页。

⑤ 李鹰翔 2010 年 3 月 12 日给笔者的信。

⑥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 21 页。

的“秘密电影”。[①]

为帮助中国的核科学研究，苏联还派遣了称职的专家。1957年5月，沃罗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物理研究所（此时已由科学院和三机部双重领导）工作。沃罗比约夫是库尔恰托夫最亲密的助手之一，笔者通过对他当年的中国同事采访得知，此人确实有很深厚的科学功底。沃罗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并编制教学大纲，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沃罗比约夫与钱三强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同周恩来也有过亲密接触。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沃罗比约夫刚来时，在研究所里只有60位核物理方面的中国专家，而到1959年11月他离开这里时，这个集体的人数已经增长到6000人。[②]孟戈非后来回忆说，不仅在技术问题上，而且在反应堆、核动力的研究体制建设方面，沃罗比约夫对中国都给予了很大帮助。[③]苏联能派出如此优秀的科学家，可见是诚心帮助中国的。

苏联的帮助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原子能研究工作。为了加强对原子能研究的领导，顺利完成苏联援助的试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设工作，1955年7月1日，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筑技术局，刘伟任局长，专门负责建设新的核科研基地；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领导原子能事业。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刘杰）设立了专门办事机构，直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工作。[④]195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已经决定对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建设事业，采取最积极的方针，并且在苏联的帮助下，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接近和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因此，必须迅速地全面地开展对于铀及各种特殊金属的勘探、开采和冶炼工作，进行各种化工材料的生产、各种特殊机械及仪表的制造，原子堆和加速器的设计和建造，以及原子能科学研究和

---

① 彭真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电，1956年12月6日，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年12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01-01，第228–230、46–49页。

② 沈志华2002年9月采访孟戈非记录。孟戈非50年代曾任科学院物理所负责人。*Негин Е.*, *Смирнов Ю.*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ёлой воде：как СССР делился с Китаем своими атомными секретами.// Итоги，октября 1996，с.43-44。根据中国资料，到1960年上半年，原子能所的职工队伍由1954年底原物理所的170人（科技人员不足100人），发展到4345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科技人员1884人。见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8页。

③ 孟戈非：《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30页。

④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14–16页。

干部培养等一系列新的工作。”通知认为，“当前最急迫的是必须由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抽调一批优秀的技术干部和行政干部，以及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立即开始学习和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决定：1956年所需的2462名高等学校毕业生和760名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分配，同时限令是年5月和7月“从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中抽调干部1895名（其中技术干部819名）、工人5055名参加这一工作”。① 在同年5月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所确定的57个重点学科中，原子能研究被摆在最为突出的地位。②

在这一基础上，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名为二机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③ 不过，由于苏联在原子能设备出口价格方面始终让中国摸不到底，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考虑紧缩投资，迫使中方不得不考虑减少核工业的建设项目。聂荣臻和宋任穷于1957年1月9日联名致电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提出在原子能工业方面，第二个五年计划只进行科学研究、地质勘探、生产氧化铀和金属铀、建立一个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生产钚的化工厂，而把浓缩铀生产的建设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考虑。④ 尽管如此，1957年3月，三机部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还是要求1962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⑤

总之，1955年初苏联向中国开启了和平利用原子能这扇窗口，而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也正是以此为起点的。

二、苏联对中国核援助的方针出现突破性转变

尽管和平利用原子能可以成为研制原子弹的技术基础，但是要实现这一步跨越却绝非易事，这不仅需要具有各种特殊的设施、设备和仪器，更需要掌握从铀分离、提纯到核爆炸的一系列专门技术和工艺。以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技术水平，以及西方进行经济技术封锁的冷战环境，要在短短几年内试制出原子弹，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然而，尽管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对中国提供了大力援助，苏联

① 中共中央通知（节录），1956年4月23日，《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20–21页。

② 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第30–3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05页。

④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02页。

⑤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9页。

对于中国进一步研制核武器的要求却反应冷淡。[①] 对中国提出的导弹研制方面提供援助的要求，也表现得犹豫不决。

在原子弹尚处于基础理论研究阶段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其运载工具——导弹的研制问题了。1955年11月，副总参谋长兼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受彭德怀和聂荣臻委托，与刚从美国归来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在哈尔滨会见，就研制导弹问题向他征询意见，并引见了军事工程学院的火箭专业教授。随后任新民等三位教授联名提出了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建议。正在住院治病的彭德怀接到报告后，随即约钱学森、陈赓来医院晤谈。1956年元旦，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再次与陈庚、钱学森商议，并向周恩来做了汇报。1月12日，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时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意在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已经提高的基础上，加快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并打算研制火箭武器，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的图纸、资料。由于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彼得鲁舍夫斯基没有表态。1月2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第五十七次例行办公会议，讨论了研究和制造导弹的问题。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提出报告。彭德怀说："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帮助，我们就去学习。"2月27日，钱学森向国务院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4月12日，遵照聂荣臻的批示，中央军委办公厅对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初步目标有：研究制造射程10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射程500至60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射程15公里的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研究。5月10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央军委5月26日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周恩来在会议上指示：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是年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五院）成立，下设10个研究室。至此，中国的导弹研

---

① 还在苏联援建的试验性工业核反应堆及相应的科研所建设的过程中，1957年中方就反复表示：非常感谢苏联对建设研究所给予的援助，但在目前阶段上，中国的主要目的不是掌握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方法，而是提取生产原子弹所需的物质。苏方对此迟迟未予理睬。（见《阿尔希波夫的回忆》，1989年初递交苏共中央。这份材料是阿尔希波夫1995年交给阎明复的。同时交付的还有阿尔希波夫主持起草的《苏中冲突大事记》和《苏中冲突的原因与过程(1958–1985年)》。感谢阎明复为笔者提供了这些珍贵的史料。）另参见陈赓传编写组：《陈赓传》，第505页。

究事业开始走上轨道。[①]

中国要实现这些宏伟设想和目标，在当时还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然而，与核能基础研究不同的是，导弹研究更带有纯军事色彩，又与原子弹运载有直接关联，苏联在这方面自然要谨慎行事。况且，当时苏联正热衷于同英美讨论停止核试验的问题。1956 年 7 月 16 日，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原子武器的试验性爆炸应当毫不拖延地停止进行。苏联建议，或者美国、苏联和英国政府缔结一个三边协定，随后由其他国家加入这个协定；或者通过上述政府各自发表正式声明，保证自己不再进行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试验。谢皮洛夫还宣布，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毫不拖延地就立即停止一切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试验和实验性爆炸的问题，缔结苏联、美国和英国的三国协定。[②]1957 年 1 月 14 日，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提案。在 3 月 8 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会议上，苏联副外长佐林进一步解释了苏联的建议。3 月 22 日，苏联使馆向中国递交了有关提案的备忘录：关于限制核武器问题，苏联的建议是，到 1959 年，实行全面禁止包括运载火箭在内的核武器的生产，并销毁现有的原子弹和氢弹，并为此建立起国际监督机制。备忘录还提到，苏联认为，“关于裁军公约所涉及的中国所承担的义务的问题，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之下进行研究”。[③] 尽管如此，这个建议如果是认真的，那么必然影响到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方针。要北京支持苏联的裁军建议，就必须给予中国核援助，而一旦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取得进展，又会影响苏联主张的限制核武器谈判的结果。莫斯科确实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

就在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签字的当天，1956 年 8 月 17 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应聂荣臻的请求，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要求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方面向中国提供全面的技术援助，并提出中国将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进行谈判。[④]9 月 13 日苏共中央复电中共中央称：考虑到导弹技术的复杂性

---

① 谢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年，第 28–29 页；张愈：《在彭总身边保健的日子里》，《人民日报》1984 年 12 月 30 日，第 5 版；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第 544–546、548 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第 575、577 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612 页；沈志华采访王亚志记录。后来为了减少层次，提高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经聂荣臻提议，1957 年 3 月中央军委下令撤销五局，所属机构和人员合并到五院。

② 《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18 日，第 5 版。

③ 苏联给中国的备忘录，1957 年 3 月 22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86-09，第 59–63 页。参见 Morton Halperin，“Sino-Soviet Nuclear Relations，1957-1960”，Morton Halperin（ed.），*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67，p.118。

④ 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第 569 页。

和中国目前缺乏干部的情况，建议中国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然后根据这方面培养专家的情况，再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苏共中央决定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人才的培养，将派专家到中国学校去工作和授课。已经指示苏联有关机构把导弹专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以及培养干部所需要的教具、样品及其技术说明送给中国。从 1957 年的新学年开始，苏联高等学校将设立小组，可以接受 50 名中国留学生，以便培养导弹技术方面的专家。[①] 这个回答与中国的要求相差太远，聂荣臻对此"大失所望"。[②]

面对苏联的如此态度，1956 年 10 月 12 日，聂荣臻召集航空委员会的委员和导弹专家开会，共同商议导弹武器发展中的困难及解决办法。聂荣臻在会上说："我们对导弹的研究，苏联帮助要搞，不帮助也要搞。因此，不要等谈判，一方面准备谈判，一方面积极进行我们自己的筹建工作。"[③] 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形成了《加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报告》，于 15 日上报给周恩来、彭德怀。报告说：按照苏共中央 9 月 13 日复电的精神，"对我国的援助目前仅仅是为我培养干部。这当然也需要，但较我们原提要求相距甚远。按照这个步骤，估计至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在我国进行导弹的研究、试制和生产"，"这就大大地推迟了我国掌握导弹（包括无线电子学等新技术）的时间，对巩固国防和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都不利"。因此建议，在继续与苏联谈判的同时，自力更生，积极筹建。[④] 两天以后，中共中央以聂荣臻代拟的电稿复电苏共中央。复电说：为了尽快培养导弹方面的干部，除按照苏共中央来电的意见派去 50 名留学生外，还打算将一批目前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转到同导弹技术直接有关的专业去学习。同时，准备在中国几个主要高等学校增设有关导弹技术的专业，希望苏联政府供给教学资料和教具、样品，并派专家来华帮助进行教学工作。复电还要求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谈判。[⑤] 但苏方迟迟不予答复。

---

①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 588 页。

② 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第 569 页；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回忆录》，第 800–801 页。

③ 聂荣臻：《聂荣臻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395 页；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第 570–571 页。

④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 591–592 页；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第 571–572 页。

⑤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 592–593 页。早在 6 月，聂荣臻就提请国务院将一部分留苏学生转学导弹和电子专业，另外争取再派 400 名学生去苏联学习上述专业。见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第 569 页。

对于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拟与苏方进行谈判，以解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究竟对中国的原子弹、导弹和飞机生产给予何种援助的问题，半年后才有了一些结果。莫斯科态度松动的原因很可能是在处理波匈事件中得到了中共的帮助。[①]1957年3月30日，中苏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议定书规定，苏联将派遣5名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教学组织工作，并在有关学校讲授有关（火箭）喷气技术的课程；按照喷气技术课程制订和提交教育计划和大纲；苏联有关高等学校在1957–1958年教学年度，接收50名中国大学生；提交两枚供教学用的P-1导弹样品及技术说明书。中国政府将偿付苏方给予技术援助的有关费用，并保证承担保密义务。[②]但这仍然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况且该协定执行得也不顺利。

作为执行协定的条件，苏方还提出一些要求。1957年5月11日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北京副代表加里宁少将会见聂荣臻时，传达了苏联为了在喷气技术方面帮助中国而需要了解的问题：一、中国在喷气技术方面的具体方针；二、中国已有多少训练出来的干部和以后还可能训练多少干部；三、建立新研究所的大致规模、期限和设备，要求苏联援助的性质和范围；四、中国可用来生产火箭技术的工业潜力，以及生产火箭武器所必需的原料、零件、半成品等工业保证来源；五、在设计、生产和使用火箭武器时的保密条件和应有的制度。苏联方面也希望知道中国方面授权何人在莫斯科就火箭技术问题进行商谈。6月18日，聂荣臻和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再次向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正式请求，阿尔希波夫答应请示政府后给予答复。6月29日苏方把皮球踢了回来，中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处来电称：苏方回复，中方对阿尔希波夫和加里宁今年5月提出有关火箭的一些问题，至今没有答复。苏方希望以书面形式尽快地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在苏方得到对问题的书面答复后，再考虑邀请中国专家组来苏具体商谈。[③]看起来，随着美苏禁止核试验、限制核扩散谈判的进展，苏联在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问题上，确是难以前进的。或许是有意安抚中国，苏联大使和总顾问表示希望了解中国原子能工业发展的长远规

---

① 作为当事人，聂荣臻就有此感受，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第803页。关于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作用，参见沈志华：《1956年10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9–143页。

②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05页。

③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08、612–613页。

划，以便确定苏联专家的工作步骤。[①]还有，1957年5月，当中国就美国向台湾运送导弹一事发表抗议声明后，苏联几次试探中国的态度，连赫鲁晓夫都亲自出面，询问中国方面是否需要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支持，甚至表示如美公开在台驻扎导弹部队，苏联也将帮助中国建立导弹部队。对此，周恩来予以婉言谢绝。[②]

正当中苏关于核援助的磋商陷入僵局的时候，同1954年的情况相似，又是苏联党内斗争的激化导致赫鲁晓夫打开了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帮助中国的大门。在非常状态下紧急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57年），指责和批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进行非法的反党组织活动，并把他们排除出中央领导层。[③]这一事件在苏联国内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众多猜疑、惊慌，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④]中国使馆也认为：苏共对马林科夫等人“作了如此严重的组织处理是值得考虑的”，“这次事件继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之后第三次严重地打击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威信”。[⑤]这时，很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北京，莫斯科一些大学生说：对于苏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不发表意见，我们也不发表意见；现在只有毛泽东说的才算对的”。[⑥]惴惴不安的赫鲁晓夫不得不再次请求中共的认可和支持。7月5日，赫鲁晓夫派米高扬专程前往中国杭州，向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详尽地介绍了事情经过，以及同莫洛托夫等人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在对华态度上的一些错误做法。米高扬表示希望中共能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立场。听了米高扬的详细介绍后，毛泽东表示，苏共这样解决问题很好，加强了党的领导，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召开会议，决定公开发表意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⑦]在7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汇报说，“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会的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主席团则一致

---

① 周恩来与尤金谈话纪要，1957年6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86-14，第98–99页。

② 姬鹏飞与尤金谈话纪要，1957年5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86-12，第80–81页。周恩来与尤金谈话纪要，1957年5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86-13，第95–97页。

③ 详见 *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Н.С. 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2，с.10-31。

④ 驻波使馆致外交部和中共中央电，谢文清致外交部并转新华社电，1957年7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38-01，第1、2–3页；驻捷使馆致外交部电，1957年7月4、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24-08，第145–146、147–149页。

⑤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49–51页。

⑥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7月12日，第2255号，第32页。

⑦ 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1957年7月5日；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49页。

认为，米高扬对中国的访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①]毛泽东的表态就像雪中送炭，使赫鲁晓夫如释重负。此外，中苏两党筹划已久的莫斯科共产党国际会议已经列入日程，赫鲁晓夫特别企盼毛泽东能亲自出席，以表示对苏共的支持。[②]于是，充满感激之情的赫鲁晓夫投桃报李，决定立即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面有所表示。

此时，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负责人聂荣臻已经有些不耐烦了。1957年7月11日，他再次写报告给周恩来指出，“中国原子能工业发展计划现在尚未定案，特别是对于制造浓缩铀后，下一步安排问题很不明确”。为此，聂提出暂缓执行1956年的原子能协定，并希望政府出面与苏方交涉，想以此对苏方施加压力。7月14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退外交部办。[③]令聂荣臻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次苏联的反应十分迅速，20日阿尔希波夫便提出愿就国防新技术援助事宜约定时间面谈。22日聂荣臻来到阿尔希波夫的寓所。阿尔希波夫高兴地对聂荣臻说：对聂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问题，苏联政府表示支持。“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并表示将圆满答复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任何问题。聂荣臻汇报后，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委托聂荣臻负责筹组代表团。[④]8月6日，周恩来致函布尔加宁明确提出：“为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和更好地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我们考虑在我原子能工业建成后，需要进一步生产原子武器和它的投掷工具，请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一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商谈。”[⑤]8月14日布尔加宁收到使馆递交的周恩来信函时，当面表示“原则上无问题”，“日内可予答复”。[⑥]10天后，苏联驻华代办交给中国一份照会，同意中国派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建立原子工业

---

①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7月8日，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3，оп.12，д.1007，л.59-59об.，*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с.259。

②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82–109页。

③ 聂荣臻致周恩来函（手稿），1957年7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92-02，第15–16页。此前研究者都引用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14页）的说法，断定聂荣臻的报告是7月18日写的。笔者认为，还是外交部的档案更为可靠。

④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15页；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第57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7页。几天后，中国正式提出要修改1956年的原子能协定，以前所定设备请暂缓交付。张闻天致苏联代办函，1957年8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92-02，第17页。

⑥ 刘晓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7年8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726-02，第58–59页。

和生产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以及航空技术等问题”。同时，还递交了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典的正式邀请函。[①]

在苏联答复同意后，中国派出以聂荣臻、宋任穷、陈赓为首的代表团，还聘请了 21 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当顾问，共 40 多人，于 9 月 7 日抵莫斯科。谈判从 9 月 9 日开始，分成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等 5 个组同时进行。苏方分别以国防部副部长、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国防工业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副部长、无线电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为组长。尽管在谈判中苏联方面还是有一些保留，但总体说来十分友好和热情，苏方代表团团长、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甚至在谈判中认为中方提出的有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主动建议提出更新的产品型号。9 月 14 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别尔乌辛对聂荣臻说：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聂荣臻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顾问开会时说：苏联政府这次的确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中国得到这些援助后，再经过自己的努力，国防物质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将跃进到一个新的科学技术水平。[②] 消息传到国内，9 月 29 日上午，周恩来委托彭德怀、李富春召集国防工业负责人会议进行研究。在听取了宋任穷的汇报后，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提出的援助项目都是中国国防所必需的，因此积极表示赞成，并同意照苏联提出的协定签字，签订后再从各方面继续具体商谈。[③]10 月 5 日，周恩来致函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并告聂荣臻：中央同意由聂荣臻代表政府签订苏方所建议的协定。[④]

10 月 15 日，中苏正式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共 5 章 22 条，根据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用的足够的六氟化铀；1959 年 4 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 1961 年底前提供导弹样

① 张闻天接见苏联临时代办谈话纪要，1957 年 8 月 24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87-04，第 8–10 页。

② 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第 575–579 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 619–620 页。

③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 622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80 页。

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等。[①] 鉴于协定中对核工业援助项目的建设规模以及向中国交付设计和设备的期限等都未作具体规定，1958 年 9 月 29 日中苏又签订了《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其中对每个项目的规模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项目设计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也有了大致的确认，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 1959 和 1960 年。[②]

《国防新技术协定》和《补充协定》是中苏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合作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的原子能工业"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③] 在此之前，苏联对中国核工业的援助都非常小心地避开军事用途，所有交给中方的文件档案和资料中，均未出现过核武器研制的字句。[④] 另外，有关核工业方面的苏联专家，以前虽然是由军队系统负责聘请和管理，但其在华活动，除工作时间外，都是由外国专家局统一安排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签字以后，所有涉及尖端技术的苏联专家再也没有参加过外专局统一组织的活动。[⑤] 由此也可以看出，《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确标志着苏联在核方面对华援助的性质已经改变：苏联真正开始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尖端技术和装备援助了。

三、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帮助及其限度

尽管 1957 年 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关于原子弹的那段著名讲话当时引起不少东欧国家领导人的非议，也令赫鲁晓夫感到突然，但是当时还并没有影响到苏联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⑥]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苏联对中国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援助是正常的和顺利的。1958 年 6 月苏联援助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从而显著改善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技术装备和条件。同时，在建造过程中培养的人才，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提取的数据，不仅为中国和平利用原

①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 623 页；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 43 页；东方鹤：《张爱萍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728 页；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第 172–174 页；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p.62。在这次谈判中，中方的主要要求中只有一项没有得到满足，即苏联拒绝提供有关核动力潜艇的任何技术资料。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 32 页。

②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 21–22 页。

③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 29 页。

④ 沈志华采访孟戈非记录。

⑤ 沈志华 2002 年 12 月 22 日采访宣淼记录。宣淼 50 年代长期在外国专家局聘请处任职。

⑥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 1957 年莫斯科会议》，第 82–109 页。

子能事业进一步提供了前提，也将间接地为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和发展奠定基础。得到消息后，毛泽东在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充满信心地指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①] 此外，苏联还根据协定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导弹、原子能等绝密技术资料，派遣了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有关方面熟悉和掌握尖端武器的研制情况及技术。聂荣臻承认，苏联的帮助，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起步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导弹研制和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加快了中国的前进步伐。在此基础上，中国开始了“消化资料、研究设计和试制工作”。[②] 于是，1958年8月，二机部党组在呈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方针和规划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的方针，并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首肯。[③]

在原子弹研制方面，苏联不仅提供设备、图纸和技术资料，而且派遣大批专家来到中国。从工厂的选址、设计，到设备安装、调试，特别是在帮助中国技术专家理解文献和资料，培训中国技术工人掌握操作技能等方面，苏联专家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原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回忆说，“当年，在我国决心发展核工业生产，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时，苏联对我们是支持的，先后派来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④] 如上所述，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建设方面，中苏两国政府共签订了6个合作与援助协定，其中关于铀矿普查勘探2个（1954、1956年），核物理科学研究1个（1955年），核工业建设2个（1956、1958年），核武器研制1个（1957年）。中方专家认为：这6个协定，包括核科学基础研究、铀资源普查勘探、铀矿开采与提取、铀转化、铀浓缩、核燃料元件和核部件制造、钚生产反应堆与铀钚分离后处理、核爆炸试验等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的核科技工业建设从一开始就能齐头并进，全面展开。[⑤]

就原子弹的制造程序而言，共有6类工厂（场），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这些

---

①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号126，第1–12张。

②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第803–804页；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第579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71页。

③ 杨连堂：《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6页。

④ 袁成隆：《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炎黄春秋》2002年第1期，第25页。俄国学者提供的数字是，帮助中国进行核武器研制的苏联科学家共640人。见乌索夫：《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

⑤ 李鹰翔2010年3月12日给笔者的信。

企业或基地于1957年底以后陆续进入设计（苏联专家负责初步和主工艺设计，中方负责施工和辅助设计）和施工阶段，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铺开。如开采矿石的铀矿场（湖南郴县、大浦和江西上饶），粉碎矿石和初步提炼天然铀的水冶厂（湖南衡阳），提取二氧化铀和制作核燃料棒的核燃料厂（包头核元件厂等），制造浓缩铀的核扩散厂（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制造原子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0基地），以及核实验场（21基地）等，这些核工业首批主要项目的基础工程和附属工程，均于1958年5月以后陆续开工建设。[①] 同年9月27日，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重水反应堆和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移交中国，标志着中国正在"向原子能时代跃进"。聂荣臻在移交典礼仪式上说："实验性原子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成和移交生产，将促进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获得迅速发展"，"原子武器并不是帝国主义所能垄断得了的。"[②] 随后一年，核燃料生产与核爆炸研制两个系统齐头并进，中国核武器的研制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在导弹研制方面，苏联一方面继续提供技术资料和样品，一方面帮助中国训练导弹部队。1957年11月26日苏联代理军事总顾问沙甫琴科少将转达了苏联国防部的通知，将于12月下旬以两列火车60个车皮载运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口岸站；为教会中方使用和维护，苏方将派103人随同前来，教学期为3个月。[③]12月20日，装有P-2型导弹及其器材的3770次国际列车，缓缓驶进满洲里火车站，因中苏铁道轨距不同，必须在满洲里车站完成卸车、装车的交接工作。当时在炮兵教导大队任技术副大队长的黄迪菲回忆说：来自苏联的那趟列车，由10多节车厢组成，头尾两节载有苏军官兵，共102人。车上载有两枚P-2型地对地训练导弹，1个营的主要技术装备，包括地面测试、发射、校正、运输、加注等设备45件。当12月24日列车顺利到达炮兵教导大队驻地时，彭德怀亲手解开了系在P-2型导弹上的红绸带，满含深情地对在场官兵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④] 几天以后，以列米·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抵达北京，开始帮助中国进行

---

① 2001年8月10日沈志华采访安纯祥记录，安纯祥曾任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总工程师；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第554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59页；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2–27页。

②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1页；《人民日报》1958年9月28日，第1版。移交典礼后，放映了一步国产新影片，名字就是"向原子能时代跃进"。

③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27–628页。

④ 李伶、周飞：《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党史博览》2002年第9期，第11–12页。

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设计工作。[①]

1958 年 1 月 11 日，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训练班开学。P-2 型导弹虽说已从苏军的战斗序列中退出现役，但对中国军人来说，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钱学森鼓励学员说：P-2 型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但对我们来说，毕竟有了教学实物，可使我们少走弯路，我在美国就没看到这样的实物，要好好学！参加训练的学员共 533 人，另有见习人员 150 名，分成 23 个专业教学组，采取按职务对口教学的方式，由苏军导弹营官兵直接任教。前 3 个月完全是接受苏联官兵手把手的教练，以后是自己独立组织培训。到 1959 年 7 月 24 日训练结束，共培养了地对地导弹专业技术骨干 1357 名，为中国导弹部队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教员和管理干部。[②] 在此期间，1958 年 9 月，在空军建制下正式成立了导弹学校，负责培训全军所需地对地、地对空、岸对舰等导弹兵器的工程技术和指挥干部。学校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设立编制，并聘请古谢夫、尼古拉耶夫等 12 名专家授课。[③]

经过与苏联专家的协商和谈判，1958 年 10 月 6 日，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正式成立，代号为 543 部队。11 月 27 日和 29 日，苏联提供的 4 套萨姆 -2 地对空导弹运到北京，其中 2 套装备空军部队，1 套给五院进行仿制，1 套给 20 基地做试验用。前来任教的苏联专家共 95 人同时到达。当时负责组建导弹部队的张伯华回忆说：苏联专家组来后，我们一起研究了教学大纲、计划，按专业进行编班。12 月 21 日，改装训练正式开始。为了保证苏联专家讲课，我向空军机关要了 53 名俄文翻译，组成翻译小组配合教学。参加这期训练的有 3 个导弹营及机关、院校、基地等 16 个单位的干部共 464 人。理论训练分 17 个专业进行，兵器和操作训练分成四类，其中实战部队由苏军导弹营负责对口包教。1959 年 4 月经过实弹打靶考核，成绩均为优秀。随后，在靶场举行了兵器装备交接仪式。[④]1959 年 10 月 7 日，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率部在北京上空一举击落国民党空军 RB-57D 型高空侦察机 1 架，开创了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用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苏联顾问对此也十分高兴。刘亚楼后来总结说：1959 年这一仗，完全是按苏联专家教给我们

---

①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 632 页。

② 李伶、周飞：《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第 11、14 页。

③ 王定烈：《我军第一所导弹学校的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空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481–485 页。

④ 张伯华：《组建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的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空军回忆史料》，第 489–493 页。

的办法打的。[①]

不过还需要提到，从政策上讲，苏联的核援助并非是无保留的。对于这一点，来华苏联专家自己也深有体会：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的帕夫洛夫局长负责派遣核武器设计专家的工作，1958年这批专家去中国前，帕夫洛夫告诉他们，“应该到中国同志那里去，并向他们讲述什么是核武器”，“他们想制造原子弹，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怎样制造原子弹”。但苏联专家讲授的内容是有严格规定的，根据上级的要求，每一位苏联专家都必须围绕着苏联1951年试验成功的那颗原子弹的制造过程讲述自己负责的内容。因为根据美国图纸设计并于1949年爆炸的那颗原子弹的技术已经过时了，而“苏联领导人又不允许把比1951年更先进的设计方案告诉中国人”。尽管如此，作为科学家，这些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还是尽职尽责的。加夫里洛夫讲解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物理图片，以及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的物理现象和释放出的物质状况；涅金讲述了原子弹的制造及其结构原理——从外形直到中子点火装置；马斯洛夫讲授了如何在弹道装置里安放原子弹，以及自动装置和仪器。开始，专家们仅限于在黑板上画出结构示意图，因为他们没有带来文献资料——根据中苏协议，转交文件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当中国的专家们反映对讲课的内容可能记录不完全或有理解上的错误时，苏联专家便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苏联专家认为，在莫斯科允许和专家们所知道的范围内，中国人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②]

当然，这种界限有时是很难掌握的，一些被派到机密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由于害怕泄露秘密而感到困苦和不安。据1957年呈送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几位以教师和教育家身份被派到中国的顾问，从未被告之哪些东西可以透露，哪些东西不该透露。报告说，由于害怕承担泄露机密的责任，他们“注定要陷入被动，或者只说中国早已从报纸甚至从苏联的报道中了解到的东西”。[③]孟戈非详细地回

① 岳振华：《击落美制U-2飞机作战追记》，《百年潮》2002年第6期，第17–22页；2002年3月2日沈志华采访恽前程记录。恽前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部副部长。1960年11月5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自己的第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并于1962年投入生产。1963年5月进行了射程为800–11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试验。这就是说，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一年多前，中国已经拥有了运载工具。参见林中斌：《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第63页。

② *Негин Е., Смирнов Ю.*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ёлой воде: как СССР делился с Китаем своими атомными секретами, c.44-45.

③ TsKhSD，f.5，op.49，roll.8862，no.41（April-December 1957），p.146，转引自D.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Odd Arne Westad（ed.），*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p.123。

忆了与原子能研究所苏联专家组组长沃尔比约夫的一次谈话，这位资深而诚恳的老专家既要严格保守苏联核潜艇的秘密，又要如实回答中国技术专家的请教，谈话双方确实都苦费了一番心思。[①]

问题的确不是出在专家本身。苏联导弹专家萨韦利耶夫被派往中国约一年的时间，负责培训中国军人使用导弹装备。1959 年秋天临行前，他应召到莫斯科接受指示。炮兵主帅米特罗凡·涅杰林叮嘱他，只能讲授已经交付给中国的装备，“不要显露自己关于其他方面的知识”，必要时应当通过大使馆的高频通讯线路向国内请示，在特别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与主帅联系。后来，在是否讲授超出战术导弹以外的内容的问题上，萨韦利耶夫与苏联军事专家组组长真的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不得不请示涅杰林。这位主帅指示：“对于所提及的问题不要提出任何建议，否则就会有意无意地泄露国家机密。不要担心会有什么后果，我保护你们。”[②] 所以，聂荣臻后来的判断是不错的：在尖端武器方面，“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差距。要我们仿制苏联的第三线甚至停了产的装备，而不给第一线或第二线的最新装备。”[③]

其实，苏联在尖端技术上对中国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中国自身也是认可并实行这种“内外有别”的原则的。举出这些事例只是要说明，赫鲁晓夫后来所说苏联在原子能和核武器研制方面完全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对中国没有秘密可言，[④] 是有些言过其实了。

四、赫鲁晓夫决心撕毁合同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

就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时，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莫斯科延缓以至最后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援助。

1958 年上半年，中苏在核政策方面继续采取了互相配合的方针，不仅如此，

---

① 孟戈非：《未被揭开的谜底》，第 24–29 页。

② *Долинин А.Д.* Как наши ракетчики китайцев обучали.//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6，13 мая 1995г..

③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第 742 页。如铀浓缩技术，苏联当时已掌握了十分省电的离心机，而给中方仍然是耗电量极大的扩散机。又如后处理技术，苏联给中方的是已经落后的沉淀法，而当时欧美都已采用先进的萃取法。再如，核武器技术传授，苏方限定专家只能讲 1951 年试验的以钚为装料的原子弹，而根本未涉及铀装料的技术问题。见李鹰翔 2010 年 3 月 12 日给笔者的信。

④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 412–414 页。

中国甚至提出了新的建议，主张成立中苏国防工业联席会议，实现全面的军事合作。[①] 但此后双方的政策性分歧日益扩大，特别是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与莫斯科的距离渐行渐远，这令赫鲁晓夫十分恼怒。[②]

1958 年 4 月 4 日，赫鲁晓夫致信艾森豪威尔，宣布苏联政府已决定从今年 3 月 31 日起单方面停止核武器试验，建议美国和英国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步骤，以便尽快达成停止核试验协议。周恩来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③]1958 年 5 月 9 日，赫鲁晓夫又向禁止核试验迈出了一大步。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议，即在日内瓦召开一个专家会议来研究为核禁试成立核查监控体系的可行性。在 5 月 30 日的另一封信中，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美国的建议，请英国和法国科学家来参加专家会议，并表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也要参加。赫鲁晓夫还暗示应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信中说，从印度或“其他一些特定国家”邀请专家来参加会议也许是明智的。[④] 尽管后来没有邀请中国出席，但在会议开始前夕，中国表示了支持的态度。新华社在 6 月 26 日的报道中表示，专家会议的讨论有助于核禁试条约的谈判。[⑤]

日内瓦核专家会议于 8 月 21 日结束，会议乐观地宣告：科学家已经发现“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能力和限度而又可行和有效的监督体系，来侦察违反可能缔结的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可能办到的”。8 月 22 日，美国和英国分别就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发表了声明，准备迅速着手谈判，签署一项“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和在专家报告的基础上实际建立一个国际监督制度问题的协议”。美、英都保证，“在开始谈判后一年的期间内停止进一步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⑥] 值得注意的是，核专家会议在讨论建立“遍布全世界”的对核试验的监控网时，没有忘记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且这个建议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提出的。结果，会议报

---

① 二机部对外联络司代拟外交部致刘晓电，1957 年 11 月 2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81-01，第 59–61 页；刘晓与费德林谈话记录，1957 年 12 月 14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97-10，第 150–155 页。

② 很多学者认为 1958 年 7 月苏联提出“联合舰队”的建议触怒了毛泽东，从而导致中苏分裂。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当时就得到了解决，毛泽东大发雷霆，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详见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第 32–43 页。

③ 《人民日报》1958 年 4 月 7 日，第 1、5 版。在给美国总统发信的同一天，赫鲁晓夫也致信中国政府，希望中国积极支持苏联的建议。见赫鲁晓夫致周恩来函，1958 年 4 月 4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30-01，第 1–4 页。

④ Morton Halperin，“Sino-Soviet Nuclear Relations，1957-1960”，pp.136-137.

⑤ 《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27 日，第 5 版。

⑥ 《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24 日，第 3 版。

告提出的监控网中有8个站点位于中国大陆。[①]无论这一情况中国当时是否了解，《人民日报》在对会议进行报道时，并非无意地加入了这样的内容：美国有人士认为，“暂停试验一年也不会妨碍美国的原子扩军计划”；英国政府在宣布停止核试验的同时透露，当晚“在圣诞岛曾经发生了核装置的爆炸”。[②]这表明，中国对专家会议的结果并不满意，至少对其是否有效持怀疑态度。不过，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个结果却是他长期努力取得的一点令人欣慰的功绩。缓和的曙光似乎已经露出了地平线。

然而，就在美、英发表声明的第二天，中国军队发起了炮击金门的战役，这简直就是向赫鲁晓夫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对于不久前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当面提出的严厉指责，赫鲁晓夫还可以容忍，并表现出相当宽容的姿态。[③]但是，对于中国领导人这次突然采取的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莫斯科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不管毛泽东炮击金门的初衷如何，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这次台海危机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停止向中国进一步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原子弹的样品。[④]如果具体地分析，那么可以看出，这次炮击金门行动在四个方面惹恼了赫鲁晓夫：

其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尽管赫鲁晓夫此前在北京呆了整整4天。过去，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分歧，但现在史实已经清楚了。[⑤]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明确承认，7月底和8月初与赫鲁晓夫见面时，“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⑥]1959年9月30日见到赫鲁晓夫，毛泽东又得意地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

---

① Morton Halperin，“Sino-Soviet Nuclear Relations，1957-1960”，p.138；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91-192.

② 《人民日报》1958年8月24日，第3版。

③ 例如，赫鲁晓夫回国后，仍然批准了中国核专家参观苏联核试验场的请求，并向他们展示了一枚原子弹。苏联国防部还派遣第12研究所的两位专家前往中国进行教学。Viktor M. 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pp.25-26.

④ 如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谢生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39、547页；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66页。

⑤ 详见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35–40页。

⑥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5–186页。

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①] 就在炮击前十几天，周恩来写信赫鲁晓夫，要求苏联在9月提供米格-19C型歼击机30架，并且附带C-5型火箭32000发及其他供半年用的装备和器材，但信中仍然没有提到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②] 赫鲁晓夫为此十分恼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还抱怨说，作为盟友，苏联不知道中国明天会做什么。[③] 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苏联这个盟国的蔑视和侮辱。

其二，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正如危机期间外交部给驻外使馆的一份指示电所说，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至于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步骤”，“要由我国根据情况来决定，不容许任何人干涉”。[④] 对此，苏联大使馆当时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⑤] 在后来与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时，赫鲁晓夫为此大动肝火，他一再强调，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事关全局，而盟国之间应该在重大问题上交换看法，协调政策。毛泽东却寸步不让，坚持中国有权利独自解决台湾问题。[⑥] 在赫鲁晓夫看来，这种态度显然就是对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挑战。

其三，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与苏联试图通过谈判同西方实现缓和的做法相反，中国摆开了一副诉诸武力的架子。苏联大使馆的报告指责说，中国的做法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⑦] 在苏联人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泽东恰恰认为，既然国际形势的

---

①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55页。

② 周恩来致赫鲁晓夫函，1958年8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38-03，第6–7页。

③ 见 *Зубок 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 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97-98。

④ 外交部致驻外使馆电，1958年9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2-00006-03，第14–16页。

⑤ V. Zubok and C.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23. 危机期间，周恩来（10月12日）和毛泽东（10月15日）确曾致函莫斯科，要求苏联提供飞机和炮兵装备。РГАНИ，ф.3，оп.12，д.1010，л.3-4，*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с.337，1046.

⑥ 见 *Зубок 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 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с.94-98。

⑦ V. Zubok and C.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p.223.

基本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那么对帝国主义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①]

其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从而激怒了赫鲁晓夫。在9月24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5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空对空导弹，其中一枚弹头坠地而未爆炸。中国政府发动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将导弹的部分残骸作为美国的罪证在北京展出。[②] 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并提出把导弹残骸送往苏联进行研究。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这个答复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而无法复原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自动导向系统的红外线传感器。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哪里还像是苏联的盟国？[③]

对于中国的这些做法，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确实感到无法容忍了。尽管在危机期间苏联两次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④] 但是赫鲁晓夫这样做，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之意，其逻辑的结果也预示了苏联将以此替换继续对中国的核援助。此外，据阿尔希波夫的回忆，中国对苏联禁止核试验及防止核扩散方针的不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58年苏联要求中国支持苏联提出的禁止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倡议，中国一直未予答复。1959年苏联又询问中国对不扩散核武器的态度，中方的回答是：我们期待着苏联履行双方关于原子能工业及为生产"最终产品"供应相关设备的协议。于是，苏联开始延迟提交正在建设的核工厂所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21页；《人民日报》1958年9月9日，第1版。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第1版，10月3日第2版，10月15日第4版。

③ *Хрущё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с.334；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郭家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66–268页；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413–415页。

④ 关于苏联9月7日和19日两个声明发表及与中国商议的情况，参见周恩来接见苏联参赞谈话记录，1958年9月5日；刘晓与库兹涅佐夫谈话记录，1958年9月8日；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谈话纪要，1958年9月18日；张闻天接见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9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33-04，第94–103页；109-01211-04，第30–31页；109-00833-01，第4–20页；109-00833-01，第21–46页。即使在中苏分裂后，中国也承认苏联在台海危机期间给予的支持。见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9月1日，第1版。

需的技术和设备。到1959年6月，苏联对中国核项目的设备供应完全中断了。[①]

应该说，苏联做出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的决定，如同决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援助一样，赫鲁晓夫个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②]1958年4月24日，赫鲁晓夫曾亲笔写信给周恩来说，关于按照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和样品的问题，苏联政府已委托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具体办理，最近期间内即可提供。[③]但台海危机后，赫鲁晓夫有些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核援助的协定，并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在与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赫鲁晓夫决定P-12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苏联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他们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④]

按照赫鲁晓夫的意图，苏方以种种借口拖延根据协定应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即样品）和图纸资料。苏联先是要求必须有专门的储存仓库，等到中国将仓库盖好后，苏联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在中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苏联保密专家也表示满意后，苏方于1958年10月函复："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国。但期限已到，莫斯科还是没有发出启运的命令。[⑤]俄罗斯报纸刊登的一则口述史料证实，准备提供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及技术资料早在半年前就装在2–3节加了铅封的车厢里，并由警卫人员日夜守卫着。但是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事情一直拖到1959年年中，在中方以及在华苏联专家的一再催问下，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亚历山大·丘林直接给苏共中央挂了电话。[⑥]最后，赫鲁晓夫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暂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⑦]

就在中国代表团准备启程赴苏为此进行谈判时，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

---

① 见阿尔希波夫：《苏中冲突大事记》和《阿尔希波夫的回忆》。

② 1960年春外贸部长李强在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时，苏方代表团成员曾表露过这样的看法：按协议应该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但就是有人（指赫鲁晓夫）不同意，没有办法。沈志华采访宿世芳记录，2001年10月29日。宿世芳当时在驻苏使馆商赞处工作。

③ 赫鲁晓夫致周恩来函，1958年4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38-03，第9页。

④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第268页。

⑤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2页。

⑥ *Негин Е.*, *Смирнов Ю.*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ёлой воде: как СССР делился с Китаем своими атомными секретами, c.44-45. 中方之所以一再催促，是因为1959年3月13日，中央军委已正式批准核试验场定点在罗布泊西北地区。张蕴钰作为第一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正带领大部队进驻罗布泊。陈赓传编写组：《陈赓传》，第509页。

⑦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412–413页。

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并于6月26日交给周恩来。信中首先介绍了苏联与西方就禁止核试验举行的日内瓦会谈的情况，随后指出："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使我们争取禁止核试验的努力获得成功，而且事情也正在向着有可能签订普遍永久禁止核试验的协定的方向发展。"而就在此时，中方提出"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中国"的要求，"如果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那么它们就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因此，苏共中央认为：目前中国"应该将苏联专家的力量集中在帮助中国建立原子工业（包括生产裂变物质）上，这将成为生产核武器的基础"，而"中国要生产出裂变物质至少还需要两年"，到那时"才需要成批生产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苏共中央来信最后表示："如果，我们终于能够签订普遍永久禁止试验核弹头的协定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武器的试验，就会使西方国家有理由废除禁止试验的协定，宣布苏联破坏了这个协定。"此外，"一旦发生战争的话，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将用来回击任何侵略者的侵犯，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① 尽管摆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尽管采取了拐弯抹角的说法，但苏共中央的意图还是十分明显的：暂时不能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两年以后再说；如果那时签订了普遍和永久禁止核试验协定，中国就不要制造原子弹了；作为替代，苏联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一切又回到了1954年的起点。

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使中国领导人十分气愤，同时也更加激发了中国人独立研制核武器的决心。后来，中国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作定名为"596"工程，充分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和科技人员对苏联的"义愤之情"。② 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③ 周恩来还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求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问题，并决定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为此，二机部提出了"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④11月11日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呈交了一个《关

---

①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1959年6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2563-01，第1–3页。

② 刘柏罗：《从手榴弹到原子弹——我的军工生涯》，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11页；林中斌：《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第167页。

③ 宋任穷：《春蚕到死丝方尽》，《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④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743–1744页；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第663页。

于以自力更生为主解决新技术所需材料问题》的报告，其中也说到，现在有若干新型材料长期依靠进口，影响了新技术研究的进展速度。因此，“发展我国的新技术材料，必须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①

或许是为了安抚中国，以免把中苏关系搞僵，在决定暂缓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同时，苏联并没有停止在导弹以及其他国防新技术方面的援助。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并批准了关于向中国派遣国防专业技术方面的苏联专家和高校教师的报告。赫鲁晓夫亲自签署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和苏联国防部于1959年9月派遣6名国防专业技术的苏联专家和高校教师到中国国防工业的科研院所去工作，派遣期限为1–2年，其任务是培养下列专业的中国技术人员：军事–电子–光学仪器；多级火箭的设计；水声学设备；操控火箭的仪器的计算和构造；红外线技术和热力自动导向头；坦克炮的稳定系统及高射炮瞄准随动系统的设计；用于大能量火箭的液体燃料技术。②

显然，看到苏联在国防技术援助方面态度的变化，中国有关机构不得不抓紧时机，坚持要求苏联方面执行已经签订的其他合同。1959年9月23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要求苏联政府按照协定在1960年内向中国供应总值约为1.65亿卢布的国防新技术装备物资和试制这些装备所需要的原材料、样品以及有关技术资料。③12月29日，聂荣臻同陈毅联名致电刘晓大使，要他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苏联政府提出，在1960年内，请苏联政府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一、按照1957年10月15日协定，供应两种新型号导弹及全套技术资料。二、派遣必要数量的苏联专家来华，在试制这两种导弹方面提供技术援助。三、按材料清单成套供应试制这两种导弹用的全套零部件和原材料，以及试制所需的专用设备。1960年1月4日，中国要求苏联按协议规定，尽快提出援建“航空及火箭科学研究院”的换文草案，并派遣选址专家小组来华。1月20日，聂荣臻请求延长25名导弹试验靶场专家的工作期限并增聘8名苏联军事专家，3月28日又要求供应两发8Ж38火箭和进行点火所需的液氧等燃料，并派遣9名专家帮助训练操作人员和进行实弹射击的技术指导工作。④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冷淡，特别是在1959

①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93页。

② ЦХСД，ф.4，оп.16，д.653，л.51-54，转引自 *Зазерская Т.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 годы），с.104-105。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56页。

④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02–703、705、708、715页。

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以后，苏联的方针渐渐确定下来。据1960年2月中国使馆的一份报告，苏联对中国有关核武器方面的一切要求，都做出了明显拖延或拒绝的反应。[①]

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减少专家（特别是尖端技术专家）的派遣。作为对1959年11月和1960年1月中国两次要求增派38名军事专家的回答，苏联只同意派遣26名，而其他不予派遣的12名专家都是有关尖端技术方面的：核武器专家3名（核燃料、光辐射理论和基础物理、测量穿透辐射参数的电子物理仪器）、各型导弹控制系统设计专家5名、导弹控制电用计算机和设计专家2名、遥测设计专家2名。对于答应派遣的26名专家，则一直拖延，最后也没派来。3月2日，苏联国防部通知中国，关于导弹试验靶场的专家聘用问题，建议缩短延聘期限和减少增聘人数。4月，苏方违反去年8月已达成的协议，以“某些专家在苏军中人数极少”为由拒派以下专家：负责特种技术的科委专家组长、火箭武器各系统弹道空气动力和牢固度计算专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反应堆的物理热工专家、五院导弹控制系统的模拟技术专家、五院微波参数放大器和分子放大器专家。6月，苏方拒绝了哈军工关于延聘专家和改派地面发射装置设计专家的请求，说“要操纵、结构的可以派，要设计的没有”。[②]

其次，对于已经在华工作的专家加强了管制，禁止他们提供较新的和关键性的资料和建议。1959年12月21日，一份编号为№3766-ш的报告呈交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谈到了拉博特诺夫院士访问北京力学研究所的情况。在访问期间，“中国科学家企图从拉博特诺夫院士那里得到有关一系列秘密问题的情报和消息，同时又不为拉博特诺夫院士提供机会，使其了解该研究所多数实验室的情况”。报告提出了中苏科技交流中涉及的秘密研究领域的问题，认为那些“参与秘密工作的重要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被派遣到国外去工作”后，常常违反苏联的保密制度。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1960年1月8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建议，“为确保在苏联科学家和高校工作人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保守国家机密”，应专门做出一个决议。于是，2月25日安德罗波夫、苏共科学和大中学部部长基里林以及国防工业部部长谢尔宾起草了苏共中央《关于在苏联科学家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确保保守国家机密》的决议文稿，并于3月16

①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12页。

② 国防部办公厅：关于苏联军事专家问题，1963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1-117-3-1963；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15页。

日在书记处会议上得到通过。决议规定，“要严格遵守所确定的了解秘密和绝密材料的程序，不要让外国专家了解超出事先所达成的协议范围的秘密材料，以及现有的关于准许接触秘密工作的保障措施”。[①]

对于苏联态度的变化，聂荣臻曾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说：“苏方执行协定的态度，1958 年下半年以前还是较好的，一般能按协定条文办事，具体工作部门和办事人员还是积极热情、愿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但上面控制较严，绝不许越雷池半步。1958 年下半年以后，控制更严，步步卡紧。协定已定的问题，往往节外生枝，寻找借口，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有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推说由两国政府重行商谈，但一经我政府正式提出，则又一声不吭、置之不理。对我多次要求加快建设进度的项目、提前交付的设备，也拒不支持。协定中没有做具体规定的问题，即强调条文文字，根本不予以考虑。总之，苏方的态度是：一般生产技术资料可以供应，关键性的生产技术资料、研究设计和理论计算资料，以及原材料生产技术资料拒绝供应；通用设备可以供应，专用和非标准设备、精密测试仪器则拖延和拒绝；一般原材料可以给一点，越是特种的就卡得越紧；聘请仿制专家比较容易，聘请基建设计专家则较困难，聘请科学研究专家干脆拒绝。”[②]1960 年 6 月在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突然全部回国，随后便停止了研究设备和六氟化铀的供应。[③]7 月 6 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 8 名专家（其中 6 人是主任工程师）奉命提前回国；7 月 8 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 5 名专家，也突然撤走。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专家以后，到 8 月 23 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 233 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并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④]

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确给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和尖端武器研制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短期难以全部估计的严重损失。按照中苏协定，苏方应援助中方建设的核工业项目共 30 个。到 1960 年 9 月的统计，全部建成的项目只有 7 个。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项目 16 个，但其中有些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上还有存疑，图纸出现差错的也不少。其余 14 个未完成工程设计的项目，中方设计人员未能掌握其核心技术，大多数不得不从头开始设计。在设备供应方面，有

---

① ЦХСД，ф.4，оп.16，д.767，л.12-20， 转 引 自 *Зазерская Т.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 годы），с.106-107，122-123。

②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 742 页。

③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 109 页。

④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 33 页。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个人行为，许多苏联专家在临走时给中国同事留下了重要资料。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 371-403 页。

13 项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16 项只供应了少部分（其中一般设备多，关键设备少，有些尚未配套），1 项完全没有供给。由于有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使一些工程无法形成生产能力，迫使中方不得不组织力量从头研制和生产。总的说来，由于苏方撤走专家，中断工程设计，停止供应设备材料，使正在建设中的 9 个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有些即将建成的项目，也因苏方毁约停援，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的时间。受到严重影响的主要项目有：海军导弹靶场的建设、长波电台的建设；空军地空导弹固体火箭发动机和发射架的订货验收；五院 543 和 542 两种型号的总设计和仿制，冲压式喷气发动机 8108 项目风动设计两个专业的掌握。20 训练基地：靶场仪器安装盒故障排除，现有型号和国产型号的发射效果分析，无线电遥测系统、控制系统及计算原理，反干扰与保密相结合的问题。三机部两种导弹潜艇（623 和 633 产品）、一种导弹快艇（183P 产品）的试制、资料调正、设备安装，以及杜 16 喷气轰炸机的装配、试验、鉴定，还有上述产品的无线电配套产品（雷达、引导站、测试设备、电子引信等）的制造；哈军工高射导弹射击理论、控制回路设计和飞行理论等新专业的掌握等等。[①]

尽管如此，但客观地讲，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核工业基础的奠定和基本框架的形成，以及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还是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没有中苏在核工业方面的 6 个协定以及苏联根据协定提供的设备、图纸、资料和专家的帮助，中国的原子弹是不可能在 1964 年就试验成功的；如果没有苏联提供的地对空导弹和苏联专家的培训，中国也不可能在 1959 年 10 月以后就基本排除了国民党飞机对大陆上空的肆意骚扰。如果要判断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那么可以说，苏联在 1960 年停止提供技术、设备和撤退专家的举动，可以延缓但已经无法阻止中国的核试验成功了。[②] 对于这一点，别人可能不了解，但苏联人自己心里是有数的。1964 年 10 月 3 日，即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前 20 天，赫鲁晓夫会晤了日本议会代表团。当日本人询问中国现在是否有能力进行核试验时，赫

① 李鹰翔 2010 年 3 月 12 日给笔者的信；国防部办公厅：关于苏联军事专家问题，1963 年 5 月；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 33–34 页。

② 还需要补充的是，1961 年中苏关系短暂和缓期间，已经停运的部分重要设备又陆续运抵中国。例如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1961 年莫斯科红旗制造厂的三台球面车床，以及电解槽、交换塔等设备到货，其中球面车床是核部件生产的关键设备。中国当时无法生产这种车床，直到 10 年以后，中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球面车床才问世。（沈志华采访安纯祥记录）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联援助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作用。

鲁晓夫坦率地回答说，中国人有能力进行核试爆，而且应该已经制造出原子弹了。因为苏联不仅向中国人展示了自己的秘密工程,还给他们提供了核技术和核设备。[①]当然，后来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突破和迅速进展，关键还在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奋发图强的决心、中国经济体制集中使用资源的优势以及中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自力更生的精神。这一点，毛泽东在接到苏联全面撤退专家时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②]

简短的结论

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表现出一种既要给予援助又要进行限制的复杂心态。

中苏同盟的存在，特别是在两国全面合作的背景下，苏联必然要在核武器方面帮助中国，这种帮助，可以是提供核保护但不让中国接触核武器，也可以是提供核技术而让中国自己研制核武器。对于前者，人们比较容易理解。中央情报局当时的估计是，苏联不可能让中国掌握核武器，他们很可能在中国部署导弹和原子弹，但“几乎可以确信它们将处在苏联的监管之下”。[③]不过，毛泽东看重的不是躲在莫斯科的核保护伞下，而是要自己拥有核武器，美国人没有想到，苏联竟然会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不是一般的盟友，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支柱之一，在50年代中期，甚至是与莫斯科平起平坐，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所以，苏联那时尽可能满足中国的一切要求，而不愿意看到中苏同盟出现裂痕。第二，赫鲁晓夫个人的因素起了很大作用。1954–1955年，苏联决定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打开对中国的核援助之窗，1957年10月又将这种援助的范围扩大到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方面，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毛泽东。这一现象反映了中苏合作的基本取向：苏联在经济和技术上援助中国，而中国在政治上支持和帮助苏联。

---

① 赫鲁晓夫与日本议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3日），РГАНИ，ф.52，оп.1，д.597，л.115-151，*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ёв. 1964.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7，с.174。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00页。

③ NIE 13-58，Communist China，13 May 1958，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NIC 2004-05，Washington D.C.，October 2004，pp.123，137.

从内心深处讲，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不情愿让中国分享苏联已经掌握的秘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只是由于赫鲁晓夫要确立其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领导地位，必须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才拿出核技术进行交换。因此，一旦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这种交换的客观因素就不存在了。而恰恰在 1958 年，苏联的国力空前提高，赫鲁晓夫本人也在党内和国际上站住了脚跟。与此同时，受到炮击金门事件的刺激，赫鲁晓夫意识到中苏在对外政策方面出现了分歧，便开始考虑如何减少和制约对中国的核援助。在这里，又是赫鲁晓夫的个人情绪起了主要作用。当然，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也使苏联领导人时刻警惕着中苏关系的变化，所以，当中苏关系刚出现一点令人不安的迹象，莫斯科首先关闭的就是核援助的大门。不过，苏联不断提高对中国核援助的层次和力度，使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就具备了制造原子弹的基本条件，这是中国核武器研制能够迅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发表于《历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略有修改

试论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关系

无论毛泽东出于什么考虑，1950 年 10 月 19 日中国出兵朝鲜无疑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金日成及其政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的东方阵线”，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被传为佳话。尽管战前毛泽东决定暂不与北朝鲜签订像中苏之间那样的友好同盟条约，但中国在朝鲜战场发挥的实际作用已远远超过了法律意义上的盟友。[①] 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谈起中朝关系，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他们在战斗中结成了“鲜血凝成的友谊”。由此人们一直以为中朝友谊地久天长，中朝联盟坚不可摧。然而，随着俄国和中国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研究者渐渐发现，在朝鲜战争期间，虽然中朝两国人民的确结成了深厚友谊，但是作为实际上的同盟国，在两国高层之间存在着很多尖锐矛盾和严重分歧，在一系列战略决策和涉及各自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双方都有着不同的考量，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主张。

一、关于军队的指挥权问题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境内，与人民军并肩作战，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这也是结成军事同盟双方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为此，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 1950 年 10 月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

① 毛泽东曾向斯大林提出，待朝鲜统一后中朝之间再签订同盟条约。对此，斯大林表示同意。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 年 5 月 14 日；维辛斯基致罗申电，1950 年 5 月 16 日，РГАСПИ（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ф.558，оп.11，д.334，л.56，57。

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还说，目前金日成已转移到平壤以北的德川，金希望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说明朝鲜人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不便直接提出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①]

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则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②] 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彭德怀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德怀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③] 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此时还不宜提出，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组建的兵团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④] 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志愿军司令部，以

---

① 毛泽东致金日成电，1950年10月8日（凡未注明馆藏的档案，均为笔者通过民间渠道收藏的文件）；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10日；沈志华2000年9月12日采访柴成文记录。柴成文，中国驻朝鲜使馆参赞，在战争前期是中方领导人与金日成之间的联系人。

②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10月1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34，л.97-98。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电报只是发给北京的，平壤对此并不知情。

③ 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25日；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

④ 至10月30日，按照协议，朝鲜人民军已有9个步兵师及特殊兵种共11.7万余人撤到中国东北境内进行整编和训练。见什特科夫致扎哈罗夫电，1950年10月31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81-83。

保持联络。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1]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2] 特别是还多次发生过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 11 月 4 日志愿军第 39 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 24 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3]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 月 7 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与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但商谈的结果令人失望：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4] 在此期间，彭德怀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 6 师尚有 6200 多人，且已同志愿军第 125 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人民军第 7 师 5000 余人又与 125 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5]

金日成出于主权和尊严的考虑，不愿交出对朝鲜军队的指挥权，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在刚刚断送了几十万朝鲜军队后，他又要指挥几十万中国军队，这似乎就难以理解了。从目前看到的史料判断，金日成有此幻想，一则是不了解莫斯科的立场，二则是误解了中国人的某些说法。为了避免刺激美国，中国政府对于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特别强调其非官方的性质，所以在公开谈到部队指挥权的问题时特别谨慎。10 月 25 日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开战的消息传出以后，金日成希望中国同意公布志愿军参战的事实，以鼓舞士气。毛泽东 11 月 7 日批示：金日成在演说中可以提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统一指挥之下配合人民军反抗侵略者”，但

---

① 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45 页。

② 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2 日。

③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67 页。

④ 参见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 167 页；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 年 11 月 11 日；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49 页。

⑤ 彭德怀致军委转金日成电，1950 年 11 月 9 日；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 年 11 月 18 日。

不宜多说。周恩来也在答复中特别强调，不是“中国志愿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1 月 12 日，周在电报中再次强调，金日成演讲的措辞一定要改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总部指挥之下的参加作战。”[①] 然而，这都是一些掩人耳目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考虑过把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相反，毛泽东还特别建议要金日成尽快与彭德怀和高岗直接见面，商谈中朝两军联合作战的事宜。[②] 会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

11 月 15 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随后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显然已经了解到斯大林的意见，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德怀干脆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仍然不置可否，而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只好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③]

事关重大，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表态，他在 11 月 13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地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473、491 页。

②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 475–476 页。

③ 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 167 页；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 年 11 月 18 日。

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①] 17 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毛泽东要彭观察金日成的反应。[②]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 12 月 3 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则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以下简称联司）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需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下仍分为两个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铁道运输、修理亦划归联司指挥。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③] 金日成返回朝鲜后，12 月 7 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取消此前对人民军第 3 军团的部署，令其就近听从志愿军第 9 兵团宋时轮指挥。[④] 彭德怀对此表示满意，并反复指出，“人民军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一套严格的苏军军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学习的”；指令第 9 兵团干部，应以学习的态度去了解（人民军）第 3 军团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介绍中国建军中的各项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经验”，但如与对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运”。[⑤] 不过，毛泽东还是有些担心。他指示不要再搞联合指挥部职权条例草案了，这“不仅在两国关系上，更主要在国际关系上”都不利。毛还强调

---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 167–168 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162–163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第 100 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第 164 页。

③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第 168–169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第 122–123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 611–612 页。

④ 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50 年 12 月 6 日；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 年 12 月 7 日；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53 页。

⑤ 彭德怀致第九兵团电，1950 年 12 月 13 日、16 日、19 日；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65 页。

说，中朝联军指挥部只能在实际上组织起来，对外不宜公开，对内也只下达到军部及独立师师部。不过，有关战争各事实际上必须统一指挥。[①]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朝鲜人民军共有7个作战军团。其中4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3个军团直接隶属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②] 除了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也需要联合行动。在中国军队出动并取得初战胜利后，斯大林决定投入苏联空军参战。[③] 1950年10月29日，苏联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苏联空军的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④] 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⑤] 1951年1月初，扎哈罗夫通告，苏联空军两个师将于近日入朝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线。此外，4月初中方空军将有5个师、朝方空军将有3个师参战。因此，在苏联顾问的赞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统一的空军指挥部。后经中朝协商，于3月参照联司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及语言不通等原因，苏联空军未加入联合司令部。[⑥]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问题，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乃势在必行。斯大林只能作此选择，这也是金日成在与中国结盟时必须面对的事实。

---

① 毛泽东致志愿军总部电，1950年12月8日。

②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本），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748页。1952年7月6日，金日成致信志愿军总部，告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调金雄为民族保卫省副相，联司副司令员由崔庸健接任，金光侠出任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269页。

③ 关于苏联空军参战的最新研究，见沈志华：《对朝战初期苏联出动空军问题的再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31–4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27页。

⑤ 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1月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71-72。

⑥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第178–179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8–277页。

二、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还在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方推进时，毛泽东就与金日成的私人代表李相朝做过一次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强调，朝鲜人民面对的是非常强大的敌人，对此必须时刻牢记。人民军只顾向前进攻，后方守备薄弱，敌人很可能从后方登陆，切断人民军的交通线。毛泽东警告朝鲜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这种危险性，应该集中力量，实施战略性后撤。李相朝传达了这一意见后，金日成不仅根本听不进去，而且警告他不得把这一情况告诉任何人。[①]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 26 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②] 周恩来也持同样意见，提出除非可以在汉城地区寻机歼灭敌军，否则，不论敌固守汉城或放弃汉城，我军均要休整一个时期。[③] 但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④] 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⑤]

1951 年 1 月 3 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 3000 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

① 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1956 年 10 月 12 日，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5，оп.28，д.410，л.233-295。

② 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 年 12 月 19 日；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56 页。

③ 关于志愿军兵力和装备补充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50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 625–626 页。

④ 详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28–39 页。

⑤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245–246、249–250 页。

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①] 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②] 战局发展果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主动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作战部队造成什么创伤。鉴于此时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③]，且考虑到"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④] 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1月2日，《劳动新闻》发表了金日成几天前在劳动党中央第三次常委会上的报告。报告指出，朝鲜党和人民对三八线的划分，"不能容忍，不能坐视"。因此，当前的军事任务就是对越过三八线逃窜的敌人"积极展开追击战"，并组织"决定性战斗"。[⑤]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须休整补充。[⑥] 1月9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⑦] 同一天，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⑧]

---

①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83页；1951年1月3日彭德怀致金日成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64页。

②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1月4日，АПРФ，ф.3，оп.1，д.336，л.81-82。

③ 志愿军党委报告：此时部队"兵员不足，给养很差，体力削弱，非休整补充、改善运输供给，难以继续作战"。志愿军党委致中共中央电，1951年1月8日。参见杨凤安、王天成：《驾驭朝鲜战争的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22页。

④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内部打印本），未刊，第350页。

⑤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1年2月12日，第21期，第21–61页。

⑥ 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1年1月1日；柴成文致彭德怀电，1951年1月8日；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65–466页。

⑦ 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11页。

⑧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65页。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停战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给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①]

1月11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金、朴会谈，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是指目前形势有利，美军要退出朝鲜。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对他们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消灭美军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即展开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的。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也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

① 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记录，1951年1月10–11日。

轻敌的错误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然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自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①]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②]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月14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③]于是，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④]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

① 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66页。

②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61页；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11–112页；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第11页。

③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1月1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7，л.1-3。

④ 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1年1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п.337，л.37-40。

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①] 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在朝鲜党内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的志愿军似乎不愿意在1951年初武装干涉者遭到失败时彻底解放朝鲜。[②] 可见此事对金日成的刺激之深。

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一味蛮干的情绪，显然是受到了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在这种情绪下，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有认真考虑此时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1951年1月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决议案，从而失去了一次尽早结束战争的有利时机，并使中国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各方面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③]

三、关于朝鲜铁路的管理权问题

随着志愿军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战线的向南推移，中朝军队的后方补给线越拉越长。这时，保障军队后勤供应问题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朝鲜的经济建设因战争而受阻，到1950年底，“工业生产已完全停顿”。为了恢复和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以后，朝鲜政府便做出了“关于1951年第一季度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等一系列决定。特别是1951年2月22日“关于改进战争时期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铁路“为恢复工农业生产而保证国民经济运输的任务”。[④] 于是，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制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随之爆发。

由于朝鲜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资源不足，致使志愿军出国作战部队的供应不能取之于当地，而美军装备精良，机动性强，亦无法取之于敌人。因此，物资和装备基本上要靠国内运来。但朝鲜山地多，运途远，且路况十分恶劣，而志愿军汽车

① 拉祖瓦耶夫致莫斯科电，1951年9月1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1022–1026页。

② 费德林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4月，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28，д.314，л.48。

③ 详见沈志华：《试论1951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第125–146页。

④ 拉祖瓦耶夫给佐林的调查报告，1951年5月1日。见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藏，第1178–1195页。

数量本来就不足，加上敌机日夜轰炸，损失极大，公路运输力量更显紧张。[①] 于是，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突出。早在 1950 年 10 月底 11 月初，彭德怀即向东北局提出应加强铁路运输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还请求中央派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11 月 6 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志愿援朝大队相继入朝，与朝鲜人民军铁道抢修部队、朝鲜铁路员工并肩作战。[②]

为了改善铁路运输的管理，协调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确保前线的供给和伤员及时转运，彭德怀在 11 月 16 日与高岗会见时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铁路联合指挥机构的设想。[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方先后派人来朝，经使馆安排多次同朝方有关人员商谈，但均未有结果。直到 12 月 3 日金日成亲自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洽谈后，才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④] 到 12 月底，中国方面成立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余光生为政委、叶林为副司令员的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后改为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负责组织支前运输，并指挥抢修铁路；同时，临时设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由中朝双方共管，并充实了力量。[⑤] 1951 年 1 月 22 日至 30 日，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后勤会议，专门研究志愿军后勤工作问题。周恩来率聂荣臻等一批军方领导人专程到沈阳参加会议。在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⑥] 经过努力，中断的铁路运输在球场、定州以北（共延长 384 公里）恢复了通车，1951 年 1 月即接运 2944 列车，较上月增加 44%。到 4 月，在军管局管辖范围内的 1391 公里线路中，通车线路已达到 1321 公里。[⑦]

尽管铁路线大体恢复了通车，但后勤供应的根本矛盾并未缓解。由于中朝各自管理自己境内的铁路，难以协调，在安全保卫方面存在重大漏洞。如朝鲜铁路使用明码通讯，加上敌特活动猖獗，运输信息时常泄露，使铁路运输和仓储遭到极大破

---

① 1951 年志愿军运输汽车损失率高达 84.6%。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下册，北京：金盾出版社，1987 年，第 140 页。

② 张明远：《风雪战勤——忆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6 期，第 34 页；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下册，第 6 页。

③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49 页；张明远：《风雪战勤——忆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第 29 页。

④ 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

⑤ 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下册，第 6 页。

⑥ 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基本经验》，北京：金盾出版社，1987 年，第 41–42 页；张明远：《风雪战勤——忆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第 34 页。

⑦ 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铁路运输类）》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第 273、282、285 页。

坏。当时后方供应的物资只有 60–70% 可以运达前线，其余均在途中被毁。[①] 除了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失外，最严重的问题是铁路运输内部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调度。由于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互不了解，强调各自的重要性，争车、争路、争时间，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抢运上来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车，急需的物资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积压在后方，由此造成列车运行时间普遍延长，熙川以北山洞严重堵塞（如 1950 年 12 月底积压载货列车竟达 329 辆）。[②] 铁路军管局虽然成立，也由双方共管，但中朝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针上，究竟应该采取军事管制方式，还是仅仅实行军事代表制，尚未确定；在运力分配原则上，究竟是首先抢运军需物资，还是以民用和经济建设物资为主，也有争论。再加上组织机构极不健全，人员思想情绪不够稳定，铁路运输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为此，彭德怀向毛泽东抱怨：对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③] 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从而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已经迫在眉睫。

关于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问题，早在 12 月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就确定了基本原则。金回到朝鲜后曾对柴成文说：“前些时候关于铁路运输的军事管制问题，中国同志多次与我们的同志商谈，我们总有一些人，就是不懂得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什么也谈不上的道理。”他还说，“这件事在北京已经商妥，请你转告高岗同志，就由他委任铁路人员去办吧。”[④] 但实际上在具体谈判中却困难重重，阻力甚大。

1951 年 2 月 19 日，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叶林（东北交通部部长）、张明远（东北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彭敏（铁道兵干部）报告：在谈判中，朝方往往对问题考虑不周，提出的意见前后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确的。第一，在中朝双方的运输量超过朝鲜铁路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反对中方提出的“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的原则，而对朝鲜经济恢复的考虑较多。按照朴宪永的话说，经济就是政治，这个问题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岗出面解决。第二，要求朝鲜交通省参与对铁路的管理。虽同意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为正，朝方为副，受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但须与交通省合署办公，并建议中国也成立类似朝鲜军事交通局的机构。第三，在铁路管理

① 张明远：《我的回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年，第 370 页。

② 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铁路运输类）》下册，第 283–284 页；张明远：《风雪战勤——忆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第 33 页。

③ 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下册，第 6、3–4 页。

④ 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

机构问题上，反对实行军管制。朴宪永提出恢复朝鲜原各铁路管理局，而将已经成立的临时铁路军管局改为定州管理局。[①]

到3月中旬，双方在铁路管理的基本原则方面的意见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军管与铁路行政合二为一是战时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有效办法，而铁路军管局则是中朝联合实行军管的具体组织形式。对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对，便自行成立了军事交通局，对铁路进行控制，还恢复了原管理局机构的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号令），实际上削弱和限制了军管局，使其无法完全行使职权。为了尽快达成协议，周恩来做了妥协，除坚持“在联司指挥下设双方统一的军管司令部，统一进行抢修护路及调度车运”外，同意“在目前作战时期，朝鲜铁路行政仍需朝鲜交通相管辖”。对于中方的这个让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与朝鲜交通相朴义琓逐项谈判时，朝方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除铁路行政系统仍归交通省领导外，军管局仅负责制定计划，其作用只是对铁路运输进行检查和监督；铁路抢修工作另成立联合机构，委托交通省领导。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已经建立的中朝联合军管机构。鉴于朝方在谈判中反复无常，双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问题复杂，关系重大，认为即使形成纸上协议，也难以改变实际状况，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干部来此慢慢谈判”。彭德怀亦无可奈何，提出将交通省的意见呈金日成，由双方政府出面解决，只求朝方能“确保军运如数完成，确定铁路管理和运输的具体办法”。[②]

随后，针对朝方提出的三项原则，即铁路行政隶属朝鲜交通省；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任正职，朝方任副职；成立统一铁道兵团司令部（即中方所说抢修司令部），同样是中正朝副，高岗提出了五点商榷意见：一、坚持对朝鲜铁路的军管制度，但可实行军事代表制，在联运司下设各级军事代表，中正朝副，军事代表对一切军运有最后决定权。二、联运司设在沈阳，派总代表驻朝交通省，监督军运计划执行。三、要求朝方保证联运司与其总代表及各级军事代表间电话畅通。四、成立统一抢修司令部，受联运司领导，同时受朝交通相及联运司指导。五、在朝中国员工受朝铁路局领导，其政治工作则受中国军事代表直接领导。叶、张、彭据此与朝交通相再次谈判。除对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尚未明确表态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岗的五点意见，但要求确定朝交通省对其所属各铁路管理局行使管辖权。关于运输问题，朝方同意原则上全部通车，由联运司审核批准军用物资和国民经济

① 叶、张、彭至高岗电，1951年2月19日。

② 叶、张、彭致高岗电，1951年3月15日；彭德怀致高岗并周恩来电，1951年3月22日。

所需物资的运输比例。至于交通省及其所属各管理局，朝方请中国派人任副职。双方商定，将谈判记录整理签字后，呈报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况后，周恩来一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争取能在记录中列入有关联合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内容，一方面也只得同意叶、张、彭在记录上签字，并将全文带回北京。[①] 恰在此时，莫斯科的意见到来，扭转了局面。

据当事人张明远观察，中朝会谈之所以争执不下，其实质是联运司领导权归谁所有的问题。中方代表认为，当时朝鲜的铁路和机车大部被毁，铁路运行的车辆主要是中国开来的，而抢修线路、运送物资的部队和司乘人员都以中方为主，甚至维修线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鲜铁路员工的供应也都是由中方负责。从这些实际情况看，朝鲜方面难以协调指挥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所以，战争期间的中朝铁路联运应由中方牵头。但朝方以及苏联驻朝鲜顾问坚持认为，对铁路运输的管理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必须由朝鲜领导。对此，周恩来曾指出，问题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并表示要同苏方协商，以求妥善解决。[②]

就在周恩来电告中方代表准备在谈判记录上签字的当天，斯大林来电表示了苏联的最后立场："我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刚刚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意见，即为正确组织部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司令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这个意见的，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将损害朝鲜的主权。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布）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我们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了顺利地进行解放战争，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为朝鲜本身的利益着想，中国和朝鲜之间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国家关系。"[③] 周恩来当即将这一电文转给高岗和彭德怀，并表示可以继续"力争联合铁路修复司令部归联司或运司指挥或仍进一步提议将朝鲜铁路管理局置于军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暂缓签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请朝交通相到沈阳再谈。[④]

在此后的谈判中，中方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1951 年 4 月 16 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需要，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即在联司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

---

① 周恩来致高岗、彭德怀电，1951 年 3 月 25 日。

② 张明远：《风雪战勤——忆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第 34 页。

③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 年 3 月 25 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724–725 页。

④ 周恩来致高岗、彭德怀电，1951 年 3 月 25 日。

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①] 有斯大林的明确表态，金日成不得不做出让步。5月4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对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运力分配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协议精神，7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刘居英为局长兼政治委员，中朝各出一人为副局长，统一负责朝鲜战区铁路运输的管理、组织与实施。军管总局下设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个分局，共有援朝员工1.2万余人。8月1日，在沈阳成立了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联运司），受中朝联合司令部直接领导，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司令员，张明远兼政治委员。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联运司的前方派出机构——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刘居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朝各有一人为副司令员，负责指挥和协调军管总局、抢修指挥部和铁道高炮指挥部的工作。铁道兵团增加为4个师又3个团，还有援朝工程总队，总人数达5.2万余人。从此，在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下，铁道运输部队、抢修部队及高炮部队密切配合，协同行动，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作战方针，大大提高了铁路运输效率。[②]

铁路管辖权是中朝争论中唯一涉及朝鲜内政和主权的问题，彭德怀在1959年受到批判时对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强调的，对铁路实行军事管制是在战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处理办法，并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将铁路交还朝方管理。[③] 不过，在莫斯科干预下强加于人的做法，毕竟给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

四、关于停战谈判和结束战争的问题

朝鲜战争历时三年，但是从1951年7月至战争结束，打打停停，多一半时间都是在停战谈判中度过的。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朝双方在停战时机的问题上，也是分歧不断，争论不休。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终于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④] 金日成却仍然急于求成，反对战争长期化的打算，要求中朝联军6月末至7

---

①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第204页。

② 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下册，第6–7页；《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基本经验》，第66–67页。

③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第352页。

④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741–742页。

月中旬再发动一次总攻。毛泽东只得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经过商谈，金日成同意6-7月不发动进攻，但还是要求经过准备在8月发动一次反攻。[①]毛泽东无奈，只好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②]斯大林详细询问了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给毛泽东回电："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③]金日成无法再坚持己见，朝鲜战争由此进入边谈边打的阶段。[④]

据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回到朝鲜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要求，并在谈判中立区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拉祖瓦耶夫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⑤]

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

---

① 金日成致彭德怀电，1951年5月30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51年6月11日。

②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5日、9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23，28-29。

③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31-32。

④ 关于停战谈判的详细过程，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对于中国的决策研究，参见牛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停战谈判决策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35–47页。对于美国的决策研究，参见邓峰：《追求霸权：杜鲁门政府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34–45页。

⑤ 拉祖瓦耶夫致莫斯科电，1951年9月1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1022–1026页。档案复印件未显示收电人。

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①] 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1952 年 2 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 90 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②] 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困境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苏联军事装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③]

5 月 2 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 5 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 1952 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

① 至少到 1951 年 11 月中旬，毛泽东仍然相信有关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见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 年 11 月 14 日，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6-19。

②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 年 2 月 8 日，АПРФ，ф.45，оп.1，д.342，л.81-83。

③ 拉祖瓦耶夫 1952 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转引自 *Волохова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2，с.104。

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①] 显然为了照顾朝方的意见，7 月 3 日，中朝代表团提出新建议：除了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②] 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 7 月 13 日提出了总共遣返 83000 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 80% 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 32%）这个基本数字，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③] 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

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 7 月 15 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用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在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后再告诉平壤。[④] 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中国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⑤] 金日成在 7 月 16 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表示赞同他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⑥] 但是就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却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

---

① 拉祖瓦耶夫 1952 年第二季度工作报告，转引自 *Волохов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гг., с.104。

②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电，1952 年 7 月 7 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1182–1183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49–250 页。关于美国对停战谈判策略的转变及其原因，详见沈志华：《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史学集刊》2006 年第 1 期，第 66–75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第 289–290 页。该电的俄国档案见 АПРФ，ф.45，оп.1，п.343，л.72-75。

⑤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第 280 页。

⑥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 年 7 月 18 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1187–1189 页。毛泽东在此电中附带了金日成 7 月 16 日回电。

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①

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做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 年 11 月 17 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 100 名战俘，以动摇敌人军心。18 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②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 年 11 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③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继任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他们扣留了 13094 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 6430 人在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战争前期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 42262 人——北朝鲜认为这些人不是战俘。④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领导人当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

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1952 年 7 月 15 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⑤

---

① 拉祖瓦耶夫致斯大林电，1952 年 7 月 17 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1184–1185 页。

②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449 页。

③ 参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 242 页。

④ *Волохов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гг.，c.106, 108.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50 页；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2 年 7 月 16 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1186 页。

周恩来随后于8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中应采取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①]

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问道，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

①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9月19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1195–1204、1227–1232页。

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1] 1952年11月10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提案，24日又提出补充建议。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赞同苏联的提案和建议，即先停战，再解决全部遣返战俘问题。[2]

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苏联援助物资的问题。不过，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中朝之间在是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这也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争论。1953年3月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3] 但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为此，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借以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而朝方则要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不必追究。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取得成功。[4]

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其对朝鲜北方的统治。而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则必须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对朝鲜战争期间中朝联盟真实状况的回顾和探索，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结论：

一、毛泽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决心派兵入朝作战，表明中共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忠诚，同时也在实际意义上让中国承担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由此，中苏同盟得到巩固，毛泽东也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于是，中国在战争中的主张往往得到苏联的支持。

二、由于大规模、持续不断地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掌握了中朝方面对于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实际主导权，而斯大林则不得不放弃战前苏联对朝鲜的完全控制。而在中苏两个大国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朝鲜只能"忍辱负重"，

---

① 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谈话记录，1952年9月4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1214–1221页。

② 周恩来关于支持苏联建议的声明，1952年11月28日，外交部档案馆，113-00118-01，第3–5页。

③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388–414页。

④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第352页。

采取服从的态度。

三、尽管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和矛盾时，最后都是朝鲜依从中国的主张，但毛泽东的本意并非要侵犯朝鲜主权、干涉朝鲜内政，也没有像斯大林战前那样追求对朝鲜的控制。究其原因，一方面中朝关系如同中苏关系，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结构性弊病，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际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毛泽东熟读中国古书，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在他的头脑中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中央王朝”的统治理念。中国与朝鲜之间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宗藩关系，其特点之一就是宗主国并不要剥夺外藩的主权，而只是要求其臣服和追随。

四、金日成有一种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又要在朝鲜建立起他个人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而朝鲜劳动党内部派别林立，其中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南方派、莫斯科派和延安派。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延安派成员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并与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无疑令金日成感到不安。这种心理障碍，再加上中国军事领导人时而表现出来的对朝鲜指挥和作战能力的轻视，使得中朝高层之间缺乏一种超脱意识形态的真诚和信任，从而给他们的同盟及合作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为战后中朝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1期

左右逢源：朝鲜战后经济重建与外来援助（1954-1960）

近些年，国际学术界加强了对朝鲜战争后朝鲜[①]历史以及朝鲜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其推动因素主要有两个：朝核危机及东北亚紧张局势需要人们探究其历史根源；俄国和东欧档案披露了冷战时期朝鲜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大量史实。[②]研究的重点首先是朝鲜政治外交史，其中主要是苏联因素的影响，尤其集中在1956年八月事件上。[③]其次是讨论朝鲜经济发展的问题，其中韩

① 本文使用"朝鲜"一词，如无特别说明均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② 这些档案很多已经译成英文发表：Csaba Békés and Vojtech Mastny，"Inside North Korea：Selected Documents from Hungarian and Polish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iect (CWIHP) Bulletin*，Issues 14/15，Winter 2003-Spring 2004；Sergey Radchenko，"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vies"，*CWIHP Working Paper*，No.47，April 2005；James F. Person（ed.），"New Evidence on North Korean in 1956"，*CWIHP Bulletin*，Issue 16，Fall 2007/Winter 2008；"Limits of the Lips and Teeth Alliance—New Evidence on Sino-DPRK Relations 1955-1984"，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Document Reader*, No.2，March 2009。另见CWIHP网站的Virtual Archive。

③ 白俊基：《20世纪50年代北韩政治冲突背景与苏联》，历史问题研究所编：《1950年代南北韩的选择与屈折》，首尔：历史批评出版社，1998年，第442–494页（韩文）；Andrei Lankov，*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 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London：Hurst & Company，2002；徐东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体制成立史：1945–1961年》，首尔：善仁出版社，2005年（韩文）；Balázs Szalontai，*Kim Il sung in the Khrushchev Era.Soviet-DPRK Relations and the Roots of North Korean Despotism, 1953-1964*，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下斗米伸夫（Shimotomai Nobuo）：《莫斯科与金日成——冷战中的北朝鲜（1945–1961）》，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日文）。其中集中讨论1956年八月事件的有：James Person，"We Need Help from Outside：The North Korean Opposition Movement of 1956"，*CWIHP Working Paper*，No.52，August 2006；Shimotomai Nobuo，"Pyongyang in 1956"，*CWIHP Bulletin*，Issue 16，Fall 2007/Winter 2008；*Си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НДР в 1953-1956 гг.: причины и динамик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9，№3。

国学者主要是从北朝鲜内部或南北朝鲜对比的角度考察其经济体制的建立。尽管意识到外援尤其是中、苏的经济援助，是朝鲜战后经济重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资料短缺，韩国学者鲜有针对经济援助的专著问世。[①] 而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重点讨论的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朝鲜经济发展的影响。[②] 目前，研究战后中朝关系，特别是中国与朝鲜经济关系的成果还不多见。[③] 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囿于政治环境，中国学者很难开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多人也不愿踏入这块是非之地。[④] 但是，面对当前朝鲜问题对于东北亚局势走向和国际安全保障的特殊意义和影响，中国学者无疑有责任进入这个研究领域。

尽管中国档案解密和开放的程度与国际水平还差得很远，但毕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主要表现在外交部档案和一些地方档案的开放。如果充分加以利用，再结合俄国和东欧各国档案文献（其中涉及中朝关系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于战后中朝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进行研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本文有意在这方面做一尝试，讨论的时间范围限于朝鲜战后重建这一历史时期。所谓重建，即国民经济恢

---

① 参见如下韩文论著，宋永奎：《北韩社会主义建设的实现过程——以 1953–1958 年的发展路线为中心》，高丽大学，硕士论文，首尔，1990 年；金圣甫：《南北韩经济结构的起源和发展：北韩农业体系的形成》，首尔：历史批评出版社，2000 年；金鍊铁：《北韩的产业化和经济路线》，首尔：历史批评出版社，2001 年。不过，韩国在较早时期收集和编纂的一些资料，还是很有价值的。如南炫旭：《中、苏对朝援助及贸易状况（1946–1978）》，韩国国土统一院调查研究室，1979 年 2 月，未刊。

② Bernd Schafer, "Weathering the Sino-Soviet Conflict：The GDR and North Korea，1949-1989"，*CWIHP Bulletin*，Winter 2003/Spring 2004，Issues 14/15；Balázs Szalontai，"'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1963-1964"，*CWIHP Bulletin*, Issues 14/15,Winter 2003-Spring2004；Charles K. Armstrong，"'Fraternal Socialism'：The Intern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Korea，1953-62"，*Cold War History*，Vol. 5，No.2，May 2005。

③ 比较重要的论文有：Shen Zhihua，"Alliance of 'Tooth and Lips'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ino-North Korean Alliance，1946-1958"，*Working Paper Series* 08-09，The U.S.-Korea Institute at SAIS，December 2008；Bernd Schaefer，"North Korean 'Adventurism' and China's Long Shadow，1966-1972"，*CWIHP Working Paper*，No.44，October 2004；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3 期（2009 年 3 月）；《朝鲜劳动党内权力斗争与中朝苏三角关系》，（香港）《二十一世纪》2010 年 4 月号；成晓河：《"主义"与"安全"之争：60 年代朝鲜与中苏关系的演变》，《外交评论》2009 年第 2 期。笔者最近与保加利亚学者阿果夫接触，得知他刚刚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专门讨论战后朝鲜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关系的：Avram Agov，North Korea in the Socialist World：Integration and Divergence，1945-1970，Ph.D.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Vancouver，2010，Unpublished。

④ 至少公开出版物是这样，如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中朝关系通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年）。2001–2002 年，中国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要期刊《东北亚论坛》刊载的与朝鲜半岛相关的文章共 81 篇，其中竟无一篇是讲中朝关系的；在 2003–2005 年的 158 篇文章中，涉及中朝关系的也只有 5 篇。人们对这一话题忌惮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参见朴键一主编：《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

复。1953 年 8 月 5 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制定了重建工作的规划，决定分三个阶段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阶段是准备时期，计划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执行三年计划（1954–1956），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恢复到战前水平；第三阶段实现五年计划（1957–1961），建立工业化的基础。① 本文将梳理 1953–1960 年② 中国援助朝鲜的过程，并试图探究这种援助的特征、成因及结果。

一、准备时期（1953–1954）

三年多的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经济损失极其严重。据 1954 年 3 月苏联使馆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资料撰写的详细报告，在战争期间，朝鲜人口锐减近 120 万（此外还有 60 万人被征兵），造成劳动力严重匮乏。直接经济损失达 4200 亿朝元（约合 140 亿卢布），有近 9000 座工业建筑、60 万所住宅、5000 所学校、1000 家医院、263 座剧院和电影院以及数千其他文化生活机关变成废墟。一些最重要的工业品产量急剧减少：电力生产从 1949 年的 59.24 亿度下降到 1953 年的 10.16 亿度，相应地，采煤量从 394.3 万吨减少到 68.8 万吨，钢从 14.4 万吨减少到 0.35 万吨，水泥从 53.7 万吨下降到 2.65 万吨，食盐从 28 万吨下降到 4.2 万吨，有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如冶金、化学、燃料遭到彻底破坏。交通业损失 615.86 亿朝元，424 个火车头及 11118 节车厢被完全炸毁，14 个港口和港湾及 1600 座服务性建筑遭到轰炸。国家商业网点全部遭到破坏，1237 个商场无一幸存。农业损失也很严重，除大量农作物被毁外，被宰杀和被掠走的牛羊 10.9 万头，猪 13.5 万头，毁坏果树 8.9 万棵。③

早在战争期间，金日成就为战后的经济恢复心急如焚。1952 年因铁路管理权和停战谈判问题，朝鲜与中国发生严重矛盾和争执，其核心问题就在于此。④ 所以，朝鲜停战协定刚刚签字，金日成首先想到的寻求经济援助的对象，不是与其长期并

①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金日成文选（1945–1967）》，1982 年，未刊，第 51–52 页。

② 1959 年朝鲜宣布五年计划提前两年完成，但跟着又宣布 1960 年作为“缓冲期”，调整一年。故第三阶段实际上到 1960 年结束。

③ 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编：《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拉祖瓦耶夫关于六·二五战争的报告书》，首尔：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印行，2001 年 6 月，第 34–53 页。另参见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 年 4 月 7 日，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5，оп.28，д.314，л.33-63；朴昌玉关于朝鲜人民经济恢复发展的三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 年 4 月 24 日，第 3 版。

④ 详见梁镇三：《中朝在韩战期间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0 期（2003 年 6 月），第 55–98 页；Shen Zhihua, “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CWIHP Bulletin*, Issues 14/15, Winter 2003/Spring 2004, pp.9-24.

肩作战的中国，而是一直处于幕后的苏联。1953 年 7 月 31 日，金日成交给苏联使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造成的损失情况以及恢复工业所需要的苏联的帮助。[①]同一天，朝鲜政府正式提交了一份照会，请求苏联派遣 62 名专家到朝鲜，帮助制订经济恢复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计任务的计划。照会详细列举了所需专家的清单和恢复项目的主要参数，并强调说，聘请苏联专家“十分必要，因为朝鲜人自己无法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②]8 月 3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决定向朝鲜提供 10 亿卢布的援助，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③]金日成得到消息后，立即在 8 月 5 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六中全会宣布：“苏联政府已经通知，决定给我们 10 亿卢布的援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政府也都做出了关于提供援助的决定。在这些国家已经掀起了一个帮助朝鲜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群众性运动。”[④]

金日成有些一厢情愿了，莫斯科的热情并没有朝鲜人期望和宣传的那么高。早在停战协定签字前，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就叮嘱驻朝使馆，在接到朝鲜政府的正式申请前，不要与他们讨论派遣专家的问题，在朝苏联顾问也不要向朝鲜政府提任何建议。苏联政府还要求在朝专家向朝鲜人建议，“在确定工业恢复计划时，要以朝鲜国民经济最必要的需求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恢复的内部潜力作为出发点。”但 8 月 7 日苏联使馆报告，根据情报，朝鲜政府的打算是请求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对恢复其遭到破坏的工业企业提供全面援助，而苏联要承担的是“几乎全部被破坏的大型企业”。具体办法是苏方提供工程技术人员、设备和材料，朝方则负责当地建筑材料和劳动力。从朝鲜的现有计划看，其“主要考虑不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内部潜力，而是指望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获得最大援助”。[⑤]显然，苏朝之间对援助问题的考虑是有差距的。

8 月 10 日，金日成向苏联驻朝首席军事顾问鲍里先科提出，要去莫斯科就经济恢复等问题与苏联政府进行会谈。[⑥]就在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也做出决议，责成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外贸部长米高扬研究对朝鲜的援助问题。根据这个决议，莫洛托夫指示驻朝大使苏兹达列夫正式通知金日成，苏联已决定给予朝鲜 10 亿卢

①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2，оп.09，п.44，д.4，转引自 Charles K. Armstrong，“‘Fraternal Socialism’：The Intern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Korea，1953-62”，p.163。

② 苏兹达列夫提交的朝鲜政府照会，1953 年 8 月 5 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5，д.779，л.3-6。

③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1953 年 8 月 3 日，АПРФ，ф.3，оп.65，д.779，л.1。

④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金日成文选（1945–1967）》，第 69–70 页。

⑤ 苏兹达列夫的请示电，1953 年 8 月 7 日，АПРФ，ф.3，оп.65，д.779，л.7-10。

⑥ 鲍里先科致索科洛夫斯基电，1953 年 8 月 10 日，АПРФ，ф.3，оп.65，д.779，л.28-29。

布的援助，并要求朝鲜政府就如何具体使用这笔援助款项提出意见。[①]8月12日，金日成再次向苏联大使提出访问莫斯科的要求。8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金日成于9月初访苏。[②]

经过协商，苏朝政府于9月19日签订了援助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将在两年内向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6亿用于工业企业的修复扩建，如金策制铁所、城津炼钢厂、南浦冶炼厂、水丰发电厂、兴南肥料厂、平壤纺织厂和一部分电气铁路等；4亿用于新建项目，如平壤丝织厂、沙里院拖拉机修理厂、平壤红十字中央医院、中央广播电台等。苏方负责设计方案、施工图纸、设备供应和安装及培训朝方技术干部。此外，对于此前苏联给予朝鲜的2.98亿卢布贷款推迟了归还期，即从1957年起10年内以商品偿付，利息也从原来的2%降为1%。朝鲜在战争期间所欠非贸易付款债务（约0.73亿卢布）被免除50%，其余部分从1957年起两年内归还。对于专项贷款也推迟了还款日期，缩减了还款数额。[③]看来，苏联人是有精细算计的，而这个援助力度显然未能满足朝鲜的要求。回到平壤后，金日成一方面派商业相李周渊赴东欧各国求援，一方面准备亲自前往中国。

其实，还在战争后期朝鲜就开始寻求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并小有收获。1953年11月李周渊走访了波、捷、匈、罗、保、阿和东德，又争取到大批援助。除阿尔巴尼亚只同意提供1.2万吨沥青及布匹外，其余每个国家都答应无偿援建2–5个工业企业，并赠送大量生活日用品等物资。不过，东欧国家在恢复时期对朝鲜的援助总体规模并不大，这些国家的援助金额总计11.47亿卢布，其中仅东德就占一半（5.45亿），而使用期限则长达10年。到1954年底，所有东欧国家援助实际使用的金额加在一起只有2.02亿卢布。[④]正如匈牙利学者指出的，“平壤对不能够向其提供实质援助的共产党国家建立联系的兴趣不大”，而“这种冷淡经常被证明是相互

① 苏中央主席团决议，*1953年8月10日，АПРФ，ф.3，оп.65，д.779，л.2*；莫洛托夫致苏兹达列夫电，1953年8月11日，АПРФ，ф.3，оп.65，д.779，л.11-12。

②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3年8月17日，АПРФ，ф.3，*оп.65*，д.779，*л.2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1953年8月19日，АПРФ，ф.3，оп.65，д.779，л.25。

③ 费德林的调查报告，1953年12月31日，АВПРФ，ф.0102，оп.7，д.47，п.27，л.115-120；费德林给*И.*维诺格拉多夫的信，1956年9月29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307-327；《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7日，第6版。所谓专项贷款，可能指军事贷款，见后。

④ K. I. 科瓦利致勃列日涅夫函附件（2），1956年4月16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170-172；《人民日报》1954年1月24日，第6版；《人民日报》1956年7月9日，第5版。另参见Bernd, Schafer，Weathering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The GDR and North Korea，1949-1989, p. 25；Charles K. Armstrong，“Fraternal Socialism”：The Intern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Korea，1953-62，pp.168-169，174-175。

的”。[①]

然而，金日成在中国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据苏联外交部的观察，战后中朝关系有一种“不正常现象”：志愿军司令部“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战争展览馆的 12 个战绩展厅中，只有一个专门给中国人看的展厅集中讲述了中国志愿军的功绩，而在其余所有的展厅中，只宣传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根本没有关于志愿军的内容；在军事装备修理等相关问题上，朝鲜人不想与中国人共事；朝鲜党内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中国军队在 1951 年初美军遭到失败时不愿意彻底解放朝鲜，如此等等。[②] 在这种氛围下向中国伸手，朝鲜人多少有些尴尬。[③]

让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北京两个星期访问所得，竟然远远超出了在莫斯科的收获。关于对朝鲜的援助，中方提出签署《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七个文件，金日成完全接受。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还表示，可以签署一个秘密的技术合作协定。[④] 根据已经公开的材料，中国的援助包括：1950 年 6 月至 1953 年底中国援助朝鲜的 72900 亿元[⑤]（合 14.5 亿卢布）全部免于偿还；在 4 年（1954–1957）期限内，再提供 80000 亿元（合 16 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 1954 年提供 30000 亿元（合 6 亿卢布），这些款项将用于供应工业原料、建筑材料、机器设备、粮食和其他用品，以及修复铁路和桥梁；在 3 年（1954–1956）期限内，中国自费收养 22735 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 7186 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此外，中国在其他方面给予朝鲜的援助条件，也比苏联优惠得多。根据中朝协议，对于赴朝工作的中国专家，朝鲜政府只需支付他们在中国所领取的同等工资（含出差和补助费）、医疗费、住宿费和交通费，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而按照苏联派遣专家的要求，除此之外，朝鲜政府每年还要支付每个专家相当于在苏联一个月

① Balázs Szalontai, “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 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 1963-1964, pp.87-90.

② 库尔久科夫给波诺马廖夫的报告，1955 年 4 月 7 日，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28，д.314，л.33-63。

③ 金日成或许还记得，新中国建立前夕，中朝在商谈鸭绿江电站的电力分配时，中国希望得到总发电量 40 万千瓦的 50%，而朝鲜只答应输送 2 万千瓦，尽管在该电站建设时中国的投资大于朝鲜。科瓦廖夫关于与中共代表团会谈情况致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7 月 6 日，АПРФ，ф.3，оп.65，д.363，л.20-23。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77 年，第 334–335 页。

⑤ 当时的旧人民币 1 万元，折合 1955 年 3 月以后的新人民币 1 元。

工资额的旅行费、休假补贴费、相当于两个月工资额的补助费（高等院校），特别是每月要按照专家的技术等级向苏联政府支付2000–4000卢布的原单位损失费。来华实习的朝鲜员工，可以享受与中国同等技术人员或技工相同的待遇，包括公费医疗，只需支付住宿费。朝鲜政府仅承担实习人员来往的旅差费。而按照苏联关于接受实习人员的规定，所有的费用都要朝鲜方面承担，此外还要支付指导实习的费用，平均每人每月100–150卢布。对于朝鲜留学生，中国只向朝鲜政府收取发给学生的助学金和国内旅费，而苏联则要收取包括教学、住宿等在内的一切开销的50%。比较中苏对朝鲜的援助力度，甚至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都感到相形见绌，所以建议与财政部一起向部长会议提出修改有关苏朝协议的条款。[①]

如此看来，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后来人民币与卢布的折算方法有变[②]，苏联对朝鲜无偿援助的金额也因为免除朝鲜归还贷款而有所增加。[③]但无论如何，考虑到中国本身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那么这样的援助力度和决心，确实是超乎寻常的。[④]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表明此时中苏在援助朝鲜方面已进入了一种“竞争”状态。[⑤]这样理解未免过于超前，需知当时中苏关系还处在上升时期，况且中国战后的经济恢复

① 费德林的调查报告，1953年12月31日，АВПРФ，ф.0102，оп.7，п.27，д.47，л.115-120；《人民日报》1953年11月24日，第1版。关于朝鲜实习人员和中国专家条件的协定书，见上海市档案馆，A38-2-352，第50–52页。另据中国有关资料，战争期间中国对朝鲜贸易顺差8053万美元，1953年都无偿赠送给朝鲜。（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300页。）但这笔款项是否已算入对朝援助的72900亿元，不得而知。此外，阿果夫引用东德的档案证明，1953年中国与朝鲜还签订了一项1500万元（2760万卢布）的物资援助协议，其中66.3%以物资形式兑现，33.7%则指定以资金和项目形式兑现。Avram Agov，North Korea in the Socialist World: Integration and Divergence, 1945-1970, p.207.

② 两年以后，苏联对中国提供援助金额折算卢布的计算方法有变。根据苏联外贸部的资料，中国提供给朝鲜的商品价格远远高于苏联商品的出口价格，如此计算，中国援助朝鲜的80000亿元人民币只约合8.5亿卢布（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4月，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45-48）。此后苏联对援助金额的统计，均按照这种方法。卢布与人民币的比价，1955年3月以前为1卢布等于人民币5000元，中国发行新币后，应为1卢布等于0.5元。1958年中朝两国贸易改以卢布为计算单位，经国务院批准，1卢布暂照0.95元人民币计算。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摘转关于中朝贸易改以卢布计价后负责结汇问题通知，1958年2月4日，湖北省档案馆，SZ73-02-0351-007。

③ 1956年苏联减免对朝的5.6亿卢布贷款，1960年减免了7.6亿卢布贷款，后来朝鲜又赖掉了对苏联的欠债1.4亿卢布（Avram Agov, North Korea in the Socialist World: Integration and Divergence, 1945-1970, p.208）。这14.6亿卢布自然可以视为苏联对朝鲜的无偿援助。

④ 1953年中国的国家预算收入233.5万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照此计算，中国向朝鲜提供的无偿援助已占整个国家预算收入的3.4%。

⑤ Kim Deok，“Sino-Soviet Dispute and North Korea”，*Korea Observer*，1979，V.10，No.1，p.12.

也要仰仗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又怎么可能有意去同苏联竞争？对于中国这种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援助他人的行为，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另有所图"。毛泽东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而中国是亚洲革命的领导者，又在历史上与朝鲜颇有渊源，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就必须做出非常的努力和牺牲。用周恩来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时的说法，就是"把中朝两国人民传统的战斗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①]

在朝鲜经济重建初期，兄弟国家的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提供的资金在1954年朝鲜国家财政预算中至少占31.6%。苏联援助的主要是工业项目，尤其是重工业。截至1954年10月1日，苏联帮助恢复和新建的工业企业达100个（其中新建项目22个，大型工业企业30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安排失当，许多发运到朝鲜的机器设备（尤其是金属切割机床）未能及时到达企业，而是长期尘封在仓库里。如果说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工业设备和原料，那么中国的援助除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外，重点是提供生活消费品。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等。[②] 培养朝鲜的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仅1954年来到中国的朝鲜实习生就有3000多人（以后增加到1万多人）。到上海的实习生共269人，基本上都分配在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企业，其中国营或公私合营企业39人，私人企业222人。[③] 到沈阳的509人，多数是由中国抚养的朝鲜孤儿。他们被分派到31个工厂，学习机械制造等方面的生产技术，准备一年后回国参加建设。[④]

除了资金、技术和物质的援助，中国对朝鲜重建做出的最值得注意且无可替代的贡献，就是几十万志愿军官兵所提供的大量无偿劳动力。这一点，在朝鲜劳动力极为紧缺的战后初期，显得尤其重要。在停战后3个月内，志愿军铁道兵便修复、修整和新建桥梁308座，全长1.5万米，并修复车站37处，协助朝鲜铁路员工全部恢复了朝鲜北部原有铁路线。此外，在城市重建，修筑水坝、河堤、水渠，植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35页。

② 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4月，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45-48。另有统计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占1954年朝鲜财政收入的35%。见后。

③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朝鲜实习生来上海市实习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1954年6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A38-2-352，第1–4页；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6页。

④ 《人民日报》1956年8月25日，第2版。

树造林，春播秋种，修建民宅，修复校舍等各个方面，志愿军都投入了巨大人力支援。[①] 仅 1957 年上半年，志愿军投入朝鲜经济建设的人力就达 43 万个劳动工日。到 1958 年全部撤军前，志愿军共帮助朝鲜修建公共场所 881 座，民房 45412 间，修复和新建桥梁 4263 座，修建堤坝 4096 条，全长 429220 米，修建水渠 2295 条，长达 1218.71 公里，进行田间劳动 8.5 亿坪，送粪 1314.6 万担，植树 3608.65 万棵，运送粮食物资 63853 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 2126.05 万斤，衣物 58.9 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 188.39 万人次。[②]

1954 年 3 月 11 日朝鲜内阁通过的决定宣布，"已胜利地完成了一九五三年的计划，即全面地恢复发展人民经济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和整理工作"，并开始执行经济恢复发展的三年计划（1954–1956）。[③]

二、三年计划期间（1954—1956）

1954 年 4 月 22 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朴昌玉在最高人民会议第七届会议做关于三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几天后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三年计划的法令：到 1956 年，工业总产量要超过战前水平，达到 1949 年的 1.5 倍（其中消费品生产约 2 倍）。在农业方面，水稻总产量超过战前水平 19%，杂粮 9%。国民收入将比 1949 年增长 30% 以上。[④]

在三年计划时期，苏联继续保证工业设备的供应，而中国对朝鲜的帮助，除少量的轻工业设备和企业的援建外，主要是提供生活用品和工业原料。[⑤]1954–1957 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口总额 9.22 亿元，进口总额 1.27 亿元，其差额 7.85 亿元，主要以外援平衡。中国提供的主要商品是：粮食（主要是小米）44.9 万吨，大豆 17.8 万吨，棉纱 3950 吨，棉花 35590 吨，棉布 8847.6 万米，煤炭 345.6 万吨，焦炭 26 万吨，橡胶 1.12 万吨；从朝鲜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海产品、铁砂、化工原料和

① 《人民日报》1954 年 3 月 31 日第 1 版，6 月 25 日第 3 版，5 月 9 日第 1 版，5 月 28 日第 1 版，6 月 6 日第 1 版。

② 《人民日报》1957 年 10 月 25 日第 5 版，1958 年 10 月 31 日第 3 版。

③ 《人民日报》1954 年 3 月 23 日，第 4 版。

④ 《人民日报》1954 年 4 月 24 日第 3 版，4 月 27 日第 4 版。

⑤ 详见南炫旭：《中、苏对朝援助及贸易状况（1946–1978）》，第 10 页。

苹果等。[①]在三年计划施行阶段，朝鲜超过 80% 的工业项目重建是在兄弟国家的帮助下完成的。[②]而完全是由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负责建设的工业项目（不算军事项目共 90 个），占此期朝鲜恢复和新建工厂总数的 20%。[③]

朝鲜的三年计划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功。按照朝鲜当局公开的材料，1955 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约等于战前五年和平建设期间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三倍。当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已完成计划的 106%，并超过战前 1949 年水平的 56%。到 1955 年底，朝鲜重建或恢复和扩大了 290 个以上的大、中工业企业，包括机器制造、冶金、采矿等部门。[④]就是说，在工业总产值方面，三年计划已经提前一年超额完成。然而，被公开报道和媒体宣传隐瞒的事实是，在三年计划期间出现的严重问题和重大危机，其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过大，造成预算赤字。由于追求高速度，三年计划不断加大国民经济投资。根据苏联有关部门的统计，朝鲜国家财政收入总额 1954 年 871 亿朝元，1955 年 979 亿朝元，预算支出总额 1954 年 806 亿朝元，1955 年 999 亿朝元，其中用于国民经济的投资，1954 年 439 亿朝元（占 54%），1955 年 608 亿朝元（占 61%）。1955 年出现财政赤字 20 亿朝元。更重要的是，财政收入增加 108 亿朝元，而支出却增加了 193 亿朝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基本建设投资（169 亿朝元）。从财政来源讲，来自兄弟国家资金的减少是收入未能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1954 年的外援 304 亿朝元（占财政收入的 35%），1955 年为 234 亿朝元，减少了 70 亿朝元。[⑤]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外援在朝鲜经济重建中的作用和地位。

其二，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早在 1955 年 1 月苏联外交部就建议，有必要提醒朝鲜同志注意，在恢复期间的工业发展方面，“应增加

---

① 李富春关于中朝贸易谈判的请示，1957 年 9 月 30 日，中国国家计委档案科。东欧档案列举的数字与中国档案差距较大，尤其是煤炭、棉布等。见 Avram Agov，North Korea in the Socialist World，Integration and Divergence, 1945-1970, pp.206-207。

② Charles K. Armstrong，“‘Fraternal Socialism’：The Intern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Korea，1953–62”，p.164.

③ Avram Agov, North Korea in the Socialist World: Integration and Divergence, 1945-1970, pp.256-257.

④ 《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3 日第 4 版，3 月 26 日第 3 版。

⑤ 科瓦利致勃列日涅夫函附件（1），1956 年 4 月 16 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164-167。朝币与人民币的比价，1959 年 3 月以前为人民币 1 元等于朝币 105 元，朝鲜发行新币后改为人民币 1 元等于朝币 1.05 元。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转知朝鲜发行新币及中朝货币比价及供苏国换结汇问题，1959 年 3 月 6 日，湖北省档案馆，SZ73-02-0386-029。

居民消费品各部门生产的比重”，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国家经济的实际条件和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①] 但金日成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建立了强有力的重工业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整个工业、运输业、农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②] 据朝鲜国家统计局的公报，1955 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 1954 年增长 62%，而生活资料的生产只增长了 37%。[③] 结果导致居民生活呈现出物质匮乏的现象。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 600–800 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也得不到，而当时朝鲜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 1500 朝元，但市场上一米棉布就要 300 朝元，一条领带要 300–500 朝元。尽管如此，当苏联提出在援助计划内增加一部分消费品时，却遭到拒绝，朝鲜政府坚持还是要工业设备。[④]

其三，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业。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引起农民不满，加上农业投入不足，取缔粮食买卖，从而造成普遍的粮食恐慌。朝鲜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农业，而是寄希望于合作化的高潮。生产合作社在短短 4 个月（1954 年 9–12 月）间从 998 个（1.87 万农户）猛增到 10098 个（33.27 万农户），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产量低于 1953 年的水平，不足 230 万吨，而计划是 300 万吨。不满的农民屠宰牲畜，吃掉种子，只是坐等国家的资金帮助。[⑤] 各地上报的粮食收成大约每町步（约 15 亩）30–35 公担，但实际上不到 20 公担。由于虚报粮产，再加上过高的实物税（23–27%），农民实际缴纳的粮食已经超过其收成的 50%。1955 年春天，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乞丐和流浪者的人数迅速增加，抢劫和犯罪行为也大大增多。强制性的征收以及禁止粮食出售，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

① 库兹涅佐夫向苏斯洛夫提交的材料，1955 年 1 月 13 日，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24-27。

② 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提纲，1955 年 4 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金日成文选（1945–1967）》，第 95 页。

③ 《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3 日，第 4 版。

④ 彼得罗夫与《新朝鲜》杂志编辑谈话纪要，1955 年 4 月 6 日，ЦХСД，ф.5，оп.28，д.314，л.200-207；彼得罗夫与慈江道人民委员会主席谈话纪要，1955 年 3 月 31 日，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187-193；匈牙利驻朝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1955 年 4 月 13 日，MOL（匈牙利国家档案馆），XIX-J-1-j Korea，7.doboz，5/f，006054/1955，*CWIHP Bulletin*，Issues 14/15，Winter 2003-Spring 2004，p.107。

⑤ 科瓦利致勃列日涅夫函附件（3），1956 年 4 月 17 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174-176；库兹涅佐夫向苏斯洛夫提交的材料，1955 年 1 月 13 日，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43-46；彼得罗夫与《新朝鲜》杂志编辑谈话纪要，1955 年 4 月 6 日，ЦХСД，ф.5，оп.28，д.314，л.200-207。

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①]

中国在1954和1955年分别提供的13万吨和15万吨粮食以及苏联紧急援助的5万吨小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朝鲜解决了燃眉之急。[②]面对苏联的批评和建议，朝鲜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使危机得到一定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5年的粮食总产量244万吨，虽然超过了1954年，但还远未达到1949年的水平（280万吨）。蔬菜、棉花只完成了计划的54%和34%。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仍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当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③]针对党内出现的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金日成采取了转移视线和转嫁罪责的做法。在1955年4月召开的劳动党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金日成激烈批评延安派的朴一禹、金雄、方虎山等人，指责他们搞宗派主义小集团。粮食危机则归罪于主管经济工作的朴昌玉（莫斯科派）和金一（游击队派），要他们为此承担责任。金日成在会议结束时提出：苏联和中国都不会永远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准备自己应付一切困难。[④]金日成如此说法，其主要原因在于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干部分别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而这无疑是对金日成权威的挑战。[⑤]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1955年12月28日，金日成对宣传鼓动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严厉指责莫斯科派的许哥而、朴昌玉、朴永彬和延安派的朴一禹。金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

---

① 彼得罗夫与慈江道人民委员会主席谈话纪要，1955年3月31日，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187-193；匈牙利驻朝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1955年5月10日，MOL，XIX-J-1-j Korea，5.doboz，5/c，006048/1955，*CWIHP Bulletin*，Issues 14/15，Winter 2003-Spring 2004，pp.107-108。另参见*Си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НДР в 1953-1956 гг.: причины и динамика，с.126。

② 库尔久科夫给波诺马廖夫的报告，1955年4月7日，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33-63；伊万诺夫日记，1955年12月4日至15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1-62。另参见Balázs Szalonta, "'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 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1963-1964"，p.90。

③ 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的报告，1956年4月14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136-151。另参见*Си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НДР в 1953-1956 гг.: причины и динамика，с.127。

④ 彼得罗夫与慈江道人民委员会主席谈话纪要，1955年4月5日，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197-199；彼得罗夫与《新朝鲜》杂志编辑谈话纪要，1955年4月6日，ЦХСД，ф.5，оп.28，д.314，л.200-207。朴一禹曾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副政委，与中国联系密切。他的真正罪名是向志愿军透露了粮荒中饿死人的情况，金日成对此颇为恼怒，破口大骂。朴不服，会后又给志愿军写信，结果遭到软禁。沈志华2010年2月17日采访金忠植（原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组织部长）记录。

⑤ 参见*Си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НДР в 1953-1956 гг.: причины и динамика，с.129；Balázs Szalonta, "'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 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1963-1964"，p.90，及沈志华采访金忠植记录。

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因此，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①] 为了突出“主体”，朝鲜领导人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兄弟国家给予的大规模援助，更不能把经济建设的成就归结到这一点上。[②] 金日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维护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和领导地位，并非有意冒犯苏联和中国。金日成非常明白，朝鲜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苏联和中国的援助。所谓“主体”，只是政治上和政策上保持自立，并不排除经济上依赖外援。所以，尽管在内部讲话如此激昂慷慨，在考虑未来的五年计划时，金日成首先想到的还是要向莫斯科和北京寻求援助。

1956 年 2 月参加苏共二十大期间，内阁副首相崔庸健请求苏联政府延缓贷款的归还日期并免于归还到期款项。此外，还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援助。朴昌玉后来告知，朝鲜希望在未来的五年计划期间再得到 10 亿卢布的物资援助，并估计中国也会答应给予同等数量的援助。5 月出访莫斯科之前，金日成向苏联大使重复了这些要求，只是把无偿援助的金额降至 5 亿卢布。同时，朝鲜希望东欧国家（主要是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同意免除朝鲜的一切债务，还打算向东德借款。[③]

6–7 月，金日成亲自率团访问苏联和东欧，收获并不如愿。东欧国家都强调自身的困难，不愿再增加新的无偿援助，只有东德，经过反复商讨，答应从以前援建咸兴市的剩余资金中，拨出 1800 万卢布作为无偿援助，用于向朝鲜提供日用品。罗马尼亚同意借款，没有确定数额。[④] 还是苏联慷慨一些，但只答应提供 3 亿卢布无偿援助，并取消 5.7 亿卢布的债务。[⑤]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冷漠，一方面是出于经济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朝鲜的不满。苏联大使伊万诺夫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56 年 4 月）的文件表明，朝鲜“在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时，没有放弃建立自己的闭关自守的经济，也没有关注进一步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联系以及他们之间形成的劳动分工的问题”。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金日成

---

①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金日成文选（1945–1967）》，第 116–131 页。

② 详见普扎诺夫日记，1957 年 6 月 19 日至 7 月 8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31-145；Bernd Schafer, Weathering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The GDR and North Korea，1949-1989, p. 28.

③ 费拉托夫与朴昌玉谈话纪要，1956 年 3 月 12 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73-85；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 5 月 17 日至 6 月 1 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171-194。

④ 伊万诺夫日记，1955 年 12 月 20 日至 1956 年 9 月 24 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86-117，253-276，316-333。

⑤ 匈牙利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1956 年 6 月 10 日，KTS（匈牙利公使馆文件），12. doboz，25/j，005594/1956，转引自 Balázs Szalontai，“‘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1963-1964”，p.91。

在洋洋万言的总结报告中，对于经济恢复时期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大规模无偿援助，竟只字未提。[①]

在困难时刻，金日成当然不会忘记向中国求援。朝鲜代表团自欧洲回来后，便开始进行准备。8月初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与中国使馆会谈后，起草了关于请求中国提供援助给朝鲜政府的建议。大使乔晓光估计，金日成将率团出席中共八大，届时会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援助的问题。同时，朝鲜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交了1957年商品供应协议草案。根据该协议，中国将向朝鲜出口商品2亿元，而朝鲜出口中国的商品仅4000万元，其差额未作说明，但给中国人的感觉是朝鲜政府有意请中国一笔勾销这个缺口。8月21日金日成在与乔晓光会谈时提出，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朝鲜政府无法满足居民的物质需求，因而请中国继续给予援助。[②]然而，几天后发生的劳动党八月事件，导致中朝上层关系急剧紧张，金日成决定不再前往北京出席中共八大。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召见正在出席中国八大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崔庸健，严厉指责朝鲜党迫害持不同政见的干部的做法，还派彭德怀（米高扬陪同）去平壤，迫使朝鲜劳动党撤销八月全会的决议。其结果，中国对朝鲜提供援助的问题自然也提不上议事日程了。尤其是11月朝鲜提出请联合国出面调解朝鲜半岛问题的建议后，毛泽东更加不满，认为朝鲜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金日成要走铁托或纳吉·伊姆雷的道路。[③]显然，此时朝鲜很难指望再得到中国的援助。

1956年9月朝鲜要求中国第二年再额外给予5000万元的无偿援助，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朝鲜不得不取消事先商议好的金一副首相访华的安排。[④]在关于1957年贸易的谈判中，中国也没有满足朝鲜关于提供粮食的要求。朝鲜坚持要中国供应20万吨粮食，而中国只答应给9万吨，后经反复谈判才同意提供15万吨。[⑤]11月28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抱怨说：周恩来不久前召集人民

① 伊万诺夫关于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56年5月19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1，л.143-159。

② 彼得罗夫日记，1956年7月20日至8月3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309-314；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6日至24日、8月29日至9月14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334-359，315-333。

③ 毛泽东接见尤金谈话记录，1956年11月30日；苏联驻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22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л.139-163。

④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29日至9月14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315-333；伊万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12月28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86，л.1-17。

⑤ 苏联驻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22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л.139-163。

民主国家的大使，讲述了国内状况，表示中国在二五计划结束前无法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任何新的援助。因此，朝鲜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查 1957 年的计划，并将被迫压缩建设资金，减少购买中国的焦炭和煤气。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只得再次转向莫斯科。金日成请求苏联在 1957 年额外援助棉花 1500 吨，并帮助解决该年度 3100 万卢布的财政赤字。金日成一再强调，"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①] 另一方面，或许是考虑到上述情况，劳动党中央 1956 年 12 月全会决议宣布，三年计划的资金来源不少是靠兄弟国家的帮助，而一五计划将主要依靠国内资源。[②]

朝鲜的态度打动了莫斯科，加上东欧危机已经过去，苏联开始转变了对朝经济援助的态度。1957 年 2 月苏共中央批准了 1957 年苏朝贸易协定和向朝鲜无偿供货协定，除了按照协定向朝鲜供应大量机械设备、工业材料和其他物资外，苏联还决定在 1957 年的出口额度之外再向朝鲜发送 4 万吨小麦，并同意接受朝鲜提供的 10 万吨锌精矿、3.5 万吨碳化钙及额外的 5000 吨独居石（磷铈镧）精矿（朝鲜富余但苏联并不需要）。为了进口朝鲜货物，责成苏联财政部和苏联内务部于 1957 年第一季度向外贸部划拨 500 公斤国产黄金以兑换自由外汇。苏联还同意将 1949 年双方签订的商品流转和支付协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1957 年，同意金日成的特别要求——提前使用 5000 万卢布的无偿援助。此外，为了满足朝鲜请求的额外援助，苏联政府同意按照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从朝鲜进口商品。[③]

三、五年计划期间（1957—1959）

1957 年上半年，中朝关系仍然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苏联新任大使普扎诺夫 4 月 10 日通报，朝鲜将于 5–6 月完成五年计划的制订，金日成表示将把计划草案交给苏联和中国，以听取意见和协调相互责任。乔晓光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未必能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追加援助。[④] 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于 6 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其目的是前往学习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中国迟迟不予答复，后来告知这次访问只能安排在 7 月进行。朝鲜领导人

① 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 11 月 14 日至 28 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1，л.287-313。

② 朝鲜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提法，1958 年 1 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外交部档案馆），106-01129-01，第 21 页。

③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57 年 2 月，РГАНИ，ф.5，оп.30，д.228，л.15-36。

④ 普扎诺夫日记，1957 年 4 月 5–12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15。

还不断向苏联人抱怨，与中国大使难得见面，也很难相处。[①]不过，从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对朝鲜的态度开始转变。从平息非斯大林化引起的思想混乱，到协助苏联解决东欧危机，中共作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开始参与处理社会主义的欧洲问题。特别是在苏共六月“宫廷政变”中支持赫鲁晓夫，巩固其在党内的地位后，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和作用愈加突出，毛泽东的感觉也越来越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和苏共已经成为平起平坐的领导者，毛泽东也有意在这方面负起责任。[②]为此，中国有必要对朝鲜表现出宽宏大量。

1957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新任驻华大使李永镐时谈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更加团结起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还表示“我们要和朝鲜继续合作，加强团结”。[③]金日成对此有所感觉，并立即做出反应。7月初，朝鲜劳动党在继续揭露和批判1956年8月“反党小集团”的同时，却决定释放朴一禹，并同意让他回到中国。在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崔庸健坚持不能释放朴一禹，认为这将是对叛逃分子的鼓励。但金日成力主或者给朴安排工作，或者让他回中国去。金日成强调，“中国同志一定会相信朝鲜劳动党中央，而不是个别不满的人。”[④]随后，朝鲜决定8月底派代表团前往中国，商讨一五计划和双边贸易的问题。

朝鲜代表团7月底到莫斯科商谈五年计划时，曾提出希望苏联同意延期归还将于1961–1962年到期的2.4亿卢布的贷款，遭到拒绝。苏共领导人对朝鲜这样层层加码的援助要求已经感到厌烦，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指出，朝鲜的计划不现实，速度过快；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必须偿还贷款并按期支付利息。赫鲁晓夫说，让金日成偿还贷款，否则不再提供新的贷款，我们的原则是“要算经济账”。[⑤]遇此挫折，朝鲜人对中国会给予多少援助也没有寄予希望。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表示，过去曾向中国提出过高的要求，这一次我们力求减少。[⑥]于是，朝鲜希望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保持低调，在访问计划中没有直接提出援助问题，甚至要求不公开活

---

① 普扎诺夫日记，1957年5月6–29日，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44-113。

② 详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第二篇第三、四、六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③ 毛泽东会见李永镐谈话记录，1957年6月21日。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第2版。

④ 普扎诺夫日记，1957年7月11–31日，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46-164。

⑤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8月6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7，л.64-65об；普扎诺夫日记，1957年8月16–30日，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93-236。

⑥ 普扎诺夫日记，1957年8月31至9月30日，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275-300。

动，不发表消息。[1] 然而，朝鲜人又一次得到意外的收获。

1957年9月13日至10月6日，以金一为团长的朝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对朝鲜的五年计划，中方总体上表示赞同，但认为增长速度定得过快（高于中国一五计划水平），农业投资不够（年平均投资低于三年计划），积累率和投资率过高（按同样价格计算远高于中国），消费水平也显得目标偏高（超过中国1962年水平）。中方代表通过讲述中国的经验，间接地就这些问题向朝方提出了建议。在贸易方面，中方确定的方针是：根据双方需要和可能的原则，在物资供应上帮助朝鲜解决困难。据中方估计，1958–1961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超将达到人民币8000万到1亿元。其差额中方决定不再以无偿援助或贷款的方式解决，而是尽可能进口一些中国并不急需的朝鲜物资，以促进朝鲜自身的生产建设。由于中国二五计划尚未确定，故这次只商谈1958年的贸易问题。对于朝鲜最关心的几项物资，中国都尽力予以解决。如煤炭中国1958年计划缺口在600万吨以上，但还是完全满足了朝鲜的需要（87万吨）。硫磺中国自己也缺，橡胶还要靠从国外进口，也都满足（硫磺）或基本满足（橡胶）了朝鲜的需求。只有棉花难以达到朝鲜的要求。中国连续两年未完成棉花播种计划（1956年差500万亩，1957年差700万亩），因此打算1958年从苏联进口几万吨棉花。这样，对于朝鲜要求供应的棉花（12000吨）、棉纱（1500吨）和棉布（1000万米），经过反复谈判，中方最后答应提供的只有8000吨棉花、500吨棉纱和500万米棉布。至于进口物资，水泥、漂白粉、硝酸铵三种大宗物资，以及黑铅等，中国实在不需要，且无法转口，故不能接受。除此之外，尽量接受了朝鲜的货单，如中国的碳化钙已经过剩，而朝鲜要求出口3万吨，最后还是接受了8000吨。朝方对谈判结果感到满意，认为“基本上解决了要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2] 在实际执行中，中国又做出一些让步，如对贸易差额的处理。因中国无偿援助的款项到1957年已经用完，而朝鲜能够向中国提供的物资很少，故此前双方贸易额有限。为满足朝方需要，除提供一般物资贷款外，中国采取了扩大贸易的积极措施。中朝年度贸易总额1957年仅5601万美元，1959年即猛增至11584万美元，翻了一番，1960年更达到12037万美元。而中国对朝贸易年年出

---

① 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经济代表团访华活动的文件，1957年8–9月，外交部档案馆，117-00665-03，第10–11、14–15、20–24页。

② 李富春关于中朝贸易谈判的请示，1957年9月30日，李富春关于中朝贸易谈判情况的报告，1957年10月4日，国家计委档案科；普扎诺夫日记，1957年10月1–25日，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257-307；尤金与李永镐谈话纪要，1957年10月19日，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255-256。

超，1957–1960 年共计 6229 万美元，这些差额最后基本上都由中国用贷款的方式解决了。[①]

为了彻底改变中朝关系，毛泽东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在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见金日成，当面承认 1956 年中共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并建议金日成赦免那些逃到中国的干部，然后接受他们回国。金日成表示“朝鲜已经不需要这些人了”，毛泽东则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人反对朝鲜。为了解除金日成的后顾之忧，毛泽东还主动提出将志愿军全部撤退回国，并准备派周恩来亲自前往朝鲜安排。最后，毛泽东表示想亲自去朝鲜访问，金日成立即说，他将组织最盛大、最热烈的欢迎仪式。后来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毛泽东的谈话“十分亲热、友好和坦诚，我们对此非常满意”。[②]

在这样的气氛中，中朝携手迈进了 1958 年。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朝鲜则仿效中国开展了“千里马”运动。毛泽东从莫斯科回来后，便积极推动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群众运动，随后又在全国推动了人民公社化。[③]这股热浪很快就波及到朝鲜，6 月 11 日金日成便要求“全体劳动者响应党的号召，骑着千里马，朝着社会主义奔驰”。朝鲜先后派出 4 个专业代表团到中国考察和学习，主要报刊也不断介绍中国“大跃进”的情况。8 月 3 日以李周渊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访华，行前金日成指示他们，要“认真学习，细致研究，把学到的经验带回朝鲜”。在为时月余走访近 100 个企业、单位后，代表团感触颇深，认为“中国的大跃进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它将扭转全世界的历史”。接着，朝鲜报纸开始发表社论，批判保守主义，提出“钢铁和机械是工业之王”的口号。同中国一样，朝鲜也开展了除四害、消灭血吸虫的全民卫生运

① 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年，上册第 301 页，下册第 371 页。差额数字为笔者根据年度贸易额计算所得。此外，朝鲜 1949、1953 和 1956 年从苏联得到的贷款约 17.7 亿卢布，到 1961 年只归还了 0.8 亿卢布，其余的大部分被减免，小部分被暂缓偿还。Avram Agov, North Korea in the Socialist World: Integration and Divergence，1945-1970, p.208.

②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7 年 11 月 9 日，АРАН，ф.1636，оп.1，д.199，л.1-6；普扎诺夫同金日成的谈话纪要，1957 年 11 月 12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至于先后逃亡中国的 15 名朝鲜高级干部，1958 年初被分别从北京和沈阳迁往内地四川（4 名）和山西（11 名）安置，作为“朝鲜劳动党反党宗派分子”，他们长期隐名换姓，受到严密监视和控制，有的后来甚至被判刑、劳改。直到 1981 年这些朝鲜干部才得到平反，在中国安度晚年。四川省档案馆，建川 1-7-617，第 1–10 页；建川 1-7-813，第 7–20 页。山西省档案馆，C54-2009-66-3、C54-1011-39-8、C59-1-83-14。沈志华 2011 年 2 月 19 日采访金忠植记录；沈志华 2010 年 2 月 16 日采访金刚（原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记录。

③ 详见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第一、二、三章，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动，在工业建设中大力提倡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全民大炼钢铁，在农村全力推行合作社合并，大办公共食堂。学习中国的“全民皆兵”，朝鲜也在城市、工矿和农村广泛建立“工农赤卫队”，并下发武器。金日成号召全国“继续苦战 1–2 年”，并说：“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再斗争 4–5 年，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①]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随着双边关系日益密切而不断加大力度。1958 年 2 月周恩来在访问朝鲜期间说，中国可以继续向朝鲜提供棉花，每年 1 万吨是有可能的，还主动问朝鲜需要多少焦炭，并答应考虑给予满足。周恩来还提出志愿军撤出之前可以帮助朝鲜人民军修筑工事，并建议中朝合建云峰水电站，中国可以先行垫付朝鲜的投资（金日成接过话题说，按照日本人的资料，在鸭绿江上可以建设三个水电站）。回国后，周恩来吩咐外交部马上落实上述事项。[②] 周恩来的态度对朝鲜是一个鼓励。6 月初，朝鲜提出请中国再援建一个纺织厂和两个纸袋厂。根据周恩来和陈毅的指示，国家计委立即邀集有关部门协商，并很快做出答复：中国同意援建这三个工厂，以无息长期贷款的方式（自 1961 年开工后起 10 年内还清）。[③] 接着，朝鲜方面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8 月 3 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到京，与中国进行提供工业设备和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谈判。在成套设备方面，朝鲜要求中国援建年产 1 万锭的绢织厂三个，1960–1962 年每年建成一个。年产 100 万套的轴承厂、年产 1.5–3 万吨的制糖厂、年产 10 万吨的面粉厂各一个，分别于 1959–1960 年建成。提供日产 30 吨的造纸设备 6 台，1959–1960 年交货；50 吨 / 小时的锅炉及发电设备 4 台，1960–1961 年交货。中方基本上同意了这些要求，只是建议制糖厂和面粉厂应根据原料产地建成分散的小厂。在专用设备及机床方面，朝鲜要求从 1958 年底至 1961 年为其供应

① 朝鲜劳动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方针政策问题的提法，1959 年 6 月 4 日，外交部档案馆，106-01129-04，第 44–63 页；接待朝鲜政府代表团的收获和一些工作体会，1958 年 9 月 19 日，外交部档案馆，204-00315-03，第 42–51 页；朝鲜代表团简况并附中方参加谈判人员名单，1958 年 9 月 30 日，外交部档案馆，204-00315-04，第 53–55 页；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秘书蔡喜正的报告，1958 年 10 月 10 日，外交部档案馆，106-01131-01，第 2–17 页；朱德接见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58 年 11 月 22 日，外交部档案馆，204-00064-01，第 1–8 页；中共上海市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朝鲜简况和中朝关系的资料，1959 年 11 月，上海市档案馆，A52-2-945，第 64–66 页。另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11 日第 5 版、12 月 9 日第 5 版、1959 年 5 月 20 日第 5 版；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 年 3 月 3 日，第 2719 期，第 19–20 页。

② 普扎诺夫日记，1958 年 2 月 14 至 3 月 1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32-60；周恩来总理在访朝鲜期间允诺或交办的事情，1958 年 3 月，外交部档案馆，203-00111-04，第 84–86 页。

③ 关于帮助朝鲜建立三个工厂的问题，1958 年 6 月 12 日至 7 月 8 日，外交部档案馆，204-00614-02，第 36–38 页。

冶金设备 17 种 29 台（部）、选矿设备 11 种 97 台、大型机床 15 种 20 台、针织机 50 台、宽轨用小型机车 7 台、宽轨用磨砂车 100 台等。当时中国正处在“大跃进”中，有关部门感到朝鲜的有些要求交货日期太紧（4 种冶金设备、5 种大型机床），有些设备中国制造能力有限，国内供应还有缺口（磨砂车）。但最后还是基本上满足了朝鲜的需求。此外，双方还签署协议，共同投资建设云峰水电站，由中方提供贷款，朝鲜政府将自 1963 年起分十年以货物偿还。朝鲜提出再建一个义州水电站，中方曾有所考虑，但最后未达成协议。根据双方签订的 1959–1962 年贸易协定，中国方面将供应朝鲜煤炭、棉花、棉纱、轮胎、炼锡、压延钢材、锰铁、硫磺、石蜡、石膏等主要物资。这次两国会谈涉及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确如《人民日报》文章所说：中朝经济关系已进入长期合作的新阶段。[①]

如果说在朝鲜三年计划期间中国主要供应的是生活消费品，那么从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已经转向以提供工业设备和物资为主。[②] 为此，10 月 18 日双方又签订了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章程和执行决议的共同条件，决定成立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每年至少开会一次，其工作范围包括互相提供图纸、资料、样品，互相派遣专家、实习生，互相委托技术鉴定等。[③] 合作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仅要求上海市承担的工业项目就有 22 项，并规定 1958 年底和 1959 年初将相关资料提交给朝方。[④]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凡援外商品，商业部优先保证供应，铁道部、交通部优先安排运输。所有援外项目，必须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计划，作为确保项目。临时追加的项目，在设备和原料不足的情况下，各部门和地区可以从国内项目中尽先调剂使用。[⑤] 金日成对中国的帮助非常满意，并一再表

① 中朝双方关于设备供应及电站建设问题的谈判情况，1958 年 8 月 5 日；朝鲜政府代表团抵京后情况简报，1958 年 8 月 31 日，外交部档案馆，204-00315-04，第 57–67、69–71 页；佩利申科与曹克强谈话纪要，1958 年 9 月 3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3；《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28 日，第 1、3 版。

② 详见南炫旭：《中、苏对朝援助及贸易状况（1946–1978）》，第 11 页。

③ 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章程和执行决议的共同条件，1958 年 11 月 18 日，上海市档案馆，B163-2-666，第 1–9 页。

④ 上海市计委催交中朝科学技术合作承担项目函，1958 年 12 月 16 日，上海市档案馆，B163-2-66，第 10–12 页。

⑤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1958 年 10 月 26 日，上海市档案馆，B134-1-11，第 1–4 页。

示感谢。[①] 中朝关系进一步升温。

1958 年 11 月 22 日，当金日成时隔 5 年后再次访问中国时，气氛已不可同日而语。北京 30 万人夹道欢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对于中朝关系，《人民日报》报道使用的词汇十分感人："唇齿相依、安危与共、亲如手足、休戚相关"。[②] 会谈中，毛泽东说，我们肯定朝鲜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的方针就是三个尊重：尊重朝鲜民族，尊重朝鲜党，尊重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非常激动，一再表示两国关系非同一般，很多朝鲜干部到过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双方表示要更多接触，加强非正式互访，并谈到几年后携手进入共产主义。谈到经济发展时，金日成趁机说，朝鲜缺乏原料，主要是棉花和焦炭，毛泽东当场拍板：棉花你们要多少给多少。周恩来补充说，朝鲜所要的 100 万吨焦炭也答应提供了。[③] 此外，劳动力短缺是朝鲜实现五年计划的严重障碍。尽管采取了大力推广机械化、动员妇女参加劳动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平壤市机关下放人员达 50%）等措施，但对于实现 1959 年跃进的目标，缺乏劳动力仍成为朝鲜经济建设的突出困难。[④] 金日成自然想到了大量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族居民，他在访华期间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派遣中国籍朝鲜族人移居朝鲜参加经济建设。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反应，决定迁送 4 万名东北朝鲜族居民，并计划在 3 月底前抵达朝鲜，以便让他们赶上春耕生产。为了扩大朝鲜劳动力的来源，中国驻朝使馆还对定居朝鲜的 13000 名华侨进行调查，了解他们是否愿意转为朝鲜籍。但调查并未取得积极结果，由于传统和习惯，旅居朝鲜的华侨都希望继续保留中国国籍。[⑤] 对这次访问，朝鲜领导人和新闻界予以充分肯定，并大力宣传。其结果不仅把中朝关系推向高峰，而且最终巩固和加强了金日成在朝鲜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⑥]

与此同时，朝鲜也向苏联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中国无法提供的设备和物资，如生产载重汽车需要的 5000 吨冲压机，以及 1300–1400 吨不锈钢等。苏联大使感到有困难，表示能够提供的不锈钢数量只有朝鲜要求的十分之一。金日成不得

---

① 朱德接见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58 年 11 月 22 日，外交部档案馆，204-00064-01，第 1–8 页；周恩来接见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58 年 11 月 27 日，204-00064-02，第 9–25 页。

② 《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23 日，第 1 版。

③ 毛泽东会见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6 日。

④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 年 3 月 3 日，第 2719 期，第 19–20 页。

⑤ 普扎诺夫日记，1959 年 1 月 21 日至 3 月 24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26-64。

⑥ 详见普扎诺夫日记，1959 年 1 月 2–20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1-25。正是 1958 年，金日成对劳动党进行了大规模整肃。详见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第 181–182 页。

不直接写信给赫鲁晓夫求援。1958 年底苏联贸易代表团访朝，带来了赫鲁晓夫的回信。金日成感谢“苏联政府一贯竭尽所能，充分满足朝鲜方面的要求”，并指出苏联拟定提供的机器、设备、材料，特别是不锈钢、拖拉机、推土机、挖掘机和汽车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①] 为了进一步得到苏联的援助，朝鲜的政治态度也需有所转变。在 1959 年 1 月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含蓄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针提出批评。[②] 出席这次大会的金日成立即表示，报告内容十分深刻，“我们从赫鲁晓夫报告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究竟该走怎样的路，才能更快、更好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金日成在大会发言中强调，朝鲜一直在学习“苏联农业集体化方面的丰富经验”。[③] 两国领导人会谈时，金日成虔诚地接受了苏联对朝鲜不切实的经济发展方针的批评，而赫鲁晓夫则答应满足朝鲜的进一步要求。[④]3 月 17 日，苏朝签订了新的经济合作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朝鲜提供价值 5 亿卢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帮助，以协助朝鲜建设火力发电站、化工厂、麻纺厂和毛织厂，及扩建金策制铁所和平壤丝织厂。[⑤]

由于超强的国内动员机制和大规模的外援帮助，朝鲜的经济发展在 1958–1959 年确实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的数字，1958 年工业总产值比 1957 年增加了 40%，等于 1956 年的两倍，1949 年的四倍。粮食产量超额 12% 完成计划，达到 370 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 341 亿朝元，比前一年增长了 26%。1959 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 75%，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长 7%。5 月 8 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发表公报宣布：到 1959 年 8 月 15 日将提前两年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⑥] 欢欣鼓舞的朝鲜领导人不断宣称，到那个时候，朝鲜人均主要工业品和谷物产量，不仅会超过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还要超过资本主义的日

---

① 普扎诺夫日记，1958 年 9 月 29 至 10 月 17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佩利申科与金日成会谈纪要，1958 年 12 月 24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3。此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页码模糊。

② 《人民日报》1959 年 2 月 1 日，第 5–8 版。

③ 普扎诺夫日记，1959 年 1 月 21 至 3 月 24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26-64；Правда，30 января 1959 г.，8-й стр.

④ 普扎诺夫日记，1959 年 1 月 21 至 3 月 24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26-64；匈牙利驻朝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1959 年 12 月 16 日，MOL，XIX-J-1-j Korea，11. doboz，24/b，001660/1960，*CWIHP Bulletin*，Issues 14/15，Winter 2003-Spring 2004，pp.112-114。

⑤ 《人民日报》1959 年 3 月 19 日，第 4 版。

⑥ 《人民日报》1959 年 1 月 17 日第 4 版，3 月 26 日第 4 版，5 月 9 日第 4 版。

本。[①]

然而，同三年计划一样，朝鲜执行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也伴随着严重缺陷和问题。根据苏联和匈牙利有关部门的报告，在1957—1959年间朝鲜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工业各部门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如电力和燃料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其他部门，造成两次被迫缩减计划；工业品质量低劣，甚至用于出口的钢材和耐火砖都无法达到技术标准；大量小型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铸铁等产品完全是废品，造成人力和资金的浪费；城市工人和职员人数激增，导致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55%）大大高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31%）；由于大量劳动力转向城市和改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缩减，粮食总产量（含玉米）呈下降趋势（1958年实际为343.7万吨，1959年340万吨）；城市人口增加带来消费品需求增长，被迫消减大宗农产品出口，导致外贸严重逆差，如对苏联的芝麻、蓖麻籽和葵花籽的出口，只完成了计划的6%、7%和27%。[②]朝鲜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四、“缓冲”时期（1960）

对于这些问题，朝鲜领导人是有所感觉的。早在1959年中宣布将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时，金日成就提到1960年将成为“休养年”，尽管没有进行解释。[③]8月中旬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公报称1960年为缓冲期，即调节和整顿经济，准备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改为七年计划）的一年。[④]为此，朝鲜开展了新一轮求援活动。1959年6月，朝鲜要求苏联紧急供应3万吨小麦，并把1960年到期的1.23亿卢布贷款延长5年。赫鲁晓夫马上答复，不仅批准了朝鲜的要求，还把贷款期又多延长了两年。[⑤]1960年2月，朝鲜又提出在贸易协定之外，请苏联再紧急供应5万吨粮

① 金日成在全国市郡党委员会鼓动员讲习会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金日成文选（1945–1967）》，第178页；Balázs Szalontai，“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gram，1953-1988”，*CWIHP Working Paper*，No.53，August 2006，p.4；《人民日报》1959年2月22日，第3版。

② 斯卡奇科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6月11日，РГАНИ，ф.5，оп.30，д.337，л.70-92；Balázs Szalontai,，“‘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 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 1963-1964” pp.93-95；普扎诺夫日记，1960年2月1–15日，АВПРФ，ф.0102，оп.16，д.6，л.28-61。

③ 普扎诺夫日记，1959年4月25日至5月19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78-116。

④ 《人民日报》1959年8月31日，第5版。

⑤ 普扎诺夫日记，1959年5月21至6月19日，7月3–30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117-144，154-185。

食，此外还希望能够满足朝鲜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苏联很快就答应将提供粮食。[①] 当然，这些临时帮助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5 月 2 日金日成与苏联大使会谈时提出，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很快来朝鲜，他就要去莫斯科。普扎诺夫试探性地询问朝鲜需要什么帮助，金日成提出，要实现七年计划，朝鲜还缺少 9–10 亿卢布的外汇，另外希望从苏联得到 1.5 万吨棉花和 10 万吨粮食。[②] 在分析了朝鲜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苏朝经济关系后，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提出，在计划和协定之外，让苏联再向朝鲜提供补充援助的可能性不大。[③] 然而，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1959 年 10 月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为了争夺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双方开始了理论争论，并试图吸引兄弟国家站在自己一边。[④]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为了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竞相对其表示友好和善意，援助金额和规模攀比上升。金日成则左右逢源，两面讨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1959 年 10 月初，苏联推迟了金日成期待和准备已久的赫鲁晓夫对朝鲜的访问，其实际原因是担心因此破坏他访美后形成的缓和局面。金日成对此极为不满。[⑤]1960 年 5 月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双方在政治上立场取得一致。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金日成赞扬《列宁主义万岁》这篇论文很好，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还说，赫鲁晓夫 1955 年就叫我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接受；还认为我们的合作化搞得太快，后来我们看了毛主席的文章，决定继续搞下去。[⑥] 苏联也不甘落后，半个月后，赫鲁晓夫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通报了中共领导人在世界工联会议上的错误做法，以及在 1956 年八月事件中如何拉苏联干预朝鲜的内政。金日成开始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劝说中苏和解。随后，赫鲁晓夫指示把 1956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交给金日成。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金日成可能会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伊姆雷。金日成看后，果然愤怒异常，并立即表示，

① 普扎诺夫日记，1960 年 2 月 1–15 日，2 月 16 日至 3 月 24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6，д.6，л.28-61，72-122。

②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1960 年 5 月 2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6，д.6，л.184-187。

③ 斯卡奇科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 年 6 月 11 日，РГАНИ，ф.5，оп.30，д.337，л.70-92。

④ 详见沈志华：《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清华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第 5–27 页；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 1960 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第 132–162 页。

⑤ 普扎诺夫日记，1959 年 9 月 18 日至 10 月 5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186-216；Balázs Szalontai, "'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 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 1963-1964", p.94。

⑥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 年 5 月 21 日。

朝鲜劳动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苏共中央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方针。回国后，金日成召集朝鲜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详细而愤怒地”讲述了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行为，说“中国的政策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也不会再到中国去了”。①

为了进一步拉住朝鲜，赫鲁晓夫答应了金日成的大部分要求。金日成走后，7月19日赫鲁晓夫召见普扎诺夫，请他转告金日成，“贷款和供应小麦、棉花的问题已经顺利解决，其他问题也委托有关部门在认真研究。”赫鲁晓夫还说，他决定9月中旬亲自访问朝鲜。几天以后，普扎诺夫把赫鲁晓夫的亲笔信交给金日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决定令朝鲜领导人十分兴奋，金日成一边看信，一边连声叫好，说苏联“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请求”。②8月，朝鲜派出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双方签署了贷款协定。苏联同意免除战争期间的军事贷款7.6亿卢布，及延期偿还1.4亿卢布的经济贷款。金日成得此消息后激动地说，这实际上就是一项9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啊！③

此时，中国已经注意到朝鲜对华态度发生了变化：领导人讲话和报刊报道“突出苏联，压抑中国”，“只谈中国国内建设的成就，不提对外政策和国际作用”，甚至提出了“彻底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④显然，中国再不有所表示，就会失去一个支持者，甚至增加一个反对者。于是，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9月10日，外交部专门下发了关于这次访问的宣传通知，要求《人民日报》和《大公报》发表欢迎社论，访问期间各报可多登载介绍朝鲜建设成就的文章、消息和照片等。⑤足见中国对这次访问的重视和认真。9月17日中国驻苏使馆发回情报：苏联已同意全部取消给朝鲜的军事债务。⑥这就进一步刺激了中国领导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中朝签订了贷款协定、供应成套设备和提供技术援助协定。中国政府将在1961–1964年期间向朝鲜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且帮助

① 普扎诺夫日记，1960年6月13-28日，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1-15。

② 普扎诺夫日记，1960年6月29日至8月8日，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16-42。

③ 普扎诺夫日记，1960年8月24日至9月9日，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72-101。该协定原计划在赫鲁晓夫9月访朝时公布，后因赫鲁晓夫取消行程，11月2日苏联报纸才在第4、5版不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

④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驻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0年8月13、15、16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090-01，第3–7、13–18页。

⑤ 外交部关于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的宣传通知，1960年9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204-00492-06，第61–62页。

⑥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60年9月17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090-02，第35页。

朝鲜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工厂和一批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轻工业企业。此外，还将供应朝鲜棉纺织设备、无线电设备等。[①]在与代表团团长李周渊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最近阿尔巴尼亚、古巴、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也纷纷要求援助，苏联又撤走了在华专家，中国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却要保证对朝鲜的援助项目。关于贷款，周恩来说，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 10 年甚至 20 年再偿还也行。[②]为了履行协定，10 月 18 日双方又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国轻工业部负责承担培训实习生 26 项（76 人），派遣技术援助专家 23 项（45–48 人）。[③]此外，同朝鲜的"缓冲年"一样，1960 年也是中国开始进入"大饥荒"的一年。[④]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克服困难，向朝鲜提供了 23 万吨粮食。[⑤]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以及金日成表现出来的亲华倾向，反过来又推动了苏联与朝鲜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了签订协定，朝鲜政府代表团 9 月就到了莫斯科，但谈判一直进展不顺利。据驻苏商务参赞处的报告，朝方对苏贸易逆差，但不愿以贷款方式平衡；朝方要求减少原料出口，增加供应机器，苏方不同意；朝方要求调整原协议的成套设备项目，苏方不能满足；朝方要求签署七年协议，苏方只同意五年。[⑥]苏朝协定迟迟没有结果，中朝协定却见诸报端，使莫斯科处于尴尬地位。此外，赫鲁晓夫再次取消访朝，引起金日成强烈不满。作为报复，对于苏联希望他亲自率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3 周年庆典的多次要求，金日成坚持称病不去，甚至都没有出席在平壤举行的庆祝大会。然而，苏联驻朝使馆报告，金日成却参加了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平壤举办的所有活动。[⑦]赫鲁晓夫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12 月 24 日，苏朝终于签订了 1961–1967 年苏联给予朝鲜技术援助协定和 1961–1965 年苏朝长期贸易协定。根据援助协定，苏联将帮助朝鲜扩建金策冶金工厂，使其能力达到年产 280 万吨钢锭和 230 万吨钢材。在博州建设发电能力 60 万千瓦的火电站，

---

① 《人民日报》1960 年 10 月 14 日，第 1 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 355–356 页。轻工业部感到援外项目过多、战线太长的情况，见轻工部党组对援外工作的报告，1960 年 12 月 10 日，上海市档案馆，B163-2-1033，第 9、10–12 页。

③ 《人民日报》1960 年 10 月 19 日第 4 版；轻工业部关于执行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决议函，1960 年 11 月 1 日，上海市档案馆，B163-2-1033，第 2–8 页。

④ 详见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第八章。

⑤ 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册，第 301 页。

⑥ 苏朝长期贸易谈判情况，1960 年 10 月 11 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090-02，第 36–37 页。

⑦ 普扎诺夫日记，1960 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7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151-171。

在平壤建设发电能力为40万千瓦的火电站，建设年处理原油200万吨的炼油厂，并由苏联供应必要数量的原油，还有电影制片厂、麻纺厂和毛纺厂等。根据贸易协定，苏联将向朝鲜提供机器和设备、棉花、石油制品及许多其他商品，5年内双边贸易额将增长80%。[①]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中苏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从两边争得援助，谋取了最大利益。其结果，朝鲜不仅安然度过了“缓冲年”，而且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几点思考

朝鲜是在战后重建时期得到外援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按照苏联的计算，截止1960年4月1日，朝鲜得到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偿援助共55亿卢布，其中苏联13亿，中国9亿。此外，苏联还提供了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中国也提供了三笔无息贷款。[②]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援助集中在重建时期，其中主要的援助来自中苏两国。根据韩国的统计资料，从战后到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总计20.43亿美元，1950–1960年提供的就有16.53亿美元，其中无偿援助16.38亿美元（含3.4亿免于偿还的贷款等）。在此期援助的金额中，苏联占43.14%，中国占30.75%。[③]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朝鲜外援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的确呈下降趋势，从1954年的33.4%到1960年的2.6%。[④]不过必须看到，这种下降恰恰是大量外援帮助朝鲜实现经济恢复的结果。况且，在五年计划和以后的建设中，外援所解决的问题都是朝鲜本身无法完成的。应该说，没有外援就不会有朝鲜如此迅速的战后重建，特别是在初期，外援起了决定性作用。

---

① 驻苏商参处致外交部、外贸部电，1960年12月28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090-02，第40–41页；《人民日报》1960年12月28日，第5版。

② 斯卡奇科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6月11日，РГАНИ，ф.5，оп.30，д.337，л.70-92；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2、630–632页。中国贷款的具体数字不详。

③ 南炫旭：《中、苏对朝援助及贸易状况（1946–1978）》，第5页。所引数字为笔者根据统计表计算所得。阿果夫根据东欧国家档案资料统计的结果，按1961年的新卢布计算，社会主义国家1954–1961年对朝鲜的援助总计为11.4亿卢布，其中中国4.11亿卢布，苏联4.09亿卢布，东欧国家3.2亿卢布。Avram Agov，North Korea in the Socialist World: Integration and Divergence, 1945-1970, p.463. 这个统计应该没有包括减免朝鲜归还贷款的数字。

④ 李周渊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结果和1958年国家预算方案的报告（译文），1958年2月17日，外交部档案馆，204-00612-02，第53–97页。

中朝经济关系看似简单，其实在这种单向援助与受援关系的背后，隐含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外交因素，这至少涉及到中朝关系、中苏关系、苏朝关系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状态及朝鲜自身经济政策的确定等，中国对朝鲜经济援助的方针正是在这样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确立和实现的。从朝鲜经济重建的历史过程看，中朝政治关系冷暖无常，而经济关系却能基本保持恒温，并有升温的趋势。中国援助朝鲜的方针几乎是一以贯之的，即使在中朝关系紧张或中国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中国的援助也从未停止，有时甚至还更加积极。其决定性因素在于，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现实政治的角度，中国始终把朝鲜看作是自己的小伙伴和保护对象。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只是加重了中国的负担，因为中国可以容忍朝鲜不断增长的需求，却无法接受它的背离。

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存在和中苏关系的变化，决定了朝鲜在争取经济外援上的有利地位。中苏友好时，双方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的东方阵线都要帮助朝鲜；中苏分歧时，双方为了加强自身的权威和力量都要拉拢朝鲜。所以，处于两大阵营对抗的前沿和中苏两个大国的中间，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朝鲜一直都能得到外来的双重帮助。当然，一般说来经济援助都是大国、强国帮助小国、弱国，但是像朝鲜这样幸运的国家，确实不多见。这种现象凸显了金日成的政治智慧，两面讨好，左右逢源，使得一个小国可以把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

相比而言，苏联对朝鲜的援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要胜于中国，不过就“尽其所能”来说，中国的援助力度应该是最大的。而且，在朝鲜重建时期，中国三次提供规模性援助，都是在自己最需要援助的时候。然而，毛泽东的慷慨大方并没有得到他希望得到的政治支持，朝鲜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无视自己的政治诺言。相反，毛泽东的做法却在经济上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中国这种持续不断的帮助，一方面刺激苏联也要给予援助，另一方面则助长了朝鲜的依赖心理，结果就是朝鲜的需求层层加码，而中苏的援助则攀比上升。感激和回报是暂时的，瞬间即逝，烦恼和困苦却是经常的，说来就来。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对朝鲜援助的结果也是这样。

归根结底，本文记述的这段中朝经济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和证明了笔者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内部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病。[①] 同中苏关系一样，冷战时期的中朝关系也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其内在运行的是共产党之间党际关系的

---

① 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29–42 页。

政治准则，因而利益、平等、主权等国家关系中的基本概念在这些国家都是模糊的和混沌的，再加上毛泽东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天下观”传统意识，因而，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政治交往复杂多变而经济援助却始终如一的奇特现象。

发表于《参阅文稿》No.2011.6，2011年2月10日（第二作者董洁）

朝鲜劳动党内权力斗争与中朝苏三角关系

所谓八月事件，是指1956年发生在朝鲜劳动党内部的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斗争。这是朝鲜党内最后一次对金日成最高统治地位的挑战，其结果以反对派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探寻这一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可以从这个典型案例看出中国、朝鲜和苏联三者之间极其微妙的关系，而深入研究这个三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解读冷战时期乃至后冷战时期东亚的政治结构和趋向，探讨朝鲜半岛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途径，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很长时间以来，八月事件对于局外人都是一个谜。尽管韩国出版了大量讨论朝鲜党内斗争的著作，但谈到这次事件，主要依靠的是北朝鲜公开发表的文件和报道，以及大量的口述史料，档案文献依据显得不足。① 俄国档案开放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对事件的描述比较深入细致了。② 本文主要依据大量的俄国档案，以及可以找到的中国档案和文献，描述并分析这一事件发展的全过程，以期为解读20世纪50年代中朝苏三角关系提供一个案例。

① 如北韩年鉴刊行委员会编：《北韩总鉴（1945-1968）》，首尔：共产圈问题研究所，1968年；康仁德编：《北韩全书》上卷，首尔：极东问题研究所，1974年；金南植、沈之渊编著：《朴宪永路线批判》第五章，首尔：图书世界出版社，1986年；徐大肃：《北韩的领导人——金日成》，徐柱锡译，首尔：清溪研究所出版局，1989年；韩国《中央日报》特别采访部：《秘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尔：中央日报出版社，1992年；沈之渊：《被遗忘的革命家的肖像——金科奉研究》，首尔：人间Sa-Rang出版社，1993年。

② 比较专门的研究成果有：A. Lankov，*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nization, 1956*，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下斗米伸夫（Shimotomai Nobuo)：《莫斯科与金日成——冷战中的北朝鲜（1945-1961)》，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

一、起因：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风波

朝鲜停战以后，尽管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参战各方未能就结束战争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也没有人想要在东北亚重新挑起武装冲突了。战争的硝烟散去后，朝鲜面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严峻局面丝毫不亚于战争本身。

据1954年3月苏联驻朝鲜使馆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资料撰写的备要报告，在战争期间，朝鲜遭受了特别严重的损失。人口锐减近120万，造成劳动力严重紧缺。直接经济损失达4200亿朝元，有近9000座工业建筑、60万所住宅、5000所学校、1000家医院、263座剧院和电影院以及数千其他文化生活机关变成废墟。一些最重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急剧减少：电力生产从1949年的59.24亿度下降到1953年的10.16亿度，相应地，采煤量从394.3万吨减少到68.8万吨，钢从14.4万吨减少到0.35万吨，水泥从53.7万吨下降到2.65万吨，等等。农业损失也很严重，除大量农作物被毁外，被宰杀和被掠走的牛羊10.9万头，猪13.5万头，毁坏果树8.9万棵。[①] 在这种情况下，平壤能够指望的，还是莫斯科和北京。

为了帮助朝鲜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苏联和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根据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调查报告：苏联政府根据1953年9月19日的苏朝协议，在两年内向朝鲜提供无偿援助10亿卢布；对战前和战争期间提供的贷款（2.98亿卢布）延长了还贷期（1957–1966年），降低了利率（从2%降为1%）；把战争期间的非贸易支付债务（7288.8万卢布）减少了一半。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力度更大，在4年内（1954–1957年）提供无偿援助80000亿元（合16亿卢布）；从战争开始至1953年底提供的援助全部免于偿付，总计72900亿元（合14.5亿卢布）；在3年内负责收养22735名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孤儿，并承担对这些儿童进行教育的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31338人）的全部费用。除以上经济和文化协议外，根据1953年11月23日签订的其他协议，在中国专家的待遇和费用以及朝鲜实习人员和留学生的费用等方面，中国的条件也比苏联更具优惠性。以至远东司建议应效仿中国的做

① 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编：《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拉祖瓦耶夫关于六·二五战争的报告书》，首尔：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印行，2001年6月，第34–53页。

法，减少向朝鲜收取的专家费用。[①] 尽管如此，朝鲜对苏联和中国的疑虑依然存在，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甚至还有加重的趋势。

从 1954–1956 年，中共和苏共从外交（主张和平共处）到内政（调整经济结构）都采取了比较一致的立场，并且希望各国共产党都能执行这一总方针。[②] 然而，这一方针在朝鲜却受到明显的抵制。苏联驻朝使馆注意到，在 1955 年 1 月 31 日朝鲜劳动党通过的关于党和国家现阶段基本任务的指南性文件中，没有按照莫斯科的意见致力于和平统一，而仍然把“解放南朝鲜人民”和“消灭南朝鲜亲美、亲日地主集团”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③] 金日成对莫斯科新方针的不满更主要地表现在他的内部谈话中：“我们要改变一味模仿苏联的做法”，“苏联人没有直接与美国人交战，他们可能希望与美国人和平共处，但是美国人占据着我们的南部，这是令所有朝鲜人民心痛不已的事。”[④] 在 1956 年初的朝鲜劳动党党章草案中，继续反映出这种倾向，以至苏联使馆不得不提出修改意见：删除原文中“美国的”和“亲美的”以及“从军事上加强革命民主的基础”等词语，以免“授人以柄”，“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朝鲜劳动党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带有军事性质的”。[⑤]

在经济建设方面，朝鲜的核心政策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依靠中苏的帮助，到 1955 年初，朝鲜三年计划所确定的工业总产量目标已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却没有任何提高。尤其是在农业方面，在战前完全可以自给的粮食生产，现在超过 30% 的农民无法养活自己。为弥补粮食不足，朝鲜不得不在 1953 年从中国购进 20 万吨粮食，1954 年 13 万吨，1955 年预计 17 万吨。被战争破坏的居民住宅到 1954 年底只修复了约 70%，大部分城市居民和 30% 的农民还生活在简易的临时建筑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在投资比例上过于偏向重工业外，在

① 费德林的调查报告（1953 年 12 月 31 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2，оп.7，п.27，д.47，л.115-120；《人民日报》1953 年 11 月 24 日，第 1 版。参见中朝互换“中朝经济文化合作协定”批准书的来往电报（1953 年 12 月至 1954 年 1 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7-00125-01，第 3–14 页。

②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 1957 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82–109 页。英文稿即将刊出：Latent Anxiety on the Honeymoon：Mao Zedong，Khrushchev and the 1957 Moscow Conference（accepted and forthcoming with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至于“和平共处”方针在亚洲推行的典型事例，应说到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 1954 年 10 月给马来亚共产党的联合电报。在这封电报中，马共被要求放弃武装斗争的方式。参见李丹慧、沈志华对万家安等原马共干部的采访（2007 年 6 月），及万家安：《〈苏中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与马共路线》，《东方文荟》2006 年 8 月 6 日。

③ 库尔久科夫致 B. N. 波诺马廖夫函，1955 年 4 月 6 日，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28，д.314，л.12-15。

④ 徐大肃：《北韩的领导人——金日成》，第 125–126 页。

⑤ 苏兹达列夫致谢尔巴科夫函，1956 年 3 月 5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22-25。

所有制改造方面则是一味追求国有化和合作化。允许私人贸易和家庭手工业在国家监控下的合理存在，本来是消费品生产和流通的必要手段，但朝鲜领导人却在执行彻底消除私有资本的路线上陷入了死胡同。私营企业 1949 年占工业企业的 15%，到 1954 年就缩减到 2.5% 以下，1955 年的计划是降到 1.3%。私营资本在贸易中的比重也从 1949 年的 46.8% 降到了 1954 年的 22.8% 以下，还有近 90% 的私人餐馆关门，致使相当大一部分城市居民失去了谋生手段。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破坏了农民自愿加入的原则。1954 年 1 月确定在农村试行合作化，当年便成立了 10000 个合作社，迫使 32% 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造成 1954 年粮食总产量比计划少收 30 万吨。政府反而提高了农业实物税的上缴比例，从 27%（大米）和 23%（其他农作物），统一增加到 50%。为完成收购计划，各级干部逼迫农民交粮，采取了包括逮捕在内的镇压手段，以至在粮食采购期间出现了农民自杀事件和暴动的危险。①

在国家关系方面，据苏联外交部的观察，在对敌斗争和经济建设中，“朝鲜同志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民主阵营的力量”，文件没有充分肯定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②外交部的另一份报告特别谈到，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 个战绩展厅中只留给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无关；“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呆过的领导工作者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等。库尔久科夫注意到，中国政府在 1952 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 1955 年 1 月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他的结论是，“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③俄国档案记载的这个情况，大体不错。④

最令人关注的是朝鲜党内的斗争情况。朝鲜劳动党是在战前不久才由 4 个主要派别联合组成的，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占据了主导地位；延安派的代表人物是金科奉、武亭、崔昌益等，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战争期

---

① 上述资料来自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 年 4 月 7 日，波诺马廖夫和谢尔巴科夫致苏共中央函，1955 年 5 月 17 日，库尔久科夫对苏联驻朝使馆 1955 年政治报告的简介，1956 年 3 月 31 日，ЦХСД，ф.5，оп.28，д.314，л.33-63，212-214，271-279。

② 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 年 4 月 6 日，ЦХСД，ф.5，оп.28，д.314，л.12-15。

③ 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 年 4 月 7 日，ЦХСД，ф.5，оп.28，д.314，л.33-63。另参见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 1 月 27–29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126-127。

④ 例如，经查，中国大使倪志亮 1952 年 3 月离任，直到 1955 年 1 月中国政府才任命潘自力为新大使。关于战争纪念馆的说法也是真实的，笔者 2006 年到平壤参观时专门去看过，情况依然如此。

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朴一禹、方虎山等；莫斯科派（来自苏联的朝鲜族人）和南方派（或国内派）虽势力较小，但也有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很有影响，如许哥而和朴宪永。还在战争期间，那些对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构成威胁的各派领导干部就开始遭到清洗。矛头首先指向掌握军事实权的延安派干部。1950 年 12 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罢免，不久朴一禹、方虎山也相继被贬和被捕。随后轮到莫斯科派干部。1951 年 11 月，莫斯科派代表人物许哥而因与金日成意见不合，被开除党籍，虽在苏联的干预下保留了副首相的职务，但最终还是被置于受审的地步，被迫于 1953 年初自杀。1953 年 8 月，以李承烨为首的一大批南方派干部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美国间谍、破坏南方革命力量和企图颠覆共和国。此案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早在半年前就被捕的南方派首脑人物朴宪永的，两年后，最高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朴宪永死刑。经过一连串的内部争斗，朝鲜党内各派终于都归附金日成麾下，朝鲜停战后不久形成的新领导班子，不仅增加了游击队派的金一，还有延安派的金科奉、金昌满，莫斯科派的朴昌玉、朴永彬，甚至南方派的朴正爱。[①] 然而，分歧和矛盾只是在高压下暂时消失，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有学者指出，1955 年 12 月金日成首次提出的“主体思想”（Juche）是“源于对抗苏联和亲近中国的思考”，其主要目的是“消除苏联的影响”，随后开展的对朴昌玉、朴永彬等一批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的批判，证明了这一点。相反，为了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金日成曾指出应“学习中国的整风运动”。[②] 鉴于当时提出新方针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莫斯科，关于主体思想是源于对抗苏联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说这里有“亲近中国”的考量，恐怕不够准确。实际上从金日成的一贯做法来看，时而倒向莫斯科，时而亲近北京，这只是他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利益的手段，但无论哪一边有可能威胁到他的地位，他都不会忍受的。

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风潮的影响下，朝鲜党内的不

① 上述资料详见康仁德编：《北韩全书》上卷，第 260–261 页；徐大肃：《北韩的领导人——金日成》，第 107–122 页；北韩年鉴刊行委员会编：《北韩总鉴（1945–1968）》，第 175–176 页；金南植、沈之渊编著：《朴宪永路线批判》第五章。笔者请余伟民等人翻译了这些韩文资料，并在此表示感谢。俄国档案也证实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见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 年 4 月 7 日，ЦХСД，ф.5，оп.28，д.314，л.33-63。

② 徐大肃：《北韩的领导人——金日成》，第 125–126 页。根据 1956 年 1 月 18 日朝鲜劳动党《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文学艺术领域的反动意识形态作斗争》的决议，朴昌玉被开除出中央常委，朴永彬撤销中央常委和中央委员职务。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关于朝鲜内部个人崇拜情况的报告，1956 年 4 月 5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57-67。

满情绪再次爆发出来。3 月 19 日金日成收到苏联大使送来的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并表示将认真贯彻到朝鲜党实际工作中。[①] 但苏联大使伊万诺夫了解的实际情况是，在第二天中央全会学习苏共二十大的材料时，除了从莫斯科回来的崔庸健做报告外，只有金日成、外相南日和宣传部副部长李一根三人发言。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金日成专讲南方党员对朴宪永的崇拜，而对朝鲜劳动党内严重存在的对他个人的崇拜现象（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他的纪念碑，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肖像，电影、歌曲、著作都在歌颂他的英明）却只字不提，只是要求以后在报纸宣传中不要再突出个人作用了。会议上宣读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翻译文本，但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做任何决议。[②] 会后，劳动党中央向各机关下发了关于学习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文件，信中的基调是朝鲜劳动党在各方面都“始终坚持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并多次强调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原则，“劳动党中央从未放弃这一原则”。至于党内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以前曾经有过，且只与朴宪永有关。[③]

1956 年 4 月 23–28 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人事调整，进一步消除反对派的势力和影响。会议既没有讨论人们议论纷纷的党内个人崇拜问题，也没有消除前一段广大干部对人事处理的不满情绪，甚至都没有研究人民普遍关心的经济困难和生活问题。金日成的长篇报告，除了赞扬朝鲜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成就外，就是反复批判朴宪永等南方派领导人以及其他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至于苏共二十大路线和集体领导问题，报告中既没有赞扬，也没有反对。很多人要求在大会发言，都被拒绝，因为知道他们要说什么。大会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以保证对金日成的忠诚和支持。在 71 名中央委员中，新选 43 人，上届保留下来的只有 28 人，在 45 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新选 43 人，保留的只有 2 人。[④] 以致于会议期间，在报纸和发言中对金日成的颂扬反而愈演愈烈，令苏联外交部感到“很不正常”。[⑤] 在贯彻代表大会精神的平壤市委积极分子会议上，积极追随金日成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金昌满的表现很说明问题。金昌满在高度评价了代表大会的意义后指出：“我们党内没有个人崇拜现象”，过去出

---

① 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 3 月 19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1，л.164-165。

② 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 3 月 21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1，л.165-168。

③ 伊万诺夫致费德林函，1956 年 4 月 18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137-139。

④ 伊万诺夫关于朝鲜局势的报告，1956 年 12 月 28 日，ЦХСД，ф.5，оп.28，д.486，л.1-17；徐大肃：《北韩的领导人——金日成》，第 128–130 页；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 5 月 5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20-222；伊万诺夫与金承化会谈纪要，1956 年 5 月 24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07-211。

⑤ 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6 年 4 月 29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163-170。

现过的，就是“在南方对朴宪永的个人崇拜，在北方对许哥而的个人崇拜”。同时“我要警告大家，关于现在我们党存在个人崇拜的言论不仅不能巩固、反而只会削弱我们党。因此，谁要发表这样的言论就处分谁”。[①]

这次会议的人事调整主要是针对莫斯科派的，在代表大会之前的一次审议候选人的中央会议上，金日成提出，有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干部已经接受了朝鲜国籍，又不愿放弃苏联国籍，为什么还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对此，崔庸健愤怒地说道，既然他们脚踏两只船，就应该把他们踢出去。结果，这些人全部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在代表大会后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金日成又针对莫斯科派干部经常光顾苏联使馆的情况，特别强调了保守机密和加强纪律的问题，并规定从即刻开始，与外国人的一切联系必须通过外交部和外贸部进行。这一时期，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莫斯科派的，因此对延安派显得十分宽容。也是在这次常委会议上，金日成突然主动提出了朴一禹的问题，他通报了有关朴一禹案件的调查情况后指出，调查结果尚不能确定其所犯罪行的具体内容。于是，金科奉和金光侠均表示应立即释放朴一禹，但崔庸健仍坚持应当枪毙，南日也认为朴必须受到惩罚。最后，金日成决定：朴一禹理应予以释放，但现在暂不执行。[②]对于延安派干部李相朝的问题，金日成也没有追究。李在战争初期曾作为金日成的代表住在北京，这次是从驻苏大使任上特意回国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期间，他两次给主席团写便条，建议讨论朝鲜劳动党内部存在的个人崇拜问题。李的建议自然是没人理睬，会后金昌满还把他叫去责骂了一顿。李相朝据理反驳，金昌满就把情况告诉了崔庸健、朴金喆等人，后者一致提出撤销李驻苏联大使的职务。后来由金科奉出面找到金日成，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事情才算过去。[③]

金日成对延安派采取如此宽容的态度，显然是因为他知道在排挤莫斯科派的问题上，与苏联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还在二十大前，苏联外交部就反映了朝鲜党内对金日成个人崇拜的种种表现，并建议苏共中央提请金日成注意改正。[④]而现在，外交部所属情报委员会还特别注意到，不久前对莫斯科派领导干部的严厉处罚，与这些人多次提醒金日成注意个人崇拜问题有关。因此，委员会建议苏共中央对朝鲜

① 费拉托夫与朴泽燮会谈纪要，1956年5月25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02-203。

②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5月10日、18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27-229；д.410，л.174-177。

③ 萨姆索诺夫与金善福会谈纪要，1956年5月31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222-223。

④ 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年4月7日，ЦХСД，ф.5，оп.28，д.314，л.33-63。

党进行帮助。[1] 外交部远东司则认为，对朴昌玉等人的批判，"实际上是发起了一场旨在反对所有苏联朝鲜族人的运动"。[2]1955 年底，在朝鲜共有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 136 人，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 1955 年 12 月 31 日法令，他们必须确认一个国籍。在回答征询问卷时，当时多数人表示愿意加入朝鲜国籍，只有 24 人提出在加入朝鲜国籍后，还想保留苏联国籍。在朴昌玉、朴永彬等人被解职后，面对朝鲜党对莫斯科派干部的排挤和歧视，很多人感到后悔，有人（如建设相、人民军卫生部部长等）甚至偷偷到苏联使馆要求保留或恢复苏联国籍。[3]

李相朝回到莫斯科，立即于 5 月 30 日约见了苏联副外长费德林。在通报了金日成将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以求经济援助的情况后，李相朝详细报告了朝鲜党内的不正常情况，并强调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实际上笼罩着整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缺乏集体领导，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个人决定。对金日成的吹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朝鲜人民革命博物馆变成了金日成个人事业的历史博物馆"，甚至传说"金日成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开始领导朝鲜人民进行反抗日本的解放斗争了"。李相朝还指出了金日成在经济工作和使用干部方面及战争期间的种种错误，并多次强调，苏共中央必须尽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帮助朝鲜党，特别是帮助金日成克服他那些危险的错误。[4] 在不久后的另一次会谈中，李相朝还建议，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谈时，最好要求朝鲜代表团的成员都参加，这样效果会好一些。否则，朝鲜党内不会听到苏联的意见。[5]6 月 8 日，朝鲜副首相崔昌益也秘密地单独约见了苏联大使。崔全面报告了朝鲜最近的情况，特别是在干部使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党内领导干部的任用既没有照顾到来自国内、中国和苏联等各个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贤，提拔的都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经验却专门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这也是造成严重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样强烈要求苏共中央帮助改变这种状况，并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议。崔说，对于苏联

---

①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关于朝鲜内部个人崇拜情况的报告，1956 年 4 月 5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57-67。

② 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6 年 4 月 29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163-170。

③ 库尔久科夫对苏联使馆 1955 年政治报告的简介，1956 年 3 月 31 日，ЦХСД，ф.5，оп.28，д.314，л.271-279；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 5 月 7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22-224。朴昌玉、朴永彬等很多人都曾到苏联使馆诉说冤情和反映情况。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 4 月 13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120-121。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关于朝鲜内部个人崇拜情况的报告，1956 年 4 月 5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57-67；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 5 月 5 日、10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20-222，225。

④ 费德林与李相朝会谈纪要，1956 年 5 月 30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190-196。

⑤ 库尔久科夫与李相朝会谈纪要，1956 年 6 月 16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38-241。

的建议，金日成一般都会认真对待的。[①]

关于金日成访苏期间与苏联领导人谈话的情况，目前没有详细资料。只知道金曾受到赫鲁晓夫的接见，会谈中苏联领导人对他提出了一些意见，但因有些情况不明，委托中央联络部弄清楚。金日成则表示接受批评，以后注意改正错误。事后，莫斯科向中共中央通报了谈话结果，毛泽东认为苏共这样做很好。[②]8月2日，苏共中央又通过使馆向劳动党传达了进一步的看法，即希望金日成在批评朝鲜党的一些错误做法时应表现得主动一些。[③]对于金日成排除异己的做法，北京和莫斯科本来是表示过不同意见的。[④]苏共二十大前后朝鲜党打击莫斯科派干部和继续大搞个人崇拜的做法，引起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也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朝鲜党内的反对派寄希望于从外部对金日成施加压力，莫斯科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在八月全会发起反对金日成的进攻起到了刺激和鼓励的作用。

二、经过：八月全会前后朝鲜党内斗争和中苏的干预

据俄国档案反映的情况，在劳动党三大期间及以后，金枓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琓、徐辉、尹公钦、金承化等一批领导干部对朝鲜党内的个人崇拜状况、干部政策和经济方针感到不满，特别是金日成出访期间在波兰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更加强了这种对立情绪。他们希望在8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揭露和批评这些错误。8月初金日成回国会后了解到这种情况，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朴正爱等人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评，同时指责这些反对派人物对抗党的方针并煽动不满情绪是“反党”行为，以无能、献媚和历史问题为由坚决要求撤换金日成身边的一批领导干部是“宗派”和“分裂”活动，他们已经形成了“反党集团”，其结果将破坏党的威信和地位，造成危险局面。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分别地、反复地找一些有不满情绪的干部谈话，采取

①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6月8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210-214。

②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记录，1956年9月18日。

③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6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335-337。

④ 例如，武亭被撤职后回到了中国，由此躲过审判。（徐大肃：《北韩的领导人——金日成》，第107-109页。）据苏联方面的情报，朴一禹被排挤引起了中国军方的不满。（波诺马廖夫和谢尔巴科夫致苏共中央函，1955年5月17日，ЦХСД，ф.5，оп.28，д.314，л.212-214。）1953年11月金日成到北京时，毛泽东提醒他无论如何不能杀朴宪永，苏联也通过顾问向金日成建议不要杀人，但金不予理睬。后来苏联大使问起此事，金十分不满，甚至与其发生了争执。（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记录，1956年9月18日；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4月19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214-216。）

威胁、利诱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对派队伍。如说服金料奉放弃了撤换干部的主张，迫使朴义琓采取了中立立场，派遣金承化去莫斯科学习等。此外，还使用警察手段监视反对派干部，对他们的司机、保姆进行审问，急召出访的内务相方学世回国布置防范措施等等。经过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动权。苏联使馆的态度令他满意：除了按照莫斯科的要求希望金日成对朝鲜党的错误采取主动姿态，并不得打击报复提意见的干部外，伊万诺夫明确表示，召开中央全会的目的是巩固劳动党的领导地位，维护党内团结，为此同意金日成先召开中央常委会议统一思想。这实际上就表明，苏联不同意反对派关于撤换一批领导干部的核心主张。苏联还表明了不干预朝鲜党内部事务的基本立场，这更让金日成感到放心。于是，在8月21–23日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虽有一些不同意见发表，但最后的结论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犯错误的主要是许哥而和朴昌玉等人，对此“中央常务委员会将采取措施来予以清除”；根据目前调查的材料，没有理由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金料奉谨慎和退缩的发言，是金日成能够把握这次会议方向的关键因素。8月28日常委会议通过了金日成将在中央全会上做的报告草案。报告包括代表团出访的结果、朝鲜国内的形势和劳动党的状况及任务三个内容，基调同以前一样。报告没有涉及党内生活问题，只说可以在全会讨论，但在结尾处，金日成提出党内“存在着派别和宗派活动残余”，号召全党加强警惕并与之斗争。[①]

8月30–31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金日成按照程序首先做了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报告，随后的两个发言均是表示同意的赞美之词。第三个发言的是延安派干部、贸易相尹公钦，他以“愤怒的揭发式语调”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尹的发言被多次打断，并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崔庸健甚至站起来大骂，会场一度陷入混乱。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为尹公钦辩护，但没有得到讲话机会。面对如此局面，中午休会的时候，尹公钦与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在以后的会议中，只有崔昌益、朴昌玉表示赞同尹公钦的意见，几乎所有的发言都反对这种“反革命和反党”言论，并对上述几人的“错误”或“罪行”展开了猛烈抨击，崔昌益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首领和思想家。第二天的会议做出决议：由于“从事反党活动”，开除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四人的党籍，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职务，解除朴昌玉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的职务。上述问题均移交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审查。不久，朴昌玉被迫到东海岸一个小型

---

① 史料来自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6–29日、9月1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335-359，317-321。

锯木厂去当厂长，而崔昌益则被任命去负责一个养猪场的工作。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镇压之中”，很多党内重大问题遭到歪曲，呈现在全体党员群众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的人策划了宫廷政变式的严重密谋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苏联使馆，崔庸健到中国使馆，分别通报了全会情况和所做决议。[①]

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4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乔将这一情况向伊万诺夫做了通报，并询问苏联的看法。[②] 显然，中国政府此前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而莫斯科的态度就比较谨慎了。

9月5日，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求见费德林并提交了他给赫鲁晓夫的信。李指责金日成对提意见的同志实行镇压，请求苏共中央干预此事。还说，外务省已经两次召他回国，他声称有病，还未成行。[③]9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朝鲜问题。会议决定，委托 B. N. 波诺马廖夫经过“周全的考虑”后接见李相朝，并答复中国大使，苏共中央将委托正在中国出席中共八大的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交换意见。[④] 在9月10日与李相朝会谈时，波诺马廖夫答复：苏共对朝鲜发生的事情表示忧虑，苏共代表团将与同样在中国的劳动党代表团和中共商谈此事，但不会干预朝鲜党的内部事务。对于李请求苏共公开发表批评朝鲜党的言论的建议，波诺马廖夫拒绝讨论。[⑤] 其实，莫斯科的这种立场并不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突然形成的。由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的震动和混乱，加上中共中央4月5日文章的公开表态，使得苏共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态度变得谨慎起来，甚至对那些比较激烈的批判言论采取了压制的做法，苏共中央6月

---

① 史料来自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9月1、4、6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319-321，322-325，327-332；Шестериков 的日记，1956年9月14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302-303。

② 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9月4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322-325。

③ 费德林与李相朝会谈纪要，1956年9月5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224-228。在苏联养病的邮电相也不敢回国，因为一旦回去就会被捕。见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记录，1956年9月18日。

④ 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3，оп.12，д.1005，л.30，*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с. 166-167.

⑤ 波诺马廖夫关于李相朝会谈情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9月12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228-232。

20 日决议充分表明了这一点。[①] 在后来与金日成的会谈和通信中，苏联领导人透露了这些情况，并表现出对继续批判个人崇拜谨慎的态度。金日成立即在朝鲜党内传达了这些信息。[②] 应该说，苏联态度的转变，无疑是金日成敢于采取严厉措施处理党内问题的因素之一。

为了平息党内的不满情绪，同时也争取莫斯科的同情，金日成在中央全会后，立即对在此前受到打压的莫斯科派干部采取了怀柔政策。9 月 14 日下午，朴正爱召集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干部开会，出席者约 100 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干部的 2/3）。会议的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将改变对来自苏联的朝鲜干部的态度，并为他们平反。[③] 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次斗争的主要矛头已经转向延安派了。从金日成等人向苏联报告的情况看，与八月“反党”事件有牵连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仅被看成是“分裂”和“宗派”活动主谋的崔昌益和徐辉，就连反对派中的最高层干部、党内元老（“老头子”）金科奉，都是陆续从中国回来的。据说，金日成曾讲过这样的话：参与政变阴谋的人都属于延安派。[④] 因此，金日成才会改变对莫斯科派的态度，目的是集中对付来自北京的压力。

9 月 18 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苏共代表团商谈了处理朝鲜问题的意见。米高扬说，昨天他与朝鲜代表团谈话，批评了他们，但崔庸健不服气。还说，苏共对情况不太了解，还没有肯定的意见，建议中苏两党共同派人去平壤，了解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与米高扬“了解情况”的说法不同，毛泽东提出，中苏两党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毛泽东说，“我们要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帮助你，但是你必须改正错误”，“我们也要劝那些被整的人采取和解态度，劝双方和解”。具体方法是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中苏代表参加；会议要做出决议，还要公开发表。毛泽东还对米高扬说，金日成对我们有情绪，不听中国的，这次主要靠你们了。米高扬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只说去谈谈看。中共希望这次去就要解决问题，但米高扬推说国内

---

① 详见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 1 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8–70 页。苏共中央决议见：РГАНИ，ф.3，оп.14，д.39，л.1，30-34，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352-368，中译文见《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6 日。

② 波诺马廖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 年 9 月 12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0，л.228-232。

③ 谢斯杰里科夫日记，1956 年 9 月 14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302-303。

④ 徐大肃：《北韩的领导人——金日成》，第 131–133 页。

还有事情，不能过多停留。[①] 接着，中共领导人又与朝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毛泽东一开始就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并通知他们，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明天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破坏你们”。毛还说，对于朝鲜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应该打，后来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彭德怀和李克农甚至质问：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会谈中对朝鲜人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毛最后说，我们可以叫跑到中国来的同志回去，但回去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把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冷静地加以解决。[②] 显然，中共的态度更加明确，不过，除了要求金日成纠正错误外，并没有进一步的企图。

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基本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 月 22 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做出决议，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米高扬认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泽东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的确，正如苏联大使所说，实际上金日成是被迫否定八月决议的，而九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也是“兄弟党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施加影响的结果”。因此，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在媒体公布九月全会决议（只在党内传达并在报纸上发了一个简短消息），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此外，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答应恢复尹公钦等人家属粮食供应的诺言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③] 后来，波兰和匈牙利爆发危机，莫斯科和北京都去关注欧洲的问题，朝鲜的事情便暂时平息下来。

①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记录，1956 年 9 月 18 日。

② 毛泽东接见朝鲜代表团谈话纪要，1956 年 9 月 18 日。

③ 史料见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 年 9 月 23 日。伊万诺夫关于朝鲜局势的报告，1956 年 12 月 28 日，ЦХСД，ф.5，оп.28，д.486，л.1-17。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 10 月 1、8、26 日，11 月 22 日，ЦХСД，ф.5，оп.28，д.486，л.26，28-33；д.412，л.344-347；д.411，л.295-296。

三、结局：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在中朝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金日成进一步加快了向莫斯科靠拢的步伐。借着苏联出兵匈牙利的举动，11 月 2 日南日向苏联大使表示，朝鲜“今后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同苏联的友谊”，“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①] 在朝鲜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②] 此外，为了取悦莫斯科，朝鲜外务省还不断向苏联使馆散布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挑拨中苏关系。如中国副外长单独约见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通报匈牙利事件；中国人说，苏联承认在对波兰问题的看法上犯了错误；李相朝有亲华情绪而轻视苏联等等。[③] 对于这些情况，北京未必一无所知，但却没有做出进一步反应。因为，这时中国看问题的角度也出现了很大变化。

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看法逐步发生了转变，认为苏联放弃阶级斗争、与美国实现缓和的方针是错误的，并由此表露出对苏共继续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和地位产生了怀疑，特别是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④]

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这首先反映在中国对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上，中国地方档案中有这样一些材料：1957 年 3 月 4 日，移居长春的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前组织部长金忠植给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写信，要求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递交有关他个人和劳动党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⑤] 若是在几个月前，这些材料确是中共急需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了。3 月 16 日吉林省委书记富振声在与金忠植谈话时，不客气地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中朝两党和两国关系一向友好，中国也“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富根据中共

---

① 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 11 月 2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2，л.364-365。

② 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 11 月 28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1，л.297-300。

③ 伊万诺夫日记，1956 年 11 月 9、28 日，ЦХСД，ф.5，оп.28，д.411，л.292-294，297-300。

④ 详见沈志华：《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史学月刊》2007 年第 1 期，第 75–89 页；《毛泽东、赫鲁晓夫与 1957 年莫斯科会议》，第 82–109 页。

⑤ 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41，第 174 张。

中央的委托转告他，在中国期间，要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朝鲜族人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的问题。[①]6 月 28 日，前朝鲜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金俊根、李熙尚［相］写信给中共中央，希望在中国参加一定的组织生活。7 月 9 日中共中央联络部答复吉林省委："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这样合适的组织给他们参加。至于帮助他们自学的问题，请你们就近指定一适当的同志，帮助他们自学。"[②]

的确，此时的中朝关系有了迅速好转的势头。八月事件前后，中国政府对于朝鲜提出的在 1957 年给予额外无偿援助或 5000 万元贷款的请求一直没有回应，最后干脆予以拒绝。因此，朝鲜也取消了预定的以副首相金一为首的贸易代表团访华的安排。[③] 而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为了迎接 1957 年 9 月中旬金一率朝鲜劳动党中央经济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商讨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和援助问题，中国政府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和安排。[④]10 月 25 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七周年时，中朝关系的升温最为明显。金日成不仅致函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表示感谢，还专门给毛泽东发出贺电，毛泽东也亲自回电致谢。朝鲜政府还在平壤召开纪念集会，并组织群众开展慰问、立像和扫墓活动。几天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据《人民日报》报导，"志愿军驻地一片节日景象"。[⑤]

在这样的气氛中，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强调了朝鲜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八月事件"阴谋颠覆"朝鲜政权的性质，取得了毛的认可。毛泽东建议金日成路过北京时，把逃到中国来的朝鲜干部集中起来，宣布对他们实行赦免。毛泽东向金日成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人去反对朝鲜的。金日成回答说，"朝鲜也不需要这些人。"[⑥] 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击的金科奉这次也没有逃脱噩运，先是被开除党籍，而后遭到拘禁，最后被送往顺安（Sunan）农场进行劳动改造。随后被肃清的，不仅有延安派干部，还有

---

① 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41，第 169 张。

② 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41，第 183–184 张。

③ 伊万诺夫关于朝鲜局势的报告，1956 年 12 月 28 日，ЦХСД，ф.5，оп.28，д.486，л.1-17。

④ 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经济代表团访华活动的文件，1957 年 8 月 24 日至 9 月 1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7-00665-03，第 5–24 页。

⑤ 《人民日报》1957 年 10 月 25、26、30 日，11 月 9 日。

⑥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с.960-961；毛泽东与尤金会谈备忘录，1957 年 11 月 9 日，АРАН（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ф.1636，оп.1，д.199，л.1-6。*Бухерт В.Г.* П.Ф.Юдин о беседах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доклад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В.Сталину и Н.С.Хрущёву，1951-1957 г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4，с. 24-27.

对金日成不满的其他派系的领导干部金元凤、赵素昂等。[1] 中国使馆获得的一份劳动党内部讲话材料称：到 1958 年初，朝鲜“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国家反党的宗派分子”，进一步肃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金承化、徐辉、李弼奎等反党宗派分子的残余毒素”。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颂扬中国“以强大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2] 这一切自然是中朝关系改善的结果。此时，中共对劳动党和八月事件的看法已完全改变。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称赞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是反帝国主义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还说，1956 年中国和苏联派人去朝鲜解决人家的内部问题，用意是好的，但结果不好，方式不对。周恩来在 1958 年 2 月访朝回国后也说，从朝鲜跑过来的那些人反映的情况很片面，导致中国对朝鲜产生了错误看法。[3]《人民日报》还摘要刊登了朴金喆在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有一大段是专门点名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的。[4]

为了安抚金日成，进一步巩固中朝关系，毛泽东还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撤回在朝鲜的全部志愿军部队。就社会主义阵营一方来说，停战后的朝鲜问题主要由中国出面解决。中朝关系紧张以后，双方对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产生了分歧，平壤有意摆脱北京对这一问题的控制。1956 年 11 月，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提出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苏、中、朝共同制定的原则。在征求了莫斯科的意见后，中国政府在 12 月 8 日的回电中指出，联合国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参战的一方，而且联合国只承认南朝鲜政府，故没有资格出面协调；目前“全面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为此“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同时，中国政府还遇到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针对志愿军干部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事件，有朝鲜公民甚至领导人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

① 北韩年鉴刊行委员会编：《北韩总鉴 1945–1968》，第 178–179 页；康仁德编：《北韩全书》上卷，第 262–263 页。

② 朝鲜领导人的内部讲话，1958 年 1 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4-00612-01，第 28–39 页。

③ 周恩来与辽宁省干部的谈话记录，1958 年 2 月 21 日，吉林省档案馆，1-14/1-1958.94，第 106–108 张。

④ 《人民日报》1958 年 3 月 9 日，第 3 版。

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因而继续在朝鲜驻守是不受欢迎的。[①] 正是因为了解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在 1956 年 9 月与米高扬会谈才提到，金日成有可能要求中国撤军，尽管苏联人对此表示怀疑。[②]

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军队便陆续部分地撤退回国。1954 年 9 月撤回 7 个师，1955 年 3 月撤回 6 个师，到 1956 年 4 月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还有 44 万人。[③] 在中国和苏联看来，志愿军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抗美国在南朝鲜驻军的主要力量。虽然 1956 年 4 月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各方同时从朝鲜撤军，但是正如中国在向苏联通报时自己认为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来自中立国方面的压力，对美国企图取消中立国委员会的主张的回应，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 1957 年 1 月周恩来访苏前夕，考虑到中国的立场，苏联外交部确定的讨论朝鲜问题的既定方针是，苏联政府认为应该强调，在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继续驻扎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④] 然而，到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与金日成谈话，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并指出现在形势大好，“东风压倒西风”，美国不敢妄动。这个建议令金日成感到惊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认为如同毛泽东所说，这样做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金日成回国立即召集会议讨论，随即两次给毛泽东发电，表示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最后双方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至 1958 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1958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⑤]1 月 16 日苏联外交部答复，这一举动“非常英明”。[⑥] 于是，2

---

①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1956 年度报告，1957 年 4 月 18 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л.139-143；停战以来志愿军与朝鲜党政军民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12 月 8 日，第 2073 号，第 158–163 页；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内部参考》1957 年 1 月 22 日，第 2111 号，第 427–429 页。

② 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 年 9 月 18 日。

③ 《人民日报》1954 年 9 月 9 日第 1 版，1955 年 3 月 26 日第 1 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562 页。

④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1956 年度报告，1957 年 4 月 18 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л.139-143；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的请示，1957 年 1 月 4 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1 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第 2810–2813 页。

⑤ 周恩来接见尤金谈话纪要，1958 年 1 月 8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28-01，第 4–7 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中共党史资料》2005 年第 4 期，第 30 页。

⑥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8 年 1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813-01，第 1–2 页。

月 5 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实现全朝鲜自由选举，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2 月 7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响应朝鲜的和平倡议，准备同朝鲜协商撤出志愿军，要求美国和其他有关各国也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军。不久，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建议。①

2 月 14 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商讨撤军的具体步骤和其他事宜。双方确定，从 3 月至年底，分三批实现全部撤军，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朝鲜问题应由朝鲜内部通过谈判解决，无需外国干涉。此后，第一批部队 6 个师共 8 万人，从 3 月 15 日至 4 月 25 日撤出；第二批 6 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 10 万人，从 7 月 11 日至 8 月 14 日撤出；第三批志愿军总部、3 个师和后勤部队共 7 万人，从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6 日撤出。志愿军撤退时将营房、设备和物资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② 至此，在朝鲜作战和驻守 8 年之久的中国军队，终于全部撤退回国，此举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之间的友好关系。③

无论如何，到 1958 年底，在朝鲜形成了金日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八月事件的阴影也云消雾散，中朝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直到此时，中朝之间仍没有签订金日成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所要求的两国同盟条约，但是，在 1950 年 10 月由于中国出兵援助朝鲜而已经实际形成的同盟关系，经历了一场风雨之后，到 1958 年 10 月中国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时却得以延续下来。两年半以后，1961 年 7 月 12 日，中国和朝鲜终于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内容和用词与 1950 年 2 月的中苏同盟条约几乎完全一样。④

① 《人民日报》1958 年 2 月 6 日第 1 版，2 月 7 日第 1 版，2 月 22 日第 5 版。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370–1370 页;《人民日报》1958 年 2 月 21 日第 1 版，1958 年 10 月 18 日第 4 版；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 年 7 月 26 日，ЦХСД，ф.5，оп.49，д.135，л.1-75。

③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和分析办公室当时全面分析了中国撤军的动机，然而所谈 4 个原因，没有一个说到问题的实质。见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for the Far East，Intelligence Report: Implications of Communist Chinese Withdrawal from North Korea，March 17，1958，MF2510409-0073，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

④ 《人民日报》1961 年 7 月 12 日，第 1 版。此前一个星期，7 月 6 日，《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见《人民日报》1961 年 7 月 8 日，第 5 版。

简短的总结

深入研究中朝关系（包括苏朝关系），对于解读冷战时期乃至后冷战时期东亚的政治结构和及其发展趋向，探讨朝鲜半岛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途径，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从以上对历史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在冷战背景下，中朝同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联姻”，而非双方宣传的或人们在表面上看到的那种“唇齿相依”的自然联盟。

中朝关系属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受历史和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关系曾处于朝贡体系之中，所谓“唇齿”联盟、“鲜血凝成的友谊”，盖源于此。战后，特别是冷战出现后，中朝关系便进入了新的国际体系。面对现代中朝关系，毛泽东既有一种传统的中央大国的统治者心态——对周边小国都要宽容并给以保护，又有一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心态——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给予帮助和支援。对于毛泽东而言，中朝同盟的立足点就是亚洲革命的利益及中共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所以，尽管朝鲜战争是中国被迫接受的既成事实，他仍然不顾个人屈辱和国家安危，毅然决定参战；而当中共需要朝鲜党支持的时候，他不仅容忍了金日成对延安派的打击和迫害，还要向朝鲜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小国无疑需要大国的保护。中朝同盟对于金日成而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他本人统治的工具。于是，在危急关头，他只能承认阵营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理念，忍受国家主权和个人尊严遭受侵犯的现实。当国际斗争的中心转移之后，作为革命阵营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朝鲜巧妙地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左右逢源，以求生存和发展。在两个大国夹缝中的小国，或两边受气，或两面得利，金日成属于后者。这里的关键在于小国的战略地位及其领导人的政治艺术水平。金日成适时地提出了朝鲜独立发展的“主体思想”，其矛头所指，不仅是莫斯科，也包括北京。

除此之外，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中朝关系说到底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故也体现出这种同盟关系的本质特征，即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而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同盟关系中固有的两种结构性弊病。其一，在共产党的传统理论中，本来就没有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即使掌握了政权，但党内和阵营内部通行的最高原则还是国际主义；其二，在共产党的组织观念中，本来就没有平等的概念，夺取政权以后，党际关系中领导和被领导的组织原则被移植到国家关系中。尽管随着时间

的推移，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也逐步意识到国家利益应该是处理相互关系的政治准则，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否定以往奉行的那些基本原则，因为一旦这样做，就等于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1] 或许，这就是中国和朝鲜在处理他们相互关系时所遇到的逻辑上的悖论。

发表于《二十一世纪》第 118 期，2010 年 4 月号

---

① 笔者以中苏关系为例对此有详细论述，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第 29–42 页；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466–475 页。

朝鲜族居民跨境流动：中国的对策及其结果（1950–1962）

作为“跨界民族”，中国东北朝鲜族居民的迁移和流动，是中朝关系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同一民族分别居住在不同国度、拥有不同国籍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学界研究中形成高潮，也成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热点。在理论探讨中，学者提出了“跨界民族”（Cross-border Ethnicity）、“跨境民族”（Trans-border Ethnicity）、“跨国民族”（International Ethnicity）等不同概念，并对其定义及内涵持有不同的解释。[①] 本文使用“跨界民族”这一概念，并非有意参与有关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论，而只是用以表述朝鲜族的一个基本特征——跨国界而居。正是这个特征，构成了朝鲜族居民频繁跨境流动的社会基础。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的朝鲜族不是土著民族，而是从朝鲜半岛迁移而来的跨界民族。尽管对其大量迁居中国东北地区的起始年代存在争论，但研究者大体都认为清末以来在朝鲜族的移民史上出现过两次高潮，即1910年日韩合并后大量朝鲜人逃亡中国和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强迫大批朝鲜人迁入此地。作为朝鲜移民的集中居住地，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据地方志记载，1908年延边的朝鲜族只有8.9万人，1930年便猛增到38.8万人，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更增长到63.5万人。[②] 而此时整个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口已达216.3万，成为中国历史上朝鲜族人口最多的一年。战后朝鲜独立，居住东北的朝鲜族开始大量反向移民，返回朝鲜的大约70万人，到1947年，东北朝鲜族居民还有140万人，其中

① 详见葛公尚：《试析跨界民族的相关理论问题》，《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1–5页；王清华、彭朝荣：《“跨国界民族”概念与内涵的界定》，《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9–23页。

② 安龙祯主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54–256、277页。

大部分住在共产党占领的解放区，居住在国民政府收复区的只有93283人。[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留在东北的朝鲜族居民只剩下70.77万人，其中延边地区51.9万人。[②] 由此看来，朝鲜族居民大规模跨境流动是有历史渊源的。

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界移居中国的朝鲜族已渐渐融入中华民族，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对于朝鲜族居民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大规模跨境双向流动及其在中国居住地建立正常社会生活的状况，中国学者已经有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考察。但所有这些研究几乎都止步于20世纪40年代末，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东北地区朝鲜族居民的跨境流动情况，以及中国政府相应对策的研究，基本上还没有纳入学术界的视野，即使有所涉及，也是浅尝辄止。[③]

最近十几年民族学的研究表明，跨界民族问题是涉及国际地缘政治的重大问题之一，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成为地区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并引起严重后果。对跨界民族采取不恰当的政策，忽视或过分顺从跨界民族的族群利益，其结果都会削弱国家认同意识，引起边境地区动乱，造成对国家的离心力，进一步发展还有可能影响相邻国家间正常的外交关系，甚至引发边界纠纷，危及领土主权，从而威胁国家安全。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西亚库尔德人问题、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矛盾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先例。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50多个少数民族中，属于跨界民族的就有30多个，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④] 在这方面，朝鲜族的跨境流动问题，如中国朝鲜族人口严重外流造成边境乡村日渐"空洞化"，以及朝鲜人大量非法越境来华影响边境地区社会稳定等现实情况，已经成为人们预测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前景时感到忧虑的重要因素之一。[⑤] 毫无疑问，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这些现

① 《东北韩侨概况》，辽宁省档案馆藏，东北行辕，全卷号JEI，转引自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35–636页。

② 安龙祯主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志》，第276页。

③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中国非常丰富，如朴昌昱：《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9页；金元石：《中国朝鲜族迁入史述论》，《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第93–100页；车哲九：《中国朝鲜族的形成及其变化》，《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137–142页；孙春日、沈英淑：《论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东疆学刊》2006年第4期，第54–60页。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应属孙春日的专著——《中国朝鲜族移民史》。

④ 详见曹兴：《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6–13页；张兴堂：《论跨界民族与我国国家安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2期，第52–56页。

⑤ 最近十几年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详见郑信哲：《论人口流动与朝鲜族的社会发展》，《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3期，第18–20页；《中国朝鲜族人口流动的重大影响及其对策》，《延边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66–73页；《朝鲜半岛局势对朝鲜族地区发展与稳定的影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5–12页；朴光星：《跨国劳动力流动与中国朝鲜族的全球性社会网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18–24页；孙春日：《中国边境地区人口流失及对策——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46–50页。

象的根源和成因，是十分必要的。

历史现象表明，造成中国东北朝鲜族居民频繁跨境流动的根源主要有三个，即朝鲜族居民的生存本能、族群意识及其国籍认定。本文拟重点利用中国外交部和相关省市开放的档案文献，从中朝关系变化的角度，考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东北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族群意识、流动状况以及中国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方针、政策及结果。

一、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及其解决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讲，处理跨界民族问题的首要环节是确定国籍。解决东北地区朝鲜族人大规模流动和迁移的问题，首先就需要确定他们的国籍，即区分在中国的朝鲜籍侨民和中国籍朝鲜族居民。

到清朝末年，中国政府深知，只靠“剃发易服”已经很难归化外来民族，于是制订了国籍法。中华民国成立后，首先颁布的也是国籍法，随后又有两次修订，其目的就是使那些越界定居的外来民族尽快“归化入籍”。至少到民国初年，一些朝鲜族居民已经在中国享受公民的合法权益。据中共延边地委的一个报告，民国四年，和龙县办理第二次朝鲜人入籍事宜，珲春、延吉、汪清三县亦相继办理。朝鲜人入籍后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延边很多朝鲜移民由此取得了合法地位。如和龙县12个社，除德新社社长为中国人外，其余均为朝鲜人。延吉5个乡，乡长为中国人，而副乡长则均为朝鲜人。汪清、珲春两县情况亦如此。[①] 不过，总体看来，加入中国籍的朝鲜人数并不可观。为了对抗日本人侵占东北的阴谋，民国政府在1929年修订国籍法时，取消了对双重国籍的限制。即使如此，当时东北朝鲜族居民中入籍者仍不到十分之一，而占绝对多数的是无国籍朝鲜人。[②]

战后，在东北的朝鲜族居民多数返回朝鲜，留下来的大都已有2–3代，或30–70年。他们90%以上经营农业，主要集中在延边地区，基本上都是自己聚成村落，只有少数与汉民杂居。其中加入中国国籍的很少，绝大多数都是朝鲜侨

① 《延边与朝鲜民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编：《中共延边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二集，1986年，未刊，第14–15页。该文件未标明作者和形成时间。

② 参见孙日春、沈英淑：《论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东疆学刊》2006年第4期，第54–60页。

民。[①] 为了稳定这批朝鲜族居民，国民政府外交部规定："对定住于吉东延吉一带之韩人，应视同中国人民，确认其为中国国籍，由东北行辕拟定根本办法，呈报核定。"1947 年 8 月 18 日，东北行辕正式颁布了《东北韩侨居留证领发办法》。然而，到是年 10 月，在国民党控制的收复区 11 个县市中，领取居留证的朝鲜人只有 9896 户，34713 人。[②]

在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以延边为主），情况也差不多。1931 年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共满洲省委曾把居住在东北的朝鲜人视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并组织了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朝鲜族居民到底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还是外国侨民的问题再次提起。1945 年 9 月末，中共东北局注意到朝鲜民族的地位问题，认为除参加华北抗战的朝鲜义勇军外，在东北的朝鲜居民一般应视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③] 1946 年 1 月 1 日，延边专员公署副专员董昆一宣布，根据延边民主政府的规定，"愿意加入中国国籍的韩国人可以入籍，可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这样朝族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④] 这就是说，朝鲜人是否加入中国国籍，完全是根据自愿的原则。

从战后的情况看，在东北的朝鲜人中，尽管政治上有不同倾向和选择，但缺乏对中国的认同感，回到朝鲜半岛的愿望是普遍存在的。1946 年 9 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北满地区朝鲜人民主联盟第三次会议，大会通过的《朝鲜人民主联盟纲领》明确规定：联盟的任务是"支援朝鲜国内的民主运动，取得朝鲜的完全独立，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朝鲜作贡献"。的确，当时多数在东北的朝鲜人都认为"朝鲜是我的祖国"。[⑤] 在战后初期，中共从革命的理念出发，支持朝鲜族居民回国建立革命政权，认为其结果对中国革命政权的建立也是有利的。但是，当中共已经在东北一些地区建立了地方政权以后，对当地朝鲜族居民的频繁流动就开始感到不安了。1948 年 8

---

① 周保中：《延边朝鲜民族问题》，1946 年 12 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局（馆）编：《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一集，未刊，1985 年，第 332–333 页。

② 《外交部核复中央党部秘书处对东北韩侨处理意见》，《东北行辕韩侨事务处工作报告》，辽宁省档案馆藏，东北行辕，全卷号 JEI，转引自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第 688–690 页。

③ 周保中：《延边朝鲜民族问题》，1946 年 12 月，《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一集，第 327 页。

④ 董昆一：《新年献辞》，1946 年 1 月 1 日，《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一集，第 8 页。

⑤ 徐明勋等：《北满地区朝鲜人民主联盟》，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编辑委员会编：《胜利 · 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5）》（朝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年，第 135 页；刘俊秀：《在朝鲜族人民中间》，《延边党史资料通讯》1987 年第 1 期，第 3 页，转引自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第 721–724 页。

月中共延边地委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原因，在东北的汉族与朝鲜族居民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对立情绪。朝鲜人“到中国国境以来，长久地受日本与中国地主军阀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虽然三代以上居住在中国境内，而他们的朝鲜祖国思想是相当浓厚的”。很多延边朝鲜人，包括少数中共党员干部，要求回到朝鲜去，尤其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这种观念比较强烈。[①] 跨界民族的这种族群认同感是影响朝鲜族入籍的主要因素，而大量外籍或无籍居民的存在则对东北边境地区的稳定形成压力。因此，尽管中共尚未建立起全国性政权，也不得不在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解决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

为区分朝鲜族居民和朝鲜侨民，以避免因边民流动而引发社会纠纷，1948 年 8 月延边地委建议：1. 凡居住延边并登记过户籍的朝鲜族居民，为中国公民；家族在朝鲜而家长与财产在延边，并经过政府许可经常往来的朝鲜居民，可承认为中国公民。凡没有登记户籍者，或经过批准出国移住而返回者，为朝鲜侨民。对公民和侨民在权利义务上加以区别。2. 与北朝鲜互相建立具有外交性质的机关，及时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3. 考虑到朝鲜族的历史习惯，适当解决边境地区生活必需品的交换问题。4. 图们江江源地区因江流改道造成国界不清，需要确定以主流为界，住在原地居民可依其自愿仍住原地或迁回本国，以便管理和免致不必要之纠纷。[②]

考虑到延边朝鲜族居民的观念和感情，并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当时采取了比较模糊的国籍政策。1948 年 12 月 9 日，中共延边地委书记刘俊秀讲到民族政策时，一方面提出：“凡是过去居住在延边地区并在土改中已向当地民主政府正式（申请）加入户籍者，为中国之公民（包括城镇在内）；凡未正式加入户籍或新由朝鲜临时来居者，为朝鲜侨民。公民与侨民在权利和义务上应有明确的区别，并按此区别来确定在中国境内入籍的朝鲜人民与朝鲜民主共和国的关系是同一民族居住在两个国家——中国与朝鲜之友邻关系。因此，凡是在中国境内入籍的朝鲜人民，均以中国公民待遇，不能以朝鲜侨民看待。”另一方面又指出，由于朝鲜民族的人民有自己特殊的民族传统，有长期的革命斗争历史，加之中朝两国地理上数百里毗邻，因此“必须承认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有原先自己的祖国——朝鲜民主共和国”。所以，当他们的祖国受到侵略或威胁时，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就有责任去保卫祖

---

① 延边地委：《关于延边民族问题》，1948 年 8 月 15 日，《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一集，第 383–386 页。

② 延边地委：《关于延边民族问题》，1948 年 8 月 15 日，第 387–388 页。

国。[①] 这无异于承认东北的朝鲜人拥有双重国籍，既可以作为中国公民参加解放战争，又可以随时以朝鲜公民身份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东北朝鲜族居民的流动情况更加复杂，也加重了中国政府日后处理他们国籍问题的难度。从中国去朝鲜的，主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族部队，以及中国地方政府组织援助朝鲜的干部、医生、司机。战后这些人有的定居朝鲜，有的又返回了中国。[②] 从朝鲜来中国的，除在吉林休整和重组的人民军部队外，主要是疏散到东北的朝鲜干部及其家属，还有大批难民。军人在战争期间又回到朝鲜作战，可以不计，而疏散或逃亡到中国的朝鲜人，很多人后来就留在了中国。[③] 尽管逃亡中国的难民数字尚无详细统计，但肯定不在少数，以至中国政府在 1951 年 1 月发起了捐助朝鲜难民的运动。[④] 总体看来，朝鲜人流动的趋向，在战争初期主要是从中国流向朝鲜（参战），而在美军仁川登陆、战局发生逆转之后，则是从朝鲜流向中国（撤退逃亡），停战后又有一些人返回朝鲜。这种情况进一步增加了区分朝鲜人与中国籍朝鲜族居民的困难。1950 年 11 月，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规定了朝鲜族加入中国籍的条件：八一五前在东北居住者；八一五后曾回朝鲜后又来东北，并在东北有房屋、土地、商业经

① 刘俊秀：《关于民族政策中的几个问题》（草案），1948 年 12 月 9 日，《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一集，第 392 页。

② 前者约 3.7–4 万人，后者数字不详，但总有数千人（未必都是朝鲜族）。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345、381 页；彭德怀、高岗致毛泽东电，1950 年 10 月 9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4 页；关于华北军区朝鲜籍人员回国问题，1950 年 3 月 9 日至 9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称外交部档案馆），118-00080-01，第 1–64 页；东北外事局给外交部的报告，1950 年 9 月 19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080-06，第 67–68 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53-154、169 页；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103–114 页；金景一：《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官兵返回朝鲜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2007 年第 3 期，第 52–61 页。

③ 人民军部队在吉林休整的决定及具体情况，见斯大林、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50 年 10 月 11 日，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558，оп.11，д.334，л.134-135；什特科夫致 M. V. 扎哈罗夫电，1950 年 10 月 31 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47，л.81-83。至于战争期间疏散到中国的朝鲜人总数，苏联有材料说近 8 万人（苏联驻朝鲜使馆的备要报告，1954 年 3 月，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 16 卷，第 2134–2153 页，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中国史料提供了一些具体数字，如到延边地区的朝鲜人约 11000 人（东北行政委员会给政务院的报告，1953 年 3 月 23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175-01，第 1–3 页）。至于在东北的朝鲜干部家属，1951 年 11 月已有 2500 多人（亚洲司给章汉夫的报告，1951 年 11 月 21 日，外交部档案馆，106-00026-03，第 23–29 页）。另有材料说，延边地区 1953 年有朝鲜难民 11728 人，停战后回国 6862 人，留下的成为定居中国的侨民。安龙祯主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志》，第 503 页。

④ 河北省委转发中央关于开展捐救朝鲜难民运动的指示，河北省档案馆，855-1-73，第 1 页。

营或有直系亲属者；八一五后分得土地、房屋而从事农业生产者。[①]

早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东北朝鲜族居民代表就是以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资格参加会议的。[②] 但整个移居中国的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当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1952年底，天津市外事处报告，当地的朝鲜侨民很多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但情况十分复杂。有的人表示，长期生活在中国，“对这块土地已生了感情”；有的人在东北是被视为少数民族，到关内后则被认为是朝鲜人；有的人在单位被当做中国人，但公安局却把他算作外侨；有的家庭，男方是中国人，女方却是朝鲜人；有些朝鲜族学生，因家庭系外侨而不能加入共青团，如此等等。[③] 不久后，延边自治州也发来类似的报告说，自朝鲜战争以后，有11000余朝鲜人由朝鲜来到延边地区，散居在延边各城市和农村，依靠政府救济和群众帮助，或投亲靠友维持生活。虽然有些已由政府安置就业，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首要的就是如何解决这些朝鲜移民的国籍问题。[④]

1953年4月，中共东北局向中央报告说：鉴于基层选举即将开始，需要进行人口普查和选民登记，大量在中国的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但是，东北延边等地与朝鲜一江之隔，两边人民“往返密切，情况复杂”，致使居住中国的朝鲜侨民与中国籍朝鲜族居民“混淆不清”。目前朝鲜处于战争环境，很多朝鲜人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如按照自愿的原则处理，可能引起朝鲜友方误会。东北局的原则意见是：凡1949年10月前即居住东北已安家立业者，应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看待，但如本人愿为侨民者，听其自便。此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后来东北者，应一律作为朝鲜侨民看待。报告还就一些具体情况的处理办法提出了意见。周恩来对此批示：交外交部研究后提出意见。[⑤]

是年6月28日，周恩来和邓小平致函毛泽东并中共中央，送交了给东北局的复电草稿，表示同意东北局处理朝鲜族居民国籍问题的原则意见。[⑥] 8月17日，中共中央复电东北局，同意以1949年10月1日为时间界线区分来华朝鲜人国籍归属的基本原则。至于具体情况，分别按下列原则处理：（1）家庭久居东北，已加入

① 韩哲石主编：《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87页。

②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6日，第3版。

③ 天津外事处的报告，1952年12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150-06，第48-50页。

④ 东北行政委员会给政务院的报告，1953年3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175-01，第1-3页。

⑤ 东北局给中央的请示报告，1953年4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018-01，第1-7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25页。

中国籍，后去朝鲜但未领有朝鲜公民证者，仍是中国籍朝鲜族；家住朝鲜，本人来东北经商或居住者，应算作朝鲜侨民。(2) 一家分住两国者，主要成员在朝鲜居住者应当做朝鲜侨民，主要成员久居东北，其住居中国的成员，则为中国籍朝鲜族；如划分不清者，应根据自愿原则处理。(3) 中国籍朝鲜族人与 1949 年 10 月 1 日以后来中国的朝鲜侨民结婚，如本人未提出改变国籍，暂时不予变更；具有朝鲜国籍的男方或女方，要求加入中国国籍者，应暂不预处理。如果具有中国国籍之男方或女方自愿于朝鲜停战后随其具有朝鲜国籍之男方或女方前往朝鲜参加建设者，应加鼓励；愿脱离中国国籍加入朝鲜国籍者，应予批准。(4) 凡父母双方俱有中国国籍，无论其在中国境内或朝鲜境内所生子女，即为中国籍朝鲜族。凡父或母一方为朝鲜国籍，其所生之子女生在朝鲜而现来中国者，应当做朝鲜侨民；生在中国者，应为中国籍朝鲜族，当其年满 18 岁愿变更国籍时，应按自愿原则办理。[①] 这一指示后来便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处理在华朝鲜人国籍问题的法律依据。[②] 从上述处理意见可以看出，在处理东北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时，中国政府特别注意照顾朝鲜政府的感受。这样的原则和处理方式，朝鲜政府当然是满意的。1954 年 1 月 23 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致函外交部称：北京、上海、天津很多过去已登记为朝侨的居民也迫切要求解决国籍问题，朝鲜大使馆曾表示“他们目前解决不了朝侨问题，等着中国政府按东北办法处理”。[③]

笔者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发现了一份文件——《关于识别国籍及处理华侨和中国籍朝鲜族人回国等内部问题工作暂行办法》。在解决中国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方面，该文件基本上重申了 1953 年 8 月 17 日中共中央指示的原则和处理意见。同时，又增加了有关在朝华侨和中国籍朝鲜族人申请回到中国的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可予批准回国的，是老弱病残者、回国结婚者、生活困难者以及其他朝方难以安排或给朝方造成困难者。对下列人员不宜批准回国：有劳动能力者，尽量动员其留朝工作；因一时失业者，应请华侨联合会设法解决其生活和职业等问题；申请回国读书升学者，应劝其继续在朝学习，将来参加驻在国的建设。[④] 显然，这样处理

① 中共中央指示，1953 年 7 月 18 日，外交部档案馆，108-00018-02，第 13–15 页。

② 几个月后，内务部在处理一般国籍问题的指示中称：东北中国籍朝鲜民族与朝鲜侨民国籍的划分，按 1953 年 7 月 18 日中共中央的指示办理，“不受本指示所规定的限制”。内务部关于处理国籍问题的指示，1954 年 4 月 15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506-02，第 3–6 页。

③ 亚洲司一科：案情节略，1954 年 2 月 9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249-15，第 104–107 页。

④ 关于识别国籍及处理华侨和中国籍朝鲜族人回国等内部问题工作暂行办法，1956 年 8 月 1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671-08，第 97–98 页。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制定者。

问题的结果是令朝鲜政府感到满意的。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处理朝鲜族人的国籍问题时，倾向于遵从朝鲜的意愿，照顾朝鲜的利益，其主要出发点，大概主要是从政治和外交两个方面考虑的，即在国际斗争中支持朝鲜，在对外关系中加强中朝团结。不过，从一个多民族国家公民对国家认同的角度来看，这样做的后果却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籍朝鲜族居民淡漠了中华民族的意识，从而在客观上强化了跨界民族的族群意识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自愿入籍的原则无可非议，但以法律的形式把这一原则与具体实施办法结合起来，才是稳定边境地区居民的根本。否则，长期依从邻国的意愿，不断调整国籍政策或做出临时性规定，不但无助于强化边境地区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甚至可能会鼓励边境居民改变国籍、向外移民的情绪。[①]

在 1957 年 5 月底中共吉林省委在延吉市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朝鲜族代表的发言充分反映出当时东北朝鲜族人的民族情绪。座谈会第一天，延边大学的青年讲师和助教便提出了朝鲜族的祖国问题。历史教研组李寿松说，目前许多朝鲜族人从情感上难以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外国的说法。他认为延边的朝鲜族并不是从古以来的土著民族，而是来自于朝鲜。现在把中国视为祖国，只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而在此之前的祖国则是朝鲜。因此，应该把朝鲜看成是“民族祖国”。朝鲜语讲师崔允甲则认为，朝鲜人和延边的朝鲜族有着同样的语言、文化、心理状态和民族起源，因此可以将中国称为“祖国”，而把朝鲜看成“母国”。在连续四天的座谈会上，虽然主题是爱国主义教育，但是竟无一人对“民族祖国”和“母国”的提法表示异议。很多教育界的代表要求与朝鲜建立直接、广泛的联系，而不要再用行政手段把朝鲜和延边之间的关口卡得太死。在座谈会后的汇报会上，州党委第一书记朱德海说，现在朝鲜族中，明说中国不是祖国的人不多，但是从内在的情感上来看，大部分朝鲜族（至少是 40 岁以上的人）都不承认中国是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在遇到困难时更想起朝鲜。[②]

在当时开展的整风运动的“鸣放”中，类似的言论更加激烈。延边地区一些朝鲜族干部、教员和学生明确表示，不愿承认中国是其祖国。有人把朝鲜称为“民族祖国”、“第一祖国”、“感情祖国”，把中国称为“法律祖国”、“第二祖国”、“现实祖国”，而把苏联称为“无产阶级祖国”、“第三祖国”。有些干部和上层知识分子认

---

①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直到 1980 年才颁布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处理国籍问题的随意性和法制观念的淡薄。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 年 6 月 18 日，第 2233 期，第 34-35 页。

为，自治州政府是“形式”，是“多余”的。还有些人要求扩大自治，主张把东北100万朝鲜族都划归延边，提高自治地区的行政地位。甚至有人认为，朝鲜族接受共产党领导，是朝鲜族缺乏“独自性”、“主体性”、“民族自豪感”的表现，说朝鲜族干部有“奴隶根性”，把民族利益出卖给了中央，把朝鲜族拖上了“灭亡”之路，汉族干部就是“监督”朝鲜族的具体表现。个别人干脆提出在延边成立“劳动党”，声称共产党“不适合朝鲜人的心理”。①

根据新华社的内部报道，尽管在随后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中，对地方主义进行了批判，但延边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多祖国论”和“多党论”，包括要求将自治州升为自治区，甚至从祖国分离出去；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的祖国；不要中共，只要劳动党；不要汉族干部领导等。州委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同程度在朝鲜族人中普遍存在的“命根子”问题。2.朝鲜族先进论和汉族落后论，不承认汉族的主体性和先进性，认为汉族是因为人口多才成为主体。3.孤立地强调民族特点和差异性，强调语言纯化等。自治州党委不得不在1959年4月重新开始整风，决定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干部中彻底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并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②

东北朝鲜族居民的这种情绪和状况，构成了后来他们在中朝两国之间经常性流动的思想条件和感情基础，为朝鲜族居民大规模回流朝鲜埋下了伏笔。

二、中朝政府对边民流动的政策和措施

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跨界民族或边境居民大规模、经常性流动，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需要及时加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与东北朝鲜族居民流动情况类似的，还有广东和新疆。③ 在广东省毗邻香港的保安等地区，边境居民流往香港是普遍现象，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大规模偷渡逃港事件更是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家政策不对头，造成内地与香港之间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的极大反差。后来进行改革开放，广东的经济水平大幅度提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12月31日，第2393期，第9–10页。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年4月24日，第2758期，第15–16页。

③ 西南地区边民跨境流动的历史状况目前还缺乏研究，不过从学者们对现实情况的描述看，西南地区历史上应该也不乏同类现象。参见鲁刚：《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5–10页；黄兴球：《中老跨境民族的区分及其跨境特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85–88页。

高，非法移民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自然就消失了。① 新疆边民外逃，主要是民族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新疆北部地区生活着大量苏联移民。在国界不明、国籍不清的情况下，50 年代新疆边民就有经常性、小规模自由越界情况出现。以后中苏关系恶化，1962 年更发生了 6 万多少数民族边民集体非法越境涌入苏联的恶性事件，史称“伊塔事件”。后来中国政府在加速解决新疆苏联侨民国籍问题的基础上，划定边境禁区，严格边境管理，很快就制止了此种情况的蔓延。② 与广东和新疆相比，东北的情况更为复杂，这里既有政策因素，又有民族因素。从越境事件的类型看，东北问题与新疆问题比较相近，但由于当时中朝关系和中苏关系的状态不同，中国政府处理这两起边民外逃事件的方式大相径庭，其结果也完全不一样。

由于很多朝鲜族家庭跨界而居的特殊情况，中朝双方对于边境居民合法往来流动的管理一直比较松散。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朝两国人员往来东北和朝鲜之间通行的是免护照、免签证的制度，中国居民向各省市公安机关机关领取出国旅行证，便可在两国之间自由往来。③ 1953 年 7 月，中朝签订了《中朝边境两国居民过境通行办法》，双方过境居民开始使用由县、市公安局发放的通行证。东北公安部颁发的过境通行证发放办法规定：年满 18 岁的公民，因探亲访友、升学、治病、办理婚丧事宜等正当理由去朝鲜者，均可向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领取通行证去朝鲜。1954 年 2 月，东北公安部发布《中朝边境地区居民过境通行证发放办法补充规定》，对办证过境有所限制，并将原来一个月有效期内准予往返，不限次数，改为只能通行一次。④ 1955 年 3 月中朝之间达成协议，从 7 月 1 日起实行新的通行制度，对出入境管理有所加强。除边境地区的朝鲜族居民和朝侨及有关工作人员外，都要办理护照和签证。但是通行证证出多门（黑龙江、吉林、辽宁、旅大等），边境出入点分散（安东、长甸、河口、辑安、临江、图们、开山屯、三合村和南坪等），特别是为了照顾朝鲜的需要，对于朝鲜族居民和朝鲜侨民前往朝鲜参加建设的证件管

① 关于广东边民偷渡香港的详细历史过程，见陈秉安：《大逃港》，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

② 详见李丹慧：《对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9 年第 4 期，第 1–8 页，第 5 期，第 1–22 页。

③ 国务院关于中朝之间通行制度问题的指示，1955 年 3 月 27 日，大连市档案馆，2-2-794，第 26 页。

④ 韩哲石主编：《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志》，第 302 页；安龙祯主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志》，第 545 页。

理，仍依照旧办法，可以发放单程临时出境证。[①] 此外，通行证的发放手续也很简便。经双方政府 6 月 8 日批准的该协议规定，朝鲜侨民只须持外侨居留证和外侨主管部门的介绍信，向当地公安派出所或边境工作站申请领取证件，没设派出所和边境工作站的公社，由特派员代发证件。而一般边境居民（中国籍朝鲜人）过境，只须持朝方亲属的信件和中国公社的介绍信便可申请领取证件。[②] 至于朝鲜公民来华探亲或长期居住，申请手续更为简单，只要公社一级政权机关在其中国亲属的证明信上盖一个章，即可凭此信在朝鲜办理相关入境证件。[③] 这样的制度，自然很难对边民出入境实行有效管理。以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为例，1954 年和 1957 年朝鲜族居民人数分别为 9963 人和 9791 人，而出境去朝者达 3852 人和 4896 人。[④] 朝鲜族居民流动之频繁及 1955 年新通行制度实行后外出人员数量之增长，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从性质上看，通过办理出境手续短期去朝进行私人访问，与朝鲜族居民大规模返回朝鲜，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尽管前者对后者有一定影响。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出入境管理，而是朝鲜政府在战后相当一段时期需要增加人口，特别是有技术或专长的劳动力。中国对东北边境地区的出入境管理，以及对朝鲜族居民外流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适应朝鲜的这种需求。

停战以后，朝鲜立即开始经济恢复和重建工作，其中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缺乏劳动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3–1954 年朝鲜便开始动员干部参加体力劳动。[⑤] 1957 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劳动力短缺更成为制约朝鲜加速建设的瓶颈。[⑥] 为此，政府一方面大量使用妇女和儿童工作，一方面普遍实行“志愿工

① 国务院关于中朝之间通行制度问题的指示，1955 年 3 月 27 日，大连市档案馆，2-2-794，第 25–27 页。

② 吉林省公安厅致公安部三局、外交部领事司函，1963 年 9 月 10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342-04，第 50–56 页。

③ 驻朝使馆致外交部领事司电，1959 年 2 月 16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806-03，第 69–70 页。为了控制朝鲜居民来华，1959 年 2 月朝鲜内务部要求中国加强对审批程序的管理，经反复磋商，1960 年 11 月中国外交部确定，以后朝鲜公民申请来华探亲或居住，其国内联系人的申请书须经县市一级公安机关批准盖章后，方可寄回朝鲜使用。外交部领事司致驻朝使馆函，1960 年 11 月 14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159-20，第 27 页。

④ 韩哲石主编：《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志》，第 46、302–303、320 页。

⑤ 匈牙利驻朝使馆的报告，1955 年 5 月 16 日，KTS，5. doboz，5/c，006050/1955；1957 年 12 月 13 日，CTS，8. doboz，5/c，00196/1/1958，转引自 Balázs Szalontai，“‘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1963-1964”，*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Bulletin*，Issues 14/15，Winter 2003-Spring 2004，p.96。

⑥ 根据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数据，1958 年工人和职员在册人数 107.8 万人，而要完成 1959 年的计划，这一数字应增加到 151.7 万人。见普扎诺夫日记，1959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7 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2，оп.14，д.6，л.258-292。

作”制度。[①] 不过，更让朝鲜政府感兴趣的是大量吸收居住国外的朝鲜人回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首先是吸引在苏联居住的朝鲜人回国。[②] 1958年4-5月初，朝鲜向苏联提出，希望让居住朝鲜具有双重国籍的朝鲜人留下来，要求在苏联远东地区企业工作的朝鲜公民提前回国，并表示对居住在萨哈林地区无国籍的朝鲜族人感兴趣。苏联政府满足了朝鲜的要求。[③] 旅居日本的朝鲜人，也是朝鲜政府关注的对象。[④] 1954年8月，朝鲜外务相南日发表呼吁书，号召在日朝鲜人回国。亲北朝鲜的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朝总联）也积极配合，搞宣传工作。朝鲜政府以教育费的名义，给朝总联提供了巨额资金，仅1957年就有1.2亿多日元。1958年9月8日在朝鲜十周年国庆大会上，金日成发出指示：热烈欢迎归国同胞。1959年10月14日第一批归国者登上驶往北朝鲜的轮船。当年回国者2942人，到1962年总计回国者74335人（含家属）。[⑤]

在中国生活的朝鲜侨民和中国籍朝鲜族人无疑也是朝鲜经济建设潜在的劳动力，且在手续上比日本朝侨回国方便，在人数上比苏联朝侨或在苏联的朝鲜人多得多，故而备受朝鲜政府关注。[⑥]

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中方档案，朝鲜停战不久，1954年5月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就有一些中国籍朝鲜族人和朝侨申请去朝鲜参加建设。对此，中国政府立即予以

---

① 匈牙利驻朝使馆的报告，1955年2月9日，KA，6. doboz，12/a，004063/1955；1955年5月10日，KA，11. doboz，22/a，006049/1955；1959年2月24日，KTS，4. doboz，5/a，002242/1959；1959年6月4日，KTS，11. doboz，24/b，004529/1959，转引自Balázs Szalontai，“‘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1963-1964”，p.93。

② 通过移民，在俄国远东地区的朝鲜人总数1915年已达4.4万，其中1.9万人取得了俄国国籍。（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到1939年，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朝鲜族有18.23万人。车哲九：《中国朝鲜族的形成及其变化》，《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137–138页。

③ 普扎诺夫日记，1958年4月9-28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贾丕才同朝鲜驻苏参赞会谈纪要，1958年6月17日，齐米亚宁同朝鲜驻苏大使会谈纪要，1958年8月23日、9月8日，托尔宾科夫同朝鲜驻苏参赞会谈纪要，1958年4月8日、9月16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5。

④ 关于朝鲜人向日本移民的情况，详见朴婷姬、吕秀一：《论解放前中国东北朝鲜人社会与在日本朝鲜人社会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第64–70页。

⑤ 郑信哲：《在日朝鲜人历史及其现状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第132–135页。此时旅日朝鲜人大批回归北方，主要是朝鲜政府宣传鼓动的结果，随着回归者传出的真实信息，1963年以后去北朝鲜的人逐年减少。

⑥ 显然是为了刺激中国，金日成向毛泽东夸口说，旅居日本的60万朝鲜人，到1960年表示愿意回到北朝鲜的已有20万人。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

批准。[①] 1955年8月，朝鲜政府第一次主动提出了这一问题，即要求中国政府协助62名朝鲜侨民技术人员回国。为了满足朝鲜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政府同意破例，按照一般侨民办理他们的回国手续，以协助他们尽快回国。[②]

一五计划的头一年，朝鲜开始大量动员在华朝侨回国。1957年1月朝鲜使馆通知中国，现有许多在华的朝鲜侨民申请回国，政府已决定今年内批准关内265人回国参加建设。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中国的政府机关工作，希望中方协助将他们的人事档案提供给朝方。3月，朝方通知，已经决定5月初即遣送253名朝侨回国，并再次催促中方提交这些人的档案材料，以便回国后为他们安排工作。在中方的询问下，朝鲜使馆人员承认，当这些朝鲜侨民接到回国的通知后，有人表示不愿回国，还有些人回国旅费有困难。[③] 中国外交部4月12日和16日通知各有关省市，这次朝鲜要协助遣返关内一批朝鲜侨民回国，公安部已将名单下发各地。“原则上对这些人回国我们不应阻拦，如造成我们工作的困难，另行解决”。朝方索要的人事材料，凡在机关、企业、学校中工作或学习者，由所在单位报送，凡散居社会者，由公安机关收集，4月底以前汇总，并报外交部。朝方遣侨回国的旅费完全自行解决，如有困难，由朝侨本人向朝鲜使馆提出解决。[④] 4月26日外交部再次发函，除继续强调在机关、工厂、学校和企业的朝侨“应尽量让他们回国”，归国旅费完全自理外，又补充：“如有中国籍直系亲属要求与朝侨一起回国，可以批准”。归国朝侨“退职金、养老金的发放，按该单位一般办法办理”。[⑤]

同年5月遣返工作开始，但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大多数朝侨都提出，本人无力支付回国旅费。如上海市外办报告，朝侨协会原计划动员140–200人回国，现拟定114人，其中表示愿意回国的60人（另携带儿童58人），而能够自筹旅费者只有十余人。朝鲜使馆已通知回国朝侨，朝鲜政府不能给予任何补助。结果，导致遣返时间不得不推迟。外办请示，是否可根据他们的经济情况，补助部分或全部旅

① 阎宝航给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及批示，1954年5月12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027-03，第4–5页。

② 关于协助朝鲜遣送62名朝鲜侨民技术人员回国事，1955年8月5–13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301-01，第1–20页。按照当时的规定，从事科技工作的侨民回国手续比一般侨民复杂。

③ 陈理与朝鲜使馆二秘谈话记录，1957年1月16日、3月11日，外交部致公安部函，1957年3月16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691-03，第16页；118-00691-04，第20–21、22–23页。

④ 外交部关于汇送回国参加建设朝侨人事档案材料函，1957年4月12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691-03，第36–41页；外交部领事司关于索取朝侨人事档案函，1957年4月16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691-02，第6–8页。

⑤ 外交部关于朝侨回国事函，1957年4月26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691-04，第27–34页。

费。据说南京市也遇到同样问题，处理办法是由南京市民政局给予被遣返朝侨平均每人 40 元补助（相当于年轻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有病者另加 25 元。其次，在向朝鲜遣返前，已有部分在华朝侨申请去资本主义国家或香港、澳门。上海市公安局根据有关规定，从严掌握，从缓办理。外办担心继续批准朝侨去资本主义国家，会影响朝鲜的遣侨工作，请示是否等遣侨工作结束再批准。[①] 外交部答复，朝侨回国旅费，原则上自理，有困难向朝鲜驻华使馆申请补助，如确有困难，朝方又不管者，由中国给予补助。至于申请去资本主义国家者，只可个别批准，其余待遣侨工作结束后再办。[②] 此外，朝鲜政府因准备工作不充分，无法同时接纳这些朝侨，到 7 月初要求暂缓遣侨工作，等待朝方把国内工作安排好再通知。谁接到通知谁回去，其余的仍继续在中国安心工作。中国外交部立即通知各有关单位，按照朝方所提要求办理。[③] 总之，在遣返朝侨的事情上，中方完全是配合朝方工作的。

然而，在华朝侨的数量毕竟有限，积极申请回国者更是不多。尽管采取了大力推广机械化、动员妇女参加劳动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平壤市机关下放人员达 50%）等措施，但对于实现 1959 年跃进的目标，缺乏劳动力仍成为朝鲜经济建设的突出困难。[④] 在这方面，人数众多且向往朝鲜的还是东北的朝鲜族人。

到 1957 年底，中国朝鲜族居民从各种渠道去朝鲜参加建设的已有 5 万多人，但去后又返回的有 4 万多人。[⑤] 1958 年底金日成访华期间，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派遣中国籍朝鲜族人移居朝鲜参加经济建设。中国政府立即做出积极反应，决定遣送 4 万名东北朝鲜族居民，并计划在 3 月底前抵达朝鲜，以便让他们赶上春耕生产。为了扩大朝鲜劳动力的来源，中国驻朝使馆还对定居朝鲜的 13000 名华侨进行调查，了解他们是否愿意转为朝鲜籍。但调查并未取得积极结果，由于传统和习惯，旅居朝鲜的华侨都希望继续保留中国国籍。[⑥] 这大概也是东北朝鲜族人的遣送数量大大超过计划的原因之一。此外，在朝鲜妇女与中国人结婚的问题上，

---

① 上海市外办致外交部领事司函，1957 年 4 月 1 日、5 月 9 日、5 月 11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691-02，第 4–5、9–10、11 页。

② 外交部对朝侨回国旅费的处理意见，1957 年 5 月 23 日，外交部领事司致上海、天津、北京外办函，1957 年 5 月 25 日，外交部档案馆，119-00691-02，第 12–13、14–15 页。

③ 外交部领事司致上海、北京、天津外办函，1957 年 7 月 2 日，外交部档案馆，119-00691-04，第 60–61 页。

④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 年 3 月 3 日，第 2719 期，第 19–20 页。

⑤ 关于偷渡去朝鲜的中国朝鲜族人及华侨问题（会议记录），1957 年 12 月 5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1，第 13–20 页。

⑥ 普扎诺夫日记，1959 年 1 月 21 日至 3 月 24 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26-64。

中国政府也完全是为朝鲜着想的。1958 年 10 月内务部在一个文件中指出："由于劳动力缺乏，朝鲜政府对朝鲜人同外国人结婚控制较严，我国有必要配合朝鲜这项政策，采取一些措施。"文件规定：朝鲜妇女要求来中国同中国人结婚的，原则上应从严掌握，而对要求与朝鲜妇女结婚的中国人，则尽量劝阻，即使劝阻无效，准其结婚，也要鼓励男方去朝鲜安家。①

对于朝鲜政府来说，彻底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途径就是允许中国籍朝鲜族居民改籍移民。此前也有朝鲜族居民移居朝鲜，但人数不多。如 1957 年和 1958 年两年，吉林省迁居的只有 600 户。现在由中国政府出面组织，情况当然就大不一样了。1959 年 1 月 18 日，国务院指示吉林、黑龙江、辽宁和内蒙古组织中国籍朝鲜族人并动员朝侨回朝鲜参加建设。为了方便遣送工作，3 月 14 日国务院规定，凡被批准去朝鲜参加建设者，是合营企业资本家者，不退股金，但可提前支付利息；属合作商店小商贩者，可酌情退还全部或部分股金；拖欠国家贷款或其他公款而偿还有困难者，可酌情减免。各省区对此项工作极为重视，立即召集有关部门成立遣送委员会，组织联合办公室，各级领导亲自负责，及时督促检查，到 4 月底遣送全部顺利结束。当年，吉林等 4 省区共遣送朝鲜族人和朝侨 10297 户，52014 人（内有朝侨 1084 人），其中吉林 7127 户，36274 人，黑龙江 2000 户，9817 人，辽宁 1071 户，5583 人，内蒙古 99 户，340 人，共有男女劳动力 24148 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人民公社社员，其次是工人和技术员，以及少数干部。从政治成分看，中共党员 988 人，共青团员 1991 人（未计算内蒙古的党团员）。这些人到朝鲜后，三分之一被安插在缺少劳动力的黄海南道、黄海北道和平安南道的农村，三分之二被分配到工厂企业。这次遣送工作一开始，申请报名者就十分踊跃，特别是在朝鲜族居住集中的地方，有的生产队大部或几乎全部申请报名。许多地方都大大超过原计划遣送的控制数字，如吉林省计划遣送 7000 户，而申请者竟多达 20000 多户，超过控制数字两倍多。海龙、磐石、永吉和舒兰 4 个朝鲜族自治县就有 5118 户，超过规定 2.4 倍。辽宁、黑龙江的申请报名者也都超过控制数一倍以上。引起有关部门注意的是，要求迁居朝鲜者报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感到加入公社后失去自由者有之，认为朝鲜才是自己真正的祖国者有之，因亲属在朝鲜想要团聚者有之，不愿当农民想去朝鲜当工人者有之，还有人想到朝鲜得到提升重用，或者通过改变国籍而勾销自己犯过政治错误的历史，甚至有一些人去朝鲜就是为了逃避债务或投机倒把

① 内务部关于中国人同朝鲜妇女结婚的内部掌握意见的函，1958 年 10 月 8 日，湖北省档案馆，SZ67-01-0540-003。

等。[①] 此后，中国政府继续采取有组织的方式遣送东北朝鲜族居民去朝鲜。[②]

主要是出于族群意识和朝鲜政府宣传的原因，东北朝鲜族居民迁居朝鲜的倾向本来就十分明显。中国政府满足朝鲜的愿望，组织大量人员移居朝鲜，固然有其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在东北朝鲜族居民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祖国观念的情况下，这种在短时间内匆忙组织移民的做法，无疑成为鼓励朝鲜族人离开祖国、放弃中国国籍的一种信号。于是，要求迁居朝鲜的人越来越多。中国籍朝鲜族居民经批准改入朝鲜籍的，1955 年只有 12 人，1956 年增加到 26 人，而 1957 年 1–9 月则猛增至 104 人，其中真正去参加经济建设的只有 5 人。[③] 延边自治州和龙县德化人民公社梨树管理区共 192 户人家，要求全家迁居朝鲜和个人申请去朝的，1960 年 11 月为 12 户和 8 人，12 月为 29 户和 20 人，到 1961 年 1 月，分别增加至 63 户和 58 人。[④] 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省因私申请去朝并得到批准的朝鲜族居民，1958 年 1 月至 1962 年 3 月共 7086 人（长住 6700 人）。其中 1961 年受理 1586 人（长住 876 人），批准 1108 人，1962 年 1 至 3 月受理 450 名（长住 291），批准 418 名，与 1961 年同期相比，增长 95%。[⑤] 这种情况的继续发展，加上中国经济生活状况恶化，就引发了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现象——非法越境。

三、非法越境问题及中国的处理方针

由于鸭绿江和图们江流域的边界状况和民族状况的特殊性，中朝边民非法越境的现象，久已有之，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按照中方统计，从朝鲜停战到 1957 年 9 月（4 年多），偷渡去朝鲜者总计 296 人（其中汉族 11 人），另有一个统计数字为

① 外交部关于组织中国籍朝鲜族人民和动员朝鲜侨民去朝参加建设工作的综合报告，1959 年 12 月 10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777-01，第 43–48 页；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 5 卷，未刊，1991 年，第 206 页；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 年 3 月 8 日，第 2724 期，第 13 页。

② 关于 1959 年以后朝鲜族居民有组织迁去朝鲜的情况，没有看到全面的材料。不过，到 1962 年 4 月，仅黑龙江一省又有 10000 多人赴朝参加建设。黑龙江省朝鲜族基本情况，1962 年 4 月 29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8-03，第 30–31 页。

③ 关于偷渡去朝鲜的中国朝鲜族人及华侨问题（会议记录），1957 年 12 月 5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1，第 13–20 页。

④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处关于边境居民外流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 年 3 月 12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4，第 58–63 页。

⑤ 黑龙江省朝鲜族基本情况，1962 年 4 月 29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8-03，第 30–37 页。

300户。[①] 但1959年（1年）延边地区非法越境去朝者就有357人，还有来华者534人（主要是探亲访友）。[②] 此期东北朝鲜族居民外流的原因，据有关部门分析，主要是朝鲜那边生活条件比中国这边好。1956–1957年朝鲜农业丰收，而征粮数量则因1955年统购出了乱子故有所降低，结果人均口粮大大高于中国。与此同时，朝鲜政府对朝鲜族人采取了鼓励入籍的做法，只要是朝鲜族人来到朝鲜，即可加入朝鲜国籍，而有了公民证不仅就业、上学方便，还可享受配给粮（每斤5元朝币）。在粮食市场标价每斤50–60元朝币的情况下，这对朝鲜族人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其次还有两点：1. 利用中朝币值和物价的差别搞投机倒把活动。人民币与朝鲜币的汇率，官方为1比60，黑市为1比250–300，朝鲜的物价也比中国高出许多。2. 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政策不满，不安心在中国农村参加集体劳动。[③]

对于非法越界行为的处理，中朝之间已有约定。根据中国公安部和朝鲜内务部1955年6月8日联席会议的记录：非法越界者一经查获，如无犯罪意图或行为，移交对方处理，若有不便，且属初犯，亦可就地勒令出境；如有犯罪意图或行为，由查获方依据本国法律处理，必要时亦可移交对方处理。[④] 然而，这些原则在实际生活中并未得到认真执行。

1957年12月5日，针对非法越境开始形成规模的现象，中国外交部、公安部和侨务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对策。与会者大多感到很为难，因为朝方不执行1955年6月的协议，不愿将偷渡的人送回来，如中国方面把朝鲜偷渡来华者313人（1957年1–9月）全部按照协议遣送回国，而先后偷渡去朝鲜者（几百人），朝方只送回27人。朝鲜外务省向中国使馆提出：如果中国政府坚持按照协议处理，朝鲜可以协助，但若本人不愿回去而强迫押送他们，则会产生不良影响。朝方希望中国政府同意这些人留居朝鲜。如此，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两难抉择：严格执行协议，会破坏与朝鲜的关系；同意朝鲜意见，则实际上纵容和鼓励了非法偷渡。讨论的结果，大家倾向于原则上仍按照协议处理，同时又照顾到个人意愿，以后对因转

① 关于偷渡去朝鲜的中国朝鲜族人及华侨问题（会议记录），1957年12月5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1，第13–20页。

② 安龙祯主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志》，第548页。

③ 外交部领事司：《关于朝鲜族非法越境事》，1957年12月；关于偷渡去朝鲜的中国朝鲜族人及华侨问题（会议记录），1957年12月5日；公安部第一局致外交部领事司函，1959年7月6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1，第3–4、13–20、26–27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中朝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66–67页。

籍、探亲、访友要求去朝的，在审批上可以从宽掌握。[①] 12月17日，外交部、公安部和侨务委员会正式通知驻朝使馆和黑、吉、辽三省：对双方过境人员应本着合法出入国境的批准从宽，非法偷越国境的处理从严的原则办事。为此，对已非法去朝居民，原则上动员他们回国，动员无效，可以发给侨民护照或办理退籍手续；对非法来华的朝鲜公民，原则上遣送回朝，如已定居且朝方同意，可以准许留下，将来如有必要，再动员他们回朝；对于本来已犯有罪行或牵涉法律案件的越境者，双方都应一律将其遣送回国；以后仍严格执行1955年6月协议，"为了减少偷越国境现象的继续发生，并适当照顾朝方的要求，今后对申请赴朝的中国朝鲜族居民，原则上从宽批准"。[②]

收到中方的意见后，朝鲜外务省领事部与中国使馆于1958年2月初商定了一致意见。5月初，双方就处理非法越境者的具体方法交换了意见，并确定了调查登记表格。12月朝鲜内务省又制定出登记表和处理程序，并提出从1959年1月1日起执行。朝鲜外务省希望中方对非法越境到中国的朝鲜公民，以同期和同样的办法处理。中国表示同意后，调查工作开始。1959年4月9日，朝方即提交了一份由内务机关调查的231名中国非法越境者的材料，并请求中国也提交非法越境来华的朝鲜居民的调查材料。根据朝方的材料，231名非法越境者都要求退出中国国籍，加入朝鲜国籍，朝鲜内务机关的意见是同意接收他们入籍，希望中方协助办理。[③]此前，2月20日朝鲜外务省曾催促中国尽快处理朝鲜非法越境公民问题，并提出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好人，去中国只是为了家人团聚，现在纷纷要求回国，但中国公安机关未予受理，推给了朝鲜驻华领事馆。朝方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他们回来参加建设"。[④]

经过一番磋商，中方基本上答应按照朝方的意见处理。[⑤] 朝鲜"对中国政府尽可能多地遣送越境人员回来参加建设的基本精神，表示感谢"，同时提出，"中国方面能全部遣送他们回来，朝方会高兴地全部接受的"，并暗示对于已经领取侨民证

① 关于偷渡去朝鲜的中国朝鲜族人及华侨问题（会议记录），1957年12月5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1，第13–20页。

② 外交部、公安部、中侨委关于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居民非法越境去朝问题的处理意见，1957年12月17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1，第1–2页。

③ 驻朝使馆致外交部领事司电，1959年4月20日；外交部领事司关于中国籍朝鲜族人非法越境去朝问题的处理意见（草稿），1959年1月9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1，第5–7、22–23页。

④ 驻朝使馆致外交部领事司、公安部电，1959年6月18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1，第8页。

⑤ 外交部致驻朝使馆电，1959年8月12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1，第10–11页。

的越境者，是否也可依照此办法处理。[①] 到 1960 年底，驻朝使馆根据朝方提供的材料，对 234 名中国籍朝鲜族越境者分别进行了处理：除已死亡的 4 人外，已经批准出籍的 195 人（另有随同出籍子女 77 人），转交朝方处理的 5 人（经查原系朝鲜公民），正在办理出籍手续的 25 人，因材料晚到尚未处理的 4 人，要求留居中国的 1 人。尽管中国按照朝鲜的意愿处理了非法越境来华人员问题，但根据近年中国越境去朝人员不断增多和朝方执行遣送原则不够坚决的情况看，驻朝使馆预感到，中国非法越境去朝人员的问题仍然存在。[②] 驻朝使馆的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由于中国没有采取坚决措施处理和防止边民外流的趋势，在中国出现暂时经济困难、生活物品匮乏的情况下，东北朝鲜族居民非法越境的现象，一下子就从几百人的偷渡发展为几万人举家或结伙外逃的严重事件。

1961 年春节过后不久，东北就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据安东市公安局报告，目前边民外逃情况比较严重，有些地区很突出，如古楼子有 81 户朝鲜族，3 月 14 日至 24 日即逃出 14 户 80 人，已变卖家具准备外逃的有 9 户，还有动摇不定的 32 户，其余 26 户态度不明。安东市委以统战部为主组成工作组已下乡进行说服教育，但效果不大。辽宁省公安厅民警总队正研究采取措施。[③] 4 月 5 日驻朝使馆报告，今年以来非法越境来朝的人数突然增多，据朝方通知已有 1500 余人。朝鲜的措施是，凡在朝有亲属的由政府暂时安置，没有亲属的尽量动员回中国，但多数人坚决不愿回去。[④] 据辽宁、吉林两省不完全统计，1–4 月企图偷越国境去朝鲜的已有 4701 人，其中越境得逞的有 3331 人。进入 5 月，情况愈发严重。安东市公安局和辽宁省公安厅电话报告说，沈阳、鞍山、本溪等地的朝鲜族居民，“成帮成伙，偕老带幼，有的在夜间偷渡，有的在白天手持木棒，不理边防民兵的劝阻，集体外逃”。除辽宁本省，外逃的还有来自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的居民。目前的非法越境，“已由单人单户夜间偷渡发展到成群结伙白天公开强越”。[⑤]

面对上述情况，中方通过外交途径曾与朝鲜方面交换意见，而朝鲜外务省坚持认为，“中朝两国居民的移动是在历史上形成的”，除了劝说他们回去，没有别的办

① 驻朝使馆致外交部领事司电，1959 年 10 月 11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1，第 33 页。

② 驻朝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1961 年 2 月 4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2，第 47–49 页。

③ 公安部四局关于最近中朝边境边民外逃情况的报告，1961 年 3 月 29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2，第 52 页。

④ 驻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1 年 4 月 5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2，第 53–55 页。

⑤ 边防情况电话记录，1961 年 5 月 8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4，第 58–63 页；外交部、公安部致驻朝使馆电，1961 年 5 月 9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3，第 82–83 页。

法。[①] 中国外交部和公安部也感到左右为难，只好一方面继续希望朝方协助解决问题，一方面督促地方政府采取措施。[②] 延边自治州党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宣传教育，抓好群众生活，加快办理正常出境手续，试图遏制这一情况。[③] 但由于没有在更高层面采取有效措施，事态进一步发展，而且势头更猛。据中国公安机关统计，从 1961 年 1 月至 1962 年 3 月，通过辽宁、吉林边界地区的非法越境者达 38590 人，被劝回 9205 人，偷渡时在界河淹死 252 人，其余 29133 人越境成功。[④] 到 5 月份，非法越境者猛增到 71000 人，其中成功到达朝鲜的 55000 多人。此外，由于中朝之间只有一水之隔，有的地方仅一步之遥，越境极为容易，实际上未被发现的还大有人在。[⑤]

1961–1962 年的大量边民外逃事件，给中国东北地区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后果和影响。首先是造成劳动力流失，很多单位的生产和工作受到直接影响。大量农民出走，使得农村劳力不足，土地撂荒，如延吉县开山屯公社船口一队有 90 名劳动力，外流 50 人，导致当年粮食减产约 4.8 万多斤，不仅未能完成征购任务，连口粮都不够。开山屯造纸厂的朝族技工共 353 人，一下走掉 113 人，占 32%，动摇不定的还有 89 人，给工厂生产带来很大困难。延边歌舞团因 20 多名演员外流，一度无法演出大型节目。其次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犯罪现象增多。外逃者往往成群结伙，强行越境，边境地区一片混乱。在边防人员或民兵劝阻时，有的不顾一切，丢下老人和子女，只身逃跑；有的被阻回后大哭大闹，以自杀相威胁；有的手持木棒、铁棍威胁和殴打边防人员，还有的甚至有组织地劫船、夺枪。由于迷失路途或不熟悉江河水道，淹死、冻死和摔死的越境分子不在少数。外流人员在走前大量抢购商品，增加了市场物资供应上的困难。个别机关干部、职员还带走一些机密文

① 驻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1 年 5 月 6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3，第 66–68 页。

② 外交部、公安部致驻朝使馆电，1961 年 4 月 21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2，第 56 页；外交部、公安部关于朝鲜族居民越境去朝问题的报告，1961 年 5 月 9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3，第 74–75 页。

③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处关于边境居民外流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 年 3 月 12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4，第 58–63 页。

④ 外交部、公安部关于朝鲜族人越境问题的请示，1962 年 3 月 23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5-02，第 1–3 页。

⑤ 高世坤关于朝鲜族越境外流问题的汇报提要，1962 年 5 月 10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8-04，第 76–85 页。

件和内部资料。更有少数坏人借机进行盗窃、诈骗、拐骗妇女等犯罪活动。[①] 经图们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1959 年 446 起（价值 94614 元），1961 年就猛增到 2410 起（价值 148995 元），1962 年更增长到 3071 起（价值 398374 元）。再有，边民大规模流动也严重影响了中朝正常经济关系的发展。延边自治州中朝边境贸易总额 1959 年达到 471.8 万元，1960 年就骤然下降到 122.8 万元，1963 年更减少到 112.2 万元。[②] 此外，外流人员大量携带人民币、朝鲜币非法出入，而朝鲜中央银行则对人民币公开予以收兑。据调查推算，延边自治州外流人员非法携出的人民币约有 30 余万元，而返回的 7000 余人将持有 2–3 万元朝鲜币。边境地区由此出现外汇黑市交易，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③]

造成朝鲜族居民大量外逃的原因，据东北有关部门的调查，有以下几点：一、中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自延边地区 1960 年 11 月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后，尽管口粮标准高于内地，但还是有很多居民感到不够吃，又听说“朝鲜生活好，粮食多，去了能落户就业”，于是寻找各种借口举家搬迁。这种情况在和龙县德化人民公社梨树管理区的外逃居民中占 42.8%。二、城市人口压缩，工厂精简职工，学校招生减少，从而引起边民不满。在安东地区 1962 年 6 月外流的 116 名职工中，有 104 人是被精简的人员。据延边一地统计，1962 年将有三分之二应届毕业生约 1 万多人不能升学，逃往朝鲜自然成为一种出路。三、地方政府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有缺点，对朝鲜族的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照顾不够，如海带、胶鞋、绸布、冷面、烧酒等特需品供应不足，朝文广播、报纸、书刊及民族形式的文体活动有一个时期停办、取消或者加以削减，朝鲜族学校普遍地、过快地推行以汉语教学为主，增加了教员及学生的负担，并引起一些思想混乱。四、地方机关对申请去朝人员审批限制较严，加以审批层次多、手续繁，有些去朝鲜探亲、定居等正常要求得不到满足。五、朝鲜政府没按协议及时移交非法越境人员而对他们采取安置的措施。朝方在越境路线上设有接待站，凡越境的单身汉都移交回来，全家越境的都安置在农业社，每个劳动力发给 40 元的安家费和一定数量的粮食。这种

① 黑龙江省朝鲜族基本情况，1962 年 4 月 29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8-03，第 31–36 页；高世坤关于朝鲜族越境外流问题的汇报提要，1962 年 5 月 10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8-04，第 76–85 页。

② 安龙祯主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志》，第 1372、1325–1326 页。

③ 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关于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外流情况的报告，1962 年 4 月 28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7-02，第 9–13 页。

做法实际上是对中国边民外逃现象的鼓励。[①] 笔者看过大量的材料和分析后感到，1961-1962 年朝鲜族居民大规模非法越境逃往朝鲜的原因，最基本的就是两条，一是多数人听信传言，认为到朝鲜后会比在中国生活条件好，尽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二是东北朝鲜族居民虽已加入中国籍，但对中国缺乏认同感，认为他们的祖国还是朝鲜。[②]

这次东北朝鲜族居民非法外逃的事件并非没有预兆，但为什么没有被及早制止，反而愈演愈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朝鲜族居民跨境外流现象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足够重视。1958 年底至 1960 年初，中朝两国连续签订了有关边境地区易货贸易、共同利用水丰水库养鱼、建立地方性联系、界河航运合作等一系列议定书和协定，双边界务关系呈现出一片和谐友好的景象。[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前所述，当非法偷渡现象开始形成规模时，中国有关部门并未采取积极态度予以处理，而是依从朝鲜方面的主张。当问题发展成严重事件后，又是为了维持与朝鲜的友好关系，中国领导人倾向于采取回避的态度，更不想因此令朝鲜政府感到不快。1961 年 5 月 10 日，公安部将东北发生的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④] 5 月 24 日，公安部和外交部在报告中提出，为了制止朝鲜族居民大批越境去朝，除要求地方机构采取安排生活、加强教育和边境堵截等措施外，还拟按照中朝边防代表协议规定，同朝方商量召开双方协商代表会议，交涉移交越境朝族居民事宜。考虑到筹备这一会议费时较久，拟在召开这种会议之前，先由乔晓光大使向朝外相进行适当交涉，请朝方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⑤]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是否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目前没有材料说明，但 6 月 6 日外交部给驻朝大使的批示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对朝族人偷越国境事部里将另详复，但总的精神是：我们将不采取外交手段，应由国内

---

①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处关于边境居民外流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 年 3 月 12 日；高世坤关于朝鲜族越境外流问题的汇报提要，1962 年 5 月 10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8-04，第 58-63、76-85 页。外交部、公安部关于朝鲜族居民越境去朝问题的报告，1961 年 5 月 9、10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3，第 74-75、69-70 页。外交部、公安部致驻朝使馆电，1962 年 3 月 24 日；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关于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外流情况的报告，1962 年 4 月 28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7-02，第 4-6、9-13 页。《情况反映》第六号，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8-01，第 98-100 页。

② 具体内容见前注所引文件。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中朝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169-177、178-186、195-202、203-257 页。

④ 公安部党组关于朝鲜族越境情况的报告，1961 年 5 月 10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3，第 69-70 页。

⑤ 外交部、公安部关于朝鲜族居民越境去朝问题的报告，1961 年 5 月 24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5，第 131-132 页。

做好工作来稳定这些人。朝方设招待站是应该的、不足为奇的。中朝关系最近很好，对朝族越境事不必过分重视，因此你不必去吉林了解情况。”[①]

中国采取如此容忍的态度，从长期看，是为了在中苏分歧过程中拉住朝鲜作为自己的支持者，从眼前看，是因为金日成即将访华，不能因此引来朝鲜的不满。7月11日，周恩来与金日成举行会谈时，提到了朝鲜族边民外流的问题。这段对话很说明问题。“周总理：我们延边地区跑去不少人。年青的去很好，可以当壮丁，年老的去就添麻烦，去的年轻人多不多？金首相：2万多人，年青、年老的各半。周总理：这是老少搭配。我们的国界很难划分。我们对你们实行门户开放，你们要多少人我们都给。金首相：战后有批人跑回去，我们动员他们回来，有一部分人说，为什么接受从日本回来的，不接受我们？周总理：不要动员他们，你们现在还需不需要？金首相:现在不需要。”[②] 根据这个谈话精神，外交部再次指示驻朝使馆，对朝鲜族越境问题的处理方针是“不宜采取外交措施，不必向朝方提出交涉”。[③]

如此大量的人员突然涌入，也给朝鲜带来了麻烦。咸镜北道人民委员会劳动局指导员安在秀1958年1月来朝参加建设并留居下来，当时主管由中国非法越境来朝者的工作。1961年11月，他向中国使馆详细讲述了朝鲜处理非法越境来朝人员的情况：咸镜北道与延边地区一江之隔，是朝鲜族居民越境的多发地段。1961年上半年越境人数不多，只要过来，就给安排工作。下半年来朝人数剧增，便在边境地区建立了6个接待站，由道人委、内务局、劳动局派干部组成。越境者到达接待站，首先由内务部代填卡片，经审查无问题就发给路费、粮票介绍到各郡人委劳动部分配工作。已来的2万多人，大都分配到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劳动，但对具有大学三年以上学历和专门技术的500多人，已按照中央指示介绍到朝鲜高等教育省、重工业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分配工作。目前咸镜北道仍缺乏劳动力，按照劳动力调配计划，各矿山所需劳动力4000名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尚需7000多名。但是，大量越境人员也给朝鲜带来很多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许多人来到后对工作条件或生活条件不满意，纷纷逃跑，目前已达1500多人。他们有的回中国，有的流浪到其他地区，留下的则在劳动局无理取闹，令人头痛。还有一些情况，如走私活动猖獗，投机倒把盛行，交通秩序混乱，传染病流行等，也让朝鲜有关部门忧心忡

① 外交部给乔晓光的批示，1961年6月6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6，第104页。

② 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61年7月11日，外交部档案馆，204-01454-01，第1–12页。在谈话记录中，这段话以后的几行内容在外交部解密时被屏蔽。

③ 驻朝使馆给外交部领事司的报告，1961年7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7，第112–115页。

忡。[①]

非法越境去朝人员大量要求返回中国确实是个大问题。1961年吉林省非法外流后又主动返回的7528人，占外流人数的58.5%。[②] 面对大批来到使馆要求回国者，中国使馆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了解到朝鲜的政策是“只允许来，不允许回去”，所以，除了帮助少数汉人和坚持回去的朝鲜族人解决问题外，对于大多数朝鲜族人，使馆倾向于“不予受理”，让他们自己去找朝方解决。[③] 外交部根据7月11日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答复使馆：关于越境朝鲜族的处理，使馆一般不予受理，让他们自己向朝方要求协助回来。对个别情况特殊，坚持要求回国的人，最好由使馆商得朝方同意后再发给归国证明书。对于汉族越境去朝者，凡朝方已予安置者，可不过问；朝方提出并送回者，可请朝方按协议规定办法遣送；越境人自己来使馆要求回国，可发给归国证明书。[④] 对于已经越境来到中国的人员，则“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动员回去；否则就可能引起朝鲜公民继续甚至大批的流入我境，从而会引起朝鲜方面的误会，甚至会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⑤]

中国的做法无疑是出于迁就和顺从朝鲜的考虑，但实际上朝鲜政府需要的主要是劳动力，特别是有学历、有技术、有专长的人才，如今大量人员涌入，鱼龙混杂，反而给朝鲜造成麻烦和困难。于是，朝鲜方面开始出面制止这种情况。1962年3月，朝鲜外务相朴成哲直接出面指责中国，认为出现中国籍朝鲜族人员偷越国境的严重情况，是由于中方“没有很好地执行有关双方人民来往的协议”，审批手续太慢，限制了正常出境。朴成哲指出，目前越境者越来越多，并有死亡，政治影响不好，扰乱了朝方社会秩序，留在朝鲜的人也不安心工作，因而希望两国政府进行协商，使朝鲜族人合法往来。对此，周恩来口头指示：“应向朝方承认错误并道歉”。[⑥] 于是，外交部和公安部指示中国驻朝大使约见朴成哲，并作如下声明：我

① 驻朝使馆致外交部领事司、公安部电，1961年12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7，125–128页。

② 外交部、公安部关于朝鲜族人越境问题的请示，1962年3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5-02，第1–3页。

③ 驻朝使馆给外交部领事司的报告，1961年7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7，第112–115页。

④ 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致领事司函，1961年8月3日；外交部领事司致驻朝使馆电，1961年8月9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7，第116、118–119页。

⑤ 中共吉林省委员会致通化地委并报外交部电，1961年11月25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948-02，第7–9页。

⑥ 外交部、公安部关于朝鲜族人越境问题的请示，1962年3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5-02，第1–3页。

国朝鲜族人大量越境去朝，给朝方带来不少困难和麻烦，朝方采取措施，给很多人安排了工作，是对我们的帮助，对此我们表示感谢；造成越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历史上的习惯性问题外，当前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的暂时性困难，这个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个过程，请朝方谅解和协助；我方审批出境工作确有拖拉的缺点，我们对此表示歉意，并正在纠正。[①]

此后，中国对朝鲜族外流问题采取的方针是“既要从宽又要慎重，既要放宽又不要放任自流，要把工作做到家”。为此确定，在国内各方面工作中对朝鲜族居民给予必要的照顾，凡在朝鲜有社会关系的，申请去朝鲜参加建设或前往居住，一般都放行，不加限制，而要求回朝鲜的朝侨，皆应批准。同时，在边境地区建立由公安、民政、海关、民委联合组成的劝阻站，对于非法越境人员进行劝阻工作。[②] 朝鲜方面因外流入朝人数陡然增多，难以处理，也加强了边境管理工作。在 1962 年第五次中朝边防总代表会议上，朝鲜代表指出，“在进出国境上应保持严肃性，不能随便来来往往。”朝鲜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如 4 月提出把边境居民渡口从原来的 18 个减少到 3 个，还把原来设在市、郡（相当于县）的边防总代表改设在道（相当于省）。[③] 到 1962 年下半年，东北朝鲜族居民大规模非法越境的势头终于得到遏制。

简短的结论

跨界民族的跨境流动并非中国的独特现象。由于战后国界的重新划定，东欧各国也出现了大量同一民族分居不同国家的问题。在那里，多数情况都是通过强制移民的方式，即将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居民强制性地迁移出境，归入到以这一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种族净化”（ethnic cleansing），其手段比较残酷无情，代价也很大。但从长期发展看，这种移民方式导致了更多单一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产生，有效地减少了可能发生的种族冲突。[④] 南斯拉夫、苏联解体后出

① 外交部、公安部致驻朝使馆电，1962 年 3 月 24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5-02，第 4–6 页。

② 《情况反映》第六号，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8-01，第 98–100 页；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东北朝鲜族人去朝等问题的指示，1963 年 8 月 8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784-01，第 8–9 页。

③ 《朝鲜政情》第一期，外交部档案馆，106-01128-01，第 1–10 页。

④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详见 Alfred J. Rieber (ed.), *Forced Migr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1939-1950*, London：Frank Cass，2000；Philipp Ther and Ana Siljak（eds.），*Redrawing Nations:Ethnic Cleansing in East-Central Europe,1944-1948*，Oxfor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1。

现的危机或许可以作为这一结论的佐证。而中国采取的方式基本上是自愿认定国籍，自行决定归属。这种办法比较和缓，易于被跨界民族接受，本来无可厚非。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如果仅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出发，一味追求跨界民族所在双方眼前的政治友谊，而没有把国家的长远利益作为首要考虑，且缺乏法制意识，则势必留下隐患，使问题长期化。

朝鲜族居民在中国东北与朝鲜之间频繁流动，的确是一个复杂问题，其中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观念问题，也有政策问题，处理起来确实棘手。从上述对东北朝鲜族居民流动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在确定国籍的标准、处理中朝通婚问题、办理中国籍朝鲜族人出境手续、接受朝鲜公民来华以及处理非法越境问题等各个方面，中国都是依从朝鲜的意见，照顾朝鲜的愿望。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政治需要，朝鲜是当时中国在国际上仅有的可以信赖的几个伙伴之一。[①] 中共中央曾指示："在当前国际上修正主义联合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时候，朝鲜党同我们坚决站在一起，是我们忠实的战友，两国关系是很好的，是互相支持的。因此，对处理涉及朝鲜的问题，应认真严肃对待，只能做好，不能做坏。"[②] 第二是中国人多，出走多少都没有大碍。毛泽东曾对金日成说："东北有 100 多万朝鲜人，又是你们的，又是我们的。你们兵少，就在那里去征。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反正）我们人多。"[③] 在外交领域和处理国际关系时寻求盟友或帮手，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为了一时的外交需求，忘却或放弃了处理国家事务（如国籍、边界、公民权利等）的一些基本原则，从而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造成隐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在对外经济合作中组织劳务输出，也是无可指责的正常经济行为。不过，对外派遣的时间、人数、专业、方式等，应该是有计划、有秩序、有法律保证的，如果完全顺从对方的要求，就难免陷入一种无序和失控的状态。至于对偷渡或强行越境等违法行为，最根本的对策，除了正确

① 尽管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注意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但真正可以作为盟友的寥寥无几。最近的研究表明："到 1960 年代中期为止，在南斯拉夫、印度和埃及领导下组成的不结盟运动逐渐导致了该地区国际关系的重组，并成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政治障碍。"见周万（Jovan Cavoski）：《与中苏争夺第三世界：1958–1959 年铁托的亚非之行》，沈志华、李滨（Douglas Stiffler）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266–269 页。直到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之后，毛泽东才不得不把组织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阵营作为外交斗争的重点。

②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东北朝鲜族人去朝等问题的指示，1963 年 8 月 8 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784-01，第 8–9 页。

③ 毛泽东接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 年 4 月 26 日。

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外，应该是健全法制、严格执法，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其他一切办法都是辅助性的。否则，其后果很可能就是因小失大，后患无穷。

总之，跨界民族的跨境流动问题，并非中朝之间的特有现象，处理这一问题完全可以也应该从坚持正常国家关系的立场出发，既照顾对方的一时意愿，更维护本国的长远利益。中朝关系冷暖无常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当时的做法是缺乏远见和全面考虑的。

发表于《史学月刊》2011 年第 11 期

1956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

——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1956年10月爆发的震动世界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轨，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出亚洲，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从而大大加强了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开始了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地位的历程。因此，对于波匈事件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国际冷战史，同样也是当代中国史领域的重大课题。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①]并不断被整理后公布于世。就笔者所知，最初是俄国的《历史档案》、美国的《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匈牙利的《年鉴》以及波兰的《今日》和《现代史年鉴》等专业刊物陆续零散刊出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的有关档案文献。[②]俄

① 目前历史学家查阅有关1956年危机的档案文献，除了去俄国、匈牙利、波兰的档案馆外，还可以去布拉格的中央国家档案馆（SUA）和军事历史档案馆（VHA），以及柏林的前东德共产党档案馆（SAPMDB）。此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也收藏了各种文字的有关这两次危机的档案文献。

② 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 №4, 5, 6; Csaba Békés, "New Findings on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CWIHP Bulletin*, Issue 2, 1992; Mark Kramer, "Hungary and Poland 1956: Khrushchev's CPSU CC Presidium Meeting on East European Crises, 24 October 1956", *CWIHP Bulletin*, Issue 5, 1995; Leszek Gluchowski, "Khrushchev, Gomulka, and the 'Polish October'", *CWIHP Bulletin*, Issue 5, 1995; Mark Kramer, "The 'Malin Notes' on the Crisis in Hungary and Poland, 1956",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1996/1997; A. Werblan and J. Stepien, "Rozmowy kierownictwa PZPR z delegacja KPZR. Nieznane dokumenty z pazdziernika 1956r.", *Dzis*, nr.4/1995; A. Werblan, "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 *Dzieje Najnowsze*, Rocznik XX IX, nr.4/1997。感谢波兰华沙大学扬·罗文斯基教授为笔者提供了波兰档案公布的情况。

罗斯总统叶利钦在1992年11月访问布达佩斯时，把俄国档案馆中1956年4月到1957年7月的有关文献115件转交给匈牙利政府，在此基础上1993年匈牙利先后出版了两本文件集。[①] 作为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参考资料，1996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编辑了包括英文、匈牙利文和俄文在内的文献专集，供各国学者使用。[②] 随后，在俄国、美国、匈牙利又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出版了两本较大篇幅的档案文献集，几乎囊括了有关匈牙利事件已经公布的全部俄国档案以及部分匈牙利和西方国家档案。[③]

正是在大量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在冷战史领域，展开了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深入研究。[④] 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遗憾的是，第一，在目前所有的重要研究中，对当时中国的反应、对策及其与事件

---

① 见Janos Rainer，“The Yeltsin Dossier：Soviet Documents on Hungary”，*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pp.22-24。

② 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and Christian Ostermann (eds.)，*The Hidden History of Hungary 1956: A Compendium of Declassified Documents*，Washington：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1996.

③ 见*Волков В.К.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and Janos Rainer (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实际上，在研究中可以利用的还有东德、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档案文献。

④ 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特别值得重视的有以下一些：波兰学者Tony Kemp-Welch的论文讲述了波兰危机的起因（“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and Polish Politics：The Spring of 1956”，*Europe-Asia Studies*，vol. 48，No.2，1996），而Leszek Gluchowski的文章则详细讨论了波兰危机的过程，特别是波兰内卫部队的作用（“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CWIHP Working Paper*，№17，1997），俄国学者В.Л.Мусатов和Л.Я.Гибианский的两篇论文研究的是匈牙利事件以及苏联在其中的作用（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1；Н.С.Хрущёв，Й.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2），美国学者Mark Kramer的论文专门讨论了苏联在这两次危机中的决策过程（“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 and the 1956 Polish and Hungarian Crisis”，*CWIHP Bulletin*，Issues 8-9，1996/1997），匈牙利学者的论述集中反映在两本论文集中 [Terry Cox (ed.)，*Hungary 1956——Forty Years On*，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1997；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eds.)，*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9]，而Csaba Békés的文章（“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CWIHP Working Paper*，№16，1996）和Johanna Granville的专著（*The First Domino: 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College Station，2004）则重点研究了西方大国对事件的政策及其影响。此外，Granville在另一篇文章（“1956 Reconsidered：Why Hungary and Not Poland?”，*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80，no.4，October 2002）中，还对这两次事件进行了比较研究。

的关系，很少见到专门讨论。[①] 第二，中国学者几乎还没有参加到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讨论的国际行列中。[②] 究其原因，一则是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至今没有对公众开放，[③] 二则是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似乎还有些观念上的禁区。[④] 但是，无论如何，对这样一些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以探明事实真相，作为历史学家，尤其中国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

综观事件的进程及其结果，涉及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从国际角度看，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担当了什么角色，即中国对波匈事件的影响；第二，从国内角度看，这两次危机的爆发及其结局如何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即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这两者之间自然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限于篇幅，本文先讨论前者，重点分析在波匈事件的进程中，特别是在苏联处理危机决策时，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俄国、波

① 例如 Granville 在其 300 多页的专著中，提到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地方仅有几处。就笔者所见，研究中国与波匈事件关系的，只有美籍华人学者陈兼（Chen Jian）在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1997 年）提交的一篇论文（Beijing and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后来被修改并扩展为他的一部在西方很有影响的专著（*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中的一章。

②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除一些通史类著作对此略有涉及外，主要是一些回忆录，如在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担任翻译的师哲的回忆录（《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李海文整理，《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的文章（《1956 年波兰"十月事件"的回忆》，《国际问题研究》1981 年第 1 期）和当时驻波兰使馆工作人员骆亦粟的文章（《1956 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外交学院学报》1997 年第 3 期）。比较集中谈到中国对事件的反应和作用的是吴冷西的回忆录（《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至于研究著作，涉及波兰问题的有一些论著，如王逸舟的《波兰危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刘祖熙、刘邦义的《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等，其中论述 10 月事件的内容均比较简略，且使用的资料已显陈旧。利用最新解密档案研究匈牙利事件的惟一学术成果，应属胡舶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国的应策与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该书辟专章讲述了中国与匈牙利事件的关系，其结论是"中国的影响是居于次要地位的"（第 250 页）。在笔者看来，这个结论似乎过于简单。

③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现在已经对外开放，而且解密的文献年限在 1–2 年后即可到 1960 年，学者期待的是那时可以看到有关波匈事件的中方档案。

④ 过去中国官方对匈牙利危机的定性是"反革命事件"，公开出版的史料也仅限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当时公布的文献，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的《匈牙利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年）和《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年）等。其实，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匈牙利政府就已经为 1956 年的事件平反了 [详见 Terry Cox，"Reconsidering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Terry Cox (ed.)，*Hungary 1956——Forty Years On*，pp.1-13]，外人又何必为此战战兢兢？至于这次事件能否算作"起义"或"革命"，那只是一个学术问题。

兰和匈牙利的档案文献，至于中国方面的参考资料，大量的只能是包括回忆录和采访录在内的口述史料，以及当时公开和内部的新闻报道。[①]

一、前提：苏联、东欧、中国三角关系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同时爆发在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也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同样是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那么，中国因素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呢？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需要对事件发生前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做出基本判断。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到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成为莫斯科的顺从奴隶，苏联与东欧关系进入了冷冻状态。[②]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开放和政治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状况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苏共二十大后，波兰舆论提出了追查枪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案件、重新评价1944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③]另一方面，改革派在波兰党内逐渐得势，一致呼吁过去受到批判的哥穆尔卡出山。而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波兰走向独立的发展道路。[④]

① 应该承认，除中国档案外，已经发表的各国文献和口述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其中充满了矛盾和疑点，这就需要研究者认真解读，小心考证。限于篇幅，本文只以经过笔者梳理和对比后确认的材料构成叙述主线，至于许多史料和论著中的偏差和舛误就不再一一指出了。

② 有关档案文献见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и Мурашко Г.П.*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2, 1949-1953，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相关的中译文史料，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17、19、22、23、24、2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③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22，оп.40，1956г，п.336，д.10，л.31-32；*Орехов А.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с.222-224。

④ 有关情况中国有详细报道，见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6月1日，第1895期，第585-597页。

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匈牙利的社会情绪虽然与波兰大体相同，但由于保守派在领导层占有绝对优势，其结局就完全异样了。尽管保守派领导人拉科西在 1953 年 6 月受到严厉谴责，但继续担任党的第一书记，而改革派代表纳吉·伊姆雷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后所推行的改革进展缓慢。由于苏联党内斗争的结果，1955 年 4 月纳吉又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而失去了权力。苏共二十大再次激发了匈牙利的改革浪潮，人们不仅呼吁变革，而且强烈要求为受迫害者平反，批评的矛头直指拉科西本人。特别是在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党内外情绪激昂，抗议现行政策的活动有增无减。7 月，莫斯科迫不得已决定拉科西退休，到苏联休养，而让他的亲信格罗·埃诺接替了其党内职务。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和社会知识分子对此非常不满，更大的冲突和风暴正在酝酿之中。[①]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②]此时，不仅东欧各国仰望着北京，莫斯科也开始指望得到中共的帮助。

自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58 年上半年。[③]尽管赫鲁晓夫的有些做法令毛泽东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头上的“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总体说来，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与中共八大

---

① 详见 *Мусатов В.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г.，№1，с.4-6；*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с.242-248；*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28-30，35-40，85-87；*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Хрущев Й.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2，с.12。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3 月 5 日，第 1817 期，第 17–19 页。

③ 参见笔者在《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年）一书中的相关论述。

路线是一致的。[①] 莫斯科越来越重视中国党的意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转载后，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拥护，苏共中央还把全文重新翻译后印发了20万册单行本，供全党学习。[②] 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时，苏联广播电台选出最有名的播音员广播，并数次播放录音，以示重视。[③] 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因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⑤]

二、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⑥]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⑦] 后来也有波兰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⑧]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按照事件的发展过程，这里涉及三个问题。第一，苏波两党在华沙会谈期间（19–20日），赫鲁晓夫关于停止苏联部队向华沙进军的命令是如何做出的；第二，苏联代表团回到莫斯科以后（20–23日），关于放弃对波兰进行干涉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三，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23–31日），为调解苏波关系、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做了哪些工作。

①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发王甫对苏联若干情况的报告，1956年4月25日。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第101张；《人民日报》1956年7月6日。

③ 荣植：《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新年宴会》，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第19–20页。

④ 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49，д.41，р.8862，л.16-17.

⑤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99–600页。

⑥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10月18日，第2236期，第3–13页。

⑦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7日，第2236期，第1283–1284页。

⑧ Andrzej 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Dzis*，nr.10/1996，c.123-124. 该文系笔者请陈世泽译自波兰《今日》杂志，谨在此表示感谢。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先是遭到镇压，随后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① 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 月 12 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哥穆尔卡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在讲话中除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提出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② 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推进改革和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不断高涨。在 15–17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做出决定，将于 19 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定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包括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 K. K. 罗科索夫斯基元帅。③ 波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说波兰当局正在走上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 700 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将军 ④ 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理由是八中全会即将开幕。⑤

10 月 18 日，波诺马连科又通知波兰人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计划于 19 日晨抵达华沙，并要求推迟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均遭到拒绝。哥穆尔卡后来向周恩来讲述的情况与此相同，只是补充了一个情况：在苏联的压力下，为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最后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并决定前往机场

---

① *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225-226；扬·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于欣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第 29 页。

②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22–24 页。

③ 罗科索夫斯基 1896 年出生在华沙，后加入苏联国籍。卫国战争中成为苏联的著名将领，因解放波兰有功获波兰元帅衔。1949 年 11 月被斯大林派往波兰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回到波兰后仍然保留着苏联国籍，后来又兼任华沙条约部队副总司令。因此在波兰人眼中，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对波兰实行统治的象征。详见 Leszek 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pp.63-70；*Носкова А.Ф.* 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45-1953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1，с.109-110。

④ 科马尔是哥穆尔卡的亲密战友，1952 年被捕，1956 年 4 月恢复政治名誉，8 月出任内卫部队总司令。

⑤ 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第 142–143 页；*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227；Leszek Gluchowski，Khrushchev，Gomulka，and the "Polish October"，pp.38-39。

迎接。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两个决定：（1）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2）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俄国档案显示，通告的全部内容是："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就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在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方面出现了尖锐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党的领导班子组成的根本问题。由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显然，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只提到代表团去波兰的必要性，而根本没提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经决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①] 俄国国防部的档案材料证明，10 月 19 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 7 空降师 108 伞兵近卫团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54 架里 -2 和 45 架伊尔 -12 飞机正待命出发。[②]

10 月 19 日早晨 7 时，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华沙，随行的还有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参谋长安东诺夫和一大批高级军官。哥穆尔卡与波兰领导人赶到机场迎接时，遭到了赫鲁晓夫气势汹汹的指责和呵斥。经过短暂的争吵，波兰人拒绝了赫鲁晓夫关于延期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双方随后来到代表团下榻的贝凡德尔宫继续会谈。在激烈的争论中，赫鲁晓夫明确说要对波兰进行"强制性干预"，哥穆尔卡则冷静地表示，如果苏方继续进行威胁就中止会谈。因当时波党所有中央委员正在另一幢大楼的会议厅等待全会开始，苏联代表团被迫同意波兰领导人先去主持全会开幕式。10 点钟大会正式开幕，首先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增选哥穆尔卡等四人为中央委员的决定，政治局还建议由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然后，奥哈布简单通报了苏共代表团来波的消息，并建议为继续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会谈而休会。大会仅

---

① *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228-229; Johanna Granville, "From the Archives of Warsaw and Budapest: A Comparison of the Events of 1956",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16, No.2, Spring 2002, pp.548-549;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itary Occupation",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eds.),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 p.9;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26–27、55–82 页。只有吴冷西的回忆说，苏联调动军队的命令是 17 日下达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 34–40 页］，这显然是记忆错误。

② A.Kirov,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eds.),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 p.132. A. Kirov 引用这条史料是要说明匈牙利的紧张局势，但在笔者看来，这是要对付波兰的，因为当时匈牙利的局势尚不足以让莫斯科做出这样的决定。

进行了半个小时。此后在贝凡德尔宫进行的波苏两党会谈，气氛稍许平和了一些。米高扬阐述了苏联代表团的看法，强调指出苏联在民主德国领土拥有武装力量，因而对八中全会后可能在波兰发生的变化并造成苏联同这些部队联系困难甚至中断的局面表示担忧。米高扬表示苏联方面绝对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莫洛托夫则表现出更为强硬的立场。波兰方面解释说，八中全会后所推行的政策和变革只会密切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加强而不是削弱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还是强烈要求除增补哥穆尔卡外，波党政治局不得作其他人事变动。这一要求得到罗科索夫斯基等保守派的支持，但遭到哥穆尔卡等人拒绝。

此时，波兰内务部开始不断得到苏军从西面和北面向华沙前进的消息，并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不过，波兰人一时无法判断苏联的举动是已经决心进行武装干涉，还是想以此施加压力，迫使波兰让步。在这种微妙的时刻，任何莽撞的决定都只会引起更加复杂和危险的结果。哥穆尔卡没有采取行动，只是向苏方提出了抗议。赫鲁晓夫谎称是以前布置的军事演习，并答应立即停止。会谈继续进行，除了波兰领导层的人事问题，又在波苏关系中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迟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下午6时，奥哈布返回全会，向中央委员们作了简要汇报，并建议因需要连夜与苏联人进行会谈，全会推迟到第二天上午再开。晚饭后双边会谈继续进行。这时，并未停止前进的苏联部队还在缓缓向华沙迫近，而为数不多的波兰武装力量部队根据罗科索夫斯基的指示也在向华沙移动。此前，罗科索夫斯基曾向赫鲁晓夫表示，如有必要使用武力逮捕那些反革命分子的话，他将随时听候莫斯科的吩咐。与此同时，得到苏军行动消息的华沙工人、学生纷纷涌向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强烈谴责苏联干涉波兰内政，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改革派，要求贯彻民主化。[①] 苏联使馆及时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断言在华沙即将爆发一场真正的叛乱，示威游行具有危险性和反苏性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关于苏联和波兰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到会谈的会场。晚9时，感到受骗的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时又责问罗科索夫斯基波兰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随后，哥穆尔卡断然中止了会谈，等待苏联人尽快做出决定。其实，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特别是在18日晚得知苏联代表团执意要来华沙时，就已经考虑到苏军可能进行武装干涉，并有了军事准备。华

① 王炳南：《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的回忆》，第38页，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2日，第2029期，第1075–1076页。

沙军区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成立了两个司令部——军事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其任务是监督苏联部队的调动并及时向政治局报告，波兰的海军和空军也制定了反击苏军的作战计划。内卫部队甚至接到命令：在必要的情况下逮捕苏联代表团。一些工厂和学校也建立起纠察队和自卫队，并得到了武器装备。[①] 此时，必须做出选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两个情报，第一，通往华沙的道路已经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无法前进；第二，罗科索夫斯基已经失去了对波兰大部分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将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决定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苏联将不得不进行干涉。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双方商定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 20 日清晨结束，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②]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决定暂时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新华社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证明，苏联仓促做出的武装干涉的决定，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说波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所以苏联当时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但当赫鲁晓夫等同志到华沙谈判后，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③] 此外还可以断定，中国的因素在这里没有起什么

---

① ЦХСД, ф.5, оп.49, д.5, л.102-103, *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232-233.

② 以上关于苏波会谈的描述，除特别注明外，均根据波兰的档案文献（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28–40、55–63 页），赫鲁晓夫的回忆与此基本吻合（见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 323–326 页）。还可参见：Leszek Gluchowski, "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 pp.4-51; Johanna Granville, "From the Archives of Warsaw and Budapest: A Comparison of the Events of 1956", p.549, *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230-232。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 年 10 月 18 日，第 2236 期，第 3–13 页；1956 年 10 月 23 日，第 2031 期，第 1135–1136 页。

作用，因为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此时并不知道中共的态度，甚至中共也还没有得到苏联将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的消息。[①]

当华沙剑拔弩张时，北京似乎还很平静。关于 19 日苏联是否通知中国准备在波兰使用武力的问题很重要，这涉及到毛泽东是否出面阻止苏军调动以及中国的反应是否对苏联决定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史料中的不同说法做出判断。

10 月 19 日，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据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尤金通知说，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十分紧张。[②] 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档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

另一种说法是骆亦粟和吴冷西提供的，据他们回忆，尤金 19 日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吴冷西说：20 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向苏联提出警告。晚 7 时，毛泽东接见尤金说，“我们收到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说你们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政治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吴还回忆说，22 日毛泽东听到苏联已经撤军的消息时又说，这主要是在波兰遇到了坚强抵抗，但中国党的表态对此也有一定影响。[③] 由于吴冷西当时列席政治局会议，所以

① 笔者 2004 年 4 月 17 日对骆亦粟进行访谈时得知，23 日刘少奇、邓小平到莫斯科后，中国驻波兰使馆参赞余湛来汇报波兰情况（骆随同余到莫斯科汇报），其中说到：19 日晚华沙街头出现了“我们有毛泽东的支持”的大标语。邓小平说，这个提法不好。以笔者的理解，这个标语不过是表明了当时波兰人对中国的期望和信任。

②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 11 页。最近出版的《毛泽东传》采用了这个说法。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601–602 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 34–44 页；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年，第 10–13 页；骆亦粟：《1956 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骆还说，毛泽东把中共的答复也告诉了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在访谈时骆告诉笔者，他当时在华沙，对于国内发生的情况他是听说的。

他的说法在中国广为流传。[①]但在笔者看来，此言疑点颇多。首先，说中国收到了苏共中央关于出兵干涉波兰的通知，这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及目前看到的通知内容不符——那里根本没提出兵的事。其次，说尤金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问题，与逻辑不符——尤金不可能违背莫斯科的指示而私自将军事调动的机密告诉中国人。最后，如果毛泽东没有得到苏联出兵的准确消息，怎么可能劈头盖脸地指责苏联领导人呢？[②]退一步讲，即使毛泽东在20日晚上（华沙时间20日中午）对尤金表示了中国反对出兵的意见，正如吴冷西自己分析的，这个消息对于20日凌晨苏联做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因为那时苏联代表团已经返回莫斯科。所以，上述回忆史料如果没有档案文献加以印证，是难以被接受的。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赫鲁晓夫在19日夜间决定停止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还不知道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会议讨论。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纪录片段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兰。会议研究了在波兰的军事演习问题(但从记录看不出讨论结果)，还决定准备从波兰召回苏联顾问的文件，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波兰问题。记录还显示，这时莫斯科已经意识到驻波兰使馆在对奥哈布和哥穆尔卡进行评价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为慎重起见，会议最后决定邀请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来莫斯科进行商议，并拟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专门去中国通报情况。[③]

在2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尽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还在犹豫，但赫鲁晓夫已经倾向于对波兰采取让步政策，他提出：“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拟定并通过了给波党中央的信，同意撤销隶属于波兰安全部门的苏联顾问机构，召回在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会议再次提出，“召开一次有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时间确定在23日，并通过了给各党中央的

① 甚至一些很有影响的论著也引用了这种说法，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04页；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146-147。

② 19日晚关于苏联部队进军华沙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所以北京有可能通过新华社记者或外电报道知道这一情况。但这只是传说而已，中共不大可能以此为根据当面指责苏联，且按照吴的说法，毛泽东自称得到的是“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

③ 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49. 中译文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1–42页。

信。信中只提了一句"鉴于波兰的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见"，还说要派一架专机来接中国代表团。[①] 会议当天，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通了电话，他在谈话中强调，"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与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的基础上。"[②] 显然，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联对波兰的基本政策已经确定，所需要的帮助是如何处理与波兰关系的善后工作以及如何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③] 后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④] 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⑤] 由此看出，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主要是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同时保证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

与此同时，大约是在10月21–22日，中共也向波兰方面表明了对波兰国内政

①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1-3；оп.14，д.67，л.129；оп.14，д.67，л.1，4，5. 中译文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3–48页。

② АВПРФ，ф.0122，оп.40，1956г，п.336，д.10，л.108，*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234.

③ 这里尚待解决的只是罗科索夫斯基的去留问题。但 Leszek Gluchowski 认为，直到23日苏联似乎仍然没有放弃武装干涉，理由是据波兰材料，那时苏军还在向华沙前进（"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p.65）。这个说法与俄国档案关于21–23日情况的记载相矛盾，而"波兰材料"究竟是什么，是否可靠，都需要进一步拿出证据。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44–45页。

⑤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02–603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2页。这个讲话内容可以证明，吴回忆的毛泽东20日与尤金的谈话，在内容上也是值得怀疑的。

策的倾向性态度。据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长米契斯瓦夫·马热茨回忆，10月1日代表团团长奥哈布因国内形势紧张提前回国，其他成员在中国南方和西部参观了三周。当代表团回国的飞机将要起飞时，发动机突然熄火，马热茨等人被带到机场贵宾接待室，等候他们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朱德。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马热茨说："我们请您向波兰党领导人转达我们的敬意及对你们进行改革的钦佩之意。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作的自主努力，并祝愿你们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刘少奇接着强调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苏共政治局通报中国对波兰改革的态度，波兰完全可以指望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最后，刘少奇还表示中国将向波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贷款。马热茨回国汇报后，波兰领导人对此十分感激。[①]

赫鲁晓夫似乎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10月24日11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②]然而，未等集体会见，赫鲁晓夫便抢先单独赶到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于23日午后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赫鲁晓夫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宾馆，并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谈到处理波兰危机时，赫鲁晓夫做了自我批评。据师哲回忆，赫鲁晓夫介绍说，他们最初对波兰事件有一些无端怀疑，认为波兰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但苏共代表团到华沙后，同波兰领导人谈了一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发现自己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新领导人。不过，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③]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刘少奇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也指出，"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刘少奇还批评了过去斯大林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错误态度。最后，

① Andrzej Werblan, "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 c.128-130.

② 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5, 5об, 中译文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9页。

③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3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804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03页。

刘少奇表示，保证与苏联团结一致。赫鲁晓夫则表示同意刘少奇的观点。[①] 会议记录非常简单，以至有些词句的确切含义还无法确定。对此，参加会议的师哲的回忆，可以帮助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中，刘少奇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对波兰事件的意见，表示同意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的方针，接着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刘少奇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有一个处理相互关系要依据什么原则的问题。大国的党，较老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理所当然应多承担义务，做出较好的榜样。苏联长期以来诚心诚意地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和中国在内，而且帮助很大。但是关系还是搞不好，波兰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匈牙利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就值得研究一下，是不是一切事情已做得尽善尽美，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些缺点或者还有一些错误。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少奇说，有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家事务时有缺点，有错误。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甚至于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有时也有协商的形式，但明天甚至当天就要通过决议，人家没有时间考虑。事先既没有个别谈话，又不作集体商谈，只有强加于人，就是要别人听你们的话，不听，你们就要整人。在世界工联、世界妇联、世界青联、世界和平运动中，都有这种情况，特别是世界工联。刘少奇还批评说：你们随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外国的兄弟党，如 1950 年 1 月《关于日本形势》一文，批评日共。这种文章是不应该发表的，是不适当的。这回《真理报》批评波兰，也在波兰引起很大反感。何必这样呢？这种事情要很慎重，这种方式要改变。必须学会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协商、合作、协同动作：只想到自己，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做法，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极大的害处和恶果。刘少奇最后说，无论国际形势有怎样的变化，或者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们保证中共会跟苏共站在一起。国际共运的中心只能是你们。陶里亚蒂曾提出一个多中心的议论，我们跟意大利同志谈过，我们不赞成这个多中心。中心只有苏联，十月革命 40 年，第一个社会国家，经验最多，工业化程度最高。帝国主义最怕苏联，不怕中国，不怕波兰。但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应该讲清楚。两党的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方向。如果我们两党的关系破裂了，帝国主义就要大加利用，大肆进攻。我们正是从这个大局出发，

① 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2. 中译文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52–53 页。

才在会议上举手同意你们的决议。赫鲁晓夫当场表示：两党关系不能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否则，时间久了是一定会破裂的。刘少奇笑着说：不会的，就是有再大的问题，我们也还是站在一起的。因为这是决定世界形势的问题。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需要站在一起，这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道理，其他的争论都是小问题。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①] 刘少奇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这次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一次。”[②] 显然，通过波兰事件批评苏联，并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目的。

会谈期间，中国驻波兰使馆派人到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情况。据参加汇报的骆亦粟回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中央决定，这次只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批评多了，怕他们接受不了。还说：苏联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东欧各国的事情，管得越多包袱背得越重，人家离得越远，放开些，反而团结得紧些。邓小平着重询问了八中全会后波党政治局人员的变动情况，特别对哥穆尔卡和罗科索夫斯基问得很仔细。他指示：“要多做苏波双方的团结工作，但对一方讲的话，要准备让另一方知道，凡是不能让另一方知道的，不要讲，别看他们现在吵架，要想到将来他们有好起来的时候。”[③] 这表明，中国当时对波苏关系是有清醒认识的，对直接介入波兰问题还是存有戒心的。

关于危机发生后中共如何做波兰党的工作，目前看到的材料很少，只有吴冷西回忆录中讲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发回的电报说，在与哥穆尔卡、奥哈布等人的会谈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党事务，同时也劝他们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度量要大一点，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中国党希望波兰与苏联搞好关系，因为波兰是东欧最大的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好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甚大，相信波兰同志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处理好波苏关系。哥穆尔卡代表波兰党一再感谢中国党的支持，并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并表示要努力改善

---

①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 13–14 页。另参见骆亦粟：《1956 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 42–43 页。

②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记录，1956 年 11 月 10 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 805 页。

③ 骆亦粟：《1956 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 41–42 页。

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刘少奇后来汇报说，我们在莫斯科在苏波两党之间进行调解，分别与两党代表团谈了几次，贯彻中央调解、劝和的方针，是取得了成功的。后来苏波双方谈得比较好，苏波之间不至于发生大的冲突了。[①]

尽管这条史料已经被一些研究者使用，[②]但其真实性颇令人怀疑。据笔者考察，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哥穆尔卡和波兰代表团根本就没有到莫斯科来。证据如下：10 月 23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哥穆尔卡请求于 11 月 8 日进行会晤，此其一。[③]据师哲和骆亦粟（二人均在莫斯科）回忆，26 日中苏会谈时，赫鲁晓夫通报了他与哥穆尔卡通电话的内容，并请求刘少奇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哥穆尔卡的工作，此其二。29 日双方会谈时，赫鲁晓夫再次通报了他与哥穆尔卡通话的内容，此其三。[④]在 31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确定，将与哥穆尔卡在布列斯特地区举行会晤，讨论匈牙利问题，此其四。[⑤]实际上，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是 11 月 15–18 日访问苏联的。[⑥]因此，10 月 23–31 日哥穆尔卡根本就不在莫斯科，刘少奇与哥穆尔卡的谈话以及中波代表团会谈从何说起?

从档案文献看，中共对于波兰党确实也有担忧的地方，也需要去做工作。问题的核心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刘少奇在 10 月 26 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 45–46、56–58 页。

② 如《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83 期，第 162–163 页）刊登的一篇文章就采用了这个说法。

③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5，5об. 关于这个问题，诺沃提尼的另一个记录是："哥穆尔卡同志告诉苏共中央他将接受邀请并在 11 月 11 日后抵达。"见 *CWIHP Bulletin*，Issue 5，p.53。

④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 15 页；骆亦粟：《1956 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 42–43 页。骆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肯定地讲，那时波兰代表团没有来莫斯科，如果有这方面的会谈，一定会要他做翻译。另据波兰报载，哥穆尔卡出席了 10 月 27 日开幕的波军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军官全国会议。

⑤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15-18об，*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479-484. 参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第 28 页。

⑥ 会谈情况详见刘祖熙、刘邦义：《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第 100–102 页。

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①]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②]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或许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与波兰党沟通，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月27日深夜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毛泽东详细了解了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感到担忧。毛泽东认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③]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④]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其原因显然是对当时动乱的匈牙利局势有所好转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

① 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3，中译文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4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5页；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42–43页。

② 据骆回忆，这个情况是后来刘少奇自己说的（笔者采访骆亦粟记录）。11月2日赫鲁晓夫与铁托会谈时，也提到他曾劝说刘少奇去华沙，但中国人一直没有得到签证，毛泽东为此很生气。见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达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第179页。

③ 基里洛克致哥穆尔卡电，1956年10月27日。Andrzej 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c.124-126.

④ Leszek 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pp.81-82.

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他还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时刘少奇提出了一个建议：苏方是否可以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谈话一直进行到夜里两点。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表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可以放手，也同意起草一个宣言。于是，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①] 在 30 日晚上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表示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稿，题目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②]

至此，在刘少奇看来，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三、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一次出兵

与波兰事件相比，苏联在最初处理匈牙利危机时（10 月 23–24 日），反应非常迅速，决策也非常果断。这里的问题是：第一，苏联出兵镇压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二，中国当时是否知道莫斯科的这个决策；第三，中国对苏联这次军事行动持何种态度。

如果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

①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 15–16 页；骆亦粟：《1956 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 43 页。

②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4，д.484，л.25，中译文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317 页；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6-14，*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с.457-463。公开发表的宣言文本见 Правда，31 октября 1956 г.，Известия，31 октября 1956 г.，以及《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1 日。

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其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局面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加剧烈。[①] 格罗执政后的举动令人颇感失望，他竟然到苏联休假长达两个月。回国后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去访问南斯拉夫，直到23日上午才回国，国内问题都交给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I. 科瓦奇全权处理。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至危机步步逼近。

10月6日为拉科西大清洗最著名的受害者拉伊克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前往送葬的群众队伍多达20万人。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而政府的默许也使民众从心理上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特别是当官方的新闻影片中出现纳吉参加送葬的特写镜头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②]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决议：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称纳吉仍是犯有错误的，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③] 这时，安德罗波夫已经预感到，"过些时候大概不得不让纳吉进入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也许还要进入政治局，因为在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而纳吉一旦进入政治局，他可能就是'局势的主宰者'。"[④]

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学生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要求越来越激烈，而且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和给予新闻工作者以豁免权。大会特别提出赞成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致电匈党政治局祝贺恢复纳吉的党籍。[⑤]10月22日在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学生集会上，成立了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并提出了16条要求，其中包括：立即从匈牙利撤出全部苏联军队，通过秘密投票自

---

① 有许多历史文献反映了莫斯科在挑选拉科西继承人时的考虑及决策过程，详见 *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c.138-139, 152-157, 172-173, 176-182。

② 山多尔·科帕奇：《匈牙利悲剧》，龚新康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年，第119页；*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c.194；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1月28日，第2063期，第664页；2004年6月8日笔者对夏道生的采访。夏当时任中国驻匈牙利使馆随员。

③ 详见《人民日报》1956年10月7日。

④ АПРФ, ф.3, оп.64, д.484, л.64-75, *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c.300-306.

⑤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1月28日，第2063期，第673页；*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год 1956-й, c.257。

下而上地选举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基层、中层和中央机构领导人，在纳吉领导下进行政府改组，罢免在斯大林 - 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审判拉科西，在多党制基础上进行全民选举，制定工人最低生活标准，平等对待单干户农民，释放无辜的被捕者并为他们恢复名誉等。[①] 此时，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三股力量已经聚合在一起了。

学生们的纲领没有提出任何进行根本经济变革的要求，但是其主要的政治要求在激进程度上却超过了以往几个月以“裴多菲俱乐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党内改革派提出的口号。[②] 为了表达和宣传自己的纲领，学生们提出在第二天下午 2 时 30 分举行游行示威，并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支持。刚刚回国的格罗等人担心局势失控，于 10 月 23 日 12 时 53 分由内务部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了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但是很快就因激起民愤而不得不在集会前几分钟取消了禁令。当天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声援波兰人抵制苏联的文章，以及各种群众倡议和通告，舆论明显地倾向于民众。于是，游行参加者的人数逐渐增加，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下班之后，布达佩斯市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加入了游行行列，工人们也从市郊的工业区涌进城里。游行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喊出的口号也越来越激进，愤怒的人群开始行动起来——象征着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被吊车和钢索拉倒了，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情绪十分激奋。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③] 正当人们期待着政府的回答时，格罗在晚 8 时发表了广播讲话。令群众失望和激愤的是，格罗一口咬定这次运动是“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工人阶级政权”和“破坏秩序”，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挑衅活动”。这不啻火上浇油，人们被激怒了，一些青年试图冲进广播电台大楼，宣读游行示威者的纲领性要求，结果与国家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晚 9 时以后，冲突过程中第一次出现了伤亡（关于谁打第一枪的问题至今没有发现可靠的证据）。这时，抗议行动开始带有武装暴动的性质了，游行示威者从派来增援守卫大楼的部队以及民防仓库和地段警察局那里抢夺或搞到了武

① *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с.316-318；A.Kirov,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 pp.134-135.

② 与以往宣传留给人们的印象不同，裴多菲俱乐部不是由学生组成的机构，而只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松散地组织起来的辩论团体。在 23 日危机爆发以后，俱乐部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完全停止了。关于裴多菲俱乐部的专题研究见 András Hegedüs，“The Petöfi Ciercle：The Forum of Reform in 1956”，Terry Cox (ed.)，*Hungary 1956——Forty Years On*，pp.108-133。

③ 俄国档案证实，苏联大使馆有两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三秘克留奇科夫）是游行的目击者，他们认为，白天的示威游行组织得很好，并且是可以控制的。见 *Мусатов В.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1，с.10。

器。午夜时分，匈党中央下令实行戒严，镇压开始了。[①]

鉴于布达佩斯不稳定的形势，苏联驻匈牙利的华约部队——特别军早就制定了应急预案。1956 年 7 月，华约部队参谋长安东诺夫来到达布达佩斯检查部队情况。随后，驻军参谋部在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下制定了一份"特别军参加在匈牙利领土内恢复秩序"的绝密计划，代号为"波浪"。该计划包括一项特别指令，规定了在必要时苏联军队必须占领和守卫的目标，苏军与匈牙利国家保安机构及人民军的合作方案，以及可以利用的武器装备数量。随着局势发展，10 月 6 日至 19 日，安德罗波夫与特别军负责人多次举行会晤，研究部署和准备工作。21 日特别军领导人又检查了各部队出动前的准备状况，同时在苏联边界也采取了防止匈牙利局势失控的安全措施。[②] 由于 10 月中旬安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分别给苏共中央和总参谋部发来的关于匈牙利形势的紧急报告，10 月 20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已经考虑派米高扬前往匈牙利，以及召回正在各地支援秋收的部队以利战备的问题了。特别军参谋长马拉申科于 10 月 22 日夜晚抵达布达佩斯，以亲自掌握局势的变化。[③] 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也于 23 日赶到匈牙利。[④] 相反，匈牙利军队的举措却显得犹豫不决。国防部长巴塔 19 日下达了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同时批准了为应付布达佩斯出现社会动乱而制定的计划，但第二天又取消了戒备状态，以至在布达佩斯发生武装暴乱当晚，很多军官都不知是否应当执行镇压的命令。[⑤] 显然，实行镇压的任务只能靠苏军来完成了。

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和大使安德罗波夫。匈牙利国防部上校米克罗什·苏奇在回忆录中说，10 月 23 日下午 5 时，吉洪诺夫当着国防部众多官员的面与在莫斯科的安东诺夫通了

---

① *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с.321-323, 349-356；*Мусатов В.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1956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с.10；*Путилин*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 с.258-260；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itary Occupation", pp.15-19, 26-27；笔者对夏道生的采访。

② A.Kirov,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 p.132.

③ *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с.300-309, 315-316；Y.I.Malashenko, "The Special Corps under Fire in Budapest：Memoirs of an Eyewitness",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eds.),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 pp.221；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itary Occupation", pp.7-8.

④ *Путилин*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 с.258-260.

⑤ АВПРФ, ф.059а, оп.4, п.6, д.5, л.88-96, *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с.337-343；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itary Occupation", pp.25-26.

电话，要求准许命令特别军在必要时进入布达佩斯。得到批准后，吉洪诺夫随即命令特别军处于待命状态，并向在场的匈牙利军官宣布，部队将于午夜后某一时刻抵达布达佩斯。[①]另据马拉申科回忆，同样在下午 5 时，安德罗波夫通过军用电话向拉先科通报了布达佩斯的局势并询问他，能否派部队帮助维持首都的秩序。拉先科回答说，那是匈牙利警察和部队的事情，况且没有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命令，他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然而不到一个小时，特别军便接到了苏联武装力量司令部的命令——准备战斗。[②]还有材料说，喀尔巴阡军区的第 128 步兵近卫师于 19 时 45 分，而驻匈特别军于 20 时接到了紧急待命的命令。[③]无论如何，在匈牙利正式向苏联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以及克里姆林宫对处理危机的措施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④]

23 日夜晚，苏联和匈牙利领导人都在紧张地研究应对危机的办法。

据俄国档案记载，在 23 日 22–23 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首先由朱可夫通报了匈牙利的局势，然后赫鲁晓夫提议向布达佩斯派出苏联军队，布尔加宁立即表示同意。但米高扬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没有纳吉就无法控制局势，而对苏联来说，这是代价最小的办法。如果苏联军队开进去，就会自找麻烦。可以先采取政治手段试试，不行再派军队去。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朱可夫、苏斯洛夫认为，匈牙利局势已经动荡不安，与波兰的情况不同，所以必须出兵并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和宵禁。其他主席团成员随声附和。会议还决定派米高扬、苏斯洛夫以及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去布达佩斯。赫鲁晓夫最后说，可以吸收纳吉参与政治活动，但暂时不担任政府首脑。[⑤]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被邀

---

① Miklós Szücs，*I was Colonel Miklós Szücs in 1956 with the General Staff*, Budapest：Szabad Tér Publishing House，1989，pp.60-62，in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eds.)，*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pp.12-14.

② Y.I. 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 under Fire in Budapest：Memoirs of an Eyewitness”，pp.222-223.

③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itary Occupation”，pp.10-11.

④ 根据布拉格的档案记载，赫鲁晓夫本人在 10 月 24 日向东欧国家领导人介绍说，23 日（傍晚）格罗曾与他通电话，说因匈牙利局势恶化不能去莫斯科参加关于波兰问题的会议，但没有提出军事援助的请求。因此，当过后不久朱可夫报告格罗曾向苏联驻匈使馆武官试探给予援助的可能性时，被拒绝了。见 Mark Kramer，“Hungary and Poland 1956: Khrushchev’s CPSU CC Presideum Meeting on East European Crises, 24 October 1956”，*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p.54；*Путилин*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с.261。

⑤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4-4об，*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с.356-359.

请来参加会议。据拉科西回忆，晚 10 点半左右他被接到主席团会议现场，赫鲁晓夫介绍了布达佩斯的情况后问道，在这种局势下是否需要苏联军队出面干涉。拉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绝对需要，而且必须立即干涉”。于是赫鲁晓夫接通了布达佩斯的电话，在简短交谈中，格罗扼要地介绍说形势很复杂。赫鲁晓夫告诉他，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苏联愿意给予任何的军事援助，但需要匈牙利政府提出正式请求。此外还通知说，米高扬将连夜赶赴布达佩斯并转告苏联的决定，在此之前不要采取任何重要举动。[①]

匈牙利领导人当晚集聚在格罗房间里，神经更为紧张，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格罗对他的广播讲话所引起的剧烈反应感到非常吃惊，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提议请纳吉出来组建新政府，在场的人一致同意。不久，纳吉被请到党中央大厦，并毫无条件地同意出任部长会议主席。22 时 22 分，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立即召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这次紧急召开的只有 1/3 成员参加的中央全会到 24 日凌晨才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由纳吉取代赫格居斯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此外，大家还一致同意格罗的建议，马上给赫鲁晓夫通电话，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刚刚出现的暴乱，并发布戒严令，因为匈牙利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除国家安全部队外，正规军被禁止开枪，除非他们自身遭受攻击，有的士兵甚至投靠到“自由战士”一边。[②]然而，在接到正式邀请之前，苏军已经开始行动了。[③]

10 月 23 日 23 时，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的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了战斗警报，这些部队共计 5 个师 31550 人，拥有 113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615 门火炮和迫击炮，185 门高射炮，380 辆装甲运兵车，3930 辆汽车。同时进入战斗准备的还有 4 个空军师，共计歼击机 159 架，轰炸机 122 架。各部队的任务是：特别军主力进入布达佩斯，占领该市重要设施并恢复那里的秩序，同时以部分兵力在奥匈边境担任掩护；喀尔巴阡军区

---

① *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акош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9，№1，с.48-49，79-80.

②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陈之骝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第 286–298 页；*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349-352；Johanna Granville，“From the Archives of Warsaw and Budapest：A Comparison of the Events of 1956”，pp.535-538。

③ 据赫格居斯回忆，在讨论邀请俄国军队的问题时，会场很乱，纳吉疲惫地坐在沙发里，没有明确表态。决定通过后，格罗和安德罗波夫认为纳吉已经同意了，并千方百计要他在后来起草的邀请信上签字。但纳吉始终拖延没有签字，直到 10 月 26 日，在莫斯科的催逼下，由已经不再担任政府首脑的赫格居斯勉强签了字。赫格居斯·安德拉斯：《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 286–298 页。

步兵军负责占领匈牙利东部各大城市；独立机械化集团军进入匈牙利南部地区。各部队随即展开行动：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在10月23日夜间已越过苏匈边界，特别军于当地时间24日2时至4时进入布达佩斯并占领了该市重要设施，独立机械化集团军主力于4时15分至6时20分进入匈牙利领土。歼击机部队起飞掩护陆军行动，轰炸机部队则在机场待命。[①]

从匈牙利局势骤然恶化到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和占领匈牙利其他大城市，前后不足12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其原因在于，一则中国的方针是“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二则情况不明，也不便发言。匈牙利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友好，而中国使馆对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从不发表意见，尽管郝德青大使本人一直对匈牙利群众运动持否定态度，认为其目的是要摆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从布达佩斯发生骚动一开始，中国大使馆的铁门就紧闭起来，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的联系，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朋友。作为前任拉科西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希望在中国使馆得到庇护，但郝德青通过门卫婉转地请他们去苏联使馆。在危机过程中，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使馆人员都集中到宿舍大院集体办公，只能通过收听和收集街头传单、小报来了解情况。由于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过邮电局发送和接收。10月24日邮电局停业后，一切国际通讯中断，使馆只能偶尔通过匈外交部向国内发送简短的密码电报。[②]至于中国领导人对危机的态度，直到10月30日之前，在所有可以看到的档案文献中，都没有丝毫反映，甚至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论著都很少提到这一点。据最近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载：刘少奇23日晚上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时听到了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从24–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③]但是，讨论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

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录，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在其住所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格罗来电话说，因国内离不开，无法到莫斯科来开会。赫鲁

---

① АПРФ，ф.3，оп.64，д.484，л.85-87，88-89，中译文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79–281页；*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с.368-369。

② János Rádvanyi，“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Hundreds Flowers Campaign”，*The China Quarterly*，No.43，Jul.-Sep. 1970，pp.122-123；郝德青：《外交工作三十年》，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65页；笔者对夏道生的采访。

③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04页。

晓夫答应他可以不来。过了一会儿，朱可夫来电话说，布达佩斯的群众已走上街头，并冲进党政机关大楼。警察拒绝为大楼提供保护，而国防军派去维持秩序的部队被群众缴了械。因此匈牙利国防部长给他打电话，要求苏联派军队给予援助。朱可夫推说这是政治问题，应在两个党中央之间解决。又过了约一个小时，朱可夫第二次来电话。当时赫鲁晓夫表示，出兵问题主席团要讨论，如果是匈牙利政府请求的话，可以考虑。放下电话后，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匈牙利目前的局势你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 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已解决了。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①] 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②] 俄国的档案文献和师哲的回忆也都没有记述刘少奇对匈牙利问题及苏联出兵的反应，很可能，刘少奇因尚未得到北京的指示，根本就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10 月 24–28 日匈牙利的局势变化既曲折又复杂，但无论如何到 28 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③] 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定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按照后来制定的计划，接替的部队应于 10 月 29

---

① 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2，中译文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52–53 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 13–14 页。

② 对来到莫斯科的东德、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赫鲁晓夫甚至连解释也没有，在 10 月 24 日晚上，赫鲁晓夫只是向这些东欧国家代表通报了处理波兰和匈牙利问题的经过。关于这次会议，目前没有发现俄国档案，捷克斯洛伐克档案中的记载全文见 *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pp.53-55。

③ 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4-61об，*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с.439-441. 据赫格居斯回忆，纳吉于 28 日 11 时从苏联使馆回来后，告诉格罗和赫格居斯，苏联人也认为他们应该下台（赫格居斯·安德拉斯：《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 310 页）。28 日 17 点 25 分，纳吉代表新政府发表声明，谴责那种将目前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视为反革命运动的观点，政府宣布各地立即停火，号召所有手持武器的人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允诺政府将与苏联签订一个苏军在最短期限内撤离布达佩斯的协议。18 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发表声明，宣布支持政府声明及新的领导班子成员。*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441-444.

日 20 时至 30 日 6 时进入阵地。[①] 此时中国领导人作何感想仍然不得而知，但《人民日报》在 28 和 29 日两天的报道却让人感到暴风雨即将过去了：匈政府限令叛乱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乱者放下了武器；暴乱分子请求谈判，布达佩斯暂时停火，匈政府和人民正设法恢复和平生活；已经实行暂时停火，正在进行谈判等。[②] 或许正是如此，毛泽东觉得华沙条约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从而决定支持波、匈等国要求苏军完全撤退回国的主张。

没有人会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从天而降。但这次苏联军队要对付的已经不是街头“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军队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了。

四、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二次出兵

如果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决策完全是独自做出的话，那么在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则发挥了微妙影响和引导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苏领导人在后来的政治论战中各执一词：中国方面强调在处理匈牙利事件中，中共“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否则就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苏联方面承认当时中共确曾对苏共中央提出劝告，但劝告的内容与现在所说完全不同。[③]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问题的大致脉络是可以说清楚的。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突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以至美国驻苏大使波伦认为：“纳吉于 28 日晚上发表的关于苏军从布达佩斯撤退的声明似乎无非是一项得到苏联默契的、旨在促使起义者停火的诡计。”[④] 甚至苏联军人后来都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军事行动，使苏军能够对匈牙利进行突然袭击。”[⑤] 但事实并非如此。从 29 日到 31 日，苏联在决策时由于内部意见分歧，一直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而中国的主张也是前后不一。只不过无论进退，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坚定。正是这些看来不

①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itary Occupation”，pp.70-71.

② 见《人民日报》1956 年 10 月 28 日和 29 日。

③ 苏共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60 年 9 月 17–20 日，转引自 *CWIHP Bulletin*，Issue 10，1998，pp.172-173；苏共与中共代表团会谈记录，1960 年 11 月 26 日，АПРФ，ф.3，оп.65，д.610，л.100-120。

④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 年）》，刘裘、金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518 页。

⑤ Y.I.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 under Fire in Budapest：Memoirs of an Eyewitness”，p.277.

容更改的意见，对苏联处理危机的方式和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面对已经狂热的人群，迟到的政府改组和让步措施不仅没有起到安抚作用，反而被一些激进的闹事者所利用，匈牙利的局势更加复杂了。10 月 29 日莫斯科接到谢罗夫的报告：8000 多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被释放，并从看守人员那里夺到了武器；在一些大城市，居民们被煽动起强烈的反共情绪，有些共产党员遭到枪杀；在德布勒森市，党委已经转入地下，并要求得到军队的支持；很多国家安全机构被解散，放下武器的国家安全人员受到围攻和袭击。① 当日晚又收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电报，说“群众已经失控”，“反共分子变得愈来愈无耻”，布达佩斯市两个区党委会以及党的机关报编辑部和印刷厂已被市民占领。② 当苏共中央得到这些消息时，赫鲁晓夫正在与刘少奇商谈如何彻底解决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说，会谈期间刘少奇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要求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东欧进一步放开。会谈到 29 日深夜，苏联终于同意连夜起草一个平等关系宣言，并决定于第二天讨论通过。③ 赫鲁晓夫的回忆与中方材料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多了一个匈牙利问题。据赫鲁晓夫回忆，会谈进行了一个通宵，讨论了匈牙利事件的进程并研究了各种方案。赫鲁晓夫通报了布达佩斯传来的消息，中苏双方在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反复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一会儿主张出兵，一会儿又决定放弃。正在这时毛泽东关于“进一步放开”的意见来了，于是做出决定，在匈牙利放弃使用武力，让事态自然发展，而把处理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匈牙利新政府身上。④

30 日，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上午，莫斯科接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广播电台已经被占领，“叛乱分子发表声明，只有在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才能放下武器”，“匈牙利军队采取观望立场”，“有可能与叛乱分子联合”。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建议，“停止向匈牙利派兵，而继续在苏联领土上集结部队”，“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到那时

---

① АПРФ，ф.3，оп.64，д.484，л.151-161，中译文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308–311、447–449 页。

② АВПРФ，ф.059а，оп.4，п.6，д.5，л.13-14，*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450-451.

③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 15–16 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 604 页。

④ *Хрущё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Вагриус，1997，с.359-360.

当然就得从整体上重新考虑全部问题”。他们最后表示，“尚未形成对局势的最终看法”，但认为“科涅夫同志须立即前来匈牙利”。[①] 是日14时，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做出决议：在匈牙利结束一党制。14时28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这个决议，并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布达佩斯。纳吉还声明：政府将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就苏军从匈牙利领土撤出事宜举行谈判；政府承认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②] 按照28日的计划，苏联军队于16时停止战斗，并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③]

然而，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却把精力集中在讨论刚刚按中共意见起草的平等关系宣言草案上。显然是受此影响，会议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根据讨论记录，30日的会议刚开始研究米高扬和谢罗夫报告的匈牙利局势时，赫鲁晓夫进入会场，通报了昨晚与刘少奇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说，考虑到苏军驻在国的意见，建议今天通过中共提议的宣言草案，而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的问题将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讨论。所有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同意。在随后的讨论中，布尔加宁虽然抱怨“中国同志对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但还是同意了准备给匈牙利的呼吁书和宣言。莫洛托夫建议，立即开始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谈判，至于华沙条约问题，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关于中国提出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莫洛托夫认为，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应在不同的基础上。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与莫洛托夫一致。但谢皮洛夫认为：“目前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他还提出，应“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后准备撤军。朱可夫赞同撤军，并承认处理匈牙利危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有教训的，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驻军问题更加严重，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福尔采娃和萨布罗夫也赞成通过宣言。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首先应发表宣言。随后，主席团讨论了宣言草案。[④] 傍晚时分，苏方将宣言草稿送给刘少奇看，其内容基本上

---

① АПРФ，ф.3，оп.64，д.484，л.122-124，中译文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312–314页。

② *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c.470-471.

③ 见《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日。关于苏联从布达佩斯撤军的具体情况见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itary Occupation”；Y.I.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 under Fire in Budapest：Memoirs of an Eyewitness”，pp.71，244-245。其中说，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宣布苏联政府同意苏军撤出布达佩斯是在17时。

④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6-14，*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c.457-463.

就是刘少奇讲的话，甚至有的词句都一样。晚 8 时宣言定稿，中共代表团再度出席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宣言。[①] 显然，中共关于发表平等宣言的建议，尽管原先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却导致了 30 日对匈牙利采取和平方针的决策。由此可以判断，29–30 日苏联经过一段犹豫，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对此，中共的影响是有决定性作用的。[②]

直到这时，中苏两方都还没有提出在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问题。此后几小时内，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双方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按照赫鲁晓夫在 1957 年 6 月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30 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因为已经与中国达成不再使用武力的协议，现在又突然改变做法，所以在 31 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③] 这就是说，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10 月 30 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看。由于一直不太了解匈牙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讨论了一天。经研究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因此，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后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

①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 16 页。

② 在中苏两党论战时，中共中央指责“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64 页），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研究者坚持这种说法。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③ *Хрущё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c.359-360；赵永穆等译校：《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 年，第 968–971 页。

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他说，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我们已经考虑过，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张退让。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31 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①]

对比俄国档案中关于 30 日和 31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讨论记录，可以对上述说法做出是非评判。根据 30 日会议的第 49 号记录，大约在夜晚（即主席团刚刚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和通过平等关系宣言），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是否可以信任他？"更晚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进入会场。会议记录表明，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而对赫鲁晓夫随后发言的记录是："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是倾向中国的意见："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②] 这说明 30 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了新的立场，而苏共还在犹豫。31 日的会议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出，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接着，赫鲁晓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再次武装干涉的具体办法，如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由明尼赫·费伦茨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国防

---

①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 16–17 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 604–605 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 805–806 页。吴冷西回忆的过程与此大体相同，但有两点差别。按吴的说法：第一，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向苏联提出的意见不是商量的口气，而是严厉的指责；第二，刘少奇紧急约见赫鲁晓夫不是在 30 日夜晚，而是在 31 日。于是，中共代表团离开的时间也不是 31 日，而是 11 月 1 日（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 51–53 页，《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第 14–15 页）。笔者以为，在这里又是吴的记忆错误。

②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6-14，*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457-463.

部长和内务部长（如果纳吉同意可以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与铁托会谈，向中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通报信息等。主席团一致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和提议。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也表示赞同。[①]以后苏联对事情的处理大体就是按照赫鲁晓夫的以上安排进行的。

显然，档案文献的记载证明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 10 月 30 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尽管目前还无法看到在危机期间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事件的全面分析及其变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可以发现，实际上，中国官方的观点从 10 月 27 日第一次刊登匈牙利事件的消息时，就称之为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的游行及其制造的"武装暴乱"，所不同的只是对匈政府行为的评论。在 11 月 2 日之前的报道对纳吉政府比较客观，言辞中还有表示支持的意思，从 11 月 3 日开始变调，不断批评和指责纳吉政府的做法。[②]由于受到过去宣传的影响，人们大多以为苏联出兵是因为纳吉政府背叛性地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求援。实际上，纳吉因阻止苏军向匈牙利逼近未果而宣布中立是在 11 月 1 日晚上，而此时苏联早已决定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了。[③]至少在 11 月 4 日卡达尔新政府在苏联坦克护卫下进入布达佩斯之前，苏联对纳吉的态度主要是认为他软弱，无法控制局面，所以最初还考虑让他参加由莫斯科组织的新政府，而中国的估计则要严重得多。[④]

说到毛泽东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刘少奇转告的米高扬 30 日电报是一个因素，同时也有史料显示，来自中国驻匈使馆的分析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据匈牙利外交官拉德瓦尼和骆亦粟回忆，郝德青大使与卡达尔的私人关系很好，后来他曾告诉卡达尔，他早就看出纳吉的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甚至认为米高扬与纳吉政府的交往以及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都是错误的，并确信只有军事干预

---

①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15-18об，*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479-484.

② 见《人民日报》1956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3 日。

③ АВПРФ，ф.095а，оп.4，п.6，д.5，л.20-22，*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522-523.

④ 实际上，从 25 日晚卡达尔取代格罗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直到其突然失踪，包括请求苏联撤军在内的所有匈牙利政府的决定，都是纳吉与卡达尔共同做出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卡达尔到莫斯科后就改变了态度，而纳吉则始终坚持反对苏联出兵的立场。参见 Huszár Tibor，*Kádár János Politikai Életrajza (1912-1956)*，Budapest：Szabad Tér Kiadó- Kossuth Kiadó，2003，pp.301-302。朱丹丹为笔者翻译了这部很有影响的匈牙利著作的片段，谨在此表示感谢。

才能解救这种状况。11 月 1 日晚纳吉在国会大厦接见郝德青，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纳吉说由于苏联违背华沙条约，他的政府决定退出该条约并宣布匈牙利中立，但他恳请郝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匈牙利新政权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府成员多数也是共产党员。现在苏联又要插手，派军队开进布达佩斯，那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希望中国能够劝阻苏联。郝德青允诺他将把被告知的一切立即报告北京。但实际上郝在此之前已经建议北京，请求给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后来毛泽东本人证实，由于郝德青的建议，使他改变了态度。在 1959 年 5 月 5 日与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见中，毛泽东向明尼赫强调，匈牙利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从他们的经验中受益不小。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对 1956 年的事件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指着坐在陈毅后面的郝德青说，大使的报告和建议对于评价和处理 1956 年匈牙利迅速发展的局势是最有帮助的。他追述道，在那年的 10 月底，中国使馆报告说，反革命势力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不能成功地清算纳吉政府，那么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恢复将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说，由于这个消息和来自几个东欧共产党的消息，他决定立即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①

至于影响莫斯科决定第二次出兵的其他外界因素，很多研究者注意到美国的态度。例如 10 月 27 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称，美国并不把苏联的卫星国当作潜在的军事盟友。第二天，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又把杜勒斯的话重述了一遍。10 月 29 日，美国大使波伦还特意请苏联领导人注意这种说法，甚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 10 月 31 日的电视讲话中又重述了一遍。② 这无异于告诉莫

① János Rádvanyi,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Hundreds Flowers Campaign", pp.123, 126；笔者采访骆亦粟记录。还有研究者认为，甚至卡达尔的出走都与郝德青有关。众所周知，11 月 1 日夜里明尼赫和卡达尔突然神秘地失踪并转道苏联军营去了莫斯科，这是苏联得以建立匈牙利新政府和取得出兵合法性的前提。胡萨尔·蒂伯尔对比了各种材料，对这个问题的论断是：当夜，卡达尔与郝德青进行了谈话，然后就来到明尼赫在内务部的办公室。在那里，明尼赫接到安德罗波夫的电话，要他们去苏联使馆。两人在使馆门口等待时，来了一辆苏联汽车将他们带到了苏联军营，并很快转送到莫斯科 [Huszár Tibor, *Kádár János Politikai Életrajza (1912-1956)*, pp.329-333]。前匈牙利驻华大使叶桐（Otto Juhasz）2004 年 3 月 26 日与笔者交谈时也肯定地说，为明尼赫开车的司机曾告诉他的朋友，明尼赫是在苏联使馆门口被苏联人劫持走的。看起来，卡达尔和明尼赫失踪之谜现在是可以解开了。至于卡达尔与郝德青谈话，还有其他材料提到（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itary Occupation", pp.79-82）。不过，据夏道生告诉笔者，卡达尔只是参加了纳吉与郝的谈话，但并未开口。后来也从未听说郝与卡达尔有私下接触。

②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itary Occupation", pp.31-32；时殷弘：《匈牙利事件和美国的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第 97–111、122 页。

斯科，美国不会出面干涉匈牙利问题。此外，与匈牙利危机同时爆发的苏伊士危机，一方面如赫鲁晓夫所说，使莫斯科不能容忍在中东失去控制后又在东欧丢掉一块阵地，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使莫斯科下定了决心——西方在集中精力处理中东危机时已经无暇顾及东欧的事情了。[①] 当然，莫斯科盟友的立场也并非不重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 10 月 30 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与匈牙利党和政府的立场不同，意大利共产党仍坚持“把暴动看作是反革命事件”，匈牙利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向着反动的方向发展”。[②] 同日苏共中央还接到报告说，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格拉西莫夫在前一天曾非常尖锐地指出，匈牙利政府的许多行动是不正确的和敌视苏联的，关于苏联军队必须撤出匈牙利的声明则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③] 还有学者指出，匈牙利事件对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使克格勃非常担心：这一骚动如果不尽快平息，将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连锁反应。[④] 不过，就影响苏联二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而言，与毛泽东态度的转变相比，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次要的。

11 月 1–2 日，就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穿梭游说的时候，[⑤] 朱可夫迅速制定了再次攻占匈牙利的“旋风”战役计划，并得到主席团会议的批准。[⑥] 米高扬回到莫斯科以后坚决反对马上采取军事行动，他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好是支持现存的政府”，“目前不要与（匈牙利）军队闹翻”，“再等 10–15 天”，“局势一旦稳定下来，事情就会向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反对，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还特别强调：“中国人已经表明了我们不能撤军的意见”。会议决定维持 31 日的决议，对匈牙利实行占领。米高扬

---

① 关于这两个危机之间关系的研究见：Terry Cox，“Reconsidering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pp.1-13；Csaba Béké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Путилин*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с.271-273。

② АПРФ，ф.3，оп.23，д.200，л.60-62，*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476-477.

③ ЦХСД，ф.3，оп.64，д.485，л.2-3.

④ Mark Kramer，“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 and the 1956 Polish and Hungarian Crisis”，pp.370-371；胡舶：《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国的应策与互动》，第 118–120 页。

⑤ 除哥穆尔卡有些勉强外，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支持苏联出兵的决策。详见 Csaba Béké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510。关于赫鲁晓夫与铁托在布里俄尼岛会谈的详情见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 172–182 页；*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235。

⑥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30，*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512-513.

最后提出，“还有 3 天考虑的时间，同志们可以出出主意”，应该继续与纳吉政府保持接触。[①] 但是，一切都晚了。11 月 3 日下午，在布达佩斯的 50 多名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全部到使馆避难。[②] 当晚 24 时，由科涅夫元帅指挥的 12 个师、总兵力达 10 万人的驻匈苏军已经全部完成了战斗准备。莫斯科时间 11 月 4 日晨 6 时，口令“霹雳”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③]

五、结论：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和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说，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步走上了希望变革的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使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苏联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变动，充分说明了苏联未来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暴动提出的退让政策，马林科夫提出的加强农业发展的方针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等等，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已经在各个方面悄悄兴起。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斗争接连不断，使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克里姆林宫新主人感到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然而，保守势力的存在，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政治经验）造成了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的不慎重、不稳妥的方式。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推动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一方面也在共产党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满和动荡。[④]

---

①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19-22，*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494-497.

② 笔者 2004 年 4 月 17 日采访中国前驻匈牙利大使（1985–1989 年）朱安康记录，朱于 1954–1957 年在布达佩斯罗兰大学文学院留学。

③ 对苏联第二次出兵过程的详细描述见：Y.I.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 under Fire in Budapest：Memoirs of an Eyewitness”，pp. 244-266。

④ 详见沈志华：《以苏为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和思考》，纪宗安主编：《暨南史学》第 3 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问题时便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必然要求苏联在东欧国家解放和起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之间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尽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危机，但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承担党内分裂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就造成了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状况，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与其说是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波兰问题，不如说是中国借波兰危机迫使苏联承认以前的错误并发表了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平等宣言。[①] 另一个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实际上，中共不仅在匈牙利危机的最后关头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就是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也有这种担心。[②] 不少国外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出兵匈牙利？[③] 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同莫斯科最

---

① 顺便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能否真正实现平等原则，是另一个问题。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的结论部分。

② 事情过去一年以后，刘少奇在与尤金大使会谈时说：当时的情况是严重的，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波兰同志不能应付这种情况的话，复辟是不可避免的。АВПРФ，ф.0100，оп.50，д.5，п.423，л.48，*Кулик Б.*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2000，с.178.

③ Edward Crankshaw，*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Pekin*，Baltimore：Penguin Books Inc，1963，p.54.

初对波兰局势的判断失误一样，北京后来对匈牙利局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纳吉本人及其政府固然在处理危机时缺乏远见，举措失当，但从来就没有背叛社会主义，至于后来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武装干涉的做法逼出来的。

如果说到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那么可以认为，放弃武装干涉波兰和第一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而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不过，本文更注意的，不是讨论在具体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是否听从了中国的建议或主张，而是提出这样一个结论：恰恰是中国所强调的两个处理危机的原则在莫斯科的决策中得到了最终体现。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正是因为如此，波匈事件后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才会进一步扩大，声望才会显著提高。1957 年 1 月周恩来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之间的穿梭外交，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 1 月 16 日中匈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匈方为缓解紧张局势希望由中国出面提出建议，并促成匈波、匈南双边会谈。[①] 波党中央则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专门考察中国党和群众的关系，学习中共的“群众路线”，甚至波兰军队在其建设中也开始采用中国军队的经验。[②]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 1956 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③] 开始介入东欧事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

发表于《历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① 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and Janos Rainer (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pp.498-499.

② 笔者对骆亦粟的采访；谢皮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 年 1 月 4 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1 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第 2810–2813 页。

③ Edward Crankshaw，*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Pekin*，p.53；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161-162.

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

——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

1956年11月，东欧的十月危机过去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也逐渐平静下来。然而，波匈事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影响却远未消失。1948年苏南冲突爆发时，社会主义阵营曾出现过一次“地震”，其结果是东欧各国被迫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①] 对于铁托的“反叛”，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权力和威望发动一次政治围歼战，通过召开共产党的国际组织会议解决问题。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都已不复存在，莫斯科面对的也不是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而是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民众。如果不肯让步，那么通过武力（布达佩斯）和武力威胁（华沙）应对危机，似乎就成为苏联唯一的选择。中共领导人并非在原则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对哥穆尔卡的支持仅仅是因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会主义，而当毛泽东认定纳吉已经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时，便坚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镇压的主张。[②] 然而，痛定思痛，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共及其领导人不能不思考：导致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在中国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东欧危机会不会在中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共作为执政党该如何应对在中国已经出现的群众闹事现象？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问题出来后，中共的主要精力在于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执政方针和路线。通过召开八大，这些目的已经达到。现在突然又冒出一个波匈事件，而且其影

① 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② 参见沈志华：《1956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

响和震动远远大于前者。那么，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究竟看到和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1]

一、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刘少奇及其率领的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后，11月10日，中共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共296人，分为9组。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了6天。[2]会议由刘少奇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共讲了六个问题：中苏关于波匈事件协商处理的经过；发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巩固的问题；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中共的方针。

刘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广大群众的反苏运动，是社会主义内部的问题”，接着提出这两个事件性质不同：“波兰事件非马克思主义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领导权”。在详细介绍了波匈事件的处理经过后，刘少奇对这次“共产主义内部最严重的事件”分析了其发生的远因和近因。远因之一，波兰和匈牙利都是苏联解放的，在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没有把工人和农民阶级组织起来，也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肃反中犯了错误，整了好人，真正的反革命却没肃清；工农缺乏阶级觉悟；对待民族问题也同样没有阶级观点。远因之二，重工业投资过多，不重视轻工业、农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领导人有特权，人民生活苦，群众不满。远因之三，搞教条主义，照搬苏联不灵，便失去信心；苏联干涉其内部事务，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近因之一，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在党员群众中引起混乱；二十大后控制不住，煽起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近因之二，事件发生初期，苏联处置不当，特别是波兰事件。近因之三，南斯拉夫进行煽动。谈到中共的立场，刘少奇说：我们的方针，第一点是中苏两党团结。第二点是做好我们的

---

① 关于这个问题，凡是研究1956–1957年中国历史的论著几乎都会有所涉及，例如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但是专门的研究和论述却很少见。

② 八届二中全会记录：第一次会议，1956年11月10日。这次会议的报告和发言，除毛泽东1月15日讲话经整理全文发表外，其余都只节选了部分内容刊出，或完全没有发表。本文所引相关文件，除注明者外，均为与会者个人记录。

工作。第三点是给兄弟党提意见要谨慎。[①]

关于如何以波匈事件为前车之鉴，以免重蹈覆辙，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脱离工农劳动群众，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刘少奇指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刘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也有一种条件，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关于防止新贵阶层出现的措施，刘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须对权力有所限制，对人民实行民主：“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讲的大民主、无领导的民主。”其次，“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这包括缩小工资差别，取消特权等。还谈到了取消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在这方面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他列举了美国华盛顿、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的例子，又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最后，刘少奇讲到了经济发展方针的问题，强调说：“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不至于上街游行，不至于闹事，还比较高兴，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他赞同陈云的意见，也主张经济建设速度宁可“慢一点”，“稳当一点”。[②]

刘少奇的倾向是明显的，即在共产党内部找原因，所谈的预防措施，重点也是改进执政党的某些制度、政策、方法。报告把问题的落脚点锁定在经济方针，把波匈事件的教训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联系起来。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周先谈了波匈事件的两个教训：第一点，在中国，对周围兄弟国家也有个别大国主义的做法，对兄弟民族也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周恩来特

① 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关于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正式发表的部分内容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5期；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

② 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第515–518页。

别指出，中国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是有封建特色的，“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第二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周特别强调后者，提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但“如果不关心人民当前的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由此谈到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周恩来说，中共八大提出建设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来，时间可能还要长一点。周恩来委婉地指出：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可以放慢一点，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他以钢产量指标为例：原来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末达到年产 3000 万吨，照现在的速度不可能实现，所以八大确定的指标是 2000–2500 万吨。从减缓工业发展速度的设想出发，周恩来又提出，八大建议的经济指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都还“只是个建议”，也是可以修改的。周认为：“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

为了制定 1957 年的经济计划，周恩来认为应该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正确的评价。周提出了“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而形成的看法：“基本上正确，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周重点讲了错误：“第一次制定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当。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计划是粗线条的，然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断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计划还要修改。计划不那么准确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1] 周恩来还专门讲了 1956 年的冒进问题。他说，从 1955 年年底反右倾保守开始，经济领域就刮起冒进之风，1956 年势头更猛。虽然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一再刹车，效果却不理想。周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明 1956 年的计划“总的说是冒进了一些，就是数目打大了”，“各方面要求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

---

① 以上引言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229–238 页。

关于1957年的计划，周恩来宣布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方针：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适当收缩。周恩来特别提醒说："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下来，不然站不稳，那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或几千万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因此，国务院提出了一个生产控制数字，适当收缩，主要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还要减少国防和行政支出，冻结编制、预算以及国防和地方的结余，注意平衡物资，安排就业，再大力开展一次增产节约运动。①

第三个报告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陈云。11月11日晚上，陈云在全会上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全会专门提出粮食、猪肉、食油这样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是因为当时这些基本生活品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并引起社会不安。首先是粮食紧张。陈云报告说，明年粮食将有50亿斤赤字："明年春天会出乱子，不如现在收缩。"② 副食品里猪肉供应紧张最为突出。陈云提出，增加生猪生产的方针就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同时采取措施解决饲料问题和适当提高收购价格。陈云还集中讲了对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刺激了农民的生产活动，活跃了城乡的物资交流，推动了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机构的改革。尽管开发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解决的办法不是收紧，而是在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开价格和管理。③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报告，分别从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触及到现行体制和政策问题。这种触及当然是很有限度的，但执政以来中共领导人还没有如此重视制度的改进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波匈事件的前车之鉴和国内政治经济的某些紧张现实，不能不使他们担心在中国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在二中全会上，表示出这种忧虑的还不止是刘、周、陈。在分组讨论中，各地方和部门负责人都反映了不少问题——住房短缺、电力不足、钢材和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等，还指出了很多官僚化和特殊化的现象——机关层次和人员应该减少，财务、警卫、用车、看病制度必须改革，干部子女需要教育等。大家普遍对这种局面感到担心，朱德说，"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东欧国家的经验值得重视，搞重工业要注意和轻工业的关系。董必武指出，冒进思想不解决，二五计划还会发生问题。

---

① 以上引言见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周恩来报告，1956年11月10日。

② 八届二中全会记录：陈云报告，1956年11月11日。

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6页。

西北组在讨论时反映，市场供需有矛盾，兰州衣食供应都紧张，如此下去，难免发生波兹南事件。[①]

仔细阅读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记录可以发现，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插话、讲话和总结报告中。

在刘少奇作局势报告时，毛泽东的插话已经表露出某种不同看法。对于波匈事件起因和性质的分析，中共中央内部似乎并没有分歧。但涉及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如何处理中共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时，便显露出不同的倾向。比如，刘少奇谈到越南对土改时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泽东插话："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刘少奇谈到积累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经济建设要稳当一点，右倾比"左"倾好一些。毛泽东插话：那要看什么右。[②]

特别是当周恩来、陈云的报告把汲取东欧国家的教训主要归结为实行稳妥的建设方针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时，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站出来扭转会议的大方向了。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小组长会议，并发表讲话。与周恩来"大冒了一下"的估计不同，毛认为成绩是主流，失误是支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工业和轻工业生产都有所增长"。"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此外，对会上提出的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毛讲话的重心同刘、周、陈的报告也有不同。他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出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至于1957年的经济计划，毛赞同在某些方面做适当压缩，但是仍然重申："虽然如此，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最后，毛泽东提到阶级矛盾问题和对民主的理解，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应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③]这显然是针对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社会动荡而言的。

全会最后一天，11月15日，毛泽东作总结报告，更明确地表达了对中国应该

① 八届二中全会简报和小组发言记录，1956年11月。

② 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

③ 八届二中全会记录：毛泽东在小组长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

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看法。[①] 首先是关于经济方针，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最不满意的地方就在这里。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针对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基本正确，成绩很大，错误不少"的估计，毛说："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特别是对周恩来、刘少奇有关冒进的提法，毛告诫道："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毛泽东因此建议，把国务院预算报告中"稳妥可靠"的讲法改为"充分可靠"。

对粮食、猪肉供应这类民众生活问题，毛泽东也感到问题很大，要求领导干部好好把粮食问题研究一下。不过，与刘、周、陈主张尽量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再次强调："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还指责报纸一年来"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接着，毛泽东又突然提到镇压反革命问题：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为了解放生产力，"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这种莫名其妙转化话题的做法说明，即使谈经济建设，毛也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

针对东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已经丢掉，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就在半个多月前毛泽东还支持波兰人，现在则认为：哥穆尔卡、匈牙利人拿斯大林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因此，波匈事件的教训就是："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毛泽东又用很大篇幅专门谈"大民主"和"小民主"问题。波匈事件发生后，基层干部和知识界人士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苏联、东欧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革命胜利后没有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中国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民主

① 以下毛泽东 11 月 15 日的总结讲话，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313–329 页。

制度来。11 月初，毛泽东委托他的秘书兼英文翻译林克到新华社，找国际部主任王飞、副主任李慎之等人座谈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情况和问题，他们提出了议会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分权削权、选举制度以及大民主和小民主等问题。李慎之还具体提出，应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在小学和中学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建立宪法法院等，他自以为这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①] 结果呢？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从来就不是一种制度，无论“大民主”还是“小民主”，都不过是阶级斗争和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而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斗蒋介石、斗地主阶级、土地改革都是大民主，私营工商业改造也是大民主。不过，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借用”这种讲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毛泽东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赞成大民主，甚至指出，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还要加上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游行。他告诫党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

与刘少奇单纯批评大民主的做法不同，毛泽东在这里把无产阶级大民主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准备加以利用。不过，毛当时并没有考虑采用这种方式解决执政党的官僚化问题，而宁愿采取整风这种“小民主”的方式。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这里所谓“武力”，就是指公开冲突，就是“大民主”。十年之后，毛泽东终于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而在当时，毛泽东以为通过整风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解决执政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

① 《林克日记》（手稿），未刊，第 15 页；李慎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百年潮》1997 年第 5 期，第 47–49 页。

八届二中全会是波匈事件后中共高层第一次全面讨论如何应对东欧风波在中国的反应。从以上的发言可以看出，对于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的分析，党内没有分歧，转到中国问题后，不同的声音便出来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认为主要是解决执政党本身的问题，毛泽东则强调同时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必须防止执政党发生异化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不过刘、周集中谈的是改革制度，而毛更强调加紧思想教育。最大的分歧出现在如何调整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反复提出应减缓发展速度，压缩基建和积累指标，以更大的投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止出现东欧式的社会动荡。毛泽东对此很不以为然，尽管没有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同意见，但他的不满情绪已经溢于言表。

二、再次讨论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

波匈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11 月 11 日，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演说，又在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一阵风浪。与苏共、中共的判断不同，铁托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匈牙利发生的危机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批评匈牙利领导人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干涉是“不必要的”，而第二次出兵虽然可能有必要，但却是“错误的”。铁托反驳了南斯拉夫应对匈牙利闹事和事态扩大承担责任的看法，认为这些观点来自“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由此，铁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问题。在铁托看来，尽管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但其认识却有相当的局限性，实质问题不在斯大林个人，而在斯大林建立的制度：“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不断地坚持地根除的东西，而这也是最难以做到的事。”①

普拉演说不仅批评了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触及到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因此立刻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强烈反响。作为苏共中央喉舌的塔斯社 19 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铁托的演说同南共联盟领导机关此前不久的相关说法“格格不入”，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原则相违背的”；演说“流露出一种干涉其他共产党的事务的倾向”；把共产党分成“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在客观上“只会危害共产主义运动”。苏共还特别批评了铁

① 见《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的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第 15–37 页。

托关于个人崇拜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并将这一观点与西方“反动宣传”相提并论。[①] 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蒙古各国党报群起攻之，意共和法共领导人也相继发文章或做报告，谴责铁托及南共联盟。[②]

中共领导人同样特别关注此事。从 11 月 25 日开始，毛泽东接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着重议论铁托的演说。会议认为，铁托提出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做法。毛泽东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指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而斯大林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毛提出，我们要彻底把他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会议认为，如何对待斯大林和犯错误的同志，是一个分清敌我的根本问题。铁托要把犯错误的人赶下台，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是完全错误的。[③]

铁托演说后，苏联和东欧各党纷纷表态，进行指责。为了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11 月 29 日毛泽东提出，中共也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可以叫“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第二天，毛泽东将会议上讨论的意见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第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其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第四，区别

① 原载 Правда，19 ноября 1956 г.，见《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的评论》，第 39–40 页。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11 日。

③ 关于 1956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一系列会议的情况，由于当时没有正式的会议记录，而列席会议的吴冷西做了详细笔记，这成为有关会议情况的唯一史料。据说，《毛泽东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一书的有关叙述，主要也是源于吴的回忆录。此处及以下关于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过程和内容，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62–82 页。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铁托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斯大林和其他与他观点不同的同志，是错误的；把这些同志称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击，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

在 12 月 2 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文章的设想和要点：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讲清斯大林主义。应明确地讲，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三、讲清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分清两类事件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的反苏反共风潮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问题。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论点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明确提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关于文章题目，毛考虑也可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最后，毛泽东指定他的两个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以及吴冷西起草文章。三人商议分工之后，各写一部分，最后由胡乔木通改全稿。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文章初稿，提出了很多意见。经胡乔木等人修改后，政治局于 19 日和 20 日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该修改稿。会议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一、对匈牙利事件不宜写得太细，不必提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文稿关于群众闹事是可以避免的说法过于简单化，因为“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但群众是无罪的。回避苏联第一次出兵的问题，而明确肯定第二次出兵是正确的。二、苏共二十大有积极意义，纠正斯大林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结果造成右倾危险和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毛泽东强调，文章的主要锋芒应该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三、毛泽东反复强调：“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四、要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的共同道路。

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集中点”。会议认为，在指出错误

的同时，文章应该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斯大林虽然有肃反扩大化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但其中都有他正确的一面：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只是扩大化而已；在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还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兄弟党，援助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特别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制度不是万能的，要靠人来运用"。毛泽东强调："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正确与否，在这里起着重大的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转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是一种诽谤，颠倒了大是大非"。

这次会议"讨论得非常详细"。归纳起来，中共领导层进一步在思想上明确了以下逻辑链条：苏联以往的错误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斯大林个人的认识问题；但是，又必须为斯大林辩护，因为保护斯大林就是保护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缺点；苏共二十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搞非斯大林化，才引起修正主义和右倾思潮泛滥；所以，波匈事件的关键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镇压和肃反不彻底。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考虑敌我矛盾的大背景。

文章按照这个思路又修改了两天，12 月 22 日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讨论后，认为可以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23 和 24 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采取分段议论的方式，再次对文章提出修改意见。主要有：修正主义思潮的要害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资产阶级民主"；强调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继续明确"以苏联为首"，反对国际共运中的"多中心论"；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毛泽东又讲了两点意见。一是从理论层面解释波匈事件的起因，分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明如果处理不好，非对抗性矛盾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二是再次明确指出要为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成就辩护，并强调现在只有中国有资格出来辩护，因为中共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些新的做法"。此外，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决定删去文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一段文字。此时中共对于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主要有两点不同看法，即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大概是想在这篇文章中集中解决前者，而避免引起苏共的争议。

从 12 月 27 日下午到 28 日清早，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文章最后定稿。毛决定，28 日广播，29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时，题目定为《再论无产阶级

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①]

中共最高层如此重视一篇文章，数度开会，反复讨论，八易其稿，除了1945年和1981年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在中共历史上实属罕见。原因在于，这不是一篇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思考的结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共必须应对苏共二十大、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铁托和陶里亚蒂等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西方政界人士和舆论媒体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从理论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全面阐述。

与《一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相比，《再论》反映了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思想变化的轨迹。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共高层在议论中虽然也提到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思考的重心在批判教条主义，强调如何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②]波匈事件及其引发的国际风波，迫使中共的思路转向，把批判的“主要锋芒”对准修正主义，强调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当然，开创了中国革命道路并且正要继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毛泽东，并不是要改变自己另辟蹊径的思路，因为很显然，即便是强调“共同道路”，毛也没有忘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是，波匈事件的震动，铁托“普拉演说”的发表，已经威胁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更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道路本质上同苏俄经验、列宁主义乃至斯大林主义是一致的，而“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苏俄的经验，否定了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也就否定了中共自己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同沿袭苏联经验、移植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相比，否定苏联道路、抛弃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是更大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中共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尽管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从中共高层的讨论中可以确定，所谓修正主义即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此后，“修正主义”的概念在中国被官方沿用二十余年，成为著名的政治批判符号。

《再论》发表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普遍反响，各国共产党机关报刊先后转载。反应最为强烈的是苏联。《再论》发表的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就几乎全文

---

① 关于文章起草和初稿讨论的过程，《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第607–608页）与吴冷西的回忆差距很大。由于看不到原始材料，无从对此作出是非判断。所幸对于讨论的内容，两者的描述大体一致，因此不影响读者对实质问题的理解。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7页。

转载。在1956年的克里姆林宫除夕联欢会上，赫鲁晓夫特意走下主席台与中国大使刘晓拥抱、接吻和干杯，称赞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还请刘晓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坐在一起。其他苏联领导人也纷纷表示赞许。[①] 苏联民众对《再论》的反应更加热烈。转载《再论》当天的《真理报》发行了约2000万份，之后还印发了100万册单行本。文章刚一刊出，苏联国内就有许多读者打电话、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表示对文章“非常满意”。有读者说：“我参加共产党三十年了，据我评判，这样的阐明斯大林功过问题深刻地符合我们内心感觉，符合每人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读者说：“我不能不对中国同志表示感激，他们这样公正地评论我党。”一些读者认为《再论》“给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历史道路以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巨大的意义”。《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Sachiukov）告诉中国记者，“许多宣传员认为这篇文章是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问题的典范”。[②] 苏联大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斯大林和铁托问题的分析，他们完全同意对斯大林问题的分析。有的说，《再论》说出了我们人民心里的话。还有的说，如果斯大林尚在，波、匈事件不可能发生。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看出中共和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有分歧，但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结论。[③]

从中国驻苏记者的报道看，苏联各方高度评价《再论》，主要是因为它充分肯定了苏联的基本经验和斯大林，在对匈牙利事件和南斯拉夫铁托演说的问题上，保持了与苏联基本一致的立场，在一片反苏的国际舆论中，这对苏联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持，正如苏联读者所说“这对于打击目前反苏叫嚣很有作用”，“是中苏巩固友谊的再一次宣言”。[④] 中共在历史上受过斯大林的压制和怀疑，也对苏共的某些做法进行过抵制，而现在既坚持苏联道路和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反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又有分寸地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给人的感觉是立场坚定、态度公允、目光远大。《再论》的发表，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和威信。无怪乎有些苏联人在盛赞的同时，表示出对自己领导人的不满，说赫鲁晓夫应该到中国去学习。甚至有人说，世界上出现了伟大的列宁继承者毛泽东，苏联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转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拜了。[⑤]

---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1月5日，第117页。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1月10日，第193–194页。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1月4日，第51–52页。
④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1月10日，第193–194页；1月4日，第51–52页。
⑤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1月4日，第52页。

尽管中共领导人赢得了如此赞誉，但他们同波兰、匈牙利执政者一样，也需要应对国内的复杂局面和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

三、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

波匈事件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丝毫不亚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除执政党外，整个国家也在积极思考。就中国社会而言，对波匈事件作出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基层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民主党派和私营工商业者，不过，这些人只有言论而无行动。相反，一般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虽然对东欧事变没有表现出兴趣，甚至也不了解，但是对切身利益的关注使得他们中许多人采取了与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非常类似的举动——退社、罢工、罢课、请愿和游行。这确实给执政的中共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基层干部、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他们对波匈事件的反应最为敏感，产生了许多疑问。

人们对波兰、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普遍感到意外——在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也会发生群众暴动和示威游行，并且提出了许多疑问：匈牙利的暴动如果是反动的，为什么有许多群众参加？如果是合理的、正义的，为什么政府又要镇压，苏联军队也出来了？开始报上说是暴乱，后来又说是革命，到底革命对象是谁？纳吉说要保卫革命的果实，是指匈牙利建国以后的果实，还是指这次事件的革命果实？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去波兰是否妥当？匈牙利请求苏军帮助平息叛乱是否合适？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是否做得有些偏激？他们提出要求独立、主权是什么意思，难道苏联妨害了他们的主权和独立？他们提出要求苏军退出波兰、匈牙利，是否会使华沙条约组织陷于瘫痪？如此等等。[①]

在感到意外和疑惑的同时，人们对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也作出了各自的解释。一种看法认为，匈牙利的党已经被资产阶级篡夺了，党已经变质了，建立了十几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被颠覆了，这都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打击得太厉害引起的后果。但更多的人认为事件源于苏联对外政策的错误，如果苏联早一些检讨和改正过去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错误做法，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对于苏军在布达佩斯出兵镇压的行动，有人认为有干涉内政之嫌，给帝国主义以借口，而且容易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1月5日，第127页；11月2日，第61页。

激起匈牙利的民族情绪。清华大学有教授说，波匈事件是革命输出造成的后果。上海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争论很大，有人认为苏联出兵是“走错了一着棋，很被动”，这样做“不符合华沙条约规定，因为华沙条约是对付外来侵略，不是对付内乱的”，“苏联出兵是把小国当作自己的支部一样”。[①]

无论把事件起因归结为苏共二十大还是苏联对外政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被视为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很多人的看法已经深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乃至制度层面。上海一些职工、干部、工商界人士就认为，波、匈共产党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不关心群众生活，结果“官逼民反”。还有人认为是党内不团结，同中国的高饶事件差不多。更有人挖苦说：“天天夸社会主义，夸了半天闹成这样。”[②]

最敏感的议论是，人们从一系列国际事件联想到了中国。尽管不少人认为中国党处理问题稳妥，对于斯大林问题比较慎重，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但还是有许多人看到了国内存在的同样问题。如民主建国会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员胥以恒认为，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证明党和政府工作上有缺点，这应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③]与胥以恒的含蓄相比，北京大学气象系四年级学生胡伯威的批评则尖锐得多，也最具代表性。10月27日，胡伯威致信《人民日报》，指责中国报纸对所发生的国际事件封锁消息，他说：“报纸应该尊重自己的读者，将事物真面目不加修改和粉饰地反映出给读者。”“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了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实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而在中国，“只有报纸来提供这种自由”。他严厉地指责《人民日报》关于波兹南暴动以及波匈事件的报道“粉饰现状”，报喜不报忧，“令人作呕”。信中表达了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大学生对民主和自由的看法：“我坚决相信民主自由的充分发扬，人权和人的尊严得到真正的（不是口头上的）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忠实地遵从这些原则，才能把人民群众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这才对社会主义有极大的好处，人民群众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变得聪明，成熟，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热爱之情，才能以雪亮的眼睛来防止和消灭种种可能发生的弊病，消灭骑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和腐朽倾向。”[④]胡伯威的来信已经超出当时执政党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程度，但还有更为极端的言论。比如，在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日，第3–9页；11月5日，第127–128页；11月6日，第167–168页。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1月6日，第167–168页；11月5日，第129页。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日，第5页。

④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0日，第295–298页。

北京钢铁学院的食堂等几个地方，就出现了粉笔写的标语："反对目前社会制度"，"我们要民主自由"，"中国人民处于悲惨的情况中，青年们行动起来吧"，"支持匈波人民的斗争"。[①]

事实上，知识界和工商界对中共现行政策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已经有所表露，东欧的动荡不过更加强化和刺激了这种情绪。还在1956年初，自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各部门收到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来信就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至5月底，中共中央及所属机关共收到来信5200件，普遍反映对知识分子政策不满。[②]工商界很多人则对中共给资本家代理人和小资本家定为资本家成分的政策有意见。无锡市资本家代理人普遍说，资本家已经固定五厘利息，企业基本上由国家管理，我们在国家领导下工作，靠劳动，拿工薪，再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实在冤枉，纷纷要求献出股份、摘掉帽子。南京很多小资本家半年定息只有5元钱，最少的仅一角七分，却为此带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康永仁反映："摘除这些人的资产阶级帽子，对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③]

如果说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还仅仅是对中共某些具体政策和做法提出意见和建议，那么在波匈事件前后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局面，则主要表现为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这些情形在1956年下半年继续发展，甚至日趋严重。

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报告：数月来，特别是全省大部分农业社转为高级社，并进入秋收和准备年终分配以来，各地不断发生社员闹退社的严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退社农民已达7万余户，已经垮掉的社有102个，正在闹退社的还有12.7万余户。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与辽宁、安徽、浙江等8个省电话联系，秋收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中，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总户数的1%，多者达5%。正在要求退社的农户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宁波专区，想退社的占20%左右。另据新华社内部报道，江苏、山东、贵州等省，退社的情况还要严重，有的地区比例高达10%，甚至很多党员都"要求单干"。辽宁、湖北都是农业丰收省份，也同样发生了社员退社的现象。就连新疆、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农民退社的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1月5日，第129页。
② 云南省档案馆，7-1-804，第1–4页。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9月24日，第621–622页。

情况。[①]

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退社的情况，据辽宁省手工业管理局 9 月 29 日统计，已正式被批准退社的社员有 524 人。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全市 90%多的独立手工业者都参加了合作社，但高潮过后就出现了社员要求退社的迹象。这种情况在目前供不应求的缝纫、制鞋两个行业中最严重。另据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的粗略统计，从 2 月以来，已经批准退社的小业主有 535 人。有一个五金联社，退社的小业主涉及到 50 个基层单位，共计 398 人。[②]

《内部参考》还报道了大量工人罢工请愿的情况。如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所属的单位，从 6 月到 9 月已经发生了 6 起工人罢工请愿的事件，参加者少则数十人，多则 300 人。10 月 29 日福州市发生了 60 多名筑路民工集体向市人民委员会请愿的事情。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到 12 月上旬，上海轻纺工业已有 53 个合营工厂 1834 人因工资和福利问题先后发生罢工、怠工、请愿和其他闹事事件。其中罢工的有 10 个厂，116 人；怠工的有 3 个厂，60 人，请愿的有 2 个厂，29 人，在厂内闹事，包围公方代表，准备罢工、请愿的有 38 个厂，1629 人。[③]

学生罢课、请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 9 月 15 日在成都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两个技术工人学校，400 多名学生开始罢课，要求转学和分配工作。参加者很快增加到 800 多人，并集体到到四川省委和市劳动局请愿，还殴打干涉他们罢课的同学，随意破坏公共财物，甚至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此外，还有 300 多人在成都游行示威，向中级法院请愿、控告。至 10 月底，学校已陷入严重混乱状态。12 月下旬，陕西省少数学校的学生发动了集体签名，强硬要求用罢课或绝食等办法对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示抗议。[④]

波匈事件后，中国社会的动乱局面确有扩大趋势。1957 年 3 月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

①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第 622、643、649、655 页；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10 月 19 日，第 1086–1087 页；10 月 24 日，第 1178–1179 页；10 月 30 日，第 1337–1338 页；11 月 6 日，第 178–179 页；11 月 21 日，第 499–502 页；12 月 29 日，第 671–672 页。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10 月 26 日，第 1258 页；10 月 31 日，第 1547–1549 页。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9 月 24 日，第 615–616 页；11 月 15 日，第 367–368 页；12 月 17 日，第 342–343 页。

④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10 月 30 日，第 1328–1331 页；12 月 26 日，第 561–564 页。

罢课。”[1]尽管从目前看到的史料，还不能说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是直接受到国际风波的影响，但就各地闹事的缘由而论，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危机颇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即都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执政者的强烈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长期受到压抑，一朝爆发，便成烈火之势。

农民和手工业者退社，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管理上的问题比较严重，经济收入不如入社之前。至于工人和学生的罢工、罢课、请愿、游行，基本上也都是因为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问题没有解决好，或者是出于对基层管理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不满和反抗。[2]纵观各方面的材料，所有事端的起因都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琐事”，就每个具体事件看，规模并不大，程度也不算严重，与波兹南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无法相比，所以当时被毛泽东称为“少数人闹事”。但是，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却有着大体相同的起因。综合起来看，问题的存在是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中国社会底层的各种困惑、不满、骚动，与波匈事件的震撼和反响交织在一起，在 1956 年下半年构成了一种虽不过分紧张，但又令人不安的局面。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确实有些担忧了。

四、中共采取的各种让步和安抚措施

各地发生的“闹事”和社会问题，中共在召开八大时已经有所察觉。这一点，在中共八大的各项报告以及大会发言中均可看到。[3]对于前述一些地方党委的报告，中共中央也及时作了批示和转发。如 9 月 29 日、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新疆区党委和福建省委的报告，要求各地参照这两个报告，贯彻中央关于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克服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精神。[4]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实际上也是要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又批转了一些地方报告，并发出一些相关指示或通知。11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各农业合作社在当年秋收分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154 页。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10 月 24 日，第 1178–1179 页；10 月 26 日，第 1258 页；10 月 31 日，第 1547–1549 页。

③ 详见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④ 参见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 622、630 页。

中，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对包工包产不合理、劳动报酬定额不够准确的问题加以清理，在实行超产奖励、减产处罚的制度时，采取多奖少罚的原则；对入社生产资料作价不合理的问题，也要好好清理一番，把社员应该交纳的股份基金计算清楚，欠交的应该尽力补交，多余的应该分期偿还；对农业社干部的报酬，应该根据本社的具体情况和合作社章程规定，对于不合理的部分加以适当的调整。[①]11月30日、12月24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河北省委、广东省委的报告，在批示中告诫各地党委，“急急忙忙”让富裕中农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因此让一部分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对坚持退社的手工业者和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可以允许他们退出，不必勉强把他们留在社内。批示还注意到合作社内困难户的问题，要求从公益金中给予适当补助，必要时可暂时给以土地报酬。[②]时近年末，中共显然希望通过调整年终分配方案和有限度地放开退社的口子，平息各地的退社、分粮、请愿风潮，缓和农村基层的矛盾。

在解决农村问题的同时，中共还着手解决城镇手工业合作社社员退社问题。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手工业合作社社员退社，一方面是自由市场放开后，个体手工业营业“突然兴旺起来”，这对合作社社员是“很大的刺激”，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后，手工业社员收入减少了。文章更多的是批评某些合作社组织，“没有认真执行党和政府关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分配上先积累，后工资福利，把积累额定得过高，致使社员收入下降；在生产上不顾客观条件，把不该集中的也集中起来，甚至高度集中，社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业务不能开展，给群众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在小业主的使用上，没有量才录用，或者给以适当安排；在技术手段上，追求机械化、工厂化，把公积金定得过高，处处向现代化工厂看齐。文章提出要对手工业合作社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在检查中发现积累比例偏高的，要适当降低；不该集中而又已集中起来的，要迅速分开；对小业主和辅助劳动力安排得不合理的，要加以调整；工资不合理的，应当适当调整；管理机构庞大的要精简；对其他不合理的经营管理制度，也要按照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加以改变。”[③]

与退社现象相联系，1956年下半年，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一个新现象：一些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13–421页。

②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640、648页。

③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4日。

私营工商业户开起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个体手工业生产也日趋活跃。9月份上海市手工业个体户为1661户，从业人员5000多人；10月份就发展到2885户，从业人员8100多人。广州市9月份一个月内，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增加1100多人。武汉市合作化后，个体手工业者只剩2000人，到9月份又增加到将近8000人。天津、北京、青岛、郑州、成都和广西等省市，个体户和从业人员也是成倍增加。有人认为，这种情形的产生，是因为八大后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自由市场，直接刺激了个体手工业的发展，使原私营工商业“死灰复燃”。有些干部担心“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这样下去会妨碍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①] 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看法和态度却有所不同。

12月7日，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批评了中共内部“左”的空气：“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只批评不鼓励，不认识资产阶级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对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又批评又鼓励的方针。”毛承认，公私关系上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跟不上，不能怪下级，只能怪上面”，还说：“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营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对抗。民建、工商联、民主党派同我们是合作的，看不到对抗。”说到“地下工厂”时，毛指出：目前中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但自由市场和地下工厂能够发展起来，这说明“社会有需要”。应该“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毛泽东以制衣业为例，主张私营工厂与合作社竞争，并把这叫做“新经济政策”。“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②] 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同工商界人士谈话，肯定“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熟悉了，更加靠拢了”。还说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对与会者提出的许多问题，毛说对他帮助很大，而且承诺政府会和他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③]

12月17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也说：各地地下工厂不少，天津就有200多。

---

①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0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7–17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4–177页。

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上，副委员长黄炎培发言提出私人开厂的问题时，刘少奇又说："有一些资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们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①] 刘少奇的话同毛泽东的谈话如出一辙，甚至比毛更放开。一个细小却涉及实质的差异是，毛认为自由市场的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刘则认为私人工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过在当时，这样的差异还没有影响到中共领导人对私人开厂的看法。《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公开表明对个体户的态度。社论肯定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的商品供应；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城市的就业人数"，"这是对国家有利无害的事情。"[②]

三个月前，中共八大刚刚宣布"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又说"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而且"十年、二十年不没收"，这不能不说是政策性的重大调整。

缓解社会紧张，平息各地"闹事"，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国民生活问题。1955年起，由于过分偏重国家基本建设，日用品生产受到挤压，加上各地争抢高速度，导致物价上涨，商品供应紧张。以大城市上海为例，"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所带来的生产建设高潮，特别是发展农业四十条纲要草案提出以后，全国农业的生产劲头很大，纷纷购置各种生产资料和文教卫生用品，带动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对上海市场提出了大量需要，原来上海认为积压的一些商品，很快定购一空，成为紧张商品。"当时国营商业部门曾想了不少办法开辟货源，满足生产方面的需要。下半年，上海的生活消费品供应也跟着紧张起来。8、9月间，全国范围内在提高工资基础上的工资改革陆续结束，增加工资后的社会购买力，很迅速地集中投入消费品市场。再加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上半年定息也在这一时期发放，更增加了对消费品市场的冲击。呢绒、绒线、针织品、家具等供不应求，部分高级消费品如自行车、无线电、手表、钻戒等，也畅销起来。工业消费品市场十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82、383页。

②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0日。

活跃和紧张。副食品的供应也很紧张，特别是猪肉来源较紧，减少了供应量，居民发生排队抢购的现象。[①]

面对压力，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在安排计划时强调注意人民生活。12月18日，因周恩来出访而任代总理的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提出了“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条件下来搞建设”的观点。他主张“保证必需的民生，有余再搞建设”，还提出要找出一个“民生和建设正确关系的标准”。[②]虽然很难说这是要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方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作为权宜之计，国民生活也已经被国务院摆在了基础的位置。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国民生活。八届二中全会前，各地上报汇总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为243亿元，全会决定调低到135亿元。陈云对这个指标仍有疑虑，于是在1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提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削减。[③]会后，国家经委经过仔细计算，果然认为基本建设投资还可以削减。12月27日、30日，陈云两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主张将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削减到114亿元，还说“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陈云意味深长地指出，这样做“可以避免犯东欧国家的错误”。[④]

为了解决企业职工提出的问题，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工人阶级问题十人小组，由刘少奇主管。12月17日，刘少奇召集十人小组和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负责人开会，座谈劳动调配、工业基础、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等问题。刘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如工厂用人可以考虑采取“劳动合同”的方式；“建立新工业基地，要研究轻重工业的配合问题”；企业管理可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它又是领导，又是监督，主要是监督，是权力和监督机关”，并且不无担忧地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要出乱子”。刘少奇还告诉与会者，中央要“全面讨论”工人问题，要求各种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能解决的应作出决定加以解决，不能解决的要有交代。[⑤]

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自然也是安定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上半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即在内部系统开始了一

①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29–43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4–13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6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三卷，第141、143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81–382页。

次检查工作。从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的反映看，不仅对中共各级统战部门有意见，而且对各单位内部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更多。于是，中共中央在 12 月 26 日作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重点转移到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部队，主要检查这些单位中的中共党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中共承认，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在党派关系上，我们的许多同志不承认或者不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地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或者加以歧视和排斥；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上，很多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想积极工作而不可得；在民族关系上，许多同志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指示要求各地和各单位“一边检查，一边解决检查中发现的问题”。[①]

总的说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地“闹事”和社会实际问题，中共和政府的主旨显然是调整原有政策，采取了某种“让步”的姿态。不过，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波匈事件后的社会思想动态。对此，毛泽东看得比较严重。

五、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1957 年 1 月 18 日至 27 日中共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问题。[②]

毛泽东在 1 月 18 日的讲话似乎非常严厉，他一开头便指出：“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出现在党内，如争名夺利、贪图享受的思想在党内有所发展，一些领导干部对农业合作化优越性有怀疑态度，反映富裕中农思想的单干风有所抬头。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学校里学生闹事的背景，一是学生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富裕中农家庭者占 80%，一是受国际事件影响，“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毛特别指出：“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

①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一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546 页。

②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8–1976）》，第 615 页。以下引言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30–362 页。

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随后，毛泽东便用主要篇幅专门讲国际风潮对党内和国内的影响，从尖刻的言词可以看出，对于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苏共二十大“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接着，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中共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无非是要推翻共产党，结果就暴露出来。“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所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最后提出：“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1月27日的讲话，毛泽东重点谈了“闹事”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闹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地主、资本家闹事是因为他们心怀阶级仇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议论纷纷是因为他们都讲唯心论，大学生闹事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至于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发生的少数人闹事的原因，一方面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是“工作方法不对头”；一方面“是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存在”。由于对立面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对待“闹事”的态度，毛泽东主张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准备和积极的态度，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他以匈牙利为鉴说：“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便成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闹得对的，就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闹得不对的，就驳回去。既“不能步步后退，好恶原则，什么要

求都答应”，也“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不能学段祺瑞”。应该耐心地做大多数闹事者的分化、引导和教育工作，而“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至于那些没有行动，只有言论的人，毛泽东主张后发制人的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总之，毛泽东最后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学问，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看，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已经蕴含了他后来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思想基础。不过，笔者并不认为此时毛泽东已经在设计“引蛇出洞”的“阳谋”。① 显然，当时中共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在这里。从波匈事件后中共召开的几次会议和应对国内局面采取的方针可以看出，作为执政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共面对着三个问题，即中共各级领导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这是引起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普通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由于中共政策方针的偏差可能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不过，工农大众不会反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会随着执政党自身的作风改变和政策调整而得到解决；党内外知识界（包括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奇谈怪论”，这些言论本质上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但由于建国以来阶级斗争搞得比较彻底，所以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有限，不会闹出大乱子。因此，要避免中国社会出现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危机，首先要解决的是前两个问题。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他的著名学说——“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以此作为开展党内整风的指导思想。

发表于《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至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

——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

1956年对于波兰和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都是激烈动荡的年代，也是中波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年，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十月危机，其结果导致国内政治动荡及与苏联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在此政治局势急剧变动的时期，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如何，中共在波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变动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和影响，一直是历史研究者希望了解的，而国际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则十分欠缺。[①] 这次会议专门讨论1956年的波兰事件，当然应该听到来自中国学者的声音。

中国对波兰的立场和政策，主要取决于毛泽东对波兰及其新领导人哥穆尔卡的认识和态度，而毛对波兰的了解，又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即中国驻波使馆的报告和新华社驻波记者在《内部参考》上的报道。最近，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了1955–1960年的档案，内有大量涉及1956年波匈事件的文件，为研究者提供了最新史料。本文即利用这些新的档案文件及新华社当时的内部报道，对笔者此前关于中波关系的研究做一点补充和深化，提交这次国际学术会议讨论。[②]

---

① 就笔者所见，只有美籍华人学者陈兼（Chen Jian）在一次冷战史会议（1997年10月，北京）上提交过一篇论文 Beijing and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9–143页。笔者最近写了两篇“波匈事件与中国”的论文，《1956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已发表（《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另一篇《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将在《史学月刊》发表。

② 据笔者所知，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主要依据中国外交档案来论述一个中外关系史的问题。

一、中波在苏共二十大后开始接近

中共虽在建国之初便与波兰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主要是因为苏联率先给予外交承认而给东欧作了榜样，中国自己并没有做好准备。[①]不过，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中波关系算是最紧密的。例如，1950年建立的中波轮船公司为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立下汗马功劳，波兰船员为此甚至遭到台湾海军的扣留和拘押。[②]还有，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建交接触和谈判，也是波兰从中牵线搭桥的。[③]毛泽东对波兰的最初认识大概来自1954年两国领导人的互访。7月26–28日周恩来对波兰的访问，更加深了两国的亲密关系。根据驻波使馆的报告，波兰领导人对周的来访感到极其兴奋，接待也十分隆重、热情，中国人对此感受颇深。[④]随后9月28日至10月10日波兰政府代表团的访华也受到极为隆重和周到的接待。毛泽东不仅两次接见贝鲁特，而且对波兰党赞赏不止，说中国宪法的制定都是参考了波兰宪法的。[⑤]刘少奇、周恩来及各方面领导人也纷纷向波兰代表团介绍情况。贝鲁特显得非常高兴，并表示对毛泽东十分钦佩。[⑥]

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了风波后，中波关系又进一步密切了。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中共对苏共中央的非斯大林化既表示欢迎，又感到担心，前者是为了批判苏联的大国主义，后者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⑦]在这时，来自华沙的消息令毛泽东感到欣慰。无论波兰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多么复杂多变，[⑧]但毛泽东得到的消息是：当波兰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提出和平过渡等问题发生争论

---

① 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1954年8月周恩来访波时，中国使馆竟无一名波文翻译，给予波兰的外交文件只能译成俄文或英文，再请波外交部译成波文。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7-00385-02，第50页。

② 笔者2006年6月26日、7月11日对王砚的电话采访。王砚是中国最早派到波兰的留学生之一。

③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1-00002-01，第1–3页；111-00002-02，第4–7页；111-00002-03，第14–19、21–25页。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7-00385-02，第32–64页。

⑤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403-01，第1–5页。

⑥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403-06，第30–36页。

⑦ 详见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70页。

⑧ 详见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于欣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3-15页；*Орехов А.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c.221-223。

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于是有人问中国党何时召开代表大会。当告以今年下半年时，他们表示：到那时留心看看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吧！一般人在争论不休时就说：等等听毛泽东的见解吧！”报道还说，在波兰考哲学硕士等学位的人，如不懂得毛泽东的著作，就不可能通过。[①]

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在4月8日转载中共中央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删去了有关苏联历史作用的内容，这令苏联使馆“感到奇怪和不理解”，[②]但这种对苏态度很可能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新华社记者报告：自从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波兰社会和党的会议上“掀起了空前热烈的政治思想的大辩论”。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大辩论，它扩展到波兰全国各界、各地和各阶层中。虽然对斯大林和波苏关系多有批判，但记者的结论是：可以相信，“经过这一场异常热烈的政治辩论后，人民的政治热情当会更高，觉悟将会提高，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将被克服，全党和全体人民将会更加团结一致。在讨论中虽然也曾有些不够妥当的，甚至是恶意的言论，也有过于感情激动的现象。但所有这些副作用都将被积极的、健康的主流所压倒，波兰是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的。”[③]

4月底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在文艺界和学术界实行民主和自由。当时这个方针在中共党内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但却在波兰听到了回声。6月19日余湛代办与波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斯查柯夫斯基会见，谈话甚为投机。余说，周恩来表示非常重视波兰党的意见，并认为“加强两党的联系很重要”。斯介绍了波兰对待报刊上各种言论乃至谬论的方针：“我们不能采取压制的做法，这样做会使人认为我们不容许批评，这将阻碍批评的开展”，需要的只是加强指导和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④]这与毛泽东正在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颇有异曲同工之处。[⑤]这些信息对于毛泽东后来处理波兰十月危机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毛泽东倡导的“百花运动”在中国一时没有结果，波兰的“大民主”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3月5日，第17–19页；6月28日，第719–720页。

② 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5，оп.28，д.396，л.163，*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 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692-695.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6月1日，第585–597页。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1，第18–21页。

⑤ 关于1956年春季波兰的“百花运动”情况，详见Tony Kemp-Welch，“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and Polish Politics：The Spring of 1956”，*Europe-Asia Studies*，Vol.48，No.2，1996，pp.181-206。

和言论自由却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动荡。

二、中国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

6月28日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游行及流血事件，引起了中国的极大关注。后来毛泽东在整风反右谈话中屡次谈到的波兰风波和“大民主”，实际上指的就是波兹南事件，而非十月事件。[①]事件爆发最初两天，中国使馆和新华社同时向国内报告了情况，根据波兰官方的解释，罢工和游行被说成是受到“破坏分子”的挑唆和利用，“是敌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经过了长期准备的行动”。由于及时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事情“已经平息”。[②]按照波兰官方提供的文本，苏联《真理报》6月30日刊载了通讯《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在波兹南的敌意性挑衅》。[③]同一天，中国《人民日报》报道这一事件的标题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暗藏反动分子在波兹南制造严重骚乱，波兰政府和党号召人民警惕敌人阴谋，城市秩序次日已恢复，肇事者将受到法律惩处。第二天，又长篇转载了波兰通讯社的消息。[④]此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看法。

7月2日，驻波使馆报告在波兹南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工人的工资低下，人民对生活水平不满，以及对波兹南事件的不同看法等。[⑤]7月5日，王炳南大使报告了波党中央国际部长和苏联大使对波兹南事件原因的初步分析。他们首先指出了经济问题，即“目前波兰存在经济困难”造成群众不满，“才使挑拨分子有机可乘”。其次在政治上，“有些报刊文章过分夸大人民生活水平低”，“以致激起群众对提高生活的强烈要求”，而“党在群众中影响弱，党员政治质量不高”。事件暴露出“波方领导上政治警惕不高，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未能足够估计，因而未加防范”。但结论仍然是：“事件发展成为骚乱，是挑拨分子所为，工人罢工游行只希望

① 关于波兹南事件的详细经过，参见 *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c.224-225；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40–141页；刘祖熙、刘邦义：《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69–70页。特别是当时的波兰领导人奥哈布的回忆：“Rozmowa z Edwardem Ochabem, Teresa Toranska”，*Oni*，Warszawa，1989，s.211-213。感谢陈世泽（中国驻波兰前大使）为笔者翻译了这篇波兰文的采访录。

②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1，第22、23–25页；109-00761-02，第14、15、16–18页。

③ *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c.224-225.

④ 《人民日报》1956年6月30日、7月1日。

⑤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1，第25–28页。

提高工资，无反苏反政府性质。”[1]

7月7日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对王炳南谈到了波兹南事件的两个背景：一是“多年来波兰集中精力发展工业，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问题注意不够，六年计划期间由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部分资金又临时抽调用于国防工业，答应给人民的未能做到”，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二是苏共二十大后，对国内开展的广泛讨论缺乏政治上的“强有力的领导”，公安工作由于受到批评而“失去警惕性”。言谈中对毛泽东提出的“十条方针”（即十大关系）极为赞赏，认为“中国党是第一个就苏共代表大会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结论的党”。[2]

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虽然指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必须不断地加强自己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的工作，经常了解群众的困难，并且尽一切可能及时地帮助解决，某些人借口生产，不管人民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坚决纠正，以便及时地发现和克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以免被敌人利用，但标题还是“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国内反革命活动”。[3] 这说明，直到此时，中国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同苏联和波兰保持一致。不过，中国人的关注点很快就转移了。

7月25日驻波使馆编写了报告“对波兹南武装挑衅事件的看法”，7月28日《内部参考》刊登了驻华沙记者谢文清发出的长篇通讯，分析“波兹南反革命暴乱发生的原因”。这两个文件的意见基本一致，尽管继续认为事件的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挑唆，但都不约而同地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波兰党和政府所存在的“严重的困难和缺点”方面。首先是人民对政府的不满，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工资低下，个人所得税累进率较高，住房严重短缺，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进一步讨论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其缺陷在于：第一，投资过于偏重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第二，轻工业和农业过于落后导致生活用品奇缺；第三，传统的手工业因课税太重而萎靡不振；第四，企业管理制度问题重重，集中表现为权力过于集中，企业没有活力，奖金制度不合理等。政治方面的问题在于：第一，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严重，导致党和政府威信降低；第二，党员质量不高，思想教育不够，没有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第三，舆论宣传工作没有抓紧，党内外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第四，放松了军队和公安工作。最后，使馆人员和新华社记者的

①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1-04，第20–21页。
②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18-04，第16–17页。
③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2日。

一致看法是，波兰领导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克服这些困难和缺点，形势正在好转。[①]

恰在此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了七中全会。7月28日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和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和关于“1956–1960年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的决议。有趣的是，全会对波兹南事件的分析和评价与中国人的看法不谋而合。决议首先肯定：“煽动者、挑拨分子和坏分子在波兹南成功地利用了斯大林工厂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们由于迟迟不解决他们的切身疾苦和正确要求而产生的特别不满情绪，挑起了罢工和街头示威的游行。”接着，便着重“深刻分析这一事件产生的根源及其基础”，即党内和国内政治生活和经济政策存在的种种困难和缺点。最后，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各项方针和措施。[②]《人民日报》连续数日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但却没有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即会上出现了改革力量（普瓦夫派）和保守势力（纳托派）的激烈争论，并最终导致哥穆尔卡重返政坛。到8月初，不仅哥穆尔卡的党籍得到恢复，而且《人民论坛》报还公开宣布取消过去对他的指责。[③]对于波兰社会舆论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国内危机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寄托在哥穆尔卡身上了。然而，对于这一点，无论中国使馆还是新华社记者，都没有注意到。个中原因大概是没有得到相关的情报，而七中全会前奥哈布则与赫鲁晓夫谈起过哥穆尔卡被释放的情况，赫鲁晓夫当时还表示要接哥穆尔卡去苏联养病。[④]显然，这时波兰与苏联的关系要比对中国亲近些。但是，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迫使波兰人越来越接近中国。

三、中共八大期间中波领导人的接触

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对东欧各党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自身的感受和政策的选择都比较相近，波兰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亲密。波党第一书记奥哈布率团参加中共八大前，于9月10日宴请王炳南大使。席间奥哈布谈到，我

①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1-01，第1–13页；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7月28日，第591–604页。

② 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编印：《人民波兰文献资料选辑》，1985年（未刊），第153–182页。

③ 关于哥穆尔卡复出的情况，详见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第40–41页；*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c.226；“Rozmowa z Edwardem Ochabem，Teresa Toranska”，s.214-217。

④ “Rozmowa z Edwardem Ochabem，Teresa Toranska”，s.217.

们这次去首先是表明与中国党的团结一致，其次是传达我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所怀的敬意，第三是想吸取一些经验。从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党对很多问题做出了大胆的决议，虽然这是针对中国情况的，但对我们也会有用，我们也相信这些决议是正确的。奥哈布还表示，由于国内的复杂情况，他可能会提前回国。[①]这里所说的国内情况复杂，主要是指七中全会后，波党内部的分化日益严重，改革派已经考虑请哥穆尔卡出面主持工作。关于这个问题，奥哈布在9月11日途径莫斯科时没有告诉苏联人，却在八大期间通知了中共领导人。[②]

中国人对哥穆尔卡的第一次了解，大概还是来自苏联提供的情况。在6月与王炳南的谈话中，苏联驻波大使波诺马连科说，波兰的青年人“全都是些民族主义者”，他们在散布对苏的敌对情绪。王问到对刚从监狱中放出不久的哥穆尔卡的看法，苏联大使说，研究了许多哥穆尔卡的材料后，他认为这个人虽有“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但历史还是清白的。考虑到“哥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者”，波诺马连科认为，他“可以留在党内，但不能担负领导工作”。[③]或许正是因为知道莫斯科对哥穆尔卡的态度，波兰人认为首先应该取得中共领导人的同情和支持。

在中共八大期间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奥哈布表示，波兰党希望自己来解决波兰的问题，并谈到有意吸收哥穆尔卡加入领导层，以便加强和巩固党的地位。他感觉到，“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情况极富同情心”，也深切感到他们对中波两党的关系“充满信任感”。不过，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奥哈布没有提到波苏关系问题，甚至有意掩盖这种不平等关系已经出现的危机苗头。直到离开北京之前，大概对于苏联大使寸步不离的监视极为反感，奥哈布暗示中国人，他还有话要讲。于是，飞机在起飞前出现了“故障”，奥哈布得以同朱德单独见面。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奥哈布告诉中国领导人，在波兰出现了反苏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波兰人要破坏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只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总体框架内能够自主解决问题。同时，奥哈布又谈到哥穆尔卡复出的问题，并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同哥穆尔卡是一致的”。奥哈布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已经感到波兰可能会受到苏联的干涉，而能够对他们提供帮助的，不是诺沃提尼、乌布利希或其他东欧国家，而是“独立自

---

①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1，第58–61页。

② 9月11日与苏联领导人会谈时，奥哈布提出了解决双边经济关系的问题和召回在波苏联顾问、专家的问题，对哥穆尔卡复出一事则只字未提。РГАНИ，ф.3，оп.12，д.1005，л.3-40，*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с.168-171，962-964.

③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1，第15、17–18页。

主”的中国。[1]另一位波兰代表团成员米契斯瓦夫·马热茨则回忆了毛泽东关于波兹南事件对中国处理上海工人抗议事件发生影响的谈话，毛泽东强调指出，他向波兰人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波兹南就是一种警示：“我们起初曾将上海事件视作反革命事件，但在接到我们驻华沙代表的电话后就改变了看法。我们不得不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召来出席政治局会议，并做出了考虑工人要求的决定。……第一书记带着新的决定返回上海，落实了工人们的要求与愿望，上海的秩序一夜之间便恢复正常。每当我想起上海就会联想到波兹南，想到安定，想到我们大家都必须与工人阶级保持联系。”[2]这个说法就更让波兰人感到亲切了。

四、中国在阻止苏联武装干涉问题上的作用

波兰日益紧张的局势迫使奥哈布缩短了在中国的行程，匆忙赶回华沙后他不得不立即请哥穆尔卡出来主持大局。赫鲁晓夫得到情报说，波兰领导层将发生大规模人事变动，其结果对苏联不利。于是决定，一方面亲自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赶往华沙，试图干预波党八中全会的领导层选举，一方面紧急调动军队向华沙逼进，以施加压力。经过 10 月 19–20 日夜以继日的会谈和争辩，赫鲁晓夫最后决定放弃对波兰的干预。与当时波兰的传说和人们的感受不同，笔者的研究认为，苏联领导人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他们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3]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波兰出现的危机持何立场，这个立场是何时告诉苏联人的，中国的意见对苏联决定放弃武装干涉波兰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起了作用？

奥哈布后来回忆说：波兰曾经流传一种说法：“在波兰同苏联关系紧张时期，周恩来曾打电话给莫斯科，提醒苏联同志说，他们不同意干涉波兰。”他本人深信“如果不是中国及时提出了自己的警告”，苏联人“肯定会对波兰进行干涉”。[4]按

---

① “Rozmowa z Edwardem Ochabem，Teresa Toranska”，s.219-221.

② Andrzej 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Dzis*, nr. 10/1996, c.128-129（中国和波兰十月事件）。所谓上海事件，大概是指 8 月发生的公私合营企业职工对政府不满而发生的罢工、请愿事件。详见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8 月 9 日，第 146–148 页。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尚未公布毛泽东与波兰代表团在八大期间的谈话记录。

③ 详见沈志华：《1956 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④ “Rozmowa z Edwardem Ochabem，Teresa Toranska”，s.217，221. 关于周恩来电话的传闻，中国使馆后来也有报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 36 页。

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据说波党中央有人透露："要不是中国党支持的话，我们这次八中全会就决不会这样顺利。"还有人说："毛泽东不同意苏联使用军队来对付波兰，赫鲁晓夫可以不听波兰人的意见，但他不能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①]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②] 于是，波兰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③]

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说法。吴冷西的回忆录说：10月20日上午他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毛说接到苏共中央来电，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波兰问题，征求中共的意见。吴汇报了当时收到的外国通讯社消息——苏军正在调动，波兰也在积极动员。后又得到消息，苏共代表团已到华沙，正在谈判。毛认为情况紧急，于晚7时召见苏联大使尤金，对苏联的做法大加斥责，并要求他立刻向赫鲁晓夫转达中共的立场：坚决反对和谴责苏联武装干涉波兰。[④] 这个回忆在时间和内容上都与事实不符。

下面根据已获史料，按照事态发展的进程对问题进行分析。根据俄国的档案，已知苏联给中共的电报和通知没有透露任何有关武装干涉的信息。[⑤] 刘少奇后来回顾事情的经过说：19日尤金只是向他通报了波兰的情况，中共没有发表什么意见。[⑥] 所以，可以肯定，毛泽东事先并不知道苏联打算使用军队的情况，自然也不可能进行阻止。

19日危机发生以后，驻波使馆当天发回电报称：昨晚苏共中央来电话说，拟派代表团参加八中全会，波党表示"希望不来"，但今晨6时赫鲁晓夫等人抵达华沙；传说波党已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继续民主化，一派反对民主化，"斗争激烈"；群众集会要求自由，与苏建立平等关系，恢复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等；"今天还谣传驻德苏军将开进波兰，西里西亚地区苏境苏军亦向波边境集中，此消息虽不可靠，但亦说明一些问题。"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谣传"是否可靠，而在于中国外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1月30日，第755–756页。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7日，第1283–1284页。关于这一传闻，中国使馆后来也有报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36页。

③ Andrzej 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c.123-124.

④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0–13页；《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5–40页。

⑤ 详见沈志华：《1956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⑥ 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记录稿），1956年11月10日。关于刘的这个讲话，正式发表的部分内容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5期。

交部收到这个电报已经是20日17时20分，而译出电文则是在21日清晨。[①]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19日来自华沙的新华社的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简况的电讯。这时，赫鲁晓夫等人早已回到莫斯科了。因此可以确定，赫鲁晓夫在19日夜间决定停止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华沙的情况，也不可能对此发表意见。

19日晚上在华沙街头的确出现了"我们有毛泽东的支持"的大标语，[②]当时波兰人也确实"众口一词"地说，"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③]但这些都属社会传言，并无根据，充其量是表达了波兰人的内心希望。至于美国报纸所说毛泽东的贺电，只是《人民日报》（10月24日）报道了哥穆尔卡10月21日当选波党第一书记的消息而已。因此，上述说法也不能证明赫鲁晓夫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10月20日上午和晚上，王炳南两次拜访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了解到的情况是：波党中央一些人企图摆脱苏联，破坏波苏友好；以哥穆尔卡为首的集团提出的政治局名单，其目的首先是向全世界公布波兰已脱离苏联；目前波兰的情况很复杂、很危险，报纸、电台全都在反苏分子和犹太人的手里；谣传的军队调动一事，只不过是几个士兵在各处散步而已；赫鲁晓夫已经来华沙了解情况，正在想办法如何对付哥穆尔卡。[④]虽然这两个谈话记录当时没有立即发往国内，但仅20日新华社和驻波使馆就先后发出了5–6封电报，详细报告了波兰发生的情况。

记者谢文清报告：西伦凯维兹、奥哈布等人在中央占绝大多数，他们主张民主化，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逐渐提高人民生活，并得到全国工人、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拥护；K. K. 罗科索夫斯基、诺瓦克、马茹尔等人主张排挤犹太人，停止民主化而恢复高度的集中，这一派人数极少，但掌握着军队。八中全会前夕提出的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没有罗科索夫斯基一派，而增加了哥穆尔卡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19日晨赫鲁晓夫等突然来到华沙，要求参加波党八中全会，遭到拒绝。当晚工人、学生集会，声称"军队已集结在华沙周围"，要求全市"动员起来"，"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反动派制造骚乱和军队借口进行干涉"。华沙群众强烈要求哥穆尔卡参加党的领导，主张主权独立、波苏友好和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对苏

---

①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15–17页。

② 这是驻波使馆参赞余湛到莫斯科向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的情况。笔者2004年4月17日对骆亦粟访谈记录。骆亦粟当时在驻波使馆工作，并随余湛到莫斯科。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10月18日，第3–13页。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2，第76–78页。

共代表团此次到华沙表示非常不满，认为是干涉内政。据传哥穆尔卡主张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和经济政策。20日群众集会人数更多，情绪更加激昂，但口号仍是“忠于社会主义阵营”，“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反对一切外来压力”。人们高呼哥穆尔卡的名字，并“热烈鼓掌”。[①]

王炳南的看法与新华社不同，他报告了与苏、德大使交谈后的个人看法：八中全会出现了“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以哥穆尔卡、西伦凯维茨为首的党内右派分子纠合犹太人以及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者正在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一个反苏运动”。哥穆尔卡集团通过他们掌握的报刊和广播，散布“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等谣言，到处组织学生和工人集会请愿，提出民主化、要平等、要独立的口号，实际上进行反苏活动，还造谣说“毛主席支持波兰对苏独立行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出现向右转的倾向。据苏大使表示，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做好准备，以防事变。有人挑动群众反对军队在华沙周围集结，并组织特别委员会追查此次调动军队的责任。赫鲁晓夫来华沙，飞机在上空盘旋2个多小时才获准着陆，谈判亦未有结果。工人和学生随时会游行，发生流血事件的可能是存在的。苏联希望中国党“能使用影响防止此种错误发展”，而苏联直接应付有困难，“软则助长右派气焰，硬则有可能逼炸”。最后，王炳南请示使馆应如何表态。[②]上述电报外交部均是21日才收到的，而且在这些电报中也没有证实有关苏联出兵干涉的情况。

毛泽东所知道的苏联使用武力干涉波兰的情况，应该来自外电。不过，吴冷西当时向毛泽东报告的“外国通讯社消息”，并非“苏军正在调动”，而是已经过去的情况。经查，实际上吴当时看到的新华社转发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20日电讯的内容是：昨天晚上赫鲁晓夫命令军队包围华沙，扬言要用武力“镇压”波兰方面的“任何叛变”；“苏联军队和八百辆坦克正在向波兰首都开动”，“波兰各地都有关于苏联军队调动的消息”，“波兰的局势十分混乱和紧张”；奥哈布以退出苏波会议和“断绝一切关系”相威胁，终于迫使赫鲁晓夫停止了把苏军调到波兰的行动。[③]

这就是说，10月20日毛泽东并没有从正式渠道得到苏联准备或已经使用武力干涉波兰的情报，而吴冷西报告的国外传闻都是过去的事情，并且说明苏军已经停止调动。毛泽东不大可能根据这些消息就训斥苏联大使，并要求苏联停止军事行

---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2日，第1075–1076、1079–1080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18–20页。

②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21–28页。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2日，第1091–1097页。

动。况且，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也不是如吴回忆的发生在 20 日晚，而是在 21 日。退一步讲，即使 20 日晚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也没有对赫鲁晓夫的决定起作用——那时苏共代表团已经回到莫斯科了。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 20 日会议的工作记录，苏共领导人做出的明确"结论"是："结束波兰现在的局面"，如果罗科索夫斯基能留在政治局，那么苏联可以接受和忍耐。同时，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波诺马连科大使"在评价奥哈布和哥穆尔卡时犯下一个愚蠢的错误"。①

10 月 21 日《人民日报》报道了 19 日苏波两党会谈的情况，说"会谈是在党的、友好的坦率气氛中进行的"。同日，新华社发回路透社 21 日电讯，说"苏军正在撤离华沙"。② 与此同时，中苏两党领导人都在开会研究波兰局势。

按照 10 月 21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工作记录，是否对波兰进行干涉的问题，苏共领导人决定在 23 日"召集兄弟党领导人"进行协商，"因为欧洲各党表示极为不安，因为波兰事件是以尖锐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形式出现的。"在随后的讨论中，赫鲁晓夫表态：鉴于目前的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并表现出耐性。此议得到"大家赞同"，尽管莫洛托夫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波党的政策"已经改变"。③ 当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德国各党的电报，请他们派代表来莫斯科商议波兰问题；委托米高扬等人审阅关于撤回苏联顾问致波党中央的信并报苏共中央最后通过；派专机接中共代表团。④ 这表明，莫斯科已经有了"放弃武力干涉"的初步意见，但还要与各党商量，特别是倾听中共的意见。显然，此时赫鲁晓夫还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 21 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 日夜毛泽东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

---

①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41–42 页。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10 月 22 日，第 1104 页。

③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43–44 页。

④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45–46 页。

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①] 就是说，直到 22 日莫斯科才了解到中共和毛泽东对波兰问题的态度，这对于苏共领导人最后确定处理波兰问题的方针以及日后与波兰的关系无疑将发生影响。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出面支持波兰党，反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从本质上讲，表达了他心中存在已久的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不满。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在党内以及同苏联大使的谈话中，多次指责和抱怨斯大林过去阻碍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错误干涉的种种做法。[②] 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也不便公开或直接向苏联党提出意见，发泄心中的怨气。这时波兰党站出来抵制莫斯科，无疑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直接挑战苏联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机会。

五、中共帮助协调苏联与波兰的关系

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的方针已经确定，但驻波使馆仍然不断传来完全相反的声音。21 日下午王炳南来电（22 日凌晨收到）说，“据我们观察，苏联对这次波兰反苏各种因素被右派利用事前估计不足，临时又显出仓促应付，并表现了相当激动。”“在这一紧急关头，请中央考虑是否有必要与苏共中央进行磋商。”[③] 波党中央会议通过了以哥穆尔卡为首的领导名单后，21 日夜王炳南再电：波党右派已“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这是右派秘密有组织地阴谋活动的结果”。“根据目前情况估计，波兰显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王炳南要求明确指示对波方针。[④]22 日王炳南又急报：苏联大使说，“现有证据证明波兹南事件是右派一手搞成的”；右派“现已开始在军队中进行煽动活动”；明晚苏联大使拟邀各兄弟国家大使吃饭，以示团结；“我们必须主动作工作，不能把波兰让给美国人”；苏联大使对事变的看法同中国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 44–45 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李海文整理，《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第 12 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602–603 页。

② 有关资料详见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③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 29–30 页。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 31–32 页。

使馆完全一致，现均采取对外谨慎态度，同波方少作接触。[①]不仅如此，王炳南还表示不同意新华社记者的看法。22 日谢文清在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是，今天不存在波兰脱离社会主义而投向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不存在资本主义在波兰复辟的问题。""波兰很多人提出口号是民主化，各国人民都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波兰也有它自己的道路。同苏联友好合作，但要自己独立解决自己的事情。很多人对苏共代表团突然到达华沙和与此同时在华沙市外调集军队之事表示极大的愤怒，认为他们是干涉波兰内政，调集军队是粗暴的武力威胁。""我个人认为，苏共代表团的到达，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王炳南在发出该电时加了按语："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②]

毛泽东未必不同意王炳南的基本分析，但此时他的关注点不在波兰的内部问题，而在于苏联对兄弟党的态度以及如何确定中共处理这次危机的方针。中共中央在 22–23 日看到这些电报时，已经确定了对波兰危机的看法和处理问题的方针。于是，对使馆与新华社之间的看法分歧做出了评判。23 日外交部给王炳南回电称："对波兰情况望客观地收集材料，及时报告国内。对情况的分析亦需客观、全面，不要人云亦云。在同波兰及其他兄弟国家使节接触中，应多听少说，不要轻易表示态度，更不宜对波兰政治情势轻下结论。中波关系中各项事务应按原计划进行。"[③]25 日外交部又致电王炳南："使馆关于波兰政局的各项电报均收悉。我们认为，使馆注意对目前波兰政局的报导是好的，但应该说使馆对波兰局势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使馆同谢文清同志的意见分歧中，谢的意见是正确的。请将此意告诉谢，并请你们对波兰局势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新华社总社同时致电谢文清："你十月二十二日发来的对波兰局势的看法的内部材料，甚好。你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得到了中央同志的好评。"[④]

大约与此同时，中国的看法和方针也告知了波兰。据马热茨回忆，10 月 22 或 23 日，刘少奇、邓小平和朱德在北京机场临时接见了他，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说："我们请您向波兰党领导转达我们的敬意及对你们进行变革的钦佩之意。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作的自主努力，并祝愿你们在国

①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1-06，第 23–24 页。

②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 33–34 页。

③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2，第 8 页。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2，第 10、9 页。27 日王炳南回电，表示接受对他的批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2，第 11 页。

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刘接着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苏共通报对波兰进行变革的态度，又补充说，波兰完全可以指望中共的支持，还答应向波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贷款。①

23日，即波党中央全会结束后两天，赫鲁晓夫在同哥穆尔卡通电话时强调，他不认为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和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基础上。②当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③至此，苏联对波兰的方针已经确定，并且与中共取得一致，但波苏关系的紧张状态并未消除，赫鲁晓夫希望中共代表团能够从中帮助协调。

关于危机发生后中共如何做波兰党的工作，目前看到的材料很少，只有吴冷西回忆录中讲的情况：中国代表团曾与哥穆尔卡、奥哈布等人会谈，刘少奇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同时也劝他们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哥穆尔卡一再感谢中国的支持，并说波兰党和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并表示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尽管这条回忆史料已经被一些研究者使用，但其真实性颇令人怀疑。据笔者考察，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哥穆尔卡和波兰代表团根本就没有到莫斯科来，刘少奇与哥穆尔卡的谈话以及中波代表团会谈从何说起？④

从档案文献看，中共对于波兰党确实也有担忧的地方，也需要去做工作。关键问题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⑤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

---

① Andrzej Werblan, “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 c.129-130.

②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22，оп.40，1956г，п.336，д.10，л.108，*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c.234.

③ 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记录稿），1956年11月10日。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03页。

④ 详见沈志华：《1956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⑤ 9月10日谈话时王炳南对奥哈布说，罗科索夫斯基过去两次来到中国，“在中国人民中威信很高”，并表示欢迎他在任何时候访华。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1，第58–61页。

鲁晓夫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①] 由于担心刘少奇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②] 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或许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与波兰党沟通，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 月 27 日凌晨 2 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进行了 3 个小时。毛泽东详细了解了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 24 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感到担忧。毛泽东认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③] 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 28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④]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 月 29 日，赫鲁晓夫等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他还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

---

①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54 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 15 页；骆亦粟：《1956 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外交学院学报》1997 年第 3 期，第 42–43 页。

② 据骆对笔者回忆，这个情况是后来刘少奇自己说的。刘少奇的回顾也证实了这一情况。见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记录稿），1956 年 11 月 10 日。

③ Andrzej 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c.124-126.

④ Leszek 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CWIHP Working Paper*, №17，1997)，pp.81-82.

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刘少奇说，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的意见说，“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时刘少奇建议苏方发表一个宣言，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经过商谈，赫鲁晓夫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于是，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①]30日晚8时完成了宣言草案。[②]随后，赫鲁晓夫返回主席团会议。讨论中，赫鲁晓夫表示可以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案。[③]

六、中波之间对匈牙利事件的分歧意见

10月23日刘少奇到达莫斯科时，布达佩斯的游行已经开始。当晚赫鲁晓夫与刘少奇谈话时，得知匈牙利发生了暴乱，便匆匆离开。赫鲁晓夫走后，刘与毛泽东通了电话，因不了解情况，决定先不表态。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的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刘少奇遵照毛的指示，没有表态。[④]

当时中国领导人确实没有得到有关情报。10月23日晚8时和9时，中国驻匈使馆发回两个电报，未加评论地讲述了布达佩斯游行的情况和匈党第一书记格罗的广播演说。此后便再无音信了。24日下午4时外交部连续发出3封电报，要求

---

①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5–16页；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43页。

② 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记录稿），1956年11月10日。

③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317页；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3，оп.12，д.1006，л.6-14，*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с.457-463。公开发表的宣言文本见 Правда，31 октября 1956 г.，Известия，31 октября 1956 г.，11月1日《人民日报》。

④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2–53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3–14页；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记录稿），1956年11月10日。

驻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使馆迅速报告匈政治局势（特别是纳吉·伊姆雷的问题），“报告时切忌主观片面和人云亦云”，并要求驻匈使馆立即派一名了解情况的参赞和翻译赶往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①]但由于中国驻匈使馆通讯中断，外交部一直没有收到回复。那时中国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国际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市内邮电局进行。由于出现动乱，从 23 日午夜起一切国际电讯、电话全部切断，使馆的报告发不出去，国内的指示也接收不到，直到 25 日下午才恢复电讯（电话仍不通）。所以，24 日上午使馆报告游行当夜已经“演变成反革命暴动”以及实行戒严和苏军出动的电报，外交部直到北京时间 26 日凌晨才收到。[②]

不过，此后驻匈使馆每日发回数封电报，始终称匈牙利发生的是“反革命暴动”。[③]《人民日报》从 27 日开始刊登的消息和报道，与使馆的说法完全一致。对于纳吉政府，中国使馆 10 月 28 日报告：“暴乱以来，从匈广播的各种通令号召措施等看，政治上可疑之处颇多，值得注意。”31 日的电报做出结论说：“从 23 日反革命政变到现在止，反革命基本上已掌握了政权。”接着，《人民日报》的报道也开始指责和批评纳吉政府。[④]11 月 1 日纳吉紧急召见中国大使郝德青，表白自己是共产党员，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恳求中共在这危急关头出面帮助解决苏联撤军的问题。[⑤]纳吉哪里知道，在他与郝德青谈话前几个小时，正是中共领导人与苏共中央商定，准备对匈牙利进行武力镇压。[⑥]

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的态度与中国全然不同，华沙一直把布达佩斯看作患难兄弟。对此，中国领导人是了解的。

10 月 23 日中国驻匈使馆报告，波党八中全会在匈牙利引起很大反响，《自由人民报》今天全文刊载了哥穆尔卡的演说，并发表短评说，这几天波兰发生的事情不仅对本国人民，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今后的道路都有决定性意义。编辑部还致电《人民论坛》报，赞扬波兰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化，加强祖国的主权，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巩固波、苏友谊而进行的伟大斗争”。[⑦]28 日又

①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第 3–4、5–6、8、9、14 页。

②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第 7、16、10–11 页。此后因形势恶化，通讯再次中断，中国使馆与外交部的联络一度只得通过匈牙利外交部和驻华使馆进行。（109-01041-01，第 23、27 页。）

③ 参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第 33、73 页；《人民日报》1956 年 10 月 27 至 11 月 3 日。

⑤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第 90–91、97–101 页。

⑥ 详见沈志华：《1956 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⑦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第 1–2 页。

报告，波兰红十字会的首批药品已抵匈。[1]

波兰不仅是最早向匈牙利提供援助，也是最早向匈牙利新政权发电祝贺的国家之一。10月29日中国使馆报告：哥穆尔卡、西伦凯维茨在给卡达尔、纳吉的贺电中称："在最近几天内你们和我们都同样地为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平等独立，进行了坚定的斗争"，"我们了解匈牙利民族政府的纲领"，"这个纲领是符合匈牙利人民和整个和平阵营的利益的，只有那些想使匈牙利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才会拒绝这个纲领"。[2] 这个看法，与中国的立场显然是有重大区别的。

匈牙利局势急剧恶化以后，郝德青于31日与波兰驻匈大使维尔曼进行了讨论。维尔曼说：波兰领导人正在积极研究匈牙利情况，我个人认为，如果采取积极措施，匈的目前局势还有可能挽救。纳吉、卡达尔还是共产主义者，当然他们的处境很复杂，因为劳动人民党已被粉碎，其他党派对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波兰党代表团曾经和他们交谈过，主要是希望他们采取迅速、坚决的措施，挽救社会主义的成果。匈牙利领导人表示同意，但他们认为首先应恢复正常秩序，恢复生产和交通，同时采取措施保持社会主义基础。[3] 此时，波兰还对纳吉政府寄予希望，而中国和苏联已商量好要抛弃这个政府了。因此，中国开始考虑与波兰拉开一定距离。

与刘少奇谈定行动方针后，11月1日赫鲁晓夫飞到布列斯特与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举行了会谈。哥穆尔卡虽然承认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已经抬头"，并同意苏军"不应撤离"，但他反对进行干涉，因为这是匈牙利的"内部事务"。[4] 尽管哥穆尔卡没有当面表示坚决反对，但11月2日《人民论坛》报发表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告工人阶级和波兰人民书》，其中讲到："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匈牙利捍卫和坚持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成果的问题可由国内力量——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去解决，而不应是外来干涉"。[5] 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则刊登了中国政府关于苏联宣言的声明，其中说到："我们非常高兴，波兰人民及其领导人已经发现了反动派分子的活动和这种活动的危害性，这些反动派分子企图颠覆人

---

①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第40页。

②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第48页。

③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35-02，第12–21页。

④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ё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4，№5，с.75-76；*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337, 510.

⑤ *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235-237. 11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这个公告时，没有引用这句话。

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注意到这一点和将最广泛的劳动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同人数不多的反动派分子的阴谋活动区分开来，这是绝对必要的。"①中波之间的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或许是考虑到与波兰立场的区别，11月2日外交部指示中国驻匈使馆：目前匈牙利局势比较复杂，要多听少讲，不要轻易表态；使馆人员要提高警惕，沉着、谨慎，少外出行动；各兄弟国家使馆对外有共同行动时可以参加，但"不宜和波兰单独行动"。②此时，波兰方面似乎还想继续与中国采取一致行动。11月3日晚，波兰驻匈大使再次会见郝德青，告知了他刚结束的与纳吉的谈话内容，并建议中国党最好也能派负责同志前来了解情况，施加影响，提些建议，这可能有助于使匈情况不再恶化，避免其完全倒向西方。③大概是因为已经得知国内的态度，驻匈使馆向外交部电告的谈话内容中，根本就没有提到波兰大使的建议。④

11月4日凌晨，苏军开始了军事行动，并很快占领了布达佩斯，以卡达尔为首的新政府随即成立。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美国提出要苏联撤军，遭到苏联代表索波列夫的否决。美国又提出紧急动议，要求当晚（北京时间次日早晨）举行联合国大会讨论。为此，波兰副外长纳希科夫斯基约见王炳南，说波政府"极愿了解中国政府对匈牙利问题的态度，以供波方参考"。王急电外交部请示如何答复。5日凌晨北京收到电报后，周恩来紧急约见了波兰大使。周说，纳吉政府放弃社会主义和华沙条约，"走上了反革命道路"，现在卡达尔组成了新政府。中国政府的意见是：坚决反对美国提案，支持匈牙利新政府和苏联。如果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匈牙利就要成为白色恐怖的世界，美国的势力就要打进去"。周恩来还说，"毛泽东同志请我把我们的意见转告波兰党和波兰政府，我们相信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这个问题上会像几天前给我们的信中所表示的一样，采取同我们一样的态度。"基里洛克说："我个人完全同意总理对这个问题的估计，我相信波兰党中央和波兰政府也会这样看问题的。"⑤中国驻波使馆从苏联大使那里获得的信息称，波兰原以为中国的看法会与他们一致，"结果适得其反"，波党政治局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对策。事后波兰外长拉帕茨基告诉王炳南，"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内部有一定困难"，"联大讨论匈牙利问题时波兰投票反对美国提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根

①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日。
②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第45–46页。
③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35-02，第28–31页。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第110–111页。
⑤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28-04，第66页；109-01017-17，第166–169页。

据了中国的意见。"拉帕茨基还说，匈牙利问题不宜拖延，最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解决；卡达尔有意扩大新政府内社会主义的力量，希望通过波大使与纳吉建立联系，波政府已同意并指示驻匈大使完成此任务。波兰方面很想知道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有何意见。[①]

看起来，波兰和哥穆尔卡一直想拉近与中国的关系，并得到中国的支持。然而，在中国领导人眼中，波兰党和政府的立场似乎与社会主义阵营渐行渐远。11月5日驻波使馆报告：此前波兰各报大量使用西方报导登载匈牙利的情况，对纳吉政府多有支持，而对苏联的干涉不满。对于中国和苏联关于匈牙利的评论和声明均未予转载。5日的《人民论坛》报仍首先刊载西方报导，其次才引用塔斯社关于工农革命政府成立的消息，摘登了卡达尔等人的公开信，而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只是极简单地转述了几句。[②]11月7日又报告说，波兰学生普遍认为苏联出兵匈牙利是错误的，是干涉别国内政。还有人要求游行示威，经波党劝阻未成。据说波党中央认为，如果游行示威就会陷入孤立，因为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支持卡达尔政府，而且游行一旦流血，可能招来苏联出兵干涉。[③]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国的注意，11月9日新华社总社致电谢文清：最近波兰在一些问题上的态度值得密切注意，要求记者和使馆合作，"迅速提供内部参考材料和你们的看法"。[④]看来，中国领导人需要对波兰新政府做出一个基本判断了。

七、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认识和评价

11月13日驻波使馆报告：据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使馆的消息，哥穆尔卡上台后，在许多问题上言行不一，如关于农业合作化，口头上说要学中国的作法，实际上正在大量解散合作社；"很多老同志"继续受到排挤，如总工会主席克沃谢维奇已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特别是对苏联的态度愈加恶劣，在华沙讲俄文已经不受欢迎。波兰军官接替苏籍军官时表现得极为冷淡，华沙军区还撤换了许多以前在苏联进修的波兰军官。[⑤]记者谢文清的看法是："社会上敌视苏联的议论甚为嚣张"，而波党领导人对于这些反苏言行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进行制止；对于匈牙利事件，

①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28-04，第71、74–75页。
②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28-04，第67页。
③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28-04，第69–70页。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2，第13页。
⑤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92–93、94–95页。

多数波兰人认为苏军第一次出兵镇压导致矛盾激化，“改变了斗争的性质”，对苏军第二次出兵和卡达尔政府的建立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而波兰官方对此态度暧昧，至今没有明确评论；波兰开始发展与美国的经济关系。[①] 不久，新华社又报道：最近议会问题成为波兰报刊讨论的中心，主要观点认为，党不是政权，议会是最高政权机关，政府成员不能在议会中占有席位。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对这次报界的讨论是支持的，并曾为此发表社论。”[②] 此外，波兰通过的工人自治法成为所谓“民主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农业政策偏右，只强调农业增产，未强调合作化。[③]

1956年底，中国使馆对波兰事件做出了基本的分析和估计：哥穆尔卡过去在思想上、理论上存在着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但错误性质属于党内问题。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新领导，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继续对苏友好并主张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在对外政策上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匈牙利问题上支持纳吉；在对内政策上片面强调民主化，忽略阶级斗争，大批解散合作社。这些与哥穆尔卡过去的错误是一脉相承的。[④] 这些信息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波兰党和哥穆尔卡的看法。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两次提到哥穆尔卡。谈到人民内部的纠纷和党内斗争时，毛举例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谈到苏联的非斯大林化时，毛说：“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⑤]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把哥穆尔卡看作是共产党内和社会主义内部的右派。

在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哥穆尔卡。讲到学生闹事时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讲到党内错误思潮时说：那些吹捧波匈事件的人“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问

①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96-99页。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1月5日，第383–384页。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1月29日，第722–729页。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1，第1–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9–322页。

题时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①]在毛泽东眼里,哥穆尔卡与铁托、赫鲁晓夫是一类人,他们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麻烦。

在一个月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说到哥穆尔卡。这次讲的是波兰的国内政策:“为什么匈牙利、波兰合作化搞不起来呢?波兰只有6%的人口加入合作社,一阵风吹掉了大部分,哥穆尔卡一篇演说就有一万多个合作社崩溃了,剩下1000多个,吹掉了90%。”[②]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毛泽东最得意、最关注的就是合作化,而波兰的做法显然引起了他的不满和怀疑。

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不仅在中共党内经常表露,对苏共也不隐瞒。1957年10月毛泽东接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时,谈到波兰问题说:“波兰的根本问题在于,在经济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农村中合作化程度很差,富农有着较大的势力和影响。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加没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极为严重。不要阶级斗争,不加强党的领导,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忽视专政的作用,都没有遭到彻底地批判。这种情况蕴藏着一种危险,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应提起注意,否则会再出现匈牙利事件。目前的问题在于,波兰同志们不这样看,对这项根本问题估计不足。在波兰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③]毛泽东在波兰事件发生一年后的这个说法,可以看作是他对哥穆尔卡的政治评判。

然而,这些话在公开场合,尤其对波兰人,是不能说的。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认识还有另一方面。1956年12月3日,毛泽东与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进行了一次长谈。根据波兰人的记载,在评价波兰形势时,毛表示“完全支持和赞赏我国现领导的政治路线”,“完全赞同哥穆尔卡在各次讲话中表述的政治纲领”。讲到个人经历,毛泽东称自己是“中国的哥穆尔卡”。毛特别赞赏哥穆尔卡的对苏政策和策略,并说中共“从一开始就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独立自主解决波兰事务的权利”,而坚决反对苏联的干涉意图。[④]

由此看来,毛泽东的基本判断是:哥穆尔卡在政治和思想上是共产党内或人民内部的右派和修正主义者,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中反对苏联的大国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3、334、339页。毛泽东这样说,大概是看到了新华社的报道:中国的不少干部和学生崇拜哥穆尔卡,“为之倾倒”,还有人写诗赞美他。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4日,第341–343页。

②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记录稿),1957年2月27日。

③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4-00049-05,第16–17页。

④ Andrzej 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c.126-128.

大党主义。应该注意的是，直到中国反右运动初期，毛泽东仍然把右派和修正主义视为人民内部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匈牙利事件具有反革命性质，纳吉是共产党的叛徒，而波兰事件是革命内部的问题，是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因此，同样是反对苏联的情绪和言行，毛泽东支持了波兰而主张对匈牙利实行镇压。正是出于对哥穆尔卡的这种双重认知，在党内进行思想教育时，哥穆尔卡往往成为毛泽东攻击的靶子，而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波兰又经常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盟友。这就是 1956 年中国对波兰关系的两面性或双重性。

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二作者李丹慧）

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一路攀升。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同盟破裂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之前，中共已经从一个在莫斯科指挥下的支部成为与苏共并列的国际共运的领导者和理论权威。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引起局面发生如此变化的重大事件就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还在中共即将执掌政权的时候，斯大林就与中共领导人达成了默契：苏共负责欧洲革命而中共领导亚洲革命。斯大林去世后，在国际共运中，首先是苏共新领导的个人领袖魅力大为减弱，接着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使苏共整体的领导形象黯然失色。与此相反，中共和毛泽东的地位则蒸蒸日上，其影响所至，不仅遍及亚洲，而且扩大到欧洲。一时间，在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在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中，悄然刮起了一股中国“旋风”。

中国“旋风”的具体体现，就是中共领导人的两篇文章和三次出访，即《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0月刘少奇和邓小平访问苏联，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波、匈三国，以及11月毛泽东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两篇文章反映了中共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水平，而三次访问则表现出中共领导人的领袖魅力和领导艺术。如果说刘少奇访苏是中共协助苏共处理欧洲问题的初步尝试，而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表现证明中共已经与苏共并列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那么，周恩来的穿梭外交则成为连接这两者之间的重要桥梁，并为毛泽东的出访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和外交基础。关于刘少奇和毛泽

东访苏的情况，笔者已有专门研究，本文讨论的是周恩来在苏联、东欧的外交活动及其影响。①

1957 年 1 月 7 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三次会谈，同时与正在莫斯科的东德政府代表团及赶来的匈牙利领导人分别举行了会谈；11–16 日周恩来率团访问波兰，与波兰领导人举行了 4 次正式会谈，与哥穆尔卡进行了 2 次单独谈话，还出席了几次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16–17 日周恩来率团访问匈牙利，与匈牙利领导人举行了 2 次会谈，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17–19 日周恩来再次访苏，并与苏方继续会谈。在此期间周恩来还打算访问南斯拉夫，后未成行。显然，周恩来的这次穿梭外交，无论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中苏关系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具体材料的短缺，在以往中国、俄国和西方学者中，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进行专门研究。现在情况不同了，从目前中、俄、波、匈各国公布的档案情况看，除中苏会谈记录至今尚未披露出来（只有摘要和概括性的转述②），主要的史料都已经问世。③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也应该对中苏关系及国际共运中这次重要活动的历史过程及其结果进行较为详细的讨论了。

一、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动乱的余波

1956 年 10 月，华沙危机尚未过去，布达佩斯便发生了街头动乱。苏军的第一次干涉，不仅没有缓解局势，反而引起了匈牙利更大的反抗行动。在中国的建议和支持下，苏联决定再次使用武力解决问题。④11 月 4 日 6 时 15 分，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下令实施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行动。在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指挥下，苏军出动了 12 个师（约 15 万人）和 2000 余辆坦克，全线进入匈牙利并重点攻占首都布达佩斯。在匈牙利军队放弃抵抗的情况下，苏军与武装的布达佩斯市民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巷战，终于以死亡和失踪 720 人的代价取得胜利。在行动开始前，苏联组建了以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临时工农革命政府，并逮捕了正在苏军基

① 详见沈志华：《1956 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119–143 页；《毛泽东、赫鲁晓夫与 1957 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82–109 页。

② 据笔者了解，有关周恩来与苏方会谈的俄国档案尚未解密，而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馆藏中则没有这些文件。

③ 限于篇幅，笔者只能在目前发现的大量中、俄、波、匈四国档案中选编部分内容刊登于本刊。

④ 详见沈志华：《1956 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一文的论述。

地进行撤军谈判的匈牙利政府所有代表及主要军事领导人。11 月 11 日，随着武装反抗者最后一个抵抗据点切佩尔枪声的停止，苏联以武力镇压动乱的军事行动结束。① 这次经过周密策划的行动很快就取得了军事胜利，但是却带来了严重的政治余波。

苏联的军事行动首先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应，并掀起一股反苏、反共高潮。11 月 5 日，艾森豪威尔致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对苏联在匈牙利的举动表示震惊，尤其是这次“动用军事力量对付匈牙利政府和人民竟然发生在贵方代表和匈牙利政府代表就撤走苏军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刻”。美国总统要求“苏联立即采取措施从匈牙利撤军，让匈牙利人民享有并实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对所有民族都适用的人权和基本自由”。② 西欧各国政府，包括中立的瑞士和奥地利，都发表声明或照会表示抗议。不少地方发生了有议员、大学校长及社会名流参加的示威游行，有的还包围和捣乱苏联使馆，甚至丢手榴弹。许多西方使节拒绝出席苏联国庆招待会，有的国家（如西德）甚至规定下半旗，有的国家（如瑞士）则提出要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西欧主要共产党的机构和活动场所遭到袭击，有的政府（如奥地利）还要以叛国罪起诉共产党。③ 苏联在国际舞台孑然一身的典型事例出现在挪威，苏联使馆为举办一次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发出几百张请柬，但出席者只有十几人；驻在国外交部只有礼宾司司长一人出席，而且与迎宾主人握手后转身就走了，使苏联大使十分难堪。④ 在联合国召开的一系列有关匈牙利问题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始终处于“被告”的席位，而不得不接连对所有的议案投反对票，处境十分孤立和被动。⑤

---

① 朱可夫关于苏军行动的报告（1956 年 11 月 4 日），转引自 *Гобарев В.* Хрущёв и военные：историк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Manuscript i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room，c.39；谢罗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 年 11 月 9 日），朱可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 年 11 月 9 日、10 日），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385–387、390、391 页。关于战斗的详细情况还见：*Мусатов В.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1，c.18-22；*Путилин Б.Г.*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c.277-278；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第 128–131 页。

②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365–366 页。

③ B. N.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 年 11 月 6 日），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28，д.382，л.163-166；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11 月 17 日第 2054 期，第 411–413 页。

④ 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37–38 页。

⑤ 《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10 日第 3 版，11 月 11 日第 6 版，12 月 6 日第 5 版，12 月 12 日第 6 版，1957 年 1 月 11 日第 5 版。

很多战后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对苏联的行为不满，并把苏军在匈牙利的行动与英法人侵埃及相提并论。11 月 14 日，印度、缅甸、印尼和锡兰联合发表外交部长声明，对在埃及和匈牙利发生的以强凌弱的事件表示不安、痛心和强烈不满，要求苏联军队“尽快从匈牙利撤出”，以便匈牙利人民有充分的权利“自己解决自己的未来和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组建自己所希望的政府”。这些国家在联合国讨论匈牙利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整体上是对苏联不友善的”，有的（如缅甸）甚至主张通过联合国对苏联采取制裁措施。[①]

波匈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主义各国流言四起，谣传不断，并引发了对苏联行为的种种猜疑、不满和反对。据新华社的看法，在波兰问题上，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比较，罗、保、阿的做法有所保留；在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上，除波兰外，其他东欧国家都表示支持，但谈的不多，罗马尼亚直到 11 月下旬才直接表态；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方面也有分歧，保、阿紧跟苏联，罗、南则一直保持平静交往。[②]

欧洲卫星国的情况还算不错，最令莫斯科头疼的是贝尔格莱德态度的变化及苏南关系呈现出的紧张状态。关于使用武力镇压的问题，在 11 月 2–3 日布里俄尼岛会谈时，尽管有所保留，铁托还是表示赞同赫鲁晓夫的观点：纳吉·伊姆雷实际上为“反革命”扫清了道路，“社会主义成果”受到威胁，因此，苏联的武装干涉是必要的。赫鲁晓夫则接受了铁托的建议，由卡达尔出任匈牙利新政府首脑，取代莫斯科最初挑选的明尼赫。为了使政权尽可能平稳交接，南斯拉夫人允诺劝说纳吉主动放弃权力。然而，11 月 4 日苏军进攻后，纳吉不仅没有辞职，还发表声明谴责苏联的举动，并率领政府成员躲进南斯拉夫使馆，请求政治避难。这令南斯拉夫的处境极为尴尬和微妙，铁托只得一方面向苏联通报，将竭力对纳吉施加影响，使其撤销自己的声明，并表明支持卡达尔政府的立场；一方面指示使馆劝说纳吉，并限制他们的活动。但苏联领导人答复说，鉴于纳吉政府已被取缔，而卡达尔政府也已宣布成立，纳吉的声明就不再需要了。赫鲁晓夫还建议并催促铁托，将纳吉等人交给苏联军队，再由苏联军队交给卡达尔政府。11 月 8 日，铁托致函赫鲁晓夫，竭力说明为了保持自己的声誉，南斯拉夫不能交出纳吉等人，而建议寻找一个折衷的

①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的报告（1956 年 12 月 28 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 13 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第 528–536 页。有意思的是，情报委员会注意到：此期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不错，在匈牙利局势危急的时刻，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总理吴努访华证明了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12 月 26 日，第 2088 期，第 571–577 页。

解决方案，包括采取赦免的方式。[①] 当卡达尔准备与南斯拉夫就处理纳吉等人的问题达成协议时，11 月 9 日莫斯科表示了绝对不许将纳吉交由南斯拉夫人处理的坚决态度。莫斯科要安德洛波夫大使转告卡达尔："关于纳吉·伊姆雷的问题已成为我们和南斯拉夫同志争论的问题，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涉及到匈牙利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根本利益。……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应当表现出坚定性和原则性。"[②]11 日南斯拉夫拒绝了苏联关于让纳吉等人去罗马尼亚的建议，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办法：或者让纳吉等人留在匈牙利，但前提是卡达尔要发表声明，公开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或者让纳吉政府的成员到南斯拉夫去避难。[③] 或许是为了向莫斯科施加压力，同一天，铁托发表了著名的普拉演说。铁托公开指责苏联对匈牙利的"第一次干涉是没有必要的"，"是绝对错误的"，而称第二次出兵是一场"悲剧"。讲演还批评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斯大林分子"。[④]

铁托的讲话，特别是关于"斯大林分子"的说法和提到赫鲁晓夫时没有使用"同志"二字，激怒了赫鲁晓夫。[⑤] 莫斯科决心甩开南斯拉夫，独自行动。就在南匈两国政府反复谈判解决纳吉等人的处理问题期间，苏联于 11 月 17 日决定，一旦纳吉离开南使馆即对其实施逮捕并送往罗马尼亚，卡达尔接受了这个方案。[⑥]21 日，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签署协议，同意对纳吉等人的安全做出书面保证。[⑦]22 日傍晚，纳吉等人在南使馆人员的劝说和陪同下走出使馆，却被守候在门外的苏联军人强行带走。[⑧] 尽管南斯拉夫提出了抗议，但莫斯科声称这是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不

---

① 有关档案见 *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с.524-533，582，585，587-588，595-596，608-611，622-625，并参见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 Хрущёв，Й. 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1，с.23-25。

② 苏联外交部致安德罗波夫电（1956 年 11 月 9 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4，д.486，л.39-42，中译文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382–384 页。

③ 苏斯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 年 11 月 12 日），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401–403 页。

④ 《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12 日，第 6 版。

⑤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达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 年，第 207–209 页。

⑥ *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656-657，667-668，669，676-677.

⑦ *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679-682.

⑧ *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668-675，676-677. 卡达尔没有向中国透露处理纳吉问题的实情。见郝德青与卡达尔谈话记录（1956 年 11 月 24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33-02，第 31–38 页。

再理睬。[①] 随后一段时间，苏南开始在各自的报刊上互相指责，批评对方。最令苏联人不能容忍的是 12 月 7 日南共第二号人物卡德尔发表的演说，声称：“匈牙利事件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悲剧”；“当匈牙利社会处于这样深刻的内部危机的时候，苏联的干涉根本起不了决定作用。这次干涉不是错误的开始，而是错误的结果”。[②] 卡达尔政府的一些做法，也开始受到贝尔格莱德的指责和讥讽。[③]1955 年刚刚缓和的苏南关系，再次进入冰点。

波兰与苏联的历史宿怨甚深，特别是苏德秘密条约签订后苏联对波兰的进攻，大规模坑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被披露，以及苏军在华沙起义时作壁上观，任凭德军剿灭起义者的表现，波兰人对这一切记忆犹新。在十月危机中，苏军兵临华沙城下，试图干涉波党选举的行为，更引起了波兰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反抗。赫鲁晓夫虽然平静地离开了华沙，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匈牙利事件再次激发了波兰人的反苏情绪。大多数人都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是完全错误的，对于第二次出兵，也有很多人认为除加重流血外恐无济于事，这样做就是把“匈的社会主义建筑在刺刀和坦克的支持上”。报刊上指责苏联的文章和报道层出不穷，波兰群众的反苏倾向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体现出来：订机票、买东西时如讲俄文就没人搭理。波兰官方对卡达尔政府迟迟不表态，报刊上亦无评论，《人民日报》、《真理报》关于匈问题的社论和评论均未见转载。这种不满也反映在实际行动中，波兰军队开始大规模进行高级将领的人事变动，以波兰军官取代了原来就职的苏联军人。[④]

在社会主义各国，中共领导人无疑是莫斯科最坚定的支持者。然而，中国社会对苏联出兵问题也是一片反对声，中共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乃至普通工人和市民都表示疑问和担心。有人认为，“苏联出兵镇压叛乱是个很大的错误”，“匈牙利事件苏联要负全部责任”；有人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内政，是不智之举”，是“大国主义”的表现，“是把小国当作自己的支部”；

---

① *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с.698, 721-724；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421–423 页；赫格居斯·安德拉斯：《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陈之骝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第 320 页；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 219–220 页；*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 Хрущёв, Й. 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с.26。

② 《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11 日第 5 版，12 月 24 日第 6 版，12 月 25 日第 6 版；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 244–245 页。

③ 苏欧司关于匈牙利近况的简报（1956 年 12 月 2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94-03，第 31–37 页。

④ 驻波使馆致外交部电、谢文清致外交部并转新华社电（1956 年 11 月 13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 92–93、96–99 页。

也有人指出，各国人民有选择社会制度的自由，华沙条约是对付北约的，对付外来侵略的，而不是用来对付内乱的。[①] 甚至在《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后，党内和干部中仍有许多不同意见："援助和干涉仅是字面问题"，"派军队到别国领土去是不正常的事"；"从法律上讲苏联出兵是干涉匈牙利"；"联合国派观察员到匈牙利去为什么不可以？"。还有不少干部表示赞同南斯拉夫的观点和立场，认为铁托和卡德尔的讲话比较有道理，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不能服人。[②]

苏联政府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做法及其结果在国内也遇到了质疑，并加剧了苏共党内本来就存在的分歧。在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当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明显地形成了以赫鲁晓夫为首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两派，并发生了争吵。赫鲁晓夫等人赞同卡达尔关于成立新政府的声明，而莫洛托夫却不同意公开谴责"拉科西－格罗集团"，认为"匈牙利正在走南斯拉夫的道路"。[③]11 月 6 日的主席团会议继续进行辩论，而且更加激烈。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观点受到批评，会议通过了支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呼吁书的决议。[④] 早在二十大前后，苏共领导层就在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赫鲁晓夫趋向激进，莫洛托夫倾向保守。秘密报告引起的苏联乃至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使得赫鲁晓夫陷入被动，并导致某种政策性回归。[⑤] 波匈事件的发生则是对赫鲁晓夫一派的更大冲击。莫洛托夫对拉科西和格罗情有独钟，而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曾寄希望于纳吉政府。[⑥] 结果，拉科西等人只是犯有"严重错误"，纳吉却走向了"反革命"，局面对赫鲁晓夫更加不利。赫鲁晓夫希望推出卡达尔的新政府控制匈牙利局势，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右边有南斯拉夫支持的纳吉拒不退让，左边有莫洛托夫支持的拉科西跃跃欲试，再加上国内知识阶层和青年学生在反对"个人崇拜"浪潮中发泄出来的对苏联制度的不满，赫鲁晓夫政权的合理性危机已经显而易见。如果说决心与南斯拉夫翻脸，采用背信弃义的极端手段处理纳吉等人，是赫鲁晓夫在外交领域不得不做出的

---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11 月 5 日，第 2043 期，第 127–129、134–142、143–144 页；1956 年 11 月 6 日，第 2044 期，第 167–168 页；1956 年 11 月 19 日，第 2055 期，第 456–457 页；1956 年 12 月 12 日，第 2076 期，第 244–245 页。

② 上海市档案馆，A22-2-555，第 23–26、31–34 张。

③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34-36 об，*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583-587.

④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41-45，*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600-604.

⑤ 详见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 1 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8–70 页。

⑥ *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632-636.

让步，那么，苏共中央主席团 12 月 19 日就《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和制止反苏维埃敌对分子的攻击行动的信函》做出的决议，则表明赫鲁晓夫在政治领域也只能屈从于莫洛托夫等人的强硬主张了。信函指出，最近，在莫斯科等城市“出现了公开反对苏维埃、充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演说”，“在学生中流传着充满反苏内容的传单”。这些言论“千方百计地煽动民族纠纷，赞扬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行动”，因此必须实行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①] 此后，逮捕和审判的浪头汹涌而来，仅在 1957 年最初的几个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数百人。[②] 有研究者指出，“事件的这种转折，迫使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不得不面对选择：或者承认自己的失败，彻底放弃改革；或者根除保守势力，至少是在上层领导中。”[③] 联想不久后克里姆林宫发生的 6 月事变，此话颇有道理。[④]

到 10 月底，随着莫斯科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关系宣言的发表，波兰危机在中共的干预下算是平息了，但哥穆尔卡上台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在苏联卫星国中，波兰是纳吉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后，赫鲁晓夫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服波兰。11 月 1 日在布列斯特，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与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和奥哈布举行了会谈。目前尚未发现这次会谈的记录，不过从当天布列斯特发回的电报及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可以断定，哥穆尔卡对苏联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匈牙利问题“是内部事情，不应该干涉”。但他承认匈牙利存在“反革命势力抬头”的危险，并同意不公开反对苏联出兵。[⑤]11 月 2 日一早，波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便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匈牙利捍卫和坚持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成果的问题可由国内力量——以工人阶级

① 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3，оп.14，д.88，л.54；РГАНИ，ф.89，оп.6，д.2，л.1-13，*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 ред.)*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393-401.

② *Наумов В.П.* Хрущё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 4，с.33；Т2162，с.17-18.

③ *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41-1991г.，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9，с.203-204.

④ 关于这次事变的详情，可参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一文。

⑤ 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66，*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510，529-534；*Орехов А.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с.235；*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 Хрущёв，Й. 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с.21.

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去解决，而不应是外来干涉”。[①] 同一天，波兰驻苏大使会见苏联副外长佐林，坚持要求说明苏军进入匈牙利领土的情况。[②]11 月 3 日晚，波兰驻匈大使向郝德青通报了他刚结束的与纳吉的谈话内容，并建议中国党最好也能派负责同志前来了解情况，施加影响，提些建议，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③] 这些情况都表明，华沙实际上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

苏联出兵后，波兰政府的立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显得十分孤立和尴尬。最初，外长拉帕茨基（Rapacki）还向中国大使表示波兰愿意帮助卡达尔政府与纳吉建立联系，并承认“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内部有一定困难”。[④] 随着局势的变化，华沙的态度也不得不有所改变。[⑤] 但是，在苏联和中国看来，波兰的立场始终有问题。苏联认为，受到“党内健康势力的影响，哥穆尔卡不能不走向正确道路”。但波兰党内意见有分歧，萨瓦茨基、奥哈布等人是左派（对苏友好），萨姆布罗夫斯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是右派（倾向南斯拉夫），拉帕茨基、西伦凯维兹以前是社会党人，还有过去的残余思想。所以，整个波兰党，特别是基层组织，非常薄弱。[⑥] 中国认为，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新领导得到群众拥护，坚持有波兰特点的社会主义，总体是好的。但是“在思想上和对外政策上明显地有着民族主义倾向”，如对苏不满情绪尚未平息，至今还有反苏游行；在匈牙利问题上基本上支持纳吉，很多观点与南斯拉夫一致，在联合国有关匈牙利问题的投票中，竟然两次与南斯拉夫一样投弃权票。在对内政策上则片面强调民主化，忽略阶级斗争。总之，波兰的形势是“表面平稳，内在紧张”。[⑦]

面对在民主化浪潮中来临的波兰议会选举，更令人有一种雪上加霜的感觉。这

---

① Trybuna Ludu，2. XI .1956，转引自 *Орехов А.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236-237。

② 佐林与列维科夫斯基会谈纪要（1956 年 11 月 2 日），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340–341 页。

③ 波兰驻匈大使与郝德青谈话记录手稿（1956 年 11 月 3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35-02，第 28–31 页。

④ 王炳南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6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28-04，第 74–75 页。

⑤ 如提出纳吉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是离开南斯拉夫使馆和放弃原来的纲领。见郝德青与波兰驻匈大使谈话记录（1956 年 11 月 1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35-02，第 37 页。波诺马连科也看到了这一点。见王炳南与苏联驻波大使谈话记要（1957 年 1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2，第 119–120 页。

⑥ 王炳南与苏联驻波大使谈话记要、余湛与苏联驻波使馆参赞谈话记要（1957 年 1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2，第 119–120、120–123 页。

⑦ 驻波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 年 12 月 8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1，第 1–6 页。

次选举与过去最大的区别是候选人不再由中央提名，而是改由地方提名。结果很多老干部、老党员因被看作“斯大林主义者”不在候选人之列，而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很多青年人成为候选人。此外，近期经济情况不好自然也会影响选举。所以，波党领导人十分担心，感到“选举结果，目前尚难预测”。尽管在议会席位分配上统一工人党超过半数，但认为“面临的情况是复杂的，必须进行严重斗争”。[①] 新华社记者也认为，在议会候选人中，统一工人党的绝对数字和百分比均有所下降，而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反动力量和教会力量都很活跃。因此，这次选举的结果不容乐观。[②] 波兰究竟向何处去，是否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前途堪忧。

最大的危险和困难还在匈牙利。由苏联一手扶植的卡达尔及其政府成员虽然乘苏联装甲车进入了布达佩斯，但面对混乱和危局却显得一筹莫展，力不从心。[③] 新政权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苏联出兵一个星期后，匈牙利中心城市的武装抵抗基本结束。据克格勃主席谢罗夫 19 日报告，安全机关已拘留 4700 人（其中逮捕 1400 人），缴获机枪 1228 挺，其他射击武器 178660 支，手榴弹 63460 枚。但局势仍然不稳定，许多企业没有开工，集会还在继续进行。[④] 反抗力量“从公开转入隐蔽，从军事斗争转入政治斗争，继续在群众中进行活动”，他们“制造谣言、散发传单、放冷枪、阻止复工、煽动罢工”，还鼓动群众提出“撤退苏军、宣布中立、自由选举、新闻自由、恢复纳吉职位以及成立全国和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等要求”。直到 12 月 8 日，因工人委员会被解散，在几个大城市还发生了示威集会和流血事件，12–13 日又发起了全国性大罢工。[⑤] 在苏联和中国看来，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卡达尔政府软弱无力，不敢斗争，对敌人“放纵”，对落后群众“过于迁就”；一是党组织瘫痪，“在群众

---

① 王炳南与波兰国务委员会秘书谈话记要、余湛与波外交部第五司长谈话记要（1956 年 12 月 21 日），109-01141-02，第 107–109、109–110 页。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12 月 30 日，第 2092 期，第 698 页。

③ *Путилин*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c.278.

④ ЦХСД，ф.89，пер.45，д.48；АПРФ，ф.3，оп.64，д.487，л.107-110，*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c.661-665.

⑤ 苏欧司关于匈牙利近况的简报（1956 年 12 月 2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94-03，第 31–37 页；《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15 日，第 5 版。

中的联系和影响已丧失殆尽”。[①]

对新政权的威胁不仅来自社会上的不满和反抗。纳吉虽已躲进南斯拉夫使馆，其政府也已垮台，但他们的影响和群众基础仍然存在。据匈官员反映，布达佩斯的枪声停止后，主要问题就是“大部分人民不承认卡达尔政府，反对苏联，要求纳吉重新上台”。[②]就连驻布达佩斯的中国记者都认为，“纳吉出来参加新政府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可能性很大。”[③]即使在纳吉等人被秘密拘捕以后，社会上同情和推崇纳吉的还大有人在，以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的决议中谈到事件的起因时，把拉科西－格罗集团的错误作为首要的“决定性”因素，认为“霍尔蒂法西斯和匈牙利资本主义－地主反革命是基本因素”，国际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和主要的作用”，而对“党内反对派”纳吉等人的定位只是“对十月事件的发生及其悲剧性转折起了重要作用”。[④]显然，作为纳吉昔日的搭档和朋友，卡达尔尽管在暗地里同意了苏联的强硬措施，但是在匈牙利社会面前还不得不顾及群众的情绪和自己的声誉。

比起纳吉，卡达尔更担心来自左翼的拉科西及其支持者的威胁。卡达尔之前的两位匈党第一书记拉科西和格罗被迫离职后，都相继“退休”到苏联疗养，但他们的政治热情丝毫没有减退，特别是在纳吉已经败落而卡达尔陷入困境的时候。拉科西一直不信任卡达尔，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他的执政耿耿于怀。[⑤]12月15日，拉科西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长信，指责“目前党的领导成员绝大多数是

---

① *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с.564-565, 638-640, 647-649. 驻匈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2-01，第24–28页。罗马尼亚驻匈大使与郝德青谈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35-02，第34–36页。卡达尔掌权后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改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此发生了激烈争论，但最后表示支持。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1月6日），ЦХСД, ф.3，оп.12，д.1006，л.41-45，*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с.600-604。

② 胡济邦致外交部并人民日报郑拓电（1956年11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2-01，第57页。

③ 驻匈使馆致外交部转新华社电（1956年11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2-01，第54–55页。

④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决议（1956年12月5日），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and Janos Rainer（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pp.460-463，参见雷尼·彼得编：《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经过和历史教训》，赵平生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⑤ 匈驻华临时代办沙尔·约瑟夫致外交部报告（1956年12月27日），MOL 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 Dokumentumok*，Budapest：MTA Jelenkor-kutató Bizottság，2001，o.99-106。

不坚定分子或纳吉·伊姆雷的支持者”，并对卡达尔的“右倾”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①] 由于没有得到答复，1957年1月9日拉科西再次致函赫鲁晓夫，指出匈牙利的情况是“表面向前迈进，暗中向后退步”，反革命正在悄悄复辟，而卡达尔的新党“没有能力完成所提出的任务”。拉科西引用大量证据说明，只有尽快起用他们这些（特别说明不包括他本人）被免职的党员干部，才能挽救匈牙利的局势。第二天，同样在苏联“休养”的前布达佩斯市委书记I. 科瓦奇的长信，更加明确地表示希望早日恢复工作。[②]

在国际社会中，匈牙利新政权的处境也十分不妙。在1956年11–12月期间，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做出了一系列决议，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呼吁苏军撤出匈牙利，要求允许向匈牙利派出联合国组织的观察员等。有的国家（意大利）代表打算就派遣“联合国警察部队”到匈牙利提出议案，还有的国家（古巴）甚至主张取消匈牙利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③] 不仅如此，据苏联的情报，很多匈牙利驻外使节和军事代表在苏联干涉的最初一个时期都举行了示威活动，表示对纳吉政府的支持。有的打碎国徽，撕毁国旗，还有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试图与西方代表建立联系。[④]

此外，令卡达尔政府头疼的还有经济问题。动乱和军事给匈牙利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直接遭受炮火破坏的损失达50–60亿福林，间接损失在11月底已达110亿福林。由于企业停产，交通中断，以及持续不断的罢工，匈牙利1956年11月的工业产值只是同年前三个季度月平均产值的10%，12月也才到24%。全国消费品储备已从140亿福林降低到60亿福林。[⑤]

总之，在危机和动乱发生两个月后，主要当事国苏联、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都仍然处在困难或危险之中，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阵地受到动摇。这时，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

---

① АПРФ，ф.3，оп.64，д.490，л.38-46，*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745-752.

②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34–443、444–454页。

③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0日第3版，11月11日第6版，12月6日第5版，12月12日第6版。

④ 苏共中央致安德罗波夫电（1956年11月12日），АПРФ，ф.3，оп.64，д.484，л.108-109，*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641-643。

⑤ 苏欧司关于匈牙利近况的简报（1956年12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94-03，第31–37页；*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563。

二、周恩来三国之行急需解决的问题

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①]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越来越引起苏联和东欧的注意。《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国国内开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和中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和关注。

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②]《人民日报》文章在《真理报》转载后，引起苏联普通读者的极大兴趣，“一般的反应都很好”。人们普遍认为“这篇文章有说服力，写得公平，分析得全面深刻，把问题说清楚了”。苏联官方则“准备把全文重新翻译一次，与苏共的文件一起编入一个供全党学习的小册子”。[③]匈牙利新闻界也一致认为，“这是一篇原则性很强的文章，从头到尾每一句话都有其实际内容，它是一个哲学著作，但是又很容易理解”，对匈人民“是有教育意义的”。[④]中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理论权威地位普遍得到认可，以至在波兰有人因不了解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几个论点而未能通过哲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考试。[⑤]毛泽东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波兰受到极大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简直是家喻户晓。[⑥]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则真诚地接受了这样的信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是中共领导人意图的真实反映。这在匈牙利社会激起了广泛的亲华热情和同情心，在匈牙利发生危机时，大部分市民都渴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人们在布达佩斯街头最常听到

①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599–600 页。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3 月 5 日，第 1817 期，第 17–19 页。

③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发王甫对苏联若干情况的报告，1956 年 4 月 25 日，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第 101 张。不久，《真理报》出版社确实在对该文进行准确校对后印成了小册子，发行 20 万册。见《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6 日，第 6 版。

④ 驻匈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6 年 4 月 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0-01，第 17–18 页。

⑤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6 月 28 日，第 1919 期，第 719–720 页。

⑥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10 月 24 日，第 2033 期，第 1209–1210 页；1957 年 5 月 7 日第 2211 期，第 26–27 页。另见 2004 年 4 月 17 日笔者采访骆亦粟记录。

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和我们站在一起”。[①] 中共八大文件传播后，更加引起关注。匈牙利驻苏大使称：中共八大提出了许多新的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匈党对此很有兴趣，十分重视。布达佩斯市委书记说，八大文件中很多东西值得匈牙利学习、研究，特别是中国党成功地把广泛的民主与坚强的集中领导相结合。应当学习中国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能广泛团结全国人民各阶层的经验。[②]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的态度便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关注的中心。

在苏联出兵问题上，中共的理论和思想准备确实远远高于莫斯科。11 月 3 日、4 日、5 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社论，详细论证了苏联行为的合理性，明确表示支持苏联出兵和匈牙利新政权。5 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关于匈牙利事件，要求各单位“拟定统一提纲，有领导地、广泛地向所有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解释”。[③] 同一天，周恩来亲自出面做工作：一方面向印度大使解释出兵匈牙利的理由，为苏联辩护；一方面向波兰大使宣布中共中央的立场和态度，希望波兰支持苏联，支持匈牙利新政府。[④]6 日，周恩来致函卡达尔，祝贺他组成新政府，并控制了匈牙利局面，还宣布向匈政府赠送价值 3000 万卢布的物资和现金。[⑤] 这些表现使苏联和匈牙利不得不心存感激。[⑥]

针对西方世界的攻击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混乱，11 月 14 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强调苏联根据华沙条约和匈牙利邀请的出兵行动是“正义”的，呼吁社会主义各国在这次“惊涛骇浪”的斗争中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头脑”，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⑦]15 日，刘少奇在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波、匈事件的性质不同，“波兰问题是革命内部的问题；匈牙利问题却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因此，对波兰不能用兵而对匈牙利必须动武。[⑧]

---

① János Rádvanyi,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Hundreds Flowers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No.43, Jul.-Sep. 1970, p.122.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10 月 8 日，第 2013 期，第 820–822 页。

③ 中宣部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宣传通知（1956 年 11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2-01，第 7–8 页。

④ 周恩来接见尼赫鲁谈话记要、周恩来接见波基里洛克谈话记要（1956 年 11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327-12，第 1–18 页；109-01017-17，第 166–169 页。

⑤ 周恩来致卡达尔函（1956 年 11 月 6），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5-02，第 4 页。

⑥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 年 11 月 22 日，第 2058 期，第 524–525 页。

⑦ 《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14 日，第 1 版。

⑧ 刘少奇接见保驻华大使谈话记要（1956 年 11 月 1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9-05，第 1–9 页。

这样的划分，对苏联既是批评又是解脱，对波兰既是警告又是保护，甚至南斯拉夫也能从批评“大国主义”的言词中找到安慰。这些做法足显中共的高明之处，也为北京赢得了更多的信任。难怪冷眼旁观的美国情报官员会认为，中共观点对东欧“影响的程度可能超出了北平自身的预料”。他们还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莫斯科开始带头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创举”。11 月 18 日在莫斯科波兰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指出，有关“苏联、中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到底谁的经验更好”这一争论，不会促进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如果一定要他做出“个人”选择的话，他更为欣赏“我们的中国同志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他们以独到的方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①]

如此看来，无论从感情、理念还是威望的角度讲，社会主义在欧洲遇到危难时，自然要求救于这个远在东方的亚洲国家了。

其实，苏联在出兵后不久便萌生了请中国出面协调和帮助的念头，米高扬就曾谈到：中国在处理波、匈事件中起了很大作用，发生了很好的影响。[②] 确如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所言，自出现危机以来，莫斯科十分强调甚至美化自己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对俄国人的支持事实上是唯一有意义的支持”。[③]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1 月 29 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口头转达赫鲁晓夫的意见，希望正在阿富汗的周恩来能在结束访问后到莫斯科一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议后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周恩来到苏联作正式访问是有必要的。[④]12 月 3 日周恩来回电，同意在访印度后直接去苏。[⑤]

与赫鲁晓夫传出口信的同一天，哥穆尔卡也提出了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波的要求，而且眼光更高——希望毛泽东访波。[⑥] 波兰十月危机期间，中国是第一个站出

① 国务院情报研究署关于北平对共产主义阵营看法的情报报告（1956 年 12 月 3 日），MF2510408-0717，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② 详见驻匈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6 年 11 月 10 日、14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2-01，第 24–28、53 页；刘晓致中共中央电（1956 年 11 月 28 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01，目录 5，卷宗 819，第 1–4 页。

③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 219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250 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274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644 页。

⑥ 萨瓦茨基、哥穆尔卡致毛泽东函（1956 年 11 月 2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04-01，第 1–2 页。

来为华沙说话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受到波兰人的信任和依赖。[①]12 月 3 日毛泽东接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告诉他可以接受邀请，但时间要推迟。因为要前往波兰而不在莫斯科停留是不可能的，而出于外交惯例的考虑，毛泽东又不便在莫斯科停留。波兰大使强调了中国领导人在大选前访波的重要意义后，毛建议可邀请周恩来于 1 月 10 日前后访波，基里洛克认为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说明了波兰邀请访问的情况，并表示中央认为有必要去“帮他们一手”。[②]12 月 7 日，波兰发出正式邀请。[③]经协商，确定周恩来于 1957 年 1 月 11 日访苏后赴波，作为时 5 天的访问，16 日离波。[④]但 12 月 16 日毛泽东又来电话，要周 12 月底先回北京，几日后再访问苏、波。[⑤]12 月 23 日新华社发布了周恩来将于 1957 年 1 月初访苏的消息。[⑥]

此前，匈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沙尔·约瑟夫曾向政府建议邀请周访匈，闻知周恩来将访苏联后又表示将建议匈政府派代表到莫斯科同周会晤。[⑦]据匈牙利档案，12 月 27 日，沙尔以私人名义致函副外长塞拜什，提出邀请周恩来访匈的问题。沙尔认为，周在此时访问布达佩斯“具有无比巨大的外交和内政意义，其效果远比政府的某一位领导人前去华沙或莫斯科向他介绍情况要好得多”。在沙尔看来，争取周的访问对匈牙利来讲可谓一举多得：在亚洲提高卡达尔政府的威望，减轻匈牙利在联合国受到的压力，帮助协调苏匈关系，让中国详细了解匈牙利的情况和困难，或许还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援助。[⑧]第二天，卡达尔请求苏联与周恩来商议，希望他

① 详见沈志华、李丹慧：《1956 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俄罗斯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 45–58 页。

② 基里洛克致拉帕茨基电（1956 年 12 月 4 日），Andrzej 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Dzis*，nr.10/1996，c.126-128；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1956 年 12 月 4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05-01，第 7–8 页。所谓外交惯例，指的是毛曾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访苏，应在苏联元首访华后，再行访苏。1957 年 4 月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后，毛泽东于 11 月访苏。

③ 西伦凯维兹、拉帕茨基致周恩来电（1956 年 12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05-01，第 1–2 页。

④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电、外交部致周恩来电、外交部致王炳南电（1956 年 12 月 8 日、11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05-01，第 9、10、11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647 页。

⑥ 《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24 日，第 1 版。值得提到的是，笔者在外交部档案馆没有发现苏联的正式邀请函。如果确实没有发出邀请，此事还是颇有意味的。

⑦ 苏欧司关于中匈关系简况的报告（1956 年 12 月 2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94-03，第 27–30 页。

⑧ 沙尔给塞拜什的信（1956 年 12 月 27 日），MOL 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Dokumentumok*，o.107-110。

访问波兰时顺道访问匈牙利。[①]30日，匈牙利使馆正式向中国提出邀请周访匈的要求，表示“即使在匈逗留一天，对匈也是很大的支持”。1957年1月8日在莫斯科最后确定，周恩来在访苏波后于1月16日率领代表团访匈一天。[②]

周恩来三国之行所承担的责任就是稳定东欧的局势，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从上述东欧危机的复杂影响和后果看，要达到这些目标，具体的途径是通过协商和沟通，与苏联形成一致意见，说服波兰和匈牙利，从而弥合苏波分歧，加强苏匈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完成这些任务的前提是中苏意见统一且精诚合作。苏共二十大召开，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流传以后，中共虽有一些不同意见（主要是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但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中苏关系总体趋势是更加友好和密切。[③]1956年正值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中苏签订了11个重要协定，中国赴苏代表团、考察团共95个（1242人），苏联访华代表团、考察团共77个（762人）；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项目从156项增加到211项；中国派赴苏联学习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共1836人，而在华苏联专家和顾问达3113人。[④]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密切往来的同时，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协调、合作也十分紧密[⑤]，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前述中国在匈牙利问题上对莫斯科的强力支持。莫斯科的感激和亲密之情在彭真11月访苏期间表现得特别充分：不仅对代表团高度赞扬，破格接待，热情宣传，而且表现得非常谦虚。赫鲁晓夫一再强调苏联党在过去工作中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希望中国同志能坦率地提出意见和批评，并一再强调要向中国党学

---

① 拜科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12月28日），APRF，f.3，op.64，d.490，pp.76-77，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and Janos Rainer (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pp.485-486。

② 张闻天接见匈驻华代办沙尔会谈话记录（1956年12月30日），外交部致驻匈使馆电（1957年1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23-01，第3–5、6页。

③ 对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一文。

④ 《人民日报》1957年1月20日，第4版；谢皮洛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1月4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1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第2810–2813页。有关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详细情况可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1995，№65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⑤ 详见：苏欧司关于最近苏联国内外和中苏关系中的一些主要情况的报告（1956年12月24日），中国外部档案馆，109-00788-01，第1–8页。

习。[①]彭真报告说，苏联“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都十分重视中苏团结”，认为中国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提法“是对他们的支持”。对于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说法，苏联领导人内心普遍感到满意，并提出“以中苏为首”的说法，不仅一般干部，“连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等同志也这样说”。[②]

值得注意的是，仔细领会波匈事件教训的毛泽东，此刻已经改变了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就是丢掉阶级斗争，放弃十月革命；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毛甚至从原则上做出了否定性判断——苏共二十大搞的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③]应该说，毛泽东正是从这时起开始反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但是，毛同时又深知：“中苏关系必须搞好，对于苏联为首的领导地位，不能发生动摇，否则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是很不利的。应该肯定：苏联总的方面是好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必须以苏联为首。对于这一点必须向党内外加强教育，很好地讲清楚。”[④]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决定了中国处理中苏关系的方针，同时也决定了周恩来处理东欧问题的立场和方式。

弥合苏波分歧是最大的难题，否则周恩来也不会把全部行程近一半的时间（5天）花在波兰。首先必须消除波兰对苏不满的民族情绪，尽管在这方面莫斯科确实已做了很大努力。11月18日发表的苏波联合公报以及12月17日达成的苏军驻波协议，表明苏联在竭力安抚波兰人，并试图在新的框架内全面改善苏波关系。[⑤]不过，从哥穆尔卡赴苏前接到上千封劝阻信，并有不少人到机场阻拦的情况看，波兰对苏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⑥]苏波会谈后，苏波关系有所好转，但仍存在很多矛盾，特别是在处理纳吉问题发生后，“又引起群众强烈的反苏情绪”。[⑦]

---

①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年12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01-01，第46–49页。

② 彭真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12月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01-01，第228–230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0–61页；林克日记（手稿），未刊，第16–17页。

④ 陶铸传达的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⑤ 关于苏波会谈及所签协议的情况，详见《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7日第5版，11月20日第1版，11月22日第5版，12月19日第5版。米高扬曾向中国大使详细介绍了苏联对苏波会谈的安排和期望。见刘晓致中共中央电（1956年11月28日），福建档案馆，全宗101，目录5，卷宗819，第1–4页。

⑥ 谢文清致外交部转新华社电（1956年11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103页。

⑦ 驻波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年11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107–109页；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278页。

其次，需要统一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11 月 13 日，苏联曾计划根据卡达尔的提议，召开一次“兄弟共产党会议”，“根据匈牙利的经验，讨论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相互关系”。[①]11 月 17 日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 B. N. 波诺马廖夫又报告说，鉴于目前一些兄弟党在匈牙利问题上存在疑惑和分歧，有必要在莫斯科召开一次东欧各国会议，统一认识。[②] 如上所述，在这方面波兰的态度显然与众不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愈加严重。波兰是卫星国中唯一公开表示赞同南斯拉夫立场的国家。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机关刊物《自由论坛》周刊在 11 月 25 日发表文章，其中引述铁托的话说，各国共产党对待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有斯大林式和反斯大林式的两种倾向，而南斯拉夫有许多意见与波兰的评价相同。虽然声明并不完全接受南斯拉夫模式，但波兰认为,“国际主义并不妨碍我们按自己的具体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③]12 月 10 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库兹涅佐夫坚持要波兰参加苏东九国关于谴责美国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共同提案，遭到拒绝后，苏联只得单独提出。[④] 苏联对此颇为恼怒，在报纸上发动了对波兰的尖锐批评，指责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采取了特别的立场”。结果，又在波兰引起强烈反响。[⑤] 显然，正是由于波兰的这种顽固态度，1957 年 1 月初布达佩斯召开的苏东领导人讨论匈牙利问题的会议时，哥穆尔卡没有被邀请出席。[⑥] 这一情况，引起了西方的普遍关注。[⑦]

最后，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是考虑到波兰党内和国内的复杂局面，哥穆尔卡仍然是莫斯科必须支持的唯一对象。1957 年 1 月初，苏联人向北京表示了这样看

①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 55 号记录（1956 年 11 月 13 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6，л.49，*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с.208，982-983。

②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 年 11 月 17 日），ЦХСД，ф.3，оп.64，д.487，л.124-125，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 13 卷（下），第 227–231 页。

③ 《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11 日，第 5 版。

④ 张闻天与基里洛克谈话记要（1956 年 12 月 17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17-19，第 199–201 页。

⑤ 波诺马连科与波兰记协领导人及华沙新闻界代表会谈记录（1957 年 1 月 12 日以后），AAN，KC PZPR，V/54，PI 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 1957*，Warszawa：PISM，2006，s.19-26。

⑥ 事后，卡达尔向波兰人详细解释了未邀请波兰与会的考虑，但给人的感觉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见波兰驻匈大使关于同卡达尔谈话致外交部电（1957 年 1 月 23 日），AMSZ，ZD 6/77，w.53，t.689，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s.72-76。赫鲁晓夫则向周恩来坦言，他担心哥穆尔卡再次提出不同意见，也估计波兰人不愿来参加这个会议。见周恩来与匈牙利领导人谈话记录（1957 年 1 月 16 日），MOL，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 Dokumentumok*，o.125-133。

⑦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周恩来访问苏东以及苏联政策的的报告（1957 年 1 月 30 日），MF2510408-0735，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

法：“哥穆尔卡是主张对苏友好的，我们不管他的基础是什么，但表现是越来越坚定了。他的原则只是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的友好，我们对这一点也是同样遵守的”；现在波兰党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要“搞好团结”，把“主要力量要放在选举上”。① 波兰外长拉帕斯基也明确表示，周恩来在大选前来波，“对波兰沿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将起很大作用”。② 此外，从波兰还传出这样的信息：哥穆尔卡已经表示对无政府主义和反苏言论要进行斗争，但“刹车”不能太猛，担心“人们会说又回复到过去斯大林时期了”；估计大选过后会采取较强硬的措施。③ 因此，如何帮助哥穆尔卡在大选中获胜，稳定波兰的社会主义政权，就成为莫斯科的期盼，也是周恩来的重任之一。

解决苏匈之间的问题到1957年初已经比较简单了，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加强匈牙利人对苏联的信任感；第二，支持并促使卡达尔政府采取坚定的立场和强硬的手段稳定国内局势。

卡达尔政府是忠于苏联的，但在党和政府的基层干部中对苏联的疑虑和猜忌很深。匈牙利国防军文工团访华归国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联出兵之际，正值匈国防军文工团应邀在华演出。鉴于团员中流传途经苏联回国时的安全会将受到威胁，沙尔代办在中方的建议下，要求苏联大使当面向文工团做出保证。后来几经交涉，苏联决定在回国途中邀请文工团在莫斯科逗留5天，演出两场。④ 此外，对于苏军随意逮捕匈牙利人并押解到苏联的做法，卡达尔和明尼赫都表示不安和反对。⑤ 显然，周恩来需要进一步安抚心有余悸的匈牙利人。

为了控制匈牙利的局势，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马林科夫、苏斯洛夫和苏共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很长一段时间坐镇布达佩斯。⑥ 此外，苏联还有49位党政工作人员、18位来自克格勃的专家、5位来自内务部的专家以及一批负责经济和财政工作

① 余湛与苏联驻波使馆参赞卡尔波夫谈话记要（1957年1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2，第120–123页。

② 王炳南致外交部电（1956年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05-01，第13–14页。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1月15日，第2105期，第267–272页。

④ 沙尔致外交部报告（1956年12月27日），MOL，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Dokumentumok*，o.99-106。

⑤ 谢罗夫和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11月14日），АПРФ，ф.3，оп.64，д.486，л.143-144，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07页。

⑥ 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团决议及给卡达尔复函（1956年11月13日），АПРФ，ф.3，оп.64，д.487，л.126-127，*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646-647。

的专家，作为副军事代表或顾问被派往匈牙利工作。[①] 尽管如此，莫斯科对卡达尔的犹豫不决和左右摇摆的行事方针始终感到不满和担心。特别是 12 月 18 日安德洛波夫大使报告的情况，更引起了莫斯科的警觉：卡达尔通知说，匈党中央最近将就一些重要问题做出决议，其中包括扩大政府组成（当时 22 个部只有 6 名部长）时拟吸收小农党、全国农民党成员，并不排除社会民主党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将与小农党和全国农民党合作，并组成共同的政治集团等。[②] 对于这种明显意味着认可多党制存在的决定，肯定引起了苏联的注意。但未等莫斯科回复，12 月 28 日卡达尔便将决议的草案交给苏共中央。尽管该决议只允许其他党派成立中央机构，而不得建立地方组织，苏共中央主席团还是立即决定派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前往布达佩斯进行干预。接到赫鲁晓夫的电话通知后，卡达尔要求请捷、罗、保三国党的领导人也来参加会议，并得到同意。[③] 关于 1957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五国领导人会议，目前没有发现苏方和匈方的档案文件，不过根据罗、捷两国的简要记录、会后发表的公报和 1 月 6 日匈牙利政府的纲领性声明可以看出，通过这次会议，莫斯科基本控制了卡达尔的方针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为选举而建立多党联合集团、"大学自治"等问题虽经匈牙利代表提出，但均未被会议接受；相反，在讨论了拉科西和纳吉的"错误"后，却决定"展开对纳吉案件"的司法调查。至于"工人委员会"，声明虽承认其存在，但要求工人"应该拒绝并且阻止执行工人委员会可能作出的违法决定"。明显的让步只有一项：在限制私人占有土地不得超过 15 公顷的条件下，允许土地出售。[④] 作为这次会议精神最快的体现，匈牙利外长在 1 月 5 日接见兄弟党报记者时便迫不及待地宣布：匈牙利人民认为纳吉是叛徒。[⑤]1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匈牙利会后发表的声明，是"匈牙利国内

①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1956 年 11 月 14 日），АПРФ，ф.3，оп.64，д.490，л.1，29，*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741-742；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432、433 页。

② 安德罗波夫致赫鲁晓夫的报告（1956 年 12 月 18 日），АПРФ，ф.3，оп.64，д.490，л.63-66，*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с.753-756。

③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备忘录、赫鲁晓夫与卡达尔通话备忘录（1956 年 12 月 29 日），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Janos Rainer (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A History in Documents*，pp.487-488。

④ 罗、捷关于布达佩斯会议的记录（1957 年 1 月 1-4 日），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Janos Rainer (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pp.489-495；《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7 日第 1 版，1 月 8 日第 1 版。

⑤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 年 1 月 10 日，第 2101 期，第 195–196 页。

情况根本趋向好转的标志”。[①] 如此看来，比起波兰，周恩来在匈牙利的政治负担要轻一些。

不过，在经济援助方面，匈牙利的期望值还是比较高的。为了解决匈牙利的经济困难，各兄弟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到 12 月初，无偿援助已达 2.85 亿卢布，还有大量日用必需品和工业原料。此外，匈政府提出了 4 亿美元贷款的要求（其中苏联 10 亿卢布，中国 2 亿卢布，其他东欧国家各几千万不等）。12 月 3 日卡达尔亲自向中国提出了这 2 亿卢布长期贷款的要求，并希望 1956 年第 4 季度应归还的 200 万英镑再延期两年。为了维持工业生产，匈政府还要求中国在 1957 年订购匈生产的各种车辆、农业机械、一般机械和成套设备，并提出了可长期提供的成套设备的初步货单。[②] 这些都是匈牙利为稳定局势而有求于中国的。

三、在新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

自十月革命以来，莫斯科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共领导人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即使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依旧执掌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苏共二十大召开，特别是波匈事件爆发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空前的内乱和动摇。周恩来这次出访的目的就是要重整旗鼓，在新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所谓新的基础，是指国际共运系统内领导原则的变化，即由“以苏联为首”客观上变为了“以中苏为首”。而建立起这个基础，并且为周的出访铺平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

在铁托普拉演说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就有意以中共的名义发表一篇理论文章，后历经月余，数度开会，反复讨论，八易其稿，终于在 12 月 29 日完成并发表。[③] 这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思考的结晶。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苏联，赢得了一片赞扬。转载该文当天的《真理报》发行了约 2000 万份，之后还印发了 100 万册单行本。

---

① 《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9 日，第 1 版。

② 苏欧司关于中匈关系简况的报告（1956 年 12 月 2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94-03，第 27–30 页。卡达尔关于请求贷款致中国政府的信（1956 年 12 月 3 日），MOL 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Dokumentumok*，o.106-107。

③ 详细过程见沈志华：《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史学月刊》2007 年第 1 期，第 75–89 页。

许多读者打电话、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表示对文章“非常满意”。一些读者认为，这篇文章“给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历史道路以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巨大的意义”。《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告诉中国记者，“许多宣传员认为这篇文章是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问题的典范。”参加苏共党史教科书写作的全组人员在读到文章后，奔走相告，同声称赞，认为这是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文献，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思想混乱。文章不仅对南斯拉夫而且对苏联都将发生深刻的影响。甚至有学生说，世界上出现了伟大的列宁继承者毛泽东，苏联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转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拜了。苏共领导人也为此感到兴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除夕联欢会上，赫鲁晓夫特意走下主席台与中国大使刘晓拥抱、亲吻和干杯，称赞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还请刘晓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坐在一起。外交部长谢皮洛夫说，文章深刻，思想理论分析正确，是对苏联最好的新年礼物。莫洛托夫、B. N. 波诺马廖夫等人也纷纷表示赞许。[①]

匈牙利的反响也十分强烈。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发表评论认为，中共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观点，有助于理解匈牙利事件。[②] 匈党宣传鼓动部认为，这篇文章是极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具有高度的哲学理论修养，其中对矛盾的分析特别精辟，匈牙利宣传工作者要说的话都已被《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出来了。[③] 普通党员读了文章后说，“我们不孤立”，“看到伟大的中国和我们站在一起，给了我们以力量和信心”。党内知识分子说，文章澄清了理论上的混乱，使我们思考了许多问题，从而更靠近党了。[④]

波兰人的反应没有那么热烈，党内多数人认为“文章极好”，有重大意义，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但对有些观点不能完全同意。关于匈牙利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多数波兰人同意卡达尔 12 月初的看法，强调首先是内因，其次是外因；关于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多数波兰人倾向于铁托的看法，认为关键在于斯大林推行的一套“管理方法”。在这方面，波兰外长拉帕茨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不过，总体

---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 年 1 月 10 日，第 2101 期，第 193–194 页；1 月 4 日，第 2095 期，第 51–52 页；1 月 5 日，第 2097 期，第 117–118 页。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关于各国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反映的报告（1957 年 1 月 15 日），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84，第 1–20 张；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 22 页。

② 《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6 日，第 5 版。

③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 年 1 月 8 日，第 2099 期，第 158–159 页。

④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传鼓动部关于党内对中共立场反响的报告（1957 年 1 月 21 日），MOL 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Dokumentumok*，o.150-151。

来看，波兰人对于文章中关于"基本矛盾、次要矛盾"以及修正主义危险的观点还是赞同的，认为中共的批评是"诚恳的，同志式的"，"又是有高度原则性的"。显然，波兰已经感觉到中国对华沙的态度比过去冷淡了，但还是满怀期望等待着中国的帮助和支持。[①]

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他的穿梭外交的。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场面是极其友好和热烈的，《真理报》发表社论，盛赞中国共产党、中苏友谊和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讲话称"苏联是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的最坚决的旗手，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强大的堡垒"。[②] 苏联原准备在体育馆举行群众大会欢迎周，"但为了更热情隆重改在大剧院举行"。[③]

周恩来访苏前一阶段（7–10 日）活动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强调支持卡达尔政府，一个是呼吁团结一切力量。

在对待匈牙利新政权的态度上，中苏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外交活动的进展很顺利。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便与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东德总理格罗提渥举行了会谈。周主张会见后发表一个简单的新闻公报，不谈别的，就是表明

① 《内部参考》1957 年 2 月 15 日，第 2129 期，第 202–204 页；王炳南与拉帕茨基谈话记要（1957 年 1 月 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2，第 127–129 页。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需要特别说明。笔者在中国档案中发现：1956 年 12 月 12 日，中国驻越大使罗贵波与苏联驻越临时代办波波夫谈话时得知，南斯拉夫国防秘书长曾说，苏联《真理报》对铁托讲话中关于个人崇拜起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说法有误会。铁托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指某种"方法"，塞尔维亚文中的"方法"在俄文中翻译为"制度"是不准确的。[罗贵波致外交部电（1956 年 12 月 13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972-05，第 27–29 页。] 再查铁托原话，是这样说的："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这些根源在哪里呢？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在于领导方法和所谓一长制，在于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和愿望……"（《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12 日，第 6 版）不久后卡德尔对此的解释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指社会主义，也不是指让群众有可能去影响国家和党的政策的列宁主义苏维埃制度。我们这里指的政治制度是下述这样一些政治形式和方法的总和：这些政治形式和方法隔绝了社会主义劳动群众，不让他们有可能直接影响政权，加强了党和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因素，并且使它们逐渐掌握政权的一些杠杆，结果，政权就会变质而成为不同于工人阶级政权的东西了。"（《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24 日，第 6 版）笔者就这个问题专门请教了塞尔维亚学者周万（Jovan Čavoški），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真理报》的翻译不准确。笔者还以为，《人民日报》刊登的铁托演说，很可能译自《真理报》。如此说来，波兰人的看法与铁托一致就很好理解了——他们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反对斯大林的统治方法。现在的问题是，罗贵波的电报是 12 月 13 日发出的，卡德尔的讲话是 12 月 24 日刊出的，因此，中共领导人或"秀才班子"对这个情况应该是知道的。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人民日报》文章指责南斯拉夫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说法就是无的放矢，甚至是有意为之了？

② 《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8 日，第 4 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4 页。

③ 驻苏联使馆陈楚与苏外交部远东司长顾德夫谈话记录（1956 年 12 月 28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984-18，第 149–159 页。

中国支持苏德联合公报、支持匈牙利政府的立场。[①]第二天上午，中苏又商定约请匈牙利领导人来莫斯科会谈，随后周恩来致电郝德青大使，要他和卡达尔、明尼赫共同前来。[②]1月10日中、苏、匈三国代表团举行会谈，周恩来提出，会谈公报要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在匈牙利的颠覆活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和镇压反革命。周还鼓励卡达尔说，即使联合国开除匈牙利，也没有什么，这样中国在联合国外就多了一个朋友。最后公报的用语是："坚决制止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堡垒作用的一切企图。"[③]

周恩来要完成的第二项任务就不那么轻松了。为此，周恩来首先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要"以苏联为首"。自二十大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苏共的威望受到打击，许多国家已经不大提"以苏联为首"了，甚至苏共本身也在考虑，为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谈苏联的领导作用，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④]而周恩来在1月8日布尔加宁举行的招待会上，重新提出"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义务。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又再次强调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⑤]与此同时，周恩来强调，密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关键问题在于苏联能够摒弃大国主义作风，这也是刘少奇3个月前在莫斯科力劝苏共领导发表平等关系宣言的主旨所在。在1月8日的招待会上，周就指责苏联对东欧兄弟国家有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搞得赫鲁晓夫"狼狈不堪，举杯不知所对"。[⑥]在1月9日的双边会谈中，周恩来谈到争取民族主义国家时又说，为了让这些国家安心，"我们强调反对大国主义"。1月10日的会谈主要谈波兰问题，这也是周恩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赫鲁晓夫介绍了波兰国内的情况后，周恩来表示，苏共支持波兰党领导、支持哥穆尔卡的方针是对的。同时又强调，要把党内的是非和党外的敌我问题分开；党内问题的解决，主要

---

① 张彦给外交部的电话汇报（1957年1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72-01，第62–63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32页。

② 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57年1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5，第2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7页；夏道生：《忆周恩来总理1957年访问匈牙利》，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第25–26页。会谈公报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12日，第1版。

④ *Кулик Б.*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ИДВ РАН，2000，c.42；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259页。

⑤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31–32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99–101页；《人民日报》1957年1月9日，第1版。

⑥ 李慎之：《关于波兰事件的报道》，1967年11月28日，未刊。

靠兄弟党自己。这显然是在批评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的做法。由于苏方参加会谈的只有 4 位领导成员，所以，周恩来在当天有众多苏联高层干部出席的宴会上又重申了这些观点。周说：处理兄弟党的关系，绝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再大的党，在各国党面前也是平等的，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①] 在公开场合做这样的尖锐的批评，令赫鲁晓夫十分难堪。

如前所说，从苏共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态度可以看出，在理论问题上，特别是在对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已经接受了中共的观点。在克里姆林宫迎新年宴会上，赫鲁晓夫不仅颂扬“斯大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且宣称他本人就是“斯大林分子”，“是在斯大林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并以此感到自豪”。[②] 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出自赫鲁晓夫的内心，这至少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中共的重要地位，并决心向北京靠拢，在政治上与中共保持一致。在欢迎周恩来的宴会上，布尔加宁赞扬中国的经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贡献，并说苏联正在仔细地研究中国的经验。赫鲁晓夫则进一步发挥了除夕宴会上的讲话，说“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称号不可分割的”，称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苏共中央还要求《真理报》立即发表这些讲话。[③] 然而，在与波兰关系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却期望中共能够站在苏联一边，因为在他看来，在政治立场上苏共更接近中共，而在苏波关系上，是“大国在为小国作出牺牲”。[④]

鉴于十月事件前东欧传说“中、南、波将组成统一战线反对苏联”，为了争取中共的理解和同情，在周恩来访问前，苏联外交部向苏共中央建议：让周恩来了解苏联驻波使馆发来的密码电报内容；向中共提交有关波苏关系和波兰形势的材料；告诉周恩来波兰报刊对中国关于波兰问题，特别是匈牙利问题的立场的歪曲；责成驻波使馆与中国大使“建立密切的、直接的联系”，并帮助他得到“关于波兰局势客观而正确的情报”；建议 K. K. 罗科索夫斯基在合适的时候向刘晓和周恩来通报

---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 1277–1278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6–7 页。

②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 252–254 页。

③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 256–257 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 21 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 99–101 页；杰留辛在“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 年 10 月，北京）答复学者提问时的讲话。

④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 278 页。

苏联关于波兰近期事件的观点。[①] 想不到，莫斯科等来的不是支持，而是一通批评，苏联人自然是不服气。尽管在会议上没有进行反驳，但私下谈话时，赫鲁晓夫却坚持为自己辩护。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毛在电话中说：我们劝他一下就行了，听不进去就算了。[②]

赫鲁晓夫大概不了解周恩来的工作方式，为了缓和苏波关系，周恩来在莫斯科重点是批评苏联，而在华沙，却主要是为苏联说话。周恩来访问波兰非常辛苦，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 21 次，还两次与哥穆尔卡私下谈话，波兰人十分感动。[③] 除了以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波的实际行动表示对哥穆尔卡的支持外，周恩来在波兰的活动和谈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劝说哥穆尔卡以大局为重，搞好与苏联的关系；站稳革命立场，在匈牙利的问题上与社会主义阵营保持一致；团结全党，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周恩来到达华沙后在机场发表的第一次讲话就提出："加强我们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④] 在中波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继续进行耐心的说服。在哥穆尔卡详细地介绍了波兰局势，特别是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的情况后，周恩来首先表示支持波党八中全会的立场，同意哥穆尔卡关于平等和主权的意见，接着话锋一转，谈起"苏联的先进作用"。周强调"先进的作用是主要的，平等和错误是次要的问题"，"我们也曾向苏共指出，他们对待兄弟党的态度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需要公开谈论此事，这是为了不削弱苏联。对于那些错误不要谈了又谈，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团结对敌和强调苏联的先进作用"。[⑤] 当晚，周恩来与哥穆尔卡单独谈话时，继续强调目前承认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

---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 年 1 月 17 日，第 2107 期，第 335–336 页。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的请示（1957 年 1 月 4 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1 卷，第 2810–2813 页。

② 李越然在"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 年 10 月，北京）答复学者提问时的讲话。

③ 余湛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谈话记录（1987 年 7 月 26 日），未刊，第 6–7 页。

④ 《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12 日，第 1 版。

⑤ 波中政府代表团会谈记录（1957 年 1 月 11–16 日），AAN，KC PZPR，XIA/31，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s.28-55。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55–82 页。关于中波领导人的会谈记录，波兰保存有两个文本，一个是记录员整理的正式文件（即这里引用的文本），一个是哥穆尔卡未刊的文件（即《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翻译的文本）。具体说明见 Andrzej Werblan，"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Dzieje Najnowsze*，Rocznik XXⅨ，nr.4，1997 r.，s.120-121。

很重要，这样才能更有力地与敌人进行斗争。哥穆尔卡坦率地说：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我们有些看法。不可否认，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最强的国家。1948 年以来，波兰党整天强调苏联的领导作用，但是现在我们不公开强调苏联的领导作用，因为在许多党员及人民群众心中，领导作用即意味着命令和一切模仿苏联。周解释说，以苏为首不等于要苏联起领导作用。[①] 波兰党内外曾对中国在十月危机时坚决反对苏联干涉的立场充满感激，而这次周恩来的讲话显然让他们感到有些失望。

关于匈牙利事件，周恩来在会谈中明确地说：“中国方面认为，苏军的帮助是必要的。当纳吉叛变以后，在匈牙利出现了反革命和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别无选择，卡达尔的行为是革命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支持苏联。”周还表示，希望在中波会谈公报中专门提一下对卡达尔政府的支持，并暗示不要过多提拉科西和格罗的错误而要笼统地谈团结和友谊。与前一个问题不同，哥穆尔卡当即做出回应，表示同意中共关于匈牙利问题的观点，并接受周的建议。只是在讨论公报的用语时可以看出，中波在匈牙利问题上的看法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中国主张写上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而哥穆尔卡坚持只能写“制造混乱”，因为匈牙利事件的内因是主要的。[②]

关于波兰党的内部问题，周恩来首先声明，中共支持波党八中全会进行的“正确变革”，“支持波党的领导是我们的责任”。随后周强调，对过去既要看到错误，也要看到成就。至于波兰党内的两种倾向，周指出：“保守主义者已经不构成威胁了”，“当前最重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倾向，它会带来许多危害。”周还提醒波兰要加强党内团结，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办好“党的报刊”。哥穆尔卡在会谈中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只提到中国对波兰大选的危险估计过重了。[③] 应该说，在公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7–8 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 1279–1281 页；骆亦粟：《1956 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外交学院学报》1997 年第 3 期，第 43 页。

② 波中政府代表团会谈记录（1957 年 1 月 11-16 日），AAN，KC PZPR，XIA/31，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s.28-55。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55–82 页。

③ 波中政府代表团会谈记录（1957 年 1 月 11-16 日），AAN，KC PZPR，XIA/31，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s.28-55。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55–82 页。在波兰档案中没有中方记录中哥穆尔卡的这样一句话：“周恩来总理的发言中有许多有意思的、有趣的、有益的东西，我们将仔细地研究。”中波两党会谈记录（1957 年 1 月 12 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 1281–1282 页。

开场合，在报纸宣传方面，中国依然是积极支持波兰的。[①]但在内部谈话时，重点还是劝导哥穆尔卡与中苏保持一致。或许是感到对波兰表示支持不够，毛泽东在14日的电报中指出，“波兰党的根本路线应当承认是正确的”，并让周再讲一下团结对敌的重要性。[②]

最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很明显是一个相互妥协、求同存异的杰作：既提倡国际主义，又反对干涉内政；既强调苏联、中国、波兰之间的共同思想和紧密联系，又不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既表示支持卡达尔的工农革命政府，又没有说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③]这种结果与当时中波关系的双重性是吻合的。毛泽东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哥穆尔卡在政治和思想上是共产党内或人民内部的右派和修正主义者，但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中反对苏联的大国和大党主义。因此，在党内进行思想教育时，哥穆尔卡往往成为毛泽东攻击的靶子，而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波兰又经常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盟友。[④]

关于周恩来访匈的安排，如前所述，尽管匈方于12月30日正式提出邀请，但中方迟迟没有答复，只是邀集匈牙利领导人到莫斯科面谈。在1月8日中、苏、匈三方会谈时，赫鲁晓夫提出建议，而卡达尔和马罗山·捷尔吉则恳切相邀，周恩来这才决定访匈一日。[⑤]的确，除了经济援助问题，中国和苏联在匈牙利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对卡达尔政权也是全力支持，所以中匈双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政治问题要商谈。[⑥]不过，周恩来访匈的意义不在于时间长短和会谈内容，而在于中国政府领导人出现在布达佩斯这一事实本身，如马罗山所说，其“作用不可估量”。[⑦]

通观与周恩来与卡达尔的谈话记录可以看出，与中苏和中波会谈相比，中匈领导人之间的会谈要顺畅和投机得多。他们在所有问题上几乎都是未等对方的话说完就表示赞同，或发表相同的意见，可说是琴瑟和谐，相得益彰。[⑧]周恩来在群众大

---

① 李慎之：《关于波兰事件的报道》，1967年11月28日，未刊。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281–1282页。

③ 《人民日报》1957年1月17日，第1版。

④ 详见沈志华、李丹慧：《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第45–58页。

⑤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282页；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 1957*，s.73-74。

⑥ 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还在周恩来访问之前，匈牙利便已草拟了双方会谈的公报。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57年1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23-04，第22–25页。

⑦ 夏道生：《忆周恩来总理1957年访问匈牙利》，第25页。

⑧ 周恩来与匈牙利领导人谈话记录（1957年1月16日），MOL，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Dokumentumok*，o.125-133。

会上的一番讲话更是鼓舞人心，他说：“匈牙利人民对反革命阴谋进行斗争的胜利，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是对整个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匈牙利人民在进行各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的时候，可以指望六万万中国人民的支持。”[①]

不过，在经济援助问题上，由于当时中国自身的困难，“在贷款贸易方面不能完全满足匈方的要求”。[②]在莫斯科会谈时，对于匈方提出的 2 亿卢布长期贷款（其中 5000 万卢布的外汇，1.5 亿卢布的物资）的要求，周当面答复卡达尔说：中方“考虑到匈牙利现在急需外汇，而且从中国运给匈牙利物资也不大方便”，决定提供 1 亿卢布的外汇，并可立即拨付。另外中方还可以提供 1 亿卢布的物资，如果匈方一时不能平衡，可将差额记账，不计利息。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再谈。匈方误以为这 1 亿卢布的物资也属贷款，一再催办。后经反复协商双方于 5 月 13 日签订协定，中国只提供 1 亿卢布的外汇贷款，其中还包括 9 月中方答应的 350 万英镑在内，年利 2%，一次性拨付，自 1960 年起分十年偿还。[③]笔者按照当时的外汇牌价粗算了一下，这 350 万英镑大概合 4000 多万卢布，也就是说，中方实际增加的贷款只有不到 6000 万卢布。这恐怕让匈牙利有些失望。

还有一件让匈牙利担心的事就是周恩来的安全问题。当时布达佩斯局势还不很稳定，而周这次出访为了获取政治效果，又必须公开露面，所以确有一定风险。为此，中国使馆再三提请匈方注意安全问题。匈牙利感到责任重大，只得请苏联帮助。1 月 14 日，苏联驻匈大使专程拜会郝德青，商谈苏军协助保卫工作的问题，并对宾馆、会场、宴会场所、沿途经过地点及汽车、食品化验等项保卫工作均作了妥善安排。对周的保卫，由苏军及苏内务部负全责。[④]周恩来到达后，在中国代表团住地周围，已派有苏联坦克守卫；匈方还从中央车库专门调了一辆防弹车供周使用。[⑤]这些防范措施保证了访问的顺利进行。

1 月 17 日周恩来回到莫斯科，进入了访苏的第二阶段。在这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周恩来不顾疲劳，又抓紧机会提出了访问南斯拉夫的问题。南斯拉夫对中国一

---

① 《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18 日，第 2 版。

② 外交部对驻匈使馆 1956 年工作总结和 1957 年工作计划批复（1957 年 4 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37-01，第 16–17 页。

③ 驻匈使馆致外贸部并外交部电（1957 年 1 月 18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5，第 41–42 页；关于中国给匈牙利贷款的谈判经过（1957 年 6 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6-02，第 3–5 页。

④ 郝德青致中央、外交部转总理电（1957 年 1 月 13 日），驻匈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7 年 1 月 14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5，第 26、28 页。

⑤ 夏道生：《忆周恩来总理 1957 年访问匈牙利》，第 27 页。

直持友好态度，尽管中共参与了共产党情报局对铁托的批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南斯拉夫是最早提出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卡德尔公开发表谈话说：中国与南斯拉夫发展道路相似，而与苏联形式不同；中国在国内发展方面将沿自己的道路前进，保持对苏平等。当时，中国正在执行“一边倒”的方针，为了保持与苏联的政治一致，只能将中南建交的问题束之高阁。[①]1954 年底苏南关系解冻，中国与南斯拉夫也开始了建交谈判，并于 1955 年 3 月互派大使。[②]不过，中南关系的真正转变，是在 5 月苏南领导人会谈和南共工会代表团访华并详细介绍了苏南冲突的过程以后。[③]6 月 30 日，毛泽东接见南大使 V. 波波维奇，与他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毛承认，从新中国建立时，“你们就一贯支持我们，这种立场一直没有改变过”。毛还说，他接到铁托的来信后非常高兴，因为这不仅是“国家之间的通信，而且是同志之间的通信”。[④]1956 年底苏南关系再度恶化时，中南关系却保持着良好状态，双方驻苏大使甚至单独进行了“亲切的会晤”。刘晓耐心倾听了米丘诺维奇讲述的苏南之间的分歧，并对有些观点表示赞同，还建议苏南之间应举行会谈，协商解决冲突。[⑤]正是由于中南之间保持着这层关系，使得周恩来有可能成为缓解苏南、匈南紧张关系的调解人。

早在 1 月 10 日晚中苏匈三方会谈时，苏、匈就表示有意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赫鲁晓夫建议周到匈牙利后邀请铁托也同时访匈，以便中国从中调解关系。周与毛泽东通话后表示，由于时间太紧，这次来不及了，中国准备安排第二次访问东欧。[⑥]在布达佩斯会谈时，匈牙利领导人又提出希望尽快与波兰和南斯拉夫的同志举行会谈，以免局势更加复杂化，并且期待由中国提出这一倡议。周答应立即报告

---

①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293 页。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49 年 10 月 10 日，第 15 期，第 37–38 页。

② 《人民日报》1955 年 1 月 2 日第 1 版，3 月 2 日第 1 版，3 月 10 日第 1 版。中南建交的详细情况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580-01，第 49–55 页。

③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96 页；邓小平、王稼祥与南共中央委员谈话纪要（1954 年 5 月 26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583-01，第 1–8 页。

④ 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214–216 页。

⑤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 250–251 页。

⑥ 夏道生：《忆周恩来总理 1957 年访问匈牙利》，第 25–26 页。参见波中政府代表团会谈记录（1957 年 1 月 11-16 日），AAN，KC PZPR，XIA/31，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 1957*，s.28-55。

毛泽东。[1] 毛泽东对铁托的看法大体上同他对哥穆尔卡的看法一样，既赞赏铁托的独立精神和坚强意志，又反对他的右倾立场和修正主义观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论述充分反映了毛的思想。中国领导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尽管“在南斯拉夫领导人中有一些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也还有一些修正主义的观点”，对此中国也在报纸上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但应该确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以同志态度对待南共”，对他们要帮助并进行合作，“而不是孤立他们”。[2]

关于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解决阵营内部的问题的建议，最早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以替代苏共在解散共产党情报局后提出的建立联络局的主张。苏共对此建议正在酝酿之时，发生了波匈事件，事情便耽搁下来。[3] 现在，苏联和匈牙利都急于同南斯拉夫、波兰缓和关系，而且希望中共出面安排此事，便把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再次提上日程。不过，原来中共主张苏共作会议召集人，现在考虑到莫斯科的尴尬处境，北京决定与贝尔格莱德联手挑起这副担子。贝尔格莱德对周恩来的欧洲之行非常重视，逐日进行报道，而且几乎都登载在第一版，特别是对于周几次有关加强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的讲话，过去从未刊载，而这次全部报道了。尽管在评论中显示出还有不同看法，但铁托看重中国的意见是不言而喻的。[4] 这些情况都有利于中国再次出面协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1月18日晨周恩来与毛泽东通话时是否谈到这个问题以及如何商议的，目前尚无任何史料，但当天上午周恩来就给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打了电话，要他单独会见铁托一次，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周要求彭真转达中共的建议：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5] 接着，在下午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又特意找到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

---

① 周恩来与匈牙利领导人谈话记录（1957年1月16日），MOL，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Dokumentumok*，o.125-133；驻匈使馆1月21日。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760-01，第3–6页。

② 波兰与中国两国代表团的会谈记录（1957年1月11-16日），AAN，KC PZPR，XIA/31，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s.28-55；彭真致中央电（1957年1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72-02，第20–23页。

③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文。

④ 驻南使馆致外交部电（1957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6，第65–66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3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10页。

议的想法。周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 2 月底或 3 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现在彭真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已经授权他同铁托商谈。米丘诺维奇提出，为了更确切地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他需要了解一些细节，比如召开这个会议的倡议是谁提出的，如果南斯拉夫不能参加，会议是否还会举行。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整个这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之间的新组织，会议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于与会者的决议。周还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不过，那样就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削弱了，中共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①

然而，贝尔格莱德拒绝了周恩来的提议。或许是担心再次出现 1948 年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在与彭真的秘密谈话中，铁托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者多边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得到彭真的报告后，周恩来在 1 月 25 日致中共中央并外交部的电报中判断，目前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可能性不大。②1 月 28 日南共中央正式通知米丘诺维奇，南斯拉夫将不参加共产党国家召开的国际会议，也不准备签署任何声明，但铁托还是决定邀请周恩来于 1957 年 2 月或 3 月访问南斯拉夫。③不过，彭真路经莫斯科回国时，向赫鲁晓夫通报的消息却是含糊的：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只是要求不规定议事的日程，也不要作出约束性的决定。④据此，赫鲁晓夫直接致函毛泽东，同意中共“关于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

①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 267–270 页。目前披露的中方史料虽然简单，但可以证实南斯拉夫大使回忆的基本内容。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13–14 页。

②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310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13、15 页。

③ 南共中央致米丘诺维奇电（1957 年 1 月 28 日），ACKSKJ（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档案馆），br.55，st. Ⅸ 9- Ⅲ /32，1-3。感谢塞尔维亚学者 Jovan Čavoški 为笔者提供南斯拉夫档案，并讲述了大致内容。

④ РГАНИ，ф.3，оп.14，д.99，л.26，*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c.991；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7 页。

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并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议。或许是考虑到持有不同意见的主要是南斯拉夫，而南共的缺席将大大降低召开会议的意义，中共中央只得以“时机尚不成熟”作为托辞答复莫斯科了。①

中共不愿此时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苏会谈最后阶段的气氛不太融洽。周恩来访问波、匈后，了解到更多情况，回过头又来做苏共的工作。在 1 月 18 日上午的会谈中，周对苏共提出诸多批评，搞得赫鲁晓夫很不愉快。关于批判斯大林问题，周对苏共提出三点批评，即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缺乏同兄弟党协商。还说，揭露斯大林需要勇气，但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赫鲁晓夫答曰，在对斯大林成就的认识上两党不存在分歧，秘密报告只是没有发挥，没有同兄弟党商量是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关于干涉波兰问题，周指出兵临华沙进行威胁，就是武装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承认这样做不应该，但否认是犯错误。关于苏波关系，周认为历史上的民族隔阂与现实问题搅在一起，所以波兰人有情绪，不愿接受“以苏为首”的说法，但哥穆尔卡正在尽力调整波苏关系。赫鲁晓夫则强调波兰人民是亲苏的，只有“个别坏分子”反苏，不承认苏联有大国主义错误。总之，周恩来感到，苏共领导的错误基本上是思想问题，苏联利益至上。一方面唯我独尊 、利令智昏，既缺乏远见，又不懂人情世故；另一方面又显得信心不足，内心恐惧，采取吓人手段。现在只是迫于形势，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并非“心悦诚服”，“彻底觉悟”。因此，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长期而耐心地”对他们做工作。②

当天下午为周恩来举办的告别宴会的气氛，直接反映了最后一次会谈的效果。与前几次招待会不同，这次会场显得有些冷清，没有频频举杯的场面，也没有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布尔加宁和周恩来只是宣读了事先写好的祝酒辞，赫鲁晓夫则一言不发。在场的人们均感觉不到欢送周恩来的气氛，以至西方使节四处打听出现如此变化的原因。③ 看起来，赫鲁晓夫是心中有气。周的观察不错，苏共领导人在

---

①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 年 2 月 2 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7，л.1-8，*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 с.224，990-991；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 7 页。

② 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2001 年 10 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13–15 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 1284–1286 页；中苏两党代表团会谈记录（1963 年 7 月 8 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5 卷，第 3827–3864 页。

③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 271、266–267 页；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Dokumentumok*，o.146-150。

联合声明广播文稿上搞小动作的做法也表明，这批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新人确实不够大气，也缺乏勇气。中苏联合声明经双方领导人确认后，苏方抢先广播了俄文稿，还对其中少量文字做了改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删去了原稿中“并非完全正常”几个字。经中方工作人员查验证明是苏方有意删改后，苏外交部还强调属忙乱中出错，并要求中文稿也按照俄文播出稿改正。搞得中方无可奈何，只得照办。[①]

结 语

周恩来不辞辛苦的穿梭外交取得了重大成功，达到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这一点，全世界都有目共睹。

西欧国家普遍承认，周访苏、波、匈的最大收获是巩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表现是中苏更加团结，苏联的领导核心趋向稳定，波兰继续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匈牙利的革命立场更加坚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争论也平息了。[②]美国的情报机构也评价说，“此次访问加强了阵营内部的团结”，“在弥合因为苏联过去的政策所造成的阵营内部裂痕方面发挥了影响力，并在阵营各成员国之间营造出一种更巩固、更灵活的关系，允许各成员国拥有最大限度的主权，而且同时能团结一致的对抗西方。”[③]

的确如此，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苏联对周恩来的访问“非常满意”，作为“一个善意的调解人”，中国“能够使苏、波、匈三国共产党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④]波兰的干部、群众普遍认为，周恩来的访问“对波兰局势的改善有很大意义”，“对大选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离开华沙不久，波党在大选中的态势便出现了“决定性”好转，并取得大胜。[⑤]至于匈牙利方面，据中国使馆观察，“匈方为此极为振奋，

① 李汇川给外交部的报告（1957 年 1 月 1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3，第 48–50 页。联合声明全文见《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20 日，第 1 版。

② 驻瑞士使馆致外交部电（1957 年 1 月 28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6，第 92–95 页。

③ 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周恩来访问苏东以及苏联政策的报告（1957 年 1 月 30 日），MF2510408-0735，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

④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2268–2269 页。

⑤ 王炳南夫人贝鲁特夫人谈话纪要（1957 年 2 月 12 日），王炳南与国务委员会秘书斯克热歇夫斯基夫妇谈话记要（1957 年 2 月 5 日），王炳南与副外长纳希科夫斯基谈话记要（1957 年 2 月 11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3，第 168–169、149–152、165–167 页。

尽力所及安排了各项活动，充分动员宣传工具展开了连续突出的宣传活动”；“卡达尔等同志的态度表现很诚恳、很虚心，会谈和共同声明所涉及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不但没有意见分歧，而且在巩固和加深卡达尔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有重大影响”。总之，这次访问“在打击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全力支持巩固卡达尔政府，鼓舞匈牙利人民战胜困难的斗争信心上都起着巨大作用”。[①]

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础是中苏同盟，周的访问进一步密切了中苏关系，这突出地表现在军事援助方面。对于中国提出的帮助研制核武器和导弹的要求，苏联过去一直不积极。[②]周离开莫斯科后不久，情况突然有了变化。3月30日，中苏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将派遣5名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教学组织工作，并讲授有关(火箭)喷气技术的课程；按照喷气技术课程制订和提交教育计划和大纲；苏联有关高等学校在1957–1958年教学年度，接收50名中国大学生；提交两枚供教学用的P-1导弹样品及技术说明书。[③]此外，有关美国将在台湾驻扎导弹部队的消息传出后，赫鲁晓夫立即通报说，如果美国胆敢这样做，苏联愿意帮助中国建立导弹部队，并发表声明支持中国。[④]

周恩来的访问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南斯拉夫驻苏大使注意到，1957年苏联官方文件列举社会主义国家时的排列方式发生了变化，“苏联和中国排在首位，其他国家是按字母次序列出的”。[⑤]中共的威望已经与苏共齐名，并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不仅波兰党中央派代表团考察中国的党群关系，学习中共的“群众路线”，并在军队建设中采用中国的做法，[⑥]就连苏共也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经验。苏联驻华使馆1957年1月初的报告认为，近几年来，中国党和国家在党务工作和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有趣的组织形式”，其中有些经验值得苏联的相关机构学习，并为此建议苏方应多组织各种代表团访

① 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57年1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760-01，第3–6页。

② 详见沈志华：《援助与限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0–131页。

③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05页。

④ 周恩来接见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7年5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86-13，第95–96页。

⑤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305页。

⑥ 笔者对骆亦粟的采访；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的请示（1957年1月4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2810–2813页。

华。[①]5个月后，苏共中央联络部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当年就派出“以苏共中央书记为首的、由中央机关主要工作人员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组成的党务代表团前往中国”。[②]周恩来访苏后，中国与苏联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已经成为事实。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后来的分析报告所说：这“标志着又一个重要时代的到来——朝鲜战争的‘胜利’已有所预示——并确定了毛作为唯一健在并能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模范领袖的地位”。[③]

客观地讲，周恩来的这次出访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其影响也并非都是正面的。哥穆尔卡不接受“以苏为首”的说法，在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上仍坚持己见；卡达尔没有得到匈牙利期望的经济援助；南斯拉夫拒绝参加共产党国际会议，不愿与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一致立场，这些都是事实，也是令周恩来感到遗憾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周恩来这次访苏对中苏关系也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在高喊“中苏团结”响亮口号的同时，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掩盖了他们在聆听周恩来“教诲”时不满和不安的心情。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他对周恩来说话的声调，感到“不大自在”，“有点冷丝丝的”。[④]对于中国人的这次坦率批评，赫鲁晓夫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59年10月中苏领导人发生争吵时终于爆发出来。[⑤]

问题的实质当然不在于赫鲁晓夫的个人修养不高，而是莫斯科感觉到一种来自北京的压力，感觉到中国地位的上升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权威的挑战和威胁。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子已经倒下了。即使中共明确提出了对斯大林评价的不同看法，在中国仍然彻底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况是，《斯大林全集》在1953年10月出版第一卷时，发行66818册，而到1956年12月出版第六卷时，只卖出6849册，下降了差不多十分之九。[⑥]其必然结果，一方面是苏联在共产党世界领导地位的动摇，一方面是人们

---

① 苏联驻华使馆向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提交的情报资料（1957年1月5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5，оп.28，п.122，д.485，л.19-49。

② 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6月7日），ЦХСД，ф.5，оп.49，д.41，р.8862，л.16-17。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2838–2839页。

③ 中央情报局国际共产主义高级研究组的报告（1960年12月），1961年2月17日，CIA/SRS-15，FOIA，pp.1-33。

④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268–2269页。

⑤ *Зубок 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с.94-106.

⑥ 上海市档案馆，A22-2-555，第47–53张。

在期盼出现新的领导者，而此时中共形象和影响的凸显，自然会引起莫斯科的注意。还在周恩来出访之前，苏联使馆在一份情报资料中就指出，八大以后，中国有“一股公开自大和民族主义的潮流”，并列举了如下一些“看来不是个别的”言论：“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相比，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更有才智更为正确”；“从现在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转移到中国共产党手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①] 周恩来出访后，连匈牙利的党史研究人员也认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领导曾由德国转到俄国－苏联，现在已转到中国了”，中国在“革命实践中解决了许多新的问题，阐明、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②] 这不能不引起克里姆林宫的警惕和不安。

世界革命和国际共运开始出现了两个平行的领导中心，这种新的领导机制，不仅构成了周恩来外交得以成功的前提，而且还在这次访问后得到加强，直到毛泽东年底出席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时达到了顶峰。然而，“天无二日”，在很大程度上，也恰恰是这种新领导机制的出现，悄悄地埋下了中苏同盟分裂的种子。

发表于《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6 辑，2008 年夏季号

① 苏联驻华使馆向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提交的情报资料（1957 年 1 月 5 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22，д.485，л.19-49。

②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 年 3 月 11 日，第 2149 期，第 179–180 页。

附录

关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俄国档案文献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与此同时，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形成的新的领导核心重新审查对外政策，确定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自身实力的方针。在这一过程中，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领导人，主张对华采取积极援助的路线和政策。此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掌握了克里姆林宫的最高权力，苏联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华经济援助的力度。

苏联的经济援助的方式包括增加低息贷款数额、扩大重点援建项目、积极发展双边贸易、出让中苏合股公司、无偿提供大量技术资料和文献、大规模派遣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大力培养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等等。应该说，正是由于苏联提供了全面的、系统的经济援助，一个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才得以在短短几年之内建立起国家工业化的基础。然而，受到中苏领导人之间政治分歧的影响，50年代末苏联对华援助开始收缩，直至1960年8月全面撤退专家，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中苏分裂从此愈演愈烈。

有关苏联对华援助的中方历史文献和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编写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中已有大量披露，对于学者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我们在收集和整理俄国历史档案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当年苏联方面的档案文献，其中包括党和政府的决议，有关部门的报告，苏联使馆的通报，以及中苏之间的往来函电等等。这里选编了其中的部分文献，希望有助于学者的研究和考察。

这些原始档案均直接或间接（经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复印自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和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原档案馆藏号附于文献之后（复印时个别馆藏号有缺失）。这批档案复印件现保存在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和东方历史学会，供学者自由查阅。为了便于阅读，编者在校对时对译文做了必要的注释和说明。

这组档案文献由沈志华收集和整理，王英杰、吕允连、杨世招、沈志华翻译，沈志华、方琼校对和编辑。

沈志华

2002年2月

文件 01

库尔久科夫关于苏联代表团访华有关事宜给维辛斯基的请示

（1954年8月5日）

机密　第1号

1954年8月5日

远东司，第1211号

加盖的印章有：库兹涅佐夫、维辛斯基、葛罗米柯、佐林

致安·亚·维辛斯基同志：

鉴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行将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祝活动，远东司认为：在苏联代表团在华逗留期间，委托它进行以下活动是适宜的：

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①]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给中国并从那里[②]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

众所周知，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应于1952年底完全交给中国所有。1952年9月，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在远东形成的紧张局势（朝鲜战争），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将共同利用旅顺海军基地

① 原文件中此句被划掉，用手笔改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

② 原文件中“从那里”一词被划掉。

的时间延长至中日和苏日缔结和约时为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2 年 9 月 15–20 日致苏联政府的照会）。双方交换照会并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

远东司认为，在当前已经变化的形势下，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中国领土上，留在旅顺港地区，对我们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在苏联军事和技术援助下，中国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保证海军基地的健全和运营的。至于在非常局势下，苏联使用旅顺港基地的问题，可以与中国政府就此问题缔结单独的协定。

二、由苏联大使馆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的问题。应该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情。

三、关于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问题。该协定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四、与中国政府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苏中混合股份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金属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

如您同意，远东司将起草相应的提案报上级机关批准。

请您指示。

И. 库尔久科夫

（文件上有如下批示，按先后顺序）

致葛罗米柯、佐林同志：

我认为第一条很值得怀疑。你们的意见如何呢？

A. 库兹涅佐夫，8 月 5 日

我认为第一条不能接受。其余建议值得研究。

安・葛罗米柯，8 月 5 日

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

佐林，8 月 10 日

葛罗米柯同志：

应该开始认真筹备参加庆祝活动的事情了：外交部派谁参加代表团、访问计划、问题、提纲。请远东司提出建议。

库兹涅佐夫，8 月 11 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7, п.383, пор.40, л.4-5

文件 02

关于苏中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草案）

（1954年10月12日）

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苏中两国科学技术合作问题先后在莫斯科和北京举行了谈判。谈判是在友好和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最后于10月　日在北京签署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根据苏联政府授权，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贸部长 А.И. 米高扬同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代表中国签字的是 ______。按照协定，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科学技术领域，通过交换相应信息以及工农业生产部门的经验，以促进合作的发展。

为制定实施合作的措施和给双方政府提出有关建议，成立了苏中委员会，委员由苏联和中国各派7人组成。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依次在莫斯科和北京召开。

为保障双方在科学技术合作问题上保持经常的和直接的联系，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相应地在北京和莫斯科派一名它们任命的委员会成员。

该协定的期限为5年。如果在这一期限到达之前一年内，双方均未宣布希望该协定终结，那么该协定将再延长5年。

苏联政府方面任命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委员：苏联地质和矿藏保护部第一副部长 Н.М. 西卢亚诺夫同志，苏联建设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В.И. 奥夫相金同志，苏联国家计委机械制造局副局长 Н.Н.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苏联食品工业部技术委员会主任 А.Л. 马尔琴科同志，苏联日用工业品部技术管理局局长 П.Г. 特列季亚科夫同志，苏联农业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А.Н. 阿斯科琴斯基同志，苏联驻华贸易代表 В.П. 米古诺夫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任命的代表是 ________。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签署是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密切的合作事业的新的重要贡献，其目的是相互帮助和达到共同经济繁荣。

文件 03

伊万年科关于在中国的苏中股份公司情况的调查报告

（1954 年 12 月 11 日）

一、“苏中金属”股份公司

“苏中金属股份公司是根据 1950 年 3 月 27 日的苏中协议，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地区普查、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而成立的。

上述协议规定“苏中金属”股份公司的股份资本为 2800 万卢布，双方股份额均等。

苏方作为公司资本投入的有房屋、建筑物、设备、运输工具、地质勘探工作的费用、材料及其他商品物质价值，总计 1400 万卢布。

中方作为公司资本投入的有新疆地区为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所必须的土地地段以及工业设施和任务所必须的建筑材料，总值为 1400 万卢布。

根据苏联和中国政府交换的照会，公司的股份资本增加到 10000 万卢布，每一方的资本为 5000 万卢布。

截至 1954 年 4 月 1 日的股份资本额为：（单位：千卢布）

	苏方	中方	总计
总计	50774	49936	100710
其中			
1）已办手续的投入资本			
房屋与建筑物	3217	—	3217
设备和材料	31731	—	31731
地质勘探工作	1640	—	1640
现金	2047	22845	24892
航空地质和航空摄影工作	7203	—	7203
运输服务	203	—	203
设计工作	650	—	650
总计	46711	22845	69556

2）未办手续的投入资本			
设备和材料	4063	—	4063
土地地段和建筑材料	—	14000	14000
建筑工作	—	13091	13091
总计	4063	27091	21154

产量

公司经营期间每年的产品产量如下：

产品名称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一、1951 年计划不变价格的总产值（千卢布）	15014.6	25894.8	38831.3	48051
二、产量（吨）				
1. 绿柱石 10% 精矿	873	1004	1204	1300
2. 锂辉石 4% 精矿	1905	3155	3863	5000
3. 钽 – 铌精矿	0.98	4.1	6.5	5.0
4. 铅 50% 精矿	—	—	—	9000
5. 锌 50% 精矿	—	—	—	5000
6. 云母 – 工业半成品	19	205	122	1000
7. 含铅 15% 的铅 – 锌矿石[①]	2100	10300	18700	—

成立公司的协议约定，向苏方提供按世界市场价格购买公司的 50% 产品的权利。在向中方购买其份额的产品并运往苏联时，这些产品应根据中国的法律缴纳出口税。

在公司的各企业中共有 8921 人，其中进行生产活动的有 5970 人，进行基本建设的有 691 人，进行地质勘探工作的有 1750 人。在公司工作的苏方人员共计 400 人。

基本费用

公司在 3 年内的基本费用如下：（单位：千卢布）

① 此处复印件字迹不清，系判译。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三年总计和 1954 年的计划总支出	55544.4	6814	17167.4	31563	40837
1）地质勘探工作	17037.8	2038.6	6517.2	8482	14400
2）工业建设	26023.8	2519.8	4786.2	18717.8	9867.8
3）住宅建设	7503.4	1519.8	3381.4	2530.2	4876.8
4）公用事业和文化生活建设	4193	561	1799	1833	4358.6
5）建设采矿石油中等技术学校	—	—	—	—	6975.6

从上面列出的表格可以看出，三年内用在工业建设上的费用仅为 26023.8 千卢布，或者说占总费用的 47.3%。

原料基地和生产前景

公司主要有两类企业：开采稀有金属矿床、生产（绿柱石、锂辉石、钽铌）精矿和云母 - 半成品的企业，以及生产铅和锌精矿的企业。

根据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弗拉索夫同志的鉴定意见，公司的绿柱石和锂辉石矿床是世界上最大的矿床之一，并且有很大的工业价值。铅和锌矿床虽然也富含金属矿石，但它缺乏巨大的……[①]

截至 1954 年 4 月 1 日，按 A-B-C-C 类计算，矿物的可采储量分别为：

绿柱石	14.6 千吨
锂辉石	154.1 千吨
云母 - 工业半成品	933 吨
铅	126.6 千吨
锌	173.8 千吨

已采矿床的勘察储量使我们可以根据它来计划今后几年的最低生产量，具体如下表：

① 此处原文复印件缺一行。

	1954 年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按 1951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千卢布）	48051	48700	55600	64600
生产量（吨）：				
1. 绿柱石精矿	1300	1400	1550	1700
2. 锂辉石精矿	5000	6000	8000	1000
3. 钽－铌精矿	5.0	6.0	7.0	8.0
4. 铅矿 50%	6900	6900	7500	7500
5. 锌矿 45%	5000	3700	4000	400
6. 云母－工业半成品	100	100	—	—

为使产量达到上述规模，公司必须补充基建投资额 22480 万卢布，其中各年度分别为：

	十亿元	百万卢布
1954 年	204.2	40.8
1955 年	352.0	70.4
1956 年	318	63.6
1957 年	250	50.0

成本及出厂价格

每吨产品的商业成本如下：（卢布／吨）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精矿			
1. 绿柱石 10%	11481	13472	13469
2. 锂辉石 4%	800	1417	1385
3. 钽－铌	248800	247800	287700
4. [①]			
5. 锌 45%	—	—	731
6. 云母－工业半成品	3902	11309	10924
7. 含铅 15% 的铅－锌矿石	250.3	250.6	—

① 此处原文复印件缺一行。

上述成本中未包括苏方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用。1953 年这一费用为 719 万卢布，其中用外币支付 334.5 万卢布，用苏联货币支付 384.5 万卢布；1954 年第一季度这一费用为 159.1 万卢布，其中用外币支付 91.9 万卢布，用苏联货币支付 67.2 万卢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公司的产品成本逐年增加。之所以成本增加，主要是由于缴纳了公司产品流转税、冲销地质勘探工作费用的数额增加、矿石中金属含量减少（1951 和 1952 年末征收流转税，1953 年缴纳流转税款 184.2 万卢布，按 1954 年计划，将缴纳 190.4 万卢布；地质勘探工作费用 1953 年冲销产品成本 150 万卢布，而 1954 年计划冲销 340 万卢布；绿柱石矿石含量降低一半，1951 年为 0.63%，1952 年为 0.38%，1953 年为 0.32%）。

公司产品的出厂价格根据贸易协定的价格确定，这一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并显著低于成本，具体数额如下：（卢布／吨）[①]

产品名称	1954 年计划成本	世界市场参考价	公司的出厂价	苏联工业部门出厂价
绿柱石 10% 精矿	13469	2496	7000	2000
锂辉石 4% 精矿	1865	517	1487	2800
钽 – 铌精矿	367700	40171	60000	4451479
云母 – 半成品	10984	—	1810	16078
铅 50% 精矿	915	585	535	2450
锌 45% 精矿	780	394	412	518

在目前的产品成本和现行的出厂价格情况下，公司经营是亏本好。1953 年公司亏损的数额达 686.8 万卢布，主要是由于自 1953 年 9 月 1 日起提高了人民币对卢布的比价。人民币对卢布的比价提高了 26%，因为对所销售的产品，苏联外贸部全苏联合公司不用人民币支付，于是在稳定出厂价的情况之下，公司对 1953 年销售的产品就少收了相当于 527 万卢布的人民币。这样一来，由于提高人民币对卢布的比价，以人民币计算的出厂价实际上是降低了 26%。1954 年销售产品的亏损额增加到 1446.7 卢布，其中苏方亏损为 723.3 万卢布，而考虑到给苏方工作人员的补助工资，苏方 1954 年的总亏损额为 1442.3 万卢布。

公司目前具有可靠的原料基地和继续发展生产的美好前景。过去的几年内建立了生产绿柱石、锂辉石、钽 – 铌、铅和锌精矿的采矿工业企业。这些年，公司培训

① 此表最右边一项复印件缺项。

了当地的工人干部，并挑选了一些必需的苏联工作干部。

二、“苏中石油”股份公司

“苏中石油”股份公司是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1950 年 3 月 27 日的协议组建的。

最初的股份资本数额规定为 4600 万卢布，后来根据换文增加到 20000 万卢布。

根据初步估算，双方各年度投入资金如下：(单位：千卢布)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	总计
双方共投入	47906	65347	78026	18246	209525
其中：					
苏方	24906	33579	38343	8681	105509
中方	23000	31768	39683	9565	104011

投入资金的构成如下：

	总计	苏方	中方
1. 土地地段	13500	—	13500
2. 房产	18747	—	18747
3. 设备和材料	187776	92748	65088
4. 航空地质工作	10968	10968	—

……[①] 产品，其加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地区。

各年度钻探和地质勘查工作的发展情况见以下数据：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钻探总计（千米）	8.5	26.1	34.5	42.0
其中勘查钻探（千米）	5.8	9.3	19.9	30.0
生产钻探（千米）	2.7	17.8	14.9	12.0
结构钻探（千米）	6.2	2.8	8.4	6.0
物理探矿工作（千平方米）	8.0	26.6	48.8	63.7

① 此处原文复印件缺一行。

由于进行了上述地质勘探工作，业已查明以下可供深层勘查钻探的良好结构：安集海、霍尔果斯、南捷克斯京、科桑－托凯、克拉玛依、瓦拉－托：现正在安集海、霍尔果斯、科桑－托凯等结构上进行深层勘查钻探。

位于开采区内的独山子矿床第三级采矿层 1954 年 1 月 1 日的石油工业储量为 A2-B 级，580 万吨。

目前正在进行侏罗纪和白垩纪更深采矿层的工业含油量的调查工作。

1953 年的石油开采量为 70200 吨，而 1951 年仅开采 3500 吨。

石油开采和加工量的增长情况、轻柴油产品产量及各年的石油总产量见下表：（原文不清，表中数据欠准确——译注。）

名称	计量单位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石油开采	千吨	2.5	52.1	70.2	75.0
石油加工	千吨	2.5	52.0	70.1	75.0
石油产品加工：					
汽油	千吨	0.6	11.5	20.4	33.3
煤油	千吨	0.6	1.6	3.9	7.5
柴油	千吨	0.3	3.5	17.5	18.0

全部开采的石油均送到公司的石油加工厂进行加工，而石油产品则通过新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组织在中国国内销售。

1954 年新疆的石油产品需求量如下：（单位：千吨）

	需求量	供给渠道	
		“苏中石油”股份公司	由苏联进口
汽油	47.5	33.0	14.5
煤油	7.0	7.0	—
柴油	20.3	18.0	2.3

“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生产的石油产品的出厂价格和苏联石油出口联合公司供给新疆的石油产品的出口价格见下表：（单位：卢布）

	1953 年每吨的商业成本	新疆的每吨现行出厂价	折合为新疆内部价格的出口价格（独山子交货）
汽油	481.1	556.8	494.58
煤油	240.5	278.4	645.30
柴油	200.5	231.6	631.86

上述的石油产品商业成本并不反映实际状况，因为其中未包括由苏联预算向苏联工作人员支付的补充工资以及没有把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计算在内。

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分别在 4 年内注销，并且查明“苏中石油”股份公司花在探查钻探无效部分上的费用为全部探查钻探费用的 30%，而当时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这一费用却分别计划为 45% 和 75%。

如果将补发苏联工作人员工资的费用及完全抵销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列入预算，则石油产品的成本增加 26%，这时实际出厂价便低于商业成本。

1951–1954 年基建费用的总额达 25482.3 万卢布。

各年度的基建费用额及其用途如下：（单位：千卢布）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总计
基建费用总额	30166	73094	81073	70490	254823
其中：					
探查钻探	2914	9043	20611	27410	59978
生产钻探	1733	7308	9616	6500	25057
地质勘探工作	817	13162	8175	6500	28654
工业建设	24162	40120	35162	24260	123704
其中：					
石油加工厂	—	7200	10515	1889	19604
住宅建设	540	2878	4509	5920	13847

上述期间，基建费用的财政拨款来源是双方同等投入的股份资本和折旧扣除款，二者在总费用数额中的比重分别为 91.2% 和 8.8%。

由于所进行的各种工作，公司已经建立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足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的石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独山子石油区建造了年产 15 万吨石油的气压管道和裂化设备，建设了总功率为 1500 千瓦的发电站 3 座，修建了装有 39 台机床的维修机械厂、可保存 1.4 万立方米石油和石油产品的油罐、年工作量为 2.5 万米的修理钻探管的管道基地、奎屯河上的进水装置、粘土厂、重晶石再生和粉碎厂，以及建设了总面积为 1.3 万平方米的住房。

为了减少从苏联运送重晶石，"苏中金属" 股份公司在伊宁布地区组织了对当地的重晶石矿床的开采。

由于公司经营的结果，公司获得如下的利润：(单位：千卢布)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总计
总利润	520.0	664.0	2395.0	1644.0	5223.0
苏联股份的红利	187.0	239.0	862.0	529.0	1880.0

各年度苏方投资的效率如下：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	总计
苏联投资的红利利率	0.75	0.41	0.78	0.56	……①

应当指出，公司生产成果和投资效率，是计入了苏方提供的补充工资及全冲销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后得出的费用支出统计结果而确定的。这一支出费用的数额可从下表看出：(单位：千卢布)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9 年（计划）
苏方工作人员的补充工资	654.0	2608.0	3874.0	4108.0
地质探查工作和无效探查钻探的费用总额	3000.0	7713.0	4342.0	2431.0
未考虑到的费用总计	3654.0	10321.0	8216.0	6539.0

从上表可以看出，仅仅补发苏联工作人员工资一项就显著提高了苏方得到的利润。

① 此处原文复印件缺字。

截至 1954 年 7 月 15 日，公司共有工作人员 5603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401 人。苏联工作人员的数量为 403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 265 人。1955 年计划全体工作人员达到 6841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 496 人。全体工作人员中，苏联工作人员为 357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 255 人。

根据已提出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1955–1957 年间的工作量如下：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钻探，总计（单位：千米）	75.0	90.0	100.0
其中：			
探查钻探（单位：千米）	50.0	60.0	70.0
生产钻探（单位：千米）	25.0	30.0	30.0
开采石油（单位：千吨）	100.0	125.0	150.0
加工石油（单位：千吨）	100.0	125.0	150.0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这一决议草案，1955–1957 年的基建费用总额双方投资额及利润规定如下：(单位：百万卢布)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基建费用	95.0	98.0	114.0
双方投资	53.0	51.0	60.0
总利润	2.520	3.000	—
苏联红利份额	0.907	1.080	—
苏联投资的红利利率	0.65	0.65	—①

根据石油开采和加工的预计增长情况，1955–1957 年可以满足新疆石油产品的如下需求量：(单位：千吨)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加工量	需求量	加工量	需求量	加工量	需求量
汽油	40	52.7	50	27.5	60	—
煤油	11.5	11.0	12.5	13.5	15.0	—
柴油	20.2	18.0	25.0	22.5	30.0	—①

① 以上三项复印件缺字。

因此，新疆所需的煤油和柴油完全可以满足，而1956–1957年的汽油加工量也接近这一产品的需求量。

“苏中石油”公司已建立起物质技术基地，足以保证今后五年（1955–1957年）进一步发展石油的钻探、开采和加工。

公司已拥有进行当前生产活动和培训进一步发展生产所需当地干部的一批苏联和当地的骨干。

虽然在新疆石油的工业储量目前还不太多，“苏中石油”公司有能力查明并投入，开采当地的矿床，从而准备好相当多的有利于深层探查钻探的地质结构，开采独山子矿床……[②]和新的前景可观的开采层。

三、“苏中造船”股份公司

“苏中造船”股份公司是根据1951年7月28日两国政府间的协议成立的。

协议规定，公司成立的目的是建设和修理海船及其他水上工具。

根据1951年7月28日的协议，中国政府将大连市的“大连船坞”造船修船厂作为公司的财产（确定其价值为4660万卢布）并作为公司的股份资本投入该公司。公司股份资本的一半由中方投入，另一半由苏方投入。苏方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里奥托－塔马瑙拉”（Риото-Таманаура）水道应得的1000万卢布通过转账投入自己的股份资本，此外还通过转账从划拨账户上支付现金1300万卢布作为股份资本。

公司1952年的生产计划额定为4960万卢布，完成了94%。1952年总共生产了54艘非自行船只，总载重量为11000吨，经大修、中修、小修的船只共18艘，完成了中方数额为180万卢布的定货。

1953年“苏中造船”股份分司工厂的计划数额为5000万卢布，完成了105.6%。出厂了19艘船只，总载重量为10000吨，修好船只14艘，完成了中方数额为3200万卢布的定货。

1954年的计划生产额为6200万卢布，其中苏方为5000万卢布，中方为1200万卢布。

截至7月1日公司总共有：

---

① 以上三项复印件缺字。

② 此处原文字迹不清。

生产工作人员	8000 人
工程技术人员	900 人
职员	500 人

公司经过自己的经营获得利润：

公司中有苏联专家 78 人。

1952 年	3320 卢布
1953 年	9850 千卢布
1954 年计划	7615 千卢布

在 1954 年苏中两国股东谈判期间，根据中方的申请，确定中方 1955 年的产品生产计划总额为 1800–2000 万卢布。这一计划规定建设 20 艘运输鱼类的驳船。中方已经交出建造驳船的定货单。因此，为了完成苏联定货单的各项计划，1955 年公司仍保持 1953–1954 年的生产规模。

在苏中两国股东谈判期间，中方同意签订苏联机构根据苏中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进行扩建和改建企业的设计工作的协议。

目前由 6 人组成的苏联海运河运部设计单位的设计工程工作队的组建工作已经完成，近日即可来大连市进行工厂设计任务和总体计划的制定工作。

四、“苏中民航”股份公司

“苏中民航”股份公司是根据 1950 年 3 月 27 日苏中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建立的。

公司完成中国和苏联领土上的下述民航空中航线的经营活动：

1. 北京 – 伊尔库茨克直达运输，经蒙古人民共和国。

2. 北京 – 沈阳 – 赤塔

3. 北京 – 乌鲁木齐 – 阿拉木图。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52 年 12 月 17 日决议，开辟了乌鲁木齐至喀什的新的空中航线，该航线于 1953 年底投入运营。另一条空中航线：乌鲁木齐 – 兰州正在建立之中，将于 1954 年底投入运营。

公司的股份资本确定为 4200 万卢布，每一方均为 2100 万卢布。

截至 1953 年 3 月 19 日，公司苏方的股份资本 2100 万卢布已经完全投入，其中包括所用飞机发动机及其他设备的折款，以及原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和航空设备公司的法定资本中苏方份额计 360 万卢布，还有现金 240 万卢布。苏方的所有上述投入均已评估并拟定了相应的文件。

截至 1954 年 4 月 13 日，中方投入公司的股份资本为 1691.3 万卢布。为抵偿这一数额，中方向公司转交了飞机场、房屋、建筑物及其他财产，以及现金 240 万卢布和原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和航空设备公司的股份资本 360 万卢布。中方剩下的欠款 408.65 万卢布由中方以人民币现金支付。

自 1950 年 7 月 1 日至 195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运营期间，公司共获利 29401013859 元人民币。

扣除应缴各种税款后拟分给双方的利润部分在双方之间分配，划拨给苏方 11426410026 元人民币，折合 228.5 万卢布。

拟划拨给中方的利润份额（包括各种税款）共计 308.22 万卢布，已按中方的意见拨出。

根据决算，1954 年第一季度“苏中民航”经营中共获利 240.8 万元人民币，折合 48.16 万卢布。

1954 年公司员工总数为 896 人，其中苏方 236 人，中方 660 人。开辟了两条新空中航线：乌鲁木齐－喀什，乌鲁木齐－沙拉－苏麦。

随着对中国公民中的专业人员的培训，公司中的苏方员工逐渐减少，他们将被公司所培养的中国干部取代。

截至 1953 年底，公司在经营期间总共从中国公民中培训出 244 名专业人员，其中：

17 名航空站副站长

6 名航空技术员

77 名航空机械员

2 名飞机无线电电气灯光设备和仪器机械员

17 名无线电技术员

16 名无线电机械员

36 名无线电测向员

53 名无线电操作员

6 名无线电台发动机工

4名蓄热室工

所培训出的部分航空机械员和无线电专业人员后来被调到中国民航工作，因为中国民航感到干部不足。

根据1954年的计划，公司应在不脱产的情况下培训65名中国同志，其专业如下：

无线电技术员	10人
航空技术员	10人
无线电测向员	10人
无线电操作员	10人
无线电机械员	10人
航空机械员	15人

公司正在从中国公民中培训10名驾驶员，到1954年底他们将取代10名苏联驾驶员，后者将被派回苏联。

1954年还将替换11名苏联医士。

1955年拟通过开辟包括中国工业地区在内的新航线的办法扩大公司的经营活动，并将把中国民航的某些航线转交给“苏中民航”公司经营，因为中国民航由于缺少干部和经验，不能胜任这些航线的运输服务方面的工作任务。

伊万年科

АВПРФ, ф.0100, оп.47, п.384, пор.53

文件 04

苏联外交部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事宜给尤金的信

（1954年12月27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

鉴于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部长会议于1954年11月25日通过了《关于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苏联专家和关于另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企业学习的决议》：

一、满足中国政府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额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工厂生产实习的请求（附件 1、2、3、4）。

二、责成苏联一批工业部为总供货人，必须完成企业设计工作，在企业建设（设计检查和咨询）、安装、调试和投入生产中提供设备、电缆制品和技术援助（附件 1 和 2）。

三、附件 1 和 2 中所指企业的能源供应由中国方面保证。

在弄清一些企业所需电站的情况下，为这些电站的建设提供援助的问题由双方另行研究。

四、交通建设部和交通部必须于 1955 年第一季度给中国派出专家－设计师和建设者（附件 3）。

五、发电站部必须在 1955 年第一季度为中国派去 13 人的专家小组，期限为一年，帮助中国进行长江水利资源勘察和测算。其中包括农业部专家工人，河运部专家工人，地质部、科学院、测绘总局各 1 名专家。

六、建设部和冶金和化学企业建设部必须在 1955 年上半年向中国各派出 11 名专家，期限为 2 年，根据双方达成的专业范围，为中国 11 个托拉斯的建设提供技术援助。

七、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必须按照附件 4 规定的专业，在 1955 年第一季度为中国派去顾问，帮助制定北京市的总计划。

第四、五、六点规定的专家出差，按苏中 1950 年 10 月 25 日的协定条件执行；而第七点规定的顾问出差按 1950 年 3 月 27 日协定规定的条件执行。

八、黑色冶金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对鞍山冶金联合企业轧钢设备的使用能力进行鉴定，意在帮助中国方面确定联合企业整个冶炼周期的设计能力；务必在 1955 年 7 月 1 日前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建议。

九、对苏联部长会议 1953 年 6 月 23 日的决议作部分变动。苏联黑色冶金部必须预先考虑在中国一个冶金厂生产 T-54 坦克装甲板的能力，最迟在 1955 年 5 月前将这一问题的决定报告苏联部长会议。

十、航空工业部和煤炭工业部不再承担帮助中国建设 шл-18[①] 飞机修理厂的工作。遵照苏联部长会议 1953 年 6 月 23 日和 1954 年 7 月 31 日命令……[②]

十一、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除按 1953 年 5 月 15 日协定规定的数额外，每年

① 此处复印件不清。

② 此处复印件缺字。

额外接收2000名中国技工来苏联工厂进行生产实习。

十二、受托培养（训练）外国工人和专家的苏联各部和机关，必须提高培养外国工人和专家的水平，以技能娴熟的人员保证通过同订货人协商所确定的课程（作业）。在能保障学员正常生活和学习的地区挑选一批先进的企业作为培训地点。

培训外国工人和专家的企业名单应征得外贸部的同意。

十三、委托对外贸易部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同其他工业部协商，确定苏联企业接收和训练外国工人和专家的程序训令。

允许对外贸易部，经过同其他有关部协商，在外国订货人请求的情况下，可延长外国工人和专家的训练时间，延长期限可到半年。

十四、鉴于中国政府的申请，允许车床制造和工具工业部把苏联部长会议1953年7月23日规定的工作期限延长1年，提供设备的期限延长2年。

十五、委托国防部、造船工业部、运输机械制造部、重型机械制造部确定，本决议2号附件中所提起的工厂……[①] 并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把自己关于把这些型号武器的许可证交给中国方面的提案提交苏联部长会议。

十六、建设部、化学工业部、电站部必须根据造船工业部的任务，如期完成造船厂和鱼雷生产厂的建筑、卫生设施、交通和电力部分的设计任务（苏联建设部）以及设计方案的特别部分，以便及时搞出上述工厂的配套设计。

十七、石油工业部必须在1955年第一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就地了解现行炼油厂的状况，并同中国方面一起弄清同炼油厂改造有关的问题。

在上述专家回来之后，苏联对外贸易部和石油工业部在一个月的期限内，就帮助中国改造炼油厂以从油母页岩中提炼人造液体燃料的问题同中国举行谈判并给部长会议提出提案。

十八、苏中1953年5月15日协定和部长会议1953年6月23日决议所规定的原则适用于为总供货人的各部以及在建设附件1和附件2所列企业中与完成相应设计勘察工作、提供设备和技术服务有关的部。

十九、委托对外贸易部同中国政府按照本决议签署援助中国议定书，规定按照现行的贸易协定条件实施对中国的援助。

在补充协定书中还规定，由于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生产驱逐舰和潜水艇的工厂，苏联所承担的军舰建造厂的设计任务（1953年5月15日协定备忘录）自行消失。

---

① 此处复印件漏印一行。

以上谨向您通报。

附：上述附件，共 13 页。

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委员费德林

附件 1

由苏联援助建设的中国企业清单

名称	履行的期限
总供货人——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	
齐齐哈尔市特种钢厂（第二批）	
该厂的生产能力可达到每年 30–35 万吨	
在编制课题和收集原始资料方面给予技术帮助	1955 年第 3 季度
设计资料	1956 年第 2 季度
工厂车间的技术方案	1957 年
施工图纸	1958 年
供应设备	1957–1959 年
总供货人——苏联有色金属工业部	
东川有色金属联合企业（云南省）	
开采和加工铜矿	
设计工作	1955 年第 4 季度
会泽有色金属联合企业	
（云南省）开采和加工铅锌矿	
设计工作	1956 年上半年
设计实验装置、加工被氧化过的铅锌矿	1956 年下半年
供应实验安装设备	1957 年上半年
在进行试验工作中给予技术援助	根据双方协商的期限
1. 为在指定的期限内进行设计工作，总定货人在 1955 年第 1 季度向总供货人提交具有代表性的铜和铅锌矿样品以及关于这些样品的必要的技术资料。	

名称	履行的期限
2. 在完成设计工作并获得总购货人对截至 1956 年 1 月 1 日工业类矿石储备进行统计确定的材料之后，将讨论有色金属联合企业的生产能力、组成以及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期限的问题。	
总供货人——苏联煤炭工业部 抚顺煤矿联合企业东部采矿场 开采油页岩，每年产量为 300–400 万吨，（一级）有可能扩大产量达：每年 600–800 万吨油页岩。 收集设计工作用原始资料 设计课题 技术方案 施工图纸 设备供应 ……[①] 在制定任务和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方面给予技术援助 设计任务 技术方案 施工图纸 设备供应	 1955 年第 1 季度 1955 年第 4 季度 1956 年第 4 季度 1957 年 1958–1959 年 1955 年第 1 季度 1956 年第 2 季度 1956 年第 4 季度 1957 年 1958–1959 年
总供货人——汽车、拖拉机和农用机械制造部 生产小功率拖拉机的工厂 年功率为 20000 的拖拉机 在选择场地方面进行协商、在制定任务和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方面给予技术援助 设计任务 技术方案 施工图纸 设备供应 在研究制定设计任务时确定拖拉机的型号	 1955 年第 2 季度 1956 年第 2 季度 1957 年上半年 1957 年第 2 季度 –1958 年 1958–1960 年

名称	履行的期限
总供货人——[1]	
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对制定的设计任务进行研究	1955 年上半年
设计任务	1956 年第 4 季度
在收集原始资料和对技术方案进行研究方面给予技术援助	1957 年
技术方案	1958 年第 2 季度
施工图纸	自 1957 年开始，接下来按照与中方协商好的工作进度表执行
供应设备	1958–1962 年
总供货人——电力技术工业部	
船舶用电力机械生产车间	
附带操纵装置的年生产率达 100000 千瓦特	
协商选择场地、在制定任务和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1955 年第 2–3 季度
设计任务	1956 年第 1 季度
技术方案	1956 年第 4 季度
施工图纸	1957 年
设备供应	1957–1958 年
在制定设计任务时将明确关于是在哈尔滨还是上海电力机械制造厂建设这些车间的问题	
备注：……[2]	

① 此处一段复印文件字迹不清。

② 此处一段复印文件字迹不清。

附件 2

由苏联援建的中国国防工业企业清单

名称	履行的期限
总供货人——船舶制造工业部	
渤海船舶制造厂	
年生产能力为 8 艘驱逐舰和 12 艘潜艇	
规定备用场地用以扩建工厂、在制定任务和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1955 年第 2 季度
设计任务	1956 年第 1 季度
技术方案	1957 年第 1 季度
施工图纸	1957–1958 年
设备供应	1957–1959 年
生产鱼雷的工厂	
年生产能力是 1200 枚	
协商选择场地、在制定任务和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1955 年第 2 季度
设计任务	1955 年第 4 季度
技术方案	1956 年第 2 季度
施工图纸	1957 年
设备供应	1957–1959 年上半年
总供货人——高速柴油机工厂	
协商选择场地、在制定任务和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1955 年第 2 季度
设计任务	1955 年第 4 季度
技术方案	1956 年第 3 季度
施工图纸	1957 年
设备供应	1957–1958 年

名称	履行的期限
总供货人——重型机械制造部	
年生产能力为 320000 马力的中速柴油机工厂	
同时考虑到扩大生产内燃机车用柴油机	
协商选择场地、在制定任务和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1955 年第 2 季度
设计任务	1956 年第 1 季度
技术方案	1957 年第 1 季度
施工图纸	1957–1958 年
设备供应	1957–1959 年
总供货人——航空工业部	
生产飞机用轮胎的工厂	
（该工厂的生产能力可确保 2 家飞机制造厂的计划需求和 5 家飞机修理厂的需求）	
协商选择场地、在制定任务和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1955 年第 2 季度
设计任务	1955 年第 3 季度
施工图纸	1955–1957 年第 2 季度
设备供应	1957–1958 年
伊尔 -28 喷气式飞机修理厂	
年生产能力为 150 架飞机（在设计该工厂时，应该考虑到以后能够使工厂从维修转入生产喷气式轰炸机）	
协商选择场地、在制定任务和收集设计用原始资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1955 年第 1 季度
设计任务	1955 年第 3 季度
施工图纸	1955–1957 年第 2 季度
用于维修飞机的设备供应	1957–1958 年
附注：	
1. 在制定设计任务时，确定上述企业的生产能力。	
2. 根据双方协商好的范围和日程表来提交施工图纸。	

附件 3

为帮助中国铁路建设 1955 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清单

为在中国铁路工程设计和建设方面给予技术援助，由运输建设部于 1955 年派往中国、期限为二年的专家的专业和人数清单：

工程名称	专业名称	专家人数
供应宝鸡－绵阳等地段的电力牵引综合设备	设计电力牵引综合设备的各类工程师	4
修建、扩展和改造 15 条铁路（北京、沈阳、郑州、武汉、兰州、西安、哈尔滨、天津等）	各枢纽站设计工作的总工程师	3
	各枢纽站设计工作的各类工程师	3
	设计编组场的工程师	1
	制定列车运行计划的工程师	1
	制定施工计划的工程师	1
	设计蒸汽机车和列车车厢的工程师	1
	设计编组场用设备的总工程师	1
在成都等各城市建设新的枕木防腐工厂	枕木防腐工厂防腐技术工艺工程师	1
长春－四平、沈阳－北京地段自动闭塞装置	设计各车站和区间站自动闭塞装置的各类工程师	1
	计算自动闭塞装置牵引功率的工程师	1
在长春、郑州和兰州等城市建设新的蒸汽机车修理厂	蒸汽机车修理厂综合设计总工程师	1
	蒸汽机车修理厂技术工艺设计工程师	1
建设新的铁路线：宝鸡－绵阳和成都－昆明	设计铁路路基的工程师	1
	设计人工设施的各类工程师	1
	工程地质方面的工程师	1
	设计隧道的工程师	1
	施工设计工程师	1
	综合设计工作总工程师	1
	考察工作总工程师	1
	地质考察工作总工程师	1
	大地测量和计算工作工程师	2
	铁路路基设计工作工程师	1
	人工设施设计工程师	1

	车站设计工程师	1
	设计供水和排水工程工作的工程师	1
	设计中心闭塞系统的工程师	1
	设计施工组织工作的工程师	1
	编制预算计划的工程师	1
	设计蒸汽机车和列车车厢的工程师	1
	综合设计总工程师	1
	考察工作总工程师	1
	考察工作总工程师－地质学家	1
	水文－地质工程师	1
	设计人工设施的工程师	1
	设计铁路路基的工程师	1
	设计车站的工程师	1
	设计蒸汽机车和列车车厢的工程师	1
	设计供水和排水工程工作工程师	1
	设计供电站的工程师	1
	设计通讯工程的工程师	1
	设计中心闭塞系统的工程师	1
	施工组织设计工作工程师	1
	制定预算计划的工程师	1
	设计隧道工程的工程师	1
	桥梁设计工程师	1
	铁路路基工程师	1
	各类岩石爆破工程的工程师	1
	组织施工设计的总工程师	1
	施工机械化工程师	1
总计		63

附件 4

为帮助北京城市建设规划 1955 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清单

为协助制定北京市城市建设总计划，由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于 1955 年派往中国、期限为 2 年的专业和专家人数清单：

专业名称	专家人数
城市设计工作专家	2
供水和排水系统工程专家	1
天然气供应工程专家	1
集中供暖工程专家	1
城市公共交通工程专家（汽车、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	1
工程设计方面的专家	1
建筑工程专家	1

АВПРФ, ф.0100, оп.47, п.384, пор.52，л.52-56，57-61，62-64，65-68，69

文件 05

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宜呈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提案

（1955年8月19日）

81/380-ГС

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原专家的提案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工作专家。

二、批准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指示草案（见附件）。

三、委托高教部接待中国方面2–3名代表，弄清帮助组织教学、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工作专家的性质。

四、提交主席团批准。

中央书记

附件：

苏共中央给苏联驻中国使馆的指示（草案）

苏联大使：

请您拜见何伟并通知他，有关苏联机关将提供援助，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培养和平利用原子弹方面的工作专家。

相应主管机关认为，中国政府派2–3名代表来莫斯科同苏联相应部门讨论这一问题是适宜的。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议（草案）
（1955年8月22日）

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弹专家的提案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和平利用原子弹方面的工作专家。

二、批准给苏联驻北京使馆的指示草案（见附件）。

三、委托高教部接待中国方面2–3名代表，弄清帮助组织教学、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工作专家的性质。

中央书记

ЦХСД, ф.4, оп.9, д.1347, р.571, л.121-123

文件 06

苏共中央主席团第142号会议记录摘录
（1955年8月22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致苏斯洛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外交部）、B. 库兹涅佐夫同志、叶留金同志、鲁缅采夫同志：苏共中央书记处

1955年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第142号会议记录摘录

苏联高教部关于在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援助的建议

（1955年8月19日第81号会议记录第380-rc条）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援助其在北京和兰州组建的高等院校里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

二、批准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指示草案（见附件）。

三、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接见2–3名中方的代表，以便弄清在组织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方面应给予的援助。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文件 07

苏共中央关于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的决定

（1956年4月16日）

一、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在苏联为中国培养科际干部，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118名中国专家进入研究生班学习，接收20名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

二、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三、兹通知，同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有关的费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中苏1952年8月9日的协定偿付。

四、此决议（草案）送主席团批准。

中央书记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1956年___）

关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科技干部事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在苏联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一、规定苏联科学院自1956年起，每年留出118个名额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入研究班学习，其专业同中国科学院协商确定。

二、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20名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

技能，期限为8个月–2年。

三、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的费用按照苏中1952年8月9日的协定进行偿付。

四、责成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在1956年7月1日前为苏联科学院提供150人的宿舍，临时安置中国公民——研究生和助理研究员，并于1957年8月1日之前按照同苏联科学院的合同为此目的建成400人的标准宿舍。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绝密（1956年4月20日）

关于在苏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科技干部事

一、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118名中国专家进入研究生班学习，接收20名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

二、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三、兹通知，同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有关的费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中苏1952年8月9日的协定偿付。

中央书记

ЦХСД, ф.4, оп.16, д.42, р.3273, л.28-31

文件 08

贾丕才关于供给中国一系列企业设备问题致尤金的电报

（1956年6月6日）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同志：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加快苏联援华项目的设计和设备提供，扩大援助范围，以及建设几个新的项目，苏联部长会议于1956年5月25日通过决议，规定：

一、缩短为以下苏联援华建筑项目——工厂和电站——完成设计和提供设备的期限：

重型机床厂；

“峰峰”中央选煤厂；

“双鸭山”中央选煤厂；

“滦县”中央选煤厂；

“武汉”热电站；

“西安1号”热电站；

“包头2号”热电站；

“太原2号”热电站；

“株州”热电站；

轴承厂；

拖拉机厂（洛阳市）；

重型机械制造厂；

锅炉生产厂（二期）；

汽轮机厂（二期）；

矿山机械设备厂；

炮镜厂；

高射炮和坦克炮制造厂；

雷管、点火装置生产装配厂；

硝化甘油火药、黄色炸药和黑色火药厂；

信管和引火装备厂；

炮管生产厂；

梯恩梯炸药和黑索金炸药厂；

单基无烟火药和发射药生产厂；

雷达生产厂；

复杂接收装置（收信机）生产厂；

无线电器件厂；

航空仪器厂；

飞机起落架生产厂；

探照灯和汽车灯制造厂，

水雷制造厂。

二、对以下企业扩大技术援助：

“抚顺”热电站——发电能力扩大2.5万千瓦；

“阜新”热电站——扩大5万千瓦；

“吉林”热电站——扩大5万千瓦（2×25000千瓦）；

“富拉尔基”热电站——扩大5万千瓦（2×25000）千瓦；

“本溪”热电站——扩大7.5万千瓦（3×25千千瓦）；

“成都”热电站——由3.6万千瓦扩大到5万千瓦（2×25千瓦）；

“包头”1号热电站——由10万千瓦扩大到22.4万千瓦；

抚顺市2号蒸溜岩厂热电站功率为5万千瓦；

“滦县”煤矿（4号井）开采能力年产达到150万吨；

“平顶山”一号矿井年采煤能力达到120万吨（矿井带变电站和筛分室）；

“滦县”4号选煤厂生产能力达到每年200万吨。

三、帮助建设以下企业：

船用铅板蓄电池生产厂；

微型专用电机第一生产厂；

微型专用电机第二生产厂；

微型专用电机第三生产厂。

委托苏联各民主国家经贸事务管理总局同中国方面联系，以备忘录的形式为本决议规定的义务办理手续，其中应规定，同援助这些企业建设有关的设计工作、所提供设备和其他技术援助的费用支付应按照现行的苏中贸易协定办理。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 M. 贾丕才

АВПРФ, ф.0100, оп.49, п.415, пор.59, л.16-17, 30-32

文件 09

中国关于建立中苏国防工业联合委员会致苏联的备忘录

（1957年12月14日）

为了加强中苏间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合作和紧密联系，中国政府提议建立一个联合的中苏委员会来管理国防工业，委员会由双方的几位代表组成，每年会面一到两次。

联合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交换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书籍、杂志、手册、电话号码簿、技术标准以及其他双方认为合适的资料；

二、讨论诸如务求标准化、技术条件、规格、国家标准及双方可以接受的不同的武器生产方式之类的问题；

三、讨论技术规格标准化问题，并向双方提供标准的产品及测量器具；

四、讨论邀请和接触事宜，包括技术专家和援助的步骤、期限及数量；

五 、在互惠的基础上邀请和派遣专家和代表团以达到现场审查、参与会谈、报告研究成果以及短期实习的目的；

六、在双方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条件方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

七、讨论交流和提供教学指南、教科书或其他有关国防工业培训的资料，或与加强国防工业人员技术、技能所必需的资料；

八、交流采用新机器、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将研究成果用于武器生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九、研究一方向另一方的生产提供的技术资料的担保问题；

十、讨论其他双方认为必要的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

在联合委员会休会期间，中国政府将授权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驻莫斯科商务处负责日常事务及国防工业的交流和联系。在此期间，苏方由何机构负责此项事务将由苏联政府决定。

联合委员会在召开每一次会议前，每一方应向对方提供包括议程、事件表及补充材料在内的备忘录。联合委员会会议的所有备忘录和记录都应分别用中文和俄文准备，并经双方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共同签字。

联合委员会讨论的所有结果供双方政府参考，若认为必要，政府将授权特定机构实施。

组织联合委员会会议的所有费用均由会议的承办国负担，但是会议期间各个代表团的费用将由各自政府负担。

请考虑上述提议。中国方面希望了解苏联政府的反应。

АВПРФ, ф.50, п.423, д.3

节选自《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 1 辑，2003 年

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俄国档案文献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成千上万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和各方面的技术专家纷纷来到这片陌生的国土，他们胸怀革命的理想，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一道挥洒汗水，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然而，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一道纸令，所有的苏联专家突然撤退回国，给中国人民及其建设事业留下了众多困难和无限遗憾。（关于这个历史课题的专题研究，可参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

这里刊登的是有关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华苏联专家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俄罗斯总统档案馆（АПРФ）、俄罗斯现代史料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现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的俄文原始档案复印件，只有个别的译自英文刊物。凡复印时抄写了档案馆藏号者，均附于文献之后。

文件左上角的编号为沈志华收藏的俄国档案复印件编号，以便于读者核查原文。

（本专题文件由吕允连、王英杰、刘子名、方琼、戴超武翻译，由沈志华编辑、校对和注释。）

文件 01

罗申与陈云谈话备忘录（节录）

（1949 年 10 月 28 日）

摘自罗申日记（1949 年 11 月 7 日）

今年 10 月 28 日时整，在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位于朝阳门大街的办公处接待室，大使拜会了陈云同志。

在礼节性的谈话之后，大使和陈云进行了轻松友好的谈话，在谈话中，陈云应大使的请求，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作了如下阐述：

…………[1]

人民政府正在制订 1950 年恢复生产能力的纲要，希望苏联专家帮助进行这项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在搞好中国各原料地区和工业地区的经济联系方面。过去它们互相脱节，彼此分割。

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中的严重障碍是缺乏忠于人民政府且精通业务的技术干部。国民党留给新政府的只有 2 万名工程师和专家，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信仰是反动的、亲美的。在银行职员和金融专家中反动分子特别多。现在有些地方就已经发现专家怠工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美帝国主义者现在和今后会把赌注压在人为扩大我们的经济困难上，压在搞经济怠工、捣乱和破坏活动上。以以下事实为例可以说明中国技术干部的匮乏：在最大的鞍山炼钢公司（在东北），70 名工程师中有 62 名是敌视所有中国人、尤其敌视中国共产党人的日本人。

在人民解放军中搞后勤和军需的同志转业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弥补经济干部的不足；现在我们只好完全依赖国民党留给我们的那些专家。

尽管有上述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困难，但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信，在苏联兄弟般的援助下，他们定能顺利地克服困难，将数百年来受帝国主义统治奴役的落后中国的经济，引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пор.19，л.58-62

① 节略的内容谈的是经济形势。

文件 02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节录）

（1950 年 2 月 12 日）

2 月 12 日晨 4 时，受葛罗米柯同志委托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

…………①

四、周恩来还请求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同志转告：与他们会谈后，他又仔细考虑了支付专家费用协议的第四条，并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协商，得出的结论是：每月支付苏联专家 2000–4000 卢布，是作为补偿企业所受损失而赔偿给苏联政府的，如果规定这笔钱收取美元，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这将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周恩来强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每个专家的费用相当于每月 10000 至 18000 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们每月只有 3400 斤小米，部长们只有 2800 斤小米。

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如果采用供给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对于中方来说，比支付美元要轻松得多。我们认为，苏方会考虑这些情况的。此外，我们要求告诉我们，支付给每个专家的大体数字，这一数字包括以美元核算的金额以及按照国际市场购买相应商品的卢布价格计算的各种食品的数量。"

五、接着周恩来请求转告，2 月 14 日 18 时是签署文件最合适的日期。在这一时间签署已准备好的文件，中方就可以在 14 日将简短的公报和文件等用无线电话通知北京，2 月 15 日所有的中国报纸都能刊登出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2 月 16 日中国将开始过春节（按阴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过节，在中国北方过节要持续 3 天，而中原和南方过节要延续一周以上。在这些日子，中国人民将忙于过节和一些拜年活动。因此他们再一次请求苏方对他们予以协助。

罗申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70-74

① 此处节略部分谈的是新疆和东北问题。

文件 0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 73 号记录摘录

（1950 年 3 月 22 日）

282. 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工作和薪金条件：

对苏联部长会议 1950 年 1 月 30 日和 1950 年 3 月 7 日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和薪金条件的决议修改如下：

1. 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和薪金条件（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和薪金条件的协定草案第 8 款），自上述协定生效之日起，应适用于以前到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

2. 关于上述协定第 4 款规定的中国政府在苏联军士开支方面对苏联政府的补偿，确定为每位军士每月 1000 卢布；

3. 接受中国政府就上述协定草案第 3 款的修改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中国货币支付给苏联专家固定工资，其数额与中国同等级别和专业的专家现行工资及以后相应的变动保持一致。在其他方面，保证苏联专家享有与中国专家同样的待遇，包括对专家食品和日用品的补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苏联方面补偿来华出差的苏联专家的如下开支：“专家及家属在苏联境内往返路途中的交通费、一昼夜住宿费、工资、行李费（每人限 80 公斤），以及出差津贴，其数额相当于专家出差前在苏联的月固定工资。

“专家及家属在中国境内往返路途中的交通费、一昼夜住宿费和工资，以及作为休假的补偿，其数额相当于在中国工作一年的月固定工资，而在高等院校工作的苏联专家为两个月的固定工资。以上费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以中国货币直接支付给苏联专家本人。”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6

文件 04

罗申转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

（1950 年 7 月 22 日）

发自北京，1950 年 7 月 22 日 20 时 50 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我于 7 月 22 日 14 时 30 分从周恩来那里收到毛泽东给您的如下电报：

“菲利波夫：

“关于对中朝边境线地区我军部队提供空军掩护、我航空兵改装喷气式飞机并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的全部武器装备的问题，我们已进行了研究，对于您的这一提议特表欢迎，并对您和苏联政府所给予的援助和支持深表感谢。

“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飞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机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

“关于我歼击机改装喷气式飞机问题，拟按以下方法加以解决。在巴季茨基[①]喷气机团的基地上于近两个月内建立一个改装训练中心。

“为培养 160 名机组人员，以供使用你方交给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我方拟首先对混成航空兵旅现有 65 名歼击机机组人员进行改装训练。待其改装训练即将结束时，即 1950 年 12 月到 1951 年 1 月，将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各联合飞行技术航校 1 月份的毕业生中挑选人员进行第二批改装训练（100 名机组人员）。这样，我们完全可以于 1951 年 3–4 月内完成接收新式喷气式飞机的工作。由此可见，我们完全能够在这一时限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

“为及时实现预定的改装训练计划，需要建立一个能对 60 人同时进行训练的训练中心，并要为其提供训练器材、直观教具及最必需数量的教练人员。为实际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认为，派我空军代表及首席空军顾问普鲁特科夫空军少将前往莫斯科就此相商，是适当的。

“请将您的决定告我。

① 巴季茨基，驻中国东北的苏联航空兵师长。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备注：在即将给您发出该电时，收到了苏联军事部[①]部长华西列夫斯基给军事总顾问[②]和巴季茨基同志关于进行改装训练并将巴季茨基机群的全部飞机交给中国朋友的指示。有鉴于此，总参谋部已同我军事顾问共同准备了一个给中国政府的建议：将中国的一个混成航空兵旅集中到上海、南京、苏州地区进行改装训练。所缺飞行员由哈尔滨－锦州联合航校抽调。有关飞机的转场和人员的集中工作将于1950年11月完成。

今天，此一计划将由中国政府审定并做出最后决定。毛泽东同志看来会将这一情况补充电告您。

罗申

第1503号电　　1950年7月22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8-89

文件 05

斯大林致科托夫的电报

（1950年8月27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科托夫[③]同志复第1726号电。请拜访周恩来，并将对他关于派军事顾问的电报的复电面交他。

“周恩来同志：您关于向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的请求，已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同意。即将向中国派出38名顾问，其中10名为防空专家，28名为空军专家。

“至于派遣其余26名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尚无派遣这些顾问的特殊需

① 即原苏联武装力量部，1950年2月改称苏联军事部。

② 指斯·阿·克拉索夫斯基，苏联空军元帅。时任苏联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

③ 科托夫，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

要，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由派往中国的如下一些顾问来担任：已给防空参谋长配一名顾问，该顾问除完成其主要工作外，还可负责军区防空作战处和情报处处长的顾问工作；已给空军参谋长配一名顾问，该顾问可负责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顾问工作。

“上述38名顾问将于最近动身前往中国。

菲利波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4

文件 06

周恩来致斯大林的电报

（1951年2月12日）

发自北京，1951年2月13日20时2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中国政府正在组建一个空军集团军，将用以参加当前朝鲜战役。为帮助该集团军战斗行动的计划与领导，请您向中国派出以下顾问人员：

1、空军集团军司令员顾问1人

2、集团军参谋长顾问1人

3、作战处处长顾问1人

4、情报处处长顾问1人

5、机械工程师顾问1人

6、专用设备和无线电工程师顾问1人

7、军械工程师顾问1人

8、野战修理工程师顾问1人

9、集团军后勤部长顾问1人

10、后勤参谋长顾问1人

11、专用汽车部主任顾问1人

12、技术处处长顾问1人

13、地面导航站主任顾问1人

14、地面导航设备主任顾问 1 人

15、通信处处长顾问 1 人

共 15 人，切盼顾问人员于 1951 年 2 月抵华。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周恩来

第 753 号电　　1951 年 2 月 12 日

АПРФ，ф.45，оп.1，п.337，л.58-59

文件 07

斯大林致周恩来的电报

（1951 年 2 月 16 日）

北京

扎哈罗夫同志转周恩来同志

您关于给中国空军派遣顾问的请求将予以满足。我认为，给您派遣既了解中国，又同朝鲜空战有关系的顾问是合适的。将由扎哈罗夫大将手下的戈卢诺夫少将担任空军司令部的顾问。

其余顾问的名单将随后告知。

菲利波夫

第 635037 号电　　1951 年 2 月 16 日

АПРФ，ф.45，оп.1，п.337，л.60

文件 0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 83 号记录摘录

（1951 年 9 月 1 日）

350——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

根据现有的关于在华苏联专家滥用依靠中方支付费用的公共服务设施，而这些在 1950 年 3 月 27 日中苏协定书中并没有规定，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派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И.Ф. 库尔久科夫同志，授命他就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上述滥用现象。将所采取的措施上报中央。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0，л.6

文件 09

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

（1951 年 10 月 24 日）

发自北京，1951 年 10 月 24 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1、当前敌驻朝航空兵主要致力于破坏我军交通线。

洛博夫[①]将军领导的航空兵部队和中国航空兵部队在过去的空战中取得了巨大成绩。苏联和中国的高炮部队在高炮射击中也取得了巨大战果，它们在掩护交通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兵力数量不够，它们不可能更加可靠地保障交通运输，因此请您考虑能否由苏联政府再派 1 个由 3 个团编成的高射炮兵师到朝鲜北部，以加强对铁路运输和安州地区机场的对空防御。

2、已完成战斗准备的中国航空兵部队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东北地区，准备参加朝鲜战斗，因此，在中国境内的防空兵器不够。此外，在 1951 年 11–12 月，中国的航空兵学校将有 463 名飞行员完成雅克 -11 的飞行训练。

---

① 洛博夫，时任苏联第 64 防空集团军司令，负责指挥在朝鲜战场的所有苏联空军部队。

根据您原来指定的计划，预定组建3个米格-9歼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1个伊尔-10强击机师、2个拉-11侦察机团、1个拉-9歼击机团、1个里-2运输机团。

考虑到我空军现状，在组建上述师和团之后，中国同志自己在1952年3月15日以前这个要求的期限内不能完成战斗机飞行人员的训练任务，因此请苏联政府给予下列援助：

（1）给中国派出3个喷气歼击机师和3个有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3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和6个米格-9航空技术保障支队，同时也是为了北京、上海、广州的对空防御。

（2）给中国派出1个团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1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2个侦察团和2个拉-11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3）给中国派出1个团的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1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1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和2个伊尔-10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4）中国空军自己可以胜任组建和训练1个图-2轰炸机航空兵师、1个拉-9歼击机航空兵团和1个里-2运输团，但到1951年12月则请给轰炸机师派出14名顾问，给拉-9歼击机团派出5名顾问。

如果您许可的话，其余顾问则从训练师和团的人员中指派。

请告知您对上述问题的决定。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5281号　　1951年10月24日

АПРФ，ф.45，оп.1，п.341，л.141-143

文件 10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的电报

（1951 年 11 月 13 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 10 月 24 日电报我们收到了。因为我远离莫斯科，我的复电晚了一些。

1、我们认为，保障北朝鲜交通枢纽的安全应主要由歼击机航空部队负责。为此我们紧急建议加快南市和泰川地区机场建设，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在此降落中方空军部队。

高炮部队的主要力量只需掩护主要的大型目标，现在应由苏军的 5 个高炮师负责掩护机场和安东－新义州地区的鸭绿江大桥。

根据朝鲜所出现的局势，加强高炮的掩护是必须的。我们认为，中方司令部可以从苏联提供的 1854 门高炮和 3268 挺高射机枪中拨出装备各师所必需的 180 门高炮和一些高射机枪。在 12 月，我们将根据补充的军事贷款向您再提供 120 门 85 毫米高射炮。

2、关于苏联向中方派出 3 个米格 -9 喷气式歼击机航空兵师及飞行员和 3 个航空技术营的要求，我们不能满足。因为米格 -9 飞机我们已不生产，我们也没有米格 -9 飞机。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 -9 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 3 个歼击机航空兵师的教练员，为期 3 个月。完成所有训练大纲后做返回苏联的准备，返回苏联的时间不晚于 1952 年 3 月中旬。

对于 1 个强击机航空兵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 5 和第 11 强击机航空兵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

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团中派遣教练员。

将向贵方派遣图 -2 轰炸机航空师和拉 -9 航空兵团的顾问，共计 19 人。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决定，我们将下达相应的命令。”

仅给克拉索夫斯基的电报：

我们有责任提醒您注意，我们临时派去训练中国米格-9飞行员的顾问应按期准时返回。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13日

АПРФ，ф.45，оп.1，п.342，л.8-9

文件 11

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的请示（节录）

（1957年1月4日）

苏共中央：

鉴于1月7日周恩来行将访问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建议将与中国朋友讨论涉及苏中关系、国际局势以及朝鲜局势等一系列问题。

一、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门工作着2739名苏联非军人专家，其中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名，经济领域的顾问123名，提供技术援助的专家2213名。除此之外，在中国工作的还有374名军事顾问和专家。

考虑到1956年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宣言中和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中阐述的关于此问题的我方立场，可以讨论苏联顾问和专家继续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适宜或者大幅度减少他们的数量的问题。

…………

谢皮洛夫①

1957年1月4日

① Д.谢皮洛夫，时任苏联外交部长。

文件 12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节录）

（1958 年 7 月 31 日）

赫鲁晓夫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1958 年 7 月 31 日，怀仁堂。

参加会谈的苏方人员：波诺马廖夫。

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邓小平。

…………[①]

赫鲁晓夫：在政治局里，对我们两国关系，对我们两党关系，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都为你们的成就感到高兴，仿佛那是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认为你们也这样对待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任何怀疑。

现在谈专家的事。我相信他们就像健康肌体上的脓包。

毛泽东：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赫鲁晓夫：我们派给你们许多专家，谁能保证他们提出的建议 100% 正确？

毛泽东：超过 90% 都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我们派给你们的专家非常精通他们的学科领域，但是他们不会处理政治问题。我们不能要求他们详细了解我们的关系。如果有人懂得这些，那么他就不熟悉自己的专长。所以我们写信给您，要求全部撤回这些专家。然后你们可以派人到我们那里学习。

毛泽东：应该利用这两种方式。

赫鲁晓夫：但是，我们有不平等的条件。我们那里没有你们的人，您担保他们不会做蠢事。

毛泽东：我们并没有从你们那里要求担保。

赫鲁晓夫：但是您们把我们置于不平等的地位。我们派来了他们做了蠢事，我还不得不请求原谅。

毛泽东：你不必要找借口。我们必须解决问题。

赫鲁晓夫：好像我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

① 此处节略部分谈的是中东局势和联合舰队、长波电台问题。

毛泽东：我们在这里谈几个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赫鲁晓夫：不全是如此。一些人不是共产党员，一些人被我们开除出党，即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不干蠢事。

毛泽东：中国也可以讲同样的话。

赫鲁晓夫：要是没有这些蠢事，我们也不会准许俄罗斯人这样做。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品质问题，这种品质应该让所有的民族佩服。但是条件对我们是不平等的。您们可以抱怨我们的专家所做的蠢事，而我们却没有你们的专家。因此，结果只能是我们做傻事。

毛泽东：历史会对此承担责任的。

赫鲁晓夫：我们必须对此负责吗？

毛泽东：你首先要进行革命。

赫鲁晓夫：那么我们是否必须对此负责？

毛泽东：这就是你不得不派专家的原因。你将来还不得不向伦敦和其他地方派出专家。

赫鲁晓夫：那么让我们共同做这件事，分担我们之间的责任和错事。

毛泽东：我们的批评，仅仅是针对军事领域和国家安全领域的苏联人，并不是针对经济领域的专家。

赫鲁晓夫：我们中间的所有人，你们中间的所有人，都会犯错误。没有人可以保证不犯错误。

毛泽东：只是一些小的错误。他们有时提出不恰当的建议，或者为建设提出不合适的看法，但都没有造成危害。

赫鲁晓夫：你们为什么在国家安全领域需要顾问？似乎你们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你们要明白，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毛泽东：就军事顾问而言，我们这里仅仅是谈论少数人，这里首先必须注意的事实是：这些顾问经常换来换去，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只有极少数人对此负责。

赫鲁晓夫：我们不知道谁为你们工作以及谁替换了谁。我们不能对此承担责任，不能控制这种情况。

毛泽东：这不是您的错。也许国家安全部门的党组织和军事部门的党组织要对此负责。

赫鲁晓夫：但是，您为什么还需要军事顾问？您赢得了如此一场战争，获得了这样丰富的经验。他们对您有什么用处？我们的顾问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我们需要技术顾问。

赫鲁晓夫：到苏联来学习嘛。

毛泽东：我们也采取这种形式，派人到你那里去，但是，有一部分专家到我这里来，也是有用的。

我谈的是个别人的事，不是谈论要撤走所有的专家。

赫鲁晓夫：我们建议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你们对我们工作人员的评论，我们感到非常震惊。我们不希望引起您的不安。

毛泽东：我同意您的看法。对这个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还可以谈。我们可能会让绝大多数顾问留下。有一些我们不需要。我们会给您提供名单。

赫鲁晓夫：我们想要一份全部顾问的名单，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因为今天有一个人做了蠢事，明天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

毛泽东：我们要求留下他们，而您要带走顾问。

赫鲁晓夫：没有你们，我们做不成任何事情。

毛泽东：我们的工人与你们的工人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的国籍。

赫鲁晓夫：我同意这是暂时的差异，主要是共产主义的纽带。

毛泽东：是的，甚至在一国之内还有矛盾呢。例如，我们北方的工人，在南方就不那么受欢迎。

赫鲁晓夫：我听说，您在一次同尤金的谈话中提到，我们的一位专家建议，在桥梁建筑上使用自由沉箱的方法，他的这种方法在我国并没有市场。我告诉你们，不要支持他。卡加诺维奇，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专家呢？我问他，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你？他说，这种方法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的。新东西恰恰是新的，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

我已经讲了我想说的一切，一个好的家庭主妇可以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经常用湿布擦去灰尘。我们也应该经常见面，这样就不会积累过多的灰尘。

毛泽东：完全正确。

赫鲁晓夫：因此，当您建议举行会谈时，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起初我们答复我不能来，因为我们认为在纽约有个会议。但是当我们收到西方人的答复时，他们显然对此拖拖拉拉。于是我们立即到您这里来。这是一次最好的会谈，有效而令人愉快。

毛泽东：我们能举行这次会谈非常好，我们不应该对问题置之不理。我建议，会谈和讨论不设任何议程，即便是有什么问题提出，或者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总能找到谈论的话题。还有国际形势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开始着手：一

些国家的局势；你们可以向我们通报一些国家的情况，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对其他国家局势的看法。但是，"合作社"的问题来得很突然，它完全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是，因为这件事，我睡不着觉，同尤金争吵，也不让你睡觉。但是，我们起码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至于米高扬，他是一个好同志。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很好。我们是在一些问题上对他表示不满，假如他很好地接受，那当然好；如果他不接受，那是他自己的事了。但是，我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划一条线。至于顾问，我们现在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告诉尤金和您的同志们，这些顾问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出色。我们经常就如何同这些苏联顾问交往，向地方党政机关下达指示。我们强调，需要同他们保持团结，我们指出，他们来帮助我们，他们中间99.9%，也许是更多的人，在中国已经工作了七八年，他们都是好人。只有少数一些人不去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比如，佩德洛舍夫斯基工作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错，而不是他手下人的错。

赫鲁晓夫：但是，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人。

毛泽东：我也是。我从未见过佩德洛舍夫斯基。现在这个工作组有个好领导，特鲁伐诺夫。

赫鲁晓夫：我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就认识他。他是一位不赖的将军。

毛泽东：我们很高兴有特鲁伐诺夫。在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些顾问我们不需要。

赫鲁晓夫：你们可以派自己的顾问，这是一个内部政治问题。

毛泽东：一个人甚至被派到最重要的政治部门，我们甚至没有请他来。

赫鲁晓夫：你们应当向大使提出这个问题，他会立即被撤回的。

毛泽东：我想划一条明确的界限。绝大多数是好的，我们只是批评他们中的一些人。

赫鲁晓夫：你们是不是要对那些界限以外的人负责呢？是赫鲁晓夫，而不是毛泽东。这就不公平，你们处在更为有利的地位。

毛泽东：您真的想全部撤回他们？

赫鲁晓夫：不。我们只是建议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相信，这些干部不仅仅是我们的资本，也是所有共产党的共同财富。我们必须使用他们，推翻资本主义。

毛泽东：我们没有提出顾问的问题。也许，我们提出一些顾问的工作缺点这个问题不对了？

赫鲁晓夫：恰好相反。您说的这个问题很好，否则就不是同志式的了。明明有

问题，您们却避而不谈。

毛泽东：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例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我们有意识地对此避而不谈。当苏联的军事顾问从波兰撤回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没有提出。我们提出批评的只是极少数人，特别是调任他们的方式。

赫鲁晓夫：你们做得很明智。我让你们自己来决定这件事。昨天需要顾问，今天不需要。确实，你们不想让俄罗斯人带着尿布同中国人走在一起。情况永远不会是这样。你们却忍受这种艰难行进的道路。

毛泽东：我只是谈论极少一些人。例如，军事科学方面的一个顾问，指示中国教授把研究重点仅仅放在如何利用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上。

赫鲁晓夫：他脑满肠肥，可肚内空空。

毛泽东：也许，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顾问都换成专家。

赫鲁晓夫：那就对了。听取他们建议中正确的东西，让他们工作。

毛泽东：对。让他们工作，但是要按照稍微不同的方式。您能呆到明天吗？

赫鲁晓夫：您想急急忙忙就把我们送回去吗？

毛泽东：不。只要您愿意，您可以一直呆下去。有关我们下一次会谈的时间，我们之间可能有些矛盾。您白天工作，我白天睡觉。可以在下午四点钟以后谈。

赫鲁晓夫：对，这是一个矛盾，但不是冲突。

毛泽东：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赫鲁晓夫：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这方面准备派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和费德林同志参加公报的起草。

毛泽东：我们这方面是王稼祥同志和胡乔木同志。我们应该吓一吓帝国主义者，它们会被吓着。

赫鲁晓夫：这是正确的。也许，这就是斯大林为什么不同您们签订条约的原因，因为他认为对中国的进攻是可能的，他不想卷入其中。我们可以帮助一点，但不能大规模地卷入。但是，有关这一点，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例如，我们同阿尔巴尼亚没有条约。在讨论华沙条约问题的时候，莫洛托夫建议排除阿尔巴尼亚。我问莫洛托夫，为什么不能包括阿尔巴尼亚。他回答说，我们会为它而战吗？但是，如果我们不防卫一个国家，那么不经过战斗就可以占领它。

…………

АПРФ，ф.52，оп.2，д.498，л.44-47

文件 13

安东诺夫关于苏中科技合作情况的报告

(1959 年 1 月 27 日)

关于 1958 年苏中科技合作状况(简要报告)

回顾过去的 1958 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两国科研机构、学者的业务和友好来往得到进一步加强。

1958 年 1 月 18 日苏中两国高教部、农科院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及苏联科技援华协议》和《关于科学技术合作和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协议》,这两个协议对发展苏中科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及苏联科技援华协议》规定,1958–1962 年期间,两国共同进行的项目 122 个,这些项目都是解决至关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的,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朋友认为,签订这两个协议具有重大意义。1958 年 2 月 14 日《人民日报》是这样写的:"今年 1 月签订的中苏科技协议是中苏两国互助、合作事业中的又一件大事。中苏两国人民日益巩固和发展的友谊、团结、互助、合作,使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国不断繁荣强大,使世界和平得到不断加强。"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强调苏联科技援助的重大意义时说:"1958 年 1 月 18 日签订的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协议,为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科技工作的大跃进创造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条件。"由于签订了这两个协议,中国朋友为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对苏联的科技成就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1958 年 2 月 14 日《光明日报》在谈学习苏联科技成果的重要性时指出:"如果科学工作者善于学习、在实践中善于应用苏联的科技成果,就可以有把握地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能掌握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一定会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

1958 年,苏联根据 1954 年 10 月 12 日和 1958 年 1 月 18 日签订的政府间协议,为解决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重要的科技问题,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对中国的科技援助是通过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科学家、提供科技资料、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实现的。

截至 1958 年底,根据科技合作项目,苏联向中国派遣了 169 名苏联专家,占苏方应派专家总数的一半,中方向苏联派遣了大约 3000 名中国专家。

根据上述协议，去年苏联向中方提供了1052项科技资料，这些项目的制定对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某些最重要的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中方向苏联提供了200多项科技资料，这些项目对苏联的经济，特别对化工、纺织、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具有意义。

由于苏联的大量科技援助，去年中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已交付使用，并建成第一个回旋加速器。这两套设备在中国建成，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原子能时代。苏联核子物理学家在中国公布了在世界上第一次用“OΓPA”装置控制热核反应的新方法，中国朋友对这一报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声明说：“在中国公布震撼人类的这一崭新的科学成果是苏中深厚友谊的体现。”

在过去的一年里，像与中国学者、专家一起进行许多重要学样问题研究、两国科学家一起进行科学考察活动这样形式的科技合作，都得到充分体现和发展。

如1958年苏中科学家对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的资源情况进行了联合考察，成果显著，通过大量的科学考察工作，取得了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珍贵的资料。苏中天文学家联合观察日蚀的科研活动是十分有益的，他们在观察过程中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科学结论和总结。

在过去的一年里，苏联专家十分注意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1958年他们就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提出了200多条建议。

但是应该指出，在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方面从总体上看是不够的。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加强苏中科学院两院的学术交往在1958年的科技合作中做得很突出。去年进行了广泛的学者交流，对计划中规定的课题进行了重要的咨询。两国科学家首次就广泛的问题密切接触和一起工作。

1958年共同进行科研工作的计划已基本完成。1957年12月11日和1958年1月18日协议确定的科技项目总数中，有89项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在去年完成拟定工作，其中已完成71项，另外18项没有完成是因为课题内容不准确，中国学者没有去苏联，有一些课题应中国同志的请求推迟到1959年完成。由于苏方的原因（没有派学者去中国）没有完成的有4个课题。

根据预定的计划，1958年苏联科学院向中国派遣199名科学工作者，其中有5

名科学院院士，13 名科学院通讯院士，55 名学科博士，65 名学科副博士及其他一些人。

在此期间，根据科技合作计划，有 61 名中国学者来过苏联，此外，有 14 名中国学者到苏联参加过学术会议。

1958 年访问中国的苏联学者和专家就某些问题提供过咨询，参加过学术会议，做过报告，帮助中国朋友解决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去年一年，苏联学者和专家讲课和做报告达 500 多次。

中国学者注意学习苏联的科技成果、努力尽快掌握成功的经验，特别是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经验。如：在苏联科学院自动化和遥控力学研究所加夫里洛夫教授作过答疑和学术报告之后，目前最先进的无接触遥控复合系统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得到普及。雷宾德尔院士关于更经济地利用水泥的建议开始被采纳使用。

苏联科技工作者艰巨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朋友的高度评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把苏联学者的这种帮助看成是“共产主义无私援助精神的体现”。

但是，苏联科学院在完成在华科技工作计划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不足。

一些科学工作者有时没有如期抵达中国，一些学者不同时到达的现象很突出，这就给中方组织科研工作造成了困难。苏联科学院在与中国科学院进行直接联系时，经常把专家们派到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机构，没有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告知大使馆，结果大使馆无法了解专家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也无法检查他们的工作情况。许多学者、专家来到中国没有预先制定工作计划。苏联科学院发生过不按期提供科技资料的现象。

去年苏联高教部和中国教育部也进行了科技合作，根据 1958 年 1 月 18 日协议规定完成 90 项科技研究课题，但是某些课题的研究工作进展得不平衡。

根据中国方面的要求，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新技术、新产品、先进的工艺及水利技术建设方面的课题上。

有关理论问题研究的学术课题完成情况不令人满意。协议规定的 69 项学术课题中，只有 32 项在苏中高校之间做了安排。

根据 1958 年的计划规定，在 144 所苏联院校和 80 所中国院校进行科技合作，但实际上只安排了 56 所苏联院校和 45 所中国院校。不是所有的中国高等院校都积极按照共同的科研课题与苏联高等院校建立联系。许多中国高等院校并不了解苏联高等院校的具体情况，对苏联高校的状况和科研课题的发展前景都不了解。远非所

有参加联合科研工作的苏联高等院校都主动采取必要措施，执行科研工作计划。去年，两国高等院校没有就具体联合科研工作进行科学工作者交流，给完成工作计划造成了困难。

大使馆不止一次讨论过执行苏中两国高等院校之间科技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也就这一问题多次与中国朋友座谈。但是这方面的工作作得还是不够，协议执行情况进展缓慢。

苏联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之间的科技合作，因为没有1958年的工作计划，所以执行得很差。

原拟于1958年11月召开的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到1959年1月才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两国间科技合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通过了关于1959年互派专家、提供科技资料和进行科研工作方面苏中双方义务的一些有关决议。

大使馆总结1958年苏中科技合作时，认为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必须注意以下主要的不足之处：

根据科技合作项目，为共同进行科研工作，去年许多苏联机构派遣了苏联专家来中国，这些机构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缺少一个统一的派遣专家和监督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机构，致使在工作中经常出现重复、混乱和无人监督的现象。虽然1958年的协议规定，提供资料、派遣和接待专家都通过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但是实际上这些工作目前多数没有通过委员会。

因为设在北京的苏联机构对执行1958年1月18日的协议有许多问题不明确，所以根据该协议来中国的苏联专家和学者，一些由大使馆的科技文化组负责，一些由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处负责。

这方面工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依我们的看法，是1958年1月18日两国间《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和苏联科技援华》的协议签订之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受苏联政府的委托，负责对该协议各项工作的监督和协调，负责所有工作的组织以及与苏联和中国各有关机构联系，安排所有工作项目。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委员会没有作过这些工作，而且与实际处理苏中科技合作事务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处在工作中也很少联系。

我们认为，目前极需适当地对这一工作实行集中领导，在中央（在莫斯科）和北京都需要有一个机构在更大的范围内协调与中国科技合作的所有工作，委托这一机构处理苏中两国科技合作的所有问题。

今年1月份大使馆已向中央提出过有关建议。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谢·安东诺夫

1959年1月27日

ЦХСД，ф.5，оп.49，д.235，л.27-36

文件 14

苏斯洛夫呈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节录）

（1959年12月18日）

…………

在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应有的援助，帮助他们努力发展国家，积极而巧妙地动员劳动人民实现所提出的任务的同时，我们对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所出现的阴暗方面不能视而不见。

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领导近来出现了对自己的成绩和能力估计过高，夸大中国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的程度的倾向，有点儿被“中国已经站起来了，明显地巩固了”冲昏头脑。出现了骄傲和自大的成分，尤其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

…………[1]

我们认为，尽管会谈一时很不愉快，但也是必要的和完全有益的。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最后和代表团离开之后，在会谈总结中，中国同志努力强调我们两党之间原则的统一。

10月4日苏联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回国。离京前，赫鲁晓夫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说，苏联党政代表团怀着坦诚的心回国，我们的友谊不应因具体问题的一些分歧蒙上阴影。中国的同志们回答，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几天过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发来电报，表示支持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相信苏中友谊将一如既往，继续巩固和发展。

不能不说，上述中共在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

---

① 此处节略部分是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对外政策提出批评。

崇拜状况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内部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决定是由个人做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观主义的，在不少情况下简直是非深思熟虑的。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对毛泽东同志的歌颂已成为无法控制之势。在党的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论点："我们中国人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同志被描述成伟大的天才的人物，称他为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灯塔，共产主义思想的化身。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成了党的代名词。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中国被说成是最新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被列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行列。实际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成了党和国家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甚至在中国高校里，最近2–3年社会科学教学归结为学习他的著作。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对他的这些赞誉完全信以为真。这同斯大林晚年我们当时的情况相似。当然，我们不能同中国的同志们谈论这个，但中央全会应该知道中共生活的这一方面的情况。

在与中国朋友们的相互关系中，近年来中央主席团坚决遵循无话不说坦诚和协商的原则，并为此做了应做的一切。苏共中央克服了斯大林生前发生的有损中国主权的某些消极因素，严格使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

…………

同志们!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十分清楚，正确地发展我们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不仅对我们两党两国来说重要，它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也是必需的。为了这一崇高的目的，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

…………

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

节选自《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83辑，2002年5月、9月

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如何出笼的俄国档案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所做的秘密报告，无疑是苏联变革社会和调整战略中最具震撼力的重大举措，也是冷战进程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事件。其结果，不仅引起了一系列有关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的深刻问题，也为冷战趋向缓和乃至根本改变国际关系格局及其发展方向提供了一次历史机遇，同时也对中苏关系的演变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因此，研究冷战的历史，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在冷战的角色和地位，就必须研究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

有关苏共二十大，过去公布的只是会议代表的公开报告和发言以及苏共的部分决议，而对于当时震动世界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几十年来在各国流传有许多文本，但始终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更不用说还有大量涉及这次大会的主席团会议和中央全会的会议记录、决议以及各部门和地区的请示、报告尚不为人知。不仅在中国出现的中文本，甚至在苏联流传的俄文本，都是从英文本转译的。直到1989年，苏联才在复刊的《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3，1989，c.128-170）上首次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文本（中译本见199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麦德维杰夫著《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一书附录）。随着俄国档案的开放，特别是到199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40周年）以后，俄国学者发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并大量引用在档案馆中新发现的历史文献。从史料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2002年莫斯科出版的关于苏共二十大的专题档案文献集 [*Аймермахер К.*（*гла ред*）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ё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ⅩⅩ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其中公布了当时起草秘密报告的3个文本，有关这次大会筹备、酝酿情况以及苏联国内外和社会反应的198个文件。不久后出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文件汇编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又补充了一些相关的档案文献。

在这里选登的文件，展示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提出、酝酿和准备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提出斯大林问题不是某个领导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改变过去一些政策方针的客观需要，也是平反冤假案件浪潮的形势所迫。不过，苏共领导层在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意见，而如何谨慎地处理斯大林问题，苏共中央却没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研究。其结果，如同毛泽东所说，虽然揭开了“盖子”，但也捅出了“娄子”。

档案由刘明、白云翻译，沈志华、方琼校对和注释。

文件 0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

（1955年11月5日）

出席会议的人员：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基里琴科、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米高扬、谢皮洛夫、阿里斯托夫、波斯佩洛夫。

第167号会议记录第21条。

关于12月21日的问题。①

只在报纸上刊登出这个日期；不举行集会。

卡冈诺维奇同志：应该在工厂里举行集会（根据中央委员会关于工厂集会的决议）。

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我们不举行集会的话，人民将会反感。应该以相应的形式庆祝斯大林的生日。

布尔加宁同志：12月21日——不能举行集会。应该显示出同以前的区别。

米高扬同志：不用举行集会，不用束缚自己。实际上三个会议连续不断。有斯大林奖金却没有列宁的。需要深思熟虑。并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些方面没有对我进行攻击的理由。我支持中央委员会反

---

① 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生日。1955年12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将在斯大林生日那天在报刊和电台介绍其生平和活动情况。

对个人崇拜的路线。存在着细微的差别。我与你，赫鲁晓夫同志，没有分歧。斯大林曾经批评我。我对他是真诚的。我不认为斯大林高于列宁。我没打算进行反对你的斗争。我建议形成一个决议——如何庆祝斯大林的生日。

萨布罗夫同志：这个问题提得正确。

赫鲁晓夫同志：在干部中有很多意见，军人也一样。

伏罗希洛夫同志：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再说，他们也攻击过我，但我还是原谅了他们。

记录下来的决定如下：

1.[①] 关于列宁的问题就这样了，而关于在报刊和无线电广播中宣传斯大林的问题应该讨论。

2.[②] 讨论关于列宁奖金的事宜——开始筹备工作。

3. 讨论关于在大剧院举行集会的程序问题。[③]

让亚斯诺夫[④]同志发言。

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8, л.61-62

文件 0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

（1955 年 12 月 31 日）

出席会议的人员：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里琴科、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波诺马连科、什维尔尼克、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波斯佩洛夫。

第 177 号会议记录。

---

① 此处发表时原文无序号，为编译者根据上下文所加。

② 此处发表时原文无序号，为编译者根据上下文所加。

③ 这里指在大剧院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 39 周年大会。

④ M.A. 亚斯诺夫（1906–1991），时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

与平反有关的问题。[①]

责成波斯佩洛夫同志、科马罗夫[②]同志、阿里斯托夫同志、什维尔尼克同志审阅所有材料。

关于沙图诺夫斯卡娅同志的信。

布尔加宁同志宣读信的内容。

伏罗希洛夫（没听完就喊了起来——“撒谎！”），接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说明契卡[③]分子（谢·米·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参与了谋杀的事实。[④]

莫洛托夫：事情牵连到老契卡人员。三个人一起与尼古拉耶夫进行的谈话。斯大林是当着我们的面与尼古拉耶夫进行交谈的。没有打他。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发言未记录下来。）

米高扬：当事件发生时，斯大林被激怒了。契卡人员插手了这件事情。

赫鲁晓夫：如果追查下去，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同志们应该叫来医生、司机和库普里亚诺夫[⑤]。对司机进行审查。[⑥]

莫洛托夫：（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应该按证件核对一下。

卡冈诺维奇：谢尔戈[⑦]曾说过：“你们对杀害谢尔盖·米罗诺维奇[⑧]是有罪的。”

列坚斯[⑨]也指责过契卡人员。

---

① 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中央开始不断收到大量有关重新审理在过去政治运动中被镇压者案件的请求。随着对诉讼案件重新进行审理，许多人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于是，出现了关于为30年代公开审判的蒙冤者平反的问题。

② П.Т. 科马罗夫（1898–1983），时任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52–1959）。

③ 苏联20年代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缩写，有时泛指国家保安机关。

④ 基洛夫于1934年12月1日被杀害，第二天，基洛夫的警卫人员、谋杀案目击者M.B. 鲍里索夫便因车祸死在从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大楼通往斯莫尔尼宫的路上。1937年6月，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的一批工作人员 Ф.Д. 梅德韦季、И.В. 扎波罗热茨、A.A. 古宾等12人被逮捕。在调查过程中，虚构了关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存在着一个由Г.Г. 亚戈达领导的反苏阴谋案件，被告人在严刑拷打下提供了关于预谋杀害M.B. 鲍利索夫的证词。在沙图诺夫斯卡娅的信件后直到1989年，连续成立了几个调查基洛夫被害案件和鲍里索夫死亡原因的委员会。但至今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⑤ Г.Н. 库普里亚诺夫（1905–1979），曾任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40–1950）。

⑥ 指鲍里索夫死亡见证人、司机B.M. 库津，当时他还活着。

⑦ 即奥尔忠尼启则，时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

⑧ 即基洛夫。

⑨ C.Ф. 列坚斯（1892–1940），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权代表，同时担任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安局主席（1926–1938）、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1934–1938），一级国家安全委员。1938年11月被捕，1940年2月被处决。1961年11月16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平反。

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基里琴科、马林科夫：

审理亚戈达的案件；

叶若夫；[①]

梅德韦季的审判案件。

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9, л.33-34

文件 0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

（1956 年 2 月 1 日）

第 185 号会议记录：关于罗多斯的案件。[②]

莫洛托夫同志：罗多斯现在表现如何？

赫鲁晓夫同志：罗多斯知道为人们平反的事情吗？

赫鲁晓夫同志的问题。请讲一下关于波斯特舍夫同志、柯秀尔同志的情况，你们为什么宣布他们是敌人？

这是上面的错误。对轻微刑事犯罪的人们，都是按这种类型的案件被追究责任的。斯大林有过错。

阿里斯托夫：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呢？艾赫直到最后仍在否认，而他还是被处决了。[③]

赫鲁晓夫同志：大概叶若夫也没有罪，一个老实人。

---

① 尼·伊·叶若夫继亚戈达之后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不久也成为恐怖运动的牺牲品。

② Б.В. 罗多斯是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特别案件调查局副局长，曾在大清洗中参与刑讯逼供。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6 年 2 月 1 日做出决议，将其交付法庭，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进行非公开审判。审判是在 2 月 21–26 日进行的，罗多斯被军事法庭判处枪决。参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③ Р.И. 艾赫，1905 年入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于 1938 年 4 月 29 日在未经检察机关批准的情况下被捕，1940 年 2 月 2 日被交付审判。在法庭上艾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声明所有的口供都是在审讯人员的逼迫下提供的。2 月 4 日，艾赫被处决。参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米高扬同志：1934 年 12 月 1 日已经通过了与恐怖活动进行斗争的法令。[①]

波斯佩洛夫同志：还规定了被逮捕人员的指标。

谢罗夫同志：是有这样的规定。

赫鲁晓夫同志：也可能，对报告需要进行一些补充。[②]

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表示支持。

赫鲁晓夫同志：责成谢罗夫、鲁坚科和委员会调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贝奈斯在 1936–1937 年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集团写给斯大林的信。[③]

莫洛托夫同志：但是，应该承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

米高扬反对莫洛托夫："而你，莫洛托夫同志，曾经支持他。"

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正如谢皮洛夫同志提出的（关于宣传画的问题）那样，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④]应该抓住实质性问题。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终究还是当了 30 年的领袖。

莫洛托夫同志：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我坚持这一点。

米高扬同志：就历史问题来说，简直令人发疯。

萨布罗夫同志：如果事实是准确的，难道这是共产主义？这是不应该得到宽恕的。

马林科夫同志：应该正确地看待事实。正确地提出问题。应该向党说明。

别尔乌辛同志：我们是否知道呢？我们知道这是恐怖。当时不能够做什么。我们有责任向党说明这一切，在代表大会上说明，在全体会议上说明。

布尔加宁同志：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中央组成人员都被消灭了。我不同意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不同意伟大继承者的说法。可以不谈"继承者"，在报告中没有这一点也可以。不能吹嘘斯大林个人（像宣传画里那样）。

---

①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4 年 12 月 1 日做出"关于对划策或实施恐怖行动案件的审理程序"的决议，该决议没有提交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例行会议审批便付诸实施，并一直延续到 1956 年。这个文件要求侦讯机关加速审理策划或实施恐怖行动的案件；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死刑的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法庭对这类罪犯做出死刑判决后立即予以执行。

② 赫鲁晓夫在这里说的报告可能是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

③ 图哈切夫斯基案件，或称军人案件和红军中托洛茨基反苏维埃军事组织案件，是根据斯大林和叶若夫的直接指示伪造的、于 1937 年 6 月 11 日对红军的一批高级将领进行的审判。参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④ 指谢皮洛夫关于重新审理以前出版的歌颂斯大林的宣传材料和宣传画的建议。

伏罗希洛夫同志：党应该了解真相，但是，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来报告。每个阶段都有其当时的情况。而我们是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道路领导国家的。斯大林是否也包括在内呢？是的。卑鄙下流的事情很多，应该正确地说明这一切，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是不能绕过去的，但是，应该考虑周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事情是重大的，应该一步一步地来。

苏斯洛夫同志：在几个月时间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不能以任何理由宽恕这一点。斯大林对德温斯基[①]说过——10–15个人留在一个地区里足够了。在斯兰斯基从莫斯科来的时候（打过电话）。[②]不能再吹捧了。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莫洛托夫同志：我同意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观点。应该再现真相。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对不正确的事情应该进行衡量，可耻的事情——这也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

赫鲁晓夫同志：亚戈达可能是清白的人。叶若夫（大概也是清白的）。大家表述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做出决定。斯大林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的问题。应该制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放在应有的位置上（销毁宣传画和文学作品）。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交换意见到此结束。

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9, л.52-54

① Б.А. 德温斯基（1894–1973），曾任斯大林的助手，以及联共（布）中央保密局副局长、苏联部长会议农业局和粮食采购部副主席等。

② P. 斯兰斯基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1951年5月，在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参与下，斯兰斯基被捕，并于1952年12月3日与其他10名囚犯一起被处以绞刑。1968年1月该案件得到平反。

文件 04

苏共中央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报告

（1956年2月9日）

绝密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根据你们的委托做如下报告：

我们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有的档案材料进行了研究，从这些材料中清楚地看到：1935–1940年，是在我们国家里对苏维埃公民进行大规模逮捕的年代。

在这些年里，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

镇压的特殊规模是在1937–1938年期间，这从以下表格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年　代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被逮捕的人数	114456	88873	918671	629695	41627	127313
其中被枪决的人数	1229	1118	353074	328618	2601	1863

这样一来，在两年之中，也就是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的有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是681692人。

1937–1938年大规模镇压运动的浪潮，广泛地波及到党务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以及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指挥人员。

在这些年里，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里，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被逮捕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和地区组织的领导干部。

在这个时期里，在一系列边疆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和党的地区委员会里，有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遭到逮捕。

不但如此，在139名由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98人在这些年里被逮捕和被枪决。

另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对于被交付法庭的所有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律采取同一种惩处办法——枪毙，其中没有一个人活下来的。

在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因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

援引的材料还可以证明：被斯大林同志称为党的武装部队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从实质上来说，执行的是反党的路线。

诉讼机关做出关于立即枪毙大批苏维埃公民的判决的法律根据，是 1934 年 12 月 1 日的法令。这个在谢·米·基洛夫被暗杀之后颁布的法令，规定了加快和简化对案件的审理，不仅禁止上诉状，甚至禁止递交赦免申请。

对绝大部分没有任何罪行的苏维埃公民进行大规模逮捕的运动，开始于斯大林同志 1936 年 10 月给政治局委员们发出电报之后。在自己的电报中，斯大林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对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的揭露，至少耽误了 4 年。

在 1937 年 3 月 19 日召开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领导干部会议上，叶若夫在其《关于联共（布）中央全体会议总结》的报告中，援引了斯大林同志的电报和联共（布）中央 2–3 月全体会议的决议，要求国家安全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以此为出发点，正如他所表达的那样，斯大林同志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重要评价”，做出“一切必要的结论。”

在对这次会议的工作情况进行总结时，叶若夫说：

“……重要的是，掌握我们这里存在的一系列令我们无法容忍的缺点，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因此，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补上在我们的审判工作和粉碎敌人方面所失去的时间。

我们正在揭露敌人，并更加猛烈地揭露他们。我们已经粉碎了托洛茨基分子们，猛烈地捣毁了他们。在此我就不再列举相关数字了，而它们是相当诱人的，已经消灭了他们不少人。我们正在抨击社会革命党人，揭露间谍分子，有德国的、波兰的和日本的，但是，目前，这还远远不是全部，正如常言说的，做得很仓猝。”（国家安全总局积极分子会议速记记录，1937 年 3 月 21 日，案卷页 401、402）

叶若夫的所有这些论点，从问题的实质来说，是呼吁各地开展在没有足够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对公民实行大规模的逮捕。

1.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开展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命令

为“补上失去的时间”，叶若夫破坏了苏联法律，在 1937 年年中的时候，下达了一系列关于镇压数十名，然后是数十万名没有任何罪行的人们，他们或者带有民族特征，或者以前在国外居住过，与外国人有联系，等等。

1937 年 7 月 25 日，叶若夫签署了第 00439 号命令，并通过电报使其生效。根

据这个命令，他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地方机关，在5天期限内，逮捕所有德国公民，包括现在或以前在军事工厂、带有国防意义的车间的工厂里，以及在铁路运输部门工作的政治侨民，在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审判过程中，要“达到彻底地揭露至今为止仍然没有被揭露的德国谍报机关的代理人”。这样一来，逮捕行动就属于对全体德国人不加选择地进行逮捕，并应该在他们之中“揭露出”还没有暴露的间谍分子。

这个命令并没有局限于此。此外，他还要求准备第二轮的大规模镇压行动，而这次行动已经是在德意志族的苏维埃公民之中进行了。

过了5天之后，1937年7月30日，他又签署了第二个命令——第00447号命令，其中说：

“……国家安全机关所面临的任务是：以最无情的方式粉碎这一反苏维埃分子整个集团……最终，一次性地、永远地结束他们反对苏维埃国家基础的卑鄙的破坏活动。

“有鉴于此，我命令：自1937年8月5日起，在全体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里，开始镇压原富农分子、积极的反苏维埃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行动……”

属于被镇压的有：原富农分子，反苏政党的党员，白匪分子，宪兵，官吏，土匪帮凶，归侨，“积极从事反苏维埃活动的人员”，包括在监狱和改造营服过刑和被监禁过的人员，以及“有能力从事积极的反苏维埃活动的人”，以及上述人员的家庭成员。

这个命令还规定成立三人小组，委托这个小组审理上述类型的案件。同时规定：应该把被逮捕的所有人员，划分为如下两个类别：

“1）所有最敌视……的人员属于第一类。对这类人员应该立即逮捕，并在三人小组对他们的案子进行审理之后，立即枪决。

“2）第二类是那些积极性稍弱，但仍然是充满敌意的分子。对他们应该进行逮捕，并在监狱里监禁8–10年，而其中最凶恶和对社会有危险的人员，应该根据三人小组确定的期限，将其监禁在监狱里。”

在这个命令里，叶若夫还当场下达了计划指标，在每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里，应该镇压多少人员，既有第一类，也包括第二类人员。根据这个命令，计划共逮捕258950人，其中莫斯科州35000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28300人，西西伯利亚边疆区17000人，列宁格勒州14000人，亚速－黑海边疆区13000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2000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10000人，等等。

对于那些最积极的机关首长还做了补充说明：

“当形势要求扩大规定的数字时，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和各边疆区、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的负责人，有责任向我提交相关的有理由的申请。”

规定“指标”和关于扩大其可能性的补充说明，在那些善于投机钻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首长之中，引起了一场争取超额完成给他们规定的指标的竞赛。这一竞赛受到了叶若夫的鼓励。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原领导干部之一，后来因破坏法律而被逮捕的卢洛夫，关于这方面做了如下内容的交待：

“……如果从狭小范围来谈‘指标’，也就是由人民委员分配的、属于被镇压和不经审判就被判决的人员在各边疆区和州里的数量，那么，我清楚地知道，这些指标已经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许多负责人之间展开独特竞赛的内容。围绕这些指标在人民委员部里形成了这样的气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给他下达的数千人指标的那位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负责人，将从人民委员那里获得新的、补充指标，而这个人也被评定为最优秀的工作人员，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快更好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尼·伊·叶若夫关于‘粉碎’反革命的命令。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这样的首长，如：拉济维尔洛夫斯基（伊万诺沃）和西马诺夫斯基（奥列尔），他们在受到尼·伊·叶若夫的接见之后，来到我这里，自豪地向我讲述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表扬了他们的工作，并给他们下达了新的、补充指标。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还想起，有一次，在我的例行汇报之后，尼·伊·叶若夫问：‘还有什么新的情况？’我说：‘拉济维尔洛夫斯基找过我。他已经完成了原有的指标。请求给予增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回答说：‘拉济维尔洛夫斯基是好样的。他已经来过我这里。我已经给他下达了新的指标。’”

关于拉济维尔洛夫斯基和西马诺夫斯基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例外。它对于整个“指标实践”是典型的。（卢洛夫卷宗，第1卷，案卷页189–190）

完成规定的指标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首长们会提出关于给他们下达补充指标的申请，通常，叶若夫在与联共（布）中央（约·维·斯大林）协商之后，对于这些请求给予满足。

尤其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叶若夫于1937年8月11日致斯大林同志的第59108号信函：

“由于在西部州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工业企业里，混杂了大量无耻的富农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这些人表现出了强烈的反苏维埃情绪，我认为必须扩大对

西部州原富农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反苏维埃分子的镇压：一类人员增加到3000人，二类人员增加到6000人。

“而按规定西部州一类分子是1000人，二类分子是5000人。

“附上决议草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书记处卷宗1937年第1595号，案卷页28、29）

规定增加指标的实施工作，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7年10月25日电报副本加以确定的，根据这些文件，某些监狱被镇压的人员指标扩大了3600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书记处卷宗1937年第1598号，案卷页42–52。）

为了使逮捕行动通畅无阻，叶若夫以命令的方式规定了简化审讯和决定逮捕问题的方法。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首长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只按名单就决定关于对一类人员的逮捕问题，而关于审讯程序方面在命令中写到：

“……根据被简化的程序加快审讯工作的速度。

“归卷的有以下文件：逮捕证、搜查记录、在搜查时被没收的材料、个人文件、被逮捕人员履历表、代表机关登记材料、审讯记录和简短的起诉书。”

关于业务进展情况，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首长必须每5天以电报报告一次。

关于执行命令的速度和案件审判的“客观性”，仅用1937年8月15日的一份报告就可以证明。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在命令下达之后的15天里，仅在57个州就已经逮捕了100990人，其中有14305人被判有罪。

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波兰人，首先是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波兰分部的领导干部，以及在党和苏维埃机关、苏联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担任领导职务的波兰族人员。

在波兰共产党中央原总书记连斯基－列辛斯基、温什利赫特、奥尔斯基、普鲁赫尼亚克、贝斯特科夫斯基和波兰革命运动其他优秀的活动家，作为波兰间谍分子被逮捕和被“揭露”之后，叶若夫于1937年8月11日下达了第00485号命令。在这个命令中，叶若夫对波兰共产党进行了诋毁，一笔勾销了它在工人运动中的革命作用，并企图证明它的主要任务几乎是组织反革命活动，捏造谣言诽谤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和巩固事业中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同志们。叶若夫命令自8月20日开始“旨在彻底消灭‘波兰军事组织’的地方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并在3个月期限内肃清这一组织。在命令中指出：

“应该被逮捕的有以下人员：

“（1）在审讯过程中被查明和根据所附的名单至今未被找到的最积极的‘波兰

军事组织’成员；

“(2) 所有留在苏联的波兰军队的战俘；

“(3) 从波兰来的投敌分子，无论他们转入苏联的时间；

“(4) 从波兰来的政治侨民和政治交换人员；

“(5) 原波兰社会党党员和波兰其他反苏政治党派的人员；

“(6) 波兰各地的反苏民族主义分子中最积极的那部分人员。”

除此之外，命令还说：“那些在已经被逮捕的间谍分子、敌对分子和破坏分子的供词中出现的人员，应该立即逮捕。”这样一来，所下达的命令的实质，是逮捕整个波兰族的全体人员。

命令还规定：对于那些按照含有简单说明其指控的实质内容的名单而逮捕的人员的案件，不必经过法院民事判决。

由于卖掉中东铁路，几万名此前在中东铁路工作的苏维埃公民返回苏联。所有这类人员获得了一个普通的名字“哈尔滨人”，随后，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7年9月20日下达的第00593号命令被逮捕。

在这个命令中说：“‘哈尔滨人’绝大多数是日本谍报机关的代理人……”，应该在1937年12月25日之前这个期限里对其进行判决。

与此同时，还下达了关于大规模镇压朝鲜人和拉脱维亚人的命令。在拉脱维亚人之中，有大批的积极参加过地下革命、国内战争和与反革命斗争的同志们被消灭，其中包括这些党和人民都了解的人们，如鲁祖塔克、艾赫、克诺林、普拉姆奈克、索姆斯、列金斯和其他人。

狂热于“间谍分子”的变态心理已经达到了如此地步：在1937年10月23日，叶若夫签署了第00693号命令，在命令中特别强调，那些外国谍报机关的代理人打着政治避难的旗号，越过边境，因此建议：“对于一切投敌分子，无论其进入我们境内的动机和情况如何，一律立即逮捕……”并交付审判。被军事法庭作为间谍分子揭露的投敌分子，以及“所有被怀疑……和未被揭露的人员，在将其案件提交给特别委员会之后，一律关押在监狱和改造营里。”

这样一来，职业革命家，兄弟党的领导干部，为躲避相关的外国谍报机关的迫害，以及为在我们这里寻求到更好生活的劳动者们，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了苏联境内，却不可避免地落入监狱或者被处决。

这个命令破坏了宪法关于提供避难权的原则，粗暴地践踏了列宁主义关于国际主义的学说。

整个大规模行动的结果是，无论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还是在其地方机关里，都聚集了大量的被逮捕的人员。于是，“为了迅速地审理被调查的案件”，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1938 年 9 月 17 日第 00606 号命令，与现有的三人小组并列成立了所谓的特别三人小组，其成员是各州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或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相应的检察长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三人小组根据简要的报告材料做出判决，被逮捕的绝大多数人员被判处枪决。三人小组的判决被立即予以执行。

根据汇总数据材料显示，仅到 1938 年 9 月 10 日，执行上述从实质上来说是宣布实行大规模恐怖行动的命令的结果，按照民族分类审理了 227986 人的案件，其中被判处枪决的 172830 人，被判各种惩罚措施的有 46912 人，交付法庭审理的有 3120 人，返回做补充调查的有 5124 人。

按照单独行动，这些数据可划分如下：

民族	总共审理人数	其中被判枪决	其他惩罚措施	交付法庭	返回补充调查
1. 波兰人	106666	84471	19018	943	2234
2. 德国人	31753	24858	5750	676	569
3. “哈尔滨人”	30938	19312	10669	251	706
4. 拉脱维亚人	17581	13944	2741	512	384
5. 希腊人	11261	9450	1553	70	180
6. 罗马尼亚人	6292	4021	2077	42	152
7. 芬兰人	5880	5224	423	140	93
8. 爱沙尼亚人	5680	4672	625	69	224
9. 伊朗人	2180	908	1154	17	101
10. 阿富汗人	691	99	400	12	180
11. 其他人	9064	5781	2494	488	301
总计：	227986	172830	46912	3120	5124

1937 年 8 月 15 日，叶若夫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基础，下达了第 00486 号命令，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机关，逮捕并通过特别委员会对所有“叛变祖国者的妻子”、在 1936 年 8 月 1 日之后被判罪的“右倾托洛茨基间谍－破坏组织的成员”，以及他们的 15 岁以上“对社会有特别危害和有能力从事反苏维埃活动的”子女，判处不少于 5–8 年剥夺自由的惩罚。

后来，这个命令的效力又被用于所谓哈尔滨分子家庭成员的身上。

第 00486 号命令的颁布，最粗暴地践踏了苏联立法原则，这些原则规定：对于一个人的刑事处罚，只能在他们有具体犯罪行为的情况下。由于这个命令，在监狱里长期关押着数十万名没有任何罪过的公民，而他们年幼的子女则失去了双亲，或者被送到孤儿院，或者由远亲负责监护。

2. 人为制造的反苏维埃组织、集团和各种中心

叶若夫的实行大规模逮捕行动的命令，不仅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机关制定了目标，而且还要求它们“揭露”哥萨克暴动组织、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集团，以及“波兰军事组织”和其他类似的组织。

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负责人在接到逮捕几千人的分配指标之后，被置于必须立即逮捕数百和数千人的境地。而因为需要赋予所有这些逮捕以某种合法的假象，各地开始捏造某种暴动分子、右倾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颠覆－破坏分子和类似的组织、“中心”、“集团”，甚至是小组。

根据那个年代的审判材料判断，几乎在所有的边疆区、州和共和国里，都存在着拥有广泛分支的“右倾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颠覆－破坏分子”的组织和中心，通常，这些“组织”或者“中心”的负责人，都是各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例如，在原西部州，“右倾反革命组织”的领导人是州委员会第一书记、自 1905 年起就是联共（布）党员的 И.П. 鲁缅采夫，在鞑靼，“右倾托洛茨基民族主义集团的领导人”是原州委员会第一书记、自 1914 年起成为联共（布）党员的 A.K. 列巴，而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右倾反苏维埃恐怖组织”的领导人是原州委员会第一书记、自 1915 年起成为联共（布）党员的 K.B. 伦金，等等。

在新西伯利亚州，“被揭露”出来的有：“波兰军事组织西伯利亚委员会”、“工农红军新西伯利亚托洛茨基组织”、“新西伯利亚托洛茨基恐怖中心”、“新西伯利亚法西斯德国民主社会党”、“新西伯利亚拉脱维亚纳粹法西斯组织”和其他 33 个“反苏维埃”组织和集团。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仿佛揭露了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该组织已经与右倾托洛茨基中心、伊朗、阿富汗、日本、英国、德国，以及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

在这个组织的领导层中，有 4 名原塔吉克斯坦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2 名原人民委员会主席，2 名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2 名人民委员和 31 名共和国组织的领导人，以及中央委员会各部几乎所有的部长，塔吉克斯坦联共（布）区委员会 18 名书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作家，军人和其他党 – 苏维埃工作人员。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揭露了”所谓的“乌拉尔暴动总部，右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教徒集团，以及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代理机关”，其领导人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员会书记、自 1914 年起成为苏共党员的卡巴科夫。据说这个总部联合了 200 个已经按军事模式形成的分支机构，15 个暴动组织和 56 个小组。

在临近 1937 年 12 月的时候，在基辅州“揭露了”87 个暴动破坏组织和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以及 365 个暴动 – 颠覆和破坏小组。

虚构出来的这些类型的反革命组织，不仅存在于各边疆区、州和地区，甚至存在于某些企业，而且无一例外地超越了国界。例如，在斯大林诺市鲁贝让斯基化工联合企业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反革命托洛茨基间谍 – 破坏组织”，并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谍报机关有着直接的联系。

从自 1906 年起成为苏共党员、于 1937 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逮捕的 A.M. 罗森布吕姆的证词中可以清楚，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是如何制造了各种“反苏维埃中心”或者“集团”的。

罗森布吕姆在 1955 年接受询问时证明说，在被逮捕之后他受到了残酷的拷打，在这些严刑拷打过程中，他被强迫承认无论是关于他本人的，还是其他人的虚假的证词，而同时，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按照法庭的判决被枪毙了。在这之后，他被带到了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里。

扎科夫斯基说：顽抗是毫无意义的，被逮捕的人员只有一个去处——就是监狱，然后建议：如果他在法庭上提供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虚构的列宁格勒颠覆、间谍、破坏和恐怖“中心”的虚假证词的话，就可以给他自由。

罗森布吕姆证明说：“……为了让我明白，扎科夫斯基在我面前展示了几个已经准备好的关于这个中心及其分支机构情况的方案……

“在向我详细介绍了这些情况之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已经准备了关于这个中心的案件，并将公开审理这个案件。

“将被交付法庭审判的有该中心的 4–5 名领导人——丘多夫、乌加洛夫、斯莫

罗金、波泽恩和沙波什尼科娃等人，以及每个分支机构的 2–3 人……

"……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事先应该天衣无缝地准备好。而在这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证人。这个证人的社会出身（当然是过去的）和党内地位，在此将起到非同小可的作用。

"你本人不用去虚构任何东西。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先将向你提供有关这个中心和分支机构的材料，你的任务就是背熟这些情况，记牢所有的问题和答案，在法庭上将会向你提出这些内容的。准备这个案件将需要 4–5 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就安心准备这些事情，不要为难审讯人员和自己。你今后的命运取决于审判的过程和后果。如果你畏怯和说假话的话，那就只好怨自己了。如果你按所说的那样去做，就能够保住自己的脑袋，政府将负担你的衣食住行，一直到死为止。"（科马罗夫卷宗调查材料，案卷页 60–69）

关于在审判过程中对法制的粗暴践踏

所进行的有害于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毫无理由的大规模逮捕行动，导致了在审判机关、检察院和法院里的对苏维埃法制的粗暴践踏。

根据叶若夫及其助手们的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和地方的业务工作人员，放弃了揭露苏联人民真正敌人的谍报工作，而把精力投入到逮捕和审讯上，以便利用一切手段论证不合法的逮捕，并做出假象以表明确实存在着各种反苏维埃组织及其分支机构。

混入国家安全机关的党的敌人，以及钻进这些机关的追求功名利禄和阿谀奉承者，他们自己干了卑鄙的勾当，并利用欺骗和恐吓的手段，把为保护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利益而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党务机关的一些诚实的党员，卷入了这些阴暗的勾当里。

肉体惩罚和严刑拷打，极其消耗体力的连续数小时的审讯、恐吓和诱供，作为"揭露敌人"的唯一的方法，已经被"合法化"了。

由 1934 年 12 月 1 日法令核准并被简化的审判，排除了对"强逼出来的"供词进行某种调查的可能性，而这种调查也"不需要"，因为法院和三人小组是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做出判决的。

在许多地方，首长们都是事先明确：每个审讯员在一昼夜里应该获得多少供词，在每份被告人的审讯记录里，指出多少个反苏维埃组织的成员的名字。

通常，审讯记录是在被告不在场的情况下制造的，后者对于"自己供词"的内

容，经常是只有在签名的时候才知道。

为了获得更多数量的证词，在一系列国家安全机关里，采用了直接诱供的手段。劝说被告提供关于他们仿佛进行了有利于外国谍报机关的间谍工作，同时还解释说，党和政府需要这种虚构的证词。在这种情况下，还向被告允诺，在提供了这种“供词”之后他们就会获释。

下阿穆尔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原负责人费尔德曼，在自己的1939年9月10日的亲笔证词中指出：他不得不详细审讯被逮捕的师长杰列夫佐夫，因为他推翻了此前交待的证词，而作为对推翻证词的原因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声明说：

“阿诺尔多夫欺骗了我，他说：我不会被逮捕，而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派，我被动员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在特种远东红旗集团军里的托洛茨基军事阴谋。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这是骗局，我的妻子已经被赶出家门，并被逮捕，东西被没收……”（费尔德曼调查档案卷宗，第137366号）

以下实施方法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把诱供者代理人或者某位已经能够顺从地签署任何谎言的被告投入囚室里，安插在没有提供所要求的证词的被告身边，他的责任是劝说没有提供“承认”自己罪行的证词的人。例如，安·谢·布勃诺夫劝说帕·彼·波斯特舍夫、C.C.施瓦茨和E.Г.叶夫多基莫夫，甚至给与瓦·康·布柳赫尔在一个囚室里的代理人送去白兰地酒，而劝说是在饮酒的时候进行的。

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里，几乎所有的人，从人民委员叶若夫到普通的工作人员，都曾经使用严刑拷打的方法来强行索取虚假证词，这是在审讯工作方面的极其严重的破坏行为，给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领导者关于伪造案件的指示，正是由此传播到地方机关的。

以下案件可以证明充斥在审判机关里的这种气氛：

帕·彼·波斯特舍夫案件

波斯特舍夫同志在1904年，当他还是一个16岁的少年的时候，就加入了我们党的队伍，从那时起一直到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候，他始终是党的一名积极的战士。苏联人民非常了解波斯特舍夫同志的功绩。他积极参加了游击运动，以及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在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波斯特舍夫同志担任了党的高级领导工作：基辅省委书记、联共（布）中央书记、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和古比雪夫州委第一书记。

1938年2月21日，波斯特舍夫同志被逮捕，并被指控参与了旨在推翻苏维埃

制度的右倾托洛茨基阴谋，除此之外，他还被指控为日本、波兰和德国的间谍分子。由乌尔里希、德米特里耶夫和苏斯林组成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波斯特舍夫同志枪决。当天判决被予以执行。

现在，无疑已经证明了，这是对波斯特舍夫同志进行的卑鄙的迫害。还是在对波斯特舍夫的案件进行审讯的过程中，一位审讯员给叶若夫写到：对波斯特舍夫采取了非法的审讯手段，波斯特舍夫关于其“间谍”和其他反苏维埃活动的“证词”，是在波斯特舍夫不在场的情况下由审讯人员撰写的。

有文件证明，关于波斯特舍夫同志案件的整个最卑鄙的离间行为，以及他被残忍地消灭，都是经斯大林同志批准的，正如对其他所有的党和经济机关领导干部的案件所做的那样。

在1955年6月，最高法院因缺乏波斯特舍夫犯罪活动的证据，撤销了此前对他的案件的判决。

斯·维·柯秀尔案件

斯·维·柯秀尔，自1907年起成为党员，过去曾经做过钳工，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前曾多次被逮捕和被流放。在二月革命之后，柯秀尔同志成为彼得堡市党委委员，在1919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然后是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书记。在1924年，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斯·维·柯秀尔被选为中央委员，自1925年至1928年担任联共（布）中央书记，而自1928年到1937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总书记。自1937年起，柯秀尔同志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柯秀尔同志被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8年5月3日，斯·维·柯秀尔同志被逮捕，并于1939年2月25日被军事法庭判处枪决。理由是据说他在1922年就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波兰军事组织），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是毕苏斯基在乌克兰的特使，以及在1934年成立和领导了“乌克兰反革命阴谋恐怖中心”。

文件证明：对斯·维·柯秀尔同志的逮捕没有任何根据和理由。自从被关进列弗尔多夫监狱的第一天起，就对他实行了最残暴、最野蛮的拷打，对他连续审讯14个小时以上，在夜晚，不许他睡觉和最起码的休息。他被详细审讯了54次，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尽管实际上仅有4份审讯记录。

被剥夺睡眠，残酷的体罚和严刑拷打，迫使斯·维·柯秀尔同志在那些在被告

不场的情况下，由审讯员任意制造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名字。

罗·英·艾赫案件

罗伯特·英德里科维奇·艾赫，拉脱维亚人，自1905年起为苏共党员，是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的活动家之一，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在数年期间，他一直担任党的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艾赫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被逮捕之前，是苏联土地人民委员。

艾赫于1938年4月29日，在未经苏联各级检察长认可的情况下被逮捕，而苏联各级检察长的认可只是在艾赫被捕15个月之后才发出的。

对艾赫案件的审讯过程，是对法制最粗暴的践踏，是专横和伪造的行为。对其指控所依据的是明显捏造和矛盾的证据。

在对艾赫实行严刑拷打之后，逼迫他在事先由审讯员捏造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其中列举了对他本人和其他一系列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工作者的指控，以及他们进行反苏维埃活动的罪行。

1939年10月1日，艾赫向约·维·斯大林提出声明，坚决否认自己的罪行，并请求查明其案件的真相。他在声明书中写到：

"……我一生都在为苏维埃政府战斗着，再没有比在这个政府的监狱中坐牢更为悲惨的事情了。"（艾赫卷宗，第1卷，文件夹）

艾赫于1939年10月27日再一次向斯大林同志递交了申诉书，这份文件现在仍然被保留着：

"今年10月25日，我被告知案件的审理已经结束，还让我看了审判书。如果我真犯了加在我头上的哪怕百分之一的罪过的话，我此刻也没有胆量向您递交这份死前的申诉，然而，我没有犯任何罪行，那些对我的指控是捏造的，我的心灵没有丝毫的污点。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而现在，当我的双脚已经接近坟墓的时候，我仍然不会对您撒谎。我的整个案件完全是诱供和诽谤的结果，是践踏革命法制基本准则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我的审判卷宗里的揭露我的证词，不仅是荒唐的，而且包含着在一系列方面对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诽谤，因为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不是根据我的提议和我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的正确的决议，被描绘成是按照我的提议进行的反革命组织的敌对行动。

"从证词中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这个证词说，我仿佛是集体农庄建设

的破坏者，就是因为我在边疆区代表会议和联共（布）区委全体会议上宣传了建设大规模的集体农庄。我的所有这些演说都有速记记录，并在报刊上发表过，但是，指控丝毫没有援引任何具体事实和讲话摘录，这种指控永远不会有任何人能够证明的，因为在西伯利亚的整个工作期间，我坚定地和毫不留情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西西伯利亚地区的集体农庄是非常牢固的，与联盟的其他产粮地区相比较，它们是最好的集体农庄……

“当时负责我的案件的乌沙科夫可以证明，利用在西伯利亚得到的供词，添补了从我这里逼供的一切虚假的供词，而我的供词又通过电话传达到新西伯利亚。

“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和最无耻的事情，中尉普罗科菲耶夫当着我的面与新西伯利亚通了电话。

“现在让我来谈一下我生命中最耻辱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人民面前犯下的真正严重的过错。这就是我招认了自己从事反革命活动……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乌沙科夫和尼古拉耶夫对我进行了严刑拷打，特别是前者，他机智地利用了我的被打断的脊柱，使我遭受无法忍受的疼痛，并在我疼痛难忍的时候逼迫我诽谤自己和其他人。

“我的绝大部分证词是乌沙科夫提出由我执笔的，或者是他口述的记录，其余的内容是我重新抄写内务人民委员部从西西伯利亚弄到的材料，并把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材料中所援引的所有这些事实全部强加于自己。如果在乌沙科夫制造和我署名的“神话般”的口供里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那么，就强迫我在另外一份口供上署名。比如对待鲁希莫维奇就是如此。最初他被指控是‘预备总部’的成员，而后来，甚至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就勾掉了这个名字，对‘预备总部’的领导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并说‘预备总部’仿佛是布哈林在1935年成立的。在对我进行审讯时，最初命令我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们又建议我写上瓦·伊·梅日劳克，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事情……

“……当审讯人员连续审讯了我16个小时，并使我丧失了意识的时候，我提供了这些虚假的证词，当他提出最后通牒性质的问题——在两支笔（写字的钢笔和打人的电棍）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我认为他们将把我带到另外一个监狱里枪毙，于是，又一次表现出了畏怯，并提供了诽谤性的证词。当时对于我来说，反正强加什么罪行都一样，只是最好快点枪毙，而不是重新施以酷刑……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我请求您，恳求您，下达命令重新审理我的案件，这并不是为了宽恕我，

而是为了揭露这些最卑鄙的诱供行为，这种行为像一条毒蛇一样缠住了许多人，尤其是由于我的屈服，以及他们的罪恶中伤。我从来没有背叛过您，从来没有背叛过党。我清楚，我正在走向死亡，那是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的最卑鄙、最下流无耻的行为的结果，他们制造了迫害我的挑衅行动。我的梦想过去是，今后将仍然是为党、为您而死去。"（艾赫卷宗，第1卷，文件夹）

这份声明是由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提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贝利亚的。

1940年2月2日，艾赫被交付审判。在法庭上艾赫不承认自己有罪，正如审讯记录中记录的那样，他声明说：

"……在似乎是我交待的供词中，除了下面的签名之外，没有一个字是我说出来的，就是这些签名也是被迫的。供词是在审讯员的压迫下制造出来的，从我被逮捕时起，就开始对我施实严刑拷打。此后，我就开始写了这些荒唐至极的东西。除此之外，审讯人员还利用了我有病的身躯（我的脊柱已经被折断），在上面击打，就像在琴键上做的那样。这是无法忍住的酷刑，我没能挺住。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向法庭，向党和斯大林表明，我没有犯罪，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什么阴谋行动。在我的整个生命中，我始终坚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我将抱定这个信念而死去。"（艾赫卷宗，第1卷，文件夹）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由乌尔里希、克利明、苏斯林组成），在听完艾赫这个声明之后，仍然在虚假的材料上盖了章，并判处艾赫枪决。判决在两天之后，即1940年2月4日被执行。

目前，已经可以清楚地证明：艾赫的案件是伪造的。

扬·埃·鲁祖塔克案件

苏维埃国家著名的活动家之一，扬·埃连斯托维奇·鲁祖塔克，于1905年还是18岁的少年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在沙皇时代多次受到宪兵局的追捕，并被判处死刑，由于是未成年人而被流放终身服苦役。在流放地度过10年之后，被革命解放了。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鲁祖塔克成为弗·伊·列宁的一名助手。

在1921年，鲁祖塔克按照列宁的提议起草了工会提纲，这些提纲是以在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中形成的列宁主义纲领为基础的。

鲁祖塔克一直积极地捍卫着党的总路线，与一切反党派别的反对立场进行斗争。他多次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鲁祖塔克

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被捕之前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1937年5月25日，鲁祖塔克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并被指控领导拉脱维亚反苏维埃民族主义组织，从事颠覆活动，是外国谍报机关的间谍。在军事法庭审判时，鲁祖塔克不承认自己有罪。在审讯记录中，书记员记录了鲁祖塔克在法庭上的声明：

"……他对法庭的唯一请求，就是希望报告联共（布）中央，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存在着还没有被根除的肿瘤，这就是人为地制造案件，逼迫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对指控的罪行不进行调查，甚至不给任何机会让人们证明自己与那些用形形色色的人的口供制造出来的犯罪行为毫无关系这一事实。他们审理案件的方法是：把谎言强加在人们头上，强迫人们臆造和诽谤那些无辜的人们，就更不用说被告本身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事情写给联共（布）中央。他要法庭相信，他本人从来没有过任何反对党的政策的恶意，因为他一直是完全拥护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里执行的全部政策。他再一次请求法庭给他机会，让他把所知道的关于审讯方法的一切情况，详细地写给党中央。"（鲁祖塔克卷宗，第1卷，案卷页）

完全漠视鲁祖塔克的这个声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由乌尔里希、尼基特钦科、戈里亚切夫组成）于1938年7月28日，只用了20分钟就做出了判决，鲁祖塔克被枪决了。判决当时就被执行。

在1955年，对该案件进行了仔细的调查表明，对鲁祖塔克的指控是伪造的，他是根据虚构的诽谤材料被判罪的。

鲁祖塔克在死后被恢复了名誉。

弗·雅·丘巴尔案件

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的活动家之一，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丘巴尔，于1891年出生，于1907年入党，在多年期间领导着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工作，后来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丘巴尔是党的一系列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在党的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

1938年7月4日，丘巴尔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并被指控参加反苏维埃恐怖颠覆－破坏组织的活动，是德国谍报机关的代理人。

1939年2月26日，丘巴尔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由乌尔里希、德米特里

耶夫和苏斯林组成）判处枪决。判决在同一天予以执行。

1955 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检察院对该案件进行调查之后，确定：对丘巴尔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

目前，丘巴尔的案件已经被终止，他在死后被恢复了名誉。

叶·格·叶夫多基莫夫案件

叶费姆·格奥尔基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1891 年生人，自 1918 年起为苏共党员，原苏共中央委员，是国内战争最积极的参加者，与反革命进行了坚决和积极的斗争，因对祖国的贡献而被授予列宁勋章和五枚红旗勋章。长期以来，叶夫多基莫夫一直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担任领导工作，而在 1933 年被选为北高加索党的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在对叶夫多基莫夫进行逮捕之前，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没有任何关于他仿佛从事犯罪活动的材料。

在 5 个月的被关押期间，尽管遭到了极其沉重的肉体惩罚，叶夫多基莫夫坚决拒绝招认自己有罪。

在卷宗里保留着他的申诉书，其中写到：

"我无法承认审判员向我出示的关于我背叛祖国的指控。我从来没有背叛过祖国。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的、反苏维埃的组织和集团。而恰恰相反，在党的队伍里和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期间，我领导了与一切反革命和反苏维埃活动的坚决斗争。

"我承认，在与人民敌人进行斗争的工作中，我曾经犯过政治错误……

"现在我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再像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去生活、工作和战斗了，尤其是在斯大林在 1937 年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体会议上下达指示之后。但是，我要重复的是，我不是党的叛徒，也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反党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阴谋集团……"（叶夫多基莫夫卷宗，第 1 卷，案卷页 40）

从卷宗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段时间里，审讯员们竭尽全力逼迫叶夫多基莫夫提供他们需要的口供，为此还进行了诱供。

1939 年 1 月 17 日，叶夫多基莫夫接连三次与尼古拉耶夫－茹里德、叶若夫和考尔（现在已经被恢复名誉）进行当面对质。所有这三个人都揭露叶夫多基莫夫参加了反苏维埃组织，而他坚决否认了这一切。有鉴于此，审讯员在对质记录中写

道：

“由于被告叶夫多基莫夫，尽管预先已经对其进行了警告，仍然表现得富于挑衅性，并干涉被告尼古拉耶夫－茹里德提供实质性的口供，因此，对质中断了。”（叶夫多基莫夫指控卷宗，第2卷，案卷页7）

叶夫多基莫夫没有在对质记录上签名。

1939年2月24日，与叶夫多基莫夫关押在同一间囚室里的囚犯C.C.什瓦尔茨报告说：

“……他称阴谋案件是‘虚构的’。审讯员被激怒了，并骂他们畜生……

“我按同志式的方式劝他提供口供……

“……有一次，在连续不断的审讯之后，叶夫多基莫夫回到囚室说，他累了，准备在一切文件上署名……”（叶夫多基莫夫指控卷宗，第5卷，案卷页196–198）

1939年3月2日，根据医生的坚持，被严刑拷打折磨生病的叶夫多基莫夫，住进了监狱的医院里。同时，科布洛夫下达命令：“与洛博夫安排在一起。”（这时的洛博夫已经屈服，他可以提供任何需要的证词。）

1939年3月28日，在给贝利亚的申诉书中，洛博夫写道：

“在今年3月2–14日我与囚犯叶夫多基莫夫同住一家医院期间……他说，他现在仅希望有一件东西，这就是一枚炸弹，以便能够炸毁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整个审判机关，他本人与它们一起升上天空，这种诽谤和迫害无辜人们的苏维埃机关，只能被称为法西斯的……

“……在梦话中叶夫多基莫夫说：‘萨什卡，混蛋，你为什么背叛……多么可怕，多么可怕……’

“……从医院出来之后，叶夫多基莫夫决定不投降，而宁愿去死，不管今后面临着什么样的折磨；当时，在他看来，也可能，在中央委员会里，人们会考虑这位没有丧失意志的‘敌人’如此英勇地死去的原因。”（叶夫多基莫夫卷宗，第5卷，案卷页203–204）

5个月连续不断的严刑拷打，摧毁了叶夫多基莫夫的意志，他开始提供明显虚假的、矛盾和与事实不符的口供，并招认了自己有罪，犯有严重的反国家罪行。

第一份这样的审讯记录标注的日期是1939年4月13日。

审讯是由梅尔库洛夫进行的。

1940年2月2日，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开庭时，审理了对叶夫多基莫夫的指控案件，在法庭上，他完全推翻了以前招认的口供，并断言自己没有任何罪

过，他申诉说：

“我不承认自己参加了右倾托洛茨基组织……

“我清楚，关于我的问题已经被决定了。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自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我从来也没有当过资产阶级的间谍和走狗。

“在 1923 年的时候，我的哥哥被杀害了，我怀疑这是波兰人干的，因此，我怎么能够与波兰人一起工作呢？我抨击所有波兰阿塔马诺夫 – 匪徒，我从来没有当过他们的代理人。

“我开始提供招认自己有罪的证词，是在与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当面对质，尤其是对我施加肉体刑罚之后。

“在预审时我一共说出了大约 124 名阴谋的参加者，但这是谎言，在这些谎言中我招认自己是有罪的。

“我从来也不是右翼分子，今后也不会是……

“其他阴谋参与者的证词与我的证词完全相符，只是因为我们大家有着一个主人——审讯员……

“我只有一个请求，仔细查明我的案件。

“我感到倍受折磨的是，我中伤了许多人……”（叶夫多基莫夫指控卷宗，第 1 卷，案卷页 97–99）

在自己最后的陈述中，叶夫多基莫夫说：

“我很快就要死了，但是，我还想对法庭说，在新领导人（指贝利亚）之下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仍然会像在叶若夫在位时那样工作的，而由此还会出现反革命组织，仍然会使我和其他人成为这些组织的领导人。

“我坚决请求向斯大林报告这一点。我不是混蛋，但是，在预审时我却变成了这种混蛋，因为无法忍住（酷刑）而开始撒谎了，开始撒谎是他们接连不断地殴打我的结果。”（叶夫多基莫夫指控卷宗，第 1 卷，案卷页 100）

尽管这种翻供如此有说服力，尽管在卷宗里缺乏客观的犯罪证据，仅仅依据其他囚犯虚假的口供，而这些口供中没有任何具体的事实，由乌尔里希、苏斯洛夫和克利明组成的法庭，仍然做出了有罪的判决，叶夫多基莫夫被处决了。

拉·约·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案件

拉夫连季·约瑟法维奇·拉夫连季耶夫，自1910年的苏联共产党党员，革命前夕处于流放之中，而自1917年起直到被逮捕之日，一直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在1917年，是基辅省委书记。在1918–1919年期间，在奥德萨和基辅市从事地下工作，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建立之后，在基洛夫格勒和基辅担任俄共（布）省委书记。1923–1929年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期间，拉夫连季耶夫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接着，再一次担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在接下来的年代里，他是西西伯利亚和远东边疆区委书记，自1936年起，担任克里木州委书记。

在党的队伍里，拉·约·拉夫连季耶夫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和机智的组织者。长期以来，拉·约·拉夫连季耶夫一直与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一起工作，与他是亲密的朋友。

正如调查表明的那样，1937年6月22日对拉·约·拉夫连季耶夫的逮捕，是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进行的，是贝利亚的旨在反对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及其战友的敌对行动之一。

对拉·约·拉夫连季耶夫案件的审判，是由贝利亚的走狗们——科布洛夫、克里米扬和萨维茨基进行的，他们通过野蛮的暴行和严刑拷打，逼迫他诽谤自己，并强迫他在关于参加右翼分子组织、进行敌对和间谍活动，以及准备恐怖行动的口供上署名。

在调查过程中，被审问的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的狱吏苏尔马夫交待说：

“审讯员在审讯时无情地拷打囚犯。尤其残忍的是克里米扬、萨维茨基……在被审讯时遭到严刑拷打的还有囚犯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沙尔瓦·艾利阿瓦、卡尔特韦利什维利……

“我经常从审讯现场把这些囚犯拖走，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无法走路了。”（拉夫连季耶夫案件调查材料，第2卷，案卷页157）

目前，许多受到拉夫连季耶夫诽谤的和他们自己也对拉夫连季耶夫进行了诽谤的同志（奥拉赫拉什维利、艾利阿瓦、斯涅戈夫、马穆利亚和其他人），已经完全被恢复了名誉。可以清楚地表明，在严酷的地下斗争年代证明了自己对列宁党的忠

诚，为巩固苏维埃国家，尤其是巩固远东地区边界做出了如此重大贡献的的老布尔什维克，无辜地惨死于贝利亚暴徒－诱供分子手中。

约·斯·温施利希特案件

约·斯·温施利希特同志，自1900年起成为我们党的成员。在十月革命之前，他遭到6次逮捕，在沙皇的监狱里和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度过了许多年。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岁月里，约·斯·温施利希特同志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1919年，他是人民军事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西部战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然后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自1921年起，约·斯·温施利希特同志与费利克斯·捷尔仁斯基一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里工作，是全联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数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参加者。

1937年6月11日，温什利希特被逮捕，并被指控似乎是从1917年开始，他就已经成为"波兰军事组织"在苏联境内的"领导人"，并从事间谍－恐怖活动，随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枪决。

对温什利希特的所有指控都是建立在假供上。但是，当被召到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时，温什利希特申诉说：

"……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波兰军事组织'，之所以提供这些虚假证词，是因为他无法忍受长期对自己施加的严刑拷打。在苏联检察长对其进行审讯期间，对于参加反革命组织的指控没有做任何的申诉，这是因为在那次审讯过程中，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好几个代表都在现场，他害怕推翻从前的口供，会招致更残酷的肉体折磨，因此，他在苏联检察长面前确认了自己以前的口供。"（温什利希特案件，第1卷，案卷页103）

尽管对温什利希特同志提出的指控是荒唐的，尽管在法庭上他坚决地推翻了此前由于遭受酷刑而提供的供词，军事法庭仍然对他判处了极刑。

从实质上来说，这根本不是审判，而只是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完成的捏造行为。像温什利希特同志这样重大的案件，仅仅用20分钟就做出了判决，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瓦·康·布柳赫尔案件

曾经担任红旗远东特遣军总司令的苏联元帅布柳赫尔，作为在国内战争年代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的军事长官，在苏维埃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布柳赫尔的功绩受到过苏联政府的高度评价。布柳赫尔曾经被授予一级红旗勋章和一级红星勋章。

在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布柳赫尔同志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38 年 10 月 22 日，布柳赫尔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针对布柳赫尔提出了诽谤性的指控：说他参加了右倾反苏维埃组织和军事阴谋，对此布柳赫尔进行了坚决的否认。

对案件的调查表明：对布柳赫尔提出的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他是无辜被逮捕的。

应该指出：在布柳赫尔被逮捕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提出了一系列囚犯（拉夫连季耶夫、杰里巴斯和其他人）的指控，为了削弱苏维埃军队，他们准备了针对布柳赫尔的恐怖行动。

在布柳赫尔被逮捕之后，贝利亚本人及其走狗们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殴打。

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名审讯员戈洛夫廖夫，在 1955 年被审讯时交待说，他是最先看到囚犯布柳赫尔的：

"……我立即注意到，布柳赫尔刚刚遭到严重的拷打，因为他的脸有很多青伤痕，整个脸部已经肿起来了。"（布柳赫尔案件，第 1 卷，案卷页）

由于遭到野蛮的殴打，布柳赫尔在被逮捕的第十八天，也就是 1938 年 11 月 9 日死去。在当天的夜间，梅尔库洛夫与手下一起把布柳赫尔的尸体运去火化了。

伊·彼·诺索夫案件

伊万·彼得罗维奇·诺索夫，自 1905 年起成为党员。在被逮捕之前是党的伊万诺夫州委第一书记。自 1918 年到 1937 年期间，负责党的领导工作，曾经担任过一系列党的地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书记职务。多次被选进党的领导机关里，积极参加了党的代表大会和党务会议的工作，在联共（布）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937 年 11 月 27 日，他被指控为反右翼苏维埃组织和敌对－破坏组织的成员，并通过这个组织领导在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全部破坏活动，根据军事法庭决议，他被处决了。

从对诺索夫提出指控的表述本身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案件只有恶毒的诱供分子才能制造出来。被逮捕的原伊万诺夫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拉济维洛夫斯基的供词，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囚犯拉济维洛夫斯基在 1939 年 5 月 31 日被审问

时，交待说：

“……叶若夫对我说，将派我到伊万诺沃市工作6个月，然而，给我提出的任务是：在最短的期限内在那里展开工作，以便尽可能快地向联共（布）中央证明：在伊万诺夫州已经不存在苏维埃政权了，只有在那里恢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预。对于我的问题——为此我应该在伊万诺沃采取什么措施，叶若夫建议我从大规模地逮捕州和地区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干部开始，以便表明：伊万诺夫州是右翼分子的基地。与此同时，叶若夫还向我指明，尽管在中央委员会里，人们信任诺索夫[联共（布）州委书记]，而我的任务应该是证明他与莫斯科的右翼分子的联系，以便以此来动摇人们对他（诺索夫）的信任，并达到逮捕他的目的……

“在执行以上所述的叶若夫的敌对的反苏维埃的指示的过程中，我做了如下事情：广泛地煽动和臆造了关于在伊万诺沃存在着右倾反苏维埃组织的案件，并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和追究伊万诺沃州党委员会和州执行委员会的一系列领导干部的责任。

“因为叶若夫要求证明诺索夫与莫斯科的右翼分子有联系，因此，根据我的指示，在叶帕涅奇尼科夫、叶法诺夫和阿列耶夫的口供里，记录上了诺索夫领导了伊万诺沃的右翼分子组织，并与莫斯科的柳比莫夫（原轻工业人民委员）保持着联系……

“……根据向叶若夫提交的这些材料，并根据他的命令，诺索夫在莫斯科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拉济维洛夫斯基卷宗，第1卷，案卷页472–477）

调查表明：对诺索夫案件的审判过程，是对苏维埃法制的最粗暴的践踏行为，并通过严刑拷打使他屈招。

诺索夫于1955年在死后被恢复了名誉。

卡·雅·巴乌曼案件

党的最年长的活动家之一，卡尔·雅诺维奇·巴乌曼在1907年加入党的队伍。

在负责一系列党的工作的年代里，巴乌曼被多次选入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被逮捕之前，卡·雅·巴乌曼担任苏共中央部的部长职务。

巴乌曼于1937年10月12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此后立即遭到了残酷的拷打，在被逮捕的两天之后，也就是10月14日，巴乌曼未经法庭审判，就被打死在列弗尔多夫监狱里。

在巴乌曼的卷宗里，有一份巴乌曼在死亡的当天写的一份申诉文件。这是一份滴血的申诉状。

在 1955 年进行的调查表明：巴乌曼是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他在死后被恢复了名誉。

Н.П. 科马罗夫案件

Н.П. 科马罗夫，过去曾经当过工人，于 1909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是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和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在所有这些党的代表大会上，Н.П. 科马罗夫同志都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在国内战争年代，科马罗夫是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并积极领导了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他一直担任着党和苏维埃的最高级领导职务：中央西北局书记，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主席，苏联部长会议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俄罗斯联邦公共事业人民委员。

众所周知，科马罗夫积极地领导了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斗争，斯大林曾经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过这一点。科马罗夫从来没有参加任何反党的派别。在党的代表大会和党务会议上的演说中，他一贯坚持党的总路线。

但是，在 1937 年 6 月，科马罗夫同志却遭到了逮捕，1937 年 11 月 27 日，因被指控似乎“是右翼反革命恐怖组织的积极分子”和“准备进行针对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领导干部的恐怖活动”，而被军事法庭判决有罪，并被处决。

审讯员 – 伪造者之一，后来因捏造虚假案件被逮捕并被判罪的一名囚犯证实：科马罗夫的所有“口供”，都是由原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的首长斯特罗明，在他还没有看到囚犯科马罗夫的时候写好的，“科马罗夫本人初次知道自己口供的内容，是在斯特罗明使他确信，这样的口供对他有利，并让他在那份他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写好的口供上署名的时候。”

调查无可争议地表明：对科马罗夫同志的逮捕和判决，是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根据那些明摆着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捏造出来的材料进行的。

按照在审讯过程中利用严刑拷打和肉体折磨获得的没有根据和明显虚假的材料而被判处枪决的苏联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名单，很可能还会广泛地被扩大。

由于叶若夫和贝利亚组织的诱供行动而悲惨死去的同志有：瓦·伊·梅日劳克、亚·瓦·科萨列夫、И.Д. 卡巴科夫、威·格·科诺林、И.Ф. 科达茨基、Л.И. 米尔佐

扬、约·阿·皮亚特尼茨基、莫·利·鲁希莫维奇、M.M. 哈塔耶维奇、鲍·彼·舍博尔达耶夫、格·纳·卡明斯基、彼·伊·斯莫罗金、Я.Б. 贝基、沙·祖·艾利阿瓦、尼·费·吉卡洛、Э.К. 普拉姆奈克、A.И. 克里尼茨基、H.H. 科洛季洛夫和其他人。

应该指出：囚犯的审讯记录都被定期地寄发给斯大林同志和政治局的某些委员，对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边疆区和州委书记所采取的行动，都是根据这些囚犯的口供进行的。在这类工作人员被逮捕之后，他们的审讯记录也同样被寄发到上述所说的地址。

党的损失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被逮捕之后死去的无辜的人们，许许多多党员同志受到了毫无理由的诽谤，并被剥夺了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权利，其中一部分人处于被逮捕的威胁之下，有些人无法忍受这种迫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37–1938 年期间进行的大规模镇压运动，实际上已经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工业部门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给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开展大规模的毫无根据的镇压行动的同时，叶若夫在会议上公开声明说，他是按照上级指示行事的。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原领导干部卢洛夫在后来接受审讯时，就这个问题交待说：

“……在一次由叶若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开的审讯人员会议上……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说：‘在我们进行的摧毁反革命的行动中，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些无辜的人们蒙受苦难，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说到关于‘我们应该考虑’这句话时，让在场的人觉得，叶若夫并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做这种事关重大的声明的。”（卢洛夫卷宗，第 1 卷，案卷页 183–184）

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的首长们，对叶若夫的这些指示做出了相应的反应。

还是那个卢洛夫在被审讯时，交待说：

“在 1937 年和 1938 年初，像德米特里耶夫这样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的首长们，直接给叶若夫发出长长的电报，请求批准逮捕……这些电报由一连串的名字组成，其中有数十名区团委书记、党委书记、主席等等。

“尽管逮捕这些人员的必要性，比电报中论证的理由还要弱，叶若夫仍然接连不断地、机械地和笼统地批准了这些逮捕……

“……有一次，在叶若夫那里汇报工作时，布拉赫（原奥尔忠尼启则边疆区内

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向他讲述了为完成他的命令而制定的关于给反革命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的计划。这个计划分几个灭绝性的阶段……首先应该镇压党的边疆区委员会书记，然后镇压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再接下来是合作社工作人员，同时还列出了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名字。叶若夫对这个计划表示赞成……”（卢洛夫卷宗，第1卷，案卷页184、188、189）

从现有的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审讯过程中，粗暴践踏法制的气氛笼罩着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的地方机关。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处原负责人舍卢德琴科，承认他曾经殴打过许多囚犯，并伪造了他们的审讯记录，他交待说：

“……在囚犯之中，联共（布）州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几乎所有领导人，以及几乎所有的人民委员都在其中。州委书记列巴在泽季克的办公室里跪了6天，什么也没有交待，只是在11月6日才被我送到囚室里。”（列巴的调查材料，案卷页73）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原工作人员格里舍奇金，在接受审讯时交待说：

“……舍卢德琴科从其前任手中接收了500多名囚犯，其中绝大多数囚犯是民族主义组织的参加者，也就是几乎所有的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干部。在这些囚犯之中，没有一个人认罪的。

“……在一次业务工作会议上，舍卢德琴科以如下方式评定了这种状况：‘对罪犯进行纵容，不愿意与反革命进行斗争，拥有机会主义立场，等等。’”（列巴的调查材料，案卷页77）

在任何一个共和国和州里，都能够找出大规模粗暴践踏法制的实例。

例如，在1938年初，为了执行侦查－行动任务，以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副局长库尔维茨为首的一个行动小组来到了博代博地区。

行动小组的工作人员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对博代博地区的工人和职员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并指控他们犯有严重的国事罪行。

在这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原工作人员科莫夫做了如下交待：

“在库尔维茨小组到达的第一天，就逮捕了500人。逮捕行动无一例外地是根据民族和社会类别进行的，没有任何的犯罪材料。

“通常，中国人和朝鲜人无一例外都是被逮捕的对象。”（库尔维茨卷宗，第1卷，案卷页150–153）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图尔洛夫的口供中，关于这方面情况说：

“按照库尔维茨的要求，全体业务人员提交自己的统计情况。我向库尔维茨提交了一份大约600人的外国人名单。有中国人、朝鲜人、德国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芬兰人、马扎尔人、爱沙尼亚人和其他类似人员……

“逮捕就是按照这些名单进行的……

“在逮捕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时候尤其猖狂。在整个博代博城里展开了搜捕，预先确定他们的住址，然后派人去逮捕，规定按人头逮捕所有的中国人和朝鲜人……

“在3月的一天，库尔维茨回到办公室，布达科夫和我当时正在办公室里，库尔维茨说：你们向我报告说逮捕了所有中国人。这不，我今天还在街上看到两个中国人呢，我已经建议把他们抓起来了。”（库尔维茨卷宗，第1卷，案卷页156）

库尔维茨亲自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局首长进行的报告，就是所进行的这一行动的鲜明证据。在报告中谈到：

“关于德国谍报机关，在这方面我这里的情况不太好。的确，已经揭露了什瓦尔茨总部……但是，德国人做事更加认真。我正在努力地调查着。芬兰谍报机关是存在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也有。我还无法搜寻到意大利人和法国人……

“中国人全都被作为间谍分子和走私犯抓起来了，剩下的只是老人，总共有7人。

“我认为，对他们不值得浪费时间。他们已经老得动不了了。健康的都被我抓起来了。”（库尔维茨卷宗，第1卷，案卷页192）

对囚犯进行了严刑拷打，并向他们索取关于其他人的供词。根据这些没有经过任何调查确认的供词，进行新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然后再对这些被新抓来的囚犯施以酷刑。

关于审讯的进行情况，见证人格里茨基交待说：

“库尔维茨采用了新的审讯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站立’方法。把100–150人赶到一个房间里，让所有的人脸冲墙站着，一连几天时间，不允许他们坐下和睡觉，一直到他们招供为止。在囚犯中间摆上桌子和写字用具。谁愿意就去写口供，写好了才被允许睡觉。”（库尔维茨卷宗，第1卷，案卷页142–143）

在对囚犯采取肉体惩罚的同时，还对调查文件进行了拙劣的伪造。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图尔洛夫的下列口供：

“更糟糕的是对中国人、朝鲜人和其他民族的审讯，对他们按人头进行普遍逮捕是在1938年3月实施的。这些民族绝大多数人不懂俄语。没有翻译，审讯记录

是在囚犯不在现场的时候编制的，因为他们不懂……”（库尔维茨卷宗，第1卷，案卷页157）

在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也进行了这样的实践，这里制造了许多诱供案件，替被告人伪造了许多口供，虚假签名和其他类似的文件。在审讯过程中殴打囚犯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某处的负责人索特尼科夫在自己的声明中写道：

“大约自1937年9月开始，所有的囚犯在被审讯时都遭到了殴打……在审讯人员之间展开了竞赛：看谁能使更多的人‘招供’。这个宗旨的制造者是贝尔曼（白俄罗斯原内务人民委员），他在一次审讯人员会议上说：

‘列宁格勒和乌克兰每天都能编成一本集子，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为达到这个目的，每位审讯员每天至少要揭露一起案件。’

“残酷殴打囚犯甚至达到了暴虐的地步，这已经成为主要的审讯方法。如果审讯人员一天得不到一份口供的话，就被视为耻辱的事情。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呻吟声和嚎叫声不断，甚至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附近的街区里，都能听到这种叫声。在这方面，审讯机关尤其突出。”（叶若夫档案，第13号目录）

殴打囚犯和对其使用刑具，已经成为审讯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关于这个问题，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三处的负责人戈普什坦因说：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8月份，在白俄罗斯对波兰代理机关展开了大规模的行动……

“1937年10月下半月，我从莫斯科返回……贝尔曼对我说，我们已经极大地落后联盟其他所有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了，在列宁格勒已经揭露了2000人，在乌克兰揭露出4000人，因此，我们必须革新整个工作，贝尔曼建议我召开全体审讯员大会，他将下达指示……

“贝尔曼听取了每个审讯员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下达了关于可以殴打囚犯的指示，审讯记录应该是简短的，应该根据案件的类别，随着加工工作的进展情况，而把每个囚犯单独列入像册，而不是整批的……

“不久之后，在明斯克开始对每个囚犯都进行殴打。这种做法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他各部门里迅速盛行起来了。”（叶若夫档案，第13号目录）

正如白俄罗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确定的那样，维捷布斯克市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科诺瓦洛夫叫来囚犯，借口核对囚犯身份证上的签名，让囚犯们在空白纸上署名，然后再把他们想要的口供内容记录在这张纸上。

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新任奥尔忠尼启则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信，在信中他通报说，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的工作进行调查表明：存在着严重的破坏法制、捏造审讯卷宗的事实，并根据这些虚假材料做出枪毙的判决。

正如在信中指出的那样：

"……调查结果是，关于各地区广泛的右翼托洛茨基组织的案件，绝大多数都被化解了，而调查材料也不能证明，右翼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些地区存在的这个事实本身，如：在索尔达托－亚历山德罗夫斯克（237 名囚犯）、伊佐比连斯基（92 名）、什帕科夫斯基（28 名）、斯塔罗－马里耶夫斯基（44 名）、诺沃－亚历山德罗夫斯基（56 名）和其他地区……

"……从监狱中获释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绝大多数是地区农业和苏维埃党务机关的积极分子，土地部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农业技术人员。"（叶若夫档案，第 13 号目录）

在车里雅宾斯克州，由于聚集了大量的囚犯和希望尽快结束案件，对审讯过程进行了"合理化"，正如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里人们说的那样，准备了"备用材料"。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证人彼沃瓦罗夫在接受审讯时供认说：

"此外，为了加快审讯过程，准备了'备用材料'——按照当时的叫法。具体的做法如下：由审讯员编写的审讯记录，可在机器上复制多份（同时有 11 名打字员在工作）。对复制的审讯记录只做稍微的修改，变动一下数据，改变一下被招募的情形和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事实即可。

"利用这一方法'加快了'审讯过程，结果是，我们，业务工作人员，编制了 8–10 份记录，而像戈里格里耶夫那样的其他工作人员，一天就写出 18 份记录……市管理局的局长切尔诺夫在业务工作会议上，把他们作为榜样提出来，并称他们是'善于与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人们。"（И.Д. 利霍列特卷宗，案卷页 20）

把通过这种方式制造出来的审讯记录出示给囚犯们，他们在严刑拷打之下被迫署上自己的名字，攻击和诽谤自己及其他人，常常是中伤他们从来都不认识的人。

在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原工作人员别里亚林交待说：

“在第 61 号囚室里关押了 60 人……让他们一律朝着一个方向跪着，一连 5–7 昼夜保持着这种姿式，迫使他们招供。我本人就负责看管第 61 号囚室，与囚犯们一起呆了 7 天，不允许他们站起来……为了使囚犯招供，我们把他头朝下吊起来，直到他招供为止……

“在囚犯之中挑选 2–3 名身体健康的人，迫使他们殴打其他囚犯。”（M.И. 谢尔久科卷宗，案卷页 24）

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的原其他工作人员，也做了类似的口供。

作为强制手段还采取了冷水浴的方法，也就是把那些经过拷打仍然不肯在事先准备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名的囚犯，带到冷水管下，穿着衣服直接淋冷水，一直到他们坚持不住招供为止。

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的“阴谋”

大规模的非法逮捕，对囚犯普遍地采取肉体惩罚措施，伪造审讯记录等等，所有这些事情都出自于钻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某些敌人，以及混进这些机关里的追求功名利禄和无原则的阿谀奉承者之手，同时也是国内业已形成的总的政治局势的结果。

报刊、无线电广播、带有“叶若夫手套”的宣传画，以及领导干部的演说，不仅帮助了契卡分子集体，而且还帮助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干部认清了：在全国各地都存在着间谍–暴乱和类似组织的广泛的分支机构，以及进行全面清洗的必要性。绝大多数契卡分子对这一点没有持批评性态度，并相信了叶若夫的指示，因为他不仅是人民委员，而且还是联共（布）中央书记。在被引导着在某种情况下破坏了法制之后，契卡分子们就开始屈从于总的潮流，并经常在这方面表现出“积极主动”的精神。

应该指出的是，许多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党员，开始直接参加对囚犯实施的肉体惩罚措施。

在大规模逮捕行动期间，由于聚集了许多囚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系列机关里，尤其是在城市和地区机关里，仅仅是审讯工作人员本身，根本无法应付这种情况，甚至连为囚犯填表格的人都不够，于是，他们求助于其他辅助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与党务机关协商，从其他部门动员来许多共产党员。这些暂时被调来的人员参加了非法逮捕行动，看管那些被“罚跪”的囚犯，有时也参加对囚犯的殴打。与右倾托洛茨基间谍分子、敌对分子和其他两面派分子进行斗争的“变态心理”，笼

罩着许多人。

有不少这样的情况：一些非常清醒的工作人员对于这种行动的非法性非常气愤，于是他们自己也落入了监狱。叶若夫在法庭上自己最后的陈述中说，他自己逮捕了 14000 名契卡人员。

在获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之后，贝利亚再次发动了大规模镇压契卡人员的浪潮。除个别人之外，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管理局的局长，他们的绝大多数助手和各部门的大批负责人，都遭到了逮捕。在许多边疆区和州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的领导干部，有三分之二的人接连不断地遭到逮捕。

绝大多数被逮捕的契卡人员，被指责参加右倾托洛茨基集团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的阴谋活动。

叶若夫逮捕并指责说，他们与亚戈达一起制造了阴谋活动。而贝利亚逮捕并表明，正在消灭以叶若夫、弗里诺夫斯基和叶夫多基莫夫为首的阴谋中心。

绝大多数被逮捕的契卡人员被判处枪毙，与此同时，这一惩罚措施事先是与斯大林同志商量好的。为协商一致提交了这些人员的名单，但同时并没有指明“这些”材料的实质性。

在被逮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之中的许多人，尤其是贝利亚逮捕的那些人，他们犯下了应受惩罚的刑事罪，破坏了法制，应该把他们交付审判，而有些人是因为不赞成参与阴谋活动而被捕的。贝利亚本人在格鲁吉亚的时候，就做过许多这类违法乱纪的事件，此外，他不希望人为制造的阴谋、集团和各种平行以及预备总部，引起斯大林同志的怀疑。不能排除那样一种情况，即被逮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的主要“罪行”，是他们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党中央委员会多次向国家安全机关派出数千名忠诚于党的优秀干部。其中许多人被叶若夫和贝利亚“变成了敌人”，并被处决。

被逮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原工作人员所遭受的殴打尤其残酷，同时为他们捏造了同苏维埃和党务机关许多领导干部同样的案件。

在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工作方面检察机关对苏维埃法制的破坏

对苏维埃法制触目惊心的破坏，大规模逮捕无辜的人们，残酷地殴打、折磨和拷问囚犯，是在苏联检察机关的直接纵容下进行的。不但如此，在一系列情况下，检察机关是最粗暴地歪曲和践踏社会主义法纪和苏维埃法律秩序基础的直接参加者。

对公民的一切逮捕行动，通常是在没有检察长认可的情况下，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进行的。宪法关于“除根据法院决议或者检察长认可之外，不能对任何人实施逮捕”的要求，已经失去了效力。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审理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已经不存在了。对囚犯的审讯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进行的，检察员通常不参加审讯工作。

在监督审讯方面检察员的作用可归纳为：在审讯材料上盖章，确认起诉书和向法院寄发卷宗材料。

无数事实表明，苏联原副检察长罗金斯基，在确定提交给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的起诉书时，甚至当没有对被告人按刑法典第 58-8（恐怖行为）条提出指控时，他仍然擅自把这一罪状写在起诉书里，并有意使这一点成为使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4 年 12 月 1 日决议的“法律基础”，这个决议规定简化司法诉讼程序和立即执行判决。

这种“检察机关的监督”，只不过是“形成了”对许多清白的苏维埃人的恐怖镇压。

还应该指出：苏联原检察长维辛斯基与叶若夫两人，根据所谓的“特别程序”，给数万名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原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判了罪。这“两人”在一天之内就制造出几百份死亡判决书。

在检察机关的监督方面，粗暴破坏法制的行为，不仅存在于中央机关，而且存在于地方机关。

苏联检察机关已经掌握了一些材料，可以证明检察机关的某些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尝试阻止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出现的不守法纪的行为，而且其本身对于契卡人员的肆无忌惮行为起到了推动作用。

例如，原军事检察长的助手卡卢金，1938 年在远东边疆区，在教导内务部工作人员如何进行审讯的时候，说：

“你们还不会审讯，你们应该像莫斯科人那样审讯他，给他戴上手铐，好好地给他点儿颜色看，他将会给你们提供一打阴谋者。”（Л.M. 卡卢金私人档案）

必须指出：由于对苏维埃法制的歪曲和破坏，卡卢金于 1940 年 3 月被军事总检察院党组织开除了党籍。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司法专横

大量的事实表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1937–1938年期间，在审理关于反革命罪行的案件时，粗暴地践踏了法制的基本准则，走上了进行非法判决的道路。

在1937–1938年期间，出现了不道德的实践：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对应该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结束调查时，提前规定了对被告人的惩罚措施。为达到这个目的，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制定了应该提交给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的被告人名单。在名单中指明了将交付审判的被告人的姓名，以及此前拟定好的惩罚措施。叶若夫把这些名单提交给斯大林同志本人，以便批准拟定好的惩罚措施。在1937–1938年期间，向斯大林同志提交了383份这样的名单，共涉及到44465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事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其中绝大部分人都被他确定枪毙了。

在由斯大林同志审批了这些名单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在把卷宗提交给军事委员会之前，就在这些名单里打上被批准的惩罚方法的标记。如果被告属于被枪决之列，就在起诉书上标上数字"1"（表示第一类），如果被告属于被判剥夺自由之列，就打上数字"2"。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成员遵循这些标记，对案件做出判决。

实际上，军事法庭对案件根本不进行审理。军事法庭根据此前已经规定好的惩罚方法做出判决，机械地在预审材料上盖章。

军事法庭的所有"开庭"，包括做出判决和宣读判决书，总共只用15–20分钟的时间。

例如，军事法庭仅用了20分钟时间，就审理和判决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梅日劳克、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波波夫、苏共中央副部长斯捷茨基和许许多多其他人的案件，这些人都被枪毙了。

军事法庭司法专横最鲜明的表现，是对斯米尔诺娃·利季娅·尼古拉耶夫娜的指控。

逮捕和审判斯米尔诺娃的唯一"依据"，是她自1920年起到被逮捕之日，一直是亚速–黑海边疆区原党委书记、作为反苏维埃组织的参加者被镇压的鲍·彼·舍博尔达耶夫的妻子（正如目前已经证明的那样：鲍·彼·舍博尔达耶夫是被毫无理由判罪的）。在接受预审时，斯米尔诺娃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关于舍博尔达耶夫从事

反苏维埃活动的事情。在卷宗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斯米尔诺娃有罪。

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上，斯米尔诺娃也同样申诉说："她不承认自己有罪，她也没有怀疑舍博尔达耶夫从事反革命活动。"

尽管完全缺乏任何根据，军事法庭仍然判处斯米尔诺娃有罪，她被处决了。

在被逮捕之后，斯米尔诺娃留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12岁，一个两岁半和一个两个月的婴儿。

在审理刑事案件的时候，军事法庭完全忽视了被告人的陈述。只肤浅地解释一下关于被告承认或者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军事法庭在所有情况下都做出了有罪的判决。

哈萨克斯坦联共（布）中央原书记、苏共中央委员 Л.И. 米尔佐扬在军事法庭上申诉到：

"……他唯一的罪过是，他在被审讯时提供了虚假的证词……他22年来一直忠诚地为党和人民服务，从来也没有与布哈林、李可夫和其他右倾分子混在一起……现在他不能撒谎，并请求法庭在他临死之前相信：他从来也没有出卖过党的利益。他并不害怕死亡，但是，令他感到恐惧的是：他死于人民敌人给他带来的不值得的耻辱中，而他从来也不是人民的敌人。"（米尔佐扬卷宗，第1卷，案卷页）

粗暴践踏公正裁判的准则，军事法庭在不进行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对米尔佐扬做出了枪毙的判决。目前，米尔佐扬在死后已经被恢复了名誉。

苏共中央原候补委员、在1915年入党的 A.C. 卡雷金娜，在预审时和在法庭上，坚决否认了对她提出的指控。尽管如此，军事法庭仅用了20分钟时间，就对她的案件进行了审理，并对她做出了死亡的判决。

目前已经查明：对卡雷金娜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对她的判决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原苏共中央候补委员、顿涅茨州党委员会书记 Э.К. 普拉姆奈克，在法庭上否认自己有罪，但是，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20分钟之内审理了普拉姆奈克的案件，并对他做出有罪并枪毙的判决。目前已经查明：对普拉姆奈克的判决是毫无根据的，是根据了伪造的材料。

自1899年起就加入了党的队伍，曾经是第二、六、七、八、九、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的 A.B. 绍特曼，在1917年亲自组织了弗·伊·列宁向芬兰转移的工作。在给阿尔特法特尔的1918年4月25日信中，弗·伊·列宁写到：

"送信人绍特曼同志，党的老同志，对他本人我非常了解，是绝对值得信赖的人。"（绍特曼案件的调查材料）

在 1937 年 6 月，绍特曼因被指控参加反苏维埃恐怖组织而遭到逮捕。在法庭上，绍特曼否认自己有罪，然而军事法庭仍然在不进行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对他进行了有罪的判决，绍特曼被枪决了。在 1955 年 12 月查明：这一案件是伪造的，绍特曼在死后被恢复了名誉。

类似专横办案的事实有很多。

事实表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甚至已经达到了通过电报进行判决的地步。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原组成人员（目前已经作为少将退休）尼基特琴科，曾经负责在远东地区巡回法庭的工作，在没有看到被告人卷宗材料的情况下，就通过电报做出了 102 起判决。

还是那个尼基特琴科，在远东的时候，不仅没有揭露那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捏造的大规模虚假案件，而且正好相反，他还千方百计地纵容这些伪造行为，并纵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工作中使用这种伪造手法。

在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里，存在着经过周密思考的"培训"囚犯如何对待军事法庭审讯的制度，关于这一点尼基特琴科是非常清楚的，然而他却鼓励这种做法。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原工作人员维什科夫斯基交待说：

"……收买囚犯，在军事法庭开庭之前对每个人进行劝诱。我们被告知，应该训练人们在军事法庭上如何确认自己的口供。关于这一点巡回军事法庭主席尼基特琴科本人也曾经说过。"（С.Л. 维什科夫斯基卷宗，第 20 卷，案卷页 446）

关于军事法庭的审判"技巧"，内务人民委员部原工作人员德米特里耶夫做了如下交待：

"……如果被告在法庭上推翻了以前在审讯时招认的口供的话，警卫人员就会粗暴地把他轰出大厅，如果被告确认自己的口供的话，他就会平静地被带出大厅。这种做法是当着军事总检察长助手的面，当着军事法庭主席和委员们的面。"（П.П. 德米特里耶夫卷宗，第 13 卷，案卷页 95）

滨海边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一个部门的原负责人莫恰洛夫，在 1940 年因伪造案件被判处枪决，在法庭上他交待说：

"……我甚至感到恐怖，当我回忆起我们做过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在这些日子里我明白了一切，但是，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和谁需要我们这样做，我不能说。

"……在军事法庭开庭时，一个囚犯声明说：他推翻了以前的供词，因为那是

殴打的结果。主持审判的尼基特琴科对他说：‘您是否想补充些什么？’在军事法庭开庭时，所有案件都涉及到被殴打的人员。此后，我再次确信：殴打囚犯是允许的。第二次军事法庭开庭时，对案卷做了报告，根据这些材料显示，被殴打的人又增加了……”（莫恰洛夫卷宗）

所有这一切事实证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最高的司法机关，公认的苏维埃法制的捍卫者，已经变成对成千上万的苏维埃公民进行镇压的法庭。

关于非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

由三人小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长委员会，以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对囚犯实行审判的制度，造成了对苏维埃法制的大规模的破坏。

绝大多数囚犯是被在1938年11月之前一直存在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判罪的。同时，三人小组和委员会被赋予了可以确定任何惩罚方法，包括枪毙的权力。说实话，这两个机关就是为了大规模地处决囚犯而成立的。

三人小组、委员会和特别会议，为捏造虚假案件提供了方便，还因为他们只审理案件的名单，不招见囚犯和见证人，不对审讯人员收集的材料进行核查。

在1937年和1938年，与三人小组并列积极工作的还有所谓的“两人小组”，其正式名称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消灭那些在实行大规模行动时被逮捕的人员。

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地方机关为每个在大规模行动时被逮捕的人员编制了一份简要的情况调查表，其中仅指明囚犯的履历情况和极简短的指控实质。这些调查材料被寄发到莫斯科，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审查。

根据这些材料制定一份名单，并标明惩罚的方法。在由叶若夫或者弗里诺夫斯基（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维辛斯基或者罗金斯基（来自检察院）对名单进行签字之后，决议被立即予以执行。

粗暴地破坏苏维埃法制的基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长委员会对数万名苏维埃公民做出了枪毙的判决。

关于所谓的“两人小组”采取的镇压规模，以下事实可以证明。

仅在1937年12月29日一天的时间里，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就审理了一份包括1000名囚犯的名单，这仅是一个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提交的囚犯的名单，他们被指控从事有利于拉脱维亚的间谍活动，其中被判处枪毙的有992人。

但是，这并不是极限。1938 年 1 月 10 日，“两人小组”审理了一份 1667 人的名单，1 月 14 日——1569 人，1 月 15 日——1884 人，1 月 16 日——1286 人，1 月 21 日——2164 人：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部门的原负责人沙皮罗，在被逮捕之后，交待了关于准备提交“两人小组”审批的人员名单的情况。他说：

“……在 1938 年 3 月之前，所有的大规模行动的调查材料都是按照叶若夫的委托……由采萨尔斯基和米纳耶夫提交的。由他们审理的案件……形成记录，人民委员对这些文件不进行任何核实，甚至都不阅读，就机械地在上面签了字，检察员也同样机械地署了名。在采萨尔斯基离开之后（此时已经堆积了 10 多万个案件），部门普通负责人被吸引参加卷宗的审理。但是，情况并没有改变，只是更加恶化了。部门负责人把这项工作视为额外的负担，并竭力在一个晚上审理完不少于 200–300 份材料。从实质上来说，这只是在调查材料上盖章而已，没有提出任何相反的意见，而人们却被判处 10 年徒刑或者被枪毙。

“对卷宗的审理结果是形成记录，这些记录文件被提交给叶若夫或者弗里诺夫斯基（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维辛斯基或者罗金斯基（来自检察院），他们对这些文件不做任何核查，就在上面签了字。”（沙皮罗卷宗）

涉及到特别委员会的活动，那么，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它对司法之外的镇压制度起到了补充作用，它与三人小组和“两人小组”唯一不同的是：它是长期有效的机关。

在 1955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成立的委员会，其宗旨是调查关于对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举出的联共（布）中央绝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是如何完成的问题。该委员会就此问题向联共（布）中央主席团提交了上述具体的材料，以便进行审批。我们亲自核查了作为报告基础的那些文件。被吸收参加准备文件资料的有下列党员：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И.А. 谢罗夫同志（自 1926 年起的苏共党员）；国家安全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多布罗霍多夫同志（自 1932 年起的苏共党员）；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统计处负责人普列特涅夫同志（自 1939 年起的苏共党员）；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机关负责人卡利斯托夫同志（自 1940 年起的苏共党员）；来自苏联检察机关的副军事总检察长捷列霍夫同志（自 1943 年起的苏共党员）。

在准备和印制本报告时，确保了必要的保密性。

除了说明案件的真实性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某些原则性的结论，这是委员会在对委托给我们的问题进行研究的这个阶段里得出的结论。

我们认为，针对大量诚实的苏维埃公民，包括针对数万名党、苏维埃、经济和军事干部，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在这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有以下两种情况，同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预先注定了要开展这种镇压活动。

第一种情况——

恶毒杀害谢·米·基洛夫，对于这个谋杀行动已经做出了结论，同时还利用这个结论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和对苏维埃法制的践踏。已经是在1934年12月1日的晚上，也就是谢·米·基洛夫被杀害之后过了几个小时，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A.叶努基泽签署的、根据第112号会议记录“形成了”以下决议：

“1）审理机关以最快的速度对因策划或完成恐怖行动而起诉的案件进行处理；

“2）责令各司法机关不得以考虑到有减免的可能性而阻止属于这一范围的罪犯的死刑判决的执行，这是因为考虑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可能接受这一诉讼申请；

“3）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对于上述类别的罪犯，在判决之后立即执行。”（在1934年12月4日的《真理报》上公布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1934年12月1日会议上通过的决议。）

仅在1934年12月3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这份决议就被提交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表决（以询问的方式）。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34年12月1日做出的这个决议，正如上述已经说明的那样，为普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动开辟了可能性。

第二种情况——

广泛的、大规模的镇压运动的开端，是在1936年的年底，在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于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政治局其他委员们发出电报之后。在这封电报里谈到了以下内容：

“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是绝对必要和刻不容缓的事情。亚戈达没有在应有的高度上完成自己关于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任务，这是显而易见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项工作中已经耽误了4年。所有党务工作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州的绝大多数代表都一致承认这一点。”

斯大林这个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开展普遍镇压运动方面“耽误4年”，以及应该尽快地“弥补”已经耽误的工作的指示，直接推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进行普遍逮捕和枪决的行动。

必须指出，在联共（布）中央 1937 年的二、三月全体会议上，这件事也被提出来了。在这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根据叶若夫的标题为“日本－德国－托洛茨基分子的走狗的敌对、破坏活动，以及间谍案件中的教训”的报告指出：

“联共（布）中央全体会议认为，在调查反苏维埃托洛茨基中心及其各地方的追随者的案件过程中被揭露出来的事实表明：在揭露这些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迟到了，最低限度，耽误了 4 年的时间。”

在苏共中央 1937 年二、三月全体会议上，在约·维·斯大林的报告中，有一个内容让人觉得奇怪和令人不解，显然，当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一点，然而现在从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们身上发生的事情的角度来看，这个内容具有特殊的内容和意义。

在报告中指出了在联共（布）中央成立“内外政策问题委员会”（6 个月）的必要性，并派各州和边疆区组织，以及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参加这个委员会。在约·维·斯大林同志的报告中还说：“这些同志应该提出不是一个，而是几个接班人，这些人能够接替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这是必须的，也是应该做的事情。”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 1937 年在约·维·斯大林那里出现了准备“几个接班人”以代替中央领导人的必要性的问题？很清楚，当时他已经酝酿成熟了关于取代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想法。而这个“取代”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想法，实际上并不是通过党内正常的民主制度，而是通过集中的、大规模的，正如已经清楚表明的那样，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理由的镇压的途径实现的，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出的中央委员，有 75% 是被这样镇压的，其中包括几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在中央二、三月全体会议上，中央委员们的一系列演说，从实质上来说，是表示赞成关于拟定的在与“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下开展普遍镇压行动方针的正确性的意见。

对于这些演说表达了最鲜明的怀疑态度的是帕·彼·波斯特舍夫同志的发言。帕·彼·波斯特舍夫同志说：

“我认为：这种尖锐的斗争年代已经过去了，腐化堕落的党员已经被消灭或者已经转向敌人一边，健康分子为了党的事业而进行了战斗。这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我从来也不认为，经过了这一尖锐的斗争阶段，卡尔波夫和与他类似的人员会跌入敌人的阵营。而根据供词显示，仿佛卡尔波夫自 1934 年起就被托洛茨基分

子招募了。我个人认为，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与敌人进行了长期和残酷的斗争的党的健康分子，在 1934 年能够跌入到敌人的阵营里，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不相信这一点。

"……我想象不出来，与党共同经历了艰难困苦的年代，然后，在 1934 年，又是如何与托洛茨基分子走到一起的呢？这是令人奇怪的……"

帕·彼·波斯特舍夫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不是这一勇敢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演说呢？

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体会议关于叶若夫报告的决议，被人民的敌人和党内投机钻营分子所利用，他们利用党的名义掩盖了针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以及普通苏维埃公民进行的大规模恐怖行动。在 1937 年被枪决的人员数量，与 1935 年相比几乎已经扩大到 300 倍！

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个阶段，当时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已经在 1935–1936 年和 1937 年上半年被镇压了。现在，根据"要两面派"的指控，根据各种诽谤性的谗言，根据因野蛮殴打获得的虚假"口供"，大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干部被镇压了，而他们曾经确保了与侵略者和白卫分子的斗争的胜利，他们曾经在最艰难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年代里，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积极地奋斗，他们曾经在党内积极地进行了反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倾分子的斗争。

病态怀疑的心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在党组织内部的共产党员中间撒下了相互不信任的种子。

联共（布）中央 1938 年一月全体会议，使党组织内的状况得到了某种改善。但是，大规模的镇压运动一直持续到 1939 年。

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在 1939 年开始减退的时候，当各地方党组织开始指责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对囚犯采取肉体惩罚是某种犯罪的时候，约·维·斯大林于 1939 年 1 月 10 日给各州、边疆区党委员会书记，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负责内务的人民委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的负责人发出了一封密码电报。在这封电报里谈到了以下内容：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实践工作中，对囚犯采取肉体压迫的方法，是经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自 1937 年开始实施的……大家知道，任何资产阶级的谍报机关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代表，都是采用极其残酷的肉体压迫方法，与此同时，其方式是最残无人道的。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的谍报机关应该人道地对待那些资产阶级最凶恶的代理人，以及那些可诅咒的工人阶

级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敌人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今后仍然有必要对那些明显的和顽固不化的人民的敌人采取这一例外的方法——肉体压迫的方法，这是完全正确和适宜的做法。”随后，约·维·斯大林还建议让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审讯工作实行监督的各地方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各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法院的院长了解这封电报的内容。

这样一来，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正如以上所表明的那样，导致对无辜人们普遍诽谤和中伤的最野蛮的拷问，两次（在1937年和1939年）都是由约·维·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在我们党半个世纪的历史中，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的岁月，但是，没有比在1937–1938年期间的普遍镇压更艰难、更痛苦的事情了，这些镇压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1918–1919年期间，针对资产阶级和其他敌对阶级开展的红色恐怖运动，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不止一次地处于危险之中，当时，我们与无数的侵略者和白匪分子，以及富农暴动分子等等进行了激烈的、殊死的战斗。但是，针对许多清白的苏维埃人，针对许多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所进行的恐怖活动，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同时，开展这种镇压运动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胜利，我们已经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作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富农阶级已经被消灭，剥削阶级的社会基础已经被摧毁。

1937–1938年事件给我们国家的国际威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给军队干部带来的损害，是我们在芬兰战争中失败的一个原因，随后，这种失败鼓舞了希特勒，并促使希特勒加快了对苏联的进攻。

在叶若夫被罢免和被判罪之后，贝利亚及其走狗从实质上来说，是继续执行了消灭党和苏维埃干部的敌对政策。

而混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层中的党的敌人，是如何能够利用这些机关反对党、反对党的领导干部的呢？

正如许多事实和文件所表明的那样，这之所以能够发生，首先是因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作为集体机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影响力。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高墙内所进行的卑鄙可耻的事情，仿佛是经过批准甚至是“为了党的利益”而进行的。而实际上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讨好一个人，有时甚至是按照他的指令进行的（例如，可参见1939年1月10日的密码电报）。

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约·维·斯大林的作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非常正确的，他曾经向党提出过警告：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是否能够永远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附在本报告后面的有以下文件：[①]

1. 约·维·斯大林 1939 年 1 月 10 日的电报；

2. 关于由约·维·斯大林批准的枪毙 138 名领导干部的调查报告；

3. 囚犯艾赫写给约·维·斯大林的信。

П. 波斯佩洛夫

A. 阿里斯托夫

H. 什维尔尼克

П. 科马罗夫

АПРФ, ф.3, оп.24, д.489, л.23-103

文件 0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

（1956 年 2 月 9 日）

第 187 号会议记录第 72 条。

关于波斯佩洛夫同志委员会的通报

揭露的情况表明，斯大林已经无法再作为一名领袖了。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想消灭的话，他还算什么领袖呢？应该有勇气说明真相。意见是：一定要向党的代表大会说明，需要考虑的是应该怎样说明，由谁来说明。如果不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对党的代表大会不诚实了。也可能，委托波斯佩洛夫同志起草报告和说明一切。理由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集中在不诚实的人手中。在什么地方说：

① 这里没有收入附件。

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印制遗嘱[①]并分发给大会的各位代表。印制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②]并分发给大会的各位代表。

莫洛托夫同志：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说。同时不仅仅说这些内容。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然而，30 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谈论马克思的。

赫鲁晓夫同志：[③]

卡冈诺维奇同志：历史是无法欺骗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赫鲁晓夫同志的建议是正确的，报告是要听取的。应该分发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遗嘱和信也应该发给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要保密。我们应该负起责任。形势要求我们不能反对。（还谈了他弟弟的事情。[④]）但是，如果我们说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整个斗争是没有理由的，那么，我们就是不诚实的。在进行思想斗争的同时，许多干部被消灭了。我赞成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要冷静行事（赫鲁晓夫同志也这样说过）。我们（我）当然感到很难受，然而，我们不应该压制自发的力量。报告最好从政治角度去起草，不能使 30 年的历史含糊不清，对此应该持冷静的立场。

布尔加宁同志：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党员们已经看到，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起了变化。如果不向代表大会说明的话，人们将会说我们胆怯。我们还不清楚，将会暴露出什么。有包括 44000 人的名单——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这是接近事实的。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要谈斯瓦尼泽的案件。[⑤]怎样谈呢？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说明斯大林与党的关系。不能把一切都强加在斯大林的头上。

伏罗希洛夫同志：应该做更充分的准备。我们不能休假了。任何闪失都将招致

---

① 这里指的是 1922 年 12 月 23–29 日和 1923 年 1 月 4 日在列宁的口述下写成的致党代表大会的信。参见《列宁全集》第 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37–343 页。

② 这里指的是列宁的文章《论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参见《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49–355 页。

③ 原记录空缺。

④ 卡冈诺维奇的弟弟 M.M. 卡冈诺维奇 1941 年 2 月受到警告说，如果“不履行党和政府的委托的话，将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被解除领导工作”。在不久后发生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中，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53 年 5 月 7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为 M.M. 卡冈诺维奇彻底平反的决议。

⑤ 1937 年 12 月，A.C. 斯瓦尼泽被逮捕，并于 1940 年 12 月被判处枪决。1941 年 1 月 23 日，又把枪决的判决改为 15 年徒刑。但是，1941 年 8 月 20 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又恢复了 1940 年的判决，同一天，斯瓦尼泽被处决。

不好的后果。我同意向党（向代表大会）通报这些情况。但应该谨慎行事。

赫鲁晓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曾经在斯大林面前提起过亚罗申科的案件[①]。

伏罗希洛夫同志接着说：有两次这样的情况，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1921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彼得格勒。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当时存在着敌人，斯大林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变得凶狠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富有人情味的。但仍然保留着残暴的习气。

米高扬：我们不能不向代表大会说明。开始我们还可以单独地进行讨论。应该如何对待过去？在1934年以前，表现得坚决果断，而在1934年之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东西。篡夺了政权，并把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在根本问题上，也就是理论问题上（斯大林与列宁有分歧），很快做了修正。在与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思想斗争的问题上，我没有谴责斯大林。然而，在农业领域的过失难道能够原谅吗？如果人们活着的话，成绩肯定是巨大的。心平气和地向代表大会说明一切（在报告中）。为什么维亚切斯拉夫[②]不想公布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呢？应该公布“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列宁著作（第四版）是不完整的，应该出版列宁著作的增补卷。

别尔乌辛同志：应该在代表大会上做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不要求谈正面的东西。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有害的。应该说明它是如何产生的。篡夺了政权，取缔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枪毙干部——我们在重工业方面已经丧失了速度。

苏斯洛夫同志：应该向大会代表们说明一切。我们谈论的是集体领导，却在这里对代表大会隐瞒实情？报告的性质应该是：委托委员会调查对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们所干的事情。没有必要从总体上对斯大林进行评价。在1936–1937年期间，有多少干部被枪毙，1936–1939年是曲线过程的最低阶段。把斯大林分为两个阶段——基本上是正确的。在1934年以前，斯大林也有很多错误。没有履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公布“遗嘱”问题。不应该垫付款项。

马林科夫同志：我认为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的建议是正确的。我们将体验到一种欣慰——我们替同志们辩护了。不说明斯大林的作用，就不能为同志们辩护。同敌人进行任何斗争，也不能成为杀害干部的理由。“领袖”确实曾经是“敬爱的”。

---

① 苏联经济学家Л.Д.亚罗申科在1951年11月的辩论会上批判了政治经济教科书的草案，并阐述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经济问题的观点。斯大林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专门用整整一章批判了亚罗申科的观点，并指责他脱离了马克思主义。1953年1月，亚罗申科被逮捕。参阅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71–649页。

② 即莫洛托夫。

不能划分两个阶段，这是与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恢复列宁主义原则。斯大林对列宁曾经产生过不满情绪。从来没有做过关于斯大林的报告。

阿里斯托夫同志：大致上来说，我不赞成一点——也就是在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谈话里所出现的那一点："不应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是极其聪明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况"（这有损于政治局委员的声誉）。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艾赫当时是诚实的人。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所有人热衷的是讨好斯大林。党的威望已经丧失殆尽。

别利亚耶夫同志：领导干部不清楚这些文件。多么令人奇怪，领导干部居然不清楚这些文件。应该向代表大会报告这些文件。怎么能够隐瞒列宁的文件呢？赫鲁晓夫同志建议向代表大会公布这些文件是正确的。应该说明真相。补充说一点，但愿别丧失斯大林的伟大。但是，对他也应该了解清楚。从政治方面自然应该说明，谁将承担责任。由此，使共产党员们不再受到折磨。否则的话，就不再相信党的力量了。在这方面不应该有保留。

什维尔尼克同志：现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够再沉默了，否则的话——这就会给公众提供话题。应该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应该揭露个人崇拜。应该做报告。三次使大批人员死亡——这是一场恶梦。

萨布罗夫同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立场是不正确的，是在说假话。只有一个斯大林（而不是两个），其实质在最近 15 年里都暴露出来了。这不是缺点（像卡冈诺维奇同志所说的那样），而是犯罪。莫洛托夫同志说，他与我们在一起已经 30 多年了。他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而在战后阶段——恶化了与所有民族的关系（关于海湾的言论）。由于愚蠢的政策我们失去了很多（芬兰战争、朝鲜、柏林）。应该彻底地说明斯大林的作用。

谢皮洛夫同志：上述对斯大林的说法都是发自内心的。对 1937 年的事件已经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应该向党说明——否则，人们是不会原谅我们的。应该说出真相，说明党并不是这样的，党并不需要把数万人监禁起来，说明我们的国家也不是这样的，它不需要把数万人送上断头台。从思想上来说——这是关于干部教育的问题。要周密地考虑方法，阻止产生危害。

基里琴科同志：危害是不会有的。不能够不说，说出来是明智的。被恢复名誉

的人应该说……[①] 应该由代表大会做出决定。

波诺马连科同志：中央委员会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表达赞成意见。数百万人的死亡不会不留一点痕迹的。应该清楚地说明这个时期的情况和斯大林的作用。

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在代表大会上应该进行说明，这一点已经没有分歧了。存在着细微的差别，需要考虑。我们大家都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然而，这不应该束缚我们。当事实已经暴露的时候，应该说明真相，或者应该证明我们行动的正确性。不必再考虑斯大林去世 3 个月之后我们就逮捕贝利亚这个问题了，这为我们的行动扫清了道路。我们可以大声地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并不惭愧。"不应该害怕。不应该无所作为，也不应该犹豫不决了。应该彻底地揭露所谓的个人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应该做报告，中央全体书记都应该参加。谁来做报告——应该周密地考虑这一点。也可能，在本届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进行说明，我们打算提出这个问题。

РГАНИ, ф.3, оп.8, д.389, л.56-62об

文件 06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速记记录

（1956 年 2 月 13 日）

赫鲁晓夫：同志们，请允许我宣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我们需要研究与党的代表大会有关的一些问题。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日程已经得到了中央全体会议的批准，报告人也已经被确定下来。与代表大会有关的其他问题，我们将在代表团代表会议上解决。

我们需要就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达成一致意见。我询问过以前的报告人：在过去的全体会议上是如何审理工作报告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和主席团其他委员们提醒说，通常是把报告文本发给全体会议成员进行审阅。我也愿意这样做。报告已经准备好了。

① 原件如此。

中央主席团审理并通过了工作报告。这份工作报告不是主席团的，而是党中央委员会的。是否在全体会议上听取这个报告？

回答声：赞成。明天我们就听报告。

赫鲁晓夫：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的话，我们将认为报告被通过了。

米高扬：全体会议信任中央主席团。

赫鲁晓夫：那么，在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代表大会的议程被批准。存在着一些细小的意见，在代表团代表成员会议上将对它们进行报告和审批。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在中央全体会议上说明。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多次交换意见，以及研究斯大林同志逝世之后的形势和材料之后认为，必须在第二十次党的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同志们，为什么我们决定提出这个问题呢？目前，大家都认识到、感觉到和清楚地知道，我们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提出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的确，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在工作报告中也着重地谈到这方面的内容，然而，我们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应该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知道的比他们从报刊上能够知道的还多。否则的话，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可能会认为，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没说出来。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一定会赞成这一点的。

回答声：正确。

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我们已经商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应该由中央第一书记来做。是否有反对的意见？

回答声：没有。

赫鲁晓夫：我们已经审理了在我们全体会议上应该解决的一切问题。第十九届中央全体会议的工作到此已经结束。我认为，如果我说：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第十九次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间很好地进行了工作的话，那么，我所表达的是全体同志的意见。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我们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然而，中央委员会立场坚定，执行了强硬的路线，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今天即将结束自己职能的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巨大荣誉。

请允许我宣布大会闭幕。

РГАНИ, ф.2, оп.1, д.184, л.6-8

文件 07

苏共二十大上午秘密会议记录

（1956年2月25日）

布尔加宁（会议主持人）：现在让我们来进行《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请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做报告。

在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报告之后

布尔加宁：将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提交代表大会进行审理（宣读决议草案）。

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

布尔加宁强调指出：目前还不能公布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但是，这些材料将寄发给各级党组织。

代表大会一致采纳了这个建议。

附件：

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1956年2月25日一致通过）

听取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赞成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论点，并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继续采取措施，确保完全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消除其在党务、国务和思想工作的一切领域里所造成的后果，严格执行党的生活准则和由伟大列宁制定的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

РГАНИ, ф.1, оп.2, д.17, л.89-90

节选自《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2004年冬季号

关于周恩来出访苏、波、匈三国的档案文献

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接连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苏联和东欧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困境，而中国共产党凭借其经验、力量和理论水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和影响节节攀升。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加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苏东各国纷纷要求中国领导人正式出访欧洲。周恩来立即中断其亚洲之行，在苏、波、匈三国开展了近两周的穿梭外交，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加助了中国“旋风”。这次外交活动是中苏政治合作的充分体现，但在接受中共批评的同时，苏共也开始感受到来自北京的挑战。这里发表的周恩来1957年1月穿梭外交的档案文献，选自俄国、匈牙利、波兰和中国。

中国档案

本组档案由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提供，由沈志华选编。文件的题目和注释为编者所加，文末注明档案的馆藏号。文件中的错字、漏字、衍字分别在〈〉、〔〕、□内核正。

文件 01

中共中央关于去波兰访问事致周恩来电

（1956 年 12 月 4 日）

恩来同志：（绝密）

十二月三日来电收到。波兰大使来谈，他们的国会选举时间是一月二十日，迫在眉睫，而统一工人党有得不到多数票的危险，希望中国予以帮助。其办法是请中国负责人于选举前去波兰一次。他们想请毛泽东同志去。当我们告诉大使毛同志在这个时间不能去的理由以后，又告诉他苏联已邀请你去莫斯科，在时间许可并征得你同意的情况下，也许你可以应邀去一次。现在波兰的斗争，已转变为统一工人党和其他政党（带资产阶级性的）争夺工农选票的斗争，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如果统一工人党失去领导权，那是很不利的。因此我们认为你去一次波兰是有必要的，（波兰大使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如果去，时间应在一月十日至二十日之间，最好在一月十五日以前，那末你到莫斯科的时间就应在一月五日至十日之间以便有四至五天时间举行中苏会谈，发表会谈公报，然后去波兰举行中波会谈，发表公报，帮他们一手。这样，你在东南亚的访问就应缩短十天左右，并且应从阿富汗或印度直飞莫斯科。是否可行，如何安排，请考虑电告。

中央

1956 年 12 月 4 日 3 时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05-01，第 7–8 页

文件 02

驻波使馆关于波兰事件的初步估计致外交部电

（1956 年 12 月 8 日）

外交部：

对于波兰事件虽经我们反复讨论，但许多问题仍待继续研究。以下只是初步的估计，仅供参考。错误和不妥之处并望指示。

（一）十一年来波兰党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把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进行了现代化的国防建设，消灭了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组织了一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消灭了文盲，培养了大批干部。在国际关系上，以国际主义精神建立了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同盟，在国际事务上有贡献，波兰的国际地位已大大提高。但波兰在几项重要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1) 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了农业、轻工业，排挤了手工业，尤其对人民生活的改善注意不够，经济发展与生活提高不平衡（五年来平均工资仅提高13–14%）；(2) 在肃反中打击面过宽，曾采非法侦讯手段，被撤职清洗逮捕者甚多，冤枉了不少的好人；(3) 领导过于集中和官僚化，未直接灵活地处理民主与集中、中央与地方政权关系问题。

这些错误主要由于党领导严重脱离群众，甚至脱离党员群众，加以不根据波兰情况教条主义地搬用苏联经验，波苏关系中的问题未及时主动提出调整，以致造成党员和人民都不满。在1953年11月底开始纠正经济政策上的错误，提出了加速提高生活水平的口号。在1955年初三中全会时，党领导开始纠正个别工作的错误，并提出了“民主化”的口号，但仍不够坚决，改正迟缓。苏共二十次大会后遂发展成全国性的“民主化”和建立对苏平等、独立关系的运动，人民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加以贝鲁特逝世失去了领导重心，党内斗争尖锐。八中全会上的改组领导和改变政策，乃是历史发展和在深刻的政治经济困难背景上产生的结果。

（二）十一年来苏联对波兰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1) 为帮助波兰解放，伤亡了近万红军[①]；(2) 基本上按照国际主义和马列主义原则无私地帮助波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3) 支持波兰在国际上的地位，保障了波兰西部边界和波兰的独立。但由于苏联背着解放者的包袱，存在着大国主义作风，在政策上也有不少错误。如：(1) 对波兰党和国家的事务干涉过多，尊重不够，如参与波党内选举、犹太人成分等问题，苏联领袖在公开场合指责或指示波兰如何如何；(2) 有些问题处理失当，如煤价问题、运价问题、遣返波侨问题，以至于战后的划界问题，均值得考虑。这些问题给反动宣传找到借口，使波兰对苏联产生很大不满。苏共二十次大会打烂了斯大林的招牌，使波兰党内及群众将某些过去波兰内政上的错误均归之于苏联“斯大林主义”，加上波苏关系中很多问题传至群众中，造成人民中一时强烈的反苏情绪。八中全会时赫鲁晓夫等飞来华沙以及调动军队准备应付事变，更是极大的失策。

① 对于这句话，驻波使馆12月11日来电更正为：“牺牲了六十二万红军”。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1，第7页。

（三）哥穆尔卡过去主张波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他在1946年工人党、社会党华沙积极分子会议上曾说波兰发展道路与苏联有三个基本区别：(1）社会政治变革不必经过流血，可通过和平方式（对苏军解放作用估计不够）；(2）可避免无产阶级专政阶段；(3）政权基础是议会民主，不采苏维埃形式。并称要丢弃农业集体化，因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有害的。以上说明哥穆尔卡过去在思想上、理论上存在着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但错误性质属于党内问题。过去波兰党处理他的问题是错误的，即不应采取开除出党和逮捕等组织手段。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的新领导，我们根据目前情况看，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正确的一面。八中全会后，波兰党未放弃社会主义，继续对苏友好并主张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同时在运动中取得了群众拥护，党的威信有些恢复，波苏关系中的问题经过会谈已基本解决。此外提出按照波兰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总的说来也是好的，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在思想上和对外政策上明显地有着民族主义倾向：(1）过去波苏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未采取正当的协商办法解决，却在群众中强调提出主权、平等、独立、走波兰的道路等口号，撤换罗科索夫斯基，叫嚷着反对斯大林主义、反“斯大林时代”、反“斯大林分子”，认为个人崇拜系制度产物，在群众中煽动激起反苏情绪。波苏会谈后，虽稍安定，但未根本转过来，由于还未认真进行对苏友好工作，以致最近还有些城市发生反苏游行；(2）在匈牙利问题上基本上是支持纳吉的。舆论上曾与南斯拉夫一起指责卡达尔政府背信。苏波会谈声明中虽有支持卡达尔政府一点，但在公报中波本不同意列入经苏再三说服并以中国的坚定态度为例，波兰方才同意。对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只介绍不批评，实际上波观念上很多与南斯拉夫一致，吹嘘波、南均为反斯大林主义胜利的国家。报刊上常把各国兄弟党分类为支持波兰派和不支持波兰派，对不明确支持波兰的兄弟国家均公开指责，甚至党员作家在同法共论战中竟向西方资产阶级报上投稿攻击法共人道报；(3）在联合国为匈牙利问题的斗争中，竟两次不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一致，而与南斯拉夫一致投弃权票；(4）对外贸易上强调利己，有时不顾兄弟国家困难，如缩减对德、捷煤的供应，转而扩大对西德和法国煤的供应。最近与朝鲜贸易谈判中，坚持采西方市场价格等。

在对内政策上片面强调民主化，忽略阶级斗争：(1）以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打击报复主义的情绪，改组中央和地方党政群的领导，很多老党员被排挤，代之以新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因此，党的领导削弱了，党内社会民主党的气味浓厚了。政府部门还在撤换领导，进行派别斗争；(2）群众中极端民主化倾向和无政府状态在发展，集会不休，劳动纪律松弛，工业生产平均下降百分之五十，农村义务交售

计划不能完成；(3) 在与各党派合作关系有放松党的领导作用的趋势，在很多问题上放松了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性，如说波兹南事件无反革命，对匈牙利事件则说不应在外国间谍中去寻找原因，而应在斯大林罪恶时代中去找。教会活动也在扩大，波天主教与梵蒂冈联系愈趋密切；(4) 青年由于思想极端混乱，全国团的组织已解体，各自另成派别。另外，各地各单位成立了联合执行委员会、协商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学校委员会等组织，往往将过去一概否定，究竟正确与否尚需研究；(5) 农业政策中缺少阶级路线，大批解散合作社，原一万多合作社现只剩千余个，改变原规定，土地可自由买卖，使农业集体化遭受严重打击。此外，由于群众中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反苏且发展成反犹。我们觉得这些对内对外政策与哥穆尔卡过去的观点并未划清界线，相反却是一脉相承的。

（四）总之，波兰目前的形势是表面平稳内在紧张。对波兰发展前途的估计，我们认为有好坏两种可能：假如党能团结一致，加强领导，逐渐克服政策中上述偏差，就能渡过困难，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反之，如目前错误继续发展，民族主义情绪太多，党内闹不团结，不能镇压反革命活动，则波兰情况会愈趋恶劣。但这两种趋势均需等待一个时期，尤其要看明年 1 月大选与 3 月间党代大会情况，才能看出何者可能性更大些。

驻波使馆

12 月 8 日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1，第 1–6 页

文件 03

驻匈使馆关于卡达尔谈匈目前情况的报告（节选）

（1956 年 12 月 8 日）

外交部并中央：

昨晚当我大使将周总理与尼赫鲁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谈话内容口头转达给卡达尔同志后，卡达尔提了些对尼赫鲁看法的意见，并介绍了一些匈牙利目前的情况。

…………

（二）关于匈目前情况。目前总的情况是社会秩序正在转向正常化，政府在阻止反革命挑衅事件上曾作了很大的努力，很多老的共产党人，有组织的工人对反革命的制造混乱极感愤慨，因而他们组织了游行来要求肃清反革命，以便早日恢复秩序。反革命的群众基础是大大地缩小了。如10月23日那样纠集十数万人示威的可能性是没有了，但是小的挑衅事件还是很多的，这主要由两方面力量的主使：(1)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是不希望恢复秩序的，所以他们仍在千方百计地挑拨暴乱；(2)另外有一小集团他们不惜以卑鄙手法制造混乱，以图证明匈牙利若无纳吉便无安宁。最近就发生了一些比较突出的挑衅事件，如本月4日反革命在布达佩斯英雄广场上曾纠集了5000–6000妇女，说要纪念什么死难烈士，还要游行至国会大厦(政府所在地)。首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这些都被匈公安军解散了。值得注意的是反革命当日就在国会前广场旁的建筑物上架好了机枪，以便俟游行队伍到达广场后制造挑衅，然后污蔑苏军和政府，幸未允许这些妇女游行。并及时破获了反革命的布置挽<免>于流血事件。五日、六日都有过这类尝试，但由于公安军已逐步坚强起来，反革命都未得逞，现在已不是过去那样由于兵士、警察本身有民族主义情绪而不能强硬地对付反革命的情况了。反革命在纳吉问题上也变得比较老实些了。目前提的要求是：如纳吉等人不能全部回匈时，一部人回来也可以，显然口吻变了，已不再提什么吸收纳吉、马雷太等人参加政府这类要求了，敌人鉴于形势改变了新的策略，罢工、怠工已是陈旧的口号了，敌人居然也提出来要工作，如最近成百的记者到国会来表示承认政府，愿为政府工作，希望政府批准他们承办这样或那样的报纸，但政府考虑目前情况决定暂不准予发行更多的报刊。作协也派代表向政府要求拨15–20万弗〈福〉林作文学基金，政府答复他们说，没有这笔款项，同时政府也将考虑将来是否还继续保留文学基金制度，因为过去作家的收入太多了，然而他们却不从事创作，专写一些小文章来攻击政府，政府今后是不会养这样一批专门攻击它的人的。经济情况很严重，动力缺乏，煤、电的困难大大地影响着工业生产。这里卡达尔同志再次提到由于匈牙利已一个半月未向西方交货，手下又无外汇，无力偿债，因此中国对匈的援助改成外汇拨款是一项很大很大的帮助。对于10月23日事件的认识上，群众还表现有思想混乱情况，有些人认为此次事件是一次革命，知识分子更称之为民族革命（使馆按——对事变的性质卡达尔11月26日讲话中认识仍不明确）。最近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特别召开了澄清此次事变性质的会议，出席的23名中央委员中有21人发了言，对此次事件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和明确的估价，会后会上一致确认此次事件既不是革命更不是什么民族革命，而是反革

命，党表示不管人们愿意与否，终于应当讲出究竟在匈牙利发生的是什么事情。

…………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2-01，第154–158页

文件 04

苏欧司为总理访苏准备的有关苏联情况的材料（节录）

（1956年12月24日）

最近苏联国内外和中苏关系中的一些主要情况

——供总理访苏参考——

（一）苏联国内重要情况：

（1）12月20日，苏共召开了中央全会，主要讨论修改1957年计划和第六个五年计划，将以相应减少基本建设的办法来扩大住宅建设和日用品的生产。原计划思想工作的讨论，因若干问题尚需研究和准备，已决定推迟。全会之后，还将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决定在民族院下设立经济委员会，以调节各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加强协作。

（2）大力改善人民生活。过去苏联的工资幅度太大，很不合理。最高的是教授、学者和军人，如一个院士每月工资是5万卢布（据说这同部长级工资相同），而一般低薪人员，每月工资仅370卢布。工作时间相差也很大，如莫斯科大学教授每周只授10小时课，一般教员每周要授课20–36小时，而后者的工资却比教授低10倍。现苏联决定从明年1月起提高低薪者的工资，开始实行七小时和矿井六小时工作日制。居民住宅问题也很严重，除政府将拨出部分基本建设投资修建住宅外，现正大力推广由工人和农民自建住宅的经验。

（3）加强思想教育和对理论文艺工作领导。最近苏联在思想辩论和文艺创作方面空气比较活跃，并产生了一些良好影响。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如11月底在莫斯科作家分会讨论戏剧问题时，作家古巴列夫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片面强调创作自由，主张取消党的直接领导。非党青年作家杜金采夫所写的“不只是需要面包”小说，过分夸大阴暗面，实质上形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影响了很大一批青年。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波匈事件上思想也较混乱，有的认为

“赫鲁晓夫去波纯系干涉内政”和“苏军援助匈牙利是同殖民主义的行为一样”，有的认为“波匈都不可靠”，“东欧国家忘恩负义”，“干脆同它们一刀两断”。苏联领导上很重视和警惕这些情况，并采取措施，加强思想领导。莫洛托夫分工负责领导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工作，目前，苏联正利用报刊发表文章批判不正确观点，通过座谈加强对群众特别是青年的教育，苏联作家协会并将于明年2月召开理事会全会，号召所有作家团结起来，击退敌人的进攻。

（4）扩大社会民主。苏联正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工会、农庄、学校的民主生活，提高工会在企业中的作用，更好运用职工代表会议和生产会议等方式，使工人更多地参加企业管理。加强各级苏维埃的积极作用，将很好准备明年举行的苏维埃选举，提高苏维埃的作用。

（二）对外重要活动：

（1）苏联根据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的原则，大力改进它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

据我驻苏使馆了解，苏联将在最短期间内继续调整同其他兄弟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加强对兄弟国家的援助。对德国，已将过去由德负担开采铀矿50%的费用，改为全部由苏联负担，将苏驻德军队以马克计算的费用由德方负担的75%减为50%，并将今年供给德国的黄金增为75吨（去年为35吨）以便德国购买资本主义国家货物。对保加利亚，将增加原料和粮食供应。对捷克，拟在今年内满足捷方要求，购捷皮鞋700万双，还将增加天然胶、棉花、石油产品的供应。对阿尔巴尼亚将增加粮食和机器的供应。阿军费的一半由苏联负担。

（2）苏联在积极调整同兄弟国家关系的同时，对铁托和卡德尔等最近发表的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言论，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批判，如真理报于11月23日发表了“争取社会主义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12月9日发表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力量”，12日发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旗帜和武器”，18日发表了“这对谁有利”等文章，阐明苏联观点，澄清思想混乱，加强内部团结。

（3）苏联针对帝国主义利用埃及问题和匈牙利事件，策动反苏反共、煽动冷战的阴谋，于11月17日发表了“关于裁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的声明”，并函中、美、英、法、印政府，希望共同采取防止战争的紧急措施。

（三）中苏间的重要联系：

（1）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 日，我人大代表团赴苏进行了访问，11 月 6 日赴苏的中国京剧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演出。苏联对上述代表团十分重视，接待也特别隆重，政治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对我人大代表团在这时去苏访问，苏方感到很满意，认为对他们是最大的支持，有些人甚至反映，“只有中国才是他们真正的患难朋友”。苏联领导人员在同人大代表团接触中表现很谦虚，一再强调苏联党在过去工作中有过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希望中国同志坦率地提出批评。

…………

苏欧司整理

1956 年 12 月 24 日

中国外部档案馆，109-00788-01，第 1–8 页

文件 05

苏欧司整理的有关中匈关系及匈牙利近况的材料（节录）

（1956 年 12 月 29 日）

…………

匈牙利最近情况简报

一、镇压反革命

匈牙利反革命武装主力，在 11 月 4 日苏军出动后三、四天之内就被粉碎。残余部分形成小股向郊区和森林地带流窜。以后，反革命力量开始从公开转入隐蔽，从军事斗争转入政治斗争，继续在群众中进行活动。采取制造谣言、散发传单、放冷枪、阻止复工、煽动罢工，并趁机企图制造武装冲突等斗争方式。此外还煽动群众提出：撤退苏军、宣布中立、自由选举、新闻自由、恢复纳吉职位以及成立全国和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等要求。由他们鼓动起来的较大事件有：11 月中旬以苏军运走匈牙利人和胁迫政府接受上述一些要求为借口，煽动全国性的罢工；11 月 23 日在各大城市发起“纪念民族自由斗争”一周月；12 月 4 日煽动首都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妇女去“追悼死难烈士”；12 月 8 日为“抗议”政府逮捕工人委员会中的反

革命分子，在几个大城市同时组织工人示威集会，在有些城市还发生流血事件；12日、13日因政府解散反革命操纵的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又发起全国性的罢工。

工农革命政府对待反革命的态度是逐渐强硬的。起初主要是揭露这次事件真相和驳斥无理要求，向人民说明是非。11月底开始限制工人委员会的活动、撤换反对的报刊编辑和电台人员，大批逮捕反革命分子。12月4日解散各种“革命委员会”，并恢复被它非法免职的人员的职务；9日颁布关于全国实行军法审判的法令和确定武装保卫工厂条例；同日宣布解散布达佩斯和其他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14日颁布“游行和集会需要得到许可”的法令；20日又颁布实行治安扣留的法令。目前反革命气焰已日见下降，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同流窜土匪和反革命作家仍有密切联系。

政府成立不久就建立新的警察部队。匈警察部队同苏军一起组成苏匈混合司令部，共同负责维持治安。11月底，匈成立武装别动队，并开始改组人民军。建军采取少而精的原则，新的军队将以军官团和原保安部为骨干，拟建立6万人（原来有20万人）。

二、恢复秩序和生产

工农革命政府成立之初，全国生产陷于瘫痪状态。为了恢复正常生活，政府在镇反和建军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政府规定机关、学校的工作人员限期上班，制止反革命分子活动，解散各种“革命委员会”。政府号召工人复工，并规定不上工者不发给工资。政府成立了“供应委员会”和“恢复建设委员会”，专门负责供应和修建工作。

匈经济情况十分严重。此次事件中遭受炮火破坏的损失达50–60亿福林。因生产停顿而造成的损失在11月底即达110余亿福林。工业生产中的困难一方面是由于反革命经常利用工人委员会煽动罢工（罢工一天即损失3亿）；另一方面由于煤、电缺乏，矿工不足（平时煤日产量8万吨，现不到3万吨，电力仅达五分之一）。由于上述原因，整个工业部门将有20万人失业。因消费品减产，只得动用国家储备，现消费品储备已从140亿福林降低到60亿福林。另一方面政府为了满足群众要求，已决定提高工资10%。

政府宣布废除征购制，基本上已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农民情绪比较稳定。事变后有40%的合作社解体，被反革命分子搞垮的一部分正在重建，政府将保证农民有选择经营方式的自由，土地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自由买卖，但仍支持合作社的发展，保持拖拉机站。政府将以国家征购和订生产合同的方式取得粮食和原料。

现正在草拟1957年经济计划，主要原则有三：(1) 一切依据动力资源情况，并从邻国取得电力，减少投资，降低工业生产水平；(2) 向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借款；(3) 农业方面，主要是深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三、建党

匈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1月1日成立，当时党的领导成员除卡达尔外大都是纳吉集团的分子。工农革命政府建立后，改组了领导机构，由21人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由卡达尔、奥普罗、马罗山、基什、卡莱、费赫尔和库比斯[①]等七人组成政治局。建党和活动的基础依据1949年召开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统一的联合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当时提出统一战线和与民主党派合作等问题）。10月24日公布了"关于吸收党员的方针"，决定在前劳动人民党党员和组织的基础上建党，并吸收新党员。

为了"坚决摆脱拉科西集团有害的政策和方法"，临时中央委员会在11月14日解除了格罗、赫格居斯等12位领导人物的职务，并决定不吸收"在拉科西、格罗领导时期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党员入党。

在建党工作中遇到一些阻碍。这些阻碍是：(一) 反革命分子乘机活动，到处乱扣"斯大林分子"、"拉科西分子"的帽子，并提出"撤换一切人"的口号，来打击忠贞的共产党人，制造党的分裂；(二) 反革命分子通过工人委员会要求在厂矿企业中取消党的组织，并多方阻挠工人入党；(三) 某些群众和党员思想混乱，有的认为暴乱是"人民起义"和"革命"，"纳吉是'民族英雄'"，有的怀疑政府是否代表工人的利益，因而立场动谣〈摇〉，消极失望。

党中央为了保证建党工作顺利进行，采取了一些措施：召开积极分子大会；制止乱扣帽子和企图"撤换一切人"的活动；揭露要求取消党组织的阴谋；12月2–5日召开中央全会，指出武装暴动的反革命性质并阐明了党的任务。由于党采取了坚决措施，建党工作逐步获得进展，目前党员人数已达10万。

四、对外关系

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后，兄弟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据12月3日前发表的数字，无偿援助已达28500万卢布（苏、捷、罗、民主德国、保等国供给了大批煤、粮食、糖等日用必需品和工业原料）。民主德国、捷、罗三国政府代表团曾先后去匈访问表示支持。为了克服困难匈政府已向兄弟国家提出要求给予总数约4亿美元的

① 原文如此，疑为比斯库（内务部长）之笔误。

贷款（苏10亿卢布，捷6000万美元，波3000万美元，民主德国6000万卢布，罗6000万卢布，中国两亿卢布，对保、南亦将提出要求）。对西方国家除旧欠两亿多美元不能偿付外，又提出一些借款和物资要求：西德已允贷6000万美元的煤和饲料，奥13万吨化学肥料，法20万吨饲料，原欠瑞士两千万法郎允延期三个月归还。据外电传，匈拟向世界银行贷款一亿美元，遭到拒绝。

南斯拉夫一面表示支持卡达尔政府，一面庇护纳吉，并认为10月23日暴乱是人民的革命运动。11月19日又派外交副秘书长维迪奇去匈，要求匈政府保证不因纳吉的罪行对他采取措施。纳吉去罗后，南政府三次照会匈方表示不满。后来卡德尔又发表演说，认为匈牙利同志不应解散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不必在建党方面“枉费心机”，这种错误看法受到卡达尔总理的公开批驳。最近南对匈态度恶劣，电台曾以滑稽节目讽刺卡达尔。

这次事件中逃往奥国的匈公民约15万人，悔悟回国的现已有7千人。奥政府多方加以阻挠并协助美国等西方国家劫运这些“难民”。匈政府在11月24日、28日、12月18日先后照会奥国政府，要求迅速解决匈公民回国问题，奥政府拖延不予答复。尼克松在12月19日还亲至奥国活动，计划劫运两万一千匈公民去美，目前已有六万人离奥分往法、英、比、南美和澳洲。

联合国安理会、大会紧急会议和十一届大会自10月28日起至11月21日连续讨论了“匈牙利问题”，并先后通过七项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撤退苏军，派联合国观察员去匈调查局势，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选举，提供匈牙利物资援助，“救济”和“重新安置”外逃的匈“难民”以及调查苏联“放逐”匈公民等。在紧急大会和十一届常会上，社会主义国家态度不尽一致，南、波两国对有些提案弃权；大部分亚非国家保持了他们的中立态度；美国伪善地提出“救济”和“援助”匈牙利的提案，但诬蔑性的提案都通过它的仆从国提出。

苏欧司

1956年12月29日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94-03，第27–37页

文件 06

王炳南与波诺马连科谈话记要

（1957 年 1 月 5 日）

苏大使称：昨天才从莫斯科回来，前几天苏共开了中央全会，这次全会上讨论的是经济问题：工矿企业机械化，更好地利用现有工矿生产能力，集中人力物力重点建设住宅等问题。下次全会将要讨论思想问题。

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上全文发表了，当日报纸一下子被买光了，现在你要想在莫斯科买到那天的报纸是不容易的，据我在莫斯科的观察，苏联人民是非常赞同这篇文章的，特别是工人，比如斯大林问题，要想把斯大林从人民的内心抛出去是不可能的，苏联对这篇文章很满意，很个别的人对这篇文章表示不满，他们不是对个别问题表示不满，而是（对）文章提到（的）一切问题不满。这些人就是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特务分子，过去坐过牢的人。

周恩来总理来莫斯科对加强我们两个国家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将有巨大意义。

对波兰的情况因我才回来还不够了解。前些日子哥穆尔卡在华沙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是他讲话中较好一篇（如果王大使没有这篇文章我可以给一分〈份〉，它是党内文件，报上未发表），现在更加明显的看出由于党内一股健康势力的影响，哥穆尔卡不能不走向正确的道路，华沙、热苏夫等省党代表会议又选出了老的共产党员作书记，如克鲁切克、拉舍维赤都是老共产党员，他们被选当书记，应该说党的正确的势力在起着作用。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内意见是有分歧的，我举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次南斯拉夫代表团来波企图将波兰拉到南方面去，南方提出的问题，萨姆布罗夫斯基在谈判中表示了同意，萨向哥汇报这个问题时，哥把萨大骂一顿。

波党中央有反苏派，他们继续在展开活动，如在波兰军队中前几天发给校级以上军官一些文件，发的什么文件呢？铁托在普拉的讲话、法国人包利热尔特尔的反苏文章，谁发的呢？当然是斯彼哈尔斯基，他将这类文件发给军官们目的是很明显的，我们要问：为什么不把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给军官呢？

奥哈布、萨瓦茨基是代表正确的一方面的，波党内真正的敌人是莫拉夫斯基、马特温、萨布罗夫斯基，哥穆尔卡也可能看见了敌人的存在，但很可能敌人存在他

不去看，或不愿去看见敌人。英德里霍夫斯基是犹太人，比较坏，但坏的程度比萨姆布罗夫斯基差些，因为萨很会阴谋，英是怕挨骂，谁当权喊谁万岁的人，他的夫人是个很好的老共产党员。

最近有些作相当负责工作的犹太人到以色列去了，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祖国。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2，第119–120页

文件 07

王炳南与奥哈布谈话记要

（1957年1月8日）

奥哈布称：

…………

三、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党最近在社会主义国家及党之间关系问题及国际问题提出了理论性意见，我们相信：中国党领导的明智，中国党的力量及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信将是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间所发生的问题的重要因素。我认为：尽管有困难，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思想政治上的一致是可以达到的，在这方面理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日报的文章，我曾很注意地阅读过，也和部分党的领导人谈过，他们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是正面的，无批评性意见，只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强调重点有些不同意见。我对文章中所提到的重要问题，如对南斯拉夫同志的批评，对斯大林作用的正确估计，均基本同意。必须指出：在我国及党内在正确评价斯大林作用问题上有困难，有多年斗争历史的波兰共产党被根据挑衅性的材料轻率解散，这件事在党及工人阶级中是惊人肺腑的事，另外，波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及苏联同志在八中全会前及在会上的表现引起了工人及群众的不满，有必要对产生个人崇拜的背景作深入的分析。但我个人对文章是基本同意的，对于文章的实质是同意的。

…………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2，第123–126页

文件 08

王炳南与波外长拉帕茨基谈话纪要（节录）

（1957年1月9日）

…………

（二）

王：部长对人民日报文章个人意见如何？

拉：最近政治局开过一次会，讨论了选举、农业政策、经济政策、组织问题，会一天开了十七个钟头，未来得及讨论这篇文章——虽然是值得讨论的。我只能发表纯粹个人的意见。

这篇文章在基本问题上表达了正确、重要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其中某些次要问题还须作更深入的考虑，例如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问题，许多党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理论工作，这篇文章为寻找个人崇拜的根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篇文章提出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的问题，认为帝国主义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主要、基本矛盾，其他矛盾是次要矛盾。文章提出修正主义的危险问题，这些对我们说是一种帮助。

我们党的党内斗争时期已过去，八中全会提出团结一致的口号，实现这个口号是有阻力的，来自两种人（1）原保守的过激分子，主要是党内知识分子及青年，还有部分工人，他们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反对所谓保守主义；(2）坚持旧的工作方法的人，他们不认为主要矛盾是敌我斗争，他们坚持党内斗争。

哥穆尔卡同志近月来在各处一再强调，我们最大危险是来自反动派的危险，党内最大的危险是离开马列主义，在反保守的同时走入修正主义的道路。

我们不主张回到老方法的时期。但我们反对强调党内有进步派和保守派，反对看人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反对不根据一个人在具体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来判定一个人，因为这样作不仅会削弱党与反动派的斗争，而且会削弱与保守主义的斗争。党将在阶级斗争中而不是在党内斗争中加强，老话仍是真理。

因此，我认为文章提出基本矛盾、次要矛盾的问题，提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是与我党领导意见一致的，是与我们所正确的路线符合的，这篇文章对我们说是一种帮助。

我们的工作及文章的论点，无疑会遇到那些主张党内斗争的人的不了解和反对。由于中国党及其领导在波兰具有威信，中国党的论点将起帮助作用。我相信，这些正确的论点虽不见得马上但终究会胜利。

文章强调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成就，对我们也是一种帮助。在波兰相当一部分党员及人民群众对过去看法不正确，他们感到失望。我们现在很强调消灭对过去的片面看法，片面性有着实际的害处，敌人利用这些片面性论点进行宣传，说社会主义制度破产，以这些为基础来反对党的活动家、党机构及全党。在评价过去成就问题上，我们的工作及文章的论点，也会遇到障碍和反对，但那是可以克服的。

文章强调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领导作用问题，这点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将是有益的。

文章对铁托、卡德尔同志所采的立场是正确的，与我党领导的态度是一致的。南共代表团访波期间我们已将自己的态度告诉给他们，这还是在人民日报文章发表以前。我们认为公开论战特别是在工人运动在匈牙利事件后遇到很大困难，敌人大力进行反苏、反共宣传的时候是不妥当的。过去的论战双方都有缺点，不利于团结。南共代表团在波期间我曾参与会谈，感觉南斯拉夫同志容易冲动，成套的东西多。人民日报的语气是诚恳的，同志式的，但又是有高度原则性的。故更保证文章的有效性，不会影响团结。我高兴地看到，南斯拉夫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比过去对其它文章的反应要好，语气较好。

文章对匈牙利问题的评价在波兰不少人中遇到保留意见。在匈牙利问题上我们有很大困难，我们曾向党员及群众解释在匈事件过程中反革命力量抬头，最后占了上风，在社会主义基础受到威胁，苏军第二次进驻布达佩斯前，我党中央在公开信中已提及。在解释工作上有困难。（他想了一会儿说）很多人怀疑这样的提法，即匈牙利事件自开始即首先由反革命挑起的，我们也有这种怀疑。

我总的认为：这篇文章的方向和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这篇文章会加强工人运动困难时期中受到威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2，第127-129页

文件 09

张彦关于总理在波、匈活动情况致外交部、调查部电

（1957 年 1 月 16 日）

外交部、调查部：

（一）15 日抵罗兹时受到波中央政治局委员萨布罗夫斯基和群众欢迎，下车后即迳去纺织厂参观，11 时到市政厅早餐，12 时参加群众大会，会后去参观教师住宅。代表团抵波以来以罗兹群众欢迎最热烈，代表团车辆所经之处不断有群众挥手致意。14 时半乘车离罗兹，17 时抵华沙，20 时王大使举行招待会，会后代表团和波政治局同志会谈到深夜 3 时，联合公报经王稼祥同志和波副外长一直磋商到 4 时才定稿，16 日晨 8 时半举行签字仪式，8 时 3 刻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10 时半乘图 104 离华沙。

（二）11 时半安抵布达佩斯，13 时半拜会主席团主席道比，随即举行午宴，16 时参加积极分子大会，会后正式会谈，20 时郝大使举行招待会，招待会后继续会谈，预定明日上午 6 时半签字，8 时离布达佩斯飞莫斯科。

（三）匈方和苏联对总理访问的安全工作很重视，总理所到之处都有苏军警卫，总理和代表团住处都有苏军坦克和装甲车，警卫很多，内部招待人员都由苏联同志担任，请放心。

张彦

1 月 16 日 22 时

机收 17 日 16 时 44 分　印出 17 日 20 时 55 分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5，第 36–37 页

文件 10

驻匈使馆关于总理访匈的估价致外交部电

（1957年1月21日）

外交部：

关于总理访匈的估价：

（一）总理访问时的匈牙利局势：

（1）镇压反革命极不彻底（仅约捕500人，杀7人），流散武器很多，尚未收缴回来。首都的反革命利用当前的一切困难和弱点，仍在进行煽动罢工罢课，排斥忠实共产党员，阻碍党员登记等破坏活动，谣言很多，打冷枪未根绝。随着城市统治力量的逐步加强，反革命 有转向农村的征兆，煽动退社、强索调整的土地、抗拒纳税等不断发生。

（2）群众反苏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一般尚未克服下去，对卡达尔政府一般在抱观望态度，尤其文艺界、新闻界、教育界和学生们的思想情况最为混乱和恶劣。作家协会和记者协会虽已命令停止活动，学校已推迟开学，但发动群众似感办法不多。报刊广播等宣传活动软弱无力，右倾机会主义言论每有出现。

（3）党政领导集团在若干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从实际斗争中逐步明确起来，思想上趋于一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也起着巨大作用，从匈政府1月5日声明看来，对若干问题的提法或强调上，表现最为明显。

（4）党员登记者已十万有余，惟首都原有党员近27万，现仅有2万余人，其中机关人员占多数，工人较少（全国约50%工人集中于首都）。领导上虽在同排斥下层党员干部的现象作斗争，但对犯错误的高级干部（部长级以上约70–80人）和中级干部（州一级约90人）该如何进行团结争取工作尚未完全清醒过来认识其重要性。

（5）暴乱造成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动力不足影响工厂正常生产，原料也有困难，通货膨胀的威胁未解除，约十多万人的失业势不可避免，群众情绪动荡，不少干部信心不足。

（6）南斯拉夫通过宣传等，对匈内政进行粗暴干涉，有些欺人太甚，放肆地散布修正主义谬论，直接影响助长着群众思想的混乱。我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后，情况虽有好转，但这仍是匈领导上最感头痛的问题，而联合国叫嚣和西方态度的恶化也

多少有些精神上的负担。

（二）继匈、中、苏莫斯科会谈公报，总理率代表团又亲莅匈作公开访问活动，这是事变以来的创举，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匈方为此极为振奋，尽力所及安排了各项活动，充分动员宣传工具展开了连续突出的宣传活动，时间虽短暂（不到24小时），总理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却达五次之多，又签订了强有力的中匈联合声明。凡此一切，在打击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全力支持巩固卡达尔政府，鼓舞匈牙利人民战胜困难的斗争信心上都起着巨大作用。同时在澄清国际上对匈牙利的干涉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深远的影响。贷款二亿卢布的援助，对匈克服经济困难也有巨大作用，从而大大地发展和增加了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

（三）总理同卡达尔等先后会谈五次（连莫斯科会谈三次在内），长达13小时。卡达尔等同志的态度表现很诚恳、很虚心，会谈和共同声明所涉及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不但没有意见分歧，而且在巩固和加深卡达尔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有重大影响。只是在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上，在不忙处决反革命头子上，我们感到由于卡达尔等亲身经验的限制，由于匈党的传统作风的影响，因而对前者体会得尚不完全明确，对后者尚未认识到其深远的作用。会谈中卡达尔等对由中国党倡议各兄弟党同南斯拉夫党尽早一同会晤解决争端的问题，曾有殷切的期待，并认为时间的推迟会使匈南关系更趋恶化。

（四）总理等访匈的保卫工作都是由苏联驻匈大使主动征求大使意见后协助匈方以苏军和苏保卫人员为主布置的（这当然系苏共中央的指示），保证了安全。我馆人员全体动员为总理等访匈服务也基本完成了任务，至于事务技术性工作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些缺点这里就不述了。

驻匈使馆

1月21日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760-01，第3–6页

文件 11

驻瑞士使馆关于西欧对总理出访的反应致外交部报告

（1957 年 1 月 28 日）

外交部：

西欧普遍承认周总理访苏、波、匈的最大收获是巩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总理访问东欧自始至终密切注意。总理此行打破了西欧资产阶级一些幻想，他们的看法也多少有一些改变。他们的反应集中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对我态度的看法以及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关系等问题上。综述如下：

（甲）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

（一）认为总理访问东欧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团结问题上的收获主要表现为：(1) 中苏更团结，总理到处宣扬苏联的领导地位，苏联现更需要我国的支持；(2) 稳定了苏联的领导核心。自波匈事件以来，苏联内部有意见分歧，总理去后解决苏联这些问题，巩固了赫鲁晓夫的地位；(3) 波兰继续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哥穆尔卡在演说中承认苏联的领导地位；(4) 布达佩斯五国会议及总理访匈后，匈政府态度更加坚决加强了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5) 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和总理访问后，各兄弟党虽未完全意见一致仍有些保留，但争论平静了，南斯拉夫道路吃不开了，恢复了斯大林。

（二）但资产阶级报纸仍然不放弃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造谣挑拨。主要在以下三点：(1) 中苏两国还有矛盾，目前只是因利害的需要而相结合；(2) 波兰没有完全倒向苏联，在联合声明中不同意说以苏联为首，不同意说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有的说这方面周总理失败了，是哥穆尔卡的胜利；(3) 南斯拉夫被孤立了，离社会主义阵营更远了。

（乙）对我国态度的看法：

西欧资产阶级承认我地位、力量和威望日益上升，第一次在欧洲事务中起重大作用，西方不能忽视。并承认我国在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问题上的成就，多少改变了一些他们看法，但对我的态度仍有不少妄测和挑拨。

（一）他们有的以前对我国有铁托主义等幻想或希望我支持波兰更向右发展，现完全破产了。有的说，虽然以前没有幻想，现在也不认为我完全与苏联一致，完全反对南斯拉夫及波兰的做法，但我如此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起来对付帝国主

义，这是使他们大为失望的。他们承认我们的做法很稳重，在一连串事件后，苏联同志有些乱，但我国则很镇静，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很策略，对波兰及匈牙利分别处理，虽然踢了南斯拉夫一脚，但是穿了丝绸拖鞋踢的很轻。有的说，现在知道中国是马列主义学说最深的共产党人，决不允许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一切都是为了世界共产主义。

（二）他们对我国态度作了不少妄测，说不要看总理表面所说的，实际上我与苏联还在相争。苏联已不是唯一领导者，我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阐述了很多问题，意思是表示苏联领导人马列主义主义学说水平不高，而苏联驻西欧使馆的公报都发表该文全文，说明苏联承认中国的理论领导地位。有的说，北京已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外交及理论重心，因为我需要苏联援助，所以帮苏联说话。有的说，因为美帝抵制我，尼赫鲁在会见总理后访美，获悉美国对华态度没有改变，因此我国转而积极支持苏联。还有的说，我也有“卫星国”，怕受到东欧国家离心倾向的影响。

（丙）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关系：

西欧重视总理访问东欧对两个阵营的关系的影响，重视各个联合声明都强烈抨击帝国主义的政策。认为这也是向美国显示我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他们说，从中苏会谈声明中可看出两国态度，坚决对当前国际形势一切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外交上的，多于内政上的，波兰在国内的一些做法所谓民主化等并没有改变，总理的访问主要是恢复社会主义阵营在对外方面的一致，以打击西方的政策。西方国家特别注意我们的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并认为我们很策略，一面反对了美国，但又没有提出要给中东军事援助，不怕与美国对立，而是照顾中东人民的情绪，免得他们感到处于两强的压力之下，亲美的则说中苏声明是对中东有威胁性的文件，更证明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必要。总的他们认为我们对中立主义表示友好，争取中东国家对西方的斗争要加强。

驻瑞士大使馆

1月28日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6，第92–95页

文件 12

驻南使馆关于南斯拉夫对总理出访的反映致外交部电

（1957年2月1日）

外交部：

兹将南舆论对周总理访苏、波、匈的反映简报如下：

南报刊对周总理的这次出国访问较为注意，对总理的行踪和行动逐日均有消息发表，尤注意对苏、波、匈的访问，几次都登载在第一版。对访苏只刊载了消息和极简单的讲话摘要，而对访波、匈期间的重要讲话（如在华沙机场、文化宫和布达佩斯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等）则作了较为详情的摘要报导。战斗报、政治报均转载了中苏、中波、中匈的联合声明的基本要点，政治报则较为详细，但对中苏联合宣言中有关中苏团结的重要意义部分均未转载。对上述会谈除最近两次外交秘书处的记者招待会上就中苏、中波联合宣言发表简短评论外，报刊未发表评论。南报刊此次报导的重点主要是我对波、匈的态度，但对总理讲话中几次强调的加强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一语，不论消息和南记者的报导中都发表了（这是过去从未刊载的）。对总理在匈讲话有关纳吉问题和苏军援助问题只字未提，迄今为止对中匈会谈未作任何表示。对中波、中苏宣言从外交秘书处发言人的谈话中除同意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应本五项原则一面外，对团结一面和国际局势的看法显然持有不同意的意见，如说声明表达了中苏两国政府的立场和他们对国际事件的评价，南对这些事件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驻南使馆

2月1日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6，第65–66页

匈牙利档案

本组档案均译自 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 Dokumentumok*（匈中关系文件集），Budapest：MTA Jelenkor-kutató Bizottság，2001。

柴鹏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译审）翻译；沈志华选编。文件题目为编者所加，文末注明档案的馆藏号。除特别注明外，注释均为匈牙利公布档案时的编者所加。

文件 13

沙尔关于邀请周恩来等问题访匈给塞拜什的信（节选）

（1956 年 12 月 27 日）

亲爱的塞拜什[①]同志！

请允许我以私人信件向您陈述几个重要问题。

关于中－匈关系：

一、邀请周恩来同志访问布达佩斯[②]具有无比巨大的外交和内政意义，其效果远比政府的某一位领导人前去华沙或莫斯科向他介绍情况要好得多。他的来访立即可在亚洲国家中使卡达尔政府的威望得到提高。而且这样的访问还可减少正在联合国中争论的激烈程度。我认为，为实现此次访问，可动用一切手段。这个访问无论在国外或在国内均可使苏联行动的必要性得到更好的理解。同时周恩来同志可以以最合适的方式帮助苏－匈双方协调关系，他的访问可以提前实现（苏匈）关系的协调。

为了让他透彻地了解全貌，我认为应向周恩来同志最大程度地详细介绍我们的事件和眼下的困难。最合适的办法也许可以这样：党和政府准备一些不便于口述的详细材料（差不多还有 3 周时间可利用），翻译成英文或俄文，用于一天（或几天）的谈判中。

这些书面材料应详细叙述过去 12 年内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对原因的分析，10 月 23 日事件的起因，到 11 月 4 日为止关于事件的详细叙述，反革命势力影响

---

① 塞拜什·伊斯特万，时任匈牙利外交部副部长。——译注；在中国外交部档案中使用的中文名字为谢白石。——原编者注

② 周恩来于 1956 年 11 月 17 日启程前往东南亚和南亚诸国访问。至 1957 年初依次访问了越南（越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然后又回到印度。原先的访问计划在途中有了改变，据新华社 1956 年 12 月 23 日报道：周恩来 1957 年 1 月初将访问苏联。接着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访问路线改向东欧，访问了波兰和布达佩斯。之后路过莫斯科继续他的亚洲之行。周恩来在出访的第一阶段之后，在去苏联之前，1957 年 1 月 5 日晚在北京作了短暂的停留，期间向社会主义国家驻北京使节作了情况通报。参见：MOL XIX-J-1-j，《外交部机密档案（1945–1964）》，中国，6.d.，5/b，0014/1. sz./1957。

扩大的根本原因，纳吉·伊姆雷的问题。眼前的问题应包括党的组建工作现状及困难，经济上的问题，为解决经济问题所需的借款愿望和计划，各社会阶层现在的表现及对这些表现的分析，苏－匈关系从解放到十月事件的全过程，其中可提及战争赔偿问题，提及合资企业、进出口、经济合作等问题，还可谈苏－匈合作的经验和教训，最后是政府为解决国内紧张情况拟采取的具体计划。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哪一位中国领导同志也不十分准确地了解引发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及如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在拉科西年代中国同志只听到他们吹嘘成绩，很难知道匈牙利的准确情况。

二、周恩来同志访匈，还可使借款一事提前解决。根据目前情况——我不愿随便猜想——中国由于自身的重大经济困难，贷款一事，前景并不很乐观。但我认为在充分挖掘潜力的情况下，中国同志可能提供我们所要求的外汇和货物贷款的50%。周恩来同志访匈期间，在听取我国的经济困难，居民可能出现的失业状况，以及因此在政治上引起的后果后，有可能使问题得到比预期更快、更理想的解决。

…………

致以同志的问候

沙尔·约瑟夫

北京，1956年12月27日

MOL XIX-J-1-j，《外交部机密档案（1945–1964）》，3.d.，4/b.，00 371/1957

文件 14

周恩来与匈牙利领导人的谈话记录（节录）

（1957年1月16日）

布达佩斯，1957年1月16日

1957年1月16日19–20时及22时15分至1时30点，分别在国会大厦及中国政府代表团下榻处。

中方参加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驻匈大使郝德青，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

匈方参加者：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政府副总理明尼赫·费伦茨博士，国

务部长马罗山·捷尔吉，外交部长霍尔瓦特·伊姆雷，工业部长奥普罗·安托尔，贸易部长罗纳伊·山多尔。

周恩来：匈牙利的治安情况怎样，是不是还有暴力行动？

卡达尔：从根本上来说，秩序恢复了，但外面还有不少无证枪支。我们的主要困难是在政治方面。敌人利用了我们的严重困难局面，用各种虚伪的口号去迷惑群众。在治安方面也还存在不足。这时他叙述了少校被杀事件。这件事更多的还不是政治性谋杀，而是个人报复。

明尼赫：11月以来，我们从私人那里已经收缴了十几万支枪，这样的数字对一个小国来说是太大了。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马罗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来布达佩斯访问时[①]还需要坦克保护，但现在中国同志也可以看到，情况大大改观了。

卡达尔：11月20日南斯拉夫大使来我处，他要求我派坦克去接。

关于莫斯科会谈，我已向匈牙利政府作了汇报，对于中国同志的立场在匈牙利领导人中间都是全部同意的。[②]

在机场，一个印度记者问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友好会见还是谈判？我回答说，我们也要谈判，但会见最主要的内容是谈友好。（周恩来表示赞同。）这个印度人当然知道，一个大规模的谈判一天是不够的。声明的文字尚需商量，还没有准备好。

中国的经济援助当然使这里的人非常高兴。

周恩来：再来说说我对亚洲诸国的访问，在阿富汗、尼泊尔，还有和尼赫鲁会谈时，都谈到了匈牙利问题。

与波兰同志也谈到了匈牙利问题，我们告诉他们，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从性质上来看，是不同的。哥穆尔卡的领导从根本上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匈牙利的事件则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打上了纳吉·伊姆雷背叛的烙印。卡达尔·亚诺什只有反对纳吉·伊姆雷和在苏联的帮助下才能在匈牙利保住社会主义事业。对波兰同志和对亚洲的领导人，我们都告诉他们，对于问题的解决，匈牙利政府除了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没有其他办法。

艾森豪威尔对尼赫鲁说，他不想为了匈牙利事件发动战争。他承认，并且只能

①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于1956年11月16日来布达佩斯访问。

② 1957年1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苏－匈高层会谈。中方代表团由周恩来率领，苏方代表由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率领，匈方代表由卡达尔·亚诺什和马罗山·捷尔吉率领。

接受这个现实：匈牙利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

南亚诸国承认，如果苏联军队不介入，那么匈牙利今天就属于西方阵营了，那会是巨大的战争危险。匈牙利只有在苏联军队的援助下才能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

…………

MOL，XIX-J-1-j，《外交部机密档案（1945–1964）》，4.d.，4/j

文件 15

匈党宣传鼓动部关于党内对中共立场反响的报告（摘录）

（1957 年 1 月 21 日）

布达佩斯，1957 年 1 月 21 日

…………

四、对中国共产党立场的反响

中国文章[①]的发表引起了巨大的喜悦，尤其在党的工作者队伍中，在广大党员中也是如此。他们一致同意文章的观点，它使同志们，包括党内知识分子，都加强了对我们事业正确性的认识。文章使我们思考了许多问题，从而更靠近党了。它帮助我们澄清了反革命事件以前和以后出现的理论上的混乱。他们说，（文章）促进了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揭露了“民族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瓦解共产党的阴谋。文章指出，所谓反“斯大林主义”不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而是在总体上反共产主义的行为。因此广大党员可以勇敢地对这类行为进行斗争，不管对方把你称之为拉科西主义者，还是称之为斯大林主义者都一样。

在《人民自由报》上发表的文章有翻译错误（说匈牙利不曾有过无产阶级专政），这引起了许多理论上的混乱，而对错误的更正又太晚。

普通党员们在读了文章以后满意地说，“我们不孤立”，“看到伟大的中国和我们站在一起，给了我们以力量和信心”。关于中国总是强调苏联的领导作用，还强调两个社会主义世界大国不仅在匈牙利问题上，同样在所有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以及在原则问题上也都完全一致这一认识，这些都在党员群众中引起普遍的满意。他

① 指《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29 日的文章。

们说，这是社会主义阵营根本力量所在。

在读了文章之后，在主要是曾受到来自南斯拉夫同志方面的影响而对政府和党不满的一些党员中，对南斯拉夫同志的信任减低了。党员们不无怀疑地问，他们真的是支持我们，支持共产主义事业吗？

也有一种观点：也许情报局是对的？这种观点之所以有害，是因为有些同志据此推论：那么现在应该同意拉科西的路线了？这是在图尔凯维（Túrkeve）。还有在扎拉埃盖尔塞格（Zalaegerszeg），德内什·伊斯特万[①]一反常态，在党日活动中第一个发言，公开宣称：生活证明拉科西和格罗是对的。他这样的看法和类似的观点，会给党造成很大的损害，使群众脱离我们，等于支持了敌人的宣传，说什么卡达尔政府要继续执行“拉科西政权”的政策，或甚至为他们回来做准备。

尽管有上述反应，在农村还不是十分了解这篇文章，因为农村的报纸比较少。

从一定的角度看，中国文章的另一个积极作用是给一些持反对立场的知识分子带来失望。中国共产党的不带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治路线对这些人有着极高的威信，他们曾幻想中国能加强并支持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曾经设想过中国党能成为“反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团结一批不同国家的“反斯大林主义”团体。与他们的想法相适应的是，他们等待在苏共与南共的争论中，中国党会支持后者的观点。

此外，一些敌人散布中国也是“帮凶”的论调，说什么中国在经济上依赖苏联，用这样的办法来报答苏联。……[②]

MOL VII.（MDP-MSZP osztálya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 –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文件），288.f.11.cs.（1957.）10.ő. e.，Információ 11.sz. 7-8.o.

波兰档案

本组档案除第一件译自波兰《今日》杂志外，其余均译自 Polski Instytut Spraw

① 德奈什·伊斯特万，1956 年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扎拉（Zala）州党委第一书记。1956 年 10 月 26 日——在革命的日子里——在示威群众的要求下辞职，并离开了该城市。1956 年 11 月 4 日后，曾短时间重返原职位。

② 《报告》的以下部分中“五、其他问题”，又谈到周恩来访问时举行的积极分子大会（1957.01.16.）。少数与会的领导干部以“毫无保留的热情和赞成”接受中国总理的讲话。

Miedzynarodowych（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 *1957*（波兰外交文件集），Warszawa：PISM，2006。王砚（中国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翻译；沈志华选编。文件题目为编者所加，文末注明档案的出处或馆藏号。除特别注明外，注释均为波兰公布档案时的编者所加。

文件 16

波兰与中国两国代表团的会谈记录

（1957 年 1 月 11-16 日）

中方参加会谈的人员是：周恩来同志、贺龙同志、王稼祥同志和中国驻波大使王炳南

波方参加会谈的有下列各位同志：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萨瓦茨基、奥哈布、萨姆布罗夫斯基、拉帕茨基、纳什科夫斯基和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

第一次会议于 1 月 11 日下午三时进行。

…………

周恩来同志：谢谢哥穆尔卡同志关于波兰形势的详细介绍，波兰党在十月事件中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它的正确性就在于波兰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运用了马列主义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支持波党 21 日的立场，当时八中全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因此波兰同志的贡献是主要的，中国党只是使形势更稳定了一些。

周恩来同志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

苏联在 10 月 30 日的声明中已经承认在平等基础上合作的正确性。中国党支持上述立场，目前我们正根据上述原则进行工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当学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在过去的波苏关系中有许多不平等的地方，现在已经得到了纠正。我们高兴地看到，波兰党没有对苏共的立场进行公开的讨论，否则也会削弱我们的阵营。同样正确的是，波兰党没有煽动民族情绪。你们的做法使争论问题不用公开讨论就可以解决，否则只会被帝国主义者利用。在我们 12 月 29 日的声明中我们指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我同意哥穆尔卡同志关于平等和主权的意见，但是也不要忘记苏联的先进作用。先进的作用是主要

的，平等和错误是次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和基里洛克的谈话中正确地指出，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像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而不应像老子对儿子那样（过去的波苏关系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曾向苏共指出，他们对待兄弟党的态度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需要公开谈论此事，这是为了不削弱苏联。对于那些错误不要谈了又谈，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团结对敌和强调苏联的先进作用。

…………

1957年1月16日，华沙。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新档案馆注：另一版本与此稍有出入。见安哲伊·维尔布兰："1957年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和周恩来的会谈"，《现代史》杂志，1997年第4期，第119–144页。[1]

AAN，KC PZPR，XIA/31.

俄国档案

本组档案来源有三：1、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对译文稍有修改）；2、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9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3、*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苏联与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档案文献），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1998。全部档案由沈志华选编，译者除《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的部分译者外，参加翻译的还有曹广金、师建军、吕雪峰等。文件题目为编者所加，文末注明档案的出处或馆藏号。除特别注明外，注释均是原有的。

① 维尔布兰公布的档案译文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5–82页。——原编者注

文件 17

拉科西关于匈牙利局势看法致赫鲁晓夫的信（节录）

（1956年12月15日）

1956年12月20日收到，1957年1月5日完成翻译并登记。

译自匈牙利文

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请允许我就匈牙利局势的几个问题向您表达一下我的意见。

…………

同时必须补充的是，目前党的领导成员绝大多数是不坚定分子或者是纳吉·伊姆雷的支持者，由于他们的存在，无法保证这个决议好的一部分不成为一纸空文。

2、尽管如此我仍觉得，目前，终于出现了这一机会，可以让大部分老党员参加工作，而在此之前他们受到了强烈的排挤，也能够实现11月4日之前所制定的那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应该以强大的政治反攻行动，支持苏联武装力量的行动，除我之外，无论是在苏联的，还是在匈牙利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参加这个行动。这是计划的第二部分，也是极端重要的部分——大概由于卡达尔同志的反对立场——这部分计划没有被完成。在最初两周里，苏联军队的解放斗争几乎没有得到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上的支持。例如：拖延动员处于法西斯主义威胁之下的百万群众，这种动员行动可以在联合共产党员的全部力量的条件下得以进行。如果卡达尔同志拒绝这种联合，那么，应该将其他同志提到首要地位。这样，他的拒绝武装解放的行动就没有了政治支柱。（卡达尔）这样做给反革命将解放的军队描绘成占领军提供了机会。尽管军事上遭到失败，但是，无论是在匈牙利，还是在国际范围内，他们仍然保持甚至是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并深深地渗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

…………

拉科西·马加什

于莫斯科，1956年12月15日

翻译：H. 德久巴

拉科西同志的信是于12月20日收到的（翻译注）。

批示："归档。关于拉科西同志的信苏共中央通过了决议（1957年4月18日第90/L Ⅷ号决议。[①]1957年5月3日。B.列萨科夫"。

АПРФ，ф.3，оп.64，д.490，л.38-46

文件 18

谢皮洛夫关于拟与周恩来谈判的内容呈苏共中央的请示

（1957年1月4日）

苏共中央：

鉴于1月7日周恩来行将访问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建议将与中国朋友讨论涉及苏中关系、国际局势以及朝鲜局势等一系列问题。

一、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门工作着2739名苏联非军人专家，其中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名，经济领域的顾问123名，提供技术援助的专家2213名。除此之外，在中国工作的还有374名军事顾问和专家。

考虑到1956年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宣言中和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中阐述的关于此问题的我方立场，可以讨论苏联顾问和专家继续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适宜或者大幅度减少他们的数量的问题。

二、最近，不论从我们方面还是从中国朋友方面，都没提出任何重大的悬而未决的经济问题。可能中国朋友会在会谈过程中提出某些经济方面的问题。在此种情况下，可以补充研究此类问题。

三、毛泽东在与尤金大使谈话时，对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本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意见并表示了不安。鉴于此，希望就涉及朝鲜局势的问题与周恩来进行讨论。

在此种情况下强调"苏联政府认为，在朝鲜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驻扎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观点看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这种强调应是适宜的。

---

① 鉴于其他类似内容以及拉科西致苏共中央的信（1957年3月2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决议，指责拉科西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策的带有偏见的批评，认为他还不适宜返回匈牙利，并借口说是匈牙利领导人的请求，委托中央书记处为他在莫斯科郊外挑选居住地点。1957年夏天，根据这个决议，拉科西与妻子一起迁移到克拉斯诺达尔，对于他来说，在那里参与匈牙利的政治生活就更加困难了。

四、由于英法武装干涉埃及、匈牙利事件以及美国近东和中东政策危险地活跃起来，造成近来国际局势中发生了许多变化，考虑到这种变化的重要意义，可以就国际局势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苏联外交部认为，在会谈结束时签署一个联合声明是适宜的，在联合声明中要强调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牢不可破和双方在评价当前国际局势时意见一致。

决议草案附后。

请予审议。

谢皮洛夫

1957年1月4日

附件

我们认为以下做法是适宜的：

一、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介绍波诺马连柯同志今年12月7日、11日和12日关于波兰局势的密电内容，但12月12日密电中涉及在波兰军队的建设中采用中国军队经验的地方（第15页第3段）除外。

二、委托苏联外交部（谢皮洛夫同志）、对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关系部（科瓦利同志）、苏联国防部（朱可夫同志）准备并向苏共中央提交有关波－苏关系和波兰局势的材料，以便在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期间将这些材料转交给他，材料中应列举具体事实说明苏联军队从希特勒占领军铁蹄下解放波兰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波兰人民的贫困处境和波兰经济的崩溃；说明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波－苏关系的特点和1944–1956年期间苏联对波兰经济援助的特点；在国际舞台上苏联为捍卫波兰利益提供的支持（波兰人民共和国西部边界问题等）；对近期波兰报刊和电台的观点进行综合：对今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波－苏会谈进行的总结等。

三、委托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准备一份转交给周恩来同志的材料，其内容是关于波兰报刊是如何不正确地报道中国共产党关于波兰，特别是匈牙利局势问题的立场的。

四、委托苏联外交部系统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通报关于波兰的局势。

五、委托苏联驻波兰大使波罗马连柯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大使保持紧密联系，并直接地以及通过我们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人士中的真诚朋友帮助中国大使获得有关波兰局势的客观的、正确的情报。

六、建议罗科索夫斯基同志在方便的场合（比如，在某一次招待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同志会晤，向他阐述自己关于波兰近期事件的观点，并在周恩来同志抵达莫斯科后，就上述问题向他通报。

译自《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11 卷，第 2810–2813 页

节选自《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6 辑，2008 年夏季号
第 7 辑，2008 年冬季号

人名译名对照表

阿尔希波夫，И. В. Архипов

阿里柯谢夫，А. Г. Алексеев

阿里斯托夫，А. Б. Аристов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

安德罗波夫，Ю. В. Андропов

安东诺夫，А. И. Антонов

奥哈布，E. Ochab

奥苏布卡 - 莫拉夫斯基，Osubka-Moravskii

巴鲁克，B. Baruch

巴塔，Bata István

鲍里先科，Борисенко

贝利亚，Л. П. Берия

贝鲁特，Boleslaw Bierut

彼得鲁舍夫斯基，Петрушевский

别尔乌辛，М. Г. Первухин

别洛博罗多夫，А. А. Белобородов

别斯托夫斯基，А. С. Пестовский

波波维奇，V. Popović

波伦，Charles E. Bolen

波伦，Chip Bohlen

波诺马连科，П. К. Пономаренко

波诺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

波斯佩洛夫，П. Н. Поспелов

布尔加宁，Н. А. Бурганин

布哈林，Н. И. Бухарин

布拉金，Булагин

布洛欣泽夫，Д. И. Блохинцев

崔昌益，Choe Chang-ik

崔庸健，Choi Yong-kon

多勃雷宁，А. Ф. Добрынин

方虎山，Pang Ho San

方学世，Pan Khak-se

费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

伏罗希洛夫，К. Е. Ворошилов

盖杜柯夫，Реми Гаидуков

高莱托夫，Горайтов

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

格罗·埃诺，Gero Erno

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

葛罗米柯，А. А. Громыко

古德利切夫，Кудричев

古谢夫，Гусев

赫布朗，Andrija Hebrang

赫格居斯，Hegedüs András

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щев

华西列夫斯基，А. М. Василевский

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

基里林，В. А. Кириллин

基里洛克，S. Kiryluk

基洛夫，С. М. Киров

吉洪诺夫，Тихонов

加夫里洛夫，В. А. Гаврилов

金昌满，Kim Chan-man

金承化，Kim Cyn-khva

金枓奉，Kim Tu-bong

金刚，Kim Gan
金俊根，Li Diun-gen
金日成，Kim Il-sung
金雄，Kim Ung
金一，Kim Il
金元凤，Kin Von-bon
金忠植 ,Kim Chyn-sik
居里，Joliot Curie
卡巴诺夫，И. Г. Кабанов
卡达尔·亚诺什，Kadar Janos
卡德尔，Edvard Kardelj
卡冈诺维奇，Л. М. Каганович
康特拉琴科，Кондратенко
科马尔，Waclaw Komar
科涅夫，И. С. Конев
科瓦利，К. И. Коваль
科瓦廖夫，И. В. Ковалев
科瓦奇，I. Kovacs
克利莫夫，И. В. Климов
克沃谢维奇，Wiktor Klosiewicz
库尔久科夫，И. Ф. Курдюков
库尔恰托夫，И. Курчатов
库兹涅佐夫，В. В. Кузнецов
拉博特诺夫，Работнов
拉科西·马加什，Matyas Rakosi
拉帕茨基，Adam Rapacki
拉先科，П. Лащенко
李弼奎，Li Pkhir-giu
李承烨，Lee Sung-yob
李熙尚，Li Khi-Sang
李一根，Lee Il-gyeong

帕夫洛夫，В. Н. Павлов
潘克拉托娃，Пакратова
朴昌玉，Pak Chang-ok
朴成哲，Pak Song-chol
朴金喆，Pak Kim-Cheol
朴宪永，Pak Hon-yong
朴一禹，Pak Il-u
朴义琓，Pak Ui-wan
朴永彬，Pak En-bin
朴正爱，Пак Ден Ай，Pak Jeong-ae
普扎诺夫，А. М. Пузанов
契尔沃年科，С. В Червоненко
切德利克，Четрик
茹约维奇，Zhuyevich
萨布罗夫，М. З. Сабуров
萨姆布罗夫斯基，Roman Zambrowski
萨丘科夫，Сачуков
萨瓦茨基，Aleksander Zawadski
萨韦利耶夫，Савельев
塞拜什，Sebes István
沙尔・约瑟夫，Száll József
沙甫琴科，Шавченко
沙图诺夫斯卡娅，О. Г. Шатуновская
什维佐夫，В. И. Швецов
斯查柯夫斯基，Józef Czesak
斯大林，Й. В. Сталин，化名菲利波夫（Филиппов）
斯拉夫斯基，Е. П. Славский
苏斯洛夫，М. А. Суслов
苏兹达列夫，Суздалев
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化名埃尔科利（Erkoli）
铁托，Josip Broz Tito

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
维辛斯基，А. Я. Вышинский
沃罗比约夫，Е. Воробьёв
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
乌宪科，Вушенко
武亭，Mu Chong
西伦凯维兹，Jozef Cyrankiewicz
希格乔夫，Шигочов
谢尔巴科夫，Л. А. Шербаков
谢尔宾，И. Д. Сербин
谢列平，А. Н. Шелепин
谢罗夫，И. А. Серов
谢皮洛夫，Д. Т. Шепилов
徐辉，So Hwi
许哥而，Ho Ka-yi
亚历山德罗夫，Н. 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
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
伊万诺夫，Иванов
尹公钦，Yun Kong-hum
尤金，П. Ф. Юдин
扎哈罗夫，М. В. Захаров
赵素昂，Cho Co-an
朱可夫，Г. К. Жуков
祖博夫，Зубов
佐林，В. А. Зорин